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年 北京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850×1168公厘 $\frac{1}{32}$ ·印張23 $\frac{1}{4}$ ·插頁8·字數522,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8,000 定价(5)2.30元

統一書号 1001·35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 目 录

第二卷說明 .....	VII—XI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神聖家族, 或對批判的 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 .....	3—268
序言 .....	7—8
第一章 以訂書匠的姿態出現的批判的批判或賴哈特先生 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 .....	9—12
第二章 體現為«MÜHLEIGNER»的批判的批判或茹爾· 法赫爾先生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 .....	13—18
第三章 “批判的批判的徹底性”或榮(榮格尼茨?)先生 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 .....	19—20
第四章 體現為認識的寧靜的批判的批判或埃德加爾先生 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 .....	21—67
(1)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聯合會”(恩格斯) .....	21
(2)貝羅論娼妓問題(恩格斯) .....	22
(3)愛情(馬克思) .....	23
(4)蒲魯東(馬克思) .....	27
賦予特征的翻譯 1 .....	27
批判性的評注 1 .....	38
批判性的評注 2 .....	42
賦予特征的翻譯 2 .....	46
批判性的評注 3 .....	47

賦予特征的翻譯 3 .....	53
批判性的評注 4 .....	60
賦予特征的翻譯 4 .....	63
批判性的評注 5 .....	64
第五章 販賣秘密的商人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或施里加先生	
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馬克思) .....	68—98
(1)“文明中的野蠻的秘密”和“國家中的無法紀的秘密” .....	69
(2)思辨結構的秘密 .....	71
(3)“有教養的社會的秘密” .....	76
(4)“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	88
(5)“秘密—譏諷” .....	91
(6)“斑鳩”(雨果萊特) .....	95
(7)“巴黎的秘密”的世界秩序 .....	97
第六章 絕對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魯諾先生所體現的批判的	
批判 .....	99—182
(1)絕對批判的第一次征討(馬克思) .....	99
(a)“精神”和“群眾” .....	99
(b)猶太人問題,第一號。問題的提法 .....	110
(c)辛利克斯,第一號。關於政治、社會主義和哲學的	
神秘暗示 .....	115
(2)絕對批判的第二次征討 .....	117
(a)辛利克斯,第二號。“批判”和“費爾巴哈”。	
對哲學的譴責(恩格斯) .....	117
(b)猶太人問題,第二號。關於社會主義、法學和政治學	
(民族性)的批判的發現(馬克思) .....	120
(3)絕對批判的第三次征討(馬克思) .....	127
(a)絕對批判的自我辯護。它的“政治的”過去 .....	127

(b) 犹太人問題, 第三号 .....	136
(c) 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	151
(d)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	158
(e) 社会主义的最后的败北 .....	170
(f) 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識的哲学 .....	173
第七章 批判的批判的通訊 .....	183—206
(1) 批判的群众(馬克思) .....	183
(2) “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 .....	189
(a) “冥頑不灵的群众”和“不知足的群众”(馬克思) .....	189
(b) “軟心腸的”和“求救的”群众(恩格斯) .....	198
(c) 天恩之降临于群众(馬克思) .....	196
(3) 非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或“批判”和“柏林学社” (馬克思) .....	197
第八章 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 或盖罗尔施坦 公爵魯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馬克思) .....	207—266
(1) 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 或“刺客” .....	208
(2) 揭露批判的宗教的秘密, 或瑪丽花 .....	212
(a) 思辨的“雛菊” .....	212
(b) 瑪丽花 .....	215
(3) 揭露法紀的秘密 .....	225
(a) “校长”, 或新的刑罰理論。单人牢房制的被揭露了的 秘密。医学的秘密 .....	225
(b) 奖賞和懲罰。双重裁判(附表) .....	239
(c) 消除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無法紀 .....	242
(4) “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	243
(5) 揭露利用人的欲望的秘密, 或克雷門斯·达尔維尔 .....	246
(6) 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 或路易莎·莫莱尔 .....	248

(7) 揭露政治經濟的秘密 .....	250
(a) 从理論上揭露政治經濟的秘密 .....	250
(b) “貧民銀行” .....	251
(c) 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場 .....	253
(8) 魯道夫, “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	255
第九章 批判的末日的审判(馬克思) .....	267—268
历史的結語 .....	268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 可靠材料 .....	269—587
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 .....	273
序言 .....	278
导言 .....	281
工業無产階級 .....	299
大城市 .....	303
竞争 .....	359
爱尔兰移民 .....	374
結果 .....	379
各別的劳动部門 狹义的工厂工人 .....	420
其他劳动部門 .....	475
工人运动 .....	500
矿业無产階級 .....	530
农业無产階級 .....	549
資产階級对無产階級的态度 .....	564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	588—601
弗·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說 .....	602—626
1845年2月8日的演說 .....	602

1845年2月15日的演說 .....	617
弗·恩格斯。最近發生的萊比錫大屠殺。	
——德國工人運動 .....	627—630
弗·恩格斯。德國狀況 .....	631—653
弗·恩格斯。“傅立叶論商業的片斷”的前言和結束語 .....	654—661
弗·恩格斯。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 .....	662—676
卡·馬克思。聲明。1846年1月18日 .....	677
注釋 .....	681—706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專業年表 .....	707—712
人名索引 .....	713—728
期刊索引 .....	729—731
譯後記 .....	732

## 插 圖

“神聖家族”一書第一版的扉頁 .....	5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第一版的扉頁 .....	271
弗·恩格斯“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的第一頁 .....	275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載有弗·恩格斯翻譯的愛·米德	
“蒸氣王”一詩的一頁 .....	472—473
曼徹斯特及其郊區平面圖 .....	514—515
“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一文的最後一頁，上面載有	
弗·恩格斯翻譯的亨·海涅的“西里西亞織工之歌” .....	592—593





## 第二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收集了他們在 1844 年 9 月至 1846 年 2 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1844 年 8 月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見；这次会見奠定了他們在理論工作和实际革命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創造性合作的基础。馬克思和恩格斯到这时已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收入本卷的著作反映了他們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一步形成的过程。

本卷开头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聖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在这部論战性的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观点进行了致命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他們对黑格尔辯証法中的合理的东西做了公正的評價，同时也批判了它的神秘部分。

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許多重要原理都在“神聖家族”一書中得到了闡述。在这部著作中，馬克思已經接触到生产方式在社会發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駁斥过去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时証明：先进的思想本身只能使社会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为了实

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見本卷第 152 頁）。在“神聖家族”中所提出的關於人民、群眾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原理有巨大的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會中發生的變革愈深入愈廣泛，完成這一變革的群眾也就愈眾多。列寧特別強調這個思想的意義，他認為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在“神聖家族”中還包含着幾乎已經形成的關於無產階級的世界歷史使命的觀點；無產階級由於自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處的地位，它“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並且消滅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慘無人道的生活條件，因為無產階級“不是白白地經受了勞動那種嚴酷的但是能把人鍛煉成鋼鐵的教育的。問題不在於目前某個無產者或者甚至整個無產階級把什麼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由於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歷史上有某些什麼作為”（第 45 頁）。

“對法國唯物主義的批判的戰鬥”一節有着巨大的意義；馬克思在這一節中概述了西歐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發展，同時指出，共產主義是唯物主義哲學的邏輯結論。

“神聖家族”一書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路·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的影響，費爾巴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過渡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時這部著作中已經含有 1845 年春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提綱”中批判費爾巴哈的形而上學的、直觀的唯物主義時所持的某些論點。後來恩格斯在確定“神聖家族”一書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中所占的地位時寫道：“人們應該以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對抽象的人的崇拜，代替費爾巴哈新宗教的核心。越出費爾巴哈哲學的範圍，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的觀點，這一工作是由馬克思於 1845 年在‘神聖家族’一書中開始

的。”(弗·恩格斯“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在“神聖家族”一書中也得到了表述。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根据私有制在其經濟运动中必将自行灭亡这一点論証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

弗·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也收在本卷中；列宁認为这部著作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正如本書作者后来指出的，这是一部早期的作品，它反映着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初期的一个阶段。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以这个当时最發达的国家为例闡明了資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的規律。他揭明了引起工厂無产階級出現的產業革命的全部奧秘，并且強調指出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恩格斯証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失業者的產業后备軍的形成，周期性經濟危机的不断重复以及随着資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对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剝削的日益加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用列宁的話來說，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对資本主义与資產階級的一份义正辞严的控訴書”。恩格斯一方面描写了英国工人的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同时指出無产階級所处的这种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資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恩格斯認为無产階級的階級斗争是历史發展的强大动力，他批判了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鼓吹博爱，宣揚友好的做法。恩格斯在总结英国工人运动的經驗时得出結論說：誠然进行罢工和成立工会是組織和教育工人階級的有效手段，但是二者畢竟無力把他們从雇佣奴隶制中解放出来。恩格斯对宪章运动有很高的評价，說它是無产階級的第一次独立的政治运动，但是同时又批評宪章主义者目标狹隘，并且

提出了一个極其重要的理論原理：宪章运动必須和社会主义結合起来。

載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兩篇文章“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和“在爱北斐特的演說”也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在这兩篇文章中还有費尔巴哈哲学倫理学观点的影响的痕迹。这两篇文章包含着有关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迹的一些重要資料，并且反映出恩格斯在 1844 年至 1845 年的冬天在萊茵省所进行的巨大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列宁在描述恩格斯这时进行活动的环境时写道，同情共产主义思想是当时德国反政府情緒的表现方式，因此，在参加运动的人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都是好心善意的資产者。“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無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別当中，恩格斯終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無产階級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九卷第 505 頁）

1845 年 4 月恩格斯迁居布魯塞尔以后，馬克思主义的这两位創始人繼續共同探討他們的新的观点，同时設法在报刊上宣傳这些观点，并同国际的無产階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代表建立联系。1845 年 9 月弗·恩格斯写“最近發生的萊比錫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一文；恩格斯从这篇文章起开始系統地为英国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極星报”撰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 年夏天旅居英国期間和宪章派中的革命派建立了巩固的联系。

弗·恩格斯为这家报纸写了一系列題为“德国状况”的論文，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德国社会的階級結構，指出了 18 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对德国發展的影响。恩格斯在这里作为一个为爭取統一民主的德国而奋斗的坚定战士，抨击德意志各邦的、首先是普魯士的反动制度，痛斥軍閥官僚的飞揚跋扈，大小王公的专橫暴

辰。同时恩格斯还揭露了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階級本質，尖銳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恩格斯在給“傅立叶論商業的片断”写的前言和結束語中，对傅立叶做了評价，認為他是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弗·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在倫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中宣布各国無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且揭穿了資產階級的世界主义。这两篇文章以及卡·馬克思 1846 年 1 月 18 日的“声明”都很重要，它們是馬克思主义的两位創始人在报刊上初次發表的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言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庸俗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观点是德国革命無产階級民主运动發展的严重障碍。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給建立無产階級政党奠定基础，于 1846 年 1 月在布魯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团结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先进工人，并且同工人运动中各种非無产階級的流派作斗争。

收入全集第二卷的是馬克思主义尚未最后形成时期的著作。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用的术语也说明了这一点。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随着馬克思和恩格斯学說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逐渐制定逐渐精确化的。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4年9月—1846年2月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  
神聖家族\*，  
或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sup>1</sup>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1月

1845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以单行本出版。

按1845年版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 合著

- “神聖家族”一書的書名，本來是意大利著名畫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Andrea Mantegna, 1431—1506) 一幅名畫的題目，畫中的人物是聖母馬利亞抱着聖嬰耶穌，旁邊有馬利亞的丈夫聖約瑟，有聖以利沙伯、聖約翰、聖亞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借用這個名來諷喻以布魯諾·鮑威爾為首的一伙的。他們把布·鮑威爾比作天父的獨生子耶穌，把其他幾個伙伴比作他的門徒。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為超乎群眾之上，以為他們的話就是天經地義，不容爭辯，正像耶穌在人們中傳道一樣。這幅畫的名稱本來應該譯為“聖家族”或“聖家”，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本著作過去一向譯為“神聖家族”，已經通用，所以，我們也就沿用了這個譯名。——譯者注

#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 K r i t i k

der

## K r i t i s c h e n K r i t i k.

---

W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

---

Von

###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

Frankfurt a. M.

L i t e r a r i s c h e A n s t a l t.

(J. Rütten.)

1 8 4 5.

“神聖家族”一書第一版的扉頁



## 序 言

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想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我们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sup>2</sup>（我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批判）愈是用哲学把现实歪曲得令人捧腹，那就对我们愈有教益。法赫尔和施里加二人便是例子。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

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假如我们在这里没有进而对这一发展本身加以探讨，那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所致。

同时，批判的批判使我們不得不用現在所达到的成果本身来同它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因此，我們先写下这篇論战性的序言，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現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見解。

**恩格斯、馬克思**

**1844年9月于巴黎**

## 第一章

### 以訂書匠的姿態出現的批判的批判或 賴哈特先生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

批判的批判雖然認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眾，但它仍然萬分憐憫群眾。所以批判愛群眾，甚至將它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死亡，反得批判的永生。批判本身變成了群眾，置身於我們中間，於是我們也看到了它的偉大——像天父的獨生子一樣的偉大。這就是說，批判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批判，並且談起“關於赤貧化的論文”<sup>3</sup>來了。它絲毫不覺得將自己比做上帝有什麼褻瀆的地方：它已經下凡，變成了訂書匠，並且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去胡言亂語，用外國話批判地胡言亂語。它純潔得猶如藍天，猶如處女，一看到罪孽深重的害麻瘋病的群眾就吓得心驚肉跳，但它還是克制住自己，研究了“波特茲”<sup>⊖</sup>的著作和“關於赤貧化的一切原著”，而且“多年來一直密切注視着時代的弊病”。它不願意為博學的專家們寫作，而要為廣大的讀者寫作，並且要清除一切古怪的語句、所有的“天書詞句和所有的行話”——它是要從別人的著作里清除所有這一切，因為假如希望批判本身服從“這種行政的規定”，那這要求未免太過分了。但是就在這一點上它還是做了一些的。它極其輕巧地擯棄了這些字的內容，雖然並沒有擯棄這些字本身。

⊖ 為賴哈特所歪曲的查理·狄更斯的筆名“波茲”的拼法。——編者注

这样，誰还敢指責它搬用“一大堆不可理解的外國字”呢？即使它已經用它的一貫的表現宣告這些字對它自己來說也是不可理解的。

下面就是這種一貫表現的若干例子：

“因此，貧困制度<sup>①</sup>是他們恐懼的對象。”

“人類思想<sup>②</sup>的每個活動在其中都成為洛特太太的形象<sup>③</sup>的責任感學說。”

“在這個真正充滿信心的藝術建築<sup>④</sup>的拱頂石上。”

“這就是施泰因這位偉大的國家要人早在引退之前就交給了政府和它的一切著作<sup>⑤</sup>的政治遺囑的主要內容。”

“當時這一民族對如此廣泛的自由還沒有任何測定<sup>⑥</sup>。”

“在他的政論文章的結尾幾行中確有把握地談判道<sup>⑦</sup>：所缺乏的只是信任。”

“對最高國家的、不愧為真正男子漢的、超絕於成規和怯懦的、在歷史中受到教育的和用他國的公眾政治生活的活生生的直觀培養起來的理智。”

“全民福利的教育。”

“在當局的監督下，自由長眠在各族人民的普魯士使命的胸堂里<sup>⑧</sup>。”

“人民機體的<sup>⑨</sup>政論文章。”

“對人民，甚至勃律蓋曼先生也要把他的成年洗禮證書<sup>⑩</sup>交給他們。”

① 原文是 Institutionen des Bettlertums。——譯者注

② 原文是 Menschengedankens。——譯者注

③ 原文是 zum Abbild von Lots Weib wird。——譯者注

④ 原文是 gesinnungsreichen Kunstgebäudes。——譯者注

⑤ 原文是 und allen ihren Abhandlungen。——譯者注

⑥ 原文是 noch keine Dimensionen。——譯者注

⑦ 原文是 parlamentiert。——譯者注

⑧ 原文是 in der Brust des preußischen Völkerberufs。——譯者注

⑨ 原文是 Volksorganische。——譯者注

⑩ 原文是 Taufzeugnis seiner Mündigkeit。——譯者注



“和专门研究人民特殊使命的著作中所陈述的其他**規定性**<sup>①</sup>所發生的矛盾是相当尖銳的。”

“丑惡的貪婪心会很快打破一切**民族意志的幻想**<sup>②</sup>。”

“渴望暴富等等的心情就是那种始終貫串在复辟时期中的精神，这种精神带着相当数量的**漠不关心**归附于<sup>③</sup>新的时代。”

“**農業的普魯士民族**<sup>④</sup>对政治意义所固有的糊塗观念是基于对偉大历史的回忆<sup>⑤</sup>。”

“反感消失了并轉入了十分兴奋的状态。”

“在这种惊人的轉变中，每个人都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远景中的特殊**願望**<sup>⑥</sup>。”

“使用塗了聖油的所罗門語言的教义問答，它的話語像鴿子一样，**嘖啞！嘖啞！**慢慢地飞上感染力和**雷鳴般的外貌**<sup>⑦</sup>的境界。”

“**三十五年的忽視的整个艺术涉猎**<sup>⑧</sup>。”

“假如宾达对1808年的城市章程的看法没有关于城市章程的本質和实施的概念的**穆斯林傾向的**<sup>⑨</sup>缺点，那末就能够用我們的代表所特有的那种心平气和的精神去接受以前的一个城市統治者加于市民头上的过分刺耳的怒喝<sup>⑩</sup>。”

处处和賴哈特先生的文風上的勇敢相吻合的，是思路本身的勇敢。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① 原文是 Bestimmtheiten。——譯者注

② 原文是 Schimären des Nationalwillens。——譯者注

③ 原文是 einer ziemlichen Quantität Indifferens… anschloß。——譯者注

④ 原文是 landmannschaftlichen preußischen Nationalität。——譯者注

⑤ 原文是 ruht auf dem Gedächtnis einer großen Geschichte。——譯者注

⑥ 原文是 stellte… Wunsch in Aussicht。——譯者注

⑦ 原文是 donnerähnlicher Aspekten。——譯者注

⑧ 原文是 Dilettantismus einer fünfunddreißigjährigen Vernachlässigung。——譯者注

⑨ 原文是 moslemischen Begriffs-Affektion。——譯者注

⑩ 原文是 grelle Verdonnern。——譯者注

“勃律盖曼先生……1843年……国家学說……每个正直的人……我們的社会主义者的偉大的謙遜……自然的奇迹……應該向德国提出的要求……超自然的奇迹……亚伯拉罕<sup>①</sup>……費拉得尔菲亚……甘露……面包师……但是因為我們談到奇迹,所以拿破侖就会拿来……”等等。

看完上面这些例子,我們就不会再觉得奇怪,为什么批判的批判还要向我們“解釋”它自認为是“通俗化的表現方法”的那种說法。因为它“用能够透視混乱的有机力量来武装自己的双眼”。而在这里应当提醒一句,这样一来,甚至“通俗化的表現方法”对批判的批判說来也不能是不可理解的了。它懂得,假如踏上文学家道路的主体沒有足够的力量把这条路弄直,那这条路就必然还是弯曲的;所以它也就很自然地把“数学演算”强加在作家的头上了。

不言而喻,批判的批判之所以变成群众,并不是为了本身要成为群众,而是为了使群众摆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也就是說,要把群众的通俗化的表現方法提升为批判的批判所使用的批判的語言。历史証实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同样也証实了这一点。如果批判掌握通俗化的群众語言,并把这种粗野的俚語改造成批判的批判的辯証法所具有的莫測高深的詞句,那末这正說明批判把自己的身分降低到了極点。

---

① 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參看旧約全書創世記第 17 章。——譯者注

## 第二章

### 体现为《MÜHLEIGNER》<sup>4</sup>的批判的批判或 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批判在前面不顾自己的身分用外国话胡言乱语，从而给自己意识大效其劳，同时用这种行动把世界从贫困中解救了出来；现在，它又打算不顾自己的身分在实践和历史中胡言乱语了。它通晓“英国的迫切问题”并给我们提供了真正批判的英国工业史概要<sup>5</sup>。

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因为这无异于承认卑贱的群众的全部群众的群众性，而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众摆脱这种群众性。因此历史将从它的群众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对象的批判又向历史吆喝道：“你知道吗，你应当如此这般地产生！”批判的一切法律都有溯及既往的力量，在批判的判决以前，历史完全不是遵照批判的判决产生的。因此，群众的，即所谓真正的历史是和“文学报”第7期第4页上开始发表的批判的历史大不相同的。

在群众的历史中，工厂出现以前是没有任何工厂城市的，可是在儿子生父亲（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的批判的历史中，曼彻斯特、波尔顿和普累斯顿在谁都还没有想到工厂以前就已经是繁荣的工厂城市了。在真正的历史中，棉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是从哈格里沃斯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的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运用到生产上以

后才开始的，而克倫普頓的騾机只不过是运用了阿克萊發明的新原理来改进珍妮紡紗机而成的。但是批判的历史善于辨别：它輕蔑地否認了珍妮紡紗机和水力紡紗机的片面性，并把騾机誉为这两个極端的思辨的同一。实际上，随着水力紡紗机和騾机的發明，立即有了在这些机器上运用水力的可能，但是批判的批判却把那些被历史的粗笨的手撮合在一起的原則互相分割开来，并把水力的这种运用当做一种完全特殊的东西归于較晚的时代。实际上，蒸汽机的發明早于上述的一切發明，而在批判中，蒸汽机被当成整个建筑物的頂点，因而在時間上是最晚的。

实际上，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之間的現代意义上的**商务联系**是英国商品出口的結果，在批判中，商务联系却成了这种出口的原因，而商务联系和出口这二者則是这两个城市成为近邻的結果。实际上，从曼徹斯特运往大陆的所有的商品几乎都經過**赫尔**，在批判中却認為是經過**利物浦**。

实际上，英国的工厂里存在着所有的**工資等級**，从1 $\frac{1}{2}$ 先令到40先令，甚至更多一些，在批判中却只有一种工資——11先令。实际上，**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而在批判中却是机器代替了思維。实际上，工人为了提高工資而实行的**联合在英国是允許的**，在批判中，这种联合却是被禁止的，因为群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請求批判的允許。实际上，**工厂劳动是極端折磨人的**，并且引起各种特殊的疾病（甚至有專門研究这些疾病的医学著作），在批判中却說“过分的緊張不会妨碍劳动，因为出力的是机器”。实际上，机器就是机器，在批判中，机器却有**意志**：机器不休息，工人也不能休息，所以工人是受外来意志支配的。

但是这些还算不了什么。批判不滿意英国的群众的政党；它

創造了新的政党，創造了“工厂党”，为此，历史应对它表示感謝。可是它把厂主和工厂工人混为群众的一团，——这点区区小事又何足为怪呢！——并且武断地說，工厂工人不給反谷物法同盟<sup>6</sup>捐献基金，并不像愚蠢的厂主所說的那样是出于恶意或是由于对宪章主义的拥护，而只是由于貧穷。批判接着武断地說，一旦英国的谷物法被廢除，农業短工就一定会同意降低工資，但是，我們敢于冒昧地指出，这个一貧如洗的階級再也不会同意减少一文錢，否則他們就会餓死。虽然愚蠢的非批判的英国法律注意到不使工作超过十二小时，批判却武断地說，英国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六小时。虽然非批判的群众的美国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通过竞争漸漸地一个又一个地夺去了英国人的市場，批判却武断地說，英国仍旧应当成为全世界的大作坊。最后，批判武断地說，财产的集中及其对劳动階級所造成的后果，在英国無論是有产階級或是無产階級都沒有看出来，可是愚蠢的宪章派就認為他們对财产集中的現象了解得非常透澈，社会主义者也認為他們早已詳尽地描述了这种后果，而且連托利党人和輝格党人（如卡萊尔、艾利生和蓋斯克爾）都可以用自己的著作来証明他們是了解这种現象的。

批判武断地說，艾釋黎勛爵的十小时法案<sup>7</sup>是膚淺的中庸的措施，而艾釋黎勳爵本人則是“立宪活动的忠实的反映”，可是到現在为止，厂主、宪章派、土地占有者（一句話，整个群众的英国）都把这种措施看成徹底激进的原則的一种表現（誠然是極微弱的表現），因为这种措施会破坏对外貿易的根基，并且会随之而破坏工厂制度的根基，——更确切些說，不仅会破坏，而且会挖它的老根。这一点批判的批判比誰都了解。批判知道，十小时工作日的問題是在下院的一个什么“委员会”上討論过，而非批判的报纸还竭力要

使我們相信这一“委员会”就是下院本身，即“**全院委员会**”，但是批判却非取消英国宪法的这种荒誕性不可。

批判的批判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即群众的愚蠢，同时也制造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愚蠢，它用批判地解釋英語的方法把非批判的内务大臣从来没有說过的話归之于这位大臣，而它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借格莱安的愚蠢来更加鮮明地衬托出自己的聪明。批判宣称，格莱安曾說过不管工厂的机器每天工作十小时或十二小时，工厂的机器大約可用十二年，所以十小时法案使资本家不可能通过机器的工作在十二年里再生产出投入这些机器的資本。批判接着就証明它替格莱安爵士捏造出来的結論是錯誤的，因为机器每天少工作  $\frac{1}{6}$  的时间，它的使用年限自然会延长。

尽管批判的批判对它自己的錯誤結論的这种指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們应当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主持公道，实际上他是这样講的：实行了十小时法案，机器就必然会按工作時間縮短的比例加快速度（批判本身在第8期第32頁上也引証过这段話），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的磨損时间仍然正好是十二年。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認的，更何况这种承認只是对“批判”的贊揚和歌頌，因为正是批判本身不仅做出了錯誤的結論，并且接着又把它駁倒。批判对待約翰·罗素勋爵却非常寬宏大量，它硬說这位勋爵有改变国家制度的形式和选举制度的意圖。由此我們必須做出結論：不是批判生来就特別醉心于制造蠢事，就是約翰·罗素勋爵在最近一周变成了批判的批判家。

批判發現：虽然有迹象表明“英国工人也注意工作時間的立法限制”，但是他們对这一問題只表現了“部分的关心”，而实际上工人为了要求实行十小时法案，在四、五月間曾一次又一次地举行集

會，一次又一次地請願，工廠區的每一個角落都籠罩着一種兩年來從來沒有過的激憤；批判還作出了一个偉大的、卓越的、前所未聞的發現：“乍看起來，廢除谷物法會給工人帶來更多的直接的好處，所以在工人的大部分願望得到滿足從而實際證明廢除谷物法對工人毫無好處以前，工人一直都會把這些願望寄托在廢除谷物法上面”，而實際上，工人在一切公眾的集會中堅決地把主張廢除谷物法的人從講壇上轟走，使反谷物法同盟不敢在英國的任何一個工廠城市舉行公眾的集會，他們把反谷物法同盟看做唯一的敵人，他們在討論十小時工作日時，像在討論類似的問題時幾乎經常有的現象一樣得到托利黨人的支持。批判正是在作出這些發現的時候，它在製造蠢事方面才真正變得偉大起來。批判發現：“工人仍被憲章運動的廣泛的允諾所迷住”，而實際上憲章運動正是工人的輿論的政治表現；批判在自己的絕對精神的深處看出“兩個集團即政治集團與土地和工廠所有者集團已經互不融合和互不掩護”，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聽到過，土地和工廠所有者集團這兩個私有者階級雖然人數不多，政治權利也完全一樣（少數貴族除外），却具有這樣廣泛的性質，我們還沒有聽到過，實際上作為政党的最徹底的表現和頂點的這一集團又是和政党集團絕對同一的。批判能有這些發現真是妙不可言。批判硬說主張廢除谷物法的人不知道下面這個事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谷物價格降低，工資也必然會降低，結果一切都仍舊和過去一樣，而事實上這些先生們是指望借助工資的這種顯著降低和由此而來的生產費用的減少來相應地擴大市場，可是這樣一來就減少了工人之間的競爭，因而工資和谷物的價格比較起來多少總比現在要高一些。批判硬這樣說真是妙極了。

在艺术家式的陶醉中任意創造自己的对立物——胡言乱語——的批判，也就是两年前叫喊“批判講德語，神学講拉丁語”<sup>8</sup>的那个批判，現在它又学会了英語，把土地占有者叫做«Landeigner» (landowners)，把厂主叫做«Mühleigner» (mill-owners；英語中的«mill»指的是一切用蒸气或水力發动机器的工厂)，把工人叫做“手”(hands)，用“干扰”(interference)来代替“干涉”，并且基于对渗透了罪恶的群众性的英語的無比同情，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来改造英語和廢除学究式的規則，按照这一規則，英国人总是把勋爵士和从男爵的称号“爵士”冠在名的前面，而不冠在姓的前面。群众說“爵士詹姆斯·格萊安”；而批判却說“爵士格萊安”。

批判着手改造英国的历史和英国的語言是从原則出發，而不是輕率从事，关于这一点，讀者現在可以从它对待璘威尔克先生的历史时所具有的那种徹底性中得到証明。



### 第三章

## “批判的批判的徹底性”或 荣(荣格尼茨?)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sup>9</sup>

璠威尔克先生和柏林大学哲学系的無比重要的爭論，批判不能置若罔聞。它本来也經歷过类似的事情，并且必然会把璠威尔克先生的命运拿来当做背景，以便把波恩的撤职事件<sup>10</sup>衬托得更引人注意。因为批判已經慣于把波恩的这段历史看做当代的突出事件，甚至写成了“批判的解职的哲学”，所以可以預料，它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把柏林的“冲突”构成詳細的哲学大綱。它 a priori [先驗地] 証明：这一切都必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發生。就是說，它表明：

(1) 为什么哲学系一定要和国家哲学家發生“冲突”，而不和邏輯学家或形而上学者發生“冲突”；

(2) 为什么这次冲突不可能像批判和神学在波恩的爭斗那样激烈和徹底；

(3) 为什么这次冲突实际上是一件蠢事，既然批判在波恩的冲突中已經穷尽了一切可能的原則和一切可能的內容，而且从那时起，世界史只好变成批判的抄襲者了；

(4) 为什么哲学系把对璠威尔克先生的著作的攻击看成对自己的攻击；

(5) 为什么璠威尔克先生除了自动离职就别無出路；

(6)为什么哲学系不想背弃自己就一定得維護璠威尔克先生;

(7)为什么“哲学系內部的紛爭必然要表現在”哲学系同时認為璠威尔克和政府都对又都不对这一点上;

(8)为什么哲学系在璠威尔克的著作中找不出他被撤职的根据;

(9)什么东西使得整个判断都不明确;

(10)为什么“作为科学机关(!)的”哲学系“認為自己(!)有权利(!)观察事件的根源”;最后,

(11)为什么哲学系仍然不願意用璠威尔克先生那样的方式从事写作。

批判用四頁的篇幅以罕有的徹底性分析了这些重要問題,同时它运用黑格尔的邏輯来証明:为什么这一切正是这样發生,为什么無論什么神都無法反对这一点。批判在另一个地方說,还没有一个历史时代已經被認識;由于謙遜,它不便說它至少已經充分認識了即使本身并不就是时代但是在它看来終归还是构成了时代的它自己的冲突和璠威尔克的冲突。

“揚弃了”自己的徹底性“因素”的批判的批判又变成了“認識的宁靜”。

## 第四章

### 体现为認識的宁靜的批判的批判或 埃德加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 (1) 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sup>11</sup>

法国社会主义者肯定地說：工人制造一切，生产一切，但是他們既沒有权利，又沒有财产，简单地說，一無所有。关于这一点，批判通过体现了認識的宁靜的埃德加尔先生的嘴作了如下的回答：

“为了創造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的意識更强有力的意識。上述論点只有像下面这样倒过来講才是正确的：工人什么东西也沒有制造，所以他們也就一無所有；他們之所以什么都沒有制造，是因为他們的工作始終是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

在这里，批判达到了如此高度的抽象，以致于在它看来，只有它自己的思想創造以及和任何现实都相矛盾的普遍性才是“某种东西”，甚至就是“一切”。工人之所以什么都沒有創造，是因为他們所創造的仅仅是“单一的东西”，即可以感触到的、非精神的和非批判的对象，这些对象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純批判深恶痛絕。凡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是非批判的、群众的，因此，它是“無”，只有批判的批判的理想的、虛幻的創造才是“一切”。

工人之所以什么都沒有創造，是因为他們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滿足他們个人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也就是因为在現代的世界秩序下，各个单个的、互有內在联系的劳动部門是分離開来的，

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一句話，就是因为劳动沒有組織起来。批判本身所提出的論点，如果从唯一可能的合理的意义上来加以說明，就是要求劳动有組織。弗洛拉·特莉斯坦（分析她的著作就可以發現这种偉大的論点）也有同样的要求，而且由于她竟敢走在批判的批判的前头，遭到了后者的極端的鄙視。“工人什么都沒有創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東西这一事实（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談的話，这种論点簡直就是瘋話。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証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創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Unmensch〕，然而，他的确对于自己是一个批判的批判家这一点感到一种內心的滿足。

“弗洛拉·特莉斯坦給我們提供了一个妇女的教条主义的例子，这种教条主义离开公式就寸步难行，并且还用現存事物的范疇来制定公式。”

批判所做的，仅仅是“用現存事物的范疇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現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現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沒有。而且尽管批判在竭力抨击教条主义，但是它还是宣告自己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妇女的教条主义**。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無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胭脂抹粉，把她那干癟得令人厭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飢似渴地物色求婚者。

## （2）貝罗論娼妓問題

埃德加尔先生曾一度降低身分来过問社会問題，他認為自己

也有責任干預“淫亂的關係”。（第5期第26頁）

他批評巴黎的一位警官貝羅所著的關於娼妓制度的書，因為“貝羅在考察娼妓對社會的關係時”所持的“觀點”使他感到不安。“認識的寧靜”對於警察正是從警察的觀點來考察問題這一點感到驚訝，而且它要使群眾了解這一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可是它却不讓人了解它自己的觀點。十分明顯！當批判跟娼妓在一起鬼混的時候，是不能要求它在公眾面前做到這一點的。

### （3）愛 情

為了達到完美的“認識的寧靜”，批判的批判首先必須竭力擺脫愛情。愛情是一種情欲，而對認識的寧靜說來，再沒有比情欲更危險的東西了。所以，埃德加爾先生正在借馮·帕爾佐夫夫人的小說（他保證說：這些小說“他已徹底研究過”）來克服“被稱為愛情的那種幼稚行為”。愛情是災禍，是妖魔，它激起批判的批判的仇恨、憤怒以至癡瘋。

“愛情……是一個凶神。她像所有的神一樣，要支配整個的人，直到人不僅將自己的靈魂、而且將自己的肉體的‘自我’交給她時，她才感到滿足。對愛情的崇拜便是苦惱，這種崇拜的頂峰就是使自己成為犧牲品，就是自殺。”

為了把愛情變為“摩洛赫”<sup>①</sup>，變為魔鬼的化身，埃德加爾先生先把它變成神。在變成神即神學的对象之後，愛情自然就會受到神學的批判了；何況大家都知道，神和魔鬼也相差無幾。埃德加爾先生把愛情變成“神”，而且是變成“凶神”，所用的辦法是把愛人

<sup>①</sup> 古腓尼基人所奉的火神，以人，特別是兒童做祭品。——譯者注

者、把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把“爱情”作为特殊的本質和人分割开来，并使它本身成为独立存在的東西。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通过謂語到主体的这一轉变，就可以把人所固有的一切規定和表現都批判地改造成怪物和人类本質的自我异化。例如，批判的批判把作为謂語和人的活动的批判变成特殊的主体，变成針对自身的批判，因而也就变成批判的批判，即变成一个“摩洛赫”；对它的崇拜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人本身特别是人的思考能力的自杀。

“对象”，——認識的宁靜叫道——“对象是一个非常确切的詞，因为，对爱者說来，被爱者（沒有女的）<sup>①</sup>只有作为他所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即作为他希望用来滿足自己的私欲的客体时，才是重要的。”

**对象！**可怕得很！沒有比对象更可憎、更鄙俗、更群众的了，——a bas〔打倒〕对象！絕對的主觀性、actus purus〔純粹的活动〕、“純”批判怎么能不把爱情看做 bête noire<sup>⊖</sup>，看做撒但<sup>②</sup>的現身呢！因为爱情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物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甚至把对象变成了人！

認識的宁靜激憤地繼續說道：爱情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客体**”这样一个范疇还不放心，它甚至把他变成一定的、现实的客体，变成这个卑賤个人的（見黑格尔关于“这个”和“那个”两范疇的“現象学”<sup>12</sup>，这里面也在进行反对卑賤的“这个”的論爭）、外在的、

① 德文“被爱者”（Geliebte）在这里應該是个陰性詞，但埃德加尔却把它当做陽性詞来使用，因而在这里“爱者”和“被爱者”两詞都屬於陽性，指的都是男人，所以馬克思諷刺地加了一句：“沒有女的”。——譯者注

⊖ 直譯是黑兽，意即鬼魅、非常討厭的东西。——編者注

② 撒但是惡魔的別名。參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4章。——譯者注

不仅是內在的、隱藏在脑子里面的、而且是可以感触得到的客体。

“爱情  
不只是幽禁在脑子里。”

不，被爱者是感性的对象，而批判的批判（如果它不得不屈节承認某种对象的話）最低限度也会要求对象成为一个非感性的对象。然而爱情却是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

最后，爱情竟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所“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变成滿足另一个人的私欲的客体，——这种欲望之所以是自私的，是因为它企圖在别人身上寻求自己的本質，但这是不應該的。批判的批判是这样地清心寡欲，以至于在自己的“自我”身上可以充分找到人类本質的全部内容。

埃德加尔先生自然沒有告訴我們，被爱者和所有其他“用来滿足人們的私欲的、令人迷恋的外在客体”有什么不同。誘人的、多情的、內容丰富的爱情这个对象，对認識的宁靜說来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模型：“令人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这正像彗星对思辨的自然哲学家說来只不过是“負”这个范疇一样。一个人在把另一个人变成自己迷恋的外在客体时，的确（根据批判的批判的承認）是在賦予他以“重要性”，但这是所謂的对象的重要性，然而批判所賦予对象的重要性無非就是批判自己賦予自己的那种重要性。因此，这种批判的“重要性”表明自己不是“卑賤的外在的有”，而是批判的重要对象的“無”。

如果認識的宁靜在现实的人身上得不到对象，那末，相反地它就会在人类中間获得事業。批判的爱情“最担心的是由于个人而忘記事業，这就是人类的事業”。而非批判的爱情却沒有把人类和单个的人、和个人分割开来。

“爱情本身是一种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走向何方的抽象的情欲，它对于內在的發展不感兴趣。”

因为在思辨的用語中，具体的叫做抽象的，而抽象的却叫做具体的，所以在認識的宁靜的眼里爱情是抽象的情欲。

“她不是降生在山谷里，  
誰都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她匆匆地辞別而去，  
連踪影也随之消失。”<sup>13</sup>

在抽象的眼里，爱情是“来自异乡的少女”，她沒有携带辯証的护照，因而被批判的警察驅逐出境。

爱情的情欲对于內在的發展不感兴趣，因为它不可能被 a priori [先驗地] 构造出来，因为它的發展是發生于感性世界中和現實的个人当中的現實的發展。而思辨結構的主要兴趣則是“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来自何处”正是“概念的必然性、它的証明和演繹”(黑格尔)。“走向何方”則是这样的一个規定，“由于它，思辨的圓环上的每一环，像方法的生气蓬勃的內容一样，同时又是新的一环的發端”(黑格尔)。这样，只有在爱情的“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可以被 a priori [先驗地] 构造出来的时候，爱情才会使思辨的批判感到“兴趣”。

在这里，批判的批判不仅反对爱情，而且也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切直接的东西、一切感性的經驗，反对所有一切实际的經驗，而关于这种經驗，我們是决不会預先知道它“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的。

埃德加尔先生通过对爱情的克服，完全肯定了自己是“認識的宁靜”。接着他又立刻通过蒲魯东显示了他在認識(对这种認識說



来，“对象”不再是“这一外在客体”了）上的高深的造詣，同时也表現了他对法語的更深的不爱。

#### (4) 蒲魯东

按照批判的批判的說法，“什么是财产？”<sup>14</sup>这部著作不是蒲魯东本人写的，而是“蒲魯东的观点”写的：

“我对蒲魯东的观点的闡述，从評定它(观点)①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开始。”

因为只有批判的观点的著作本身才具有特征，所以批判的評定必然从賦予蒲魯东的著作以一种特征开始。埃德加尔先生賦予这部著作以特征的方法是翻譯。当然，他賦予它的是丑恶的特征，因为他把它变成了“批判”的对象。

于是，蒲魯东的著作就遭到了埃德加尔先生的双重攻击，即通过賦予特征的翻譯的暗中攻击和通过批判性的評注的公开攻击。我們將看到，埃德加尔先生在翻譯时比他在做評注时更为毒辣。

#### 賦予特征的翻譯 1

“我不想(这是被批判地翻譯过的蒲魯东在說話)②提供任何新东西的体系，除了廢除特权、消灭奴役以外，我別無其他願望……公平，除了公平而外別無其他，——这就是我的主張。”

被賦予特征的蒲魯东仅限于有願望和主張，因为“善良的願望”和非科学的“主張”是非批判的群众的特性。被賦予特征的蒲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魯东的特点,就是他具有与群众的身分相称的馴順的性格,他使自己所希求的东西服从于自己所不希求的东西。他不敢奢望提供新东西的体系,他的願望很低,他甚至除了廢除特权等等之外就別無其他願望。除了这样把自己已有的願望批判地从屬于自己所沒有的願望以外,他的第一句話还立即暴露了特有的邏輯缺点。一个作家既然在自己的書中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想提供新东西的体系,那末他当然應該告訴我們,他到底想提供什么?是想提供系統化的旧东西呢,还是非系統化的新东西?但是,被賦予特征的蒲魯东既然不想提供任何新东西的体系,那末,他是否想提供特权的廢除呢?不,他只是希望廢除特权。

真正的蒲魯东說:«Je ne fais pas de système; je demande la fin du privilège» etc. (“我不創立任何体系,我要求廢除特权”等等)。这就是說,真正的蒲魯东声明:他不追求任何抽象的科学的目的,而只是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而且他的要求决不是任意提出的。这个要求由于他对論題的全部發揮而成为有根据和有理由的要求,它就是这种發揮的要領,因为,“公平,并且仅仅是公平,这就是我的立論的要領”。被賦予特征的蒲魯东說过:“公平,除了公平而外別無其他,——这就是我的主張”,这种說法使他陷入了更加狼狽的境地,因为他还“主張”其他許多事情,例如,照埃德加尔先生的說法,他“主張”哲学在过去是不够实际的,“主張”駁倒沙尔·孔德,如此等等。

批判的蒲魯东自問道:“难道人有責任永远是不幸的嗎?”換句話說,他問的是:不幸是不是人的道德本份?而真正的蒲魯东是个輕佻的法国人,所以他提的問題是这样:不幸是不是一种物質的必然性,是不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 (“难道人不可避免地永远不

幸嗎?”)

群众的蒲魯东說：

«Et, sans m'arrêter aux explications à toute fin des entrepreneurs de réformes, accusant de la détresse générale, ceux-ci la lâcheté et l'impéritie du pouvoir, ceux-là les conspirateurs et les émeutes, d'autres 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 etc. [“我不談改良派厂主的那些毋庸辯駁的解釋，他們中的一些人把普遍的貧困归咎于政府的胆怯和無能，另一些人归咎于陰謀家和叛乱，还有一些人則归咎于無知和普遍的墮落腐化”，等等。]

因为«à toute fin»是群众的德文字典中所找不到的下流的群众用語，所以批判的蒲魯东自然就擯弃了这个把“解釋”[explications]一詞規定得比較确切的用語。这个術語是从群众的法国法学中借来的，在法国法学中，«explications à toute fin»的含义是“毋庸辯駁的解釋”。批判的蒲魯东評击“改良主义者”，即法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sup>15</sup>，而群众的蒲魯东所評击的則是“改良派厂主”。群众的蒲魯东把各种类型的“改良派厂主”加以区别：这一类(ceux-ci)說些什么，那一类(ceux-là)說些什么，另一类(d'autres)又說些什么。批判的蒲魯东却讓同样的一些改良主义者“时而譴責这个，时而譴責那个，时而又譴責另一个”，这無論如何証明他們是反复無常的。真正的蒲魯东根据群众的法国实践来談«les conspirateurs et les émeutes» [“陰謀家和叛乱”]，也就是說，先指出陰謀家，然后再指出他們的行动——叛乱。相反地，把各种类型的改良主义者混为一談的批判的蒲魯东却把暴徒加以分类，所以他說“陰謀家和叛乱者”。群众的蒲魯东說的是無知和“普遍的墮落腐化”。批判的蒲魯东則把無知变为愚蠢，把“墮落腐化”变为“下流無耻”，最后又以批判的批判家的身分把愚蠢变为普遍的。于是他自

己就在这里現身說法地做了一个愚蠢的榜样，因为他用«générale»这个字时写的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他写的是：«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而想說的却是：“普遍的愚蠢和普遍的下流無耻”。按照非批判的法文语法，这里应该写成这样：«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s»<sup>①</sup>。

被赋予特征的蒲魯东在說話方面和思考問題方面都跟群众的蒲魯东不同，当然他也經歷过完全不同的教育过程。他“請教过科学大师，讀完了数百卷哲学和法学等方面的著作，最后还确信：我們从来没有正确地了解‘公平、正义、自由’这几个詞的含义”。而真正的蒲魯东則認為，他一开始就理解了（*je crus d'abord reconnaître*）批判的蒲魯东只是在“最后”才領悟的东西。这里之所以必須把 *d'abord*〔一开始〕批判地改变为 *enfin*〔最后〕，是因为群众不敢相信他們“一开始”就理解了什么东西。群众的蒲魯东用最明快的語言叙述他怎样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种意外成果感到驚訝，叙述他怎样不相信这个成果。因此他决定进行“反証”，他向自己問道：“人类是否可能在道德运用的原則方面这样长期地受騙呢？人类是怎样和为什么受騙的呢？”等等。他認為，自己的观察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些問題的解决。他得出結論說，在道德方面，也像在其他一切知識領域中一样，謬誤“构成科学的阶梯”。相反地，批判的蒲魯东却立刻就相信了他在政治經济学、法学等方面的研究所給予他的第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显然是这样：群众不敢

① 法文中形容詞有单数和多数之分。在这里，在蒲魯东的原文中«générale»〔普遍的〕是单数，它所形容的名詞仅仅是它紧前面的«corruption»〔墮落腐化〕一詞，但是埃·鮑威尔却把它当做多数来翻譯，因而成了它前面的两个名詞的形容詞。——譯者注

認真地行動，他們一定要把自己研究的初步成果奉為無可辯駁的真理。他們“在和自己的反對方面較量之前，一開始就有了現成的見解”，因此後來“發現，當他們自以為已經到達終點的時候，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到達起點呢”。

於是，批判的蒲魯東繼續毫無根據地語無倫次地大發議論：

“我們關於道德規則的知識不是一開始就很充分的，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它可能足夠社會進步之用，但是到後來它就會把我們引入歧途。”

批判的蒲魯東沒有解釋，關於道德規則的不充分的知識為什麼可能足夠社會進步之用（哪怕是只在一天之內）。而真正的蒲魯東卻先向自己提出問題：人類是否可能和為什麼可能這樣普遍、這樣長期地迷誤不醒？他認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一切謬誤都構成科學的階梯，甚至我們的最不完善的判斷也包含着一些真理，這些真理對於某些歸納推論和對於實際生活的某一特定領域是完全夠用的；超出這些推論和這個領域，這些真理就會在理論上產生謬誤，在實踐上導致失敗。蒲魯東在做了這樣的解釋以後，他就能夠說，甚至關於道德規則的不完備的知識在一定的時間內也可能足夠社會進步之用。

批判的蒲魯東說：

“但是，對新知識的需要一經出現，舊偏見和新思想之間立即就會爆發殘酷的鬥爭。”

但是，怎麼可以跟還不存在的敵人進行鬥爭呢？要知道，儘管批判的蒲魯東也告訴我們對新思想的需要產生了，但是他還並沒有說這個新思想本身已經產生了。

群眾的蒲魯東說的則是：

“對更高的知識的需要一經出現，這種知識就決不會讓自己等待下去。”

可見，它已經存在着。“于是斗争就开始了。”

批判的蒲魯东断言，“人的使命就在于一步一步地进行自我教育”，好像人就沒有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使命，即成为人，好像“一步一步”的自我教育必然会把我們推向前进似的。我可以一步接一步地走，并仍旧回到我出發的地点。而非批判的蒲魯东所談的則不是人的“使命”，而是人进行自我教育所必备的条件（condition），不是一步一步地（pas à pas）；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par degrés）。批判的蒲魯东自言自語地說道：

“在作为社会基础的諸原則中有这样一个原則，它为社会所不理解，它被社会的無知所敗坏，它也是一切禍害的根由。虽然如此，人們仍然尊重这个原則，希求这个原則，如不然，这个原則就不会有任何影响了。这个原則按其實質來說是真實的，但按我們对它的觀念來說則是虛妄的……它究竟是什么呢？”

在第一句話中批判的蒲魯东說，原則被社会所敗坏、所不理解；可見这个原則本身是正确的。在第二句話中他再一次承認这个原則就其實質而言是真實的，虽然如此，他仍然責难社会不該尊重和希求“这个原則”。相反地，群众的蒲魯东之所以譴責社会，并不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原則本身，而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由于我們無知而伪造出来的原則（«ce principe… tel que notre ignorance l'a fait, est honoré»）。批判的蒲魯东認為不真實的原則的實質是真實的。群众的蒲魯东則認為，伪造的原則的實質是我們的虛妄觀念的結果，而这个原則的對象（objet）却是真實的，这正像炼金术和占星术的實質是我們臆想的結果，而它們的對象（天体运行和物体的化学屬性）却是真實的一樣。

批判的蒲魯东繼續說他的獨白，他說：

“我們研究的對象是法律，即社會原則的規定。政治家，也就是社會科學界人士，為一些極不明確的觀念所拘泥；但既然每一種謬誤都有某種現實的東西做基礎，那末我們也就能在他們的書中找到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創造給人世的真理。”

批判的蒲魯東的議論是極其古怪的。他先斷定政治家是不學無術和觀念不清的，然後又十分武斷地轉口說每一種謬誤都有某種現實的東西做基礎，對於這一點我們是沒有什麼可懷疑的，因為陷入謬誤的人本身就是作為每一種謬誤的基礎的某種現實的東西。其次，他又從每一種謬誤都有某種現實的東西做基礎這一事實得出結論說，在政治家的書中可以找到真理。最後，他甚至使政治家把這個真理創造給人世。假如他們已經把真理創造給人世，那我們就用不着再到他們的書中去尋找真理了。

群眾的蒲魯東說：

“政治家們互不了解 (*ne s'entendent pas*)；因此他們的謬誤是主觀的，謬誤的根源就在他們自己身上 (*donc c'est en eux qu'est l'erreur*)。”他們的互不了解證明了他們的片面性。他們把“自己的個人見解和健全的理智”混為一談，而“既然”——根據先前的推論——“每一種謬誤都有某種真正現實的東西作為自己的對象，那末在政治家的書中就必定能找到他們不自覺地放在裡面（即自己書中）<sup>①</sup>的真理”，——他們是把真理“不自覺地放在裡面”，而並沒有把真理創造給人世 (*dans leurs livres doit se trouver la vérité, qu'à leur insu ils y auront mise*)。

批判的蒲魯東向自己問道：“何謂公平，它的實質、它的性質、它的意義怎樣？”好像公平還有某種不同於其實質和性質的特殊意義似的。非批判的蒲魯東所問的是：“它的原則、它的性質和它的公式 (*formule*) 怎樣？”公式所表明的原則是經過科學證明的原則。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在群众的法語中，«formule» 和 «signification» [“意义”] 是根本不同的。在批判的法語中这两个詞的意思却完全一样。

在結束自己这番毫無用处的議論之后，批判的蒲魯东提起精神，大声疾呼：

“讓我們試着稍微接近一些我們的对象吧！”

其实，非批判的蒲魯东早就紧紧地靠近了自己的对象，并且正在試着对自己的对象做出更确切更中肯的規定 (d'arriver à quelque chose de plus précis et de plus positif)。

在批判的蒲魯东看来，“法律是公平的事物的規定”，在非批判的蒲魯东看来，法律則是公平的事物的“宣告” (déclaration)。非批判的蒲魯东駁斥了認為法律創造公理的見解。而“法律的規定”这种說法既可以表示法律被某种其他的東西所規定，又可以表示法律本身規定某种其他的東西；批判的蒲魯东本人在上面就是从后一种含义来談論社会原則的規定的。不过，做这样細微的区分对群众的蒲魯东說来确实是不适当的。

既然被批判地賦予特征的蒲魯东和真正的蒲魯东之間有这样一些分歧，那末，蒲魯东第一所企圖証明的东西跟蒲魯东第二所要証明的东西完全不同，就絲毫也不值得奇怪了。

### 批判的蒲魯东

“企圖用历史的經驗証明”，“如果我們关于公平的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觀念是虛妄的，那末显而易见(尽管这样显而易见，但他仍然認為必須加以証明)①，这种觀念在法律上的一切运用就必定是不好的，我們的一切設施也必定是有缺陷的”。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群众的蒲魯东却远不是要証明显而易見的东西。相反地，他所說的是：

“如果我們关于公平的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观念不够明确、不完全或者甚至是虛妄的，那末显而易見，这种观念在我們的立法上的一切运用也是不好的”，等等。

那末，非批判的蒲魯东到底想要証明什么呢？

他繼續写道：“假如人們对于公平这个概念以及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的見解不是固定不变的，假如这类見解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起了各种不同的变化，总之，假如思想有了进步，那末，关于公平在我們的观念中、从而也在我們的行动中受到歪曲的这种假說，就得到了事实的証明。”

而問題也就在于，正是这种不固定性、这种变易性、这种进步，“由历史所光輝地証实了”。非批判的蒲魯东也就援引了这些光輝的历史証据。他那批判的影像先前根据历史經驗証明了完全不同的原理，現在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种經驗本身。

在真正的蒲魯东看来，羅馬帝国的衰亡是“賢者 (les sages)”所預料到的，而在批判的蒲魯东看来，則是“哲学家”所預料到的。批判的蒲魯东当然認為只有哲学家才是賢者。照真正的蒲魯东的看法，羅馬“法經過千年来的法律实践或司法活动而神聖化了 (ces droits consacrés par une justice dix fois séculaire)”；照批判的蒲魯东的看法，在羅馬存在着“被千年来的公平所神聖化了的法”。

根据这个蒲魯东第一的判断，在羅馬，人們是像下面这样發表議論的：

“羅馬……是靠它的政治和它的众神而获胜的；宗教信仰和公众精神的任何一种改革都是愚蠢的事情和褻瀆的行为(在批判的蒲魯东那里，«sacri-

lège» 这个詞的意思不像在群众的法語中那样是褻瀆聖物或冒犯神灵，而只是平常的褻瀆行为)①；如果羅馬决心解放各族人民，那它就会因此而背弃自己的法。”蒲魯东第一补充道：“可見，羅馬既有为自己打算的事实，也有为自己打算的法。”

根据非批判的蒲魯东的看法，在羅馬，人們的議論更加徹底些。他們确切地叙述了事实：

“奴隶是羅馬的最大富源；因此各族人民的解放就等于羅馬財政的破产。”

在談到法时，群众的蒲魯东还說出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羅馬的野心通过万民法 (droit des gens) 而合法化了。”証明奴役法的这种方式完全符合羅馬人的法律观点。在群众的羅馬法全書上載明：«*jure gentium servitus invasit*» (Fr. 4. D. I. I.) [“奴隶制通过万民法而巩固下来了”(“学說彙纂”②第一卷第一題第四节)]。

在批判的蒲魯东看来，“偶像崇拜、奴隶制和軟弱無能构成了羅馬各种制度的基础”——任何制度都不例外。而真正的蒲魯东却說：“羅馬在宗教方面的各种制度的基础是偶像崇拜，在国家生活方面，是奴隶制，在私人生活方面，是享乐主义”(在普通的法語中，«*épicurisme*» [“享乐主义”] 这个詞和 «*mollesse*» 即軟弱無能的意思是不同的)。在羅馬的这种情况下，神秘的蒲魯东說“出現了”“上帝的旨諭”，而真正的唯理論的蒲魯东說的是出現了“自称为上帝的旨諭的偉人”。在真正的蒲魯东那里，这个偉人称僧侶为“蝮蛇”(vipères)，而在批判的蒲魯东那里，这个偉人的言談却比較温和，他称僧侶为“蛇”。在前者那里，他以羅馬的方式談論“律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羅馬法全書共分三部分，“学說彙纂”是第二部分。——譯者注

师”〔«Advokaten»〕，在后者那里，他以德国的方式談論“法学家”〔«Rechtsgelehrte»〕。

批判的蒲魯东称法国革命的精神为矛盾的精神，接着又补充道：

“这足以使人相信，代替了旧事物的新事物在本身没有任何方法严整、思虑成熟的东西。”

他似乎非机械地重复“新”和“旧”这两个批判的批判所慣用的范疇不可似的。他好像非得提出这种毫無意义的要求，即“新事物”在本身〔*an sich*〕应包含有方法严整、思虑成熟的东西，这就像要求人們在本身〔*an sich*〕都要有些污点一样。而真正的蒲魯东却是这样說的：

“这足以証明，代替了旧事物秩序的那个事物秩序，在本身中〔*in sich*〕已丧失了方法和反省。”

沉醉在法国革命的回忆中的批判的蒲魯东，竟把法語革命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un fait physique»〔“物質界的事实”〕譯作“物理学的事实”，而把«un fait intellectuel»〔“精神生活的事实”〕譯作“智慧的事实”。由于把法語这样一革命化，批判的蒲魯东就得以使物理学拥有了自然界中所出現的一切事实。如果說，他这样一方面把自然科学捧到九天之上，那末另一方面，由于他否認自然科学中有智慧，由于他把智慧的事实同物理学的事实截然分开，也就把自然科学贬到九地之下了。同时，由于他把精神生活的事实直接提升为智慧的事实，他也就使心理学和邏輯学的一切进一步的探討成了多余的事情。

既然批判的蒲魯东(即蒲魯东第一)甚至不去猜測真正的蒲魯东(即蒲魯东第二)究竟想用他的历史的演繹来証明什么东西，那

末对于他來說，当然也就不存在这种演繹的实在內容，即通过否定历史上的实在法来証明法的觀念的演变，証明公平的不断实现。

“社会通过自己的原則的否定……和最神聖的法的破坏而得救。”

真正的蒲魯东就这样証明，羅馬法的否定导致了法的概念在基督教的法的觀念中的扩大，征服者的法的否定导致了自治团体法的确立，法国革命对全部封建制法的否定导致了更广泛的现代法律秩序的建立。

批判的批判死不承認，原則通过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規律是蒲魯东發現的，这个光荣應該屬於他。具有如此自覺的形式的这种思想，对法国人确是一个真正的啓示。

### 批判性的評注 1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同样，蒲魯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是从政治經濟学的观点对政治經濟学所做的批判。——至于該書有关法律的部分，即根据法的观点来批判法的这一部分，我們在这里沒有做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該書的主旨是批判政治經濟学。——因此，通过对政治經濟学，其中包括对蒲魯东所了解的政治經濟学的批判，蒲魯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这一工作之成为可能，正是依靠了蒲魯东本人曾經做过的一切，这正如同蒲魯东所做的批判是以重农学派对重商主义学說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李嘉圖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以及傅立叶和聖西門的著作作为前提一样。

政治經濟学的一切論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經濟学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并

且正如薩伊所坦率承認的，甚至被当做只是“偶然”为政治經濟学所涉及的事实。蒲魯东則对政治經濟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帶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魯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經濟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經濟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魯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經濟学的意义，正如同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級？”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

如果說蒲魯东本人还没有把私有制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如工資、商業、价值、价格、貨幣等等，像“德法年鑒”<sup>16</sup>那样看做私有制的形式（見弗·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而是用这些政治經濟学的前提来反駁經濟学家，那末这就完全符合他那从历史上說来可以原宥的上述观点。

把私有制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經濟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發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經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釋宗教观念，因而不断地違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政治經濟学中，工資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額。工資和資本的利潤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像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發現，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費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發現，价值純粹是偶然确定的，它無論和生产費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沒有任何关系。工資的数額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資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發現，工人是被迫同意資本家所規定的工資，而資本家則是被迫把工資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約双方的自由。在商業

和其他一切經濟关系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有时經濟学家們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們之間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經濟学家們意識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們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責为本来合理的（即他們認為合理的）工資、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業的伪造者。例如，亚当·斯密有时攻击資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攻击銀行家，西蒙·德·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圖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經濟学家都攻击非产业資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費者来体现私有制的資本家。

所以經濟学家們有时候，特别是在他們攻击某种特殊的損人利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例外地維護經濟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觀，但在大多数場合下，他們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經濟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們总是不自觉地在這個矛盾中徘徊不已。

蒲魯东永远結束了这种不自覺的状态。他認真地对待經濟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觀，并把它和經濟关系的違反人性的现实尖銳地对立起来。他迫使这些关系真正符合于它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更确切些說，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关于自身的这种看法而承認自己是真正違反人性的。因此，蒲魯东不同于其余的經濟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澈地描述为經濟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經濟学观点出發对政治經濟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經做了。

想說明“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的觀點的特征的埃德加尔先生，当然是既絲毫沒有談到政治經濟学，也絲毫沒有談到蒲魯东的著作所具有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正是在于把私有制的實質問題看

做政治經濟学和法学的根本問題。对于批判的批判說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蒲魯东并未因他否定私有制而有了任何新的發現。他不过是泄露了批判的批判所諱莫如深的秘密罢了。

埃德加尔先生在他那赋予特征的翻譯之后馬上接着說道：“于是，蒲魯东發現了历史上的一个絕對者，一个永恒的基础，一个引导人类的神。这个神就是公平。”

蒲魯东在 1840 年用法文写的著作并不是从 1844 年德国發展的观点出發的。这也就是蒲魯东跟許多和他恰相对立的法国作家所共有的观点，它給批判的批判以方便，使后者可以籠統地一下說明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特征。此外，只要徹底遵循蒲魯东自己所提出的規律，即公平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規律，就足以摆脱这个历史上的絕對者。如果說蒲魯东沒有得出这种徹底的結論，那末这应当归咎于他生为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的这种可悲的情况。

对埃德加尔先生說来，由于蒲魯东提出了历史上的絕對者，由于他相信公平，所以他就成了神学的对象；而 *ex professo*〔職業的〕批判神学的批判的批判現在就可以抓住蒲魯东，以便能在“宗教观念”上大作文章。

“每一种宗教观念的特点都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最后总有一个要成为胜利的和唯一真实的。”

我們將看到，宗教的批判的批判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最后有一个——“批判”——要作为唯一的真理战胜另一个对立面——“群众”。可是蒲魯东却把群众的公平当做絕對者，奉为历史上的神，从而就犯下了更不公平的过錯，因为公平的批判已經非常明确地为自己保留了这个絕對者、这个历史上的神

的地位。

## 批判性的評注 2

“貧窮困苦的事實使蒲魯東得出了一些片面的論斷；他認為這個事實是同平等和公平相抵觸的；他把這個事實當做自己的武器。於是，對於他，這個事實就成了絕對的合理的，而私有制存在的事實則成為不合理的了。”

認識的寧靜告訴我們說，蒲魯東認為貧困的事實是和公平相抵觸的，——可見，他認為這個事實是不合理的；可是認識的寧靜連口氣都顧不得喘就趕忙聲明說，對於蒲魯東，這個事實成了絕對的合理的。

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從私有制的運動似乎使人民富有這個事實出發，得出了替私有制辯護的結論。蒲魯東從政治經濟學中被詭辯所掩蓋的相反的事實出發，即從私有制的運動造成貧窮這個事實出發，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結論。對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當然是從充滿矛盾的私有制本質表現得最觸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憤的事實出發，即從貧窮困苦的事實出發。

“相反地，批判則把貧窮和財產這兩個事實合而為一；它發現了二者的內在聯繫，使它們成為一個整體，並且向這個整體本身詢問其存在的前提是什麼。”

批判直到現在還絲毫不了解財產和貧窮的事實，“相反地”，它卻用僅僅在自己想像中所做到的事情來反駁蒲魯東的真實的事情。它把兩個事實合而為一，並且在把兩個事實變為一個唯一的事實之後，又發現了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批判不能否認，連蒲魯東也承認貧窮和財產這兩個事實之間存在着內在的聯繫，並且正是由於這種內在聯繫的存在，他才要求廢除財產，以便消滅貧困。



蒲魯东甚至还做得更多。他詳尽地表明了資本的运动怎样造成貧困。相反地，批判的批判却不屑于做这类鷄毛蒜皮的瑣事。它發現貧穷和私有財產是两种对立的東西，——这可真是一个相当时髦的發現。它使貧穷和富有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詢問其存在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問題是多余的，因为批判自己剛剛創造了这个“整体本身”，可見它的这种創造本身就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前提。

批判的批判既然向“整体本身”去探詢其存在的前提，那就等于是用真正神学的方式在这个“整体”之外寻求这些前提。批判的思辨在它似乎正在研究的那个对象以外运动着。貧富之間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可是批判的思辨却避不研究这个形成整体的真正的运动，以便給自己留一个机会，說批判的批判作为認識的宁靜是高居于两个对立方面之上的，只有它那創造“整体本身”的活动才能消灭它所創造的抽象。

無产階級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們本身构成一个統一的整体。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問題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們是統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來說，作为富有來說，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無产階級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滿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無产階級，作为無产階級來說，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約着它而使它成为無产階級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

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有产階級和無产階級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階級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滿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証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觀。而無产階級在这种异化中則感到自己是被毀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無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階級，用黑格尔的話來說，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憤慨**，这个階級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見，在整个对立的範圍內，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無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則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經濟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轉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違背的、为客觀事物的本性所制約的發展，只有通过無产階級作为無产階級——这种意識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貧困的貧困**、这种意識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無产階級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別人生产財富、替自己生产**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無产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产階級在获得胜利之后，無論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絕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無产階級的胜利，無产階級本身以及制約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們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無产階級，那末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們相信的那样是

由于他們把無产者看做神的緣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經形成的無产階級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觀，由于在無产階級的生活条件中現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違反人性的頂点，由于在無产階級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論上意識到了这种損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無法掩飾的、絕對不可抗拒的**貧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現——的逼迫，不得不憤怒地反对这种違反人性的現象，由于这一切，所以無产階級能够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現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現代社会的一切違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經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鍛炼成鋼鐵的教育的。問題不在于目前某个無产者或者甚至整个無产階級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無产階級，無产階級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整个結構最明显地無可辯駁地預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無产階級中有很大大一部分人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識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沒有必要多談了。

“批判的批判”之所以認為自己不应当承認这一点，是因为它已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創造因素。历史上的各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因此它借它的化身埃德加尔的口發布了如下的宣言：

“有教养和沒有教养、有财产和沒有财产，这些对立面應該受到完全而充分的批判，只要不蓄意褻瀆它們就行。”

有財產和沒有財產被当做批判的思辨的两个对立面而受到了形而上学式的尊崇。因此只有批判的批判的手才能触动它們而又不犯褻瀆聖物的过錯。資本家和工人則不應該过問他們自己的相互关系。

埃德加尔先生甚至根本沒有想到，可能会有人抨击他的关于对立面的批判的观点，可能会有人来褻瀆这些聖物，結果他就把只有他自己才能对自己提出的异議硬塞在他的論敌口中。

批判的批判所臆造的論敌問道：“除了自由、平等这一类已有的概念而外，难道还可能运用什么其他的概念嗎？我的回答是（注意埃德加尔先生的回答）<sup>①</sup>，倘若以希腊語和拉丁語为表达手段的思想一旦穷尽，这两种語言也就立刻死亡了。”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批判的批判沒有用德語給我們提出任何一种完整的思想。表达它的思想的語言还没有产生，所以怪不得賴哈特先生批判地处理一些外国字，法赫尔先生批判地处理英語，埃德加尔先生批判地处理法語，从而为創造一种新的批判的語言做了許多准备工作。

## 賦予特征的翻譯 2

批判的蒲魯东說：

“土地耕作者彼此間分割土地。平等只是把占有神聖化；趁此机会，它把財產也神聖化了。”

在批判的蒲魯东那里，地產是在分割土地的那一瞬間出現的。在他那里，靠“趁此机会”这样一句話就實現了从占有到財產的

---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过渡。

真正的蒲魯东說：

“土地耕作为土地占有奠定了基础…… 光保証劳动者得到他的劳动果实而不同时保証他有生产工具是不够的。为了使弱者免受强者的侵害…… 人們認為必須在占有者之間划下固定的分界綫。”

可見，“趁此机会”，平等首先是把占有神聖化了。

“随着人口的增长，移民們的貪婪和私欲也一年比一年强烈。看来必須造成一些新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以限制他們的野心。于是，由于需要平等，土地就成了财产…… 毫無疑問，土地的划分在地理上从来就不是均等的…… 虽然如此，但原則仍然是这一个。平等以前把占有神聖化，現在則把财产神聖化了。”

在批判的蒲魯东那里，

“古代的财产創建人由于过分关心自身的需要而忽略了这样一个情况：轉讓、出卖、贈送、获得与丧失的权利也就相当于所有权，这就消灭了他們所賴以产生的平等。”

在真正的蒲魯东那里，财产的創建人并不是由于关心自身的需要而忽略了财产的这种發展进程。他們只不过是沒有預見到这一点。但是即使他們能够預見到这一点，在这种場合下也还是眼前的需要占上風。其次，真正的蒲魯东太群众化了，所以他沒有把轉讓、出卖等权利和“所有权”对立起来，也就是說，他沒有把种和类对立起来。他是把“遺產的保存权”和“遺產的轉讓等权”对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对立和真正的进步。

### 批判性的評注 3

“蒲魯东根据什么来証明财产是不可能的？还不是根据那个平等的原則，这簡直令人难以置信！”

要相信这一点，埃德加尔先生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够了。埃德加尔先生应当知道，布魯諾·鮑威尔先生把“無限的自我意識”作为自己的一切論断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則看成福音的創造原則，而福音則由于其無限的無意識性似乎是和無限的自我意識直接矛盾的。同样，蒲魯东把平等看成和平等直接矛盾的私有制的創造原則。如果埃德加尔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識”稍微比較一下，他就会發現，后一个原則**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維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則**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和思維直觀的語言所表达的东西。自我意識是人在純思維中和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在實踐領域中对自身的意識，也就是人意識到別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別人当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平等是法国的用語，它表明人的本質的統一、人的类意識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也就是說，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費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圖用**自我意識**的原則来鏟除一切确定的和現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則力圖用**平等**的原則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蒲魯东对哲学很憤慨，这件事本身不能怪他。但他为什么憤慨呢？他認為，哲学到現在为止一直是不够实际的，它昂然騎在思辨的高头大馬上，因此人們在它的面前显得过分渺小。但我認為，哲学是超实际的，也就是說，它到現在为止一直不外乎是事物現狀的抽象表現；它总是受事物現狀的前提所支配，并且总是把这些前提当做某种絕對的东西。”

哲学是事物現狀的抽象表現这样一种看法，就其来源而言，則不是埃德加尔先生提出的，而是**費尔巴哈**提出的；費尔巴哈最先把哲学規定为思辨的和神秘的經驗，并証明了这一点。可是埃德加

尔先生却能够赋予这种看法以一种独创的、批判的表现方式。这就是：费尔巴哈得出结论说，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而埃德加尔先生却相反，他教导我们说，哲学是超实际的。实际上倒不如说是这样：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像中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一定要幻想它高高地超越于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之上；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没有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做出任何真正的判决，未能对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鉴别力，也就是说，未能实际地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 in abstracto [抽象形式的] 实践。所谓哲学是超实际的，这只是说它高高地君临于实践之上。批判的批判把全人类统统归之为一群没有创造精神的群众，这样它就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思辨的思维把现实的人看得无限渺小。旧思辨哲学在这一点上完全和批判不谋而合。例如，请大家看看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下面这一段话：

“从需要的观点看来，观念的具体对象就是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因此，在这里——实际上也只在在这里——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人的。”<sup>17</sup>

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至于哲学应该怎样表现事物现状，这已由法赫尔先生对英国事物现状的描述和埃德加尔先生对法语的现状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绝妙的范例。

“可见，蒲鲁东也是很实际的：他发现了平等这个概念是证明财产的根据以后，就从这个概念出发来反对财产。”

蒲鲁东在这里的做法和德国批判家的做法是一样的，因为德国的批判家从关于人的观念——他们发现这种观念是证明神的存

在的根据——出發正是要反駁神的存在。

“如果平等的原則所造成的結果比平等本身更強有力，那末蒲魯東怎么还要帮助这个原則获得这么意外的強力呢？”

按照布魯諾·鮑威爾先生的意見，自我意識是一切宗教觀念的基礎；它構成福音的創造原則。但是為什麼自我意識的原則所造成的結果在這裡比自我意識本身更強有力呢？人們用純粹德國的精神回答我們說，這是因為：自我意識固然是宗教觀念的創造原則，但是它只有作為脫出自身、自相矛盾、自我外化和異化的自我意識，才能成為這種創造原則。因此，達到了自身、理解了自身、認識了自己本質的自我意識就支配着它的自我異化的各種產物。蒲魯東的情形也完全是這樣，當然還有所區別，這就是：他講法語而我們講德語，因此他用法國的方式表達我們用德國的方式所表達的東西。

蒲魯東自己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平等作為理性的創造原則是財產賴以構成的基礎，而作為這種理性的根據，它又是證明財產的一切論據的基礎，既然如此，那末為什麼不存在平等，反而存在對平等的否定——私有財產呢？所以蒲魯東就對財產的事實本身進行考察。他證明，“事實上，財產作為一種制度和原則是**不可能**”（第34頁），也就是說，它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正在各方面消滅着自身；用德國的方式來說，它是自我外化、自相矛盾和自我異化的平等的定在。和對這種異化的認識一樣，法國的事物現狀也以充分的理由向蒲魯東指明了真正消滅異化的必然性。

蒲魯東在否定私有財產的同時，也感覺到需要對私有財產的存在作**歷史**的辯解。像所有這一類最初的嘗試一樣，蒲魯東的論斷也帶有實用的性質，這就是說，他假定過去的各代人都是完全自



覺地和深思熟慮地努力把他認為真正代表人類本質的平等思想體現在自己的各種制度中。

“我們一再地提起這一點……蒲魯東是為了無產者的利益而寫作的。”

是的，激勵蒲魯東去寫作的不是自滿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為的利益，而是群眾的、現實的、歷史的利益，是超過簡單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導致危機的利益。蒲魯東不單是為了無產者的利益而寫作，他本人就是無產者，*ouvrier*〔工人〕。他的著作是法國無產階級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個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來，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意義。

“蒲魯東是為了那些一無所有的人的利益而寫作的。擁有和一無所有，在他看來是兩個絕對的範疇。擁有在他看來之所以是最重要的東西，就因為在他的眼中不擁有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思考對象。蒲魯東認為，每一個人都應當擁有，但是只應當和別人一樣多。我必須說，在我所擁有的一切東西中，我感到興趣的只是唯我獨有的東西，我比別人多的東西。如果實行平等，那末，無論是擁有的事實，或者是平等本身，對於我都將是無關緊要的了。”

要是相信埃德加爾先生的話，那末擁有和不擁有對於蒲魯東就真是兩個絕對的範疇了。批判的批判到處都只看到一些範疇。例如，對埃德加爾先生說來，擁有和不擁有、工資、獎金、匱乏和需要、為滿足需要而進行的勞動，所有這一切都無非是一些範疇而已。

如果社會所必須擺脫的只是擁有和不擁有這兩個範疇，那末為社會“克服”和“揚棄”這兩個範疇，對任何一個甚至比埃德加爾先生更低能的辯證論者說來，都該是一件多么輕而易舉的事呵！埃德加爾先生也把這種“克服”看做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把僅僅針對蒲魯東來稍微說明一下擁有和不擁有這兩個範疇，都看做不值

得做的事情。但是，既然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疇，而是最悲慘的現實，既然在我們这个时代一無所有的人也就是無，既然他連一般生存的必需資料都被剝奪（人類生存的資料則更是如此），既然不拥有就等于人完全脫離了他的實物性，那末，蒲魯東把不拥有看做最重要的思考對象，就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正因為在蒲魯東和所有的社會主義著作家以前很少有人考慮這個對象，所以這樣做就更加正確。不拥有是最令人絕望的唯靈論，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現實，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現實，是極其實際的拥有，即飢餓、寒冷、疾病、罪惡、屈辱、愚鈍以及種種違反人性的和違反自然的現象的拥有。任何事物，凡是因人們初次充分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從而成為思索的對象，在一個研究者看來，它就是最值得思考的對象。

蒲魯東想消滅不拥有和拥有的舊形式的願望，和他想消滅人對自己的實物本質的實際異化關係、想消滅人的自我異化的政治經濟表現的願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於他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還受著政治經濟學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魯東仍以政治經濟學的占有形式來表現實物世界的重新爭得。

批判的批判硬要蒲魯東以拥有來反對不拥有；而蒲魯東則相反，他以占有來反對拥有的舊形式——私有制。他宣稱占有是“社會的職能”。在這種職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別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質力量使用出來和發揮出來。

蒲魯東未能用恰當的話來表達自己的這個思想。“平等占有”是政治經濟的觀念，因而還是下面這個事實的異化表現：實物是為人的存在，是人的實物存在，同時也就是人為他人的定在，是他對他人的人的關係，是人对人的社會關係。蒲魯東在政治經濟的異化範圍內來克服政治經濟的異化。

### 賦予特征的翻譯 3

批判的蒲魯东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批判的所有者，

“这个所有者自己承認，那些为他工作的人所丧失的东西就是他所攫为已有的东西。”

群众的蒲魯东对群众的所有者說：

“你工作过！你难道从来没有强迫别人为你工作？他們为你工作，你不为他們工作，但他們为你工作而丧失了的东西，你却能够攫为己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批判的蒲魯东硬要薩伊把“自然的占有物”理解为 *«richesse naturelle»* [“自然的財富”]，虽然薩伊为了消除任何的誤解，曾在他那本“論政治經濟学”的“概論”中十分明确地宣称，他所理解的財富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占有物，而是“价值的总和”。当然，批判的蒲魯东也像埃德加尔先生改造他那样改造了薩伊。在批判的蒲魯东看来，薩伊从土地比空气和水易于占有这个事实，“立即引伸出把田野变为财产的权利”。可是薩伊根本没有从土地比较容易占有这个事实引伸出土地所有权，相反地，他毫不含糊地說：*«Les droits des propriétaires de terres—remontent à une spoliation»* [“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是由掠夺而来的”]（“論政治經濟学”第三版第一卷第 136 頁注釋<sup>18</sup>）。所以，根据薩伊的看法，土地所有权的确立需要 *«concours de la législation»* 和 *«droit positif»* [“立法”和“实在法”的“促成”]。真正的蒲魯东并没有强迫薩伊从土地比较容易占有这个事实“立即”引伸出土地所有权来。他之責难薩伊，是因为薩伊用可能性来代替权利，把可能性的問題和权利的問題混为一談；

“薩伊把可能性当做权利。人們并不是問为什么土地比海洋和空气容易占有；人們想知道的是，人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种財富攫为己有。”

批判的蒲魯东繼續說道：

“对此只补充說明一点：人們在占有一塊土地的同时还占有了一些其他的要素——空气、水、火：terra, aqua, aëre et igne interdicti sumus. [我們被禁止获得土地、水、空气和火]⊖。”

真正的蒲魯东根本沒有“只”补充說明这一点，相反地，他說他順便(en passant)要讀者“注意”空气和水的占有。在批判的蒲魯东那里，羅馬放逐命令格式是莫名其妙地硬湊在他的議論中的。他忘了說明禁令所指的“我們”是誰。真正的蒲魯东則是向非所有者講話：

“無产者們！……财产把我們同社会隔絕起来：terra etc. interdicti sumus. [我們被禁止获得土地等等]。”

批判的蒲魯东以下述方式对沙尔·孔德进行辯駁：

“沙尔·孔德認為，人要生活就必須有空气、食物和衣服。这些东西中的某几种，例如空气和水，据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它們始終都是公有财产，而其他几种則为数有限，据說因此就成了私有财产。可見，沙尔·孔德是从有限和無限这两个概念出發来进行論証的。如果他把不必需和必需这两个概念当做主要范疇的話，他就可能会得出另一些結論。”

批判的蒲魯东的这种辯駁是多么的幼稚！他建議沙尔·孔德抛弃他作为論証的出發点的那些范疇，而突然轉而采用另一些范疇，为的是不得出他自己的結論，而是“可能”得出批判的蒲魯东的結論。

---

⊖ 这是古羅馬放逐出国命令格式的釋义。——編者注

真正的蒲魯东並沒有向沙尔·孔德提出这类建議。他不想用什么“可能”之类的字眼来同沙尔·孔德妥协，他是用沙尔·孔德自己的范疇来抨击沙尔·孔德。

蒲魯东說，沙尔·孔德以空气、食物和衣服（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的必要性为出發点，这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不停止生活。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人因此（按照沙尔·孔德的看法）就需要經常不断地占有各种各样的物品。这些物品的数量是各不相同的。

“天体的光、空气和水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致人不能使它們有显著的增减；所以每个人需要多少，就可以占有多少，同时决不妨害別人去利用这些物品。”<sup>19</sup>

蒲魯东把沙尔·孔德自己的規定当做出發点。首先，他向孔德証明：土地也正好是第一必需品，因此它應該讓每个人都有可能利用，但必須在孔德所指出的限度內——“决不妨害別人去利用它”。既然如此，那末土地究竟为什么成了私有财产呢？沙尔·孔德回答說：因为土地的数量不是無限的。可是他好像倒應該做出相反的結論：正因为土地的数量有限，所以它不能被占有。占有空气和水之所以不会妨害任何人，是因为它們在任何时候都是綽綽有余的，它們的数量是無限的。相反地，随意占有土地之所以妨害別人去利用土地，正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土地の利用應該根据大家的利益来調整。沙尔·孔德的論証方式恰恰証明了和他的論点相反的东西。

“蒲魯东（即批判的蒲魯东）<sup>①</sup>推断：沙尔·孔德是从民族可以成为土地所有者这种观点出發的；可是，即使财产本身就产生使用和濫用的权利——

---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jus utendi et abutendi re sua*〔使用和濫用自己財物的權利〕，那也不能承認民族有使用和濫用土地的權利。”

真正的蒲魯東沒有說所有權“產生”*jus utendi et abutendi*〔使用和濫用的權利〕。他是過於群眾化了，所以不談什麼產生所有權的所有權。*Jus utendi et abutendi re sua*〔使用和濫用自己財物的權利〕也就是所有權本身。因此，蒲魯東直截了當地否認人民對自己領土的所有權。他反駁那些認為這是夸大其詞的人們說，在各個時代，人們都從這個臆造的民族所有權中引出了諸如宗主权、貢稅、王侯的專賣權、徭役等等一類的東西。

真正的蒲魯東發揮了下述的見解來反對沙爾·孔德：孔德想表明財產是怎樣產生的，但他一開始就把民族是所有者當做一個前提提出來，也就是說，他陷入了 *petitio principii*<sup>⊖</sup>。他要國家出賣土地，要企業家購買這些土地，也就是說，他預先就把他想證明的那種財產關係本身當做前提肯定下來了。

批判的蒲魯東推翻了法國的十進制。他保留了法郎，但是却用“三分尼”來代替生丁。

“蒲魯東(批判的蒲魯東)<sup>①</sup>補充道：如果我出讓一塊土地，那末，我就不僅使我自己喪失了本年的收穫，而且還剝奪了我的兒孫的一種永恆的福利。土地有價值不僅僅是在今天，它還具有一種潛在的、未來的價值。”

真正的蒲魯東談的不是土地不僅今天有價值，而且明天也有價值；他是把完滿的、現有的價值跟潛在的、未來的價值(這種價值取決於自己利用土地的本領)加以對比。他說：

⊖ 一種邏輯上的錯誤，即在證明某個論點時使用這樣的論據，該論據本身只有在假定待證明的論點正確的條件下方才有效。——編者注

①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把你們這塊地毀壞或者賣掉（這反正對你們是一樣的），結果你們不僅會喪失一次、兩次或許多次收穫，而且還會失去你們——你們和你們的兒孫——從這塊地裡所能獲得的全部產物。”

對蒲魯東說來，重要的不是把一次的收穫和永恆的福利（靠一塊地所獲得的金錢也能像資本一樣變為“永恆的福利”）做對比，而是把現有的價值和土地由於繼續耕作所能獲得的價值做對比。

“沙爾·孔德說：我用我自己的勞動賦予物品的新價值是我的財產。蒲魯東（批判的蒲魯東）<sup>①</sup>却想以下述的說法來推翻他的這個論點：在這種情況下，一停止勞動，人也就不應再是所有者了。產品所有權無論如何決不能產生對構成產品基礎的材料的所有權。”

#### 真正的蒲魯東說：

“就算勞動者能占有他自己勞動的產品吧；可是我不懂為什麼產品所有權必須產生對物質的所有權。在同一岸邊捕魚的漁夫中，捕魚最多的漁夫難道就會因他捕魚的本領高明而成為他捕魚的那一段的所有者嗎？難道有獵人曾經因他獵術高明而獲得對整個地區的野獸的所有權嗎？農夫的情形也是如此。要把占有變為財產，除了要花費勞動外，還必須有另外一個條件；否則，只要人不再是一個勞動者，他也就不會立刻不再是一個所有者了。”

*Cessante causa, cessat effectus* [原因一消逝，結果也隨之消逝]。如果一個所有者之為所有者，只由於他是一個勞動者，那末只要他不再是勞動者，他也就不會立刻不再成其為所有者了。

“因此，按照法律，財產是由時效造成的；勞動不過是占有賴以表現的一種顯著的標志、一種物質的行為而已。”

蒲魯東繼續說道：“可見，通過勞動來占有物品的制度是和法律相抵觸的。如果這種制度的擁護者硬說他們是用這種制度來解釋法律，那末他們就會自相矛盾。”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其次，按照这种看法，如果說对土地的开垦“創造充分的土地所有权”，那末这种論断就正是 *petitio principii*①。其实，这里只創造了物質的新的生产能力。至于說因此也創造了对物質本身的所有权，那还需要加以証明。人并没有創造物質本身。甚至人創造物質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質本身預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批判的蒲魯东把格拉古·巴貝夫变成了爭取自由的战士，而在群众的蒲魯东那里，巴貝夫是作为爭取平等的战士 (*partisan de l'égalité*) 出現的。

批判的蒲魯东自告奋勇地給荷馬的“伊利亚特”一詩規定了应付的稿酬，他說：

“我付給荷馬的稿酬应当和他所給予我的东西相等。可是怎样确定荷馬所給予我們的東西的价值呢？”

批判的蒲魯东的确是过于鄙視政治經濟学上的瑣事了，所以他不知道物品的价值和該物品所給予別人的东西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物。真正的蒲魯东說：

“詩人的稿酬应当和他的产品相等；可是这种产品的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呢？”

真正的蒲魯东認定“伊利亚特”具有無限大的价格（或交換价值，*prix*）；批判的蒲魯东則断定它有無限大的价值。真正的蒲魯东把“伊利亚特”的价值，即它的政治經濟学意义下的价值（*valeur intrinsèque*），同它的交換价值（*valeur échangeable*）加以对比；而批判的蒲魯东則把“伊利亚特”的“內在价值”，即它作为一首史詩的

---

① 見本卷第 56 頁編者注。——譯者注



价值,同它的“为交换的价值”加以对比。

真正的蒲魯东說:

“物質报酬和才能沒有共同的量度。在这方面一切生产者的状况都是相同的。因此,对他們做任何的比較和在按能力給报酬上做任何的分等都是不可能的。”(«Entre une récompense matérielle et le talent il n'existe pas de commune mesure; sous ce rapport la condition de tous les producteurs est égale; conséquemment toute comparaison entre eux et toute distinction de fortunes est impossible.»)

批判的蒲魯东則說:

“生产者的状况之相同是相对的。才能不能用物質来衡量……对生产者进行任何的比較和任何的外部划分都是不可能的。”

在批判的蒲魯东那里,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應該感到自己在社会中是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因为他的才能和他的洞察力都只是社会的洞察力的产物。”

真正的蒲魯东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談到有才能的人的感觉。他說,有才能的人應該降到社会的水平。他决沒有断言有才能的人只是社会的产物。相反地,他說:

“有才能的人使自己鍛炼成一个有用之材……在他身上隐藏着自由的劳动者和积累起来的社会資本。”

批判的蒲魯东繼續說道:

“此外,他应当感謝社会使他摆脱了其他各种工作,使他有可能致力于科学。”

真正的蒲魯东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祈求有才能的人的感謝。他說:

“社会讓艺术家、学者、詩人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仅就这一点而言,他們就已經获得了公平的报酬。”

最后，批判的蒲魯东創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他硬要社会在150个劳动者当中保有一个“元帅”，因而也就要保有一支军队。在真正的蒲魯东那里，这个“元帅”却大不了是一个“铁匠”(maréchal)罢了。

#### 批判性的評注 4

“如果他(蒲魯东)<sup>①</sup>想保留工資的概念，如果他想把社会看做一个給我們工作并支付我們工作报酬的組織，那末，他就更沒有理由把時間当做报酬的量度，因为他不久前曾跟着胡果·格劳修斯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在事物的重要性方面，時間是無关紧要的。”

唯有在这个地方批判的批判才企圖解决自己的任务并企圖向蒲魯东証明：他从政治經濟学的观点出發来反对政治經濟学是不对的。但也正是在这里，批判真正以批判的形式大出其丑。

跟胡果·格劳修斯一样，蒲魯东也發揮了这样的思想：时效不能作为变占有为财产、变一种“法律原則”为另一种“法律原則”的根据，这就像時間不能把三角形三內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这样一个真理变为另一个真理，即三角形三內角之和等于三直角一样。

蒲魯东大声疾呼地說：“你們决不可能使那本身什么都不能創造、什么都不能改变、什么都不能革新的時間把使用某物品的人变为該物品的所有者。”

于是埃德加尔先生就推而言之：因为蒲魯东說，单是時間不能把一种法律原則变为另一种法律原則，而且時間本身又根本不能改变或革新任何东西，所以他把劳动時間当做劳动产品的政治經濟学上的价值的量度，就表明他不是始終如一的。埃德加尔先生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之得以想出这个批判的批判的見解，是由于他把 «valeur» [“价值”] 譯作 «Geltung» [“重要性”]，因而有可能把这个詞以同一种含义到处乱用，在談到法律原則的意义时这样用，在談到劳动产品的商業价值时也这样用。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把時間的空洞的延續和充实的劳动時間看成同样的东西。假使蒲魯东說時間不能把蒼蠅变为大象，那末批判的批判也同样可以推而言之：既然如此，他就沒有理由把劳动時間当做工資的量度。

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須花費的劳动時間屬於这个物品的生产費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費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錢（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这一点甚至連批判的批判也不会不了解。除劳动時間和劳动材料外，經濟学家还把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資本家的利息和利潤也算入生产費用。在蒲魯东那里，地租、利息和利潤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于是剩下的只有劳动時間和預支費用。蒲魯东既把劳动時間，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資和規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政治經濟学中决定性的因素則是資本和地产的物質力量，这就是說，蒲魯东恢复了人的权利，虽然还是以政治經濟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的。他从政治經濟学观点出發的这种做法正确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新政治經濟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原富”<sup>20</sup>的头几頁中發揮了这样的見解：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時間曾經是工資以及与工資尚無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的量度。

然而就算批判的批判暫時假定蒲魯东沒有从工資的前提出發吧。难道它認為生产某件物品的必要時間将来总有一天会不成为

这件物品的“重要性”的本質因素嗎？难道它認為時間在喪失着自己的價值嗎？

在直接的物質生產領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產的問題即物品的價值問題的解決，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該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因為社會是否有時間來實現真正人類的發展，就是以這種時間的多寡為轉移的。

甚至精神生產的領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動，難道在確定精神作品的規模、結構和布局時就不需要考慮生產該作品所必需的時間嗎？否則，我至少會冒這樣的危險：我思想中存在的事物永遠不會變為現實中的事物，因而它也就只能具有想像中的事物的價值，也就是只有想像的價值。

以政治經濟學的观点對政治經濟學所進行的批判，承認人類活動的一切本質規定，但只是在異化、外化的形式中來承認。例如，在這裡它把時間對人的勞動的意義變為時間對工資、對僱傭勞動的意義。

埃德加爾先生繼續寫道：

“為了強迫有才能的人接受上述的量度，蒲魯東竟濫用自由交易這個概念，並斷言社會和社會的個別成員本來就有否棄有才能的人的作品的權利。”

在傅立葉主義者和聖西門主義者那裡，兩隻腳繼續站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有才能的人，提出了對稿酬的過高要求，並把他關於自己是無價之寶的幻想提出來作為確定其作品的交換價值的標準。蒲魯東對有才能的人的這些奢望所做的回答，跟政治經濟學對任何企圖使價格大大超過所謂自然價格（即物品的生產費用）的野心所做的回答一樣，這就是說，他指出自由交易來作為回答。同時，蒲魯東並沒有在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濫用這種關係，相反地，

他把被經濟學家看做只是有名無實虛無縹緲的東西，即立約雙方的自由，肯定為現實的東西。

#### 賦予特征的翻譯 4

批判的蒲魯東徹底改造了法國的資產階級，也同樣徹底改造了法國的無產者，從而終於改造了法國社會。

他否認法國的無產者有“力量”，而真正的蒲魯東卻是責備法國無產者沒有德行(vertu)。他把他們在工作中的熟練變成了靠不住的熟練——“你們在工作中可能是敏捷的”，——而真正的蒲魯東卻無條件地承認他們在工作中的敏捷(«*prompts au travail vous êtes*» etc. [“你們在工作中是敏捷的”等等])。他把法國的資產者變成了愚蠢的市民，而真正的蒲魯東則是把卑下的資產者(bourgeois ignobles)跟聲名狼藉的“高貴的”(nobles flétris)資產者加以對比。他把資產者從代表中庸之道的市民(bourgeois juste-milieu)變成了“我們的善良的市民們”，為此法國資產階級可能會向他稱謝不止的。在真正的蒲魯東談到法國資產者的“邪惡意志”(«*la malveillance de nos bourgeois*»)日益滋長的地方，批判的蒲魯東卻偏偏老是說“我們的市民們的無憂無慮”在與日俱增。真正的蒲魯東的資產者遠不是無憂無慮的，他向自己喊道：«*N'ayons pas peur! N'ayons pas peur!*»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只有那種想靠大喊大叫來驅散恐懼和憂慮的人才會這樣說話。

批判的批判通過翻譯真正的蒲魯東的著作創造了一個批判的蒲魯東，從而向群眾表明，什麼是批判地完成的譯文。它向我們表明了什麼是“恰如其分的翻譯”。因此他有充分的權利攻擊那些拙劣的、群眾的譯品：

“德国公众想以極低廉的价格获得出版物，因此出版商就想有廉价的譯品；譯者不願在工作中餓死；他甚至不能以深思熟慮的态度(以完全是認識的宁靜的态度)<sup>①</sup>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因为出版商必須使譯品迅速出版問世，以赶上竞争者。此外，甚至譯者也得担心竞争：他得担心有别的譯者索价更低并且更快地完成工作。于是他立刻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手稿口授給某个穷繕写員，同时尽可能念得快些，免得按小时拿工錢的繕写員占了便宜。如果第二天他能將稿子交給不断催促他的排字工，那他就算万幸了。何况，在我們的書市上泛滥的各种譯品只不过是德国文壇目前萎靡不振的一种表現罢了。”如此等等(“文学总匯报”第8期第54頁)。

### 批判性的評注 5

“蒲魯东根据人类因利息和利潤制度以及消費和生产的平衡而特別遭到損害这一点，得出了财产不可能的証明；这个証明缺少一个能补其不足的反面，即証明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可能的。”

希圖僥幸的本能使批判的批判决定不去深究蒲魯东关于利息和利潤制度等等的論断，也就是說，不去深究蒲魯东的一些最重要的論断。問題在于：如果沒有关于私有制运动問題的十分实际的知識，要想在这一点上批判蒲魯东，哪怕只是做个批判的样子，也完全是是不可能的。于是批判的批判指出蒲魯东沒有提供私有财产的历史可能性的証明，企圖以此弥补自己的無能为力。可是，除了空話就什么也沒有提供的批判为什么偏要求別人給它提供一切呢？

“蒲魯东用来証明财产不可能的論据是：工人不能用自己劳动所得的錢买回自己的产品。蒲魯东在証明这个論点时探究了資本的实质，但却沒有提出詳尽透澈的論据。工人之所以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就因为产品总是社会的產品，而工人本身則不外乎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罢了。”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为了再詳尽透澈一些，埃德加尔先生也許應該一反蒲魯东的推論說，工人之所以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他怎么也不得不去把它买回来。在購買的定义中就已經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工人把自己的产品当做脱离了他自身的、异化了的对象来对待。順便說一句，埃德加尔先生的詳尽透澈的論据并没有詳尽透澈地說明，为什么資本家(他自己也不外乎是单个的人，而且还是被利潤和利息所雇用的人)不仅能买到劳动产品，而且还能买到比劳动产品更多的东西，要說明这一点，埃德加尔先生就必须說明劳动和資本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說，必須去探究資本的實質。

从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出的这几段話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批判的批判怎样利用它剛从某个作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并在改成批判的說法以后立刻把它当做自己的天才發明，拿来反对那个作家。要知道，批判的批判正是从蒲魯东那里汲取了这个似乎未曾被蒲魯东引用过而現在正被埃德加尔先生使用着的論据。蒲魯东說：

“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如果把工人分离开，那末，付給每一个单个的人的日工資就很可能超过每一单个人的产品的价值；但問題不在这里…… 你們給一切个人力量支付了报酬，但这并不就等于給集体的力量支付了报酬。”

蒲魯东最先注意到：付給单个工人的工資的总和，即使在每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完全得到了报酬的情况下，也还是不足以偿付物化在大家的产品中的集体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为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而被雇用的。埃德加尔先生歪曲了这个思想，他硬說工人不外乎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这样，批判的批判就利用了蒲魯东的总的思想，并用它去反对同一个蒲魯东的同一种思想的进一步的具体發揮。它用批判的方式掌握这个思想，并在下面这几句話

### 中暴露了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秘密：

“現在的工人只考慮自己，也就是說，他以為他只是作為一個人而得到報酬的。不是別人，正是工人自己不考慮他在同別的力量合作中所產生的那種巨大的、不可比擬的力量。”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見，一切禍害都只在工人們的“思維”中。的確，英國和法國的工人組織了各種團體，在這些團體中，工人們所議論的話題不僅有他們作為工人所應有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們作為人所應有的各種需要。工人們組織這些團體，就表明他們非常徹底而廣泛地理解從他們的合作中所產生的那種“巨大的”、“不可比擬的”力量。但是這些群眾的共產主義的工人，例如在曼徹斯特和里昂的工場中做工的人，並不認為用“純粹的思維”即單靠一些議論就可以擺脫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實際上所處的屈辱地位。他們非常痛苦地感覺到存在和思維、意識和生活之間的差別。他們知道，財產、資本、金錢、僱傭勞動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遠不是想像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異化的十分實際、十分具體的產物，因此也必須用實際的和具體的方式來消滅它們，以便使人不僅能在思維中、意識中，而且也能在群眾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為人。而批判的批判卻相反，它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中消除了僱傭勞動的想法，只要他們在思想上不再認為自己是僱傭工人，並且按照這種過於豐富的想像，不再設想自己是作為單個的人來支取工錢的，那末他們就會真的不再是僱傭工人了。從這以後，作為絕對的唯心主義者，作為以太的生物，他們自然就可以靠純思維的以太來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上消除了資本這個範疇，他們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資本；只要他們在自己的意識中改變自己這個“抽象的我”，并把真正改變自己的現



实的生存、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加以鄙弃，他們就会真正發生变化并轉化为现实的人。把实在的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疇的“精神”，当然要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統統归結为批判的批判的辯証思維过程。它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埃德加尔先生發表了自己的这番宏論之后，当然是應該“否認”蒲魯东的批判具有“意識”了。

“但是蒲魯东也想成为講求实际的人。”“他認為他已經有了認識。”“虽然如此”，認識的宁靜得意洋洋地大声叫道，“但我們現在也还是應該否認他有認識的宁靜。”“我們从他的著作中摘引几处，以表明他怎样很少考虑自己对社会的态度。”

在后面我們还要从批判的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几处（見“貧民銀行”和“模範农場”），以表明它怎样連最基本的經濟关系都还未能認識，更談不到加以考虑，因而就以它所特有的批判的机敏，感到自己有責任对蒲魯东进行批判的分析。

在批判的批判作为認識的宁靜“制服了”一切群众的“对立面”之后，在它用范疇的形式掌握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的辯証法中之后，我們將看到，它又在用思辨的辯証法重新創造世界。不言而喻，以批判的思辨形式来創造世界的这种奇迹，为了不致遭到“褻瀆”，只能用神秘剧的形式曉諭未入聖門的群众。于是，維什努-施里加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就以販賣秘密的商人<sup>21</sup>的姿态出現了。

## 第五章

### 販賣秘密的商人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或 施里加先生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

**施里加-維什努**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把“巴黎的秘密”<sup>①</sup>崇奉為神。歐仁·蘇被譽為“批判的批判家”。要是他知道這件事，一定會像莫里哀的醉心貴族的小市民一樣驚叫起來：

“天哪！我原來說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一點還不知道呢，您今天把這個告訴我，我對您真是萬分的感激。”<sup>22</sup>

施里加先生在批判之前，先來一個**美學的小引**。

“**美學的小引**”對“批判的”史詩的普遍意義，特別是對“巴黎的秘密”的普遍意義，作了如下的闡述：

“史詩創造這樣一種思想：現在本身是無，它甚至不僅是（是無，甚至不僅是！）<sup>②</sup> 過去和未來的永恒的分界綫，而且還是（是無，甚至不僅是，而且還是！）<sup>③</sup> 應該經常加以填充的、把永生和無常分隔開來的裂口……這就是‘巴黎的秘密’的普遍意義。”

接着，“**美學的小引**”又斷定說：“如果**批判家**有這樣的願望，那末，他也可能成為**詩人**。”

① “巴黎的秘密”是法國作家歐仁·蘇寫的小說，該書宣揚了社會改良的思想。  
——譯者注

② ③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施里加先生的整个批判都将証明这种論断的正确性。这一批判的一切組成部分都是“詩作”。

同时,这一批判又是“美学的小引”所規定的“自由艺术”的产物,也就是說,它“發現了絕對是从来还没有过的、嶄新的东西”。

最后,这一批判又是“应该經常加以填充的、把永生(施里加先生的批判的批判)<sup>①</sup>和無常(欧仁·苏先生的小說)<sup>②</sup>分隔开来的裂口”,所以它甚至还是批判的史詩。

### (1) “文明中的野蛮的秘密”和 “国家中的無法紀的秘密”

誰都知道,費尔巴哈把基督教关于投胎降世、三位一体、永生不灭等等的观念看做投胎降世的秘密、三位一体的秘密、永生不灭的秘密。施里加先生則把現今人世的一切关系都看做秘密。如果說費尔巴哈揭露了现实的秘密,那末施里加先生却反而把现实的平凡的东西变成了秘密。他的本領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經被揭露的东西。

于是,他把文明中的野蛮(罪犯的存在)和国家中的無法紀与不平等都說成秘密。二者必居其一:不是施里加先生把揭露了这些秘密的社会主义文学依旧看做一种秘密,就是他想把这种文学的最著名的結論变成“批判的批判”的私人的秘密。

因此,我們沒有必要深入探討施里加先生关于这些秘密的論断,而只指出最精彩的几点。

---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在法律和法官面前，所有的人不論富貴貧賤都一律平等。这一原理在国家的信条中占着首要的地位。”

是國家的嗎？恰恰相反，大多數國家的信条都一開始就規定富貴貧賤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宝石匠莫莱尔<sup>①</sup>十分誠实而清楚地說出了秘密(即貧富对立的秘密)<sup>②</sup>的本質。他說：但願富人也知道这一点！但願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不幸得很，他們不知道貧窮是什么。”

施里加先生不知道：欧仁·苏由于要对法国資產階級礼貌一些而把时代弄錯了，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市民階級常說的“呵！但願皇上也知道这一点！”改成“呵！但願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再借“宪章真理”<sup>23</sup>时代的工人莫莱尔之口說了出来。这种貧富間的質朴关系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已經不再存在了。富人手下的学者即經濟学家們就在这里傳播关于貧窮这种肉体貧困和精神貧困的非常詳細的見解。他們用安慰的口吻証明說，因为要保持事物的現狀，所以这种貧困似乎也應保存下来。甚至他們很細心地計算出，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應該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縮減自己的人数。

欧仁·苏描写的是罪犯的酒吧間、巢穴和言談，而施里加先生却發現了一个“秘密”，即“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描写罪犯的言談和巢穴，而是要

“研究作惡的動机的秘密…… 因为正是在这些交往最活躍的地方…… 罪犯們才是無拘無束的”。

假使有人向自然科学家論証，蜂房并不是作为蜂房而引起自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然科学家的兴趣，这些蜂房就是对于沒有研究过它的人来说也不会成为秘密，因为只有在新鮮空气中和花朵上蜜蜂“才是無拘無束的”，那末，自然科学家将何言以对呢？罪犯的巢穴和他們的言談反映罪犯的性格，这些巢穴和言談是罪犯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描写罪犯必然要描写到这些方面，正如描写 *femme galante* [情妇] 必然要描写到 *petite maison* [幽会密室] 一样。

罪犯的巢穴不仅对一般的巴黎人，就是对巴黎的警察都是“秘密”，所以，为了使警察能到这些偏僻的角落里去，現在正在巴黎最古老的地方鋪設具有照明設備的寬广的馬路。

最后，欧仁·苏自己宣布，他描写上述一切是为了投合讀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欧仁·苏先生所有的小說都是为了投合讀者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只要举出“阿达尔·居尔”，“火蛇”，“普利克和普洛克”等等小說，就足够說明这一点了。

## (2) 思辨结构的秘密

对“巴黎的秘密”所做的批判的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的黑格尔结构的秘密。施里加先生把“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無法紀”說成秘密，也就是把它們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畴之中，接着就迫使“秘密”开始自己的思辨的生命历程。要指出这种思辨结构的总的特点，只要几句话就够了。施里加先生对“巴黎的秘密”的論述就是对思辨结构的各个细节方面的运用。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die Frucht*] 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質，而且是梨、

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質，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話說)“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說：对梨說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質的，对苹果說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質的。作为它們的本質的并不是它們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們中抽象出来又硬給它們塞进去的本質，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質——“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誠然，我的有限的、基于感覺的理智辨別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說这些感性的差別是非本質的、無关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虛幻**的果实，而它們的**真正**的本質則是“果实”这个“实体”。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別丰富的規定的。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問仅限于說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像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說，这是“矿物”，而他的学問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說多少遍“矿物”这个詞。

思辨的思維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一般果实”，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假象，它就不得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从“果实”、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別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但如此，要从抽象轉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此，思辨哲学家抛弃了“果实”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一种

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說，使人看来好像他并没有抛弃抽象似的。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他的議論大抵是这样：

如果說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一般实体”、“一般果实”，那末，試問，这个“一般果实”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統一体**、关于“一般实体”、关于“一般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觀**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無差別的、靜止的本質，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質。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別，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而且对“一般果实”本身，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通常的千差万別的果实是“**統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們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結晶。因此，比如說，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讓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讓自己像梨一般存在。因此，我們就不能根据我們从实体观念得出的看法再說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反地應該說“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果实”确定自己为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間的差別，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別，这些差別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別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無內容、無差別的統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統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發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統一体**。这統一体把单个的果实都消溶于自身中，又从自身生出各种果实，

正如人体的各部分不断消溶于血液，又不断从血液中生出一样。

可見，基督教認為只有一个上帝的化身，而思辨哲学却認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譬如在現在这个例子里，在思辨哲学看来，每一个单个的果实就都是实体的，即絕對果实的特殊化身。所以思辨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把现实的、普通的果实的**存在**制造出来，然后故弄玄虛地說：苹果、梨、扁桃、葡萄存在着。但是我們在思辨的世界里重新得到的这些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却最多不过是**虛幻**的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因为它们是“一般果实”的生命的各个环节，是**理智所創造的抽象本質**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因而本身就是**理智的抽象产物**。我們在思辨中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經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們不是从物質的土地中，而是从我們腦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它們是“一般果实”的化身，是**絕對主体的化身**。因此，我們从抽象，从“一般的果实”这一**超自然**的理智的本質回复到现实的**天然**的果实，却反而使这些天然的果实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意义，把它們变成了純粹的抽象。所以，現在我們應該注意的主要正是証明“一般果实”在它的一切生活表現中——在苹果、梨、扁桃等等中的**統一性**，也就是証明这些果实的神秘的**相互联系**，証明“一般果实”怎样在这些果实的每一种中**漸次地实现自身**，并怎样**必然地**从自己的一种存在形式轉到另一种形式，例如，从葡萄轉到扁桃。因此，通常的果实的意义現在已經**不在于它們的天然屬性**，而在于使它們在“絕對果实”的生命过程中取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屬性**。

一个普通人說苹果和梨存在着的时候，他并不認為自己說出了什么特殊的東西。但是，如果哲学家用思辨的術語說出这些存在的東西，那他就是說出了**不平凡的東西**。他完成了一个**奇迹**；他



从“一般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質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就是說，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他以为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一般果实”）中創造出这些果实。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这些或那些实物存在时，他就是进行了一次創造。

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創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屬性当做他自己發現的規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創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說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話來說，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內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施里加先生，先作这些論述是必要的。如果說施里加先生过去一直把现实的关系（例如法紀和文明）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疇中，并且用同样的方法把“秘密”变为实体，那末，現在他才第一次登上了真正思辨的、黑格尔的高峰，并把“秘密”变成了体现为现实的关系和人的独立主体。于是，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看門人、公正人、江湖医生、桃色事件、舞会、木門等等就成了这种主体的生活表现。起初他从现实世界造出“秘密”这一范疇，而現在又从这一范疇造出现实世界。

施里加先生笔下的思辨结构的秘密很清楚地显示出他比之黑格尔無疑具有两大优点。第一、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詭辯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觀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經歷的过

程，說成想像的理智本質本身即絕對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第二、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敘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敘述。这种思辨發展之中的现实的發展会使讀者把思辨的發展当做现实的發展，而把现实的發展当做思辨的發展。

在施里加先生那里就沒有这两种困难。他的辯証法絲毫沒有故作玄虛。他以極其誠实而坦白的态度来表演他的技巧。而且他不在任何地方滲入现实的內容，所以他的思辨結構沒有任何碍手碍脚的附屬物，它給我們看到的不是任何模稜两可的外表，而是赤裸裸地表露出来的美。此外，在施里加先生那里出色地表明思辨怎样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自由地从自身中 *a priori* [先驗地] 造出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想用詭辯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性，又怎样正好陷入对对象的最不合理的、非自然的从屬性，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独特的規定說成絕對必然的和普遍的規定。

### (3) “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欧仁·苏帶着我們看了社会的最下層，拜訪了罪犯的酒吧間等等，然后又把我們引到了上流社会，引到了聖热尔門区的舞会上。

施里加先生关于这种推移做了如下的解釋：

“秘密总力圖用新的轉变来逃避考察。它以前一直作为一种絕對猜不透的、完全不可捉摸的、否定的东西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相对立；而现在它又作为后者的不可觉察的內容而滲入了后者。但是这样一来秘密也就消除了被認識的絕對不可能性。”

“秘密”过去一直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即同

法紀和教養相對立，“而現在它又……滲入了後者”，即滲入了教養的領域。至於只有上流社會才能代表教養的領域這一點，則是一個秘密，即使不是巴黎本身的秘密，也是巴黎所不了解的秘密。施里加先生沒有從罪犯世界的秘密推移到貴族社會的秘密，而是使“秘密”成了有教養的社會的“不可覺察的內容”，成了它的真正的本質。這並不是施里加先生為了要開辟進一步考察的道路而作的“新的轉變”，而是“秘密”本身為了要使自己能逃避考察而作的“新的轉變”。

施里加先生在真正跟着歐仁·蘇到他一心向往的地方，即到貴族的舞會以前，又採取了 *a priori* [先驗地] 構成的思辨的虛偽轉變。

“顯然，秘密總力圖躲藏在非常堅固的外殼中，這是可以預見的。而在事實上也好像是我們面臨着無法克服的不可入性……因此，可以預料，大體說來，……尋根究底的新嘗試在這裡畢竟還是不可缺少的。”

夠了！施里加先生在這件事情上獲得這樣多的成就，以至

“秘密這一形而上學的客體就顯得輕浮佻達，無拘無束，賣弄風情了”。

為了要把貴族社會變成“秘密”，施里加先生企圖通過幾次思考來弄清“教養”的含意。他總是先給貴族社會全面地加上一些誰也不會到它裡面去尋找的性質，以便後來再去發現貴族社會並不具備這些性質這一“秘密”。然後他就把這一發現當做有教養的社會的“秘密”。施里加先生給自己提出了如下的一些問題：“普遍理性”（大概是思辨的邏輯吧？）是不是有教養的社會中“社交談話”的話題？“是不是只有對人的愛的韻律和拍節才使”這個社會“成為和諧的整體”？“我們稱之為一般教養的東西是否就是普遍的、永恆的、理想的東西的形式”，也就是說，我們稱之為教養的東西是否

就是形而上学的想像的結果？施里加先生不难 a priori [先驗地] 預言他自己的問題的答案：

“但是，可以逆料……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欧仁·苏的小說中，从平民社会轉到貴族社会的过程是通过写作小說的一般手法来完成的。盖罗尔施坦公爵魯道夫<sup>①</sup>的乔装使他得以深入社会的下層，正如他的身分使他得以接近社会的上層一样。在赴貴族舞会的路上，他所考虑的决不是周圍的各种生活的对照，他感到最够味的只是他自己的各种乔装的对照。他告訴他最順从的同伴，他怎样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中感到極其有趣。

他說：“我觉得这些对照真够味。昨天我是一个画家，呆在費維街的一間小房子里画扇面；今天早上我以店伙的身分，用黑醋栗酒招待皮普勒太太；而今晚呢，我又是靠神的恩惠支配这个世界的一个特权者。”

被請到舞会上去的批判的批判唱道：

“我在地上的諸神中逍遙，  
我的神識几乎已經縹緲！”<sup>24</sup>

批判的批判在下面的頌歌中吐露了心曲：

“这里出現了魔术般的奇迹，在黑夜里陽光普照，在寒冬里显出春天的葱綠和夏天的繁茂。我們立即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我們相信人們心中有神明存在的奇迹，尤其是当美妙和优雅使我們完全相信理想已經近在咫尺的时候。”(!!!)<sup>②</sup>

批判的乡村牧师，你多沒有經驗，多輕信呵！只有你那批判的純朴才能从雅致的巴黎舞厅立即轉入这样一种迷信的心情，以致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譯者注

② 括弧里的惊嘆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相信“人們心中有神明存在的奇迹”，从巴黎的迷人的女人中看出“近在咫尺的理想”，天使的化身。

批判的牧师因为天真得極其可爱，决定偷听两个“絕代佳人”克雷門斯·达尔維尔<sup>①</sup>和薩拉·麦克格萊哥尔伯爵夫人<sup>②</sup>的談話。你們猜猜他想从这两位美人那里“偷听”些什么？他想听

“我們怎样才能为可爱的孩子們祝福，怎样才能使丈夫得到最大的幸福…… 我們听着……我們惊奇……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这位偷听私話的牧师大失所望的时候，我們却不覺暗自幸灾乐禍。两位太太談的既不是“祝福”，又不是“最大的幸福”，也不是“普遍的理性”，相反地，“却是慫恿达尔維尔夫人不忠于她的丈夫”。

关于这两位太太中間的另一位，麦克格萊哥尔伯爵夫人，我們却得到下面的純朴的說明：

她“真够有进取心，居然在秘密結婚以后生下了孩子”。

伯爵夫人的这种进取精神使施里加先生大为不滿，以致对她加以严厉的訓誡：

“我們發現，伯爵夫人一心只想获得个人的私利。”

她能如願以償，嫁給盖罗尔施坦公爵，这在施里加先生看来并不見得有什么好处。

“我們絕不能指望她的出嫁会給盖罗尔施坦公爵的臣民带来幸福。”

我們的这位清教徒在結束自己的訓誡时“郑重其事地”指出：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魯道夫的情妇。——譯者注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魯道夫的第一个情妇。——譯者注

“薩拉(有进取心的太太)①虽然是这个光彩夺目的圈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但是,她在这个圈子中未必是一个例外。”

虽然! 但是, 未必! 难道說这个圈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不是例外嗎?

关于另外两位理想人物——达尔維尔侯爵夫人②和德·呂遜納公爵夫人③的性格, 我們听到下面的話:

她們“得不到內心的滿足。她們沒有从婚姻生活中找到爱的对象, 因此就到婚姻生活以外去寻找爱的对象。婚姻生活中的爱情对她們說来依然是一个秘密, 她們为內心的强烈的冲动所驅使, 力圖把这秘密揭穿。因此, 她們就沉醉于秘密的爱情。这些沒有爱情的結婚的牺牲品, 会不自主地把爱情本身降低为一种外表的东西, 降低为一种所謂的男女关系, 而把浪漫的因素, 即秘密, 当做爱情中的內在的、令人振奋的、本質的东西”。

这种辯証的闡述愈适用于生活的一切場合, 我們对它的功績的評價也就應該愈高。

例如, 不敢在自己家里飲酒而又想痛飲的人, 就到家庭“以外”去寻找飲酒的“对象”, “因此”, 就沉醉于秘密的飲酒。而且有一种無法克制的力量促使他把秘密当做飲酒的本質的要素, 然而他不会把飲酒降低为純“外表的东西”, 可有可無的东西, 就像上述的几位太太不会把爱情降低到这种程度一样。因为根据施里加先生本人的說明, 她們并不是把爱情, 而是把沒有爱情的結婚降低到它的本来面目, 就是說降低到一种外表的东西, 降低到一种所謂的男女关系。

施里加先生接着問: “爱情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③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把“秘密”說成这种爱情的“本質”这一說法我們剛才領教过了。那末，我們到底應該怎样才能找出秘密之秘密，本質之本質呢？

牧师先生朗誦道：“不是万綠丛中的林蔭小道，不是月明之夜的自然的蒙朧，也不是华貴的窗帘和帷幔造成的人工的蒙朧。不是那豎琴和風琴的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不是禁物的誘惑力……”

窗帘和帷幔！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还有風琴！牧师先生，你还是把教堂忘了吧！誰会抬着風琴去幽会呢？

“所有这一切(窗帘、帷幔和風琴)①不过是一种秘密的东西。”

那末难道这种秘密的东西不就是秘密的爱情的“秘密”嗎？决不可能：

“爱情中的秘密是令人激动、陶醉、着迷的那种东西，是情欲的威力。”

在“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中，牧师先生就已經拥有能使人着迷的东西了。如果他不是带着窗帘和風琴，而是带着鼈羹和香檳酒去幽会，那他也不会缺少“令人激动和陶醉”的东西。

聖者教訓說：“誠然，我們不想承認情欲的威力，但是正因为我們要把它从自身清除出去，正因为我們不承認它是我們自己的本性，它對於我們才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假如我們承認它是我們自己的本性，那末当它力圖牺牲理性、真正的爱情和意志力以表現自己时，我們立刻就可以克制它。”

依照思辨的神学的精神，牧师劝我們承認情欲是我們自己的本性，說这样才能在以后去克制它，即撤回这种承認。如果情欲想牺牲理性(同情欲相对立的意志力和爱情是屬於理性的領域的)以表現自己，他誠然是要立刻加以克制的。但是只要情欲不力圖牺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牲真正的理性，即信仰，牺牲真正的爱情，即对上帝的爱，牺牲真正的意志力，即基督的意志，以表现自己，那末，就是非思辨的基督徒也是会承认情欲的。

牧师再说下去就立刻向我们泄露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的见解：

“因此，只要爱情不再是结婚的本质、一般伦理的本质，情欲就成为爱情、道德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这里的情欲不应该仅作狭义的理解，即理解为神经的颤动、血管中的热流，而且还要作更广义的理解，即理解为它提高到精神力量的外观，提高到支配欲、虚荣心、求名欲…… 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是(广义的)①情欲的代表，而这种情欲就是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牧师说得一针见血：要克制情欲，他首先得克制神经传达和快速的血液循环。——在说到“狭”义的情欲时，施里加先生认为高度的体温是由血管里血液的沸腾而来。他不知道温血动物之所以称为温血动物，是因为他们血液的温度尽管有若干细小的变化，但始终保持在同一的高度上。——只要神经传达一中止，血管里的血液一冷却，这罪恶的肉体，这情欲的栖息之所，成了一具尸首，而魂灵们也就能顺利无阻地彼此谈论“普遍理性”、“真正的爱情”和“纯正的道德”。牧师大大地贬低了情欲，竟致勾消了刺激性爱的那些因素，即快速的血液循环(它证明人要是迟钝得没有情欲也就不会有爱)和神经的传达(它把作为情欲的主要栖息之所的器官和大脑连接起来)。他把真正的性爱归结为机械的 *secretio seminis* [泄精]，并和一个臭名远扬的德国神学家一起囁嚅着：

“不是为了性爱，不是为了肉欲，只因上帝曾经吩咐：你们要生养众多。”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現在，讓我們把思辨的結構和歐仁·蘇的小說比較一下吧。這些被當做愛情的秘密的並不是情欲，而是神秘、獵奇、挫折、恐懼、危險，尤其是被禁止的事物的誘惑力。

這裡談到：“為什麼許多女人偏要找不配做自己丈夫的男人做情人呢？這是因為愛情的最大的魔力就在於它像禁果一樣地誘人……你們會同意：愛情要是去掉了擔心、苦惱、困難、秘密、危險，那就什麼東西也沒有，或者幾乎什麼東西也沒有了。那就是說，只剩下了情人的軀殼……總而言之，這多多少少好像這樣一件事情：有這樣一個人，有人問他，你為什麼不和你那個寡居的情婦結婚呢？那個人回答說，唉，這一點我當然也想過，不過結婚後，我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過夜。”

施里加先生強調說，愛情的秘密不在於被禁止的事物的誘惑力，而歐仁·蘇卻強調說，被禁止的事物的誘惑力構成愛情的“最大的魔力”和各種 extra muros [屋外的] 愛情獵奇的根據。

“在愛情中正如在商業中一樣，禁令和走私是形影不離的。”<sup>25</sup>

歐仁·蘇和自己的思辨的解釋者相反，他還作出了這樣的論斷：

“嬌柔造作和玩弄手腕的僻性，故弄玄虛和詭計多端的傾向，是女人的本質特點、天生的僻性和主要的本能。”

使歐仁·蘇感到煩惱的只是這種反對結婚的僻性和傾向。他真想使女人的這種本能運用得比較無害、比較有益。

施里加先生把麥克萊哥爾伯爵夫人變成了“提高到精神力量的外觀”的那種情欲的代表者，但是她在歐仁·蘇的筆下卻純粹是個抽象理智的人。她的“虛榮心”和她的“驕傲”遠不能成為情欲的形式，而是一種和情欲毫不相干的抽象理智的產物。因而歐仁·蘇強調說：

“爱情的火样的冲动从沒有打动她那冷若冰霜的心；任何动人心弦的事件也不能改变这狡猾、自私而虛榮的女人的刻薄打算。”

抽象、無情而冷酷的理智所造成的利己主义构成了这个女人的根本特征。所以，她的灵魂在小說中被描写成“枯燥而冷酷的”，她的意向被描写成“恶毒透頂的”，她的性格被描写成“狡猾的”和“絕对的”（这是抽象理智的人所特有的性格），她的嬌柔造作被描写成“高明的”。我們順便提一句，欧仁·苏小說中伯爵夫人的生活道路，同小說中大多数人物的生活道路一样，是描写得很不合理的。老奶媽要她相信她日后将“戴王冠”。她对此竟深信不疑，于是出發旅行，想借出嫁来取得王冠。結果弄得不倫不类，竟把一个德国的小“諸侯”当做了“戴王冠的人物”。

我們这位批判的聖徒痛斥了情欲以后，認為还必须表明：为什么欧仁·苏一写到上流社会就要描写舞会（这几乎是所有的法国小說家都喜欢采用的一种手法），而英国小說家一写到上流社会往往是描写打猎或乡間別墅。

“欧仁·苏一写到上流社会就要描写舞会，这件事，对这种理解事物的方法（施里加先生的观点）<sup>①</sup>說来，不可能是無关紧要的，而且从这方面（从施里加的结构方面）<sup>②</sup>来看也不可能是純粹偶然的。”

于是批判家放开繩繩，馬就沿着按归天的老沃尔弗的精神对这种必然性所做的一連串的証明飞步狂奔起来。

“跳舞是作为秘密的情欲的最普遍的表现。只有結成配偶才能得到的两性(?)<sup>③</sup>的直接接触即拥抱，在跳舞中是容許的。因为跳舞虽然从外表看起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③ 括弧里的問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来能够得到快感,而且实际上(是实际上嗎? 牧师先生!)<sup>①</sup>也是这样,但终究不能看做情欲的(难道应看做普遍理性的嗎?)<sup>②</sup>接触和拥抱。”

于是最后得出了一个最多是踮着脚跟跳舞的結論:

“因为,如果真的把跳舞看做情欲的接触和情欲的拥抱,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单单对跳舞表示寬容,而一切类似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在其他地方同样無所顧忌地表现出来——社会反而会給加上一个严重的罪名,認為这是不可原諒地伤風敗俗和不識廉耻的行为,而冠以恶名并無情地加以取締。”

牧师先生所說的不是康康舞,也不是波尔卡舞;他說的是一般的舞蹈,是只有在他那批判的脑盖骨下面才能跳的舞蹈这一范畴。如果有机会讓他到巴黎的“雪蜜卢”去看一看跳舞,那兒的潑辣大胆、毫無隱諱的作風、輕浮放蕩的动作、刺激情欲的音乐定会使他的基督教德意志的情感激动起来。他自己的那种“实际上能够得到的甜蜜之感”使他有可能“觉得”:“确实不可理解,为什么跳舞的人自己反而”給观众造成赤裸裸的人类情欲这样一种激动人的印象(“这种情形要是在其他地方”,即在德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便是不可原諒的罪过”……),而同时,当跳舞的人不仅能够而且必然要成为情欲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人的时候,为什么他們又不應而且不敢——至少可以这样說——自視為这样的人!!

出于对跳舞的本質的崇敬,批判家把我們引入了舞会。但是他遇到了重大的困难。在这个舞会上虽然有人在跳舞,但只是在想像中跳舞。欧仁·苏根本没有对跳舞作任何描写。他沒有混在跳舞的人群中間。他之所以要利用舞会,只是为了便于把上層的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貴族圈子里的人匯集在一起。在絕望之余“批判”迫不及待地補充作者，用自己的“幻想”把舞會等等輕鬆地描寫了一番。如果說，按照批判的規定，歐仁·蘇在描寫罪犯們的巢穴和言談的時候，絕不是他對這些巢穴和言談的描寫本身發生興趣，那末，相反地，他必然會對跳舞發生無限的興趣，儘管描寫跳舞的並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富于幻想”的批判家。

再看！

“事實上，社交的聲調和節奏的秘密，即這種極不自然的事物的秘密，是一種回復到自然的熱烈的渴望。因此，像塞西莉<sup>①</sup>身上所發生的這種情形給有教養的社會一種像電一樣的影響，並獲得極不平常的成就。對她這樣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只受自己的本性支配的、在奴隸中生長起來的女奴說來，這種本性是生命的唯一泉源。她突然被送入宮廷，在那里的風俗習慣的強制下，她很快就識破了這些風俗習慣的秘密……她是絕對有力量駕馭這個環境的，因為她的力量，她的本性的力量像不可思議的魅力一樣影響着周圍的人，而在這個環境中塞西莉必然會走入歧途而放縱起來，但是在以前，當她還是奴隸的時候，正是這種本性使她拒絕了主人的一切卑鄙的要求，始終忠實於自己的愛情。塞西莉是有教養的社會的被揭露了的秘密。被壓抑的感情最後終於冲破障礙而不可抑制地奔放出來……”

不知道歐仁·蘇的小說的內容而只讀過施里加先生的文章的讀者，一定認為塞西莉是這個舞會上的一个迷人的女人。然而在小說中，當巴黎在跳舞的時候，塞西莉正坐在德國的監獄里。

塞西莉作為一個女奴始終是忠實於黑人醫生大衛<sup>②</sup>的，因為她“狂熱地”愛着他，也因為她的所有者維里斯<sup>③</sup>先生正“粗暴地”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魯道夫的侍醫。——譯者注

③ 同①。——譯者注

爭取她的温存。在小說中，使她生活放蕩的动因是很簡單的。她一被帶到“歐洲人的世界”中，就“耻于同黑人結婚”。她剛到德國，一種敗壞了的主体就“立即”腐化了她。這是她血管里的“印地安人的血液”在起作用。為了迎合“可愛的道德”和“可愛的交易”，偽善的歐仁·蘇先生不得不把她的行為說成“天生的墮落”。

塞西莉的秘密就在於她是一個混血姑娘。她的情欲的秘密是熱帶的熾熱。帕爾尼在他致愛琳娜的美麗的詩篇中贊美過混血姑娘。在成百篇的游記中都可以看到混血姑娘對法國水手是多麼危險。

“塞西莉本來是那種只有在熱帶的熾熱下才能激起的強烈的情欲的化身…… 每一個人都聽人談到過這些所謂能使歐洲人喪命的有色人種的姑娘，這些迷人的吸血鬼，她們以可怕的誘惑力來迷醉她們的犧牲者……使他們像當地有力的俗話所說的那樣，渴飲自己淚，飢食自己的心。”<sup>①</sup>

塞西莉對那些有貴族教養的萎靡不振的人正好絲毫沒有施展這樣的魔力……

“塞西莉這一類型的女人，往往對雅克·弗蘭<sup>②</sup>之類的粗魯的情欲的代表者產生一種突如其來的影響，使他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sup>③</sup>

像雅克·弗蘭之類的人是从什麼時候開始代表起高尚的社會來呢？可是批判的批判却非把塞西莉說成絕對秘密的生命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不可。

---

① 引自“巴黎的秘密”。——譯者注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③ 同①。——譯者注

#### (4) “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秘密作为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固然是从对立躲藏到内部去了。然而上流社会还有它可以用来保护聖地的特殊集团。上流社会对这种至聖所說来好像是小礼拜堂。但是对于在門庭前逗留的人說来，小礼拜堂本身就是秘密。因此，这种特殊的教养之于人民……正如粗野之于有教养的人一样。”

“固然……然而……还……好像……但是……因此”，正是这些魔术般的鈎子把思辨的論述之鏈的各个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上文中我們看到，施里加先生如何使秘密离开罪犯世界而藏到上流社会里去。現在他必須构造另一个秘密，即上流社会有它的特殊的集团，这些集团的秘密对人民說来是一种秘密。除了上述魔术般的鈎子以外，这种結構还需要把集团轉化为小礼拜堂，把非貴族世界轉化为这种小礼拜堂的門庭。而且資產階級社会的一切領域只形成上流社会的小礼拜堂的一个門庭这一件事，对巴黎說来又是秘密。

施里加先生追求两个目的。第一、必須把体現在上流社会的特殊集团中的秘密变成“整个世界的公共财产”。第二、必須把公証人雅克·弗兰构造成秘密的有生环节。批判家發表了如下的議論：

“教养还不能而且也不想把所有的等級和所有的差別都拉到自己的圈子里面来。只有基督教和道德才能在地球上建立包罗万象的王国。”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教养、文明就等于貴族的教养。因此，他看不到，工業和商業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但是我們怎样到公証人雅克·弗兰那里去呢？这太簡單了！

施里加先生把**基督教**变成个人的特質，即“**虔敬**”，而把**道德**变成另一种个人的特質，即“**正直**”。他把这两种特質結合在一个人身上，并把这个人命名为**雅克·弗兰**，因为雅克·弗兰并没有这两种特質，而只是假装出这种样子。于是，雅克·弗兰就成了“**正直和虔敬的秘密**”。然而，弗兰的“**遺囑**”是“**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的秘密**”，可見已經不是正直和虔敬本身的秘密。批判的批判想把这个遺囑构造成秘密，所以它必須把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說成这个遺囑的秘密，而不反过来把这个遺囑說成表面上的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巴黎公証人事务所認為雅克·弗兰是对自己的一种**恶意誣蔑**，并通过戏剧檢查，坚持要从已經搬上舞台的“**巴黎的秘密**”中刪去这个人物，正在这个时候，批判的批判却一面“**和概念的空中王国爭論**”，一面把巴黎的公証人看做**宗教和道德、正直和虔敬**，而不看做巴黎的公証人。公証人萊昂的审判过程應該是对批判的批判的一个啓發。公証人在**欧仁·苏**的小說中所处的地位是和他的职位密切相关的。

“公証人在世俗事务中，就如僧侶在宗教事务中一样，他們都是我們的秘密的守护者。”（蒙泰“**法兰西各等級……的历史**”第九卷第37頁<sup>26</sup>）

公証人是世俗的神甫。按職業說他是清教徒，但“**誠实**”——莎士比亚說——并“**不是清教徒**”<sup>27</sup>。他同时是达到各种各样目的的中間人，是市民的傾軋和糾紛的主使者。

对于以伪善和公証职务为自己的全部秘密的公証人弗兰，我們似乎还没有作更深入一步的了解。但是不要性急！

“如果說，伪善对公証人說来完全是**有意的**，而对罗兰<sup>①</sup>夫人說来是一种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类似本能的东西，那末，在这两者之間存在着一群人，这些人不可能深入秘密，但总是下意識地竭力在这样做。同时把这个世界的上等人 and 下等人引到江湖医生布拉达曼蒂（波利多里<sup>①</sup>神甫）的陰森森的住所中去的，也并不是迷信。不，他們是到那里去寻找秘密，以便向世界証明自己無罪。”

“上等人 and 下等人”涌向波利多里那里，并不是为了要找到能向全世界証明自己無罪的某种秘密。不，“上等人 and 下等人”是到波利多里那里去寻找“一般的秘密”，寻找那作为絕對主体的秘密，来向世界証明自己無罪。这就像我們不找斧子，而找“一般的工具”，找 in abstracto [抽象的]工具来劈柴一样。

波利多里所有的一切秘密無非是墮胎的方法和杀人的毒藥而已。——施里加先生在思辨的極度兴奋中讓“謀杀者”求助于波利多里的毒藥，“因为他并不想做謀杀者，而是要做一个受人尊重、愛戴、敬仰的人”。好像在謀害人命的时候，問題是在于得到尊重、愛戴和敬仰，而不在于人的脑袋！但是批判的謀杀者并不为自己的脑袋操心，而为“秘密本身”奔忙。——既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謀杀人，也并非所有的孕妇都是違犯警章怀孕的，那末这个波利多里怎么可以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他所期望的秘密呢？施里加先生大概是把江湖医生波利多里和 16 世紀的学者波利多罗·味吉里奧攪混了；这位学者虽然沒有發現任何秘密，但力圖使揭露秘密的人即發明家的历史成为“全世界的公共財產”（見波利多罗·味吉里奧“發明家手冊”1706 年里昂版<sup>28</sup>）。

可見，秘密本身，即終于变成“全世界的公共財產”的絕對的秘密，就是墮胎和下毒的秘密。秘密本身轉化为对任何人也不能說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是秘密的秘密，這的確是使它自己變成“全世界的公共財產”的最巧妙的辦法。

### (5) “秘密—譏諷”

“秘密本身現在已經成了公共財產，成了全世界和每個人的秘密。或者它是我的藝術或我的本能，或者我能夠在市場上像買商品一樣地買到它。”

現在成了全世界公共財產的是什麼樣的秘密呢？是國家中的無法紀的秘密嗎？是有教養的社會的秘密嗎？是偽造商品的秘密嗎？是製造香水的秘密嗎？還是“批判的批判”的秘密？都不是！這裡說的是 in abstracto [抽象的]秘密，是秘密這個範疇！

施里加先生想把僕人和看門人皮普勒及其妻子<sup>①</sup>描寫為絕對的秘密的體現。他企圖構造出“秘密本身”的傭人和看門人！他是怎樣從純範疇的高峰跳到“在閉鎖的門前當暗探”的“僕人”的腳下，從高踞於抽象雲霧頂上的寶座中的秘密這一絕對主體的高峰跳到看門人所住的地下室呢？

他先使秘密這個範疇完成思辨的過程。而在秘密借墮胎和下毒的辦法成為全世界的公共財產以後，它

“也就絕對不會再是被掩蓋的和不可捉摸的，而是一種自己掩蓋自己的東西，或者更好一些（真是愈來愈好了！）<sup>②</sup>，是被我掩蓋、被我弄得不可捉摸的東西”。

絕對的秘密這樣從本質轉化為概念，從它本身是被掩蓋着的東西的客體階段轉化為它自己掩蓋自己的主體階段，或者更好一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②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些，轉化為“我”掩蓋“它”的階段，但我們並沒有因此獲得任何進展。相反地，困難却似乎增加了，因為人們頭腦中和人們心中的秘密比海底的秘密更不可捉摸，更不易揭露。因此，為了挽救自己的思辨的論斷，施里加先生立即提出了經驗的論斷。

“在關着的門後面(注意聽，注意聽!)<sup>①</sup>今後(今後!)<sup>②</sup>將孕育、釀造并形成秘密。”

“今後”施里加先生把秘密本身的思辨的“我”轉化為一種完全經驗的純粹木制的現實，即轉化為門。

“但是隨着(也就是說，隨着關閉着的門的出現，而不是隨着從故步自封的本質到概念的推移)<sup>③</sup>也就有了偷聽、看穿和探索秘密的可能性。”

可以挨着關着的門偷聽，這個“秘密”並不是施里加先生發現的。大眾的俗話就說“隔牆有耳”。相反地，成為完全批判的思辨的 secrets 的，倒是這樣一件事：只有“今後”，也就是在去罪犯巢穴中作地獄之行以後，在我們高升到有教養的社會的天上以後，在波利多里的所有的奇蹟發生以後，秘密才能在關着的門後孕育，才能被人挨着關着的門偷聽。構成同樣偉大的批判的 secrets 的還有一件事，這就是關着的門不論對於孕育、釀造、形成秘密(在叢林後面不知孕育、釀造、形成了多少秘密!)，或者對於探索秘密都是絕對必要的。

完成這一出色的辯證的功績後，施里加先生自然要從探索本身談到探索的原因。在這裡他向我們揭露了一個秘密：幸災樂禍是探索的原因。他從幸災樂禍又進一步談到幸災樂禍的原因。

他說：“每一個人都希望比別人好，因為他不僅在掩蓋自己行善的動機，而且極力想把自己作惡的事實用重重的濃霧包藏起來。”

---

① ② ③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這句話要倒過來說才對：每一個人不僅在掩蓋自己行善的動機，而且極力想把自己作惡的事實用重重的濃霧包藏起來，因為他希望比別人好。

這樣，我們終於從自己掩蓋自己的秘密達到掩蓋秘密的“我”，從這個“我”達到關着的門，從關着的門達到探索，從探索達到探索的原因，達到幸災樂禍，從幸災樂禍達到幸災樂禍的原因，達到要比別人好的願望。現在，我們馬上就有眼福看到站在在關着的門前的僕人。要比別人好的這種普遍的願望使我們一下就知道“任何人都好探詢別人的秘密”，在這裡批判家又從容不迫地加上了下面這一精辟的見解：

“在這方面，僕人的地位是最有利的了。”

如果施里加先生讀過巴黎警察局的檔案庫中的檔案、維多克檔案、法國的“黑皮書”和類似的東西，他就會知道，在這一方面，警察所處的地位要比僕人所處的“最有利的地位”還更有利些，警察只在最簡單的事情上才利用僕人，而自己則不僅不停在門外，不僅看着主人脫衣服，而且還變成他的 *femme galante* [情婦]，甚至變成妻子，鑽進被窩，碰到他赤裸裸的肉體。在歐仁·蘇的小說中，警探“紅手”<sup>①</sup>是情節發展的主要體現者之一。

“今後”施里加先生對於僕人不能完全“不顧私人利益”這一點感到煩惱。這種批判的懷疑為批判家鋪設了通往看門人皮普勒及其妻子的道路。

“可是，看門人的處境使他能比較獨立，使他有可能把屋內的秘密變成自由的、沒有利害關係的（虽然是嚴酷而辛辣的）、譏諷的對象。”

<sup>①</sup>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看門人的这种思辨的结构所遇到的第一个大困难，就是在巴黎的很多房屋中至少有一部分住戶的僕人常常就是看門人。

批判的幻想以为看門人的地位比較独立和沒有利害关系，这是否正确，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来判断。巴黎的看門人是房东的代表和密探。在大多数場合下，他們的工錢不是由房东，而是由房客出的。由于自己的收入很不可靠，看門人除了自己的正式職業以外，还常常要弄点外快。在恐怖統治时期，在帝国时期和复辟时期，看門人是秘密警察的主要代理人。例如富瓦將軍就处于自己的看門人的暗中監視之下，寄給將軍的信件都要被他先轉給附近的警察代理人审阅（見弗罗芒“警察内幕”<sup>29</sup>）。因此，«portier»〔“看門人”〕和«épiciier»〔“小店主”〕这两个詞是罵人的話，連«portier»〔“看門人”〕自己也希望別人称他«conciierge»〔“看房人”〕。

欧仁·苏根本就沒有把皮普勒太太描写成“不計利害的”和心地善良的人，他一开始就描写她在兌錢时欺騙魯道夫，她为魯道夫介紹了和他住在一幢房子里的奸猾的放高利貸的女人，她向魯道夫担保他和丽果萊特<sup>①</sup>相識一定会有許多乐事，她譏刺少校給她的錢太少，同她討价还价（她一肚子火地称他为“吝嗇的少校”，并說：“給你料理家务，你每月只給 12 法郎，总有一天你会从这里得到教訓的”），“小气”得連柴米都要管，等等。她自己說出了她“独立”行动的原因是少校每月只給她 12 法郎。

在施里加先生那里，“阿娜斯塔西婭·皮普勒用某种方式开始了反秘密的游击战”。

在欧仁·苏的小說里，阿娜斯塔西婭·皮普勒是巴黎看門女

---

<sup>①</sup>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是一个浪漫女子，又称“斑鳩”。——譯者注

人的典型。欧仁·苏想把“被昂利·蒙尼埃先生描写得非常出色的看門女人加以戏剧化”。而施里加先生認為必需把皮普勒太太“嘴上刻薄”的特点轉化为特殊的本質，然后再把皮普勒太太轉化为这种本質的代表。

施里加先生接着說：“她的丈夫看門人阿尔弗勒德·皮普勒和她是同行，但是运气不佳。”

为了安慰他的失敗，施里加先生把他也轉化为一种諷諭。他是秘密的“客觀”方面的代表，是“作为諷諭的秘密”的代表。

“使他遭到失敗的秘密就是人家对他的諷諭和嘲笑。”

此外，神灵似的辯証法怀着無限的同情把“不幸的老糊塗”变成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强健的人”，分配他担任絕對秘密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很可敬、很幸运又很有决定意义的环节的角色。对皮普勒的胜利就是

“秘密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失敗”。“稍为机灵和勇敢一些的人就不会上嘲笑的圈套。”

### (6)“斑鳩”(丽果萊特)

“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从皮普勒和卡布里昂<sup>①</sup>的例子中，我們已經看到，秘密在它自己的漸次的發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純滑稽戏的地步。現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使个人不再演出这种愚蠢的喜剧。‘斑鳩’在这一步上做得不能再純朴了。”

任何人都可以在两分鐘內看穿这种思辨的滑稽戏的秘密，并

<sup>①</sup>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学会独立地应用它。在这一点上，我們應該稍为指明一下。

**題目：**試說明人是怎样成为动物的主宰的。

**思辨的解答：**假定我們有六种动物，譬如說有獅子、鯊魚、蛇、牛、馬和哈巴狗。我們从这六种动物中抽象出“一般动物”这个范疇。把“一般动物”想像为独立的存在物。把獅子、鯊魚、蛇等等看做“一般动物”的化装或体现。我們既可以把我們的想像的东西，即我們抽象的“动物”变成某种现实的存在物，同样也就可以把现实的动物变成我們抽象的創造物，即我們想像的創造物。我們看見“一般动物”体现为獅子，就会把人撕得粉碎；体现为鯊魚，就会把人吞下去；体现为蛇，就会用毒液伤人；体现为牛，就会用角舐人；体现为馬，就会用蹄子踢人；但是，如果“一般动物”体现为哈巴狗，就只会对人吠叫，并把和人的搏斗完全变成搏斗的外观。从哈巴狗的例子中，我們已經看到，“一般动物”在它自己的漸次的發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表演純滑稽戏的地步。如果小孩或孩子气的人看見哈巴狗就逃跑，那末現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使个人不再演出这种愚蠢的喜剧。某甲在这一步做得不能再純朴了，他向哈巴狗揮动了自已的竹杖。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一般的人”如何通过某甲和哈巴狗而成为“一般动物”的主宰，从而也就成了现实的各种动物的主宰；这个人如何制服了体现为哈巴狗的动物，从而也就制服了作为动物的獅子。

同样，施里加先生的“斑鳩”通过皮普勒和卡布里昂而战胜了現存的世界秩序的秘密。不但如此！“斑鳩”本身就是“秘密”这个范疇的实现。

“她自己还没有意識到自己的崇高的倫理价值，因此她对自己說来，也还是个秘密。”

欧仁·苏通过穆尔弗<sup>①</sup>的口向我们揭露了非思辨的丽果莱特的秘密。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浪漫女子”。在她身上，欧仁·苏描写了巴黎浪漫女子的亲切的、富于人情的性格。可是又由于对资产阶级恭顺，而生性又好夸大，他就一定要在道德上把浪漫女子理想化。他一定要把她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的尖锐的棱角磨掉，也就是消除她对结婚的形式的轻视、她和大学生或工人的纯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和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的太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圈子即整个官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

### (7)“巴黎的秘密”的世界秩序

“这一秘密的世界也就是‘巴黎的秘密’的个人活动得以进行的普遍世界秩序。”

“但是”在“转过话题来谈史诗事件在哲学上的再现”以前，施里加先生还得“把上面所做的零零碎碎的构图合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如果施里加先生说，他想转过话题来谈史诗事件“在哲学上的再现”，那末，我们应该认为这是真正的自白，是他的批判的秘密的暴露。直到现在，他总是使世界秩序“在哲学上再现”。

施里加先生继续他的自白说：

“从我们的叙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前面研究过的一些单个的秘密，并不是与其他秘密无关而本身就有价值的，它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闲谈中的珍

---

<sup>①</sup>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僕人。——译者注

聞。這些秘密的價值就在於它們自身組成許多環節的有機的連貫性，而這些環節的總和就是秘密。”

由於他那坦率的脾氣，施里加先生談得更遠了。他承認“思辨的連貫性”並不是“巴黎的秘密”的真正的連貫性。

“是的，在我們的史詩中，秘密並不表現為這種自知的連貫性（按成本嗎？）<sup>①</sup>，但是我們在這裡碰到的問題並不是邏輯的、任何人都看得見的、自由的批判機體，而是一種神秘的植物的存在。”

我們不去研究施里加先生的完整的圖畫而直接來考察構成“推移”的這一點吧。通過皮普勒的例子，我們已經熟悉了“秘密本身的自嘲”。

“秘密本身用自嘲來判決自己。秘密在自己的發展結束時消滅自己，從而促使任何堅強的人進行獨立的檢查。”

蓋羅爾施坦公爵魯道夫這位“純批判”的偉人的使命就是實行這種檢查和“揭露秘密”。

如果我們在一個時候中看不到施里加先生，然後才來研究魯道夫和他的功績，那就可以預言，而讀者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猜想，或者寧可說是預測，我們將把魯道夫從“神秘的植物的存在”（他在批判的“文學報”中就是這樣的）轉化為“批判的批判的機體”中的“邏輯的、任何人都看得見的、自由的環節”。

---

<sup>①</sup>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

## 第六章

### 絕對的批判的批判或 布魯諾先生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

#### (1) 絕對批判的第一次征討

##### (a) “精神”和“群众”

过去，批判的批判似乎对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多少进行过一番批判的研究。現在我們却發現它是在研究絕對批判的对象，即它自己。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靠批判地貶低、否定和改变某些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来取得自己的相对荣誉。現在它却靠批判地貶低、否定和改变全体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絕對荣誉。同相对的批判对立的有相对的界限。同絕對的批判对立的有絕對的界限、群众的界限，即作为界限的群众。和一定的界限相比，相对的批判本身必然是有限的个体。和普遍的界限相比，和界限本身相比，絕對的批判必然是絕對的个体。正像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和人物匯合在“群众”这一鍋不純的稀粥里一样，似乎还是事物的和人物的批判也一变而为“純批判”了。过去，批判似乎多少是賴哈特、埃德加尔、法赫尔等等这些批判的个人的特性。現在它却是主体，而布魯諾先生則是它的化身。

过去，群众性似乎多少是被批判的事物和人物的特性；現在事物和人物却变成了“群众”，而“群众”則变成了事物和人物。以前

的一切批判的关系現在都在絕對批判的英明和絕對群众的愚蠢的关系中消失了。这个**基本的关系**是过去的批判的行动和战斗的**意圖、趋向、解答**。

和自己的絕對的身分相适应，“純”批判已經在初次上場时就道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箴言”，但是尽管如此，作为絕對的精神，它必将完成某种辯証的过程。它的原初概念，只有在它的天体运行的終点上才会真正被实现（見黑格尔“哲学全書”<sup>30</sup>）。

絕對的批判宣告說：“还在几个月以前群众就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是注定要統治世界的，他們早就在搬着指头計算这一天的到来。”<sup>31</sup>

正是布魯諾·鮑威尔先生自己在“自由的正义事業”（自然是在“他自己的”事業里）、“犹太人問題”<sup>32</sup>等等里面搬着指头計算統治世界的日子的到来。虽然他也曾意識到他不能够指出确切的日子。他竟把他自己的一大堆罪过轉記在群众的罪行录上。

“群众以为自己占有許多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只有……当人們通过对真理的一系列的論証而尾随真理之后的时候，才算整个地占有了真理。”

真理，对鮑威尔先生來說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具自己論証自己的自动机器。人始終都要尾随其后。现实發展的结果，也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証明了的即被意識到了的真理**。因此，絕對的批判就会和鼠目寸光的神学家同声問道：

“如果历史的任务并不是要証明这些最簡單的真理（例如，地球繞日运行），那末还要历史干什么呢？”

从前的目的論者認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給动物充飢，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給人类充飢，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給理論的充飢（即証明）这种消費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則为了証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

思辨的高見：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識**。

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所以**绝对的批判利用了下面这些话**：

“**历史不容許别人嘲弄自己……历史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便人們……研究历史……为什么需要历史呢？……历史向我們提供明确的証明……历史揭开真理**”云云。

如果照**绝对的批判的說法**，到現在为止，历史上只有这样**两三个最简单的、終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末被批判硬加在人类过去全部經驗之上的这种貧乏，首先只是**証明了绝对的批判自己的貧乏**。相反地，从非批判的观点看来，历史的結果就是：**最复杂的真理、一切真理的精华(人們)最終会自己了解自己**。

绝对的批判繼續表明：“**真理，它們对群众說来似乎是这样一目了然，以至它們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是無需証明的，不值得讓历史特地去証明它們的重要性；它們根本就不屬于由历史来解决的任务这个範圍之內。**”

绝对的批判在对群众大發神聖的雷霆之余，又向群众巧言奉承了一番。的确，如果說**真理一目了然**是因为群众觉得它就是这样，如果說**历史是根据群众的意見来决定自己对真理的态度**，那末在这种場合下，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無可爭辯的**，它对于历史就具有**法律效力**，而历史只証明群众**不能一目了然**因而群众需要証明的东西。所以說，群众給历史規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業務”。

绝对的批判談的是“**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憑着自己的批判的天真發明了绝对的“**一开始**”和抽象的不变的“**群众**”。在绝对的批判的心目中，16世紀群众的“**一开始**”和19世紀群众

的“一开始”，就像这两个世紀的群众本身一样，是很少有什么差別的。这种**真实的、一目了然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其特点正在于它“**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絕對的批判对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攻击，也就是对本来就“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攻击。

对絕對的批判以及对上帝的辯証法說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已丧失了它全部的精华、意义和价值。它像一潭死水一样，成了淡而無味的东西。所以，絕對的批判一方面証明一切不言而喻的东西，此外，还証明許多幸而难于理解因而永远不会不言而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宣布凡是要引伸和証明的东西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言而喻，实际的任务不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

既然“真理”和历史一样，是以太的、脱离物質群众的主体，所以，它不是面向經驗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它为了成为“真正被認識了的”真理，不去影响居住在英国的地下室中或是法国庫房的閣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軀体，而是通过他的整个唯心主义的腸道“徐徐伸展”。不錯，絕對的批判向“群众”証明：到現在为止，群众曾按自己的方式即在表面上被那些由历史仁慈地“揭开”的真理所触及；但同时批判又預言道：

**“群众对历史进步的态度将根本改变。”**

这一批判預言的神秘含义对我们說来却是“明如白昼”。

我們知道：“到現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們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喚起了群众的热情。換句話說，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慘的結局，是因为作为它們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須滿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

好像只有滿足思想、符合思想的那种理解才不再是表面的理

解。布魯諾先生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思想和对它的理解之間的关系搬出来，正像他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不成功的历史活动对群众的关系搬出来一样。因此，如果絕对的批判真的譴責什么东西是“表面的”，那就是譴責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絕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見茹尔·法赫尔先生的論英国的迫切問題的文章）。根据过去的、非批判的历史，即根据和絕对批判的意旨相違背的历史，应该更严格地区分下述两点：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喚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認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現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錯覺构成傅立叶所謂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調。資產階級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經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裝飾自己的搖籃的“热情”之花也已經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侖的劍，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只有对那样的群众來說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們的真正的主导原則和革命的主导原則并不是一致的，他們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資產階級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如果說能够代表一切偉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質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內的

特殊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說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喚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絕大多数群众來說，革命的原則并不代表他們的实际利益，不是他們自己的革命原則，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暫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業，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認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經驗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經驗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

批判教导我們說：“精神的真正敌人應該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衛者所想像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

在群众之外的进步的敌人恰恰是独立存在的、被賦予自己的生命的、群众的自卑自賤、自我排斥和自我异化的产物。所以，群众用反对他們的自卑自賤的独立存在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們本身的缺点，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办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教心理一样。但是，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不以外在的方式和这种后果进行斗争。群众絕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識的單純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純粹內在的唯灵論的活动来消灭物質的异化。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編輯的报纸<sup>33</sup>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偉人們之所以看起来偉大，  
只是因为我們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

这种批判的转变给批判的批判和书报检查机关之间的先定的和谐奠定了基础。从批判的观点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相反地，书报检查官正是我自己的、被深谋远虑的警察为我人格化了的机智，也就是我自己的、与我的不机智和非批判性进行斗争的那种机智。从外表看来，在卑劣的感性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的斗争只不过是与作家内心的自相斗争不同的一种东西。如果我把书报检查官当做真正的、单个的、不同于我的存在物，当做用外部的极不相称的标准来丑化我的精神创造物的警察刽子手，那末，这样的书报检查官正是群众想像的结果，是非批判的幻想。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提纲”<sup>34</sup>曾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那末罪过并不在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官方的野蛮，而在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不文明。没有被任何群众和物质所沾污的“纯”批判认为书报检查官也是脱离一切群众的现实的、纯“以太的”形象。

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它在发挥自己的这种思想时说道：

“现在精神已经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萎靡不振中去寻找。”

绝对批判的出发点是“精神”的绝对权限的信条。其次，它的

出發点是精神存在于世界以外即精神存在于群众以外的信条，最后，它同时把“精神”、“进步”这个方面和“群众”这个方面变成凝固不动的本質，即变成概念，然后又把双方当做一种永久不变的極端相互对立起来。絕对的批判并不想去研究“精神”本身，并不想去研究精神自己的唯灵論的本性和它的輕率的奢望是否就是“空話”、“自我欺騙”、“萎靡不振”的根源。相反地，精神是絕对的，然而不幸的是，它同时不断地变为精神的空虛，因为它总是失算。所以，它必需有一个对它施以奸計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群众。

講到“进步”，情形也是这样。与“进步”的奢望相反，經常可以發現退步和循环的情况。絕对的批判决沒有想到“进步”这个范畴是沒有任何內容的、抽象的，可是它竟如此深謀远慮，以致为了能够抬出进步的“个人的对头”即群众來說明退步而承認“进步”是絕对的。既然“群众”不外是“精神”即进步、“批判”的“对立物”，所以也只能用他們的这一想像的对立物来給他們下定义。如果把这一对立物撇开不談，那末，关于群众的意义和存在，批判所能說的只不过是某种極不明确的、因而也是荒誕無稽的东西：

“群众这个‘詞’的意思也包含所謂有教养的人士。”

对批判的定义來說，一个“也”或一个“所謂”就已經足够了。这样一来，“群众”也就不同于实际的群众了，它只是为了“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發：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順利的出色的行动显然都沒有出色的結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現在为止都是損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因此，他們宣称“进步”（見傅立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抽象詞句；他們猜到



了(見歐文及其他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因此,他們对現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無情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發展的損害的广大群众运动。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識的渴望、他們的道德力量和他們对自己發展的不倦的要求。

“絕对的批判”能够在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这些事实面前看出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不断破灭,同时为了这点还沮丧地寻找一个“精神”的对头(它在“群众”中找到了这个对头),請看,絕对的批判具有多么非凡的聪明呵!所有这些偉大的批判的發現到底还是同义反复。照批判的意見,精神到現在为止总是受到限制,碰到障碍,換句話說,它总是有一个对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对头。誰是精神的对头呢?精神的空虛。批判本来把群众規定为只是精神的“对立物”、精神的空虛和精神空虛的更詳細的定义,即“思想懶惰”、“表面性”、“自滿”。絕对的批判不去研究精神的空虛、思想懶惰、表面性和自滿的来源,而在这些品質中寻出精神、进步的对立物,并从道德上去加以侮辱。——这种做法比起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来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呵!如果这些品質被說成群众的,即与这些品質还有所不同的某种主体的品質,那末这种区分只不过是“批判的”区分的外观而已。仅仅就外观來說,絕对的批判除精神的空虛、思想懶惰等抽象的品質外,还有一个特定的具体主体,因为批判心目中的“群众”,無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質,是这些品質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質的虛幻的人格化。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層隱蔽的含义。这个含义在以后的論述过程中将完全揭露出来,这里我們只大略地談一談。

布魯諾先生所發現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觀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觀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質、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現。在历史的範圍內，在人类本身的範圍內，这种对立表現为：代表積極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虛的群众、代表物質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黑格尔历史觀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絕對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發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經驗的、明显的历史中的發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說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

同黑格尔的这种学說同时發展的，在法国有空論派<sup>35</sup>的学說，他們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統治。这是十分徹底的做法。如果說现实的人类的活动也就是一群单个的人的活动，那末抽象的普遍性即理性、精神反而應該仅仅在少数单个的人身上得到抽象的表現。每一个单个的人是否願意去冒充这样的“精神”代表者，这要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像力。

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絕對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現。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創造历史的絕對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顧既往以求意識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顧既往的意識，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絕對精神無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 post festum〔事后〕才上場的。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 *post festum* [事后] 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像中。布鲁诺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

接着布鲁诺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说黑格尔精神只是 *post festum* [事后] 在幻想中创造历史，那末，鲍威尔先生则和他以外的其他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識地在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之后却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業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不仅如此！批判、已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对待群众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唯一的历史态度**。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所有的对立面都消溶在这一批判的对立面中了。

既然批判的批判只有在同群众，即同**愚蠢的对立中**才能具体

地存在，所以它就不得不經常為自己制造这种对立面，法赫尔、埃德加尔和施里加三位先生就足以証明批判在它的专长方面，也就是在它对人和物进行群众的愚化方面所特有的高深造詣。

現在，我們跟着絕对的批判去看看它对群众的征討。

### (b) 犹太人問題，第一号。問題的提法

同群众相对立的“精神”为了立刻显示自己的批判性，就把他自己的膚淺的著作即布魯諾·鮑威尔的“犹太人問題”看做絕对的东西，而把反对这一著作的人看做罪人。它在对这一著作受到的攻击所作的**第一号答辯**<sup>36</sup>中，不但絲毫沒有表示这一著作有什么缺点，反而肯定它發現了犹太人問題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我們将会看到，它在以后的几次答辯中就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策”。

“我的著作所受到的待遇开始表明：正是那些过去和現在一直都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應該起来反对精神。我現在对这一著作所进行的辯护，进一步証明了那些由于自己拥护解放和‘人权’信条而自以为是不知有多么偉大的群众的辯护人，在思想方面是何等貧乏。”

絕对批判的著作的問世必然要激起“群众”来开始表明自己对精神的敌对态度，因为“群众”的**存在**这件事本来是由“群众”和絕对批判之間的对立的实际存在来决定和証实的。

某些自由主义的和唯理論的犹太人对布魯諾先生的“犹太人問題”的攻击，較之自由主义者对哲学和唯理論者对施特劳斯的群众的攻击，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批判的用意。上面所引証的評語究竟新穎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黑格尔的下面这段話来判断：

“这里應該指出那种肮脏的良心的特殊形式，它的表現就是这些淺薄的

先生們(自由主義者)①引以自傲的辯才；而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在它最缺少精神內容的地方，它最經常地談論精神；在它表現出最無生氣的地方，它却總是嘮叨着生命這個詞”等等。<sup>37</sup>

至于說到“人權”，那我們已經向布魯諾先生證明過（“德法年鑒”上的“論猶太人問題”<sup>38</sup>）：不是群眾的辯護人，而是“他自己”不了解這些“權利”的實質，並且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它們。同布魯諾關於人權不是“天賦的”這種發現相比較（這種發現近四十多年來在英國有過無數次），傅立葉關於捕魚、打獵等等是天賦人權的論斷，就應該說是天才的論斷了。

我們只從布魯諾先生和菲力浦遜、希爾施等人的爭論中舉出幾個例子。連這些可憐的對手也不是絕對的批判所能征服得了的。不管絕對的批判怎麼說，菲力浦遜先生用以下的話來責備它時，決沒有說出什麼不盡情理的話：

“鮑威爾在思索的是一個特殊類型的國家……國家的哲學理想。”

布魯諾先生把國家和人類、人權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混為一談，就必然會思索或者至少是想像一個特殊類型的國家即國家的哲學理想。

“我曾經證明：基督教國家……不可能使其他某一宗教的信徒和基督教階層在權利上完全平等，因為這種國家的主要原則是一種特定的宗教。假若朗誦者（希爾施先生）②不是極其令人厭倦地闡述自己的思想，而是來推翻我的上述論證，那就會更好一些。”

如果朗誦者希爾施像“德法年鑒”所做的那樣，真的推翻了布魯諾先生的論證，並且表明了等級的和排他的基督教的國家不僅

---

① ②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是不完备的国家，而且也是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那末，布魯諾先生也会像回答“德法年鉴”上对他的駁斥那样回答道：

“在这件事情上的責难是毫無意义的。”

布魯諾先生說：

“犹太人对历史彈簧的压力，引起了反压力。”

和他的这一論断相反，希尔施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

“所以說，犹太人对于历史的形成必然起了某种作用，而如果鮑威尔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的话，那末，另一方面，他就沒有权利断言犹太人对于現代的形成是毫無貢獻的。”

布魯諾先生回答道：

“眼中的刺也起了某种作用。是否由此可以說它对我的視觉發展作了什么貢獻呢？”

刺，就像犹太精神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从我生下来那天起就在我的眼中，現在仍然在我的眼中，并且跟眼睛一同成长和發展。这样的刺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刺，而是和我的眼睛分不开的一根罕有的刺，它必然会对我的視觉的高度非凡的發展有所貢獻。所以，批判的“刺”并沒有刺痛正在朗誦的“希尔施”<sup>⊖</sup>。此外，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評文章已經向布魯諾先生表明犹太精神对“現代的形成”的意义了。

萊茵省議會的一位議員說道：“犹太人显得古里古怪是由于他們犹太人的習慣，而不是由于我們的所謂基督教的習慣。”这个意見使絕對批判的神学家的心灵深深地受到了凌辱，以至它現在还

---

⊖ 双关語：德語中 Hirsch（希尔施）是姓，但同时有“鹿”的意思。——編者注

沒有忘記“命令这个議員規規矩矩地使用这样的論据”。

另一位議員断定說，“犹太人的市民平权，只有在犹太本身已經不再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布魯諾先生就針對这种說法指出：

“这是对的，而且正是在注意到我那本小册子中提到的另一批判見解的时候是对的。”这个見解就是：基督教也应当不再存在。

由此可見，絕对的批判在对“犹太人問題”这本小册子受到的攻击所做的第一号答辯中，仍旧把取消宗教、把無神論看做市民的平等的必要条件。所以，絕对的批判在考察犹太人問題的最初阶段上还没有进一步領悟到国家的本質和他的“著作”中的“失策”。

当有人証明絕对的批判所杜撰的“最新的”科学發現只不过是重复早已是人所共知的观点的时候，它就感到很恼怒。有一位萊茵省議員指出：

“还没有人想断定說，法国和比利时在組織它們的政治机构时显示出它們对原則的認識是特別明确的。”

絕对的批判滿可以反駁說，这种說法就是把現在已变得陈腐了的关于法国的政治原則不能令人滿意的見解拿来冒充傳統的見解，从而把現在的东西搬到过去。这是就事論事的反駁，然而絕对的批判并不能从这种反駁中得到好处。相反地，絕对的批判必然会把过时的見解說成目前的主导見解，而把目前的主导見解說成批判的秘密，即絕对的批判还得通过自己的研究才能使群众了然的那种秘密。所以它才不得不說道：

“大多数人(也就是群众)①都已肯定了这一点(即过时的偏見)②；但是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对历史的認眞的研究証明，即使是在法国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之后，也还要做許多事情才能达到認識原則。”

可見，对历史的認真研究本身並沒有“达到”認識原則。它靠自己的認真态度仅仅証明了“还要做許多事情才能达到”。真是偉大的成就！尤其显得偉大的是这个成就在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后。但是，在認識現存的社会制度方面，布魯諾先生已經以自己的下述意見做了許多事情：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就是非規定性。”

如果黑格尔說，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無”等等，那末，絕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現时代的特性归結为“非規定性”这个邏輯范疇，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規定性”同“有”和“無”一样列入思辨邏輯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質”的一章。

現在，我們如果不發表一个总的意見，就不能丢开“犹太人問題”第一号。

絕对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就是給当代的一切問題以正确的提法。它恰好沒有回答現实的問題，却提出一些毫不相干的問題。既然它可以制造一切，那末它必然也会預先制造出“当代的問題”，就是說，它必然会把這些問題制造成自己的、批判的批判的問題。如果談到拿破侖法典，那它就会証明：这实际上是談“摩西五經”<sup>①</sup>。它对“当代的問題”的提法就是对這些問題的批判的曲解和歪曲。例如，它这样歪曲“犹太人問題”，以致它自己竟用不着去研究作为這一問題內容的政治解放，反而可以滿足于批判犹太

<sup>①</sup> “摩西五經”——指旧約全書前五篇：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数記、申命記。——譯者注



宗教和描写基督教德意志国家。

和绝对批判的其他一切新颖的表现一样，这种方法也是思辨戏法的重演。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思辨哲学歪曲我的问题，并且像教义问答那样，借我的嘴来说它自己的问题，它当然也能够像教义问答那样，对我的每一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

### (c) 辛利克斯，第一号。关于政治、 社会主义和哲学的神秘暗示

“政治的！”这个词在辛利克斯教授讲义里的出现，简直使得绝对的批判大发雷霆来了<sup>39</sup>。

“凡是注视现代的社会发展和熟悉历史的人，他也必定知道目前发生的政治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政治的：这些运动本来(本来！……紧接着就是彻底的英明)①具有社会的(!)意义，大家知道(!)，在这类(!)意义面前，所有的政治利益都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

大家知道(!)，在批判的“文学报”问世以前几个月，就出现了布鲁诺先生的空想的政治性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sup>40</sup>。

如果，政治运动具有社会的意义，那末，政治利益怎么会在自己的社会意义面前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呢？

“辛利克斯先生无论是在自己家里，或是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什么见闻广博的人物……他什么东西都不可能理解，因为……因为，他对于近四年来开始并从事自己的决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工作的批判，一无(!)所知。”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在群众看来，批判从事了“决非政治的”、而是“純粹神学的”工作，它不仅在这四年当中，而是在它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那天就使用了“社会的”这个詞，而現在还是满足于这个詞！

社会主义的著作曾在德国傳播这样的观点，說人的一切志向和事業都毫無例外地具有社会的意义；自从那时以来，布魯諾先生也可以把自己的神学工作叫做社会的工作了。在辛利克斯的講义發表以前出現的布·鮑威尔的文章，凡是做出实际結論的，也統統做出了政治的結論，尽管如此，批判却要求辛利克斯教授从熟讀鮑威尔的著作中来領会社会主义，这算是什么批判的要求！非批判地說，辛利克斯教授無論如何不可能用布魯諾先生的尚未發表的文章来补充他已發表过的文章。从批判的观点看来，群众对于絕對批判的“政治的”和一切群众的“运动”，当然應該从未来的角度，从絕對进步的意义上来加以解釋。但是，为了使辛利克斯先生在認識了“文学报”之后永远不再忘却“社会的”这个詞，不再否認批判的“社会的”性質，批判在全世界面前第三次詛咒“政治的”这个詞，并且第三次郑重地重复“社会的”这个詞：

“如果注意到現代历史的真正的趋向，就不会再提政治的意义了，然而……然而社会的意义”云云。

辛利克斯教授既然做了絕對批判先前那种“政治的”运动的替罪羊，所以，他現在也是絕對批判在“文学报”問世之前有意运用“黑格尔派的”运动和說法以及后来又在該报中無意地运用这些东西的替罪羊。

有一次，批判硬給辛利克斯安上了一个“真正的黑格尔派”的头銜，又有两次則給他安上了一个“黑格尔派哲学家”的头銜。不仅如此，布魯諾先生甚至“希望”，“那些通过黑格尔学派的所有著

作(特别是通过布魯諾本人的著作)<sup>①</sup>令人厭倦地轉了这么一圈的陈旧說法”,既已在辛利克斯教授的演講里發覺了“疲憊”不堪,下一步很快就会到达它們的終点。布魯諾先生指望借助辛利克斯教授的“疲憊”使黑格尔哲学遭到毀灭,从而使自己摆脱这种哲学的束縛。

这样一来,絕对的批判在第一次征討中就推翻了它自己长期以来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上帝——“政治”和“哲学”,把它們說成是辛利克斯教授的偶像。

光荣的第一次征討!

## (2) 絕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討

### (a) 辛利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費尔巴哈”。对哲学的譴責

第一次征討結束以后,絕对的批判可能認為“哲学”已被消灭,并且直截了当地把它看做“群众”的同盟者。

“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实现群众的衷心願望。”这就是說,“群众要求简单的概念以便同事物本身不發生任何关系,要求千篇一律的做法以便預先解决一切問題,要求空話以使用它們消灭批判。”

而“哲学”正在滿足“群众”的这个欲望!

被自己的胜利事迹弄得醉熏熏的絕对批判以女巫般的狂暴痛斥哲学。費尔巴哈的“未来哲学”<sup>41</sup>是一个隐藏的汽鍋<sup>⊖</sup>,它的蒸气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 双关語:《Feuerbach》——“火流”,《Feuerkessel》——“汽鍋”(直譯:“火鍋”)。

——編者注

把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絕對批判的魁首熏得兴奋若狂。批判在三月里讀完了費尔巴哈的这篇文章。这次閱讀的成績和認真閱讀的标志,就是写成了駁斥辛利克斯教授的第二号論文。

一貫作为黑格尔思想方式俘虏的絕對批判,正在这里猛烈地冲击它的監獄的铁檻和圍牆。“简单的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思維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嫌弃。馬上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無穷尽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体系的秘密”宣告“已被揭露”。

然而,到底是誰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費尔巴哈。是誰摧毀了概念的辯証法即仅仅为哲学家們所熟悉的諸神的战争呢?是費尔巴哈。是誰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無限的自我意識”在內的破烂貨呢?是費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費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毀了現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疇:“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無穷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認識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質、基础之后,唯有“批判”才能够發明出新的范疇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疇,变成一系列范疇的原則。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唯一的生路,但这条路仍然处在惊惶不安和遭受迫害的神学的非人性的控制之下。历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無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沒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創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

的活動而已。在費爾巴哈的一切天才發現之後，絕對的批判還竟敢用新的形式來為我們恢復一切陳腐的廢物。而且正是這時它把這種陳腐的廢物痛罵為“群眾的”廢物，——它沒有什麼權利這樣做，因為它對摧毀哲學並沒有出過一點力。僅僅這一個事實就足以揭露批判的“秘密”，就足以公正地評定促使它對辛利克斯教授（他的“疲憊”已給它幫了很大的忙）說出下面這些話是幼稚的：

“凡是沒有完成任何發展過程的東西都受到了損失，因此，即使它們想要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假若扯得遠一些，那它們就是企圖改變新的原則……不！新東西不可能被曲解為空談，從新東西那里剽竊個別的思想方法是可能的。”

絕對的批判在辛利克斯教授面前夸耀自己揭露了“系科學科的秘密”。難道批判沒有揭露哲學、法學、政治學、醫學、政治經濟學等等的“秘密”嗎？絕對不是。批判曾指出（請注意！），它在“自由的正義事業”中曾指出作為生財之道的科學和自由的科學之間、教學自由和系科章程之間是互相矛盾的。

儘管“絕對的批判”並沒有像它對待別人那樣，硬要費爾巴哈說出這種胡說八道的話來（例如它從這位哲學家那里剽竊來的、它所不理解而又被它歪曲了的那些原理），這當然是好的，不過，如果它誠實，它就該供認出它所謂的關於“哲學秘密”的揭明是來自何處。“絕對批判”的神學觀點的最大特點就在於，現在德國庸人們都開始理解費爾巴哈和領會他的結論，可是批判却不能正確地理解和成功地運用費爾巴哈的任何一個原理。

批判的第一次征討的功績跟它在同一條道路上取得的新成就相比，真是黯然失色。現在它把“群眾”和“精神”之間的鬥爭“規定”為過去全部歷史的“目的”；它宣稱“群眾”是“卑賤”的“純粹的

無”，直截了当地把群众称为“物質”，并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和“物質”对立起来。这样一来，难道絕對的批判不就是真正基督教德意志的批判嗎？唯灵論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經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費尔巴哈永远克服，但在这以后“批判”又重新以最可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促使“基督教德意志的精神”获得胜利。

最后，批判現在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这一点应当看做是批判在第一次征討中还隱蔽着的秘密的进一步發展。以后它会更进一步，把自身和“一般批判”等同起来，把自己說成是“精神”、是絕對者、是無限的，相反地把群众說成是有限的、粗野的、卤莽的、僵死的和無机的，因为“批判”就是这样理解物質的。

单就人类和鮑威尔先生的关系来看，历史的財富是多么無穷尽呵！

### (b) 犹太人問題，第二号。关于社会主义、 法学和政治学(民族性)的批判的發現

有人在向群众的、物質的犹太人宣揚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論自由和这样一种唯灵論自由的教义，——这种自由認为自己即使在束縛中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覺得自己很幸福，即使这种幸福仅仅存在于“观念中”，而且这种自由只会受到一切群众存在的排挤。

“犹太人現在在理論領域內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們就真正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他們有什么程度的自由願望，他們就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sup>42</sup>

这个論点使我們有可能立即去測量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絕對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批判的深渊。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認純理論領域內的解放；認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質的条件。“群众”認為，甚至为了爭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論”研究的時間和經費，也必須进行物質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聖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呵！

我們暫且放下純精神的社会主义来看看政治学。

里謝尔先生和布·鮑威尔相反，他指出他的国家(即批判的国家)必須驅逐“犹太人”和“基督徒”。里謝尔先生說得完全正确。既然鮑威尔先生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既然国家对于敌对分子(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犹太人問題”中已經被評定为变节分子)的反抗只有采取暴力驅除这些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办法(比如，恐怖統治企圖用砍掉包买主脑袋的办法来消除收購谷物的行为)，所以鮑威尔先生在他的“批判的国家”中也就必然把犹太人和基督徒送上絞架了。既然鮑威尔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所以，为了徹底起見，他也就必然把解放的政治手段同解放的人类手段混淆起来。但只要有人向絕對的批判指出其結論的真實含义，它也就会像謝林曾經回答那些用真實含义来代替謝林的空談的反对者那样，来回答他：

“批判的反对者之所以成为批判的反对者，因为他們不仅用自己的教条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批判，甚至認為批判也是教条主义的；換句話說，他們拚命反对批判的原因，就是因为批判否認他們的教条主义的划分、說明和托詞。”

对待絕對的批判和謝林先生的教条主义态度实际上是在人們把特定的真實含义、思想和观点加在絕對批判的身上时产生的。然而为了迁就并且向里謝尔先生証明自己的博爱之忱，“批判”打

算使用教条主义的划分、說明、特别是“托詞”。

比如我們讀到这样一段話：

“如果我在那本書里(在“犹太人問題”中)①希望越出或者有权越出批判的範圍,我应当(!)談的(!)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因为‘社会’并不排除任何人,只有那些不願意参与社会發展的人才自己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在这里,絕对的批判在它应当做的事(如果它沒有做出相反的事的話)和它实际做的事之間进行了教条主义的划分。它用禁止它越出“批判的範圍”的願望和权限的“教条主义的托詞”来解釋自己的小册子“犹太人問題”的局限性。怎么?“批判”应当越出“批判”的範圍嗎?絕对的批判由于教条主义的必然性采取了这条道地的群众的托詞,一方面肯定自己对犹太人問題的理解的絕对性,肯定这种理解的“批判性”;另一方面也承認有更广泛的理解的可能性。

批判的“不希望”和“不應該”的秘密最終会在批判的教条中找到解答。根据这种教条,“批判”的局限性的一切表現只不过是适合群众理解力的必然形式而已。

批判不希望! 批判不應該越出自己對犹太人問題的狹隘理解的範圍! 但是,如果它希望或者應該的話,那它会做出些什么呢? 它会做出教条主义的說明。它会不談“国家”而談“社会”,所以它絕不会去研究犹太人对待現代市民社会的真實态度! 它教条主义地解釋与“国家”不同的“社会”,意思是說它从国家中排除国家的时候,那些不願参与社会發展的人反而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在从自身中排除的問題上,社会的做法跟国家的做法實質上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社会做得比較斯文一些。譬如，社会不是把你一脚踢出門外，而是創造一些条件，使你在这个社会里难以生存下去，結果，你会心甘情愿地离开它。

实际上，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国家并不排除那些遵命守法和不阻碍它的發展的人。完备的国家甚至对許多事情都熟視無睹，它把真正的对立說成是非政治的、对它毫不妨碍的对立。此外，絕对的批判本身發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仅仅是由于犹太人排除国家，也就是說犹太人自己把自己从国家中排除出去，所以它才排除犹太人。如果这种相互关系在批判的“社会”中表現得更温存、更虛伪、更狡詐，那末这只能表明“批判的”“社会”的莫大虛伪和發育不全。

我們再来看看絕对批判的“教条主义的划分”、“說明”、特别是“托詞”。

例如，里謝尔先生要求批判家“把法的范围以內的东西和法的范围以外的东西区分开来”。

批判家对于法律上的这种蛮橫無理的要求表示憤慨。

他反駁說：“可是直到目前，情感和良心都干涉了法，常常补充它，由于法的教条主义形式（因而不是法的教条主义本質？）<sup>①</sup>所决定的法的性質，就必須常常补充它。”

另一方面，批判家只是忘了法本身非常明确地把自身同“情感和良心”区分开来；他忘了这种划分可以由法的片面本質和教条主义形式來說明，这种划分甚至成了法的主要教条之一；最后，他忘了这种划分一旦实现就构成法的發展的最高阶段，正像宗教从

---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各种世俗內容中摆脱出来就使宗教成了抽象的、絕对的宗教一样。“情感和良心”干涉法这个事实使“批判家”有足够的根据在談法的地方談情感和良心，在談法律教义的地方談神学教义。

絕对批判的“說明和划分”使我們有可能充分地領会它的关于“社会”和“法”的最新“發現”。

“批判准备了世界形式，甚至是第一次开始准备世界形式的观念。这种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讀者，請你提起精神来！）<sup>①</sup>社会的形式，关于这种形式至少（如此少嗎？）<sup>②</sup>可以說，誰对它的建立毫無貢獻，誰在它那里不憑自己的良心和情感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也不可能参与它的历史。”

“批判”所准备的世界形式被确定为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社会的形式。这个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釋。或者这种說法应解釋为世界形式“不是法的，而是社会的”形式；或者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形式”。我們考察一下这两种說法的内容，現在先談第一种解釋。絕对的批判把上述这个不同于“国家”的新“世界形式”說成是“社会”。現在它却把名詞“社会”說成是形容詞“社会的”。如果說辛利克斯先生和他的“政治的”一詞相反，从批判那里三度获得了“社会的”这个詞，那末里謝尔先生則和他的“法的”一詞相反，而获得“社会的社会”这个詞。如果对辛利克斯先生來說，批判的解釋可以归結为这样一个公式：“社会的”+“社会的”+“社会的”=  $3a$ ，那末，絕对的批判在其第二次征討中就是从加法轉到乘法，而里謝尔先生則委身于自我相乘的社会，委身于社会的平方，即社会的社会 =  $a^2$ 。絕对的批判为了做出它的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关于社会的結論，它只得轉到分数上去，开始求社会的平方根，如此等等。

現在我們来看看第二种解釋：“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世界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双重的世界形式無非是現存的世界形式，即現今社会的世界形式。“批判”在其世界前的思維中还只是为着現存世界形式的未来存在准备条件，这个事实是偉大的令人崇敬的批判奇迹。但是不管“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社会”怎样，批判除了自己的«fabula docet»〔“寓言的教导”〕，除了自己的訓誡以外，关于这种社会暂时还說不出什么名堂来。誰在这个社会里不憑自己的情感和良心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自己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归根到底，除了“純情感”和“純良心”即“精神”、“批判”及其心腹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下去。群众将要被这种或那种方法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其結果，“群众的社会”将停留在“社会的社会”之外。

总而言之，这个社会就是批判的天堂，而真正的世界却被作为非批判的地獄从那里驅逐出来。絕对的批判在其純思維中正在准备这个“群众”和“精神”对立的被改头換面了的世界形式。

就民族命运問題向里謝尔先生所作的解釋如同就“社会”問題所作的解釋一样，其特点是批判的深刻性。

犹太人渴望解放和基督教国家渴望“把犹太人列入自己的政府方案的一定部位里”（好像犹太人很久已不被列入基督教政府方案的一定部位里似的！）这件事，使得絕对的批判有理由預言各民族的衰亡。我們看到，絕对的批判是通过多么迂迴曲折的道路，也就是通过曲折的神学道路才走向現代的历史运动的。我們可以从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神諭般的箴言来判断通过这条道路所获得的

成果的重要性：

“各民族的未來……非常……黑暗！”

看在批判的面上，就姑且讓各民族的未來隨便怎麼黑暗吧！然而，有一點而且最主要的一點是清楚的：未來是由批判決定的。

批判大聲疾呼地說：“命運可以任意決定一切；我們現在知道，命運是由我們決定的。”

正如上帝把自己的意志賦予自己的創造物——人一樣，批判也把自己的意志賦予自己的創造物——命運。所以創造命運的批判也像上帝一樣神通廣大。甚至它所“遭遇到的”外來“反抗”也是由它決定的。“批判創造了自己的對頭”。所以，“群眾對它的憤慨”只是“威脅着”“群眾”自己的“安全”。

如果批判像上帝一樣神通廣大，那末它也像上帝一樣無所不知，並能把它的神通廣大的本領同個人的自由、意志和天性結合起來：

“如果批判不能使每個人跳出批判的掌握而成為他想成為的那個樣子，而且也不能預先向每個人嚴格指出適合其本性和意志的那種觀點，它就不能成為創造時代的力量。”

萊布尼茨本人也沒有能夠在上帝的神通廣大同人的自由和天性之間確定先定的諧和。

顯然，如果“批判”同心理學（它把成為某種東西的意志和成為某種東西的能力區分開來）發生了矛盾，那末就必須注意到，它是有確鑿的根據來宣告這種“區分”是“教條主義的”。

我們要重整旗鼓進行第三次征討！我們再一次想起批判“創造了自己的對頭”！但是，如果批判不說空話，它怎麼能創造自己

的对头——“空話”呢？

### (3) 絕對批判的第三次征討

#### (a) 絕對批判的自我辯護。它的“政治的”过去

絕對的批判对“群众”的第三次征討是从下面的問題开始的：

“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sup>43</sup>

我們在同一期“文学报”上領教过了：

“批判除了認識事物之外，別無他圖。”

这样說来，一切事物都該是批判的对象了，而某种特殊的专供批判的对象的問題也就沒有意义了。如果注意到一切事物都“化为”批判的事物，而批判的事物又“化为”群众，即絕對批判的“对象”，那末这个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布魯諾先生首先叙述了他对“群众”的無限同情。他把“他和人群之間的鴻沟”作为“不断研究”的对象。他很想“認識这个鴻沟对未来的意义”（这一点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認識“一切”事物），也很想“消除它”。可見，实际上他已經了解了这个鴻沟的意义。鴻沟的意义就在于被他消除。

因为，对任何一个人來說，最近的存在物就是他自己，所以“批判”首先就得消除它本身的群众性，正像基督教禁欲者在开始精神对肉体的征討之前首先要抑制自己的肉欲一样。絕對批判的“肉体”是它的真正群众的（包括 20 卷至 30 卷的）著作生涯的过去。因此，鮑威尔先生必須使“批判”的著作生涯的历史（这和鮑威尔本身的著作生涯的历史一模一样）摆脱其群众的外观，然后再把这种

历史加以潤色和解釋并通过这种辯护的評注来“巩固批判以前的著作”。

他一开始就說明群众在“德国年鉴”<sup>44</sup>和“萊茵报”<sup>45</sup>封閉以前把鮑威尔先生看成是自己人的这种錯誤有两重原因。第一、群众不認為著作活动是“純粹的著作活动”，因而是錯誤的。同时，群众認為著作活动是“唯一的”或“純粹的”著作活动，因而犯了相反的錯誤。毫無疑問，不管怎样“群众”都是不对的，因为它同时犯了两个互相排斥的錯誤。

絕对的批判趁此机会向那些嘲笑“德意志民族”是“下流作家”的人大声喝道：

“請給我說一說看，哪一个历史时代不是由威严的‘笔’預先規定了的，不是应当由笔来解决其存在問題的！”

布魯諾先生以批判的天真把“笔”跟書写的主体，并把作为“抽象的書写者”的書写的主体跟从事过書写的活生生的历史的人分了家。这样，他就有可能被“笔”的神奇力量弄得如醉如狂。他同样可以要求人家給他指出，那种不是由“家禽”和“养鵝女”預先規定了的历史运动。

后来，我們从这位布魯諾先生那里得知，迄今还没有一个，根本没有一个历史时代是被認識了的。話又說回来，迄今未能規定“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笔”，又如何能够預先規定所有的时代呢？

尽管如此，布魯諾先生事实上还是証明了自己的見解是正确的，因为他以辯护的“笔迹”“預先規定”了他自己的“过去”。

批判在各个方面不仅帶有世界和某一时代的普遍的局限性，而且还帶有完全特殊的个人的局限性，但是，它有史以来就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自命为“絕对的、完善的、純粹的”批判，很明显，这种

批判只是一味迁就群众的偏見和理解力，正像神啓示世人时所常做的那样。

絕對的批判断言：“这必然会导致理論和它的臆想的同盟者之間的分裂。”

但是，因为批判——这里可以把它改称为理論——不能变成任何东西，相反地，它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因为它不是在世界内部，而是在世界之外發展的，并以它那始終如一的神的意識預先規定了一切事物，所以，在它看来，跟它以前的同盟者分裂是一个“新的轉变”，这种轉变不是內在的，不是为了它自己，而只是为了摆摆样子，只是为了別人。

“可是說老實話，这种轉变也并不是新的。理論經常进行自我批判(大家知道，为了迫使理論进行自我批判而痛斥这种理論該是多么必要)①，它从来不奉承群众(但更奉承自己)②，它始終謹慎从事，以免陷入敌人的前提。”

“基督教神学家必須謹慎从事”(布魯諾·鮑威尔“基督教真相”<sup>46</sup>第99頁)。那末为什么“謹慎从事的”批判还是陷入了敌人的前提呢？它当时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真正的”見解清清楚楚地談出来呢？它为什么不直說出来呢？它为什么不打消关于它跟群众和睦相处的幻想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法老③在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还給他時間亚伯拉罕。——你为什么告訴我她是你的妹妹呢④？”(布魯諾·鮑威尔“基督教真相”第100頁)

“打倒理性和語言！——神学家說：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明明是在撒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③ 古埃及的国王，聖經中的人物。——譯者注

④ 參看旧約全書創世記第20章。——譯者注

謊。啓示會招致致命的侮辱。”(同前)

打倒理性和語言！——批判家說：如果鮑威爾先生不只是擺擺樣子，而是真正地跟群眾打成一片，那末絕對的批判在其啓示中就不再是絕對的，因而它會招致致命的侮辱。

絕對的批判繼續說道：“它的努力(即絕對批判的努力)①簡直不被人重視，況且，批判還有個時期會不得不誠懇地考慮敵人的前提并暫時認真地接受它們，簡言之，批判當時還沒有能力完全打破群眾的這種信念：它跟批判有着共同的事業和利益。”

“批判”的努力簡直不被人重視；可見，罪過是在群眾身上。而另一方面，批判承認它的努力不可能被人重視，因為它自己還沒有“能力”使這種努力被人重視。這樣，罪過似乎是在批判身上。

絕非如此！批判曾“不得不(有一種壓力加在它頭上)②誠懇地考慮敵人的前提并暫時認真地接受它們”。了不起的誠懇，真正神學的誠懇！但是這種誠懇實際上對待事物并不認真，而只是“暫時認真地接受它”；它始終，就是說，時時刻刻謹慎從事，以免陷入敵人的前提，但是它却“暫時”“誠懇地”考慮這些前提。“誠懇”一詞在上面所引証的最後一句話里太言過其實了。批判“誠懇地考慮了群眾的前提”，但這時“它還沒有能力完全”打消關於批判的事業和群眾的事業的一致性的幻想。它還沒有具備這種能力，但是却已經有了希望和念頭。它還不能在外部分裂，但是這種分裂卻已經在它的內部，即在它的靈魂中形成了，而且是在它誠懇地同情群眾的時候形成了！

雖然批判完全和群眾的偏見糾纏在一起，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和这些偏見糾纏在一起；老实說，它反而摆脱了自己的局限性，而只不过是“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向群众証明这一点。因此“批判”的整个局限性純粹是一种假象，——如果没有群众的局限性，这种假象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可見，罪过又是在群众身上。

但是，既然这种假象是由于批判“没有能力”和“没有力量”吐露真情造成的，那就說明批判本身还是不完美的。它用自己所固有的那种与其說是誠懇不如說是辯护的方式承認了这一点。

“尽管它(批判)①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致命的批判，但是它还可以被認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特殊形式，——或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極端表現；尽管它的真实而具有决定性的結論已經超出了政治範圍，但是它还必然在別人的心目中造成一种錯覺，似乎它在从事政治，而这种不完美的錯覺使它有可能获得上述絕大部分的朋友。”

批判依靠它似乎是在从事政治这一不完美的錯覺而获得了朋友。假如这种錯覺是完美的，那末批判就必然会失掉自己的政治朋友。它雄辯地而又胆怯地力圖洗清自己的一切罪恶，它抱怨錯覺是不完美的錯覺，而不是完美的錯覺。“批判”这样用一种錯覺代替另一种錯覺，就可以对下面的一点感到自慰了：如果它掌握了希望从事政治的“完美的錯覺”，那末它就反而不能掌握随时随地消灭政治的“不完美的錯覺”。

对“不完美的錯覺”不太滿足的絕对批判再一次問自己：

“批判当时被卷入‘群众的政治的’利害关系之中，它……甚至(!)……必須(!)……从事政治(!)，这是怎么回事呢？”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在神学家鮑威尔看来，**批判**必須永世地研究思辨神学，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即人格化了的“批判”原本就是一个 *ex professo* [职业的] 神学家。至于为什么要从事政治？这就必須用完全特殊的、政治的、个人的情况来加以解釋。

为什么“批判”甚至必須从事政治呢？“它被控告了——这就是問題的答案。”至少“鮑威尔政治”的“秘密”的底細就在这里，至少那种在布魯諾·鮑威尔的“自由的正义事業和我自己的事業”中用連接詞“和”把群众的“自由事業”跟他“自己的事業”連在一起的錯覺不能被說成是非政治的。但是，如果批判所从事的不是服务于政治的“自己的事業”，而是服务于自己的事業的政治，那就应当承認，不是政治欺騙了批判，而相反地，是批判欺騙了政治。

这样，布魯諾·鮑威尔就應該被趕下神学講台了，因为它被控告了。“批判”曾不得不从事政治，就是說，它必須进行“自己的”訴訟，即布魯諾·鮑威尔的訴訟。不是鮑威尔先生进行了批判的訴訟，而是“批判”进行了鮑威尔先生的訴訟。“批判”为什么必須要进行自己的訴訟呢？

“替自己辯护嗎？”或許就是这样。但是“批判”远不限于这种个人的、世俗的动机。就算是这样。但不仅是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揭發它的敌人的矛盾”，而且——批判可以补充說——还为了把它駁斥形形色色的神学家的旧文章（如像它跟普兰克的长篇的对罵，神学家“鮑威尔”与神学家“施特劳斯”的兄弟之爭）編成一本書。

絕对的批判由于承認了它的“政治”的真实利益而感到心安理得，一回想到它的“訴訟”，就又重新咀嚼起它曾在“自由的正义事業”中以种种方式反复咀嚼过的老黑格尔的东西：“与新事物相对

立的旧事物实际上已經不是旧事物了”（見“現象学”中的啓蒙与信仰的斗争；見全部“現象学”）。批判的批判是反芻动物。批判經常把黑格尔的殘羹剩飯（如像上述关于“新事物”和“旧事物”或“一个極端是从与之对立的另一極端發展起来的”等等論点）再回一回鍋；除了求助于辛利克斯教授的“疲憊”之外，它从来沒有感到需要用任何其他方法来清算“思辨的辯証法”。而且，它不断以重复黑格尔的办法“批判地”超过了黑格尔，例如：

“批判一出場就賦予探討以新的形式，即已經不致于变为外部限制的形式”等等。

如果我要使某物發生一种变化，那我就要使它在本質上变为另外的东西。因为每一种形式同时也就是“外部限制”，所以任何一种形式都不“致于”变为“外部限制”，正像苹果不致于“变为”苹果一样。但是，“批判”賦予探討的形式，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也不致变为“外部限制”，因为批判一超出一切“外部限制”的範圍，就会消失在荒謬的灰藍色的迷雾中。

“但是，如果旧事物……从理論上探討过共存或非共存的問題，那末它（新旧之間的斗争）<sup>①</sup>当时（即批判“賦予”探討以“新的形式”的时候）<sup>②</sup>是不可能發生的。”

旧事物为什么不从理論上探討這個問題呢？因为，“它絕不能一开始就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突然間”，即一开头，它“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新事物”，就是說，它既沒有从理論上探討自己，也沒有探討新事物。这样一来，新旧之間的斗争就不可能發生了，假如不幸連这种“不可能性”也不可能有的話！

---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如果神学院的“批判家”进而“承認”他是“明知故犯”，他“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后依然随心所欲地犯了錯誤”（批判所經受，所體驗或所做的一切，对它來說已变为它所故意創造的、自由的、純粹的反省产物），那末批判家承認这点只具有真理的“不完善的錯覺”。因为“复类福音作者批判”<sup>47</sup>完全是建筑在神学基础上的，因为它完全是神学的批判，所以神学講師鮑威尔先生可以“既不犯罪也不犯錯”地編写和教授神学。相反地，犯罪和犯錯的却是神学院，因为神学院不了解鮑威尔先生是怎样严肃地实现了他在“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前言（第一卷第 23 頁）中所提出的諾言：

“如果否定在这第一卷中可以表现得特別大胆和过火，那末我們就会联想到，真正肯定的东西只能产生于郑重的普遍的否定之后…… 最后将会看清：只有世界上最富有毁灭性的批判才能使我們認識耶穌及其原則的創造力。”

鮑威尔先生为了消除他的諾言的積極意义的模稜两可的外觀，故把主“耶穌”跟他的“原則”分开。鮑威尔先生实际上把主耶穌及其原則的“創造”力描述得十分有声有色，以致于他的“無限的自我意識”和“精神”竟成了基督教的創造物。

即使批判的批判与波恩神学院之間的爭論足以說明当时批判的“政治”，那末，它为什么在这次爭論結束之后还繼續从事政治呢？請听下面的回答：

“达到这一点时，批判本應該或者停留下来，或者立即前进，探討政治的本質并把它当做自己的敌人，——只要批判有可能停留在当时的斗争中，同时，只要不存在过分严格的历史規律；因为依据这种历史規律，在同自己的对立面的斗争中初次體驗到本身力量的原則必然要使它的对立面压倒自己……”

好漂亮的辯護詞！“批判**應該**停留下來”，只要可能……“有可能停留下來”！誰“**應該**”停留下來呢？誰必須做那種“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同時！批判必須前進，“同時，**只要**不存在**过分**嚴格的历史規律”等等。历史規律對絕對的批判也“**过分**嚴格”了！如果這種規律不站在相反的方面，批判的批判向前邁進該是多麼耀武揚威！然而 *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打仗就應當像個打仗的樣子]！批判在历史上必將使自己成為可悲的“历史”！

“如果批判(仍然是那位鮑威爾先生)①必須……那末還是不能**不同**時承認，當它響應這一類(即政治的)②的要求時，它總覺得自己沒有**把握**，同時由於這些要求，它跟它的**真正的**因素發生了矛盾，——這種矛盾恰恰在這些因素中已經得到了解決。”

过分嚴格的历史規律造成了批判的政治上的弱點，但是——它懇求說——不能**不同**時承認，它雖不是在实际當中，但至少是在**本身之內**超出了這些弱點。第一、它“**在感情上**”克服了這些弱點，因為“它總覺得自己對這些要求沒有把握”，它覺得自己在政治上很糟糕，連它自己也不知道政治是怎麼一回事。此外！它跟它的**真正的**因素發生了矛盾。最後(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它跟它的**真正的**因素所發生的矛盾不是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解決，而是“已經”在它那獨立存在於矛盾之外的**真正的**因素中“得到了”解決！這些批判的因素可以大言不慚地說，亞伯拉罕還沒有降生，我們就已經在世了。當發展還沒有產生我們的對立面的時候，它，這個尚未產生的對立面就已經在我們的混沌期中被解決了，死去了，滅亡了。既然批判與其**真正的**因素的矛盾“已經”在批判的**真正的**

---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因素中“得到了解决”，既然被解决了的矛盾不是矛盾，那末，确切地说，批判根本没有跟它的真正的因素发生过矛盾，沒有跟自己发生过矛盾。——这样，它的自我辯护的总目的似乎已經达到了。

绝对批判的自我辯护有成套的辯护語彙：

“本来也并不”，“只是不被重視”，“况且，还有”，“还没有完全”，“尽管——但是”，“不仅，而且主要是”，“其实，同样也只是”，“批判本应该，只要这是可能的，同时，只要……”，“如果……那末还是不能不同时承認”，“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难道这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不”……諸如此类等等。

绝对的批判在不久之前还用下面这些话表达了类似的辯护的言詞：

“‘虽然’和‘但是’，‘誠然’和‘然而’，天上的‘不’和地上的‘是’——这就是最新神学的支柱，就是它昂然闊步所用的高蹠，是它的整个智慧所仅有的把戏，是它在其一切言談中所慣用的說法，是它的始与終。”（“基督教真相”第102頁）

### （b）犹太人問題，第三号

“绝对的批判”并不满足于以自己的自傳来証实它固有的神通广大，“正像創造新东西那样首次来創造旧东西”。它也不满足于亲自出馬來为自己的过去作辯护。現在，它給第三者、其余的世俗界提出了一項绝对的“任务”，而且是“目前的主要任务”，这就是为鮑威尔的行为和“大作”辯护。

“德法年鑒”刊載了一篇对鮑威尔先生的小册子“犹太人問題”<sup>48</sup>的評論。这篇文章揭露了鮑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談的这个基本錯誤。固然，在該文中“首先”沒有对旧的犹太人問題提供“正确的提法”；但是，“犹太人問題”能够得到考察

和解决是依据了現代对全部旧問題的那种提法，也正是由于这种提法，旧的問題才由过去的“問題”变成了現代的“問題”。

看来，絕对的批判認為在第三次征討中有必要給“德法年鑒”一个答复。在这里，絕对的批判首先承認：

“在‘犹太人問題’中犯了同样的‘过失’——把政治本質和人类本質混为一談。”

批判指出：

“現在来指責批判还在两年前部分地所持的立場，未免太迟了。”“反之，任务不外是对批判甚至曾不得不……研究政治这一点加以說明。”

“两年前”？現在，我們就按絕对的日历，从批判的救世主即鮑威尔主办的“文学报”誕生的那一年算起吧。批判的救世主誕生于1843年。同年，“犹太人問題”增訂第二版問世。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張”<sup>49</sup>这一文集中对“犹太人問題”进行“批判的”研究，也是在旧历1843年，不过日期要晚一点。就在这重要的旧历1843年，或在批判的日历元年“德国年鑒”和“萊茵报”相繼查封之后，出現了鮑威尔先生的荒唐的政治大作“国家、宗教和政党”。这本书原封不动地重犯了鮑威尔在“政治本質”这一問題上的老毛病。辯护者被迫假造了一份年代表。

对于鮑威尔先生为什么“甚至”“不得不”研究政治这一点的“說明”，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具有普遍意义。这也就是说，既然絕对的批判的無辜、純潔和絕对早被奉为基本的信条，那末，与这种信条相矛盾的一切事实当然会变成这样一些难解的、引人入胜的和玄妙莫測的謎，而这些謎在神学家看来显然是一种神的非神的行动。

相反地，如果把“批判家”看做有限的单个人，如果不把他和他

所处的时代的界限分离开来，那末，回答为什么“批判家”甚至不得不在世界范围以内发展起来这一问题，将是多余的，因为问题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如果绝对的批判要坚持自己的要求，那我们就准备写一篇烦琐的短论来阐明下面的“现代问题”：

“为什么正是必须由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来证明圣母马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这个事实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证明，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天使是神的真正的流出体呢？即尚未达到消化食物所必要的浓度的流出体？”“为什么鲍威尔先生要为普鲁士王室作辩护并且把普鲁士国家奉为绝对的国家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自己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里要用‘无限的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基督教真相’中要用黑格尔的形式来重谈基督教的创世说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要要求自己和别人来‘说明’他应该犯错误这种怪事呢？”

我们在证明所有这些“批判的”、同样也是“绝对的”必然性之前，还是先来看一看“批判的”辩护伎俩。

“犹太人问题……应该……首先获得一个正确的提法，它既是宗教的、神学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在考察和解决这两个问题时，批判既不抱着宗教的观点，也不抱着政治的观点。”

问题在于：在“德法年鉴”里，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解释成是真神学和假政治的。

首先，“批判”回答了对神学局限性的“责备”：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启蒙认为，只要把宗教的对抗说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全盘予以否定，就可以解决犹太人问题。可是，批判却必须把这一对抗表述得一清二楚。”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猶太人問題的政治方面，那我們就會發現神學家鮑威爾先生甚至在政治上所研究的也不是政治，而是神學。

“德法年鑒”反對鮑威爾把猶太人問題解釋成“純宗教”問題，而這裡特別指的是布魯諾·鮑威爾在“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張”這本文集里的一篇文章，標題是：

“現在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

這篇文章和舊的“啓蒙”毫無關聯。該文包含着鮑威爾先生對現代猶太人獲得解放的能力，即獲得解放的可能性的肯定見解。

“批判”說道：

“猶太人問題是宗教問題。”

試問：什麼是宗教問題，特別是，什麼是當前的宗教問題？

這位神學家卻根據外表作出判斷，把宗教問題就看成宗教問題。但是，請“批判”回想一下它對辛利克斯教授所做的那番解釋：當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會意義，關於政治利益——批判說——“沒有什麼可多談的”。

根據同樣理由，“德法年鑒”就對批判說道：宗教的當前問題如今有着社會意義。關於宗教利益本身卻沒有什麼可談的了。只有這位神學家才能認為：談宗教就是談宗教。的確，“德法年鑒”在這裡也犯了個“錯誤”，它並沒有想停留在“社會的”這個詞上，而是進一步描述了猶太人在現代市民社會中的真實處境。只要剝掉掩蓋着猶太精神實質的宗教外壳，掏出猶太精神的經驗的、世俗的、實際的內核，就能夠規劃一個消溶這種內核的真正的社會形式。而鮑威爾先生卻以“宗教問題”就是“宗教問題”為滿足。

鮑威爾先生造成這樣一種假象，似乎在“德法年鑒”中否定了

猶太人問題也是宗教問題。決非如此。相反地，在該雜誌中曾經指出，鮑威爾先生只了解猶太精神的宗教本質，但不了解這一宗教本質的世俗的現實的基礎。他把宗教意識當做某種獨立的實質來反對。所以，鮑威爾先生不是用現實的猶太人去解釋猶太教的秘密，而是用猶太教去解釋現實的猶太人。因此，鮑威爾先生對猶太人的理解僅限於猶太人是神學的直接對象或猶太人是神學家。

因此，鮑威爾先生就沒有發覺，現實的世俗的猶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猶太精神，是由現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斷地產生出來的，並且在貨幣制度中獲得了高度的發展。他之所以不能發覺這一點，是因為他不知道猶太精神是現實世界的一環，而只把它當做是他的世界即神學的一環；是因為他作為一個上帝的虔誠信徒，把現實的猶太人不是看做進行日常活動的猶太人，而是看做安息日里的偽善的猶太人。在這位篤信基督的神學家鮑威爾先生看來，猶太精神的世界歷史意義必須在基督教誕生的那一時刻而告終。所以，他必須得重復那種認為保存猶太精神就是違反歷史的陳舊的正統觀點；而諸如似乎猶太精神的存​​在僅僅是上帝咒罵的確證，是基督啓示的明證等等陳舊的神學偏見，則應該在鮑威爾那里以批判的神學的形式復活起來。根據這種形式，猶太精神現在和過去的存在，只不過是對基督教的非世俗起源的粗暴的宗教的懷疑，也就是說，是反抗基督啓示的明證。

和所有這一切相反，在“德法年鑒”中曾經證明猶太精神是依靠歷史、通過歷史並且同歷史一起保存下來和發展起來的，然而，這種發展不是神學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學說中所能看到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商業的實踐中才能看到。在“德法年鑒”中曾經說明，為什麼實踐中的猶太精神只有在完備的基督教世

界里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不但如此，那里还指出，它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的实践。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以他们的宗教（好像宗教就是一种特殊的孤芳自赏的本质）来解释；相反地，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因此，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鮑威尔先生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

鮑威尔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神学家，尽管他是批判的神学家，或者是神学的批判家，也没有能够超乎宗教的对立之上。他把犹太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仅仅看做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关系。他甚至不得不通过犹太人和基督徒跟批判的宗教（無神論、最高的有神論、对神的否認）的对立，来批判地恢复犹太教和基督之间的宗教对立。最后，他由于自己的神学狂，不得不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即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仅仅局限于他们理解神学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的圈子之内进行活动的的能力。正如正统的神学家所认为的，整个世界都可以归结为“宗教和神学”。（他也可以如法炮制，把世界归结为政治、政治经济学等等，并且可以把神学譬如说叫做天上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一门关于“精神财富”和天国财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学问！）同样，在激进的批判的神学家看来，世界解放自身的能力只不过是把“宗教和神学”当做“宗教和神学”加以批判的抽象能力。他所唯一知道的斗争是反对自我意识的宗教局限性的斗争，然而自我意识的批判的“纯洁

性”和“無限性”也同样是神学的局限性。

可見，鮑威尔先生之所以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神学**問題，就是因为他把現代的“宗教”問題看做“純宗教的”問題。他的“問題的正确提法”其用意只在于对他“自己的能力”——回答來說，問題的提法是“正确的”！

現在，我們就来談談**犹太人**問題的政治方面。

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經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沒有获得人类意义上的解放。可見，**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別的**。所以，必須对政治解放的實質，也就是对發达的現代国家的實質进行研究。可是，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根据和完备的政治国家的对比予以估价，而且應該把它們看做不發达的国家。

这就是研究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这一問題所依据的观点，而在“德法年鑒”中也就是根据这一观点来研究这个問題的。

鮑威尔先生为“批判”的“**犹太人**問題”作了如下的辯护：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他們对于他們向之要求自由的那种制度存在着妄想。”

事实上，鮑威尔先生已經指出**德国**犹太人的妄想：他們在沒有任何社会政治生活的国家里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只有政治特权的地方要求**政治权利**。在这方面已經向鮑威尔先生表明，他自己也沉浸在关于“**德国政治制度**”的“妄想”之中，而且一点也不亚于犹太人。正因为这样，他以“**基督教国家**”不可能从政治上解放犹太人这一点來說明犹太人在德意志国家的处境。他歪曲了事情的真相，他把**特权国家、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設想成絕对的基督教国家。与此相反，曾經向他証明：沒有任何宗教特权的政治上完备

的現代國家，也就是完備的基督教國家；因此，完備的基督教國家不僅能夠解放猶太人，而且是真正地解放了他們，同時按這種國家的本性來說，也應該解放他們。

“有人向猶太人指出……他們沉湎於關於自身的種種妄想之中，儘管他們以為他們是在要求自由和要求承認自由人性，其實他們只是力爭特權，別無他圖。”

自由！承認自由人性！特權！多麼動聽的字眼。為了進行辯護何不使用這些字眼來規避某些問題！

自由？這裡指的是政治自由。已經向鮑威爾先生指出，當猶太人要求自由而又不想放棄自己的宗教的時候，他正是在“從事政治”，而不是提出任何與政治自由相抵觸的條件。已經向鮑威爾先生指出，把人劃分為非宗教的公民和宗教的個人，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已經向他指出，當國家擺脫了國教並且讓宗教在市民社會範圍內存在時，國家就從宗教下解放出來了，同樣，當單個的人已經不再把宗教當做公事而當做自己的私事來對待時，他在政治上也就從宗教下解放出來了。最後，已經指出，法國革命對宗教的恐怖態度遠沒有駁倒這種看法，相反地，卻証實了這種看法。

鮑威爾先生不去研究現代國家對於宗教的真正關係，而認為必須給自己設想出一個批判的國家來，這樣的國家只不過是在他的幻想中把自己擴張為國家的神學批判家。當鮑威爾先生陷入政治中的時候，他總是重新把政治當做自己的信仰即批判的信仰的俘虜。只要他研究國家，他總是把它變成對付“敵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學的論據。在他看來，國家是批判神學的心願的執行者。

當鮑威爾先生第一次擺脫了正統的非批判的神學時，在他的心目中，政治的權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權威。他對耶和華的信仰一

变而为对普魯士国家的信仰。布魯諾·鮑威尔在自己的小册子“普魯士福音教”<sup>50</sup>里面，不仅把普魯士国家奉为绝对，而且做得非常彻底，把普魯士王室也奉为绝对。但在事实上，这个国家并没有唤起鮑威尔先生的政治兴趣：相反地，在“批判”看来，这个国家的功績就是通过教会合并来取消宗教信条，利用警察来迫害异教派。

1840年發生的政治运动使鮑威尔先生摆脱了他的保守派政治，并且一度使他上升到自由派政治的水平。但是，这种政治，老实說，只不过是神学的借口而已。在“自由的正义事業和我自己的事業”这一著作中，自由的国家是波恩神学院的批判家，是反对宗教的論据。“犹太人問題”把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国家和宗教之間的对立上，以致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变成了对犹太教的批判。鮑威尔在其最近的政治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里终于暴露了这位把自己扩张为国家的批判家的那种最隱秘的心願。宗教为国家牺牲，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国家仅仅是消灭“批判”的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工具。最后，正像1840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使批判摆脱了自己的保守派政治一样，从1843年以来在德国傳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使批判摆脱了（虽然只是表面地）一切的政治，从此以后，批判终于能把自己的反非批判的神学的著作說成是社会的作品，而且也可以毫無阻碍地来研究自己的批判的神学——使精神和群众对立，——以及宣告批判的恩人和救世主即将降临。

言归正傳吧！

承認自由的人性？犹太人不只是想力求承認，而且真的是在力求承認“自由的人性”，这种“自由的人性”就是在所謂普遍人权中得到典型的承認的那种最“自由的人性”。鮑威尔先生自己則以为，犹太人力圖承認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正是說明他們力圖获得普

遍人权。

在“德法年鑒”中已經向鮑威尔先生証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認”不过是承認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認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內容，即构成現代市民生活內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質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並沒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並沒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並沒有使人放弃追求財富的齷齪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經營的自由。

已經向他指出，現代国家承認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認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說，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現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無意識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紐带同別人發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營業的奴隶，自己以及別人的私欲的奴隶。現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認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並沒有創立这个基础。現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發展而不得不掙脫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認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可見，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賦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双方面相互制約的行为。当里謝尔先生順便談到行动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經營自由等等时，就正确地闡明了犹太人力圖使自由的人性获得承認的意义。“自由的人性”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極其肯定的承認。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認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純粹商業的犹太人的性質，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經是它的必然成員了。其次，在“德法年鑒”中曾經指出，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員叫做 *par excellence* [道地的]“人”，

为什么人权称为“天赋的权利”。

黑格尔曾經說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批判”关于人权是不可能說出什么比黑格尔更有批判性的言論的。最后，批判断言，犹太人和基督徒为了使别人和自己获得普遍的人权，**應該放弃信仰的特权**（批判的神学家都是从自己的唯一的固定观念出發来闡明一切事物的），和它的这种断言特別对立的是出現在一切非批判的人权宣言中的一項事实：信仰任何事物的权利，举行任何一种宗教仪式的权利，这些都極其肯定地被認為是**普遍人权**。此外，“批判”还應該知道，作为推翻阿貝尔派的借口，主要就是由于它侵犯了**宗教自由**而硬說它是侵犯了人权；同样，在后来恢复宗教仪式的自由时，人們也是以人权为口实的。

“至于談到政治的本質，那末，批判已經探溯它的矛盾，一直探溯到五十年前就曾經最徹底地研究过的**理論和实践之間的矛盾**的地步，——一直探溯到法国代議制。在这种代議制之下，理論自由被实践所推翻，而实际生活的自由却又在理論中徒然寻求自己的表現。

“在已經揭發了基本謬誤之后，就必須指出，批判所發現的**法国議院辯論中的矛盾**，即自由的理論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間的矛盾，特权的立法效力和公法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純个人的利己主义力圖攫取特权的閉塞）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也就是这个範圍內的**普遍矛盾**。”

**批判**在法国議院辯論中所發現的矛盾，不外是立宪主义的矛盾。如果批判把它了解为**普遍的矛盾**，那它就算是了解了立宪主义的一般矛盾。如果批判比它認為“應該”看到的还看得远一些，也就是說，如果它想到了必須消除这个普遍的矛盾，那末，它就会放弃立宪**君主制**而主張**民主的代議制国家**，主張完备的現代国家了。批判既然远沒有对政治解放的本質进行批判的分析，沒有揭露这种本質和人类本質的关系，就只能談到政治解放的**事实**、發达



的現代國家，也就是說，只能談到這樣的地步：現代國家的存在是符合它的本質的，所以可以發現和說明那些構成現代國家本質的相對缺陷和絕對缺陷。

當批判自以為自己是超乎“政治本質”之上的時候，它反而大大低於這一本質，它總還要在政治本質中去繼續尋求解決自己的矛盾的方法，總還要堅持自己對現代國家的原則一竅不通的頑固態度。上面引用的那些“批判的”話越是明白地證明這一點，它們就越有價值。

批判把“特權的實際勢力”和“自由的理論”對立起來，把“公法狀況”和“特權的立法效力”對立起來。

為了不至於誤解批判的意見，我們就得重提一下批判在法國議會辯論中所發現的那一矛盾，也就是“應該理解為”普遍的矛盾的那一矛盾。順便來談一下每周規定一天作為童工的休息日的問題。有人提議禮拜日。有一個議員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建議在法律中不提禮拜日，因為他認為這是違背憲法的。馬丁（杜·諾爾）大臣認為這一提案有宣布基督教已經不復存在的企圖。克萊米約先生代表法國的猶太人宣稱，本着尊重絕大部分法國人的宗教的精神，猶太人並不反對提禮拜日。可見，根據自由的理論，猶太人和基督徒是平等的，但根據實際來看，和猶太人比較，基督徒卻享有特權，因為，不然的話，基督教的禮拜日怎麼能夠在為全體法國人制定的法律中得到反映呢？難道猶太教的安息日就沒有同樣的權利嗎？或者，也有這樣的情形，在法國的實際生活中，猶太人實際上並沒有受到基督教特權之害，然而法律卻不敢公開承認這種實際的平等。鮑威爾先生在“猶太人問題”里所舉出的政治本質的一切矛盾，立憲主義的一切矛盾，就是如此。而立憲主義根本就是現

代代議制国家和旧的**特权国家**之間的矛盾。

鮑威尔先生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錯誤，他認為，由于把这个矛盾当做“普遍的”矛盾来理解和批判，他便从**政治的本質**上升到了**人类的本質**。对于这个矛盾的这种理解只是說明了从半政治的解放上升到完全政治的解放，从立宪君主制上升到民主代議制国家。

鮑威尔先生認為，他在廢除**特权**的同时，也就廢除了**特权的对象**。針對馬丁(杜·諾尔)先生的声明，他指出：

“如果不存在**特权宗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宗教。抽掉宗教的排他性，宗教也就不复存在了。”

**工業活动**并不因**行帮、行会和同業公会**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消灭了这些**特权**之后，真正的**工業**才会發展起来。**土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廢除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轉讓**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普遍运动。**貿易**并不因**貿易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通过**自由貿易**，它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地，只有在沒有任何**特权宗教**的地方(北美的自由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發展起来。

現代的“**公法状况**”的基础、現代發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統治的**社会**，而是廢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縛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場所**的發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特权的閉塞**”既不和別的閉塞对立，也不和**公法状况**对立。自由**工業**和**自由貿易**消除了**特权的閉塞**，从而也消除了各种**特权**的閉塞之間的斗争；相反地，它們却把从**特权**下解放出来的、已經不和別人联系(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般結合)的人放在**特权的地位**上(这种**特权**把人們和**社会整体**

分离开来，而同时又把他们结合在一个规模很小的、特殊的团体里面)，并且引起了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同样整个的市民社会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发的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公法团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度的成员，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面。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

这么说来，在这里，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任何特权的闭塞都不与公法状况相对立，批判所发现的矛盾已被消除——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

和马丁(杜·诺尔)先生的意见完全一致的鲍威尔先生就法国议会的辩论所宣布的那一条法律正好同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相反：

“正像马丁(杜·诺尔)先生把法律中应该去掉基督教礼拜日这项建议解释成宣布基督教不再存在的建议一样，犹太人安息日的法律对犹太人不再有效这样的宣言有同样的理由(而这理由是有充分根据的)可以成为犹太教不再存在的通告。”

在发达的现代国家里，情形正好相反。国家宣布：宗教，正像

市民生活的其他要素一样，只有自国家公布它們是非政治的因而讓它們自行其事的时候起，才开始获得充分的存在。取消这些要素的政治存在，譬如說，通过选举資格的廢除来取消财产的政治存在，通过国教的廢除来从政治上取消宗教，——伴随着宣布它們的政治死亡而来的，便是这些要素的生命的蓬勃發展，这个生命从此便順利無阻地服从于自身的規律并十分广泛地展現出来。

無政府状态是摆脱了使社会解体的那种特权的市民社会的規律，而市民社会的無政府状态則是現代公法状况的基础，正像公法状况本身也是这种無政府状态的保障一样。它們怎样互相对立，也就怎样互相制約。

从上所述，我們就可以看出批判对“新东西”領会程度了。如果我們不打算超越“純批判”的范圍，那末我們就会产生一个問題：批判在法国議會辯論中既然發現了上述矛盾，为什么不想把它了解成普遍的矛盾呢？在他看来这是“應該”如此的。

“可是，当时要走这一步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不仅因为……而且因为如果没有和自己的对立物發生內在交錯的这点最后残余，进行批判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缺少这一点，批判就不可能达到只有一步之差便可达到的那个地方。”

不可能的……因为……是不可能的！批判肯定地說，这个决定性的“一步”是不可能的，但为了“能够达到只有一步之差便可达到的那个地方”，它又是必要的。誰会起来反駁这一点呢？为要达到只有“一步”之差便可到达的那个地方，决不可能再走那么“一步”，因为这一步必然使我們走过那个地方，結果又多走了“一步”。

結局好，一切好！批判在它和敌視鮑威尔先生的“犹太人問題”的群众进行战斗而近于尾声的时候供認，它对“人权”的了解，

它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宗教的評價”，“它有时在自己的議論終結部分指出的那种自由的政治本質”，总之，整个“法国革命的时代对于批判說来，恰恰是一个象征（因而，从精确的实在的意义上說，这个时代并不是法国人进行革命嘗試的时代）也就是說，不过是批判最終在自己的面前看到的那些形象的虛幻的表現”。我們并不想使批判扫兴，因为，如果說它在政治上也犯了过失的話，那末这往往只發生在它的著作的“末尾”和“終結”部分。有一个鼎鼎大名的醉鬼在午夜以前从来没有喝醉过酒，他总是以此自慰。

在“犹太人問題”的幅員上，批判無疑地从敌人手里贏得了越来越多的地盘。受鮑威尔先生庇护的批判的著作，在“犹太人問題”第一号里还是絕对的，而且揭示了“犹太人問題”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在第二号里，批判“不想而且也沒有权利”超出批判的范圍以外。在第三号里，批判本来應該再走“一步”，但是走这一步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不是它的“願望和权限”，而是它陷入了自己的“对立物”的罗网，阻碍它完成这“一步”。它很想跳过最后的一关，然而遺憾的是，它的批判的快靴却被殘留的最后一点点群众糾纏得寸步难行。

### (c) 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群众的局限性迫使“精神”、批判、鮑威尔先生不把法国革命当做“散文意义上的”法国人的革命实验的时代，而“只”当做它自己的批判的幻想的“象征和虛象”。批判在自悔“失策”之余，又对革命作了新的探討。同时它还惩罚了使它断送清白的誘惑者——“群众”，并且告訴他們这一“新的探討”的結果。

“法国革命是一种还完全属于 18 世紀的实验。”

法国革命这种 18 世紀的實驗还完全是 18 世紀的實驗，而不是 19 世紀的實驗，这种年代学上的真理似乎“还完全”属于那类“一开始就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在对“明如白昼”的真理抱有很大成見的批判所用的術語中，这种年代学上的真理叫做“探討”，并且自然也就在“对革命的新的探討”中获得一隅之地。

“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

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此可见，从字面的意思看来，上述批判的說法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即仍然是“探討”。

并未被这种探討所涉及的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 年在 *Cercle social* [社会小组]<sup>51</sup> 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貝夫密謀的失敗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 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貝夫的友人邦納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討，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在革命由此 (!)<sup>①</sup> 而消灭了人民生活中的封建屏障以后，它就不得不满足于民族的純潔的利己主义，甚至煽起这种利己主义。而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抑制这种利己主义，抑制的办法就是对它加以必要的补充，承認最高的存在物，这样最大限度地確認那應該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連接起来的普遍国家秩序。”

① 括弧里的惊嘆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民族的利己主义是和封建等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普遍国家秩序的自發的利己主义。最高的存在就是最大限度地確認普遍国家秩序，因而也就是最大限度地確認民族。但是最高的存在必須抑制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抑制普遍国家秩序的利己主义！由確認利己主义、而且由**宗教上**確認利己主义（即承認它是超人的，因而是摆脱了人的約束的存在物）来抑制利己主义，这真是批判的任务！最高存在物的創造者对自己这种批判的意圖是一無所知的。

認為民族狂热依靠于宗教狂热的**畢舍**先生，是更了解自己的英雄**罗伯斯比尔**的。

民族主义导致了羅馬和希腊的灭亡。因此，当批判断言民族主义促使法国革命失敗的时候，批判并没有說出有关法国革命的任何独到見解。同样，它把民族的利己主义規定为純潔的利己主义，这也沒有說出有关民族的任何东西。如果把这种純利己主义和**費希特**的“自我”的純潔的利己主义加以比較，那末这种利己主义就反而成了非常陰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天生的利己主义。如果說这种利己主义的純潔性只是相对的，即只是針對封建等級的利己主义而言，那末就沒有必要对“革命”作“新的探討”，从而揭示出以民族为內容的利己主义較之以某种特殊等級和特殊团体为內容的利己主义更普遍或更純潔。

批判对普遍国家秩序的闡述并不是教益很少的。这些闡述仅限于断定普遍国家秩序应当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联合起来。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說，市民社会的成員根本不是什么原子。原子的特性就在于它沒有任何屬性，因此也沒有任何由它自己的本性必然所制約着的、跟身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原子是沒有需要的，是自我滿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絕對的空虛，也就

是說，这种世界沒有任何內容，沒有任何意义，沒有任何重要性，这乃是因为在原子的自身中已經万物皆备的緣故。就讓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者在他那非感性的观念和無生命的抽象中把自己設想为原子，即把自己設想成和任何东西無关的、自滿自足的、沒有需要的、絕對完善的、極乐世界的存在。非極乐世界的感性的现实是不顧他这种想像的。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虛的，而真正是把他灌飽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質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癖好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需要，对于另一个拥有滿足这种需要的資料的利己主义者來說，並沒有什么明显的意义，就是說，同这种需要的滿足並沒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須建立这种联系，这样就相互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間的皮条匠。由此可見，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們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員彼此連接起来。他們之間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連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們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像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們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們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

“創造了完全以正义和美德为生活准則的‘自由人民’的罗伯斯比尔和聖茹斯特的偉大思想——例如，見聖茹斯特关于丹东罪行的报告及其他有关普遍警察制的报告——完全是由于恐怖政策才能維持一段時間，这种思想是一



种矛盾，人民本質的卑劣而自私的分子对付这种矛盾都一如預料那样畏怯和陰險。”

把“自由人民”說成“人民本質”的分子所必須对付的“矛盾”，这种絕對批判的說法究竟絕對空虛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照罗伯斯比尔和聖茹斯特的意思，自由、正义、美德反而只能是“人民”的必然的表现，只能是“人民本質”的屬性。罗伯斯比尔和聖茹斯特十分明确地談到古代的、“人民本質”所独有的“自由、正义、美德”。斯巴达人、雅典人、羅馬人在自己强盛的时代里就是“自由的、正义的、有美德的人民”。

罗伯斯比尔在他論述公共道德的原則的演說中間道（在1794年2月5日召开的公会會議上）：“民主的或人民的政府的根本原則是什么？是美德。我說的是公共的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羅馬做出了那么偉大的奇迹，并且将在共和的法兰西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来。我們說的美德就是热爱祖国和祖国的法律。”

接着，罗伯斯比尔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做“自由人民”。他不断地要听众回忆古代的“人民本質”，并且既提到它的英雄**萊喀古士、狄摩西尼、米太雅第、亚立司泰提、布魯士斯**，也提到它的敗类**卡提利納、凱撒、克罗狄烏斯、皮索**。

**聖茹斯特**在关于逮捕丹东的报告（批判引用了这一报告）中極为明确地說：

“在羅馬人以后，世界变得空虛了，只有想起羅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才能够再預言自由。”

他以古代的方式斥**丹东**为**卡提利納第二**。

在**聖茹斯特**的另一个报告（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了古代精神即**剛毅、謙遜、朴質**等品質的

人。警察局按其本質來說应当是相当于羅馬的市政檢查局那樣的機關。他列舉了柯德爾、萊喀古士、凱撒、小卡托、卡提利納、布魯土斯、安東尼、卡西烏斯等人的名字。最後，聖茹斯特用一句話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義、美德”的特征，他說：

“革命者都應當成為羅馬人。”

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和他們的黨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隸制為基礎的古代實在論民主共和國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隸制即資產階級社會為基礎的現代唯靈論民主代議制國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權的形式承認和批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即工業的、籠罩着普遍競爭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為目的的、無政府的、塞滿了自我異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個性的社會，另一方面又想在此後通過單個的人來取締這個社會的各種生命表現，同時還想仿照古代的形式來建立這個社會的政治首腦，這是多么巨大的錯誤！

這種錯誤是悲劇性的，聖茹斯特在臨刑之日指着懸掛在康瑟爾熱麗大廳里的那塊寫着“人權宣言”的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說道：“但創造這個的畢竟是我。”就在這塊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權利，而這種人不會是古代共和國的人，正像他的經濟狀況和工業狀況不是古代的一樣。

這裡不是替恐怖主義者的錯誤做歷史的辯解的地方。

“在羅伯斯比爾倒台以後，政治的啓蒙和運動就迅速向成為拿破侖的俘虜這個方向上發展，因此拿破侖在霧月十八日之後不久就能夠說：‘有了我的地方長官、憲兵和僧侶，我就能夠利用法國來做我所願做的一切。’”

正好相反，世俗的歷史却告訴我們：羅伯斯比爾倒台以後，從前想獲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想的政治啓蒙運動，才初次開始平凡。

地實現。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資產階級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資產階級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認了这个社会。在执政內閣时代，資產階級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高漲起来。于是出現了創辦商業和工業企業的热潮、發財致富的渴望、新的資產階級生活的喧囂忙乱，在这里，这种生活的享受初次表現出自己的放肆、輕佻、無礼和狂乱；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開發，土地的封建結構已經被革命的巨錘打得粉碎，現在無数新的所有者以第一次出現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耕作，解放了的工業也第一次活躍起来；——这就是剛剛誕生的資產階級社会的生活的某些表現。資產階級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資產階級。于是資產階級开始了自己的統治。人权已經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論了。

霧月十八日拿破侖的俘获物决不像批判所設想的那样（它竟把什么馮·罗泰克先生和韋尔凱尔的話信以为真）是革命运动；拿破侖的俘获物是自由資產階級。要相信这一点，只要讀一讀当时的立法者們的演說就行了。讀了这些演說，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似乎你被人从国民公会送到了現在的某个众議院。

拿破侖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資產階級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體現。的确，拿破侖已經了解到現代国家的真正本質；他已經懂得，資產階級社会的無阻碍的發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認和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侖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庫和他的不能有自己意志的下屬。他用不断的戰爭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他充分地滿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

求資產階級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業、享乐、財富等等。当他专橫地压制資產階級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實踐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資產階級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質利益（即商業和工業）一和他拿破侖的政治利益發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們。他对工業瑣事的輕視是他对思想家的輕視的补充。而在內政方面，他反对資產階級社会，把資產階級社会当做他仍然作为絕對的目的本身来体现的国家的敌人。例如，他曾在樞密院宣称，他不容許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那由国家掌管馬車运输从而使商業受国家支配的計劃也有同样的意义。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侖的实力的事件。巴黎的証券交易者用人工制造飢餓的办法迫使拿破侖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推迟了两个月，結果把这次进攻推到了年底。

如果說，自由資產階級在拿破侖时代再一次遇到了革命的恐怖主义，那末在波旁王朝即复辟时代則再一次遇到了反革命。1830年自由資產階級終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願望，所不同的只是他們的政治啓蒙运动現在已經完成，他們不再把立宪的代議制国家看做国家的理想，不再認為爭得立宪的代議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們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現，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確認。

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1830年这次革命的一个要素获得胜利的时候还没有終止，現在这个要素增添了自己在社会上很重要这样一种意識。

#### (d)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18世紀，斯賓諾莎主义不仅在他那以物質为实体的法国后嗣學說中占

統治地位，而且也在予物質以精神名稱的自然神論中占統治地位…… 法国的斯宾諾莎学派和自然神論的信徒只不过是在斯宾諾莎体系的真締這個問題上互相爭辯的两个流派…… 單純的命运就注定这种啓蒙运动要灭亡，就是說，在它被迫向法国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动投降之后，它已經淹沒在浪漫主义里了。”

这是批判所說的話。

現在我們就扼要地把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跟法国唯物主义的世俗的群众的历史做一个对比。我們將畢恭畢敬地承認，在实际演变的历史与按照“絕對的批判”（它既創造新东西，同样也創造旧东西）的命令而演变的历史之間存在着一条鴻沟。最后，我們將遵照批判的指示，把批判的历史的“为什么？”，“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这三个問題作为“頑強地研究的对象”。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說”，18世紀的法国啓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現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現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紀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兒、馬勒伯朗士、斯宾諾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鮮明的斗争。人們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費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被法国啓蒙运动特别是18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紀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紀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內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紀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結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紀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

远屈服于現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費尔巴哈**在理論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則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說”，**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別：一派起源于**笛卡兒**，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两个派別在發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錯的。我們沒有必要来詳細考察直接起源于**笛卡兒**的**法国唯物主义**，同样，我們也沒有必要来詳細考察**法国的牛頓学派**和**法国一般自然科学**的發展。

因此，我們只指出如下的几点：

**笛卡兒**在其**物理学**中認為**物質**具有独立的創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質生命**的表現。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範圍內，**物質**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認識**的唯一根据。

**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附和**笛卡兒**的**物理学**而同他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他的学生的职业是**反形而上学者**，即**物理学家**。

**医师勒卢阿**为这一学派奠定了基础，**医师卡巴尼斯**是該学派的極盛时代的代表人物，**医师拉美特利**是該学派的中心人物。当**笛卡兒**还在世的时候，**勒卢阿**就已經把**笛卡兒**关于**动物結構**的学說用到**人体**上来（18世紀**拉美特利**曾这样做过），并宣称**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勒卢阿**甚至还認為**笛卡兒**隱瞞了自己的真正的見解。**笛卡兒**提出了抗議。18世紀末，**卡巴尼斯**在他的著作“**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sup>52</sup>中完成了**笛卡兒**的**唯物主义**。

法国直到現在还存在着笛卡兒派的唯物主义。它在机械的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这种自然科学却是最不能——“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說”，——指責浪漫主义的。

在法国以笛卡兒为主要代表的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从誕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他恢复了伊壁鳩魯的唯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兒。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始終同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笛卡兒的形而上学所遇见的另一个反对者是英国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伽桑狄和霍布斯正是在他們的敌人已經作为官方势力統治着法国的一切学派的时候战胜这个敌人的，而这已是他們去世以后很久的事了。

伏尔泰指出，18 世紀法国人对耶穌会派和揚遜派<sup>53</sup>的爭論的漠不关心，与其說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說是由罗的財政投机造成的。而实际上，17 世紀的形而上学的衰敗可以說是由 18 世紀唯物主义理論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論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質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塵世的享乐和塵世的利益，趋向于塵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論。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經威信扫地。在这里我們只需要大略地指出这种进化的理論过程。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兒、萊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積極的、世俗的內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發現。但是在 18 世紀初这种表面現象就已經消失了。实証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給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現在，正当实在的本質和塵世的事物开始把人們的全部注意

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像的本質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在17世紀最后两个偉大的法国形而上学者馬勒伯朗士和阿尔諾逝世的那一年，**爱尔維修**和**孔狄亚克**誕生了。

使17世紀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論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鍛鑄成的**怀疑論**。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兒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費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虛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發展过程。他为了編纂形而上学的灭亡史而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他主要是駁斥了**斯宾諾莎**和**萊布尼茨**。

**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論摧毀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証明，由清一色的無神論者所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無神論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無神論，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無神論社会的来临。

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話來說，**比埃尔·培尔**“对17世紀說來，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18世紀說來，則是第一个哲学家”。

除了否定神学和17世紀的形而上学之外，还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們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論上加以論証的書。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sup>54</sup>很湊巧地在英吉利海峽那边出現了，它像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試問：洛克不是斯賓諾莎的學生嗎？“塵世的”歷史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顛的天生的產兒。大不列顛的經院哲學家鄧斯·司各脫就曾經問過自己：“物質能不能思維？”

為了使這種奇蹟能夠實現，他求助於上帝的萬能，即迫使神學本身來宣揚唯物主义。此外，他還是一個唯名論者。唯名論是英國唯物主義者理論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說來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現。

英國唯物主义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科學，而以感性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学則是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部分。阿那克薩哥拉連同他那無限數量的原始物質和德謨克利特連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當做權威來引証。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於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條件。在物質的固有的特性中，運動是第一個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這裡所說的運動不僅是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更是趨向、生命力、緊張，或者用雅科布·伯麥的話來說，是物質的痛苦 [Qual]。物質的原始形式是物質內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質的力量，這些力量使物質獲得個性，並造成各種特殊的差異。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裡，還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發展的萌芽。物質帶着詩意的感性光輝對人的全身心發出微笑。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述出來的學說本身却反而還充滿了神學的不徹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後的發展中變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

主义系統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鮮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視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領域內克服敌視人的、毫無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無情的徹底性来發展理智的一切結論。

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論断說，如果我們的感覺是我們的一切知識的泉源，那末觀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科学只能給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一个名称可以适用于許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認為感性世界是一切觀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說一个詞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詞，除了我們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無形体的实体也像無形体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觀念。决不可以把思維同那思維着的物質分开。物質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假如“無限的”这个詞不表示我們的精神能够無限地添加某一数量，那末这个詞就毫無意义。既然只有物質的东西才是可以覺察到的，才是可以認識的，那末对神的存在就絲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結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追求的对象就是我們謂之幸福的东西。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規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說系統化了，但他沒有更詳尽地論証培根关于知識和觀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則。

洛克在他論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論証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則。

霍布斯消灭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論的偏見，而科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萊、普里斯特列等人則鏟除了洛克感覺論的最后神学藩篱。自然神論——至少对唯物主义者來說——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簡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我們已經提到过，洛克的著作的出現对于法国人是多么的湊巧。洛克論証了 bon sens 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說，他間接地說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

曾經直接受教于洛克和在法国解釋洛克的孔狄亚克立即用洛克的感覺論去反对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他証明法国人完全有权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見的不成功的結果而予以抛弃。他公开駁斥了笛卡兒、斯宾諾莎、萊布尼茨和馬勒伯朗士等人的体系。

他在他的著作“关于人类知識的起源的經驗”<sup>55</sup> 中發展了洛克的观点，他証明，經驗和習慣的事情不仅是灵魂，而且是感觉，不仅是創造觀念的艺术，而且是感性知觉的艺术。因此，人的全部發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把孔狄亚克从法国各学派中排挤出去的正是折衷主义哲学。

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区别是与这两个民族的区别相适应的。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辯。他們給它以它过去所沒有的气概和优雅風度。他們使它文明化了。

爱尔維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說为出發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質。爱尔維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維修“論人”<sup>56</sup>）。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

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業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兒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結合。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兒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細节。他的“人是机器”<sup>57</sup>一書是模仿笛卡兒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在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sup>58</sup>中,論述物理学的那一部分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結合,而論述道德的部分實質上則是以爱尔維修的道德論为依据。还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为此受到黑格尔贊許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論”<sup>59</sup>),和萊布尼茨的学說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我們一方面說明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重起源,即起源于笛卡兒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說明了法国唯物主义同17世紀的形而上学,即笛卡兒、斯宾諾莎、馬勒伯朗士和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所以我們就沒有必要再来叙述沃尔涅、杜畢伊、狄德罗等人的以及重农学派的观点。德国人只是在他們自己开始同思辨的形而上学进行斗争以后,才觉察出这种对立的。

笛卡兒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則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們智力平等,关于經驗、習慣、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業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說,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經驗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識、感觉等等,那就必須这样安排周圍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認識和領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

西，使他能認識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須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來說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說，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極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現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積極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懲罰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場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發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繩，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繩。

諸如此类的說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在这里沒有篇幅来对他們加以評論。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傾向具有代表性的，是洛克的英国早期学生之一孟德維尔对恶習的辯护。他証明，在現代社会中恶習是必然的和有益的。这决不是替現代社会辯护。

傅立叶是直接 from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說出發的。巴貝夫主义者是粗魯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維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維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則从边沁的体系出發去論証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經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膚淺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薩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說当做现实的人道

主义学說和共产主义的邏輯基础加以發展。

鮑威尔先生或批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給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搜罗材料的呢？

(1) 黑格尔的“哲学史”<sup>60</sup> 把法国唯物主义說成斯宾諾莎的实体的实现，这無論如何总比“法国的斯宾諾莎学派”理智得多。

(2) 鮑威尔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从黑格尔的“哲学史”中知道，法国唯物主义就是斯宾諾莎学派。如果他現在从黑格尔的另一著作里發現，自然神論和唯物主义是对同一个基本原則持不同理解的两个派別，那末他就会得出結論說，斯宾諾莎有两个在其体系的真諦方面互相爭辯的学派。鮑威尔先生滿可以在黑格尔的“現象学”中找到我們所談到的这一段說明。現在就把它照抄在下面：

“啓蒙运动內部在絕對本質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執……并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把沒有任何謂語的絕對物称为……最高的絕對的存在……另一派却把它叫做为物質……可是，二者都是同一个概念，——区别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仅仅在于两种結構的出發点各不相同。”（黑格尔“現象学”第 420、421、422 頁）

(3) 最后，鮑威尔先生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知道：如果实体不在其进一步的發展中过渡为概念和自我意識，那它就会成为“浪漫主义”的财产。“哈雷年鑒”<sup>61</sup> 当时也曾做过类似的論断。

但是，“精神”無論如何总得給它的“敌人”唯物主义注定一种“愚鈍的命运”。

---

注釋。法国唯物主义同笛卡兒和洛克的联系，以及 18 世紀的哲学同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大多数近代法国哲学史中都有詳尽的闡述。和批判的批判相反，我們在这里只

要重复一下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东西就行了。可是，18世紀的唯物主义同19世紀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則还需要詳尽地闡述。我們在这里只引証爱尔維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1) 爱尔維修。“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因此，應該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無知。”——“道学家們迄今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就，因为要拔除产生恶行的根子，就必须到立法当中去挖掘。在新奥尔良，只要妻子討厭丈夫，她就有权离弃自己的丈夫。在这样的地方就没有不貞的妻子，因为妻子没有必要欺騙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把道德同政治和立法結合起来，那末道德就不过是一門空洞的學問而已。”——“一个人如果一方面对危害国家的恶行無动于中，另一方面却对私生活中的恶行怒不可遏地加以抨击，那就可以看出他是伪善的道学家。”——“人們并不是生而善或生而恶的，但是他們却生而有能力成为善人或恶人，这要看公共利益是把他們結合起来还是把他們分离开。”——“如果公民們不实现公共福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私人福利，那末除了瘋子以外就根本不会有犯罪的人。”（“精神論”1822年62巴黎版第一卷第117、240、241、249、251、339和369頁）——爱尔維修認為，教育（他所理解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謂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見上引書第390頁）能培养人；如果需要进行改革来消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那末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就必须根本改变人的意識：“只有当人民对旧的法律和習俗的愚昧的尊敬减弱时，才能实现偉大的改革”（上引書第260頁），或者，如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說的，只有消灭了無知，“才能实现偉大的改革”。

(2) 霍尔巴赫。“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脫离开自己，因为他不能不顧自己。”“不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我們的好处、我們的利益……驅使我們去爱或去恨某些东西。”（“社会体系”1822年巴黎版63第一卷第80、112頁）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須要爱別人，因为別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 道德向他証明，在一切存在物

中，人最需要的是人”(第76頁)。“真正的道德也像真正的政治一樣，其目的是力求使人們能夠為相互間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工作。凡是把我們的利益同我們同伴的利益分開的道德，都是虛偽的、無意義的、反常的道德。”(第116頁)“愛別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同我們同伴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便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美德不外就是組成社會的人們的利益。”(第77頁)“人若沒有情欲或願望就不成其為人……人若是完全撇開自己，那末依戀別人的一切動力就消滅了。人若對周圍的一切漠不關心，毫無情欲，自滿自足，就不成其為社會的生物……美德不外是傳送幸福。”(第118頁)“宗教的道德從來也沒有能把死人變成比較有社會性的人。”(第36頁)

(3) 邊沁。我們只引証邊沁駁斥“政治意義上的普遍利益”的一段話。“個人利益必須服從社會利益。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呢？每個人不都是像其他一切人一樣，構成了社會的一部分嗎？你們所人格化了的這種社會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如果承認為了增進他人的幸福而犧牲一個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末，為此而犧牲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以至於無數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個人利益是唯一現實的利益。”(邊沁“懲罰和獎賞的理論”……1826年巴黎第三版<sup>64</sup>第二卷第229、230頁)

### (e) 社會主義的最後的敗北

“法國人在應當如何組織群眾的問題上建立了一系列的體系；但是他們不得不耽於幻想，因為他們把真正的群眾看做可用的材料。”

恰恰相反，法國人和英國人証明了，並且是極其詳盡地証明了，現代社會秩序正在組織“真正的群眾”，因而它是群眾的組織。批判仿效“總匯報”<sup>65</sup>的手法，想用“幻想”這個非同小可的字眼來鏟除所有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體系。

批判就這樣打死了外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然後它又把火力轉向德國：

“當德國的啓蒙者突然發覺他們的1842年的希望落了空並且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關於現代法國諸體系的信息恰好傳到了他們那裏。現在他們可



以大談必須把下層人民階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同時他們也想以這種代價來避開他們自己是否不屬於那種不僅在下層中可以找到的群眾的問題。”

很显然，批判在为鮑威尔过去的著作辯護時，把它所有的動聽的理由都說盡了，以至于現在除了說 1842 年的啓蒙者“茫然”而外，找不出別的理由來解釋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幸運的是，關於現代法國諸體系的信息傳到了他們那里。”為什麼傳來的不是關於英國諸體系的信息呢？其決定性的批判的原因在於：施泰因的“現代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sup>66</sup>一書沒有給鮑威尔先生帶來關於現代英國諸體系的信息。這個決定性的原因也說明為什麼在批判關於社會主義體系的各種高談闊論中總是只談法國的體系。

批判繼續啓示我們說，德國的啓蒙者犯下了反對神聖精神的罪過。他們埋頭研究早在 1842 年就已存在的“下層人民階級”，為的是避開當時尚不存在的問題：在應當於 1843 年建立的批判的世界秩序中，他們應獲得什麼頭銜，是綿羊的頭銜還是山羊的頭銜，是批判的批判家的頭銜還是污穢的群眾的頭銜，是精神的頭銜還是物質的頭銜。但是，他們首先應當認真考慮一下他們本身的批判的靈魂的濟度，因為，如果我損傷了我自己的靈魂，那末包括下層人民階級在內的整個世界對我有什么幫助呢？

“但是，精神的存在物不改變，它就不能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而它若不受最堅決的抵抗，就決不可能有所改變。”

如果批判比較熟悉下層人民階級的運動，它就會知道，下層階級從實際生活中所受到的最堅決的抵抗使它們每天都有所改變。出自英法兩國下層人民階級的新的散文和詩作將會向批判表明，即使沒有批判的批判的神聖精神的直接庇佑，下層人民階級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發展的更高水平。

絕对的批判繼續夢囈般地說：“那些人，他們的全部財產就是‘組織群眾’這句話”，等等。

关于“組織劳动”的問題已經談得很多了，虽然这个“口号”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自己提出的，而是力圖調和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法国政治激进派提出的。关于“組織群眾”这一正好应当解决的任务，在批判的批判之前沒有一个人談到过。相反，事实已經表明，資产階級社会本身、旧的封建社会的解体正是組織群眾。

批判把自己的發現加上了引号 [Gänsefüsse<sup>⊖</sup>]。嘎嘎叫着暗示鮑威尔先生去拯救卡皮托里的鵝<sup>Ⓛ</sup>，無非就是他自家的鵝<sup>⊖</sup>，即批判的批判。批判把群眾重新組織起来，把它設計成精神的絕对的敌人。精神和群眾的对立也就是批判的“社会組織”，在这个社会里，精神，或批判，是組織工作，群眾是原料，而历史則是产品。

試問，在絕对的批判在它的第三次征討中对革命、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取得一系列的輝煌胜利之后，这些海格立斯<sup>Ⓜ</sup>般的战績的最后結果究竟怎样呢？結果不过是所有这些运动都毫無結果地失敗了，因为这些运动仍然还是被群眾所褻瀆的批判或被物質所褻瀆的精神。批判甚至在鮑威尔先生自己过去的著作中就發現了群眾对批判的多方面的褻瀆。然而，在这里代替批判的是辯护；批判不是抛弃过去，而是使过去“巩固起来”；它不是把肉体对精神的褻瀆也看成精神的死亡，相反地，是把肉体的精神化甚至也看成鮑

⊖ 直譯：“鵝足”。——編者注

Ⓛ 卡皮托里是羅馬的古堡，相傳偷襲此古堡的敌人憑鵝的叫聲來發現看守人。  
——譯者注

⊖ 双关語：德文«Gans»本义为“鵝”，轉义为愚蠢的化身。——編者注

Ⓜ 海格立斯 (Hercules) 是古希腊神話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半神半人的英雄。——譯者注

威尔的肉体的生命。然而，只要未完成的、还被群众所褻瀆的批判不再是鮑威尔先生的創造物，而成为整个的民族和大批世俗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創造物，只要未完成的批判不再叫做“犹太人問題”、“自由的正义事業”、“国家、宗教和政党”，而叫做革命、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就会变得愈来愈無情，而且会愈来愈坚决地傾向于恐怖主义。这样，批判就用怜惜自己的肉体而把别人的肉体送上十字架的办法，消灭了物質对精神的褻瀆和群众对批判的褻瀆。

不管是用这种手段还是用那种手段，“被肉体所褻瀆的精神”和“被群众所褻瀆的批判”無論如何总算从絕對批判的道路上清除掉了。精神和肉体、批判和群众的絕對批判的分离和純粹的对立，代替了这种非批判的混合。这种对立在它形成当代的真正的历史利益的世界历史形式下，是鮑威尔先生及其伙伴，或精神，与作为物質的所有其余人类的对立。

革命、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們以本身的灭亡为批判的主开辟了道路。奥莎那<sup>①</sup>！

#### (f) 絕對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識的哲学

批判在一个領域內达到了虛假的完善和純潔，因而，当它沒有在其他一切領域內表現出同样的“完善”和“純潔”的时候，这就只是一种失策，“只”是“不徹底”。这“一个”批判的領域就是神学的領域。这个領域的純潔的疆土起于布魯諾·鮑威尔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迄于布魯諾·鮑威尔的最后一个边境要塞——“基督

<sup>①</sup> 犹太人頌贊上帝或祈福之詞。——譯者注

教真相”。

我們在“文学总匯报”上讀到：“現代的批判已經和斯賓諾莎主义一刀兩斷。因此从它这方面來說，如果不加批判地在一個領域內假定有**实体**，即使是对个別的荒謬的論点而言，也是不徹底的。”

如果說，过去关于批判怀有政治偏見的供認由于指出这“**在本質上非常微弱**”而馬上被冲淡了，那末，現在关于**不徹底性**的供認則由于附带声明这种不徹底性只是对个別的荒謬的論点而言而被冲淡了。可見，过錯不在鮑威尔先生身上，而在像倔强的劣馬把批判带走的荒謬之点上。

下面的两三段引文将会表明，批判和斯賓諾莎主义断絕以后又采取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它从“**实体**”轉向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怪物，即“**主体**”、“**作为过程的实体**”、“**無限的自我意識**”；“**完善的**”和“**純潔的**”批判的最后結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創世說。

我們首先来看一看“复类福音作者批判”：

“施特劳斯仍然忠实于把**实体**視為絕對物的观点。具有这种普遍性形式、具有尚未达到现实的和理性的規定性的这种普遍性形式的宗教傳說，不外就是抛弃了自己的邏輯單純性并采取了**公社力量**的特定存在形式的**实体**；因为普遍性的这种现实的和理性的規定性只有在自我意識中，在自我意識的**单一性和無限性**中才能达到。”（“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第一卷前言第6—7頁）

我們現在不管“达到規定性的普遍性”、“**单一性和無限性**”（黑格尔的概念）的命运如何。——鮑威尔先生不指出，貫串在施特劳斯关于“**公社力量**”和关于“**傳說**”的理論中的观点在斯賓諾莎关于**实体**的觀念中有其抽象的表現，有其邏輯形而上学的象形文字；鮑威尔先生不說明这一点，而是强迫“**实体**抛弃自己的邏輯單純性并

采取公社力量的特定存在形式”。他用黑格尔的魔术机来强迫“形而上学的范畴”（从现实中抽出的抽象概念）跳出使它们溶化于纯思想的“简单”因素中的逻辑框子，并采取自然存在或人类存在的“特定形式”，也就是说，强迫它们体现出来。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批判继续驳斥施特劳斯说：“这种观点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每当它要解释和清楚地描述福音历史的起源过程时，它只能提供某种过程的假象。‘福音历史的来源和发端是传说’的说法再度肯定了同一个东西——‘传说’和‘福音历史’；的确，这里也指出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还向我们说明，福音历史的发展和解说起源于什么样的实体的内部过程。”

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应当把实体理解为内部过程。他从实体的观点出发对发展做了如下的说明：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扩张的发生不是因为同一个东西具有不同的形式，——不是，这种扩张不过是无定形地重复那本身只……包含差异所具有的单调的假象的同一个东西罢了。”（“现象学”序言第12页）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鮑威尔先生继续说道：

“因此，批判必须反对它本身……并在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寻求神秘的实体性的解答，而这种发展则导向理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及理念的现实存在，导向无限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对实体性的观点的批判继续说道：**

“实体的闭塞性必须消灭，而且实体必须提升为自我意识。”（“现象学”第7页）

同样，鮑威尔的自我意识也是提升为自我意识的实体，或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于是，自我意识就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至

体。这是一幅諷刺人脫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因此，这种自我意識的本質不是人，而是理念，因为理念的現實存在就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是人化了的理念，因而它是無限的。人的一切屬性就这样神秘地变成了想像的“無限的自我意識”的屬性。正因为如此，鮑威尔先生才十分明确地談到这种“無限的自我意識”，他說，一切事物都起源于無限的自我意識并在其中找到解釋，即找到本身存在的根据。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鮑威尔先生繼續說：

“实体性关系的力量就在于它力圖把我們导向概念、理念和自我意識。”

黑格尔說：

“可見，概念是实体的真理。”“实体性关系的推移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內在必然性造成的，它恰恰說明概念是实体的真理。”“理念是对等的概念。”“达到自由存在的……概念……無非就是自我或純粹的自我意識。”（“邏輯学”，“黑格尔全集”第二版67第五卷第6、9、229、13頁）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最可笑的是，鮑威尔先生在他的“文学报”上还这样說：

“施特劳斯沒有能完成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尽管他已經以他那不徹底的批判正好証明了完成这一批判的必要性”，等等。

鮑威尔先生本人在他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一書中並沒有打算对黑格尔的体系做完善的批判，而至多不过是打算完成黑格尔的体系罢了，——至少在把黑格尔体系应用于神学这一方面是这样的。

他把他的批判（“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前言第21頁）称为“特定体系的最后業績”，而这个特定体系正是黑格尔的体系。

施特劳斯和鮑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識的爭論，是在黑格尔

的思辨範圍之內的爭論。在黑格爾的體系中有三個因素：斯賓諾莎的實體，費希特的自我意識以及前兩個因素在黑格爾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統一，即絕對精神。第一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人的自然。第二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自然的精神。第三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以上兩個因素的統一，即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

施特勞斯和鮑威爾兩人十分徹底地把黑格爾的體系應用於神學。前者以斯賓諾莎主義為出發點，後者則以費希特主義為出發點。他們兩人都就上述兩個因素之中的每一個因素在黑格爾那里由於另一個因素的滲入而被歪曲這一點批判了黑格爾，可是他們使每一個因素都獲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徹底的發展。因此，他們兩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爾哲學的範圍，但同時他們兩人都繼續停留在黑格爾思辨的範圍內，而他們之中無論哪一個都只是代表了黑格爾體系的一個方面。只有費爾巴哈才是從黑格爾的觀點出發而結束和批判了黑格爾的哲學。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學的絕對精神歸結為“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從而完成了對宗教的批判。同時也巧妙地擬定了對黑格爾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基本要點。

在鮑威爾先生那里，雖然已經不是神聖精神向福音書作者口授福音書的本文而使之筆錄下來，但起這個作用的卻是無限的自我意識：

“我們勿須隱諱，對福音歷史的正確理解也是有其哲學基礎的，就是說，是以自我意識的哲學為根據的。”（布魯諾·鮑威爾“復類福音作者批判”的前言第15頁）

為了說明鮑威爾的這種自我意識的哲學以及鮑威爾先生從批

判神学中获得的結果，必須从他的最后一部关于宗教哲学的著作“**基督教真相**”中摘引几段出来。

該書在談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候說：

“如果唯物主义的真理、自我意識的哲学已被發現，而自我意識又被認為是一切，是斯宾諾莎的实体这个謎的解答和真正的 *causa sui*〔自身原因〕……那末又何必需要精神呢？又何必需要自我意識呢？自我意識建立了世界，建立了差別，并且在它自己所創造的东西中創造它自身，因为它重新消除了它的創造物和它本身的差別，并且只有在創造中和在运动中才是它本身，——好像这种自我意識在这种运动中没有自己的目的似的！可是它本身就是这个运动，并在其中首次掌握了自己。”（“基督教真相”第 113 頁）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自我意識的运动看做普遍本質即物質的运动，但是他們还未能看出，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識的运动，才能真正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与本身的統一。”（同書第 114—115 頁）

**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第一段話清楚地表明：唯物主义的真理就是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絕对的、即至高無上、無拘無束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識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沒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識”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的創造者。世界是被迫使自己异化并采取奴隶形象自我意識的生命表現，但是世界和自我意識之間的差別只是似是而非的差別。自我意識不把自己和任何现实事物区别开。世界不过是自我意識制造出来的形而上学的区别，是它的以太头脑的幻影和它的臆想的結果。因此，自我意識又重新消灭了它一度認可的在它之外有某种事物存在的假象，并且不承認它本身的“創造物”是实在的物体、即那种实在有別于自我意識的物体。自我意識也通过这种运动首次把自己制造成絕对的东西，因为絕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絕对的唯心主义者，就必须經常地完成**



一种詭辯的过程，就是說，他先要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幻覺，变成自己头脑的單純的突發之念，然后再宣布这种幻影是真正的幻影——是純粹的幻想，而最后便宣告它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

第二段話清楚地表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物質的运动看做精神化了的运动，但是他們还未能看出，这不是物質运动，而是观念运动，这是自我意識的运动，即純思想的运动。他們还未能看出，真正的宇宙运动只有作为独立于物質和摆脱了物質即独立于现实和摆脱了现实的、自我意識的观念运动，才是真正的和现实的；換句話說，有别于观念的和思想的运动的物質运动，只是作为假象而存在。辛利克斯，来帮帮忙吧！

这种思辨的創世說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我們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現象学”中就可以看見这种理論：

“自我意識的异化就是实物性所制造的东西……自我意識在这种异化中把自己假定为实物，或者把实物假定为自身。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因素，即自我意識同时又揚弃自己的这种异化和实物性，并使它們返回到自身……这就是意識的运动。”（黑格尔“現象学”第 574—575 頁）

“自我意識具有区别于它本身的内容……这种内容在其本身的差別中是自我，因为它是自我揚弃的运动……这种内容，要下个比較确切的定义，不外就是上述运动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是完成自身而且自为地作为精神来完成自身的精神。”（同書第 582—583 頁）

針對黑格尔的这种創世說，費尔巴哈指出：

“物質是精神的自我异化。所以物質本身就获得了精神和理性；但同时它又被看做不实在的、不真实的本質，因为只有从这种异化中复生的本質，即使自己摆脱了物質、摆脱了感性的本質，才称得上是完善的、具有真正形式的本質。可見，自然的、物質的、感性的世界在这里所遭到的否定，就跟被原罪所敗坏的自然在神学中所遭到的否定一样。”（“未来哲学”第 35 頁）

这样，鮑威尔先生一方面替反对非批判的神学的唯物主义作辯护，另一方面又指責它“还没有成为”批判的神学、理智的神学、黑格尔的思辨。辛利克斯！辛利克斯！

既然鮑威尔先生在一一切领域中都貫徹自己跟实体的对立，貫徹他的自我意識的哲学或精神的哲学，那末在一一切领域中他就只應該同他自己臆想的幻影打交道。批判是他手中的武器，他用这个武器把在無限的自我意識之外还以有限的物質存在自居的一切，都变成單純的假象和純粹的思想。在实体中，他駁斥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幻覺，而是世俗的内核——本性，他攻击存在于人之外的本性，也攻击人自己的本性。在任何領域內都不假定有实体（他居然还說这样的話），这就等于不承認任何有別于思維的存在、任何有別于精神的自發性的本性力、任何有別于理智的人的本質力量、任何有別于活动的苦痛、任何有別于本身行动的別人對我們的影響、任何有別于知識的感覚和欲望、任何有別于头脑的心灵、任何有別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別于理論的實踐、任何有別于批判家的人、任何有別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現實的共同性、任何有別于我的你。因此，鮑威尔先生进而把自己同無限的自我意識、同精神混为一談，即用創造者来代替創造者的这些創造物，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同样，他把坚持自己和他鮑威尔先生的創造物有区别的整个其余世界当做固执的群众和物質予以擯弃，这也是合乎邏輯的。于是他就希望：

“再隔一些时候，  
物体界也会永远到达尽头。”<sup>68</sup>

他也合乎邏輯地把他自己对他迄今未能征服“这个愚笨的世界”一事的不滿变为世界对它自身的不滿，而把批判的批判对人类

發展的激憤變為人類對他的批判，對精神、對布魯諾·鮑威爾先生及其伙伴的群眾的激憤。

鮑威爾先生最先是一個神學家，但並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神學家，而是一個批判的神學家或神學的批判家。當他還是一個把一切宗教的和神學的蠢事加以思辨裝飾的老黑格爾正統派的最極端的代表時，他就不斷地宣稱批判是他的私人財產。那時他就已經把施特勞斯的批判看成人類的批判，而和這種批判相反，他十分明確地維護神的批判的權利。後來，他從宗教的外殼下剝出了構成這種神性的內核的極端自命不凡或自我意識，把它看做獨立的存在，把它變成獨立的存在物，並在“無限的自我意識”的幌子下把它提升為批判的原則。接着，他又在他本身的運動中完成了被“自我意識的哲學”描述為絕對的生命行為的那種運動。他重新消除了作為“被創造出來的東西”的無限的自我意識與創造東西的主體即他本身之間的“差別”，並認識到：無限的自我意識在自己運動中“只是”鮑威爾“他自己”，所以宇宙的運動只有在它本身的觀念的自我運動中才能成為真正的和現實的。

神的批判在返回自身以後，以合理的、自覺的、批判的方式復活了：自在的存在變成了自在自為的存在，而且只有在最後才會變成飽滿的、實現了的、已揭示出來的起源。神的批判和人類的批判不同，它是作為批判、作為純粹的批判、作為批判的批判出現於世的。對鮑威爾先生的新舊著作的辯護代替了對新舊約全書的辯護。神與人、精神與肉體、無限性與有限性之間的神學的对立，變成了精神、批判或鮑威爾先生與物質、群眾或世俗世界之間的批判的神學的对立。信仰與理性之間的神學的对立變成了正常的人的理智與純批判的思維之間的神學的对立。“思辨神學雜

志”<sup>69</sup>变成了批判的“文学报”。最后，宗教的救世主终于显化为批判的救世主鮑威尔先生了。

鮑威尔先生的最后阶段并不是他發展中的失常：这是他从他的异化返回到自身。不言而喻，神的批判使自己异化并超出自己的范围的那一瞬間，是与它部分地叛离自己而創造某种人类事物的那一瞬間相吻合的。

絕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發点以后，就結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結束了自己的全部生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純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内部的旋轉，因此，群众对它已絲毫不感兴趣了。

## 第七章

### 批判的批判的通訊

#### (1) 批判的群众

世上难道还有什么地方能  
比家族的怀抱更温暖?<sup>70</sup>

处于绝对定在中的、布魯諾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宣称，群众的人类，即本身不是批判的批判的全体人类，都是它的对立面，是它的本质的对象：其所以是本质的，是因为群众 *ad majorem gloriam dei* [为了上帝的无上光荣]，为了批判和精神的无上光荣而存在；其所以是对象，是因为群众不过是批判的批判的材料，批判的批判宣称，它同群众的关系是现代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

但是，仅仅宣布自己为全世界的对立面，还不能使自己成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面。一个身体不灵活因而处处碰人的人也未尝不可以自命为一切人的绊脚石。要成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面，光由我宣布世界是我的对立面，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方面，即必须世界宣布我是它的本质的对立面，把我看成这样并承认我是这样。批判的批判借助于通讯获得了这种承认，它使通讯向世界证明批判的拯救世界的工作以及世界对批判的福音的普遍的愤懑。批判的批判作为全世界的对象也就是它本身的对

象。通訊應該表明批判的批判就是批判的批判，是現代的世界利益。

批判的批判認為自己是絕對的主体。絕對的主体需要崇拜，而真正的崇拜則需要第三者，即信仰絕對主体的个人。因此，沙洛頓堡的神聖家族从它的記者們那里受到它所应受的崇拜。記者們告訴它，它是什么，它的敌人即群众不是什么。

批判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对自己的意見当做世人的意見，把自己的概念变成現實，这样它就無疑地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它自己內部形成一种群众，即批判的群众，他們的單調的使命就是充当批判的名言的永不休止的回音。为了自圓其說，这种自相矛盾是情有可原的。不以罪惡世界为自己的家的批判的批判，必将在自己家里建立起罪惡世界。

批判的批判的記者，即批判的群众的成員所走的道路并不是玫瑰花鋪成的道路，而是一条艰苦的、遍地荆棘的、批判的道路。批判的批判是唯灵論的主宰，純粹的自發性，*actus purus*〔純粹的活動〕，它不能容忍任何外来的干涉。因此，記者只能是似是而非的主体，他对批判的批判只能表現似是而非的独立性，只能似是而非地希望向它报道一些新奇而独特的事情。实际上，他不过是它自己的創作物，不过是它本身的暫時对象化了的和独立化了的知覺而已。

因此，記者們抓住一切机会，喋喋不休地向人們保證，他們为了应付一下而向批判的批判报道的消息，都是它早已知道、洞悉、認識、理解和體驗到的。例如，采尔萊德就常常說这样的话：“您了解这件事嗎？您是知道的；您已經第二次、第三次知道这件事了；当然，您已經听得很多，所以一切事情您都非常明白。”

又如，駐布勒斯勞的記者弗萊什漢默爾說：“而這件事……對於您我都很难說是一個謎。”駐蘇黎世的記者希采爾說：“您自己當然是知道的。”批判的記者崇拜批判的批判的絕對的理解力，甚至硬說它能理解那些根本無從理解的事情。例如，弗萊什漢默爾說：

“只要我告訴您，您要是不想碰見身穿黑色長袍和斗篷的天主教青年牧師，您就別上街，那您就會完全(!)①理解到(!)②我的意思。”

記者們甚至还戰戰兢兢地傾聽批判的批判怎樣說話，回答，呼喊，譏笑！

例如，采爾萊德說：“不過……您請說吧。好吧，就請您聽一下吧！”弗萊什漢默爾說：“可是，我已經聽到您所說的一切，我想說的也正是這些……”希采爾說：“埃德曼，您呼喊吧！”駐杜賓根的記者說：“您可別譏笑我！”

因此，記者們常常這樣說：他們向批判的批判報道事實，等待它來做精神的闡明；他們向它提供前提，讓它來做結論。他們甚至抱着歉意表示，他們是重復它早已知道的消息。

例如，采爾萊德說：

“您的記者只能給您提供一幅畫面，即描寫一些事實。而賦予這些事物以生命的精神，您當然是知道的。”或者說：“而現在，您已經可以自己得出結論了。”

希采爾說：

“一切創造物皆淵源於其極端對立面這一思辨的原理，我是不敢和您談論的。”

或者也可以說，記者的閱歷不外是執行和証實批判的預言。

---

① ② 括弧里的驚嘆號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例如，弗萊什漢默爾說：“您的預言已經實現了。”采爾萊德說：

“我曾經写信告訴過您，在瑞士正日益發展着一種趨向，這種趨向遠不是不幸的，實際上倒是可喜的……倒証實了您所一再表述的思想……”等等。

批判的批判有時覺得有必要強調一下它那種禮賢下士的精神，它就連通訊也申閱和答复，它之所以這樣禮賢下士，是因為記者對交給他的每個課題無不感到勝任而愉快。例如布魯諾先生写信給駐杜賓根的記者說：

“要我来答复你的信，这实在說不過去……另一方面……你又說得如此中肯，我……簡直無法拒絕你的恳求，只好来闡明一下。”

批判的批判要外省給它写通訊。但是這種省不是行政省（大家知道，德國根本沒有這種省），而是以柏林為首都的批判的省，柏林是批判的家长和批判的神聖家族的所在地，而省里則住着批判的群眾。批判的外省人只有躬身謝罪之後，才敢斗胆請求批判的最高當局予以注意。

例如，一位匿名的記者写信給神聖家族的成員和首腦埃德加爾先生說：

“閣下！請允許我冒昧地告訴您，志向相同的青年人总是乐于成为知音的（我們倆人的年齡相差不過兩歲）。”

埃德加爾先生的這位同代人附帶地自称是最新哲學的本質。難道說：“批判”同哲學的“本質”通信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假如埃德加爾先生的同代人保證說他已經掉了牙齒，那也不過是暗示他的寓意的本質而已。這個“最新哲學的本質”“從費爾巴哈那里學會了把修養這個環節歸入客觀的看法”。它立刻就来試驗它的修養和看法，硬讓埃德加爾先生相信它已經有了“對他的小說（“堅定



不移的原則万岁!”<sup>71</sup>)的全面的看法”，同时它又公开承認它还很不了解埃德加尔先生的思想，而最后則已經不很相信自己已經有了全面的看法，問道：“难道我完全誤解了您嗎？”在这种試驗之后，最新哲学的本質像下面这样談到群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它說：

“我們应当本着礼賢下士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开那个阻止普通人类的理智进入思想的无边无际的海洋的魔术般的紐結，哪怕这样做一次也是好的。”

誰要想全面地了解批判的群众，那就請他讀一讀希采尔先生的苏黎世通訊(第5期)。这位不幸的人以确实令人感动的勤勉精神和值得贊頌的記憶力背誦着批判的名言。其中也不乏布魯諾先生講到他所参加的战役以及他所策划和领导的征战时慣用的得意之詞。特别是当希采尔先生痛恨世俗的群众及其对批判的批判的态度的时候，他更显出他不愧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員。

他談到以历史的参加者自居的群众、“純潔的群众”、“純潔的批判”，談到“这个对立面(“純潔得史無前例的对立面”)的純潔性”，談到“心怀不滿”，談到“群众較之批判的蠢笨無能、性情鄙劣、懦弱、冷酷、畏縮、狂暴、凶狠”，談到“本身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对抗而使批判变得更尖銳更机警的群众”。他談到“来自極端对立的創造”，談到批判摆脱了憎恨和类似的世俗的激情。登載在“文学报”上的希采尔先生的通訊的全部內容，不外就是这么一套批判的言詞。他責备群众仅仅满足于“主張”、“善良的願望”、“言辞”、“信仰”等等，但是他自己身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員却满足于表达他的“批判的主張”、“批判的信仰”、“批判的善良願望”的言辞，并且讓布魯諾先生及其伙伴去“行动、工作、战斗”和“創造”。

尽管“批判的群众”的成員描繪了一幅世俗的世界和“批判的

批判”之間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紛爭的可怖景象，但是至少对那些不信仰的人來說，連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紛爭这个事实本身都还是沒有証实的。而記者們殷勤地非批判地重复談論批判的“幻想”和“奢望”，这只能証明主人的固执的念头也正是奴僕的固执的念头。的确，有一位批判的記者正力圖用**事实**來証明。

他写信給神聖家族說：“您可以看到，‘文学报’已达到了目的，就是說，它絲毫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同。只有当它投合沒有头脑的人之所好，当您随着流行的揚尼恰尔<sup>①</sup>軍乐队的言語的乐声昂首闊步的时候，它才能得到人們的贊同。”

好一个流行的揚尼恰尔軍乐队的言語的乐声！大家知道，批判的記者总想騎在“不流行”的言語上逞英豪。但他对“文学报”絲毫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同这个事实所做的解釋，必然会像純粹的护教論一样遭到駁斥。这个事实最好还是从相反的方面來解釋，那就是說，批判的批判是投合了广大群众之所好，即投合了絲毫得不到人們贊同的广大的下流作家群众之所好。

可見，批判的記者們光是用批判的言語向神聖家族“祈禱”并同时向群众念“咒語”是不够的。为了証明群众和批判之間有真正的紛爭，必須要有非批判的群众的記者，必須要有群众派往批判的批判的真正的使节。

因此，批判的批判也为非批判的群众留下了一席之地。它讓群众的忠厚的代表們同它通信，承認群众和批判之間的对立是重要的，絕对的，并作乞求摆脱这种对立的絕望的吼叫。

---

① 古代土耳其的近衛軍。——譯者注

## (2) “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

### (a) “冥頑不灵的群众”和“不知足的群众”

“群众”冷酷無情，冥頑不灵，对一切都盲目不信仰，他們在这些方面有一位相当坚定的代表。这位代表談到了“柏林学社<sup>72</sup>的純黑格尔哲学的造詣”。

这位記者說：“只有在認識现实的基礎上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但是，我們从柏林学社的社員們那里得知，我們的認識不是对现实的認識，而是对某种非现实的認識。”

記者把“自然科学”称为哲学的基础。

“一个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同哲学家的关系，如同哲学家同神学家的关系一样。”

他繼續談論“柏林学社”：

“关于这些先生我不想多說什么，我只打算說明一下，他們的处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們虽然完成了精神上的脫換羽毛的过程，但是他們并没有摆脱这种脫換羽毛的产物，所以就不能接受新生和返老还童的因素。”“这些(自然科学的和工業的)<sup>①</sup>知識我們还必須掌握。”“我們最感需要的、关于世界和人类的知識不是单憑思想的敏銳所能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識，必須使所有的感官都起作用，而且人的一切才能都必須当做必需的和最重要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否則，直觀和認識是永远不够的……而且还会导致道德的喪失。”

但是，这位記者竭力把他贈送給批判的批判的藥丸包上糖衣。他“为鮑威尔的言詞找到了正确运用的方法”。他“注視着鮑威尔的思想”，他說“鮑威尔說得很正确”，最后，看来他并不是同批判本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身論戰，而是同某些方面和批判有所區別的“柏林學社”論戰。

覺得自己受到了損傷而且在一切**有關信仰的事情**上敏感得像老處女一樣的批判的批判，是不會上這種分別和假殷勤的當的。

它回答說：“你想把你來信中一開頭就說到的那一派人看做你的敵人，那你就錯了。你不如干脆承認（接着就是一道陷人於絕境的破門令）<sup>①</sup>，你就是批判本身的敵人！”

多不幸呵！群眾的人！你竟是**批判本身的敵人**！但是，至於說到上述群眾的論戰的內容，批判的批判是**尊敬**它對**自然科學和工業**所抱的批判的態度的。

“衷心地尊敬對自然界的**研究**！衷心地尊敬詹姆斯·瓦特而（真是崇高的言辭）<sup>②</sup>絲毫不尊敬瓦特給自己的親人帶來的百萬財富！”

衷心地尊敬批判的批判對別人的尊敬！批判的批判在這封回信中指責上述柏林學社的成員不在嚴肅而重要的著作上下工夫，不去研究它們，指責他們一旦指出某一著作是劃時代的等等，便以為評價它的任務大功告成了。但是它自己在這封回信里對一切自然科學和工業只表示了一下尊敬，就算在指出它們的意義方面已經大功告成了。而批判的批判在表示它對**自然科學**的尊敬時所做的保留，好像已故的騎士克魯克反對自然哲學時所發出的第一批雷矢<sup>③</sup>一樣。

“自然界並非是唯一的現實，因為我們吃的和喝的都是自然界的單個的產品。”

批判的批判關於自然界的單個的產品所知道的，只不過是“我們吃它們和喝它們”而已。衷心地尊敬批判的批判的自然科學！

① ②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③ 即閃電，古希臘神話中主神宙斯的神箭。——譯者注

批判合情合理地把研究“自然”和“工業”这种令人不快的强加于人的要求同下面这种妙不可言的修辞学上的感嘆对立起来：

“难道(!)①您以为对历史现实的認識已經完結了嗎？难道(!)②您能說出一个已經被真正認識了的历史时期嗎？”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論关系和實踐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業，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認識嗎？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認識(比如說)某一历史时期的工業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認識这个历史时期嗎？誠然，唯灵論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維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業分开，認為历史的發源地不在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霧中。

“冥頑不化”和“冷酷無情”的群众的代表因提出过中肯的指責和忠告，而被批判斥为群众的唯物主义者。批判对待另一位不太恶毒、不太群众的記者，也不見得好些。这位記者虽然对批判的批判有所期望，但是并不認為它沒有辜負这些期望。这种“不滿”的群众的代表写道：

“不过，我必須承認，貴报第一期完全不能使我感到滿意。我們所期望的确实是另外的东西。”

批判的家长亲自出面回答道：

“說什么本报辜負了期望，这我早已預料到了，因为这些期望对我說来是

---

① ② 括弧里的惊嘆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很容易想像到的。人們太倦怠了，竟想要一下子就得到一切。一切嗎？不是！要尽可能得到一切，同时又尽可能什么都不做。就是說要得到那種不費力氣就可得到的一切，不經過任何闡釋就能理解的一切，總而言之，就是一種用一個字就能概括的一切。”

“群眾”要求按原則和本性“不能提供任何東西”的批判提供**一些東西或甚至一切東西**，於是批判的家長在對“群眾”的不正當的要求憤恨之餘，以長者的口吻講述了如下的一段趣聞：不久以前，柏林的一位熟人大為抱怨他的著作（大家知道，布魯諾先生根據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幻想而寫成了這部臃腫不堪的著作）冗長不堪，廢話連篇；鮑威爾先生安慰他，答應為了使他便於理解而贈給他一種印書用的像小圓球一樣的油墨。這位家長用油墨的不勻來解釋自己的“著作”的冗長，正像他用“世俗的群眾”（他們為了充實自己而想要一口吞下一切和無）的空虛來解釋他的“文學報”的空虛一樣。

雖然我們決不否認上述情節的重要性，但是也很難認為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對立**就在於：批判的批判的一位群眾的熟人說批判很空虛，而批判反過來說他非批判；另一位熟人認為“文學報”辜負了他的期望；最後，**第三位熟人和摯友**認為批判的著作冗長不堪。儘管如此，但是懷抱期望的熟人 № 2 和至少想要摸清批判的批判的祕密的摯友 № 3，都使得批判與“非批判的群眾”之間的關係更富於內容和更為緊張。批判對待具有“冥頑不靈的心”和“普通人的理智”的群眾有多麼殘酷，它對待苦苦哀求擺脫對立的群眾就有多麼溫和。帶著破碎的心、懺悔的心情和溫順的精神去接近批判的群眾，由於誠心而得到了獎賞，即聽到了批判的一些有分寸的、預言式的、有份量的話。

### (b) “軟心腸的”和“求救的”群众

伤感的、誠懇的、求救的群众的代表搖尾乞怜，他披肝瀝胆、双膝跪地、两眼望天地祈禱，乞求批判的批判說几句表同情的話。

他說：“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訴您呢？我为什么要在您的面前为自己辯白呢？因为我尊敬您，所以我希望博得您的垂青；因为我万分地感激您对我的培育，所以我爱戴您。您責备了我，所以我的良心驅使我在您面前来为自己辯白……我决不是要向您强辯，但是我根据个人的切身体会想来，您本人也会乐于看到您还不大認識的人証明他对您的同情。我决不妄求您来答复我这封信。我既不想占去您可以用来做更多事情的宝貴時間，又不想給您增加麻煩，更不想使自己因为希望不能实现而苦恼。您可以把我对您說的話說成是伤感、糾纏或虛榮(!)①，或者随您高兴答复或不答复我，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我情不自禁地要發出这封信，我只希望您能相信我写信的一片好意(!)②。”

正像上帝的慈悲亘古以来就是賜給可怜人一样，这个含泪乞求批判發發慈悲的、群众的、但順从的記者终于如願以償了。批判的批判善意地答复了他。而且还不止此！它还就他極想知道的問題做了極其深刻的闡明。

批判的批判教誨說：“两年前回忆起 18 世紀的法国啓蒙运动是适时的，因为这可以使我們在当时激战的某一地区也投入这批輕装部队。但是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如今真理变化無常。当时是适时的，現在却成了失誤。”

絕对的批判下詔把这批輕装部队称为“我們的聖徒”、我們的“先知”、“主教”等等(見“軼文集”第二卷第 89 頁)<sup>73</sup>。这在当时自然也只能是一种“失誤”，不过是“适宜的失誤”。誰能够把輕装部

① ② 括弧里的惊嘆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队称为“主教”的部队呢？批判热情地談論以“畢生的精力来思考、探討和研究真理”的这批輕装部队所表現的自我牺牲精神、道德毅力和热忱，这又是一个“适宜的”失誤。它在“基督教真相”一書的序言中声称，这批“輕装”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每一个博学的人都事先保証說，他們一定会把整个世界翻轉过来”，“他們似乎是毫無疑問地真正能够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这也是一个“失誤”。誰能够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呢？这批輕装部队能够嗎？

批判的批判繼續教誨“誠愚的群众”的求知心切的代表說：

“法国人以前虽然因創立社会理論的企圖获得了新的历史功績，但是現在他們畢竟是日暮途穷了；他們的新理論还不够純，他們的社会幻想、他們的和平的民主还远沒有摆脱旧秩序的前提。”

假如批判确有所指的話，那指的就是傅立叶主义，特别是“和平民主日报”<sup>74</sup>的傅立叶主义。但是后者根本不能說是法国人的“社会理論”。法国人有好几套社会理論，而不是仅有一套。“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摻了水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一部分慈悲为怀的資產階級的社会学說而已。人民拥护共产主义，同时分裂为許多不同的派別。改造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傾向的真正的运动不仅沒有日暮途穷，而且只是在現在才真正开始。同时，这一运动决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想的那樣完成于純粹的，即抽象的理論中，而必定完成于决不去关心批判的那种無条件的范疇的实实在在的實踐中。

批判繼續滔滔不絕地說：“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假如有一个能够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那末这只是那个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認識普遍頹廢的原因的民族。”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



的預言正確無誤，那末任何一個民族都永遠不會優越於其他民族，因為所有的歐洲文明民族——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現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認識普遍頹廢的原因”。最後，硬說“批判”、“認識”即精神的活動能提供精神的優勢，其實只是一種詞句上的同義反復；而躊躇滿志地把自己擺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於自己腳下乞求指點迷徑的批判，正是通過這種漫畫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義，證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國民族性的泥坑里。

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批判並不是什麼在人類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為社會積極成員的個人所進行的真正的人類活動，這些個人也是人，同樣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動。因此，他們的批判同時也貫串着實踐，他們的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在這裏面他們提出了顯明的實際措施，這裏面不僅體現着他們的思維，並且更主要的是體現着他們的實踐活動。因此，他們的批判是對現存社會的生動的現實的批判，是對“頹廢”原因的認識。

批判的批判向求知心切的群眾成員闡述一番之後，自然可以理直氣壯地這樣來談它的“文學報”：

“這裏有一種純粹的、一目了然的、通達事理的、不附加任何東西的批判。”

這裏“沒有提供任何獨立的东西”，這裏除了不提供任何東西的批判，即一種最終達到極端無批判性的批判之外，就根本沒有提供任何東西。批判把加了着重號的詞句排印出來，并使它們在自己的摘錄中大放異彩。沃尔弗干格·門采爾和布魯諾·鮑威爾互相伸出了友誼的手，可見批判的批判還停留在同一哲學在本世紀

最初几年所处的地方，那时謝林否定群众的推測，他力圖提供某种东西，甚至提供除了純粹的、純哲学的哲学之外的無論什么东西。

### (c) 天恩之降临于群众

剛才当着我們的面被批判教訓一頓的軟心腸的記者同批判保持着赤誠的关系。群众和批判的緊張的关系只是以牧歌的形式表現在这位記者的身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的双方保持着善意的、客客气气的、因而也是普普通通的关系。

自己对群众的危害健康的、令人胆寒的影响，批判的批判首先是从一位一脚踏上了批判的土地而另一脚依然还在塵世的記者身上發現的。这位記者是“群众”在自己的反批判的内部斗争中的代表。

他有时覺得“布魯諾先生和他的朋友們不了解人类”，他們“其实是盲目的”。但是他馬上又糾正了自己：

“当然，您是对的，您的思想是真实的，这一点我看得像白天一样清楚。但是請您原諒，人民也不見得不对…… 是呵！人民是对的…… 您是对的，这我不能否認…… 我真不知道这一切将会有什么后果。您說……好吧，就呆在家里吧…… 呵，我不能再……呵……总有一天会發瘋的…… 我希望您能善意待人…… 請相信我，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識往往会弄得他昏头昏脑，好像磨在脑子里轉一样。”

另一位記者也写道，他“有时会失去理解力”。你看，批判的天恩已經准备寬恕說上面段話的群众的記者了。好一个可怜虫！罪恶的群众从一方面拉他，批判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拉他。但是，把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弄得这样糊里糊塗的，并不是所获得的知識，而是信仰和良心的問題：是批判的基督还是人民，是上帝还是世界，是布魯諾·鮑威尔及其朋友們还是世俗的群众！

而正像罪人的靈魂的極端墮落先于上帝的天恩的降臨一樣，在這里，令人詛喪的糊塗也是先于批判的天恩而出現的。當批判的天恩最後降臨于群眾的時候，中選者所失去的自然不是自己的愚蠢，而是自己愚蠢這種意識。

### (3) 非批判的批判的群眾或 “批判”和“柏林學社”

批判的批判始終沒有能夠把自己描繪成本質的對立面，同時也就沒有能夠把自己描繪成群眾的人類的本質的對象。冥頑不靈的群眾的代表們指責批判的批判沒有目的性，並非常恭敬地向它說明，它尚未完成精神上“脫換羽毛的過程”，它必須首先取得切實的知識。除這類代表外，還有兩位記者。一位是軟心腸的記者，首先，他不是批判的對立面，其次，他渴望靠攏批判的真正原因是純個人的原因。因為把他的信讀下去就可以看出，他實際上只是想把他對阿爾諾德·盧格先生的虔敬和他對布魯諾·鮑威爾先生的虔敬調和起來。這種調和的企圖給他那顆善良的心增色不少，但是絲毫不能代表群眾的利益。於是，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後一位記者已經不是群眾的真正的成員，而是批判的批判的準備受堅信禮的徒弟。

一般說來，群眾是不確定的對象，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任何確定的行為，也不可能同任何事物發生確定的關係。作為批判的批判的對象的群眾同真正的群眾毫無共同之點。真正的群眾自己在內部和相互之間形成最為群眾的對立。批判的批判的群眾是批判的批判本身“製造”出來的，正像博物學家不談動植物的特定綱目而只是把“一般綱目”當做自己的對立面一樣。

因此，为了使自己拥有真正的群众的对立面，除了这种抽象的群众，即批判本身的想像的产物之外，批判的批判还需要有某种特定的、可以經驗地指出来的、而不只是假想的群众。这种群众必須把批判的批判同时看成自己的本質和自己的本質的絕灭。它必須力圖成为非群众，即批判的批判，同时又不能实现这种企圖。上述的“柏林学社”正是这种既批判又非批判的群众。慎重其事地研究批判的批判的人类群众只不过是这么一个柏林学社而已。

据我們所知，“柏林学社”（即批判的批判的“本質的对象”，批判的批判經常在研究它，而它在批判的批判看来也在研究批判的批判）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 *ci-devant* [从前的] 青年黑格尔派組成的。如批判的批判所断定的，它一方面使他們 *horror vacui* [惧怕真空]，一方面又使他們产生空虛之感。我們不打算深究实际情况，而相信批判的說法。

通訊的使命主要是向公众詳尽地叙述批判对“柏林学社”的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闡明这种关系的深刻意义，証明批判必須殘酷地对待这种“群众”，最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整个世界屏息注視着这种对立，有时贊成批判的行动方針，有时則加以反对。例如，絕对的批判写信給一位拥护“柏林学社”的記者說：

“这一类的事情我已經不知听过多少次了，所以我下定决心不聞不問。”

他同这一类批判的事情打过多少交道，就連世界也無从推測。

但是我們不妨来听听，批判的群众的一位成員是怎样报道柏林学社的：

“他<sup>⊖</sup>一开始回答就說：‘如果說有人承認鮑威尔兄弟（对神聖家族总必

---

⊖ 这是同記者談話的人，持有柏林学社的觀點。——編者注

須 pêle-mêle [不加區別地]加以承認)①,那就是我。但是“文学报”! 正义第一!’——我很想知道,关于您,这些激进主义者中的一个,即1842年的这些聪明人中的一个是怎样想的……”

記者又繼續報道說,一个不幸的人發現“文学报”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他認為埃德加尔先生的小說“三个正直的人”既粗糙又誇張,他不了解,書報檢查与其說是人和人的斗争,与其說是一种外部斗争,不如說是一种内部斗争。这些人懶得去看一下自己的内部世界,懶得用精炼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批判的思想去代替書報檢查所不能通过的言辞。他認為埃德加尔先生評論貝罗的那篇文章是膚淺的,而批判的記者則認為這篇文章很有份量。这位記者虽然自己承認:“我沒有讀过貝罗的著作。”但是他相信埃德加尔先生写得很成功等等,大家知道,虔信則迷。批判的信徒繼續說道:“总之,他(柏林学社的人)②对埃德加尔的著作深为不滿。”他还認為“那里对待蒲魯东的論述也不够十分严肃”。記者說到这里时替埃德加尔先生証明說:

“的确(!?)③,我讀过蒲魯东的著作;我知道,埃德加尔在自己的叙述中抄录并以明显的方式比較了蒲魯东的各种独特的論点。”

照这位記者的意見,这些先生之所以不喜欢埃德加尔先生对蒲魯东所做的出类拔萃的批判,唯一的原因就是埃德加尔先生沒有声色俱厉地痛斥财产。此外,——多稀罕呵!——敌人还認為埃德加尔先生的关于“工人联合会”的文章沒有意义。記者安慰埃德加尔先生說: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③ 括弧里的惊嘆号和問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当然罗，这篇文章沒有貢獻出什么独到的見解，而实际上，这些先生是退回到他們确实一貫坚持的格魯培的观点上去了。他們認為批判必須貢獻，貢獻，再貢獻！”

看来批判是沒有貢獻出語言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經濟学和法学方面的全新的發現！它簡直謙遜極了，甚至容許說它沒有貢獻出什么独到的見解！連我們的批判的記者也把前所未知的东西貢獻給現代的力学，强迫人們退回到他們一貫坚持的那种观点上去。去回忆格魯培的观点，那是不大巧妙的。格魯培在其大体說來頗為貧乏的、不值一提的小冊子里問布魯諾先生，他打算对思辨的邏輯学提出什么样的批判。布魯諾先生請他去問后代，并且說：

“一个傻瓜等待着回答。”<sup>75</sup>

就像上帝懲罰不信上帝的法老时使他的心冥頑不灵并認為他不配得到啓示一样，記者断言：

“因此，他們根本不配看見或認識你們的‘文学报’的內容。”

于是，他不仅不去劝他的朋友埃德加尔設法获得思想和知識，反而給埃德加尔出主意說：

“但願埃德加尔能弄到一袋子語彙，将来写文章时，閉着眼睛从袋子里掏些出来，就会有适合讀者口味的風格。”

他一方面断言“某种程度的瘋狂，不受欢迎，毫無內容，毫無思想，对自己無法理解的事物游移不定，空虛之感”（这些形容語显然是指柏林学社說的），一方面滿口称贊神聖家族：

“处理事情是一貫得心应手，运用范疇是独具匠心，研究問題是融会貫通，一言以蔽之，完全掌握了对象。他（柏林学社的一員）<sup>①</sup>是尽可能減輕自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己的任务，而您則把事情本身变得容易了。”他又說：“您在‘文学报’上實現了一种純粹的、明显的、切中要害的批判。”

最后，他說：

“我之所以向您这样詳細地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知道，把我的朋友的想法告訴您，会使您感到滿意。您可以由此看到‘文学报’已經达到了它的目的。”

“文学报”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对立起来。我們方才已經看到了柏林学社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攻击，也看到了它因这种攻击而受到的斥責，現在我們再来看看柏林学社渴望博得批判的批判的怜悯而做出的两重嘴臉。

一位記者写道：

“我今年年初到柏林时，听那里的熟人說，您厭惡一切人，您对一切人都敬而远之，您簡直成了一个隱士，故意避免同其他人接近和交往。当然，我不知道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錯。”

絕对的批判答道：

“批判不組織党派，它不想有自己的党派，它是孤独的，这就是說，它深入到自身(!)①的对象的时候，它是孤独的，它把自己同这种对象对立起来的时候，它是孤独的。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絕开。”

批判的批判把現實的对立換成了本身和世界、神聖精神和世俗群众之間的想像中的对立，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超越一切教条主义的对立，同样，批判的批判作为政党把自己同除它以外的全人类对立起来，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布魯諾先生及其伙伴的人格上，于是滾到了政党观点之下，但是它仍然想像自己凌駕于一切党派之

① 括弧里的惊嘆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上。批判高踞于**抽象**的孤独这个宝座上，甚至当它似乎在研究某种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并未脱离無对象的孤独状态而同某种现实的对象發生真正的社会关系，因为它的对象不过是它的想像的对象，是想像中的对象——这种批判的自白的真实性已由我們的全部叙述所証明了。从“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絕开”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它同样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抽象**的性質——作为**绝对抽象**的**抽象**的性質；而正是这种同一切、同一切思維、直觀等等相隔絕的無，才是**绝对的胡說**。然而，这种和一切隔絕、和一切脱离的孤独并不能摆脱自己从中脱离出来的对象，正像**奧力金**不能摆脱从他身上脱离的**生殖器**一样。

另一位記者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位同他見過面談过話的“柏林学社”的人，說他“情緒恶劣”，“心境憂郁”，“不能多开口”（其实，他以前总是“敢說敢做的”）而且“頹唐沮丧”。这位“柏林学社”的成員向記者談了一些，而記者又把他說的話报告了批判：

“他不能理解，像您們二位这样一貫尊重人道主义原則的人怎能如此孤僻，如此不講友情，甚至还很高傲。”他不知道“为什么世上竟有这样显然是故意在制造分裂的人。我們观点相同，我們都崇拜極端，即崇拜批判，我們都能够树立極端的思想，至少也能够理解和运用它”。“他認為这种分裂的主导原則不外就是利己主义和傲慢。”

記者接着又竭力为自己的朋友說好話：

“也許，我們的朋友中至少还有一些人不理解批判，或者不理解批判的一片好心……*ut desint vires, tamen est laudanda voluntas*〔虽然力不从心，但其志可嘉〕。”

批判像下面这样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做了对比，并以这个对比来作为回答：



“对批判的看法各有不同。”这些先生“以为批判就在他們的口袋里”，而批判“却知道并且真正在运用批判的威力”，就是說，它并不把它保存在口袋里。在前者看来，批判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在批判看来，却是“最富有內容的，更确切些說，是唯一具有內容的”。正像絕对的思維認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一样，批判的批判也認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因此它認為在它本身之外不存在任何內容，因此它不是对那些处于批判的主体之外的现实对象的批判，它本身就創造对象，它是絕对的主客体。批判繼續說：“第一种批判用言辞迴避一切，迴避对事物的任何研究，第二种批判用言辞把自己同一切隔絕开。”第一种“聪明，但一無所知”，第二种“在不断地学习”。实际上，第二种并不聪明，它 *par çà, par là* [处处] 学习，但只是为了摆样子，只是为了用一知半解来冒充自己特有的大智大慧，把这种一知半解当做“口号”来反对自己曾从之受教的群众本身，并将它变成批判的批判的胡說。

第一种批判認為，“極端”、“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这一类字眼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是最受尊敬的范疇。第二种批判研究各种观点，而不在研究中使用上述抽象的范疇的标准。

批判 №2 大喊大叫，說什么現在已經談不到政治，哲学已經完蛋；它决心要用“幻想的”、“烏托邦的”之类的言辞来清除社会体系和社会运动，——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上面已經說过的范疇“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等等的批判的修正版嗎？而它的“标准”，如“历史”、“批判”、“对象的綜合”、“新的和旧的”、“批判和群众”、“观点的研究”，总之，它的一切口号，难道不是从范疇中，而且是从抽象范疇即标准中产生出来的嗎！？

“第一种批判是神学的，不怀好意的，嫉妒的，小气的，傲慢的；第二种批

判則是这一切的对立面。”

批判这样一口气对自己吐出一大串贊詞，硬說自己具有柏林学社所缺少的一切，正像上帝能办到人所不能办到的一切一样。然后批判为自己提出了如下的証詞：

“它已經明澈如鏡，渴求知識，心地平和，因而它是坚强而又不可战胜的。”

因此，要对付柏林学社之类的敌人，它無需“任何其他武器，只用奥林帕斯的嘲笑<sup>①</sup>就够了”。于是，批判以它独有的彻底性闡明这种嘲笑的性質，竭力确定这种嘲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种嘲笑不是高傲。”絕對不是！这是否定的否定。这“不过是心情愉快的、心平气和的批判家为了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認為和它平等（多自命不凡呵！）<sup>②</sup>的观点而必須使用的办法”。所以，每当批判家發笑时，他就是在使用一种办法。但是他因为“心平气和”，所以嘲笑这个办法不是用来对付人，而是用来对付观点！嘲笑竟成了他所运用的、甚至是他所必須运用的一种范疇！

世外的批判不是现实的即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并同这个社会共甘苦的人类主体所特有的活动。现实的个人只是偶性，只是批判的批判借以表现自己为永恒实体的人間的容器。主体不是人类中的个人所实现的批判，而是批判的非人类的个人。并非批判是人的表现，而是人是批判的异化，因此批判家完全生活在社会之外。

“批判家能否生活在他所批判的社会里呢？”

应当反問一下：难道他不是必須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嗎？难道

① 意指神的嘲笑。——譯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他自己不是必須成為這個社會的生活的表現嗎？為什麼批判家要出賣自己的精神產物呢？難道他出賣它們就能使現存社會的最糟的法律變成自己專用的法律嗎？

“批判家甚至不應當企圖把本人同社會混為一談。”

因此，他為自己建立起一個神聖家族，正像孤獨的上帝渴望在神聖家族里消除他同整個社會相隔絕這種苦悶一樣。既然批判家希望擺脫糟糕的社會，那就讓他先擺脫他所獨有的社會。

“這樣，批判家就失去了社會的一切歡樂，但是也沒有社會的痛苦了。他既不知道友誼（批判的朋友除外）<sup>①</sup>，也不知道愛（對自己的愛除外）<sup>②</sup>，而且誹謗也對他無能為力；無論什麼東西都侮辱不了他；無論憎恨或嫉妒都觸動不了他；激憤和憂恨都是和他毫不相干的情感。”

總之，批判家擺脫了一切人間的激情，他成了一個神人，他滿可以給自己唱一首修女歌：

“我不思戀愛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唯一的依靠。”<sup>76</sup>

批判家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它最後對我們說：

“凡夫俗子為了使批判家同自己處於平等地位（這種自命不凡的平等在上面譴責過了！）<sup>③</sup>，就向他扔石頭（依照聖經類推，應當用石頭打他一頓）<sup>④</sup>，不願意理解他，硬說他動機不純（硬說純粹的批判動機不純！）<sup>⑤</sup>。這種凡夫俗子並不會受到批判家的嘲笑，因為他們不值一笑；批判家只是把它的真正的本性揭示出來，心平氣和地把它放在和它那微不足道的意義相稱的地位

① ② ③ ④ ⑤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上去。”

我們从上面知道，批判必須使用嘲笑这个办法来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認為和它平等的观点”。批判的批判自己也不甚明了自己对待不信上帝的“群众”的策略，这几乎已經表明了批判的內心的憤激和暴躁。而憤激和暴躁同“情感”远不是“毫不相干的”。

但是，不能不承認，經過一場海格立斯式的斗爭（批判在這場斗爭中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自己同非批判的“世俗的群众”，甚至同“一切”隔絕开），批判終於幸福地达到了它那孤独的、上帝似的、自足的、絕對的存在。如果說，当它的这种“新面貌”初次表現出来的时候，罪恶的情感的世界看来对它还有某些支配力的話，那末我們現在就将在某个“艺术形象”中看到它的美学的渐趋冷靜和飞升。它要在“艺术形象”中为自己贖罪，以便最后作为第二个胜利的基督来完成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并在战胜龙之后安然地升入天堂。

## 第八章

### 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在他周游世界期间贖补了双重的罪行：他个人的罪行和批判的批判的罪行。他在跟父亲激烈爭吵时向父亲揮动了宝劍；批判的批判在同群众激烈爭吵时也为罪恶的激情所控制。批判的批判沒有揭露任何一个秘密。鲁道夫贖补了这个罪过并揭露了一切秘密。

按照施里加先生的評定，鲁道夫是人类国家的头等公僕（施瓦比亚人埃基迪烏斯的“人道国家”。見卡尔·魏尔博士的“宪法年鉴”1844年第二卷）。

根据施里加先生的論断，为了使世界免于灭亡，必須有

“敢于無情地批判的人出台…… 鲁道夫就正是这样的人…… 鲁道夫領会了純批判的思想。而对于他和全人类來說，这个思想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經驗，比鲁道夫即使在良师指导下所能从这一历史中汲取的一切知識，都更有益处…… 鲁道夫借以使自己的周游世界留芳千古的公正裁判，实际上正是

对社会秘密的揭露。”

他本人就是“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鲁道夫比批判的批判的其他偉人拥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外部工具。但批判的批判却聊以自慰地說：

“时运較差的人是無法达到魯道夫所获得的**成果的(!)**①，可是他却能达到美好的目的(!)②。”

因此批判就讓时运亨通的魯道夫来实现它自己的思想。它对他唱道：

“哈內曼，走向前，  
你有双大的防水靴！”<sup>77</sup>

現在我們就来看看魯道夫的批判的周游世界怎样“对于**全人类**來說，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經驗**，比……一切知識，都更有**益处**”，等等——我們来看看这个**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的魯道夫吧！

### (1) 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或“刺客”③

“刺客”的職業本是屠夫。各种各样的經歷使这个强悍的自然之子变成了杀人犯。他在凌辱瑪丽花④的时候偶然为魯道夫所見。魯道夫在这个精明的鬧事鬼的头上很內行地着实打了几拳。于是他博得了“刺客”的尊敬。随后，在罪犯麇集的酒吧間里，“刺客”显露了他那善良的性格。魯道夫对他說：“你还是有心肝和骨气的。”魯道夫用这句话激起了他的自尊心。“刺客”改邪归正了，或者如施里加先生所說，变成了“**有道德的生物**”。魯道夫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現在讓我們来看看魯道夫改造“刺客”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刺客”所上的第一課是練習**伪善、背信、狡黠和伪装**。魯道夫利用为道德所感化的“刺客”同**維多克**利用为道德所

① ② 括弧里的惊嘆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③ ④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感化的罪犯是出于同一目的，这就是說，魯道夫把“刺客”变成了密探和奸細。他教他在“校长”<sup>①</sup>面前“伪装”放弃了“不偷的信条”，慫恿这个“校长”去干偷盜的勾当，以便把后者誘入魯道夫所設置的圈套。“刺客”感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演“滑稽戏”。他对这种要他充当密探和奸細的計謀表示抗議。靠着批判的批判的“純粹”詭辯，魯道夫沒有花多大功夫就說服了这个自然之子，使他相信：下流的勾当如果出于“善良的、道德的”动机，就不算是下流的勾当。于是“刺客”就充当了奸細，装着友好和守信的样子，把自己旧时的同伴誘入了致命的陷阱。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第二个阶段。現在我們看到“刺客”在魯道夫病中充当他的看护，把他从垂危中挽救出来。

“刺客”成了这样彬彬有礼的有道德的生物，他为了怕把地毯弄脏，連黑人医生大衛請他坐在地板上他都推辞了。他甚至胆怯到不敢在椅子上坐。他先把椅子放倒在地板上，然后坐在椅子的两个前脚上。每当他称呼被他从垂危中挽救出来的魯道夫为“朋友”或《Monsieur》（“先生”）而沒有叫《Monseigneur》（“殿下”）<sup>②</sup>时，他总是忘不了道歉的。

冷酷無情的自然之子馴服得多么惊人呵！“刺客”給我們揭穿了自己的批判轉变的最玄奥的秘密，他向魯道夫表白說，他对他就像看家狗对自己的主人一样順从：《Je me sens pour vous comme qui dirait l'attachement d'un bouledogue pour son maître》〔“我对您就像看家狗对自己的主人一样順从”〕。昔日的屠夫变成了狗。从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② 公爵和主教的称号。——編者注

此，他的一切德行都將是狗的德行，是狗對主人的絕對“忠順”。他的獨立性、他的個性完全消失了。但是，和蹩腳的畫家不得不在自己的畫上題字來說明畫的內容一樣，歐仁·蘇也在“刺客”這頭“看家狗”的嘴上貼了一張標籤，這就是“刺客”時刻誦之于口的一句話：“‘你有心肝和骨氣’這幾個字使我成了人。”一直到咽最後一口氣，“刺客”都不是在自己的人類個性中尋求自己的行為的動機，而是到這句標籤式的話中去尋找這種動機。他常常想到自己的長處和別人的缺點，以證明自己的道德修養的增進；而每當他滔滔不絕地高談仁義道德的時候，魯道夫總是對他說：“我喜歡你這樣的談吐。”“刺客”成了一頭非比尋常的、有道德的看家狗。

第三個階段。“刺客”的雖粗獷卻勇敢的率直已被他那小市民式的禮儀所代替，對這種禮儀我們已經稱頌過了。現在我們就要看到，同“有道德的生物”這種身分相適應，他也學會了庸人的舉止和風度：

“就他的舉止而言，他可以算做世界上最不討人厭的市民。”

比這外形更可悲的，是魯道夫給他那批判地改革過的生活所賦予的內容。魯道夫把他派到非洲，“給不信神的世界提示一個關於悔過的生動而有益的例證”。從此，“刺客”所表現的就不是他自己固有的人性，而是基督教的教義。

第四個階段。批判的道德上的轉變使“刺客”成了一個溫順的、謹小慎微的人，他的所作所為都被恐懼和世故所節制。

穆爾弗——他由於過分單純，總是洩露家丑——告訴我們：“‘刺客’對懲罰‘校長’這件事閉口不談，因為他生怕連累自己。”

可見，“刺客”知道這種懲罰是違法的行為。他不談這件事，是



因为他怕受牽連。好一个聪明的“刺客”呵！

第五个阶段。“刺客”在自己的道德修养方面已增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他甚至以文明的方式来領会他对魯道夫的那种狗式的忠順。“刺客”搭救了热尔門<sup>①</sup>的性命之后，对他說了这样几句话：

“我有一位保护人，他之于我就如上帝之于神甫；我真願意对他俯首跪拜。”

而在思想中他也确是跪拜在他的上帝面前了。

他繼續对热尔門說道：“魯道夫先生会保护你的。我說‘先生’，虽然我是應該說‘殿下’的。可是我已經習慣于称他为魯道夫先生，而他也允許我这样称呼。”

“多么可貴的覺醒和振奋呵！”——施里加在一陣批判的狂喜中叫道。

第六个阶段。“刺客”最后在救他的殿下时被人刺死了，这样他就轟轟烈烈地結束了他那忠矢不二的有道德的看家狗式的一生。在斯凱萊特<sup>②</sup>正要用刀刺死公爵的那一瞬間，“刺客”抓住了暗杀者的手。斯凱萊特便刺杀了他。而“刺客”在临死时却对魯道夫說：

“我有理由說，像我这样的一撮塵土（这样的看家狗）<sup>③</sup>对于像您这样偉大的殿下有时也許是有点用处的。”

这番狗式的自白以警句的形式概括地表明了“刺客”的全部批判的生涯；自白之外，他在嘴上又附了一張标签：

“我們彼此算是了清宿債了，魯道夫先生。您對我說过我是有心肝和骨气的。”

①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③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施里加先生竭盡全力地叫道：

“魯道夫把這個‘刺客’還給了人類(?)<sup>①</sup>，這是他的一樁多么大的功績呵！”

## (2) 揭露批判的宗教的秘密，或瑪麗花<sup>⊖</sup>

### (a) 思辨的“雛菊”

我們在談歐仁·蘇的瑪麗花以前，還得先談談施里加先生的思辨的“雛菊”。

首先，思辨的“雛菊”是一種修正。因為施里加先生唯恐讀者會從他的設計中得出結論，似乎歐仁·蘇

“使客觀基礎的描述(對“世界秩序”的描述)<sup>②</sup>脫離了那些唯有聯繫這個基礎才能為人所理解的當事的個人力量的發展。”

除了糾正施里加先生的敘述給讀者造成的誤解這個任務以外，雛菊在“我們的史詩”即施里加先生的“史詩”中還執行着另一種形而上學的使命。

“世界秩序和史詩式的事變如果只是互相交錯成一個五光十色的混合體，並變幻神速地時而給我們展現出世界秩序的一鱗半爪，時而給我們演出一幕戲劇，那末這兩者就還沒有藝術地結合為一個真正統一的整體。要形成真正的統一体，就必須使兩種因素——這個混沌世界的秘密同魯道夫借以洞察和揭露秘密的明確、坦率和信心——在一個人身上互相衝突……雛菊也就執行着這個任務。”

① 括弧里的問號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 原文是«Fleur de Marie»,直譯是“瑪麗花”或“花瑪麗”，而施里加用來稱呼瑪麗花的德文字«Marienblume»的含義則是“雛菊”。——編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施里加先生对雛菊的设计跟鲍威尔对圣母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方面是“神类”(魯道夫)，“各种威力和自由”、唯一的能动原则都归之于他。另一方面是消极的“世界秩序”和属于它的人。世界秩序构成“现实事物的基础”。为了使这个基础不致“完全被废弃”，或者为了使“自然状态的最后残余不致被消灭”，为了使世界本身还能分享一些集中在魯道夫（跟世界相反）身上的“发展原则”，为了使“人类的事物不致被描写成绝对不自由的和没有能动性的”——为了这一切，施里加先生就必然要陷入“宗教意识的矛盾”。尽管他把世界秩序同它的活动彼此割裂开，从而造成了僵死的群众和批判(魯道夫)的二元论，他仍然不得不又承认世界秩序和群众也有几分神类的属性，并在雛菊身上构成魯道夫和世界这两者的思辨的统一(见“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第一卷第39页)。

除了房屋主(当事人的“个人力量”)和他的房屋(“客观基础”)之间所存在的实际关系以外，神秘的思辨和思辨的美学都还需要第三个因素，需要具体的、思辨的统一，即需要把房屋和房屋主集诸一身的**主客体**。既然思辨不喜欢仔细地研究天然的中介，那末它就看不出，对于一个人(例如对于房屋主)是“客观基础”的“世界秩序的一鳞半爪”(例如房屋)，对于另一个人(例如对于这栋房屋的建造者)则是“史诗式的事变”。批判的批判指责“浪漫主义艺术”的“统一教条”，可是它现在却力求获得“真正统一的整体”、“现实的统一体”，并且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就像黑格尔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一样。

在批判的雛菊身上“時代的普遍罪過、秘密本身的罪過”之成為“罪過的秘密”，恰如秘密本身的普遍罪過在債台高筑的小鋪老板身上成為債務的秘密一樣。

根據對聖母的設想，雛菊本來應該是救世主魯道夫的母亲。施里加先生也正是這樣宣告的：

“按照邏輯的連貫性的要求，魯道夫應該是雛菊的兒子。”

但他却不是雛菊的兒子，而是雛菊的父亲，於是施里加先生就在這裡面發現了一個“新秘密，即現在所孕育出的常常不是未來，而是早已衰逝的過去”。這還不算，他還發現了另一個更大的、同群眾的統計學直接矛盾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一個孩子如果不也成為父亲或母亲，而是保持着童貞進入墳墓……那末他本質上……是一個女兒。”

施里加先生“根據邏輯的連貫性”把女兒看做她父亲的母亲，他的這種思想同黑格爾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學中一樣，也是兒子生出母亲，精神產生自然界，基督教產生非基督教，結果產生起源。

施里加先生證明，“根據邏輯的連貫性”，雛菊應該是魯道夫的母亲，現在他又證明了一個相反的說法：“為了完全符合她在我們的史詩中所體現的觀念，她決不應該成為母亲。”這就至少說明了，我們的史詩的觀念同施里加先生的邏輯連貫性是互相矛盾的。

思辨的雛菊無非是“觀念的體現”而已。但究竟是什麼樣的觀念呢？“她所依然擔負着的任務仿佛是描繪過去在它自己徹底消逝之前所流出的最後一滴辛酸的眼淚。”她就是比喻的眼淚的繪像；而甚至她在扮演自己的那種渺小角色時，也依然只是“仿佛”而已。

我們不去追究施里加先生對雛菊的進一步描述。我們讓她自

己高高兴兴地遵照施里加先生的指示，“去和每一个人做最坚决的对头”——簡直就和上帝的特性一样神秘的对头。

我們也不去探究那被“上帝埋在入胸中”并为思辨的雛菊所“依然仿佛”指明的“真正秘密”的底細。我們暫且撇下施里加先生的雛菊，調过头来看看欧仁·苏的瑪丽花和魯道夫在她身上所創造的那些批判的奇迹。

### (b) 瑪丽花

我們在罪犯当中看到的瑪丽是一个卖淫妇，是那个罪犯麤集的酒吧間老板娘的奴隶。尽管她处在極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羈和人性的优美。这些品質感动了她周圍的人，使她成为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詩意的花，并获得了瑪丽花这个名字。

对瑪丽花必須从她初出場起就做細密的观察，这样才能把她的本来的形象和批判的变态做一个对比。

瑪丽花虽然十分纖弱，但立刻就表现出她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潑、生性灵活的，只有这些品質才能說明她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

她拿起剪刀来抵抗用拳头打她的“刺客”。这是我們初次遇見她的情景。在这个場面中，她不是一个毫無反抗地屈服于暴力之下的沒有防御能力的羔羊，而是一个善于捍衛自己的权利和能够坚持斗争的女郎。

在費維街的罪犯們的酒吧間里，她向“刺客”和魯道夫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叙述时她用笑来回答“刺客”的挖苦。她埋怨自己在出獄以后沒有去找工作，而把在獄中賺得的300法郎統

統花在游逛和裝飾上，“但是沒有人勸告我呀”。回想起自己生活中的灾难——卖身于罪犯酒吧間的老板娘，她感到很悲伤。現在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追怀这一切往事。“真的，我想起过去就伤心……做个誠实的人想必是很好的。”“刺客”嘲笑道：“就讓她做个誠实的人好啦！”于是她叫道：“誠实，我的天！你說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誠实！”她坚决声明，“我决不哭鼻子”（«je ne suis pas pleurnicheuse»），但她的生活境遇是可悲的——“这是很不愉快的”。最后，跟基督教的懺悔相反，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提出了这样一条斯多葛派的同时也是伊壁鳩魯派的人性原則，这是自由而坚强的人的原則：

“到头来，做过的事情就讓它过去吧！”

現在我們来看看瑪丽花和魯道夫的第一次散步。

“你想到自己那种可怕的处境，恐怕是常常感到痛苦的吧？”——已經非常渴望来一場道德談話的魯道夫說。

她回答道：“是的，我曾經不止一次地透过河岸的栏杆凝視着塞納河，可是，过后我又轉过来看着花，看着太陽，并且自言自語地說：河始終会在这里，可是我还没有滿十七岁呵，誰会知道呢？在这一刹那間，我覺得我不應該有这样的命运，我覺得自己身上有某些好的地方。我对自己說：我的苦是受够了，但是至少我从来没有害过什么人。”

瑪丽花把她的处境不是看做她自己自由創造的結果，不是看做她自己的表露，而是看做她不應該遭受的命运。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她还很年輕。

瑪丽所理解的善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太陽和花給她揭示了她自己的像太

陽和花一樣純潔無瑕的天性。最後，她之所以**善良**，是因為她還年輕，還充滿着希望和朝氣。她的境遇是**不善的**，因為它給她一種反常的強制，因為它不是她的人的本能的表露，不是她的人的願望的實現，因為它令人痛苦和毫無樂趣。她用來衡量自己的生活境遇的量度不是**善的理想**，而是她**固有的個性、她天賦的本質**。

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資產階級生活的鎖鏈脫去了，瑪麗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豐富的感受以及對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所有這一切都證明，她在社會中的境遇只不過傷害了她的本質的表皮，這種境遇大不了是一種歹運，而她本人則既不善，也不惡，就只是**有人性**。

“魯道夫先生，多麼幸福呵！……青草、原野！……要是您允許我下車去就好啦…… 這裡真好…… 我真想在這片草地上跑一下！”

她走下馬車，給魯道夫摘了許多花，“幾乎高興得說不出話來”，等等，等等。

魯道夫告訴她，他要帶她到若爾日夫人<sup>①</sup>的農場上去。在那裡，她將會看到鴿房、馬廄之類的東西；那裡有牛奶、乳酪、水果等等。對這個孩子說來，這真是上天的恩賜。她會很痛快的——這就是她的主要的想法。“您甚至不能想像我是多麼想痛快痛快呵！”她非常坦率地向魯道夫說，她的不幸是她自作自受：“過去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因為我不會節省錢的緣故。”於是她勸他節儉，並勸他把錢存入儲蓄銀行。她完全浸沉在魯道夫為她建造的空中樓閣里。她之所以陷於悲哀，只是因為她“忘記了現在”，而“這種現在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為魯道夫管理農場。——譯者注

同关于愉快光明的生活的幻想相对照，使她想起了自己的境遇的極端可怕”。

到現在为止，我們所看到的都是瑪麗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象。在这里，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狹隘的世界觀的界限。他打击了資產階級的偏見。現在他把瑪麗花交到主人公魯道夫的手中，以便弥补自己的孟浪無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采。

受魯道夫之托照看瑪麗花的若尔日夫人是一个不幸的、患憂郁病的、信教的妇人。她一見到这个年輕的姑娘，就馬上說一些非常动听的話，說什么“上帝保佑那些又愛他又怕他的人、那些曾經不幸并已經悔悟的人”。“純批判”的偉人魯道夫喚来了一个可怜的、迷信極深的教士拉波特<sup>①</sup>。他指定这个牧师对瑪麗花进行批判的改造。

瑪麗欢欢喜喜、坦率天真地同这个老教士接近。欧仁·苏怀着他所固有的基督教式的粗暴，要“可惊嘆的本能”对瑪麗耳語：“在开始懺悔和贖罪的地方要結束羞慚”，这就是說，在唯一济度世人的教堂里不要害羞。他忘記了她在乘車遨游时的那种愉快的坦率、那种由大自然的美和魯道夫的友好同情所引起的兴高采烈；当时她只是由于想起必須回到罪犯酒吧間老板娘的身边，这种兴高采烈的心情才沮丧下来。

拉波特教士立即摆出了**超凡出世的姿态**。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上帝的仁慈是無穷尽的，我的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上帝都沒有弃絕你，这就可以証明这一点…… 救你于絕境的这位寬大为怀的人实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魯道夫的农場中的牧师。——譯者注



現了聖經上的話(注意:不是實現人的目的,而是實現聖經上的話)<sup>①</sup>:人有呼主之名者,主將庇佑之;人有呼主者,主將成就其心願;主將聞听其呻吟并拯救之……主將完成自己的事業。”

瑪麗還沒有明了教士這番說教的險惡的用意。她回答說:

“對我仁慈并使我回到了上帝那里去的人,我將為他祈禱。”

她最先想到的不是上帝,而是她那人世的救星,她想為他祈禱,而不是為她自己的赦免祈禱。她希望自己的祈禱能使別人得救。此外,她竟天真到以為自己已經回到上帝面前了。教士認為自己必須來打破這種有違神道的錯覺。

他打斷了她的話,說道:“很快,你很快就會得到赦免,赦免你那深重的罪孽……因為,正如先知者所說,主保佑一切行將墮落的人。”

請注意牧師言談中的違反人性的話。你很快就會得到赦免!你的罪惡還沒有得到寬恕。

拉波特在同姑娘見面時竭力在她心中喚起自己有罪這種意識,而魯道夫在同姑娘臨別時則送了她一個金十字架,這是她即將受到基督教磔刑的象徵。

瑪麗在若爾日夫人的農場上已經住了一個時期。我們先來偷聽一下老教士拉波特和若爾日夫人的談話。他認為瑪麗是不能“嫁人”的了,“因為,儘管有他拉波特擔保,也沒有一個男人有勇氣忽視那玷污了她的青春的過去”。他接着又補充說,她“必須贖補大的罪惡”,而“如果她有道德感的話,她是不會墮落的”。他證明她有可能像那些下流到極點的小市民一樣保持自己的清白:“在巴黎有很多樂善好施的人。”這個偽善的牧師知道得很清楚,這些樂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善好施的巴黎人每时每刻都遇見那些直到半夜还在最熱鬧的街頭叫賣火柴(瑪麗也曾經這樣做過)的七八歲的小女孩,可是他們總是無動于衷地從她們面前走過;而這些小女孩未來的命運也幾乎毫無例外地和瑪麗的命運一樣。

教士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要瑪麗贖罪。他在自己的心中給瑪麗定了罪。現在我們來看看瑪麗花在傍晚送拉波特回家時兩人散步的情形。

“你看呵,我的孩子!”——他開始了熱烈動人的談話——“看那一望無涯的天際,這天際的界限現在無法分辨了(這已是黃昏時候了)<sup>①</sup>。我覺得,萬籟俱寂和無邊無際幾乎能讓我們產生一種永恆的觀念……瑪麗,我對你說這些,是因為你易于感受造物之美……看到這造物之美在你心中,在你那長久喪失宗教感情的心中激起了宗教崇拜,我常常是深為感動的。”

教士已經成功地把瑪麗對於大自然美的純真的喜愛變成了宗教崇拜。對於她,自然已經被貶為適合神意的、基督教化的自然,被貶為造物。晶瑩清澈的太空已經被黜為靜止的永恆性的暗淡無光的象徵。瑪麗已經領悟到,她的本質的一切人性表現都是“罪孽深重”的,這些表現背棄了宗教,違悖了真正的神恩,這些表現是離經叛道、褻瀆神靈的。教士必須使她感到自慚形穢,必須把她的自然的和精神的力以及各種自然的賦與都化為灰燼,以便使她能夠接受他所許給的超自然的賦與,即接受洗禮。

當瑪麗想要對教士有所告白並祈求他寬恕的時候,他回答說:

“主已經向你證明他是仁慈的。”

瑪麗不應當把她所受到的寬恕看做同一種人類造物對她這同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一种人类造物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关系，而应当把这看做一种無限的、超自然的、超人类的仁慈和寬恕，应当把人的寬恕看做上帝的仁慈。她必須把一切自然的、人类的关系化为对上帝的彼岸关系。瑪丽花对牧师关于上帝仁慈的空談所做的回答，表明宗教教义已經把她腐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她說，她一进入新的、良好的环境，就只是感到新的幸福：

“我曾經每一分鐘都在想念着魯道夫先生。我时常抬头望着天，但不是在那里找上帝，而是找魯道夫先生，好向他道謝。是的，我在这一点上責备了我自己，我的神甫；过去我想念他比想念上帝为多；因为他为我做了唯有上帝才能做出的事情……我是幸福的，幸福得跟永远逃脫了大險的人一样。”

对新的、幸福的生活境遇只是如实地感到是一种新的幸福，也就是对这种境遇抱着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态度，这在瑪丽花看来已經是不可饒恕的了。她已經譴責自己不該把救她的人如实地看做自己的救星，而沒有用想像中的救星——上帝来代替他。她已經为宗教的伪善所支配，这种伪善把我对別人的感恩拿过来归之于上帝，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違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

瑪丽告訴我們，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和她对生活的态度的宗教的轉变，應該归功于若尔日夫人和拉波特的教誨：

“当魯道夫把我帶出巴黎最古老的地方的时候，我已經朦朧地意識到我的地位的卑下，但我从您和若尔日夫人那里所得到的教誨、劝导和榜样，使我能够領悟到……我过去与其說是不幸，还不如說是有罪……您和若尔日夫人使我懂得了我的罪孽是無限深重的。”

这就是說，她应当感謝拉波特教士和若尔日夫人的，是充滿她心中的已經不是自己地位卑下这样一种人的、因而也是可以容忍

的意識，而是自己罪孽無限深重这样一种基督教的、因而也是不可容忍的意識了。这个教士和这个巫婆教会了她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譴責自己。

瑪丽感到她所遭到的精神上的不幸是非常巨大的。她說：

“既然善惡意識的覺醒对于我是这样的可怕，那末为什么不讓我由不幸的命运去摆布呢？……要是听我淪落在过去的火坑中，也許貧困和毒打很快就断送了我的性命，而对于这种無論我怎样渴望也始終得不到的純潔，我至少是可以毫不知道便了此一生的。”

毫無心肝的教士回答道：

“就是品性最高尚的人，只要他在你被救出的污泥中呆过一天，出来后也会在額上留下一个洗不掉的污点。这就是神的司法不可动搖的法則。”

瑪丽花被教士这种巧舌如簧的詛咒深深地刺痛了，她叫喊道：

“那末，您看出我是命定該絕望的罗！”

这个宗教的老奴回答說：

“你必須拋棄想从自己的生活中撕掉这可悲的一頁的任何希望，但是你应该期望上帝的無限仁慈。在这里，在塵世上，可怜的孩子，你应得的一份是眼泪、懺悔、贖罪；但有一天在那里，在天堂中，你将得到赦免和永恒的福祐。”

瑪丽还没有痴愚到要到天堂的永恒福祐和赦免中去寻求慰借的地步。

“可怜可怜我吧”，——她叫道，——“可怜可怜我吧，天呀！我还这样年輕……我多么不幸呵！”

这时，牧师的伪善的詭辯达到了極点：

“恰巧相反，这是你的幸福，瑪丽，是你的幸福！主使你受到良心的譴責，这种譴責虽然充滿了痛苦，但却是与人为善的。它証明你的灵魂有宗教的感受性……你所受到的每一点苦难都会在天上得到补偿。相信我的話，上帝

一时把你放在邪路上，是为了以后讓你能得到**懺悔的榮譽**和**贖罪**所应有的永恒的奖励。”

从这一瞬間起，瑪丽便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識的奴隶。如果說，以前她在最不幸的环境中还知道在自己身上培养可爱的人类个性，在外表極端屈辱的条件下还能意識到**自己的人的本質是自己的真正本質**，那末現在，却是从外面损伤了她的現代社会的污浊在她眼中成了她的**內在本質**，而因此經常不断地憂郁自責，就成了她的义务，成了上帝亲自为她預定的生活任务，成了她存在的目的本身。如果說以前她还自夸：“我决不哭鼻子”，并且說“做过的事情就讓它过去吧”，那末在現在，对于她，折磨自己就成了**美德**，而懺悔則成了**榮譽**。

后来發現，瑪丽花原来是魯道夫的女兒。我們再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是盖罗尔施坦郡主了。我們現在偷听一下她同她父亲的談話：

“我祈求上帝把我从这些迷茫中解脫出来，讓充滿在我心中的单只是对上帝的虔誠的爱和神聖的希望，最后，我祈求上帝完全掌握着我，因为我想全心全意地皈依于他，但是我的这些祈求都落空了……他不听取我的祈禱……不用說，这是因为我对塵世的眷戀使我不配同上帝交往。”

一个人既然把自己的迷誤看做**瀆犯上帝的無限罪行**，那末他就只有**完全皈依上帝**，对塵世和世俗的事情**完全死心**，才能确信自己的得救和上帝的仁慈。瑪丽花既然已經領悟到使她解脫非人的境遇是神的**奇迹**，那末她要配得上这种**奇迹**，她自己就必須成为**聖徒**。她的人类的爱必須轉化为宗教的爱，对幸福的追求必須轉化为对永恒福祐的追求，世俗的滿足必須轉化为神聖的希望，同人的交往必須轉化为同神的交往。上帝应当完全掌握住她。她自己給

我們揭穿了为什么上帝不肯把她完全掌握住的秘密。她还没有全心全意地**皈依**上帝，她的心还困惑于塵世的事情。这是她那健全的天性的最后一次閃光。她终于完全皈依上帝了，因为她完全脱离了塵世，入了修道院。

“人若有罪愆，  
深重不可贖，  
送进修道院，  
朝以繼暮，  
曠日無間，  
悔悟乐無窮。”

(歌德)78

在修道院中，由于魯道夫的陰謀詭計，瑪麗花得到了**女修道院**長的聖職。起初她認為自己不够格，拒絕接受这个职位。旧任女修道院長遂加以劝說：

“我再多两句嘴，我亲爱的女兒，你在进教会以前的生活是十分純潔可嘉的，但如果說它也充滿了迷惘的話，那末，自从你到我們这里以后所表現的福音德行的榜樣，在主的**眼中**已經**补救和贖償**了任何罪孽深重的既往。”

我們从女修道院長的話中可以看出，瑪麗花的世俗德行已經变成了福音德行，或者更正确地說，她的实际德行必須采取福音的、**漫画**的形式。

瑪麗回答女修道院長的話說：

“聖姑，我認為現在可以同意接受这个职位了。”

修道院的生活不适合于瑪麗的个性，結果她死了。基督教的信仰只能在想像中給她慰借，或者說，她的基督教的慰借正是她的現實生活和现实本質的消灭，即她的死。

魯道夫就这样先把瑪麗花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在埋葬她的时候致悼詞的，除了天主教的神甫以外，还有批判的神甫施里加。

施里加把她的“無辜的”存在称为她的“短暫的”存在，并把这种存在同“永恒而难忘的罪愆”相对照。他贊頌她，說她的“最后一口气”是“祈求仁慈和寬恕”。新教牧师在先叙說一遍主的恩賜的必然、死者对一般原罪的分担和自認有罪这种意識很强以后，接着就一定要轉而对死者的德行来一番世俗的贊揚；同样，施里加先生也使用了一套这样的詞句：

“而她本人还是没有什么需要寬恕的。”

最后，他在瑪麗的墓上放了一束教会辞令的最枯萎干癟的花朵：

“她怀着人所罕有的內心純潔而与世长辞了。”

阿門！

### (3) 揭露法紀的秘密

#### (a) “校长”，或新的刑罰理論。单人牢房制的 被揭露了的秘密。医学的秘密

“校长”是个海格立斯型的、精力充沛的罪犯。按他的教育程度來說，他是个有教养有学識的人。他这个性如烈火的大力士同資產階級社会的法律和習慣是相冲突的，因为資產階級社会的一般标准是平庸無能、温文嬌弱和暗中交易。他成了一个杀人犯，像一个秉性强悍而無从找到适当的合乎人性的活动的人那样放蕩不

羈、荒淫無度。

魯道夫捉住了这个罪犯。他想批判地改造他，想用他給法律界創造一个范例。他同法律界的爭端不是“刑罰”本身，而是刑罰的**种类和方式**。用黑人医生大衛的特殊的話來說，魯道夫發明了这种刑罰理論，他就有資格成为一个“最偉大的德国刑法学家”，并且从此以后这种理論甚至有幸获得一个具有德国式的严肃和德国式的徹底的德国刑法学家的拥护。魯道夫甚至沒有想到他可以超出刑法学家之上；他的野心是想成为一个 *primus inter pares*〔庸中佼佼〕的“最偉大的刑法学家”。他命令黑人医生大衛弄瞎了“校长”的眼睛。

起初，魯道夫重复着反对死刑的种种老生常談，說什么死刑对罪犯沒有任何效用，对人民也沒有任何效用，因为人民把杀人只当做一种聊以消遣的把戏来觀賞。

此外，魯道夫又把“校长”和“校长”的靈魂加以区别。他所关心的不是拯救实际的“校长”这个人，而是从精神上拯救他的靈魂。

他教訓說：“拯救靈魂是神聖的事業…… 救世主說过，每一件罪行都能够贖补，但只有誠心想懺悔和贖罪的人才能如此。从法庭到断头台的过渡是太短促了…… 你（“校长”）<sup>①</sup> 曾經濫用自己的力气来为非作歹，現在我要叫你使不出你的力气…… 你將要在最軟弱的人面前發抖…… 对你的懲罰將和你的罪行相等…… 但这种可怕的懲罰至少还会給你留下悔改的無限境界…… 我只使你离开外界，目的是要你沉沒在漆黑如夜的昏暗中，单独地回想自己的惡行…… 你将不得不反躬自省…… 被你貶得一錢不值的意識将会覺醒并把你引向悔悟。”

魯道夫認為靈魂是神聖的，而人的肉体則是非神聖的，所以他

---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只把灵魂看做真正的本質，因为——按照施里加先生对人类的批判描述——灵魂是属于天国的；既然如此，所以“校长”的肉体和他的力气就不是属于人类的了，这种力气的生命表现就不应加以合乎人性的改造，不应归还给人类，不应把这种力气当做本質上是人类的東西来处理。“校长”曾經濫用自己的力气，現在魯道夫則麻痺、摧殘、消灭这种力气。要摆脱人类的某种本質力量的变态表现，除了消灭这种本質力量，就沒有更批判的手段了。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手段：眼睛作恶就挖掉眼睛，手作恶就砍掉手，总之，肉体作恶就杀害肉体，因为眼睛、手、肉体对于人本来都只是多余的、罪恶的附屬品。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群众的法学在这方面同“批判的”法学不謀而合，也認為摧殘、麻痺人的力量是对这些力量的有害表现的解毒剂。

在普通的刑法学中使純批判的偉人魯道夫感到惶惑不安的，只是从法庭轉到断头台的过程太快了。与此相反，他是想把对罪犯的复仇同罪犯的贖罪及其对自身罪恶的認識結合起来，把肉体的惩罚同精神的惩罚、感官的痛苦同懺悔的非感官的痛苦結合起来。世俗的惩罚同时必須是基督教道德教育的手段。

这种把法学和神学結合在一起的刑罚理論，这种“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天主教教会的刑罚理論而已，这一点边沁在他的著作“惩罚和奖賞的理論”中已經詳尽地表明了。在这部著作中，边沁还証明了現今的各种刑罚在道德上是毫無效驗的。他把法律所規定的种种刑罚称之为“法庭打油詩”。

魯道夫給“校长”的惩罚也就是奧力金自己給自己的那种惩罚。魯道夫閹割了“校长”，夺去了他的一个生殖器官——眼睛。“眼睛是身体的明灯”。魯道夫正是采取了弄瞎眼睛的手段，这使

他的宗教本能增光不少。这就是过去在純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所通用的刑罰，这种刑罰在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英吉利和法兰西的强盛的青年时代也曾經盛極一时。为了要人改邪归正，就使他脱离感性的外部世界，强制他沉沒于自己的抽象的内心世界——弄瞎眼睛，这是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所得出的必然結論；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充分地实现这种分离，使人完全和世界隔絕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唯灵論的“我”，这就是**真正的德行**。如果說魯道夫沒有像在拜占庭和法兰克王国那样把“校长”安置在真正的修道院中，那末他至少也把他禁錮在观念的修道院中了，这是不为外界的光亮所扰的漆黑如夜的修道院，是寂靜無为的良心和自認有罪这种意識的修道院，在这种修道院中栖身的只是一些虛幻的回忆的影子。

一种思辨的羞愧之心不允許施里加先生公开承認他的主人公魯道夫的刑罰理論，即世俗的懲罰同基督教的懺悔和贖罪相結合的理論。他不是这样公开地承認，而是偷偷地塞給魯道夫——当然也是当做被初次揭露于世的秘密——一种理論，即懲罰应当使罪犯成为制裁他“本身”罪行的“法官”。

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本身的秘密是黑格尔的刑罰理論。黑格尔認為刑罰是罪犯自己給自己宣布的判決。甘斯更詳細地發揮了这种理論。黑格尔的这种理論是对古代 *jus talionis* [报復刑]⊖的思辨的掩飾，康德曾把这种刑罰發展为法律上唯一的刑罰理論。黑格尔所謂的罪犯自我定罪只不过是一种“理念”，只不过是对通行的經驗刑罰的一种思辨解釋。因此，他还是听憑国家在每一个發

---

⊖ 按以牙还牙的原則处刑的法律。——編者注

展阶段上選擇刑罰的形式，也就是說，他听憑刑罰保持它的現狀。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比起他的批判的应声虫来更是一个批判家。那种承認罪犯也是人的刑罰理論，只能在抽象中、在想像中做到這一點，這正是因為刑罰、強制是和人类的行為方式相矛盾的。況且，真正實行這種理論會是不可能的。抽象的法律會被純主觀的武斷所代替，因為在每一個案件中如何使刑罰符合罪犯的個性，都得以那批“道貌岸然的”官方人士來決定。柏拉圖已經懂得法律一定是片面的，一定是不考慮個性的。相反地，在合乎人性的關係中，刑罰將真正只是犯了過失的人自己給自己宣布的判決。誰也想不到要去說服他，使他相信別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強力就是他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強力。相反地，他將看到別人是使他免受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刑罰的自然的救星，也就是說，關係將恰好顛倒過來。

魯道夫說出了他那諱莫如深的想法，也就是揭穿了弄瞎眼睛的目的，他對“校長”說：

“你的每一句話都將是祈禱。”

他想教會他祈禱。他想把這個海格立斯型的強盜變成一個全部工作只是祈禱的修道士。跟這種基督教的殘忍相比較，那種想消滅某人就干脆殺某人的頭的普通刑罰理論，顯得是多麼的人道。最後，很显然，每當真正的群眾的立法嚴肅地提出了感化罪犯的任務的時候，它所採取的行動比這個德國的赫倫·挨·力斯怯得<sup>①</sup>的行為要合理和人道得多。跟弄瞎“校長”的眼睛這回事比起來，四個荷蘭農業移民區和亞爾薩斯的奧斯特瓦爾德罪犯移民區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嘗試。就跟魯道夫毀了瑪麗花和“刺客”一樣，他

<sup>①</sup> “天方夜譚”中的人物，為一理想化的回教國王。——譯者注

也毀了“校長”；他讓瑪麗花去受教士的折磨，受自己有罪這種意識的折磨；他剝奪了“刺客”的人的獨立性並把他貶低到看家狗的卑下地位；他為了使“校長”學會“祈禱”，便挖了他的雙眼；他就这样把三個人都毀了。

受了“純批判”的“簡單”改造以後的各種現實就是這個樣子，也就是說，這種種現實乃是對現實的歪曲和脫離現實的毫無意義的抽象。

在施里加先生看來，弄瞎了“校長”的眼睛以後，立即就完成了**一個道德的奇蹟**：

“令人生畏的‘校長’——施里加告訴我們說——**突然承認了誠實和正直的力量**；他向‘刺客’說：是的，我相信你，你是從來沒有偷過東西的。”

不幸得很，在歐仁·蘇的書中還保留着“校長”對“刺客”的評價，其中正好也承認了這一點，但這決不會是瞎了眼睛的結果，因為這是在瞎眼睛之前說的。“校長”曾私下對魯道夫談論過“刺客”，他說：

“不過，他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不会的，他是一个好人……过去他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这样一来，施里加先生的道德的奇蹟就化為烏有了。現在我們來看看魯道夫的**批判**的治療所得到的**真正結果**。

首先，我們看到“校長”同“貓頭鷹”<sup>①</sup>一起旅行到布克伐爾農場去，想在那里惡毒地愚弄瑪麗花一番。支配着他的當然是向魯道夫報仇的念頭，而他也只能形而上學地向魯道夫報仇，也就是故意跟魯道夫作對，偏要挖空心思去做“壞事”。“他奪去了我的視力，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但是沒有使我丟掉作惡的念頭。”“校長”告訴“貓頭鷹”，為什麼他叫人把她找來：

“我感到很無聊，我在這些誠實的人當中完全是孤獨的。”

如果說，歐仁·蘇由於他對人的自暴自棄有僧侶般的、獸性的偏愛，以至於讓“校長”跪在老潑婦“貓頭鷹”和小惡棍“癩子”<sup>①</sup>的跟前，哀求他們不要離棄他，那末，這個大道學家是忘記了，這樣就會使“貓頭鷹”感到惡魔式的自滿。魯道夫本來想要罪犯相信**肉體暴力**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他用暴力弄瞎了罪犯的眼睛，結果向罪犯証明了**肉體暴力**的強大；同樣，歐仁·蘇也在这里教“校長”恰如其分地承認了**完滿的情欲**的有力。他教他懂得，沒有這種完滿的情欲，人就不再是男子，而變成了孩子們肆意嘲笑的对象。他使他相信，世界應該承受他的罪惡，因為他一失掉視力，就受到了這個世界的折磨。歐仁·蘇現在剝奪了“校長”的最后一點人的幻想，因為“校長”曾經相信“貓頭鷹”對他是忠誠的。他有一次對魯道夫說：“她可以為我赴湯蹈火。”然而，歐仁·蘇為了充分地滿足自己的欲望，竟使“校長”在極度絕望之余，脫口喊出了：

“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吶！”

他學會“祈禱”啦！於是歐仁·蘇先生就在“這種對上帝仁慈的無意的祈求中”看到了“某種天意”。

這種無意的祈禱是魯道夫的批判的第一個結果。接踵而來的是在布克伐爾農場上的**非自願的懺悔**，在那里，“校長”夢見了被他殺害的人的幽靈。

---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我們暫且放過對這個夢的極其詳細的描述，轉過來看看“紅手”的地窖中的情景，在那里我們會看到被批判地改造過的“校長”，他戴着鐐銬，被老鼠咬得遍體鱗傷，餓得半死不活，被“貓頭鷹”和“癩子”折磨得瘋瘋癲癲，像一頭野獸那樣嗥叫着。“癩子”把“貓頭鷹”交到他手里。我們且看看“校長”在動手弄死“貓頭鷹”時的情形。他不僅在表面上模仿主人公魯道夫的樣子，挖出了“貓頭鷹”的雙眼，而且也在精神上學習魯道夫的榜樣，重復他那偽善的言辭，用假仁假義的詞句來掩飾自己的殘暴行為。當“貓頭鷹”剛剛落入“校長”的掌握中的時候，“校長”表現出“令人恐怖的高興”，他的聲音由於狂怒而發抖。

他說：“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想馬上就結束你的性命……我要以牙還牙，你折磨了我，我現在也要折磨你……在殺死你以前，我要跟你長談一次……這對於你是可怕的。首先，你看到沒有……自從我在布克伐爾農場做了那個夢以來，我有了很驚人的改變……在那個夢里，我們過去的一切罪行都顯現在我的眼前，那個夢幾乎使我發瘋……它將來會使我發瘋的……我對自己以往的殘暴感到可怕……我沒有容許你虐待夜鶯<sup>⊖</sup>，不過這還是小事……你把我誘騙到這個地窖里，讓我在這裡挨餓受凍……你把我一個人留下，使我產生一些可怕的念頭……呵，你不知道孤獨是什麼滋味……孤獨洗淨了我的靈魂。我不認為這是可能的……我也許沒有以前那樣壞了，證據就是，在這裡抓住你，……抓住你這個惡魔，我感到無限的快樂……我抓住你不是為了給自己報仇，而是……而是為我們的受害者報仇……是的，我要履行自己的職責，親手懲罰自己的同謀犯……現在我對自己以往的行凶殺人感到恐怖，雖然這樣，但我還是要毫無恐懼、完全泰然自若地用非常殘酷的手段狠狠地把你弄死，對這一點你不會感到奇怪嗎？……你說……你說……你懂得這點嗎？”

在這不多的幾句話中，“校長”匆匆地彈出了道德詭辯的全部

⊖ 即瑪麗花。——編者注

音阶。

他开头的几句话是复仇心的**公开表露**。他宣称要以牙还牙。他想杀死“猫头鹰”，他想用冗长的说教来延长她死前的痛苦，而他用来折磨她的那一套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诡辩！）完全是道德的说教。他硬说在布克伐尔的那一场梦感化了他。同时他又给我们揭穿了**这个梦的真正的作用**，他承认这个梦几乎使他发疯，而且将来也还是会使他发疯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改邪归正，他举出了这个事实：他曾经阻止人们虐待玛丽花。欧仁·苏书中的人物（先是“刺客”，在这里是“校长”），必须把他这个作家本人的意图（这种意图决定作家使这些人物的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他们必须经常不断地说：我改正了这一点、那一点，以及那一点，等等。因为他们不是过着真正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只得在自己的言谈中竭力强调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在这里，保护玛丽花即是一例）的意义。

“校长”既然告诉了我们在布克伐尔的那场梦有着教人行善积德的作用，那末他就还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欧仁·苏把他关在地窖里。他应该表明小说作者的做法是合理的。他应该对“猫头鹰”说，你把我关在地窖里，让老鼠来咬我，害我饱受饥渴之苦，这种种做法促使我完全改邪归正了。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

“校长”对“猫头鹰”发作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嗥叫、那种肝胆欲裂的狂怒、那种极其可怕的复仇心，是对这种道德辞令的辛辣的嘲弄。这种种表现给我们揭穿了“校长”在牢房中所产生的那些念头的性质。

“校长”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既作为一个批判的**道学家**，他就能够调和这些矛盾。

他正是把由于“猫头鹰”落入自己掌握中而引起的“無限的快乐”宣布为自己改邪归正的标志。他的复仇心不是自然的复仇心，而是道德的复仇心。他不是想为自己报仇，而是想为他和“猫头鹰”的共同的受害者报仇。他杀死“猫头鹰”并不算杀人，而是履行职责。他不是向她报仇，而是以一个公正的法官的身分来惩罚自己的同谋犯。他对自己以往的行凶杀人感到恐怖，虽然如此（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诡辩感到惊奇），但他却问“猫头鹰”：对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吗？——我要毫无恐惧、完全泰然自若地杀死你！同时，由于某种未表明的道德原因，他竟然沉醉于他想去干的杀人勾当——“狠狠地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弄死”——的情景中了。

“校长”杀害“猫头鹰”这件事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特别是在她对他表现得这样残酷以后更是如此。但是，他的杀人之出于道德的动机，他对自己因即将“狠狠地把人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杀人而惨无人性地感到快乐这一层给予道德的解释，他正好是以犯下新的杀人罪行来证明自己以往对以往的杀人行凶的懺悔，他从一个普通的杀人犯变成一个曖昧的、有道德的杀人犯；凡此种种都是魯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获得的輝煌成果。

“猫头鹰”想从“校长”的手中掙脱出来。“校长”觉察到了这一点并牢牢地抓住她。

“你还是站着别动的好，‘猫头鹰’！我必须彻底向你说明我是怎样逐渐达到悔悟的……这种解说你听起来是会不愉快的……它会向你证明，我在为我们的受害者向你报仇的时候必须残忍才行……我必须赶快讲完……当我想到我把你抓在手中的时候，我就快乐得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我要强迫你听我讲话，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来使你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怖……我的眼睛瞎了……但我的思想却变成了具体有形的，所以我能够在想像中不断鲜明地、几乎可以感触到地描绘出……我的受害者的轮廓。观念



几乎像物質一样銘刻在我的头脑中。如果在懺悔之余再加上严酷得可怕的贖罪……这贖罪把我們的生活变为漫长的不眠之夜，其中充滿了复仇的幻覺和絕望的思念……那末，在受到良心的苛責并終于悔悟以后，也許会得到人們的寬恕。”

“校长”繼續滔滔不絕地大談其虛偽的空話，这种空談每时每刻都显露出它的偽善。“猫头鷹”必須听他講他怎样一步一步地达到悔悟。这种解說对于她会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它会証明，“校长”的職責就是不为自己而为他們大家的受害者来無情地向她报仇雪恨。“校长”突然中断了他的訓話。如他自己所說，他必須“赶快”結束他的訓話，因为他想到他把她抓在手中的时候，就快乐得全身的血完全沸騰起来，这是縮短訓話的道德上的理由。然后他又使自己的血液平靜下来。原来他对她說教的这一段長時間，对于他的报仇并不算是損失，因为这段時間“使她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怖”。又是一个繼續說教的道德上的理由！正是因为这些道德上的理由，所以“校长”能够泰然自若地又接着他剛才中断片刻的地方繼續說起教来。

“校长”正确地描述了一个与外界隔絕的人的情形。一个人，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觀念，那末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觀念变为感性的实物。他想像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这就是一切虔誠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瘋癲的共同的表现形式。“校长”老是重复着魯道夫的口头禪，說什么“痛苦异常的懺悔和贖罪是强有力的”云云；他这样反复叨念，所以已經像个半瘋半癲的人了；他的这种現身說法，鮮明地証明了，在基督教的自認有罪这种意識和神經錯乱之間有真正的联系。同样，“校长”既把

生活之变成充滿幻影的**梦夜**看做**懺悔和贖罪**的真正結果，那末他就給我們揭穿了純批判和基督教感化的真正的秘密。这种秘密也就正在于人变成幻影，人的生活变成一連串的**梦境**。

欧仁·苏在这里感到，这瞎眼强盜对“猫头鷹”的举动会敗坏魯道夫所啓示給他的**拯救灵魂**的思想。所以他就在“校长”的口中塞进了下面这句话：

“这些思想的有益的影响就在于平息了我的狂怒。”

可見，“校长”供認了他的**道德憤懣**不外是世俗的狂怒而已。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力量……决心来杀死你……不，我不能叫你流血……这会是……杀人（他說出了事物的真正的名称）<sup>①</sup>……也許是情有可原的杀人……但这終究是杀人。”

“猫头鷹”利用适当的时机用匕首刺伤了“校长”。現在欧仁·苏可以讓“校长”动手杀死“猫头鷹”，而不再繼續道德的詭辯了。

“他痛得大叫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襲击，立刻把他的复仇心、他的暴怒、他那嗜杀成性的本能全都激發起来，像一团烈火那样熊熊地燃燒起来，这一切突然以非常駭人的力量爆發出来。他那先前已被震动的神智現在完全混乱了…… 呵，你这条蛇！…… 我尝到了你的牙齿的滋味…… 你会像我一样的**沒有眼睛**……”

他挖掉了她的双眼。

“校长”的天性通过魯道夫的治疗只是被伪善和詭辯裝飾起来，只是被禁欲般地压制下去；現在，当这种天性汹涌澎湃地冲出藩篱，造成爆發的时候，这种爆發就显得更有害更可怕。欧仁·苏承認，“校长”的理性已經被魯道夫所策划的一切事件狠狠地震动

<sup>①</sup>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了；承認这一点倒是值得感謝的。

“他的理性的最后一点閃光在这惊心动魄的嗥叫中、在这該死的家伙的嗥叫中消失了(他看見了被他杀害的人們的幽灵)①……‘校长’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野兽那样怒吼着和咆哮着……他把‘猫头鷹’活活地折磨死了。”

施里加先生喃喃地叨念着：

“‘校长’不能有‘刺客’那样快的(!)②和幸运的(!)③轉变(!)④。”

正如魯道夫使瑪麗花成了修道院的住戶一样，他也使“校长”成了畢塞特神經病院的住戶。魯道夫不仅麻痹了他的肉体力量，而且也麻痹了他的精神力量。而这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因为“校长”不仅用他的肉体力量作过孽，而且也用他的精神力量作过孽，而按照魯道夫的刑罰理論，凡是有罪的力量都应当消灭。

但是現在，在欧仁·苏先生那里还没有彻底完成“和恐怖的复仇相結合的贖罪和懺悔”。于是“校长”又恢复了理智，但是由于害怕落入法网，他假装瘋癲，繼續留在畢塞特。欧仁·苏先生忘記了，“他的每一句話都应当是祈禱”，然而到最后，他的言辞成了瘋人的含糊不清的怒号和囁語。或許是欧仁·苏先生有意譏諷地把这种生命表現跟祈禱混为一談了吧？

在魯道夫把“校长”的眼睛弄瞎——这也就是把人同外界隔絕，强制他陷于深沉的灵魂孤独之中，把法律的懲罰同神学的折磨結合起来——这种做法中所运用的刑罰觀念，最突出地体現在单人牢房制之中。因此欧仁·苏先生也就歌頌起单人牢房制来了：

“过了好几百年人們才了解，制止某种威胁社会机体的流行極快的麻瘋病(也就是監獄中的道德敗坏)⑤，只有一种手段，这就是隔离罪犯。”

① ⑤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惊嘆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欧仁·苏先生贊同那些可尊敬的人們的看法，他們認為犯罪的流行是由于監獄的設立。为了把罪犯救出邪惡的社会，他們竟把罪犯单独一个人留在社会之中。

欧仁·苏先生声称：

“在所有那些理直气壯、不屈不撓地力求充分和絕對地实施单人牢房制的人們的呼声中，如果我这微弱的呼声也能被人听到，那我就認為自己很幸运了。”

欧仁·苏先生的願望只实现了一部分。在众議院本屆會議討論单人牢房制的問題时，甚至拥护这种制度的官方人士都不得不承認，这种制度迟早会使囚犯發瘋的。因此十年以上的徒刑都一律改为流放。

如果托克維尔先生和波蒙先生認真地研讀了欧仁·苏的小說，那末他們就毫無疑問地会使单人牢房制得到充分和絕對的实施。

如果說欧仁·苏为了使神智正常的罪犯成为瘋人而把他們逐出任何社会之外，那末，为了使瘋人恢复理智，他就讓他們回到人类社会中来：

“經驗表明，孤独对監獄中的罪犯有多少益处，它对瘋人就有多少害处。”

如果說，欧仁·苏先生和他那批判的主人公魯道夫無論是通過天主教的刑罰理論还是通过監理会教派的单人牢房制，都未能使法紀貧乏到只有一个秘密，那末，他們却以許多新的秘密丰富了医学；而归根到底，發現新秘密和揭露旧秘密都同样是劳苦功高的。对于“校长”的失明，批判的批判說出了和欧仁·苏先生完全一致的意見：

“当人們告訴他說他已經双目失明的時候，他甚至还不相信。”

“校长”不能相信自己的失明，因为他的确还看得见东西。欧仁·苏先生描繪了一种新的白內障，他告訴人們許多对于群众的、非批判的眼科学的确是秘密的东西。

瞳孔在动手术以后蒙上了一層白的顏色。显然，这是水晶体白內障。到現在为止，这种白內障可能的确是由损伤晶体囊所引起的，同时这几乎毫無痛苦，虽然也不是完全沒有痛苦。但是，既然医生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而不是用批判的方式获得这种結果，那末，就只有先加以损伤，然后等它發炎并形成纖維素性渗出物，从而使水晶体模糊不清。

在第三卷第三章中，“校长”身上出現了更大的**奇迹**和更大的**秘密**。

盲人又复明了：

“‘猫头鷹’、‘校长’和‘瘸子’看見了牧师和瑪麗花。”

如果我們不想学“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榜样，把这种現象解釋为作家捏造的**奇迹**，那末我們就應該假定“校长”又去給自己的白內障动了手术。后来他又成了瞎子。他过早地張开了自己的眼睛，于是光綫的刺激引起了發炎，結果損害了眼网膜，使他得了無法医治的**盲症**。在这里，这整个过程一共只占了一秒鐘，这对于非批判的眼科学是一个新的**秘密**。

### (b) 奖賞和懲罰。双重裁判(附表)

主人公魯道夫給我們揭示了一种用**賞善罰恶**的方法来維護社会的新理論。从非批判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論無非是現代社会的理論而已。在現代社会中，賞善罰恶的事情难道还少嗎？和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相比，群众的共产主义者**欧文**是多么的非批判呵！

他看出賞罰制度是社會等級差別的神聖化，是奴隸般的屈辱狀況的完整表現。

歐仁·蘇把頒發獎賞的權柄交給司法部門——刑事裁判的特別補充，並且因不滿足於單一的裁判而發明一種雙重的裁判，這可以算是一種新的揭露。可惜的是，這種被揭露了的秘密不過是重復邊沁在他的上述一書中詳盡闡明過的舊學說而已。不過，歐仁·蘇先生以較之邊沁更批判得無可比擬的方式論證和發展了自己的建議，對於他的這一層榮譽是決不能抹殺的。當這位群眾的英國人還完全停留在罪惡的塵世中的時候，歐仁·蘇先生的演繹卻超升到了批判的天國。歐仁·蘇先生的議論如下：

“為了使惡人生畏，人們把他們所預知的天怒物質化了。為什麼不把上天對善人的獎賞也同樣物質化並使人預先在塵世知道這種獎賞呢？”

按照非批判的見解，情形恰恰相反：正如人們在上天獎賞的觀念中只是把人間的僱傭僕役理想化了一樣，人們在天上的刑罰理論中也只是把塵世的刑罰理論理想化罷了。如果不是一切善人都受到社會的獎賞，那末這也是應該如此，因為這樣才能使天上的正義顯得比人間的正義到底高出一籌。

歐仁·蘇先生在描述批判的獎賞裁判時，給我們提供了“婦女的（埃德加爾先生以充分的“認識的寧靜”斥責弗洛拉·特莉斯坦的）<sup>①</sup>教條主義的例子，這種教條主義希望有一套公式，並且用現存事物的範疇來制定公式”。歐仁·蘇先生按照他所完全支持的現行刑事裁判的每一個條款，依樣葫蘆地詳細描繪了他所附加的獎賞裁判的摹本。為了使讀者能一目了然起見，我們且把他所

<sup>①</sup>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描写的原本和摹本放在一起，列为一个对照表。

### 批判地完成的裁判表

#### 现行的裁判

名称：刑事裁判

征象：手中持劍，旨在斬断恶人之头。

目的：懲罰恶人，監禁、凌辱、处死。人民当知为恶受罰之可畏。

發現恶人的手段：警察密探、特务，以便偵緝恶人。

某人是否屬於恶人的决定：Les assises du crime，审理罪行的陪审法庭。官府纪录并宣布被告的罪行，給被告以公开的报复。

罪犯在判决后的情形：他处于高級警察的監視之下。养活于監獄中，国家担負其費用。

执行判决：罪犯上断头台。

#### 批判地补充的裁判

名称：善行裁判

征象：手中持冠，旨在給善人加冕。

目的：獎賞善人，獎金、尊崇、保障生命之安全。

人民当知为善載譽之可歌。

發現善人的手段：道德密探、特务，以便查訪善人。

某人是否屬於善人的决定：Assises de la vertu，审理善行的陪审法庭。官府纪录并宣布被告的善行，給被告以公开的表彰。

行善者在判决后的情形：他处于最高的道德仁爱的監督之下。养活于自己家中，国家担負其費用。

执行判决：在处决罪犯的断头台正对面建立一座大善人高踞其上的高台——善行台。

欧仁·苏先生为自己想像中的圖景所深深激动，于是不禁感嘆起来：

“咳，这是烏托邦！不过請想一想，一个社会像这样組織起来該多好啊！”

可見，這就是**社會的批判的組織**。歐仁·蘇責難說，這種組織至今仍然不過是烏托邦，然而我們倒不得不來替這種組織辯護一下。歐仁·蘇又完全忘記了他自己提及的那些每年在巴黎頒發的“德行獎”。這些獎賞甚至是以雙重的形式設置的，有獎勵男人和女人的高尚行為的物質獎賞，即 *Prix Montyon* [蒙提昂獎金]，也有獎勵品德完美的處女的 *Prix rosière*<sup>⊖</sup>[羅節獎]。這裡甚至也並不缺乏歐仁·蘇所要求的**薔薇花冠**。

至於談到道德密探以及最高的道德仁愛的監督，那末凡此種種都是耶穌會派所早已設立過的。此外，“辯論日報”<sup>79</sup>、“世紀報”<sup>80</sup>、“巴黎小廣告”<sup>81</sup>等報紙每天都在不惜巨金地紀錄和宣揚巴黎的各種證券投機商人的德行、偉績和功德，更不用說每個政黨都各有自己的機關報來紀錄和宣揚本黨成員的政治上的業績了。

老福斯就已經指出，荷馬比他的眾神更好。因此我們可以要“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魯道夫來對歐仁·蘇的觀念負責。

除此而外，**施里加**先生還告訴我們：

“此外，在歐仁·蘇的小說中常常有一些離開故事的主要脈絡的插筆，即各種補敘和插話，而這一切都是一種批判。”

### (c) 消除文明中的野蠻和國家中的無法紀

消除犯罪行為及文明中的野蠻的法律預防手段，就是“國家對處死的犯人的子弟和判處無期徒刑的犯人加以管制”。歐仁·蘇想用比較自由主義的方法來分配犯罪行為。今後，任何一個家庭

⊖ *rosière* (羅節) 是一個貞潔的姑娘，曾因品德高尚被獎以薔薇花冠。——編者注



都不應該再擁有犯罪的世襲特權，罪行的自由競爭應該戰勝罪行的壟斷。

歐仁·蘇消除“國家中的無法紀”的方法是：修改法國刑法典中關於“濫用信任”的那一節，其次，特別是任命一批領取固定薪俸的律師為窮人辦事。可見，歐仁·蘇先生認為，在已經設有所為窮人辦事的律師的皮蒙特、荷蘭及其他國家中是消除了無法紀狀態的。按照他的意見，法國的立法只有一個缺點，即沒有給那些為窮人服務的律師規定固定的薪俸，沒有責成他們專為窮人服務，並且過於縮小了法定的貧窮範圍。似乎無法紀並不是正好在審判程序中開始的，似乎在法國並不是大家都早就知道：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关系。看來，法紀和事實的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區別，對於批判的小說家也許還是“巴黎的秘密”呢！

如果人們看了對法律秘密的批判揭露再看看歐仁·蘇想在司法執行官方面所進行的那些偉大改革，那就可以理解巴黎的“撒但”報<sup>82</sup>了。在這張報紙上，市內某區的一個居民向這位“大改革家兼速寫專家”訴苦說，他們的街道上還沒有瓦斯燈。歐仁·蘇先生回答說，他將在他那部大作“終身流浪的人”的第六卷中想辦法消除這種不幸。另一個區又埋怨初等教育的缺點。於是他又答應在他的大作“終身流浪的人”的第十卷中為這個區進行初等教育的改革。

#### (4) “觀點”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魯道夫沒有停留在他那高超的(!)①觀點上…… 他不遺余力地用自

① 括弧里的驚嘆號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由選擇的方式上下左右地來領會各種觀點。”(施里加語)

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秘密之一，就是“觀點”和用觀點來評判觀點。在它的眼中，每一個人跟每一種精神產物一樣，都變成了觀點。

只要你一旦懂得，批判的批判的總秘密就是使陳舊的思辨的胡說死灰復燃，那末要洞悉觀點的秘密就再容易不過了。

首先，讓批判自己通過族長布魯諾·鮑威爾先生的口來談談它那“觀點”的理論。

“科學……從來不跟某個人或某種特定的觀點打交道……當然，它也不會忘記消除某種觀點的界限，只要值得在這上面花費力量 and 這些界限真正具有全人類的意義；但它把這些界限看做純粹的範疇和自我意識的規定性，因此它只面向那些有勇氣上升到自我意識的普遍性的人，即那些決不想停留在這些界限以內的人。”(《軼文集》第二卷第127頁)

鮑威爾的這種勇氣的秘密就在於黑格爾的“現象學”。黑格爾在“現象學”中用自我意識來代替人，因此最紛繁複雜的人類現實在這裡只是自我意識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識的規定性。但自我意識的赤裸裸的規定性是“純粹的範疇”，是赤裸裸的“思想”，因此，這種“思想”我能夠在“純”思維中加以揚棄並且通過純思維來加以克服。在黑格爾的“現象學”中，人類自我意識的各種異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質的、感覺的、實物的基礎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壞性工作的結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學，因為這樣的觀點以為：既然它已經把實物的、感性現實的世界變成“思維的東西”，變成自我意識的純粹規定性，而且它現在又能夠把那變成了以太般的東西的敵人溶解於“純思維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這個世界征服了。因此，“現象學”最後完全合乎邏輯地用“絕對知識”來代替全部人類現實，——之所以用知識來代替，是因為知識是自我意識的唯一存在

方式，而自我意識則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絕對知識來代替，是因為自我意識只知道它自己，並且不再受任何實物世界的拘束。黑格爾把人變成自我意識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識變成人的自我意識，變成現實的人即生活在現實的實物世界中並受這一世界制約的人的自我意識。黑格爾把世界頭足倒置起來，因此，他也就能夠在頭腦中消滅一切界限；可是，對於壞的感性來說，對於現實的人來說，這當然絲毫不妨礙這些界限仍然繼續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識的有限性的一切東西——人及人類世界的任何感性、現實性、個性，在黑格爾看來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現象學”的目的就是要證明自我意識是唯一的、無所不包的實在。

近來，鮑威爾先生把絕對知識改名為批判，而給自我意識的規定性所換的名字則是一個聽起來比較簡單的術語——觀點。在“軼文集”中兩個名字仍然并用，而觀點也仍然是用自我意識的規定性來作注腳的。

既然“宗教世界本身”只是作為自我意識的世界而存在，所以批判的批判家——*ex professo*〔職業的〕神學家——就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竟有意識和存在互相分別的世界存在；想不到，當我只是揚棄了這個世界的想像存在，即它作為範疇或觀點的存在的時候，也就是當我改變了我自己的主觀意識而並沒有用真正實物的方式改變實物的現實，即並沒有改變我自己的實物現實和別人的實物現實的時候，這個世界居然還像往昔一樣繼續存在。因此，存在和思維的思辨的神秘同一，在批判那里以實踐和理論的同樣神秘的同一的形式重復着。因此，對於那種仍然想有所區別於理論的實踐，對於那種仍然想有所區別於把某一特定範疇消融於“自我意識的無限普遍性”這種做法的理論，批判便油然而生出一股怒氣。批判

本身的理論仅限于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如国家、私有財產等）宣布为自我意識的無限普遍性的对立物，因而也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反而應該表明，国家、私有財產等怎样把人化为抽象，或者它們怎样成为抽象的人的产物，而不成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现实。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說黑格尔的“現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許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評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鮑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們只是提供了一幅毫無內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滿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規定性，把这种規定性变为想像的規定性、变为范疇，并把这个范疇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凡此种种做法，都是为了能够以老成达練的姿态、洋洋得意的神气从抽象的、普遍范疇的、普遍自我意識的观点，高高在上地傲然睨視这种規定性。

在魯道夫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着善的观点，就是持着恶的观点，并且他就按照这两个不变的范疇来評价一切人；同样，在鮑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看来，一些人从批判的观点出發，另一些人則从群众的观点出發。但魯道夫和鮑威尔等人都是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

### (5) 揭露利用人的欲望的秘密， 或克雷門斯·达尔維尔

在此以前，魯道夫仅限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賞善和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罰恶。現在我們可以从一个事例看出，他怎样利用恋情来漁利，怎样“使克雷門斯·达尔維尔的优良的天性得到适当的發展”。

施里加先生說道：“魯道夫給她指出了慈善事業的消遣的一面，這種思想証明了那經歷過深刻考驗的魯道夫的智慧所獨有的人類知識。”

魯道夫在同克雷門斯談話時所使用的那些詞句，如“使之引人入勝”，“利用天生的愛好”，“施展巧計”，“利用狡黠和欺詐的癖性”，“把根深蒂固的橫暴的本能改造為高尚的品質”，等等，——所有這些詞句，就像這裡完全是硬加在女性身上的那些欲望本身一樣，泄露了魯道夫的智謀的秘密來源——傅立葉的學說。在魯道夫的手中，傅立葉的學說得到了通俗的闡明。

就跟上面看到的對邊沁的理論的運用一樣，對這個學說的運用又成了魯道夫的批判的財產。

年輕的侯爵夫人應該不是在慈善事業本身中去尋求自己人類本質的滿足，她應該不是在慈善事業本身中獲得活動的人性內容和目的，從而也得到消遣。不，相反地，慈善事業只是一種外在的理由，只是一種借口，只是一種供消遣用的材料，這種消遣能夠同樣得心應手地把其他任何一種材料變成自己的內容。貧窮被有意識地用來使慈善家享受“風流韻事的樂趣，讓他滿足獵奇、冒險和喬裝的欲望，使他陶醉於自己的超群出眾，使他感到神經的激動，等等”。

這樣一來，魯道夫無意中說出了早已公開的秘密：人的貧窮、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種極度窘迫的境遇，都應供金錢貴族和知識貴族娛樂，應當作為滿足他們的自私欲、供他們擺架子和消遣的對象。

在德國有許多慈善協會，在法國有不少慈善社團，在英國也舉辦無數唐·吉訶德式的慈善事業，如為賑濟窮人舉行的音樂會、舞會、義演、義餐，甚至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這一切都沒有任何

別的意思。由此可見，慈善事業也早就已經当做消遣來舉辦了。

侯爵夫人一聽到«amusant»〔“消遣的”〕這個詞，便突然無緣無故地轉變過來，這使我們不得不懷疑她的痊愈是否能持久，或者更正確些說，這種轉變只在表面上看來是突然的和無緣無故的，只在表面上看來是由魯道夫把慈善事業描述為消遣而引起的。侯爵夫人愛上了魯道夫，而魯道夫也打算跟她一塊喬裝變服，跟她私通，跟她一起搞種種慈善性的獵奇活動。後來，侯爵夫人在對聖拉扎監獄作慈善性的參觀時，暴露了她對瑪麗花的忌妒，並且由於她對自己的這種忌妒心抱著慈善的態度，所以在魯道夫面前閉口不談瑪麗的被捕。魯道夫至多只能教會一個不幸的女人跟不幸的人們演笨拙的笑劇而已。魯道夫所發明的慈善事業的秘密被巴黎的一個紳褲公子泄露了。這位紳褲公子在跳舞之後，邀請自己的舞伴去晚餐，他說：

“呵！夫人，為救濟這些窮波蘭人，只跳幾次舞還不能算盡到心了呀……做善人就做到底吧！……現在我們去吃一頓為這些窮人義賣的晚餐吧！”

## （6）揭露婦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萊爾

在路易莎·莫萊爾被捕時，魯道夫趁機發表了一通議論，這些議論可以概括如下：

“主人經常用恫吓、平白無故的毆打或主奴關係的本性所產生的其他情況來虐待女僕。他陷女僕於不幸，使她遭受羞辱並迫使她去犯罪。法律不觸動這些關係……實際上迫使少女去殺害嬰兒的罪犯却並不受到懲罰。”

魯道夫的議論甚至不能擴展到對主奴關係本身加以聖明的批判。他雖然是一個小統治者，但却是這種關係的大衛道者。魯道夫

还未能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的非人性。他完全忠实于他以前的理論，所以，只感到缺少一条懲办誘奸者并把懺悔和贖罪跟严厉的惩治結合起来的法律。

魯道夫要能够去仔細考察一下其他国家的現行立法就好了。英国的立法正实现着他的一切願望。它由于过分周到（布萊克斯頓对这一点称頌不止），竟对誘奸娼妓的人也加以背信弃义的罪名。

施里加先生奏起了欢迎曲：

“魯道夫(!)①就是这样(!)②想的(!)③。現在把这些思想和你关于妇女解放的幻想比較一下吧。在这些思想中你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解放事業，而你一开始就过于講求实际，所以你經常因你的努力落空而遭到失敗。”

無論如何，我們得感謝施里加先生揭露了一个秘密：某种事業在思想中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得到。至于他非常可笑地把魯道夫跟那些宣揚妇女解放的人相比这件事，那末讓讀者来比較一下魯道夫의思想和傅立叶的下述(就算是)“幻想”：

“通奸、誘奸給誘奸者带来光荣，并被当做風流韵事…… 但可怜的姑娘呵！杀害嬰兒，这是怎样的罪行呵！如果她重視自己的名誉，她就必須消灭丑行的痕迹，而如果她因为这个世界的偏見而牺牲自己的嬰兒，那末她就会受到更大的羞辱并成为法律偏見的牺牲品…… 这就是一切文明的机械論所描繪的恶性循环。”

“年輕的姑娘对于任何一个想把她变为自己独占財產的买主來說，难道不是一种商品嗎？…… 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

“某一历史时代的發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

① ② ③ 括弧里的惊嘆号是馬克思加的。——譯者注

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鮮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質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質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賦之以复杂的、曖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对于使妇女陷于奴隶状态这件事，男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應該受到懲罰。”(傅立叶)<sup>83</sup>

把傅立叶关于婚姻問題的精辟的評述以及法国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派別的著作拿来同魯道夫的論断对比，完全是多余的。

小說家从社会主义文献中所挑选出来的这些憂伤的片断，揭露了批判的批判仍然茫無所知的“秘密”。

## (7) 揭露政治經濟的秘密

### (a) 从理論上揭露政治經濟的秘密

**第一点揭露：**富有常常使人揮霍無度，揮霍無度則使人破产。

**第二点揭露：**剛才所指出的富有的后果是由于富家子弟缺乏教养的緣故。

**第三点揭露：**繼承权和私有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且也必須是这样。

**第四点揭露：**富豪在道德上有責任向工人說明他使用自己財產的理由。大宗財產就是托付給英明、堅定、敏捷而寬厚的人的繼承錢財、封建采邑；同时也委托这种人卓有成效地处理这宗財產，把它用来影响一切有幸受这大宗財產的輝煌的济世灵光所庇祐的事物，使其富有成效、日益兴盛、日臻完善。

**第五点揭露：**国家應該以个人节儉的基本原理来教导閱历不深的富家子弟。国家應該使富有道德化。



**第六点揭露：**最后，国家应该研究解决劳动組織这个重大的問題。它应该提供資本和劳动联合的有效例証，并且要是这样的联合：它井井有条、公平合理，它既保証工人的福利，又不損害富人的财产，它用互相傾慕、互相感激的紐帶把这两个階級联系在一起，从而永远保証国家的安宁。

因为国家暂时还没有采用这种理論，所以魯道夫就亲自提供几个实际的范例。这些范例暴露了这样的秘密：最为人所熟悉的經濟关系对于欧仁·苏先生、魯道夫先生和批判的批判却还是“秘密”。

### (b)“貧民銀行”

魯道夫創立了**貧民銀行**。这个批判的貧民銀行的章程如下：

銀行的主旨是对規矩的有家室的工人在失業期間予以救济。它应该代替施舍和當舖。它每年有 12 000 法郎的收入，發放 20 到 40 法郎一份的無息救济貸款。在开始的时候，它只在住着大部分工人的巴黎第七区展开活动。要求救济的男工或女工必須持有自己的最后一家雇主的証明書，上面確認他（或她）的行为規矩并載明他（或她）被解雇的原因和日期。这笔貸款于債務人重新找到工作的时候开始归还，每月偿还全部貸款的六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听債務人的自便。偿还貸款的保障是具有誓言的借約。此外，还需要另外有两个工人来担保貸款受主的誓言。因为貧民銀行的批判的目的是減輕工人生活中的一个最不幸的灾难——工作中断，所以根本只有失業者才能受到救济。主管这个机构的热尔門先生所得的年薪是 10 000 法郎。

現在我們用群众的眼光来看看批判的政治經濟的實踐。銀行

每年的收入共計 12 000 法郎。一個人發給貸款 20 至 40 法郎，因此平均每人 30 法郎。第七區的“貧苦”工人的數目，據官方的承認，至少是 4 000 人。這樣，每年能救濟 400 個工人，即第七區的最貧苦的工人的十分之一。就算失業的平均時間是四個月即十六個星期——對於巴黎，這個數字是太小了。要是把 30 法郎分十六個星期去用，那末每個星期的所得就不到 37 個蘇零 3 生丁，也就是一天的所得少於 27 個生丁。在法國，一個囚犯每天的開支平均是 47 個多生丁，其中僅飲食一項就要用去 30 多個生丁。而且魯道夫所救濟的工人是有家室的。就算除夫婦二人外，一家平均只有兩個小孩，那末 27 個生丁就必須分配給四個人用。房租每天至少是 15 個生丁，於是，剩下的就只有 12 個生丁了。一個囚犯所吃的麵包，平均起來大約要花 14 個生丁。可見，工人和他的家庭從批判的銀行所得的全部現金，如果撇開其他一切需要不計，只夠買不及他本人需要量的四分之一的麵包，所以工人就只得餓死，否則他就得採取這家貧民銀行所圖謀防止的那些手段，即典當、乞討、偷竊和賣淫。

可是，無情批判的偉人對於銀行的經理却是照顧得挺周到的。每年經管的收入總共是 12 000 法郎，而經理的年薪却是 10 000 法郎。因此，管理費占總金額的 45%，也就是說，比巴黎其他群眾的貧民辦事機構的管理費幾乎多兩倍，因為這類機構的管理費用大約只占全部開支的 17%。

就姑且承認貧民銀行所給予的救濟是真正的救濟而不只是虛幻的救濟，可是這個由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所發明的機構，仍然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幻想上：只要改變一下勞動報酬的分配辦法，就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年。

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那就是:750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91个法郎,其他750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120法郎。可見,已經有1500万个工人的收入比維持生活的絕對必需費用为少。

批判的貧民銀行的用意,按照合理的解釋,就在于从工人在業期間的工資中扣除他在失業期間为維持生活所必需的費用。是我在他失業期間先給他一笔錢,以便他在开始工作时再还給我呢,还是他在工作期間先給我一笔錢,我在他失業期間再把錢还給他呢,这反正都一样。無論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总是他在有工作时把他在失業时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交給我。

这样看来,“純粹的”貧民銀行所不同于群众的儲蓄銀行的,只是两种非常奇异、非常批判的特点:第一是銀行貸款給 *à fonds perdus* [無望的債務人],荒唐地断定:当工人想归还貸款的时候就一定能归还,而当工人能归还的时候就总是想归还的;其次是銀行一点也不給工人的存款支付利息。只是因为存款在这里是采取預支的形式,所以銀行認為它本身不向工人索取利息就已經是天大的好事了。

可見,批判的貧民銀行不同于群众的儲蓄銀行的,就是工人失掉利息,銀行失掉資本。

### (c) 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場

魯道夫在布克伐尔建立了一所模范农場。这个地点選擇得非常恰当,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遺迹——封建城堡。

在这个农場作工的六个男工,每人每年可得工資150埃巨或450法郎,每个女工每年可得工資60埃巨或180法郎。此外,他

們還有免費的膳食和免費的住房。布克伐爾工人的日常膳食是一“大”份火腿、一份不很少的羊肉和一塊不很小的牛肉，此外還有作為副食的兩種涼拌菜、兩大塊干酪、土豆、蘋果酒，等等。六個男工每人的工作量比法國的一般雇農多一倍。

法國每年的全部收入，按人數平均分配每人只有 93 法郎，法國直接從事農業的人數等於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普遍效法這位德國哈利發<sup>①</sup> 的模範農場，那末不僅在國民財富的分配方面，而且在國民財富的生產方面，都要引起一場革命。

從上述種種可以看出，魯道夫之所以能夠把生產這樣大大擴充，只是由於他要每個工人比以往多工作一倍，而使每個工人耗費的食物也比以前多五倍。

既然法國的農民已經異常勤勉，那末多工作一倍的工人就應當是超人的大力士了；“大”量的肉菜似乎也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有理由假定，這六個工人每人每天至少要消費一磅肉。

如果把法國生產的全部肉類加以平均分配，那末每一個人每天所得到的肉就不到四分之一磅。由此可見，魯道夫的范例在這方面也會引起一場怎樣的革命。這樣，單只是農業居民所消費的肉類就會多於全法國的肉類生產量，所以，這種批判的改革最後就會完全消滅法國的畜牧業。

從布克伐爾農場經理沙特林<sup>②</sup> 老爹的賬目看來，魯道夫除了給工人高額的工資和豐盛的膳食以外，還把農場總收入的五分之一給了工人，這筆錢正是他的地租。本來按平均計算，通常除了一

① 為穆罕默德繼承人的稱號，通常用以稱呼伊斯蘭教的教皇。——譯者注

②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布克伐爾農場的管賬。——譯者注

切生產費用和耗費于生產中的資本的利潤而外，法国的地主一般還剩下五分之一的總收入，或者換句話說，作為地租的份額等于總收入的五分之一。魯道夫過分增加了用來酬勞工人的費用（根據夏普塔爾的著作“論法国的國民經濟”<sup>84</sup>第一卷第239頁，一個作雇工的法国農民全年收入的平均數是120法郎），因而無可爭辯地過分減少了他所耗費的資本所應得的利潤；其次，他把自己的全部地租都送給了工人；儘管這樣，沙特林老爹仍然告訴我們，由於使用這種方法，殿下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從而也鼓舞了其他非批判的地主去經營這樣的農場。

布克伐爾的模範農場不過是幻想的空中樓閣而已；它的潛在基金不是布克伐爾土地的天然富源，而是魯道夫所擁有的神奇的祝福爾土納特<sup>85</sup>的錢袋。

於是批判的批判就此喧嚷起來：

“從第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整個計劃不是烏托邦。”

只有批判的批判才能在第一眼就看出祝福爾土納特的錢袋不是烏托邦。批判的第一眼乃是“凶惡的一眼”。

### (8) 魯道夫，“一切秘密本身的 被揭露了的秘密”

使魯道夫能夠實現其全部救世事業和神奇治療的萬應靈丹不是他的漂亮話，而是他的現錢。道學家們就是這樣的——傅立叶說。要模仿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就必須是百萬富翁。

道德就是“行動上的軟弱無力”<sup>86</sup>。它一和惡習鬥爭，就遭到失敗。而魯道夫甚至還沒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人類尊嚴這種意識

之上的獨立道德的觀點。相反地，他的道德是建立在人類軟弱無力這種意識之上的。他是神學道德的代表。我們已經詳細考察了魯道夫用衡量世界的基督教的固執觀念（諸如“慈善事業”、“無比忠順”、“克己”、“懺悔”、“善與惡”、“賞與罰”、“可怕的懲治”、“隱遁”、“拯救靈魂”，等等）所建立的英雄業績，也表明了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滑稽戲而已。現在我們只要再分析一下魯道夫這個“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或被揭露了的“純批判”的秘密的個人性格就夠了。

還在我們這位批判的海格立斯的少年時代，“善”與“惡”的對立就已經以兩個化身——魯道夫的兩位教師穆爾弗和波利多里——出現在他的面前。前者教他行善，而且本人是“善人”。後者教他作惡，而且本人是“惡人”。為了使這種構思在平庸方面不遜於其他倫理小說的類似構思，“善人”穆爾弗必須被描寫為不太“有學問”、“在智能方面”不“特別突出”的人。可是他誠實、單純、沉默寡言，常常以高貴的姿態，用可恥、下流之類的字眼來痛斥邪惡的事情，對卑鄙下賤的行為感到深惡痛絕。如果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可以說他是誠實地把善和真的旋律變成了各種音調的平均化的東西，也就是變成了一個音符。

相反地，波利多里卻是一個聰明絕頂、學識淵博、教養有素的奇材，但同時也是一個“最沒有道德”的人，並且滿腦子都是“最可怕的懷疑論”，作為年輕的虔誠的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表，歐仁·蘇對此是不能等閑視之的。對於歐仁·蘇和他的主人公的精力和教養，可以根據懷疑論使他們感到驚惶失措這一點來加以判斷。

施里加先生說：“穆爾弗同時就意味着1月13日的永世難忘的罪過和通過無比愛戴魯道夫這個人物並為他作自我犧牲來永遠贖補這個罪過。”

就跟魯道夫是全世界的 *deus ex machina* [从机器里出来的神]⊖ 和耶穌基督一样，穆尔弗也是魯道夫个人的 *deus ex machina* [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和耶穌基督。

“魯道夫和拯救人类、魯道夫和实现人类本質的完美，这对于穆尔弗来说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献身于这个統一的整体不是出于那种愚蠢如狗的奴隶般的忠順，而是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主的。”

可見，穆尔弗是一个文明的、自觉的、自主的奴隶。像公爵的每个奴僕一样，他把自己的主人看做人类的救主。格劳恩<sup>①</sup>奉承穆尔弗，称他为“勇敢無畏的护从”。魯道夫自己称他为僕人的模范，而他也确实是个模范的僕人。欧仁·苏告訴我們，他 *tête-à-tête* [私下]总是严格不苟地称魯道夫为“殿下”。有旁人在場时，为了保守匿名微行的秘密，他口里虽然叫“先生”，但心中还是称“殿下”。

“穆尔弗揭开了秘密的秘幕，但这只是为了魯道夫。他帮助了摧毁秘密本身的实力的工作。”

关于把穆尔弗跟最簡單的人世关系隔絕开来的秘幕之严密，可以从他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談話中得出一个印象。穆尔弗以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法定自衛权为由，得出結論說，魯道夫有权以秘密刑法官的身分来弄瞎綁得紧紧的和“赤手空拳的”“校长”。他描述魯道夫将怎样在法庭面前陈述自己的“高尚”行为，将以怎样华丽的詞句来炫耀自己，将怎样吐露自己的偉大心思；这种种描述，說明他够得上做一个剛剛讀完席勒的“强盜”的文科中学生。穆尔

⊖ 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員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这句话的轉义就是指那种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編者注

①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魯道夫的駐法公使。——譯者注

弗讓世界来解决的唯一秘密，就是這個問題：他在扮演运煤工人的角色时用什么东西塗在自己臉上，是用煤灰呢，还是用黑顏料。

“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別出来。”（“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給一切作恶的人；将荣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保罗达羅馬人書”第二章第九一十节）

魯道夫自己把自己当做这种天使。他降临人世，以便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別出来，奖賞善人，懲罰恶人。善恶的觀念在他那虛弱的头脑中銘刻極深，以至于他竟相信真有魔鬼，并且像昔日波恩的扎克教授那样，竟想活捉恶魔。相反地，另一方面他又企圖把魔与神的对立以縮圖的形式复制出来。他爱“起一些天命的的作用”。正像在现实中一切差別日益匯合为貧富之間的差別一样，在觀念中一切貴族的差別也在变成善恶之間的对立。这种差別是貴族給自己的偏見所賦予的最后形式。魯道夫把自己归入善人之列，而恶人之存在，是为了使他能因自身的完美而怡然自得。現在我們再进一步观察这个“善人”。

魯道夫先生的行善和揮霍就跟“一千零一夜”中巴格达的哈利發一模一样。如果他不像吸血鬼一样吸尽他那小小的德意志公国的膏血，他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根据欧仁·苏先生本人的描写，魯道夫要是沒有一个法国侯爵的庇护因而免于被迫退位，那末他已經屬於那些淪为附庸的德国公爵<sup>87</sup>之列了。根据这个事实就可以判断他那个公国的大小。其次，魯道夫对他自身的地位的估价批判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他这个小小的德国諸侯，竟認為在巴黎必須半匿名微行，以免引起別人对自己的注意。他有意随身携带一名宰相同行，其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宰相为他代表“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兒戏的一面”；好像一个小小的諸侯



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鏡子以外，还需要第三个什么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兒戏的一面的代表似的。魯道夫也影响了自己的从人們，使他們同样批判地不了解自己的作用和意义。例如，僕从穆尔弗和公使格劳恩就沒有發覺，巴黎代办巴第諾<sup>①</sup>先生怎样嘲弄他們，假装把他們的私人委托看做国家大事，并且譏諷地信口开河，大談其

“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之間可能存在的玄妙关系”。“是的”——魯道夫的公使报告說——“有时他竟厚顏無耻地对我說：‘在管理国家的事業中有多少为人民所不知道的錯綜复杂的糾葛呵！沒有人會說，男爵先生，我呈交給您的报告書对于欧洲事务的进程有影响，可是事实的确如此。’”

公使和穆尔弗認為厚顏無耻的事不是有人期望他們去影响欧洲事务，而是巴第諾把自己的卑賤職業理想化到这种程度。

我們先来回憶一下魯道夫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場面。魯道夫告訴穆尔弗說，他“現在突然間感到很驕傲和快乐”。可是馬上他又發起脾气来了，因为穆尔弗不想回答他一个問題。他对穆尔弗喊道：“我命令你說話！”穆尔弗請求他不要命令。魯道夫对他說：“我不喜欢沉默無言。”他不能自制，竟然有失身分地說起粗話来。他提醒穆尔弗說，对于他的一切效劳他都是有报酬的。一直到穆尔弗提醒他1月13日那件事以后，他才平靜下来。在这場風波以后，穆尔弗的奴才本性又显露了出来，他只是在一刹那間才讓自己忘其所以的。他揪自己的“头髮”，不过幸好他沒有头髮；他感到心灰意懶，因为他曾一度对自己那位显貴的老爺表現得有些粗野，而

<sup>①</sup> “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譯者注

这位老爷是把他称为“僕人的模范”，称为“我的善良、老成、忠实的穆尔弗”的。

魯道夫并未因他自己有这些邪恶的表现而感到惶惑不安，他随后又重复他那固执的“善”“恶”观念，并且宣扬他在行善中所做出的成绩。他把施舍和怜悯称为他那受到创伤的心灵的纯洁而虔诚的慰藉。对于被唾弃的卑贱的众生滥加施舍和怜悯，据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离经叛道的褻瀆聖物的行为。道理很清楚，怜悯和施舍是他的心灵的慰藉，因此玷污它们就是褻瀆聖物。这就等于“引起人们对上帝的怀疑；而凡有所施，均应感化人们信仰上帝”。对被唾弃者加以施舍，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呵！

魯道夫认为自己的心灵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因此，他经常对它们进行观察和评价。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场面中，狂人对穆尔弗发了一阵脾气，但他却聊以自慰地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玛丽花的遭遇使他感到很伤心。“我伤心到流出了眼泪，可是人们还责备我漠不关心、冷酷无情、无动于衷！”他这样证明了自己固有的善良以后，就对“邪恶”、对玛丽的无人知晓的母亲恶行痛斥了一番，并且尽量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对穆尔弗说：“你知道，我非常重视某种复仇行为，非常珍贵某种痛苦。”同时他还扮出一付恶魔的怪相，吓得这个忠实的奴僕大声惊叫起来：“唉哟，殿下！”这位显贵的老爷很像“青年英国”<sup>88</sup>社的活动家，他们也想改革世界，建立丰功伟绩，并且染上了类似的歇斯底里症。

关于魯道夫进行的种种猎奇和他经历的种种遭遇，我们首先可以在他那热中于猎奇的天性中找到缘由。他喜爱“风流韵事、消遣、猎奇、乔装”；他的“好奇心”是“贪得无厌”的；他感到“需要生气蓬勃的、火热的激情”，他“热烈地渴求强烈的神经激动”。

他这些天生的癖性，在他那想起天命的作用和想按照自己的固执的幻想来改革世界的渴望中获得了支持。

决定他对别人的态度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执观念，就是一些完全个人的、偶然的动机。

例如，他解救黑人医生大衛及其情妇，不是出于这些人的命运所引起的直接的人类同情心，不是为了解放他們本身，而是为了要对奴隶主維里斯起天命的作用和惩罚他的不信上帝。例如，对他說来，“校长”是他为了运用自己早已泡制出来的刑罰理論所欲得之物。另一方面，穆尔弗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談話也使我們有可能更深入地观察那些决定魯道夫的高尚行为的純个人动机。

殿下所以关心瑪丽花，正如穆尔弗所說，“如果撇开”穷人的命运所引起的怜悯不談，是因为他的女兒（他因为失去了她而感到十分悲痛）如果还在的話这时也是这么大年龄了。魯道夫对达尔維尔侯爵夫人的同情，“如果撇开”他那博爱的怪癖不談，是由于这样一种个人性質的原因：如果没有老达尔維尔侯爵及其和亚历山大皇帝的友誼，魯道夫的父亲早就被排除于德国君主的行列之外了。

他对若尔日夫人的仁慈和对她兒子热尔門的关心也是由于同一原因。若尔日夫人屬於达尔維尔家族。

“可怜的若尔日夫人之不断受到殿下的恩惠，与其說是由于这种族誼关系，还不如說是由于她自己的不幸和自己的德行。”

辯护士穆尔弗竭力用“主要是”、“如果撇开不談”、“还不如說”这样一些詞句来掩飾魯道夫的曖昧的动机。

最后，魯道夫的整个性格完全表現为一种“純粹的”伪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竟可以当自己的面和当别人的面，巧妙地把自已的邪恶的情欲的發泄描述为对恶人的情欲的憤怒。这种手法使我們

想起了批判的批判的类似手法；批判的批判也是把自身的愚蠢硬說成群众的愚蠢，把自己对世界在它之外的發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硬說成是这个世界对發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最后，把自己的利己主义（它以为自己汲取了、吸收了全部精神）硬說成群众对精神的利己主义式的抵抗。

我們將說明魯道夫的“純粹的”伪善怎样表現在他对“校长”、对薩拉·麦克格萊哥尔伯爵夫人以及对公証人雅克·弗兰的行为中。

魯道夫劝誘“校长”到他的住所去偷盜，以便将他誘入圈套并将他捕获。这时他所考虑的远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是純个人的利益。“校长”持有麦克格萊哥尔伯爵夫人的文書夹，而魯道夫很想把这个文書夹弄到自己手里。关于魯道夫 tête-à-tête [私下] 对“校长”的打算，在小說中有这样一段明显的描述：

“魯道夫感到了难以忍受的憂慮。如果他放过了这个捕获‘校长’的有利机会，那末，毫無疑問，这样的机会就决不会再碰到了。而魯道夫非常想占有的那一切秘密，則都会被这个强盜隨身带走。”

魯道夫捕获了“校长”，也就等于获得了麦克格萊哥尔伯爵夫人的文書夹。他捕获“校长”是出于个人利益。他弄瞎“校长”的眼睛也是出于个人的激情。

“刺客”对魯道夫講述“校长”同穆尔弗的爭斗，并且認為“校长”之所以頑强抵抗是由于他知道什么命运将落到他的头上。这时，魯道夫回答說：“他不知道。”他在說这句話的时候，“神色很憂郁，臉也由于前面談到的那种近于凶恶的表情而显得变了样”。复仇的念头完全控制了他，他預先尝到了野蛮地懲罰“校长”的那种粗野的乐趣。

于是，当被魯道夫定为**复仇工具**的黑人医生大衛出現的时候，魯道夫就高喊：“**复仇！…… 复仇！……**”魯道夫是在“**酷烈的盛怒**”之下喊出这几个字的。

他心中充滿了酷烈的盛怒。于是他附着医生的耳朵密授他的計謀，当医生因恐怖而战栗的时候，他便馬上巧妙地大談其“純”理論的动机来掩飾个人的**复仇心**。他說，这只是“运用”那早就时常閃現在他的高尚的头脑中的“**观念**”，并且他還沒忘記油腔滑調地补充一句：“他将来还是有悔改的**無限境界**的。”他这是模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做法，这类宗教裁判所在把判定有罪的人交給世俗的法庭燒死的同时，总是要来一套虛伪的祈禱，祈求賜予悔过的罪人以仁慈。

自然，当审讯和惩处“**校长**”的时候，殿下就坐在自己那間异常舒适的私室里，穿一件长长的、黑得异常的袍子，臉色蒼白得非常刺目，并且，为了完全和法庭的情景一模一樣，他面前还摆着一張长桌，桌上陈列着各种物証。先前当他把弄瞎眼睛的計謀通知“**刺客**”和医生时所显露出的那种野蛮和**复仇**的表情，現在当然應該从他臉上消逝得無影無踪。現在他在我們面前必須表現得“**沉靜、憂愁而审慎**”，摆出一付非常可笑的**郑重其事**的姿态，儼然以世界法官自居。

为了使人們对弄瞎眼睛一事的动机的“**純潔性**”沒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愚鈍的**穆尔弗**对格劳恩公使表白了一番：

“严厉懲罰‘**校长**’的目的主要是替我向这个陰險的杀人犯**报仇**。”

当魯道夫单独跟**穆尔弗**在一起的时候，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思：

“我对恶徒們的憎恨……更加强烈了，我对**薩拉**的厭惡愈來愈增长，当然罗，这是随着我女兒的死所給予我的悲痛的加深而增长的。”

魯道夫告訴我們，他對惡徒們的憎恨是很強烈的。自然，他的憎恨是批判的、純粹的、道德的憎恨，是對惡人的憎恨，因為他們是邪惡的。因此他把這種憎恨看做他在行善方面的一個進步。

但是馬上就暴露出，道德憎恨的這種加深無非是一種偽善的口實，他就用這種口實來掩飾他對薩拉的个人厭惡的增長。不確定的道德的幻影——對惡人的憎恨的加深，只不過是確定的不道德的事實——對薩拉的厭惡的增長——的掩飾罷了。引起這種厭惡的是一種十分自然、十分個人性質的原因，即他個人的悲痛。這種悲痛也就是他的厭惡的尺度。當然羅！

魯道夫在跟臨終的麥克格萊哥爾伯爵夫人會面時，表現了更加令人憎惡的偽善。

在揭露了瑪麗花是魯道夫和伯爵夫人的女兒這個秘密以後，魯道夫“做出威脅的、殘忍的樣子”走近伯爵夫人身邊。伯爵夫人祈求他的憐憫。

他回答說：“對你沒有憐憫，你該死…… 你這個惡魔，我和我的家族的惡魔！”

這樣看來，他是想為“家族”報仇了。接着他告訴伯爵夫人，他為了贖補弑父的罪過，發誓要周游世界，在世界上賞善罰惡。魯道夫折磨伯爵夫人，他忿激如狂，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只是在執行他在1月13日以後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嚴究邪惡”。

當他起身走出門的時候，薩拉喊叫起來：“可憐可憐我吧，我快死啦！”

“‘死就死吧，該死的东西！’魯道夫怒不可遏地說。”

最後這句話——“怒不可遏”——給我們揭示了魯道夫的種種

行为的純粹的、批判的和道德的动机。正是这种盛怒使他对他那——如施里加先生所說——已經归天的父亲揮动过宝劍。作为一个純粹的批判家，他不同自己身上的这种邪恶作斗争，而是竭力去制服别人身上的邪恶。

最后，魯道夫自己取消了他的天主教刑罰理論。他想廢除死刑，想把懲罰变为懺悔，但这只是在杀人犯杀害别人和不触犯魯道夫的家屬的时候才是如此。只要魯道夫的親屬中有一个人遭到杀害，他馬上便会采用死刑；他需要双重的立法：一种适用于他这个偉人，另一种适用于凡人。

他从薩拉那里知道雅克·弗兰对瑪丽花之死負有罪責。他自言自語地說：

“不，这不够……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燒着！……真是嗜血的欲望！……真是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坏蛋害死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还对自己說，弄死这个人沒有好处……生活而沒有錢，生活而不能滿足他那瘋狂的情欲，这将是长久的、加倍的折磨……但这是我的女兒呀！……我要杀死这个人！”

他冲过去杀害雅克·弗兰，但是他發現雅克·弗兰已处于無需杀害的景况中了。

好一个“善良的”魯道夫呵！他那狂热的复仇心，他那嗜血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詭詐地掩飾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只是因为幸运、金錢和官銜，这个“善人”才得以免受牢獄之灾。

为了弥补这位唐·吉訶德在其他各方面的渺小，“批判的威力”使他成了“善良的房客”、“善良的邻居”、“善良的朋友”、“善良

---

的父亲”、“善良的资产者”、“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君主”；而且，施里加先生的赞歌的这个音阶还在那里迴响不已。这比“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成果还要多。单是这，就足以使魯道夫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了。



## 第九章

### 批判的末日的审判

批判的批判曾两次通过魯道夫拯救世界免于灭亡，但这只是为了现在能够亲自宣布世界的灭亡。

我们又听见并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希采尔高踞于苏黎世的上空，并划破空际飞向远方；他手里拿着书卷是展开的，好像是“文学总汇报”第5期；他右脚踏群众，左脚踏沙洛頓堡；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每一句话像鸽子一样，噗喳！噗喳！飞上批判的末日的审判的感染力和雷鸣般的外貌的境界。

“当一切终于汇合起来反对批判的时候（我确实，确实对你们说过，<sup>⊖</sup>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整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命运注定它与圣徒争战）为了最后的攻击而在它的四周结成集团的时候，那时批判的勇敢和作用就会博得最大的承认。我们不必为斗争的结局担忧。一切的结局将会是这样：我们对各个集团分别加以清算（我们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一样，我们把绵羊赶到右边，把山羊赶到左边），并给敌对的骑士们拿出有关贫困的全部证据（这是魔鬼的灵，出去到普天之下，叫大家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这样，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将为之一惊。”<sup>89</sup>

天使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

«Dies irae, dies illa  
Solvat saeculum in favilla.

---

<sup>⊖</sup> 在这段引文里马克思加了一些讽刺性的插语。——编者注

Judex ergo cum sedebit,  
 Quidquid latet, apparebit,  
 Nil inultum remanebit.  
 Quid sum, miser, tunc dicturus? etc. ⊖

你們可以听到交战时的喧囂声和士兵的杀喊之声。这一切在开始时都必須經過。因为，接着就会出现冒牌基督和冒牌先知——巴黎的畢舍先生和卢先生，苏黎世的弗里德里希·罗默尔先生和泰奥多尔·罗默尔先生，并且他們会說：基督在此！而那时，鮑威尔兄弟的标志就会在批判中显现出来，鮑威尔兄弟的作品 [*Bauernwerk*] ⊖ 的聖語就会灵驗：

“犍牛能成双，  
 田地耕成行。”<sup>90</sup>

## 历史的結語

我們以后知道，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批判的“文学报”。

⊖ “世末之日，主怒可畏，火燒世界，万物成灰。判主开訊，大彰义怒，凡諸隱微，無不显露，無罪不罰，逃避何处。可怜罪人，何言答对？”等等。（引自天主教聖歌“世界末日的审判”）——編者注

⊖ 双关語：《Bauernwerk》一字在此既有“鮑威尔兄弟的作品”的意思，又有“乡下人的創作”和“粗糙的作品”的意思。——編者注

弗·恩格斯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sup>91</sup>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

1845年在莱比锡印行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根据1845年德文版

并与1892年德文版

核对后刊印

原文是德文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von

**Friedrich Engels.**

---

Leipzig.

Druck und Verlag von Otto Wigand.

1845.



## 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sup>92</sup>

工人們！

我獻給你們一本書。在這本書里，我想把你們的狀況、你們的苦難和鬥爭、你們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實情況描繪給我的德國同胞們。我曾經在你們當中生活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對你們的狀況有足夠的了解。我非常認真地研究過你們的狀況，研究過我所能弄到的各種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並不以此為滿足。我尋求的並不僅僅是和這個題目有關的抽象的知識，我願意在你們的住宅中看到你們，觀察你們的日常生活，同你們談談你們的狀況和你們的疾苦，親眼看看你們為反抗你們的壓迫者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我是這樣做了。我拋棄了社交活動和宴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空閒時間幾乎都用來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對此我感到高興和驕傲。高興的是這樣一來我在獲得實際生活知識的過程中有成效地度過了許多時間，否則這些時間也只是在客廳里的閑談和討厭的禮節中消磨掉；驕傲的是這樣一來我就有機會為這個受壓迫受誹謗的階級做一件應該做的事情，這些人儘管有種種缺點並且處於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個人的尊敬，也許只有英國的錙銖必較的商人才是例外；還值得驕傲的是這樣一來我就能保護英國人民，使他們不致日益受人鄙視。而來自歐洲大陸的這種鄙視，正是你們

国家的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经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們餓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除了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经费，他们还为你們做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委员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渐腐烂的“蓝皮书”中哪怕编写出一本易读的书，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绝大部分“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状况呢？没有，他们当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来把你们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

但是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你们来说却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很道地，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易近人**的。顺便说一句，无论在英国或是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当做外国人看待。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规模的利己**



# TO THE WORKING CLASSES

OF

GREAT-BRITAIN.

Working Men!

To you I dedicate a work, in which I have tried to lay before my German Countrymen a faithful picture of your condition, of your sufferings and struggles, of your hopes and prospects. I have lived long enough amidst you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r circumstances; I have devoted to their knowledge my most serious attention, I have studied the various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documents as far as I was able to get hold of them — I have not been satisfied with this, I wanted more than a mere *abstract* knowledge of my subject, I wanted to see you in your own homes, to observe you in your every-day life, to chat with you on your condition and grievances, to witness your struggles agains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of your oppressors. I have done so: I forsook the company and the dinner-parties, the port-wine and champaign of the middle-classes, and devoted my leisure-hours almost exclusively to the intercourse with plain Working Men; I am both glad and proud of having done so. Glad, because thus I was induced to spend many a happy hour in obtaining a knowledge of the realities of life — many an hour,

弗·恩格斯“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的第一頁



主义 [*wholesale selfishness*] 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 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 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产生的。我确信, 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 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 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 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们当做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 当做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 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 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 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 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要坚定, 要大胆, 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 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 全人类的事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

巴门(莱茵普鲁士)

## 序 言

本書中所考察的問題，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本內容比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論述的，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工人階級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發点，因为它是我們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資產階級的共产主义則是它的間接产物。所以，为了給社会主义理論，同时給那些認為社会主义理論有权存在的見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 *pro et contra* [贊成和反对] 社会主义理論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無产階級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顛，特别是在英国本土，無产階級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調查所証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這個問題进行稍微詳尽的闡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內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無产階級，研究了他們的要求、他們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讀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書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

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都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

亚的騷动<sup>93</sup>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險，这种危險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最后，我还要做两点声明。第一、*Mittelklasse* [中等階級]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 middle-class (或通常所說的 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 bourgeoisie (資產階級) 一样是表示有产階級，即和所謂的貴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階級，这个階級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輿論”間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 同样，我也經常把工人 (working men) 和無产者，把工人階級、沒有财产的階級和無产階級当做同义語来使用。第二、我在引用別人的話时，在大多数場合下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屬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在竭力強調农業区的貧困，否認工厂区的貧困，而保守党人却剛好相反，他們承認工厂区的貧穷，但不想承認农業区的貧穷。因此，当我描述产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証据，以使用自由資產階級亲口說出来的話来打击自由資產階級；只有当我亲身观察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証据真实無誤的时候，我才引用保守党人或宪章派的材料。

弗·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門

⊖ 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解釋，原作中凡用《Mittelklasse》(“中等階級”)的地方，在本書中以后均譯为“資產階級”。——編者注

## 导 言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 18 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也不谈它对现在和将来的巨大意义。这是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的著作的题目。现在，我们只谈几点，这几点是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 and 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所必需的。

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里，靠自己挣的钱也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还是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場，而竞争（后来由于取得了国外市场和扩大了贸易而替自己开辟了道路）的威力也还没有对工资发生显著的影响。加以本地市场的需求还不断地在扩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缓慢增长是步调一致的，并且保证了一切工

人都有工作；此外，他們之間還不可能發生激烈的競爭，因為他們散居在农村。所以，大部分織工甚至還能夠積蓄一點錢，並且租一小塊地在空閑的時候耕種。至於空閑的時間，他們願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為在什麼時候織布和織多少布是隨他們便的。的確，他們是蹩腳的莊稼人，他們的耕作是馬馬虎虎的，也沒有很多的收入；但是，至少他們還不是無產者，他們，如英國人所說的，是在故鄉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他們是定居的，在社會上的地位比現在的英國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們就這樣過着庸碌而舒適的生活，誠實而安靜地、和和氣氣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比他們的後代好得多；他們無須乎過度勞動，願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夠掙得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有空到園子和田地裡做些有益於健康的工作，這種工作本身對他們已經是一種休息，此外，他們還有機會參加鄰居的娛樂和遊戲；而滾木球、打球等等遊戲對保持健康和增強體質都是有好處的。他們大部分是些強壯、結實的人，在體格上和鄰近的農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沒有區別。孩子們生長在农村的新鮮空氣中，即使他們有時也幫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還不是經常的，當然更談不到八小時或十二小時工作日了。

這個階級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樣，是不難想像的。他們和城市隔離，從來不進城，因為他們把紗和布交給跑四方的包買商，從他們那裡取得工資；他們和城市完全隔離，連緊靠着城市住了一輩子的老年人也從來沒有進過城，直到最後機器剝奪了他們的收入，把他們吸引到那裡去尋找工作。他們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和農民一樣，由於有一塊租來的土地，他們大部分和農民有直接聯繫。他們把鄉紳——當地最大的土地占有者——看做自己“天



然的长上”，向他討主意，有了小的爭吵，就請他当公断人，对他表示这种宗法关系所应有的尊敬。他們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道德的生活，因为他們那里沒有那些引入过不道德的生活的邪路——附近沒有酒館和賭場，而他們有时去那里过过瘾的小酒店的掌柜也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佃农，有好的啤酒，喜欢严格的生活規律，每天晚上很早就把买卖收了。孩子們成天和父母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們結婚。年輕人是在幽靜純朴的环境中、在和婚前的游伴互相信賴的气氛中长大的，虽然婚前發生性的关系几乎是普通現象，可是这仅仅是在双方都已經把結婚看做道义上的責任时發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一句話，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的生活 and 思想与現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閉关自守，与世隔絕，沒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沒有激烈的波动。他們当中能讀書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們按时上教堂去，不談政治，不搞陰謀活动，不动脑筋，热中于体育活动，带着从小养成的虔敬的心情听人講聖經，由于他們为人忠厚温順，和社会上比較有特权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他們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們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織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却一無所知。他們在自己的平靜、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沒有产业革命，他們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誠然，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應該过的。他們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貴族服务的工作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頂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簡單的机器，把他們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剝夺

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們思考，迫使他們爭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業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階級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發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發明是珍妮紡紗机。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布萊克本附近斯坦得希尔的織工詹姆士·哈格里沃斯制造成的（1764年）。它是后来的騾机的雛形，是用手搖的，可是不像普通的手搖紡車，手搖紡車只有一个錠子，而它有十六个至十八个錠子，只要一个人搖就行，因而能够生产比过去多得多的紗。从前，一个織工需要三个女紡工供給紗，紗还总是不够，織工常常得等着；現在，紗却比現有的織工所能用的多了。新發明的机器使紗的生产費用减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本来就已增长了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大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織工，而他們的工資也就提高了。現在，因为織工在織机旁能賺更多的錢，他們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業而专门織布了。这时，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用来纏紗）的家庭，一天工作十小时，每星期可賺4英鎊（合28个普魯士塔勒<sup>①</sup>），如果事情进行得順利，又有足够的工作，就常常掙得更多；一个織工在自己的織机上一星期賺两英鎊的事，也是常有的。兼营农業的織工階級就这样逐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織工階級，他們光靠工資生活，沒有絲毫财产，甚至连虛假的财产（例如一小塊租来的土地）也沒有，这样，他們就变成了無产者（working men）。此外，紡工和織工从前的那种关系也完結了。从前，紡紗和織布是尽可能地在同一个屋子里进行的。現在，使用珍妮紡紗机像使用織机一样，都需

<sup>①</sup> 德国旧时的銀幣，1塔勒合3馬克。——譯者注

要有气力，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紡紗的工作了，而且这个工作变成了全家生活的唯一来源；可是另外一些家庭却刚刚相反，把过时的、落后的手搖紡車扔在一边，不得不单靠当家人的織机过活（如果他们买不起珍妮紡紗机的話）。后来工業中無止境地發展的分工就是这样从織布和紡紗开始的。

这架最初的很不完善的机器的出現，不仅引起了工業無产阶级的發展，而且也促进了农业無产阶级的产生。在这以前，有許多小的土地占有者，即所謂自耕农，他們过着平靜的、完全不动脑筋的、庸庸碌碌的生活，就像他們中間的兼营农业的織工一样。他們沿用祖傳的不完善的老方法耕种一小塊土地，他們以那种一切都从習慣而且世代代都不知道改变的人們所特有的頑强性来反对任何新事物。他們当中也有許多小佃农，可是这不是現代所謂的佃农，而是这样一些人，他們由于契約上的可以繼承的租佃关系或者由于古老的習慣，从父亲和祖父手里繼承了小塊的土地，一直穩穩当当地坐在上面，就好像这些土地是他們的財產一样。現在，在产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許多土地閑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他們一租就是50英亩、100英亩、200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所謂的 tenants-at-will（即每年都可以退佃的佃农），他們因为耕作得較好而且經營規模較大，所以能提高土地的收益。他們的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便宜；而小自耕农除了卖掉那塊已經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紡紗机或織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农村無产者以外，就再沒有其他任何办法了。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無法改进的祖傳的粗枝大叶的耕作方法，使得他在和这样一些人竞争时找不到其他出路，这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具有

大規模經營和投資改良土壤所产生的一切优越性。

可是工業的發展並沒有停止在这里。有些資本家开始把珍妮紡紗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發动；这就使他們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紗賣得比用手搖机器的个体紡工便宜。由于珍妮紡紗机的构造不断在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須把它們加以改造或者換成新的；資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經过时也还可以維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紡工來說，这越往后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水力紡紗机的出現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普累斯頓的一个理髮师理查·阿克萊在1767年發明的，在德国通常叫做 Kettenstuhl [經綫織机]，它和蒸汽机一样，也是18世紀机械方面最重要的發明。它一开始設計的时候就是打算用机械發动，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的。郎卡郡菲尔伍德的賽米尔·克倫普頓綜合了珍妮紡紗机和水力紡紗机的特点，于1785年發明了騾机。大約在同一期間，阿克萊又發明了梳棉机和粗紡机，于是工厂生产方式就成为棉紡業中唯一占統治地位的了。这些机器經過一些不大的改变，逐漸用来紡羊毛，以后(19世紀的头十年)又用来紡麻，这样，就从这两方面排挤了手工劳动。但是事情还没有停止在这里：在18世紀最后几年，一个乡村牧师卡特賴特博士發明了动力織机，在1804年左右，他把这种机器又改进得足以压倒手工織工；这些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發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在1764年發明的，从1785年起已用来發动紡紗机了。

由于这些發明(这些發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業的各主要部門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業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障地一个跟一个地讓

給了机器。結果，一方面是一切紡織品迅速跌价，商業和工業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沒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場，資本和国民財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数字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败坏，政治騷动以及我們将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国有产阶级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实。我們已經看到，甚至仅仅像珍妮紡紗机这样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已經使下層阶级的社会地位發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从我們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給我們以布匹的一整套配合得很好、构造得很精密的机器，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使我們感到惊异了。

現在，我們来稍微詳細地研究一下英国工業的發展<sup>⊖</sup>，先从它的主要部門棉紡織業开始。在1771—1775年輸入英国的子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1841年輸入52800万磅，而1844年輸入就不下60000万磅。1834年，英国輸出55600万碼棉布，7650万磅棉紗和价值120万英鎊的棉針織品。同年，棉紡織業中使用了800多万錠子，11万台动力織机和25万台手工織机，水力紡紗机还没有計算在內。根据麦克庫洛赫的計算，全联合王国直接或間接靠这一工業部門生活的几乎有150万人，其中仅仅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就有22万人；这些工厂所使用的动力，蒸气力是33000馬力，水力是11000馬力。現在这些数字已經远远地被超过了；可以大胆地假定，在1845年，机器的数量和生产能力，以及工人的数目，都

⊖ 根据波特著“国家的进步”一書倫敦版，該書第1卷出版于1836年，第2卷出版于1838年，第3卷出版于1843年（Porter. «Progress of the Nation». London, 1836—I vol., 1838—II vol., 1843—III vol.）（系根据官方資料写成）；这里还根据其他一些資料，其中大部分也是官方的。——恩格斯原注

这里所描写的產業革命的历史輪廓在某些細節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沒有更好的資料。——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将比 1834 年增加二分之一。这种工业的中心是**郎卡郡**，郎卡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而棉纺织业又使得郎卡郡完全革命化，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地方；这种工业在八十年内使郎卡郡的人口增加了 9 倍，并且好像用魔杖一挥，创造了居民共达 70 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波尔顿**（60 000 居民）、**罗契得尔**（75 000 居民）、**奥尔丹**（50 000 居民）、**普累斯顿**（60 000 居民）、**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共 40 000 居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工厂城市。在南郎卡郡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近代的一些最大的奇迹（虽然这一点从来没有人谈到过），所有这些奇迹都是棉纺织业造成的。此外，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形成了第二棉纺织区（包括**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中心，这个主要城市的人口自兴办这种工业的时候起到现在也从 3 万增加到 30 万。**诺定昂**和**得比**的织袜业，由于棉纱价格的降低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由于针织机的改良（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织两只袜子）又获得了第二个推动力。从 1777 年发明了网布机那时起，花边的生产也成了重要的工业部门；以后不久**林得里**发明了花边机，而后来在 1809 年**希斯科特**又发明了络丝机。这样一来，制造花边的工作无限地简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随着它的跌价而大大增长，以致现在从事于这种生产的已经不下 20 万人。它的主要中心是**诺定昂**、**莱斯特**和**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戴文郡**等）。和棉纺织业有关的劳动部门，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由于用氯代替大气中的氧漂白，由于对染色和印花有影响的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在机械方面出现了促进印花发展的一连串的极其光辉的发明，这些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推动力；由于有了这种推动力，又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了需求的增加，

这些部门就空前地繁荣起来。

在羊毛加工業中也开始了同样的活动。这种工业过去曾是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可是过去的产量根本不能和现在所生产的相比。在1782年，前三年收集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把那些机器改装得适用于纺羊毛的尝试完全成功了。从这时起，在羊毛加工的区域中开始了我们在棉纺织区中所看到的那样迅速的发展。1738年，约克郡西部地区生产了毛织品75 000匹，而1817年就生产了490 000匹，并且毛纺织业的发展是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的：1834年输出的毛织品比1825年多450 000匹。——1801年加工的羊毛是10 100万磅（其中有700万磅是输入的），而1835年加工的是18 000万磅（其中有4 200万磅是输入的）。这种工业的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西部地区，在这里，特别是在布莱得弗德，英格兰的长羊毛制成供编织等用的毛线，而在其他城市，例如里子、哈里法克斯、哈得兹菲尔德等地，短羊毛制成合股毛纱，然后再制成呢绒织物；其次，是郎卡郡和约克郡接近的那一部分，即罗契得尔附近地区，这里除了生产棉纺织品，还生产许多法兰绒；最后，是英格兰西部，这里生产最精致的呢子。在这里人口的增加也是值得注意的：

	1801年	1831年
布莱得弗德	29 000人	77 000人
哈里法克斯	63 000人	110 000人
哈得兹菲尔德	15 000人	34 000人
里子	53 000人	123 000人
整个约克郡西部地区	564 000人	980 000人

从1831年以来,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又增加了20—25%。在1835年,全联合王国从事紡羊毛的工厂是1313个,共有工人71300人,在这个数目中只包括了直接或間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广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包括織工在內。

麻紡織業中的进步开始得比較晚些,因为原料的天然特性給紡紗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的确,18世紀最后几年,在苏格兰已經有人做过这种尝试,但是一直到1810年,法国人日拉才实际上做到了用机器紡麻。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国加以改善,并在里子、丹第和拜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顛的土地上得到了它們应有的地位。从这时起,英国的麻紡織業才开始迅速地發展起来。1814年,有3000吨<sup>⊖</sup>亚麻运入丹第,到1833年就有19000吨亚麻和3400吨大麻了。輸入大不列顛的爱尔兰夏布从3200万碼(1800年)增加到5300万碼(1825年),其中大部分又从大不列顛輸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織品的輸出从2400万碼(1820年)增加到5100万碼(1833年)。紡麻工厂的数目在1835年达到了347个,共有工人33000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兰南部,有六十多个在約克郡西部地区(里子及其附近),二十五个在爱尔兰的拜尔法斯特,而其余的在多尔塞特郡和郎卡郡。麻織品的生产是在苏格兰南部、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兰。

。英国人在蚕絲加工方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績。他們从南欧和亚洲取得已經紡好的原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細綫。在1824年以前,生絲的高額关税(每磅4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国絲紡織業的發展,英国絲紡織業的市場仅仅限于本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

⊖ 英国1吨等于2240英磅,約1000公斤。——恩格斯原注



有保护关税)。后来，进口税降低到一个辨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量地增加了。在一年内綫錠的数目从 78 万增加到 118 万，虽然 1825 年的商業危机也使这个工業部門的發展停頓了一些时候，但在 1827 年这一部門中所生产的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国人在技术方面的技巧和經驗保證了他們的捻綫机优越于他們的竞争者的拙劣机械。1835 年，大不列顛共有捻絲厂 263 个，工人共計 3 万人，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柴郡（麦克尔士菲尔德、康格尔頓及其附近地区）、曼徹斯特和索美塞特郡。此外，还有许多从事于廢茧加工的工厂；用廢茧制成一种特別的絲（spunsilk〔紡絲〕），英国人甚至用它来供給巴黎和里昂的織綢厂。用这种方法加工的絲主要是在苏格兰（佩斯里等地）和倫敦（在斯比脫菲尔茲），同时也在曼徹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織成綢子。

但是，从 1760 年开始的英国工業的巨大高漲，并不仅仅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業活动的一切部門里去，而許多和前面提到的东西毫無联系的發明，也由于它們正好出現在工業普遍高漲的时候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其次，当工業中机械能的巨大意义在實踐上得到証明以后，人們便用一切办法来全面地利用这种能量，使它有利于个别的發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工人和各个工業部門加倍地工作。随着蒸汽机的出現，英国的丰富的煤藏第一次成了重要的东西；只是在現在机器的生产才开始萌芽，而对鉄矿的注意也随着加强了，因为鉄矿是給这种生产提供原料的。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国的飼羊業兴盛起来，而羊毛、亚麻和蚕絲輸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国商船队的扩大。發展得最快的是鉄的生产。英国藏鉄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解鉄矿石的时候总是用木

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少，价格也愈来愈贵。上一世纪才开始使用烧过的煤（焦炭），而在1780年以后又发明了把焦炭所熔解的铁（在此以前，只能从它得到生铁）变成锻铁的新方法。这种把熔铁时掺杂在铁里面的碳素提出的方法，英国人叫做搅炼；它给英国的制铁业开辟了崭新的活动地盘。炼铁炉建造得比过去大50倍，矿石的熔解由于使用热风而简化了，铁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制造的大批东西现在都可以用铁制造了。1788年，一个著名的民主派托马斯·倍恩在约克郡建成了第一座铁桥，跟着就出现了其他许多铁桥，现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铁路上的桥，都是用生铁造的，而在伦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萨得克桥）；铁柱和铁的机座等等成了很常见的东西，而随着瓦斯灯的使用和铁路的修筑，英国的制铁业又获得了新的销售领域。螺丝钉和钉子也逐渐地用机器制造了。设菲尔德人亨茨曼在1760年发明了一种铸钢的方法，这种方法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并且使人们能生产出以前完全没有的便宜的物品。由于原料的质量较高，工具经过改进，机器装备比较新，分工比较精密，这时英国的金属制品生产才重要起来。北明翰的人口从73 000（1801年）增加到200 000（1844年），设菲尔德的人口从46 000（1801年）增加到110 000（1844年），仅仅后一城市的煤的消耗量在1836年就达到了515 000吨。1805年输出了4 300吨铁制品和4 600吨生铁，而到1834年就输出了16 200吨铁制品和107 000吨生铁，铁的全部生产在1740年没有超过17 000吨，到1834年就几乎达到了700 000吨。光是熔解生铁，每年就要消耗300万吨以上的煤，甚至很难想像，煤矿在最近六十年来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意义。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

的一切煤藏都正在开采，光是諾森伯兰和德勒穆的煤矿每年就有500万吨以上出口，使用工人四五万。根据“德勒穆紀事报”<sup>94</sup>的报道，上述两个郡开采的煤矿：

在1753年是……………14个，  
1800年是……………40个，  
1836年是……………76个，  
而在1843年是……………130个。

同时，现在所有煤矿的开采都比过去紧张多了。錫矿、銅矿和鉛矿也在同样地加紧开采；和玻璃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即陶器的生产，这种生产在1763年左右由于約瑟亞·威季伍德而获得了特殊的意义。他开始根据科学原则制造陶器，促进了艺术风味的發展，并且在北斯泰福郡8英里见方的一片地方建立了陶器厂（potteries），这地方从前是一片不毛之地，现在却布满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6万以上的人。

一切都完全卷入了这个总的巨流。农业里面也发生了变革。不仅土地的占有和耕种，如我們所看到的，轉到了另一些人的手里，而且农业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大佃农开始下本錢来改良土壤，拆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較好的农具并实行系统的輪作制（cropping by rotation）。科学的进步也帮助了他们；亨·戴維爵士把化学应用于农业得到了成功，而技术的发展又給大佃农带来許多好处。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起来；尽管从1760年到1834年有6 840 540英亩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国却由輸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了輸入粮食的国家。

在交通建設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紧张的活动。1818—1829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1 000英里的公路，法定宽度为60英尺，而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制加以改造。在苏格兰，公共事业局从1803年起修筑了约900英里公路，并建造了一千多座桥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立刻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民从事于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業者；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語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賽尔特的習俗和語言一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完全一样。在科克、里美黎克和克黎等郡之間，以前是一片荒地，沒有任何車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隱匿处和南爱尔兰地方賽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经是道路縱橫的地方，而这样一来也就給文明开辟了进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道路。整个大不列顛，特别是英格兰，在六十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国、法国的一样坏，现在却布满了最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像英格兰的差不多一切东西一样，都是私人企業家一手建立起来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1755年以前英国几乎没有运河。1755年，郎卡郡开鑿了从桑奇-布魯克到聖海倫斯的运河，而在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鑿了第一条大运河，即布黎紀瓦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徹斯特及附近的煤矿流到梅塞河口，并在巴頓附近通过一条导水槽越过艾尔威尔河。从这时起英国就开始了运河的建設，布林德利是头一个重視这一建設的人。从那时起，四面八方地开鑿了許多运河，許多河流也疏浚得可以通航了。仅仅在英格兰就有2 200英里运河和1 800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鑿了橫貫全境的凱利多尼亚运河，在爱尔兰也开鑿了几条运河。而这些工程，像鐵路和公路一样，也几乎全部是私人和私营公司一手建立起来的。

铁路只是在最近才修筑起来的。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到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年通车）。从那时起，一切大城市彼此都用铁路联系起来。伦敦和南安普顿、布莱顿、杜弗、科尔彻斯特、剑桥、埃克塞特（经过布里斯托尔）以及北明翰之间有铁路相通；北明翰和格罗斯特、利物浦、郎卡斯特（一綫经过牛顿和威根，一綫经过曼彻斯特和波尔顿）以及里子（一綫经过曼彻斯特、哈里法克斯，一綫经过莱斯特、得比及设菲尔德）之间有铁路相通；里子和赫尔以及新堡（经过约克）之间也有铁路相通。此外还有许多正在建设和设计中的支綫，因此，不久以后从爱丁堡坐火车到伦敦只要一天的时间便够了。

蒸气不仅在陆路交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通工具具有了新的面貌。第一艘轮船是1807年在北美的哈德逊河下水的，而在大不列颠则是1811年在克莱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英国建造了轮船600多艘，而在1836年停泊在英国港湾中的轮船总计已在500艘以上。

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sup>⊖</sup>，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

⊖ 1887年和1892年出版的英译本中，在“工业”一词之后还有“和商业”这几个字。——编者注

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我們已經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此外，爱尔兰只是在18世纪初才进入了平静状态，这里的居民过去在发生骚动的时候被英国人残酷地屠杀，减少了十分之一以上，现在也开始迅速地增长起来，特别是从工业繁荣开始吸引了许多爱尔兰人到英格兰去的那个时候起。大不列颠的巨大的工商业城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业者。可是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而在狭义的工业以外，在手工业方面，甚至于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也被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但同时，随着从前的手工业生产的被消灭，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工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从前，他们总有希望自己弄一个作坊，也许

将来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开办独立的企業必须有大量資本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而在过去，工人的地位往往是走上资产者地位的阶梯。现在，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在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这个现在布满了整个大不列颠的广大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天天地吸引着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sup>95</sup>通过时起已成了全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一点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而且，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对这个大问题保持缄默，并把自己的私利说成真正的民族利益，但是他们是决不会成功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级的问题都获得更大的重要性，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1844年最近的一次会议所讨论的还始终是工人的问题（济贫法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sup>96</sup>。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托马斯·邓科布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提议拒绝纳税的激进资产阶级却充当了很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实质上也只是关于爱尔兰无产阶级状况和帮助他们的方法的辩论。早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向工人让步的时候了，工

人們不是在懇求，而是在威脅，在要求；要知道，不久也許就太晚了。

可是英國資產階級，特別是直接靠工人的貧窮發財的廠主們，却不正視這種貧窮的狀況。資產階級認為自己是最強大的階級——代表民族的階級，他們羞於向全世界暴露英國的這個膿瘡；他們不願意承認工人的窮苦狀況，因為對這種窮苦狀況應負道義上的責任的，正是他們，正是有產的工業家階級。因此，關於工人狀況的一切談論，有教養的英國人（大陸上知道的僅僅是他們，即資產階級）通常總是報以輕蔑的一笑；因此，整個資產階級都有這樣一個特點，即對有關工人的一切總是一無所知的；因此，他們在議會內外一談到無產階級的狀況時就說得牛頭不對馬嘴；因此，雖然土地正從他們腳下逝去並且每天都可能崩潰，而這種很快就會發生的災禍又像力學和數學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樣地不可避免，可是他們還是很安然自得；因此，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奇怪的事情：雖然天知道英國人用了多少年來“研究”和“改善”工人的狀況，可是他們還沒有一本專門闡述這種狀況的書。但因此也產生了從格拉斯哥到倫敦的整個工人階級對富有者的極大的憤怒，這些富有者有系統地剝削他們，然後又冷酷地讓命運去任意擺布他們。這種憤怒經過不長的時間（這個時間幾乎是可以算出來的）就會爆發為革命，和這個革命比起來，法國第一次革命和 1794 年簡直就是兒戲。



## 工业无产阶级

研究无产阶级各个部分时所应当遵循的顺序，很自然地决定于上述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第一批无产者是出现在工业里面而且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产业工人，即从事于原料加工的那些人。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的生产，只是由于产业革命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业，第四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爱尔兰，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相应的各类无产阶级时所遵循的顺序。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发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所以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我们会看到，工厂工人，产业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而其他工人的参加运动，却要看他们的手工业被产业革命侵害的程度如何而定。这样，以英国为例来观察工人运动和工业发展之间的这种一致的步调，我们就会更好地懂得工业的历史意义。

可是因为目前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已经卷入了运动，而且它的各个部分的状况，正由于他们都从事工业，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考察这些共同点，然后再就各个部分的特点来

更詳細地研究这些部分。

上面我們已經說明了工業如何把財產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它用這些資本來建立龐大的企業，從而使從事手工業的小資產階級破產，它用這些資本來使自然力為自己服務，把個體手工業者從市場上排擠出去。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氣力的利用，機器的應用，這就是從 18 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舊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槓桿。小工業創造了資產階級，大工業創造了工人階級，并把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少數選民擁上寶座，可是，這只是为了後來在某個時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們。目前，無可爭辯的和容易解釋的事實，是“美好的舊時代”的人數眾多的小資產階級已經被工業所消滅，從他們當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資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貧窮的工人<sup>⊖</sup>。

但是工業日益集中的趨勢并不就止于此。人口也像資本一樣地集中起來；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在工業中，人——工人，僅僅被看做一種資本，他把自己交給廠主去使用，廠主以工資的名義付給他利息。大工業企業需要許多工人在一個建築物里面共同勞動；這些工人必須住在近處，甚至在不大的工廠近旁，他們也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村鎮。他們都有一定的需要，為了滿足這些需要，還須有其他的人，於是手工業者、裁縫、鞋匠、面包師、泥瓦匠、木匠都搬到這裡來了。這種村鎮里的居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逐漸習慣於工廠工作，逐漸熟悉這種工作；當第一個工廠很自然地已經不能保證

⊖ 參看我在“德法年鑒”上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sup>97</sup>。這一著作談到了“自由競爭”，可是工業只是自由競爭的實踐，而自由競爭又只是工業的原則。——恩格斯原注

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的确，农村比起城市来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更廉价地雇到工人。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是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里的工资降低了又利于在农村中开办新的工厂。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继续下去，而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业中的这种疯狂的竞赛还能这样继续一百年，那末，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而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许会在瓦灵顿或牛顿附近的某个地方碰头。人口的这种集中在商业中也沿着同样的道路进行着，因而，如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赫尔和伦敦这样几个大港就几乎壟断了大不列颠的整个海上贸易。

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工商业最发达，所以这种发达对无产阶级的后果也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干净；在这里，时代已经走得这样远，连《Old merry England》〔“美好的老英国”〕这句话也没有人懂得它的意思了，因为关于《Old England》〔“老英国”〕，甚至在老头子们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

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曾经是最稳定的阶级，现在变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弄到些钱，但九十九个破了产，而这九十九个中一多半都只是靠破产生存的。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他们的生活如何，大城市对他们的影响又如何。

## 大 城 市

像倫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鐘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闢的田野的些許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們把倫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業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塢，并聚集了經常布滿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倫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烏里治以上的这許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無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間，成百的輪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間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偉，这样壮丽，簡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偉大感到惊奇<sup>⊖</sup>。

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費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沒有尽头的絡繹不絕的車輛，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貧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倫敦人为了創造充滿他們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們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質；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們每一个

---

⊖ 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丽如画的帆船时代写的。現在，这样的船如果还出现在倫敦，那就只有停在船塢里面了，而布滿太晤士河的已是熏得漆黑的丑陋的輪船。——恩格斯在1892年版上加的注

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

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

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北明翰和里昂，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

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

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只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在我住在英国的那一个时期，在极端令人愤怒的情景下真正饿死的至少有二三十个人，而很少能碰到一个陪审员有足够的勇气在验尸的时候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见证人的供词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可是资产阶级（陪审员都是从他们里面选出来的）总要找出一条后路逃避那个可怕的判断：“饥饿致死。”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下不敢说出真相，因为这就等于判决他们自己有罪。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不是直接由于饥饿而是由于它的后果死掉的：经常挨饿引起不可救药的疾病，因而增加了牺牲者的数目；饥饿使身体虚弱，结果在另一种条件下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地过去的事情，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严重的疾病和死亡。英国工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他们难道不对吗？

当然，餓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誰能向工人保證明天不輪到他？有誰能保證他經常有工作做？有誰能向他担保，如果明天厂主根据某种理由或者毫無理由地把他解雇，他还可以和他的全家活到另一个厂主同意“給他一片面包”的时候？有誰能使工人相信只要願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聰明的資產階級向他宣傳的誠实、勤勞、节儉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真正会給他带来幸福？誰也不能。工人知道他今天有些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明天有沒有却由不得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風吹草动、雇主的任何逞性、商業上的任何滯銷，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渦里去，他只是暫時从这个漩渦里面掙扎出来，而在这个漩渦里面是很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不沉下去的。他知道，如果他今天还能够生存，那末，他明天是否还有这种可能，就絕對沒有把握了。

現在，我們來比較詳細地研究一下沒有財產的階級因社會戰爭而遭遇到的那種狀況。讓我們看看，社會給工人什麼樣的住宅、什麼樣的衣服和食物作為他們工作的報酬，社會讓那些對它的生存最有貢獻的人如何生活下去。我們從住宅說起。

每一個大城市都有一個或幾個擠滿了工人階級的貧民窟。的確，窮人常常是住在緊靠着富人府邸的狹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總給他們劃定一塊完全孤立的地區，他們必須在比較幸福的階級所看不到的這個地方盡力掙扎着活下去。英國一切城市中的這些貧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樣的；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區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見的是一排排的两層或一層的磚房，幾乎總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許多還有住人的地下室。這些房屋每所僅有三四個房間和一個廚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國（除了倫敦的某些地區），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這裡的街道通常是沒有鋪砌過的，骯髒的，



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么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现在就从这些贫民窟中挑出几个来研究一下。我们从伦敦<sup>①</sup>，从它的著名的“乌鸦窝”(rookery) 圣詹尔士开始，这个地方现在终于有几条大街穿过，所以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圣詹尔士位于该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周围是富丽堂皇的大街，在这些街上闲逛的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人物，这个地方离牛津街和瑞琴特街，离特拉法加广场和斯特伦德都很近。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街道狭窄、弯曲、肮脏，热闹程度不亚于大街，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圣詹尔士可以看到的几乎全是工人。在这里，买卖是在街上做的；一筐筐的蔬菜和水果（所有这些东西不用说都是质量很坏的，而且几乎是不能吃的）把路也堵塞住了，所有这些，像肉店一样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满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很脏，看来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住在里面。但是这一切同大杂院和小胡同里面的住房比起来还大为逊色。这些大杂院和小胡同只要穿过一些房子之间的过道就能找到，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

---

① 在这一段已经写成的时候，我在“彩色杂志”（1844年10月）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伦敦工人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许多地方和我的这一段几乎逐字逐句都是一样，而且在本质上是和我这一段通篇完全一致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穷人的住宅。一个医生的笔记”。——恩格斯原注

了，門框和窗框都損壞了，勉勉强强地支撐着，門是用旧木板釘成的，或者干脆就沒有，而在这个小偷很多的区域里，門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給小偷去偷。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門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住在这里的是穷入中最穷的人，是工資最低的工人，掺杂着小偷、騙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們周圍的那个道德堕落的漩渦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貧穷、肮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給予他們的足以使德行敗坏的影响。

但是，倫敦的貧民窟并不止聖詹尔士一处。在一大片像迷陣一样的街道里隱蔽着成百成千的大大小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里的房子对于凡有可能稍稍多花一点錢租个比較像人住的地方的人來說，都实在太坏了，这些貧穷到極点的人們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們的华丽大厦紧邻的地方找到的。例如不久以前，由于檢驗一个尸体，很体面的人們居住的波特曼方場附近的地方被描写成“一群因肮脏和貧穷而道德堕落的爱尔兰人”的住所。在如同朗-愛克及其他虽然不是貴族式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許多地下室，这里面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飢餓的女人爬出来晒太陽。紧靠着倫敦第二个大戏院德留黎棧戏院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坏的街道：查理街、英王街和派克街。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到閣楼都住滿了貧苦的家庭。在韋斯明斯特的聖約翰教区和聖瑪格丽特教区，根据統計学会会刊的材料，在1840年，5 366个工人家庭住了5 294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話）；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 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間。在汉諾威方場的貴族教区聖乔

治，根据同一材料，有 1 465 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 6 000 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这些不幸的穷人（连小偷也不希望在他們那里找到一点什么）是怎样受着有产阶级的在法律掩护下的剥削呵！上述的德留黎棱戏院附近的这些糟糕透顶的房屋是按照下列标准收房租的：地下室是两个房间每星期 3 先令（1 塔勒），一楼是每个房间 4 先令，二楼是 4<sup>1</sup>/<sub>2</sub> 先令，三楼是 4 先令，而阁楼每间是 3 先令。这样，仅仅查理街的经常挨饿的住户每年向房主缴纳的贡税就达 2 000 英镑（14 000 塔勒）之多，而上述的韋斯明斯特的 5 366 个家庭一年缴纳的房租则达 40 000 英镑（270 000 塔勒）。

但是最大的工人区是伦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拜特纳-格林，伦敦的工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听听拜特纳-格林的圣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先生是怎样讲自己的教区的吧：

“这里有 1 400 幢房子，里面住着 2 795 个家庭，共约 12 000 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 400 碼（1 200 英尺）见方的一片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 10—12 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我认为在伦敦的主教唤起公众注意这个极端贫穷的教区以前，城市西头的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岛的野人更多一些。只要亲眼看一下这些不幸的人们的苦难，看一看他们吃得多么坏，他们被疾病和失业折磨成什么样子，我们面前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无助和贫穷的深渊，仅仅是这个深渊有可能存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引以为耻。我在工厂最不景气的三年间在哈得兹菲尔德附近做过牧师，可是，我在那里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在拜特纳-格林看到的这种穷得毫无希望的情形。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sup>98</sup>

仅仅从这一段描写里就可以想像出这些住宅一般地是什么样子。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我們再听一听某几个有时候不得不到这些無产阶级住宅去看看的英国官員所說的話吧。

各报在报道薩雷的驗尸官卡特先生1843年11月14日檢驗四十五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十九岁的兒子住在倫敦百蒙得錫街白獅子大院3号的一間小屋子里面；里面沒有床，沒有鋪盖，也沒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兒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粘滿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們既沒有被子，也沒有床单。羽毛牢牢地粘滿了整个尸体，不淨尸就不能进行檢驗，在淨尸的时候医生發現尸体極其消瘦而且被跳蚤、虱子等咬得遍体鱗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塊，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1844年1月15日，星期一，两个男孩子被帶到倫敦烏尔希浦街警察局的法庭上，罪状是：他們餓得受不住，偷了一家小店里的一只半生不熟的小牛蹄，并且立刻把它吃光了。法官覺得还必须进一步調查，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下列的材料：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退伍士兵（后来当了警察）的寡妇，丈夫死后留下了九个孩子，很穷苦。她住在斯比脫菲尔茲地方的奎克街普尔斯-布莱斯2号，生活極端貧困。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發現她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間不大的杂屋里面，除了两把沒有座子的旧藤椅、一張折了两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杯和一个小小的鉢子，就什么家具也沒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沒有，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圍裙包起来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鋪。他們盖的是自己的少得可怜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訴他，去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床去买食物；她

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单押在食品店里面，总之，她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發給这个女人一笔相当大的补助金。

1844年2月有人替一个六十岁的寡妇泰莉莎·比碩普和她的二十六岁的生病的女兒向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請救济。她們住在格娄弗諾方場布朗街5号的一間小小的杂屋里面，这間杂屋的大小和一个柜子差不多，里面沒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破布，这两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觉；一个木箱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母亲靠扫地賺一点錢。据房主說，她們从1843年5月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漸把一切都卖光和当光了，同时房租一次也沒有付过。——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發給她們1英鎊。

我并不想断定倫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貧穷。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勞而誠实的家庭，比倫敦所有一切闊佬都誠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無产者都毫無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沒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無家可归的来总算是幸运的。倫敦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們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謂夜店（lodging-house）里面去，用这点錢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呵！房子从地下室到閣楼都摆滿了床；每一間屋子有4張、5張、6張床——能容納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張床上睡4个、

5个、6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吵闹、打架，而如果同床铺的人彼此很和睦，那末事情就更糟；他们商量好共同去盗窃或者去干那种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兽行。而那些没钱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们就睡在哪里——在过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搅他们的任何角落里。一些人幸而走进私人慈善事业在某些地方办的收容所里面去，另一些人睡在维多利亚女王窗下的公园里面的长凳上。我们看看“泰晤士报”<sup>99</sup>在1843年10月所写的吧：

“从昨天登载的警察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每夜平均有五十个人左右在公园里面过夜，他们除了树木和堤上的几个洞穴，就没有任何东西来防御坏天气。这大半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受了士兵的引诱，被带到首都来，并且被抛弃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受命运的摆布，去挨饿受穷，她们对年轻人的恶习是毫不在乎的。

“这的确可怕。穷人总是有的。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我们觉得，在这个有数百万人口的首都中，在它的成千的小街和胡同里，总会有许多苦难，许多是很刺眼的，也有许多是永远也不会暴露出来的。

“但是，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层呻吟的人们的苦难！这里在互相冲突，这里一切矛盾都在斗

爭，只除了引誘人的惡習和接受別人引誘的惡習……但是讓人們記住一點：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的華麗的街區，每一年每一個冬天的夜里，都可以發現這樣一些年紀很輕但因染上惡習和受過折磨而顯得衰老的女人，她們被社會所唾棄，因飢餓、骯髒和疾病而活活地腐爛着。讓人們記住這些，並且要學會行動而不是議論。上帝可以做証，這種活動的場所現在是多麼廣闊！”

我在前面已經談過供無家可歸的人們寄宿的夜店。這些地方是多麼擁擠，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明。在上奧格爾街新開辦的能容300人過夜的“流浪者收容所”里面，從開始寄宿那天（即1844年1月27日）起到3月17日止，總共收容了2740人，有的住一夜，有的住了幾夜；雖然一年中比較舒適的季節已經到來，但是想到那里以及到白十字街和華坪的收容所去投宿的人却大大地增加了，而每天晚上都有許多無家可歸的人因為地方不夠而被拒絕。在另一個收容所里面，在普雷豪斯廣場的中央收容所里面，1844年的頭三個月內平均每夜有460人寄宿，總共是6681人，分發了麵包96141份。雖然這樣，但根據管理委員會的聲明，只有在城市東部也開辦了流浪者收容所時，這個收容所才能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投宿者的需要。

現在我們撇開倫敦來一個一個地看看聯合王國的其他大城市。先從都柏林開始。從海上一進入這個城市就會感到它是那樣地柔媚，正如同進入倫敦就感到它是那樣地雄偉一樣；都柏林灣可算是不列顛諸島中最美麗的一個海灣，愛爾蘭人常常把它比做那不勒斯灣。城市本身也是美麗如畫的，那里的貴族區比英國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時都柏林的窮人區卻可以歸入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惡的窮人區之列。誠然，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歸咎於愛爾蘭人的那種正是在骯髒環境中才覺得舒服的性

格。但是，既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任何大城市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成千的爱尔兰人，既然任何穷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逐漸沉沒在这种肮脏的环境中，那末，都柏林的貧穷就不是什么特別的、只有爱尔兰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都柏林的穷人区散布在全城，房屋的肮脏和不适于居住，以及街道的零乱荒蕪都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根据習芝所监督的报告<sup>⊖</sup>，可以想像这些区域的穷人的拥挤：他們說，1817年在軍营街，在52幢房子共計390个房間里面住了1318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邻近的街道上，在71幢房子共計393个房間里面住了1997人。

“在这个区域及其邻近的区域里有很多臭气熏天的(foul)小胡同和大杂院，許多地下室光綫只能从門口透进去，住的人往往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床鋪。可是，例如尼可尔生大院，在28个狹小而簡陋的房間里住着151个人，穷得在整个大院里只能找到兩張床和兩条被。”

都柏林的貧穷严重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是屬於“济貧协会”的一个慈善机关每天就要为2500人，即为全市人口的1%开着大門，——白天給他們吃，晚上讓他們走。

关于爱丁堡，艾利生博士向我們述說了类似的情形。这个城市由于它的位置优越，不愧有現代雅典之称，但是在这里，新市区

---

⊖ 皇家医学学会會員、曾任該会主席等职的威·巴·艾利生博士在他的一本書中曾引用过这个报告。这本书就是“关于苏格兰貧民的管理以及这种管理对大城市衛生状况的影响的考察”1840年爱丁堡版(Dr. W. P. Alison, F. R. S. E., fellow and late President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etc. etc. «Observ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or in Scotland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of Great Towns». Edinburgh, 1840)。作者是有宗教情緒的托利党人，是历史学家阿契波德·艾利生的哥哥。——恩格斯原注



里的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住在旧城的穷人们的肮脏贫穷也成了一个惊人的对比。如艾利生所指出的，这个相当大的城区的肮脏和丑恶并不下于都柏林的最坏的区域，“济贫协会”在爱丁堡也会发现需要救济的人数不下于爱尔兰的首都。艾利生甚至断定，在苏格兰，特别是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穷人的生活比联合王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坏，并且最穷的并不是爱尔兰人，而是苏格兰人。爱丁堡旧教传教士李博士在 1836 年曾向宗教教育委员会做证说：

“我从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像这个教区的这种贫穷。人们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任何其他财产；常常是一间屋子里住着两对夫妇。我在一天之内看过 7 幢房子，里面都没有床，有些房子里面甚至连麦秸也没有；八十岁的老头们都睡在光地板上，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脱衣服睡的。我在一个地下室里发现两个苏格兰家庭，他们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进城后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在我去的时候正在咽气；每一个家庭都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肮脏的麦秸；此外，在这个黑得甚至在白天也很难看清人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头驴子。——看了像苏格兰这个地方的这种贫穷，就是铁石心肠也会不忍的。”

汉能博士在“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上也报道了类似的事实。从一个议会报告书<sup>⊖</sup>中可以看出，爱丁堡穷人的家里是多么肮脏，可是，在这种条件下肮脏也是意料中的。晚上，鸡宿在床柱上，狗，甚至马也和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因而这些住房自然极其肮脏

⊖ “济贫法委员会就大不列颠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调查结果向内务大臣提出的报告”连同附件于 1842 年 7 月向议会提出（3 卷对开本）（«Report to the Home Secretary from the Poor-Law Commissioners, or an Inquiry into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 With Appendice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July 1842.—3 vols. in folio）。这些材料是一些医生的报告，由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爱得文·查得威克收集和整理。——恩格斯原注

和恶臭，而且各种各样的虫子都在里面繁殖起来。爱丁堡本身的布局就对住宅的这种恶劣状况起了最大的促进作用。旧城位于一座小山的两个斜坡上，沿山脊是一条大街 (high-street)。从这条大街的两边向山下伸出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由于它们是弯弯曲曲的，人们就把它們叫做 wynds〔弯街〕；这些小胡同就构成該城的無产階級区。在英格兰，每一家人都尽可能地力求住一幢单独的小房子，在苏格兰的城市里却刚刚相反，房子都盖得很高，像巴黎一样地有五六層，里面住了許多家人；因此，人们非常拥挤地塞在一个不大的空間里的情形，就更加严重了。

在英国的一本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城市工人衛生状况的文章<sup>⊖</sup>，文章中說道：“这些街道常常窄得可以从一幢房子的窗子一步就跨进对面房子的窗子；而且房子是这样高，这样一層叠一層，以致光綫很难照到院子里和街道上。城市的这一部分沒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沒有渗水井，也沒有厕所，因此，每天夜里至少有 5 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糞便要倒到沟里面去。因此，街道無論怎么打扫，总是有大量晒干的脏东西發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难聞，而且严重地損害居民的健康。如果說，在这些地方人们不仅忽視健康和道德，而且也忽視最平常的礼貌，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但如此，凡是和这个地方的居民比較熟識的人都可以証明，疾病、貧穷和道德墮落在这里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里，社会已經墮落到無法形容的下流和可怜的地步。貧穷階級的住宅一般都很脏，而且显然是从来沒有打扫过。这些住宅大半都只有一个房間，虽然空气很不流通，但是由于玻璃被打破了，窗框又不好，所以屋里还是很冷。屋子是潮湿的，往往位于地平綫以下，家具总是少得可怜或者干脆就沒有，一捆麦秸常常成为全家的床鋪，男人和女人、小孩和老头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水只有到公用的水龙头那里去取；取水的困难自然在各方面都促进了肮脏的傳播。”

在其他大海港城市中，情形也并不見得好些。在利物浦，尽管

⊖ “机工”(月刊)1843年10月号。——恩格斯原注

它的商業發達，很繁華，很富足，可是工人們還是生活在同樣野蠻的條件下。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即 45 000 人以上，住在狹窄、陰暗、潮濕而空氣不流通的地下室里，這種地下室全城共有 7 862 個。此外，還有 2 270 個大雜院 (courts)；所謂大雜院，就是一個不大的空間，四面都蓋上了房子，只有一個狹窄的、通常是上面有遮蓋的入口，因而空氣就完全不能流通，大部分都很骯髒，住在裡面的幾乎全是無產者。關於這些大雜院，我們在談到曼徹斯特的時候再來詳細地說。在布里斯托爾有一次調查了 2 800 個工人家庭，其中有 46% 每家只有一間屋子。

在工廠城市中我們也發現完全相同的情形。諾定昂總共有 11 000 幢房子，其中有 7 000—8 000 幢蓋得後牆一堵挨一堵，因而空氣就無法流通；此外，大部分是幾幢房子只有一個廁所。不久以前做了一次調查，發現一排一排的房子都是建築在僅僅蓋上了一層木板的不深的污水溝上。在萊斯特、得比和設菲爾德，情形也是一樣。關於北明翰，上述的“機工”雜誌上的那篇文章這樣說：

“在舊市區有不少地方到處是臭水洼和垃圾堆，骯髒而無人照管。北明翰的大雜院很多，有兩千多個，工人大部分都住在這種大雜院里。這種大雜院通常都很狹窄、骯髒、空氣不流通，污水溝很壞；每一個大雜院四周有 8—20 幢房子，這些房子只有一面透空氣，因為它們的後牆是和其他的房子共用的，而在院子最裡面的地方通常是一個公共垃圾坑或類似的東西，其骯髒是無法形容的。但是必須指出，較新的大雜院是建築得比較合理，保持得也比較不錯的，甚至在舊的大雜院中，小宅子也不像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那樣密集，因此，在北明翰發生流行病的時期，死亡事件就比起離開它總共只有幾英里的烏爾未漢普頓、達德里和比爾斯頓少得多。北明翰也沒有住人的地下室，雖然地下室有時不是照它應有的用途來加以使用，而在裡面設立了作坊。供無產者寄宿的夜店是很多的（400 個以上）；它們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心的大雜院裡面。幾乎所有的夜店都髒得令人作嘔，發出一股霉臭；這是乞丐、流浪漢

(trampers, 这个字的本义下面再谈)①、小偷和妓女的藏身之所。这些人住在这里,根本不讲究什么礼貌,也不要求什么舒适;他们在这种只有这些已经堕落的人才能忍受的氛围中吃饭、喝酒、抽烟和睡觉。”

格拉斯哥在许多方面是和爱丁堡相像的:有同样弯弯曲曲的小胡同[wynnds]、同样高的房屋。关于这个城市,“机工”杂志曾经这样说:

“工人阶级在这里差不多占总人口(将近30万)②的78%,他们住在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贫穷和肮脏方面超过了圣詹尔士和怀特柴泊的最糟糕的小胡同,超过了都柏林的郊区和爱丁堡的wynnds〔弯街〕。这些地区有许多在市中心——特隆盖特以南、盐市以西、考尔顿、‘大街’后面以及其他地方;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像迷阵一样的狭窄的街道和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在这些地方差不多每走一步都可以遇到破旧的、空气不流通的、好几层的、没有自来水的、半坍塌的房子所形成的大杂院或死胡同。这些房子真正是塞满了人。每一层住着三四家,有时达20人之多,有时每一层整个地都当夜店租出去,在一个房间里,不能说安插了,而简直是塞进了15个到20个人。这些区域是居民中最贫穷、最堕落和道德败坏到极点的一部分人的藏身之所,这些地方应当被看做那些可怕的要命的流行性热病的发源地,这些病就从这里蔓延到整个格拉斯哥。”

让我们看一看,政府的手工织工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詹·库·昔蒙兹是怎样描写这个城市的这些部分的③:

“我曾经看到过我国和欧洲大陆的最严重的贫穷状况,但是在我看到格拉斯哥的一片片像迷阵一样的小胡同以前,我不相信在一个文明国家里竟有这么多的罪恶、贫穷和疾病。在最下等的夜店里,一间屋子里面有10个、12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③ 詹·库·昔蒙兹“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1839年爱丁堡版(《Arts and Artisans at Home and Abroad》. By J. C. Symons. Edinburgh, 1839)。——作者本人看来是个苏格兰人,属于自由党,因而狂热地反对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这里所引证的在该书第11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个、乃至 20 个人，有各种年龄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杂乱地睡在地板上。这些房子通常 (generally) 是这样肮脏、潮湿和破烂，甚至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马放在里面。”

在另一个地方，作者写道：

“住在格拉斯哥这些贫民窟里面的经常流动的人口有 15 000 到 30 000。城市的这一部分全是狭窄的街道和当中一定有一堆垃圾的四四方方的大杂院。不论这些房子的外观是怎样糟糕，但我还是怎么也想不到里面会那样肮脏和贫穷。在我们（警监密勒上尉和昔蒙兹）<sup>①</sup> 在夜间去看过的那几个夜店里，地板上躺满了人；有男人，有女人，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体，杂乱地躺在一起，有时一间屋子里面有 15 个到 20 个人。他们的床铺是一堆半霉烂的麦秸和一些破布。家具一点也没有或者很少，只有炉子里面的火使这些洞穴有些像住着人的样子。偷窃和卖淫是这些居民的主要的生活来源。看来谁也不想把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sup>②</sup> 打扫一下，谁也不想消灭这个地狱般的洞穴，消灭这个处在王国第二大城市心脏里面的罪恶、肮脏和传染病的巢穴。在我仔细地调查其他城市最贫穷的地区的时候，无论是在道德和健康的恶化方面，还是在人口的密集方面，我都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形。地方当局承认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房屋是破烂和不适于居住的，可是，正是在这些房屋里面人住得最满，因为按照法律这些房屋是不准收房租的。”

英国中部的大工业区，西约克郡和南郎卡郡的拥有许多工厂城市的人口密集地区，是丝毫不亚于其他大城市的。约克郡西部的毛纺织业区是一片丘陵绵延、青葱翠绿的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丘陵越向西越陡峭，直到险峻的黑石山脊才达到它的最高点，形成了爱尔兰海和德意志海的分水岭。艾尔河流域和柯尔德河流域是英国最美丽的区域之一，这里密布着许多工厂、村庄和城市。里子在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这里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译者注

艾尔河畔，连接曼彻斯特和里子的铁路沿着柯尔德河前进。灰色的粗石块砌成的房屋和郎卡郡那些变黑了的砖房比起来是这样美丽，这样整洁，使人看了就觉得愉快。但是，一走到城市里面去，就会发现令人愉快的事情是很少的。如像上述的“机工”杂志在另一个地方所写的（我自己相信这种描写是正确的），里子位于

“一个向艾尔河河谷逐渐倾斜下去的斜坡上。这条河约有一英里半长的一段蜿蜒曲折地穿过该城，在解冻或大雨滂沱的时候就猛力地向四面泛滥。城西较高的地区，就这样一个大城市说来，是相当清洁的，但是位于该河及其支流（becks）沿岸的那些地势较低的地区却是肮脏的、拥挤的，它们本身就足以缩短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孩子的寿命。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一提寇克盖特、马许胡同、十字街和里士满路附近的工人区的令人作呕的情形。这些地方的街道大多数既没有铺砌过，也没有污水沟，房屋盖得杂乱无章，有许多大杂院和死胡同，甚至最起码的保持清洁的设备也没有。所有这一切就完全足以说明这些不幸的、肮脏和贫穷的渊藪中的过高的死亡率。在艾尔河泛滥的时候（顺便说一說，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sup>①</sup>，住房和地下室常常积满了水，不得不把它舀到街上去；在这种时候，甚至在有排水沟的地方，水都会从这些水沟里涌上来流入地下室<sup>②</sup>，形成瘴气一样的飽含硫化氢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呕的沉淀物。在1839年春汛的时候，由于排水沟沟水外溢竟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后果：根据出生死亡登记员的报告，本城该区本季度的出生和死亡之比是二比三，而本城其他区域同一季度内的比率却恰好相反，即出生和死亡之比是三比二”。

在这个城市的其他的人口密集地区，根本没有污水沟，或者虽有但是修得很坏，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某些街上的房屋的地下室中，很少有干燥的时候；在其他区域的许多街上，铺着厚厚的一層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② 必须记住，这些“地下室”不是堆东西的，而是住人的。——恩格斯原注

稀泥。居民一次又一次地用煤渣填平坑洼，想把街道修好，但是并没有用，一堆堆的垃圾还是到处堆着，房子里倒出来的污水还是积在水洼里面，直到风把它吹干，太阳把它晒干为止。（参看“统计学会会刊”第二卷第404页市参议会报告书）——在里子，普通小宅子所占的面积不超过5码见方，通常包括1间地下室、1间起居室和1间卧室。这些白天黑夜都塞满了人的房子里的拥挤，不仅对居民的健康而且对他们的道德都又加了一重威胁。这些小宅子是怎样拥挤，可以从上面引用过的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看出：

“在里子，我们看到过兄弟姊妹及男男女女的寄宿者和一家的父亲母亲同宿在一个房间里；由此就发生了许多使人一想到就会发抖的恶果。”

离里子仅7英里的布莱得弗德也是如此，该城位于几个河谷的交叉点上，靠近一条黑得像柏油似的发臭的小河。在晴朗的星期天——因为在工作日这城市是被灰色的烟云笼罩着的——从周围的小山上看去，该城呈现出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色；但是城市里面也和里子一样地肮脏和不适于居住。城市的老区位于陡峭的斜坡上，这些区域里的街道是狭窄而不规则的。在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里，堆着垃圾和脏东西；房屋破旧、肮脏、不适于住人，在河的紧旁边，在谷底，我看到过许多房屋，最下一层有一半陷在山坡里，根本不适于住人。在谷底，在工人住宅挤在高耸的厂房当中的地方，是整个城市中最肮脏和建筑得最糟的部分。在布莱得弗德的比较新的区域里，正像在其他任何工厂城市里一样，小宅子比较整齐，排成一系列一列的，但是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和传统的安置工人的方法分不开的一切弊病，关于这方面，在讲到曼彻斯特时，我们还要更详细地讲一下。约克郡西部其他城市如班斯里、哈里法克

斯、哈得兹菲尔德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哈得兹菲尔德由于它那令人神往的自然环境和最新的建筑形式，成为约克郡和郎卡郡一切工厂城市中最美丽的一个，但是它仍然有许多坏的区域。由市民大会选出的城市调查委员会在1844年8月5日的报告中写道：

“大家知道，在哈得兹菲尔德，整条整条的街道和许多胡同及大杂院都既没有铺砌，也没有下水道或其他任何排水沟；这些地方堆积着污泥、垃圾和各种废弃物，这些废物在逐渐腐烂、发酵；几乎到处都有污水洼，因此，这里的住宅都是又脏又坏，以致疾病丛生，威胁着全城的健康。”<sup>100</sup>

如果我们步行或坐火车越过黑石山脊，我们就到了英国工业完成了自己的杰作的典型基地，英国的整个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即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南郎卡郡。现在，我们面前又是一片丘陵绵延的美丽的地区，这地区从分水岭往西向爱尔兰海慢慢倾斜下去，就是里布尔河、艾尔威尔河、梅塞河以及这三条河的支流的令人心曠神怡的碧綠的夹谷。一百年前左右，这地方大部分还是一片居民稀少的沼泽，现在却布满了城市和乡村，成为英国的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了。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的发源地，也是英国工业的中心。曼彻斯特的交易所是英国工业生活中的一切波动的寒暑表；曼彻斯特的现代化的生产已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在南郎卡郡的棉纺织业中，自然力的利用、机器（主要是动力织机和骡机）对手工劳动的排挤以及分工都达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三个要素是现代工业的特征，那末我们必须承认棉花加工业在这方面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走在其余一切工业部门的前面的。现代工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在这里一定会达到最充分最完备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在这里一定会以最典型的形式出现；工人由于蒸气力和机器的应用以及分工而受到的屈辱在这里一定会达



到極点，工人一定会很清楚地意識到这种屈辱；同时無产阶级摆脱这种屈辱的企圖，在这里也一定会达到極点并带有高度的自觉性。因为曼徹斯特是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也因为我对它的了解就像对自己的故乡一样，并且比該城的大多数居民还了解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城市我們要多談一些。

曼徹斯特周圍的城市，就工人区的情况說，和中心城市很少有什么差别，只是这些城市的工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曼徹斯特更大。这是一些純粹的工业城市，它們的一切商業活动都是在曼徹斯特或通过曼徹斯特进行的；它們在各方面都依賴曼徹斯特，因此，居民只有工人、厂主和小商人，而曼徹斯特还有大批商業人口、許多委托商店和大零售商店。所以，像波尔頓、普累斯頓、威根、柏立、罗契得尔、密得尔頓、海华德、奥尔丹、埃士頓、斯泰里布雷芝、斯托克波尔特等城市，人口虽然有 3 万、5 万、7 万，甚至 9 万，但是它們几乎都是些大的工人区，只是有一些工厂、几条大街和几条市外公路把它們隔开，大街两旁是商店，公路两旁是厂主的有花园圍繞着的別墅似的房子。这些城市本身都建筑得坏而杂乱，有許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它們的建筑物是用鮮紅的、但時間一久就会变黑的磚（这里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修成的，就給人一种特別陰暗的印象。把地下室当做住宅，在这里是很普通的；凡是可挖洞的地方，都挖成了这种深入地下的洞，而很大一部分居民就住在这样的洞穴里面。

除普累斯頓和奥尔丹外，位于曼徹斯特西北 11 英里的波尔頓算是这些城市中最坏的了。我到那里去过好多次，就我所看到的來說，这个城市只有一条大街，而且很脏，这就是第恩斯盖特街，这条街同时也是市場；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陰

森森的討厭的大窟窿，虽然这里除了工厂就只有一些一两層的矮房子。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城市中較老的一部分是特別荒凉和难看的。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說这是一条小河还是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很不清潔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

以下就說斯托克波尔特，它虽然位于梅塞河的柴郡那一面的河岸上，但仍属于曼徹斯特工業区。它夹在沿梅塞河的一个狭谷里面，街道在河岸的一边是陡峭地順山而下，在另一边是同样陡峭地順山而上。从曼徹斯特到北明翰的铁路就通过高架桥越过这个城市和整个狭谷的上空。斯托克波尔特在全区是以最陰暗和被煤烟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出名的，事实上也的确給人一种特別陰沉的印象，从高架桥上看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那些从谷底到山頂一长条一长条地分布在全城的無产者的小宅子和地下室給人們的印象还更加陰沉。就我的記憶所及，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見过这样多的住人的地下室。

在斯托克波尔特东北数英里，是埃士頓-安得-萊因，这是这个区最新的工厂城市之一。它在一个山坡上，运河和泰姆河从山麓流过，一般說来是按照新的比較有規則的体系建筑起来的。五六条平行的长街沿山崗橫排着，它們和其他向河谷傾斜下去的街道交叉成直角。在这样一种街道分布体系下，工厂都被排挤到市中心以外去了，何况为了要靠近水源和水路交通綫，这些工厂本来就会集中在河谷底部的；在这里，工厂全都挤在一起，从烟囱里噴出濃烟。因此，埃士頓比起大多数其他的工厂城市来，給人的印象要舒服得多：街道比較寬闊、清潔，鮮紅色的小宅子看起来比較清新悅目。可是工人小宅子的这种新的建筑体系也有坏的一面，因为

在每一条这样的街道的后面都隐蔽着一条脏得多的后街，由一条狭窄的夹道通到那里去。在埃士顿，除了市郊的几幢房子，我没有看到过一幢可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些街道，街上的小宅子又坏又破，砖头摇摇欲坠，墙壁现出裂痕，涂在里面的泥灰也已经脱落了；这些街道被煤灰弄得又脏又黑，它的面貌，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不比该区其他城市的街道好一些，只是在这里这样的街道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一种例外。

再往东一英里是斯泰里布雷芝，这个城市也在泰姆河畔。如果从埃士顿登山，那末从山顶向左右眺望都会看到许多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别墅一样的华丽的住宅，其建筑式样大部分是伊丽莎白式，这种式样和哥德式的关系正像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一样。再向前走一百步，河谷里的斯泰里布雷芝就出现在眼前。但是和那些华丽的别墅，甚至和埃士顿那些朴素的小宅子比起来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呵！斯泰里布雷芝在一个比斯托克波尔特夹谷还要狭窄的弯弯曲曲的狭谷里面，夹谷两边的斜坡上杂乱无章地布满了小宅子、房屋和工厂。在走近城市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城的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只有很少的几条街伸展在狭窄的谷底；大部分街道是纵横交错的，沿着斜坡时起时伏。由于街道分布在这种倾斜的地势上，几乎一切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有一半陷到地里面去。在这种紊乱的建筑体系下形成多少堆大杂院、后街和小胡同，从山上朝下看就可以看见。从山上看下去，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就像一幅鸟瞰图一样地展现在下面。再加上可怕的肮脏，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郊区很美丽的城市却给人这样一种可憎的印象。

关于这些較小的城市，我們已經說得不少了。这些城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一般說来这些城市里的工人的生活是和曼徹斯特一样的。因此，我只描写了每一个城市的建筑形式的特点，但要补充一点，就是对曼徹斯特工人住宅状况的一般特点的一切評論，对它周圍的这些城市也是完全适用的。現在我們就来談这个中心城市吧。

曼徹斯特位于一串小山的南山坡下，这一串小山从奥尔丹起綿延于艾尔威尔河和梅德洛克河的河谷間，到克薩尔-摩尔山达到終点，这是曼徹斯特的跑馬場和“聖山”<sup>101</sup>。曼徹斯特本城位于艾尔威尔河左岸，在該河及其两条支流——艾尔克河和梅德洛克河之間，这两条小河就在这里流入艾尔威尔河。在艾尔威尔河右岸，在这条河的急轉的河曲环抱之处是索尔福，再往西是盆德尔頓；艾尔威尔河北边是上布劳頓和下布劳頓；艾尔克河北边是奇坦希尔，梅德洛克河南边是休尔姆，再往东是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頓，再往前，差不多在曼徹斯特以东是阿德威克。所有这些房屋的总和，通常就叫做曼徹斯特，这里的人口至少有40万，也許还要多。这个城市建筑得如此特別，人們可以在这里住上多少年，天天上街，可是，如果他只是出去办自己的事或散步，那就一次也不会走进工人区，甚至連工人都接触不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無意識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識的打算，工人区和資產階級所占的区域是極严格地分开的，而在那些不能公开这样做的地方，这种事情就在慈善的幌子下进行。在曼徹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闊的长寬各为半英里的商業区，几乎全区都是營業所和貨棧（warehouses）。这个区域几乎整个都是不住人的，夜里寂靜無声，只有值勤的警察提着遮眼灯在狹窄而黑暗的道路上巡邏。这个地区有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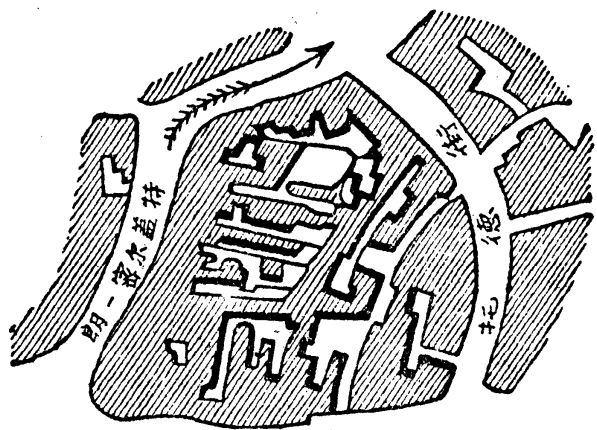
条大街穿过，街上非常热闹，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是些辉煌的商店；在这些街上，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了人，这里的市面是不到深夜不停止的。除了这个商业区域，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的全部、盆德尔顿和却尔顿的大部分、阿德威克的三分之二以及奇坦希尔和布劳顿的个别地区，——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即在却尔顿和在奇坦希尔的较低的地方，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却尔顿和阿德威克的郊外房屋或别墅里，或者住在奇坦希尔、布劳顿和盆德尔顿的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能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诚然，这些商店和它们背后的那些区域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商业区和靠近资产阶级住区的地方，商店就比背后藏着工人们肮脏的小宅子的那些商店更漂亮些。但是，为了不使那些肠胃健壮但神经脆弱的老爷太太们看到这种随着他们的富贵豪华而产生的穷困和肮脏，这些商店总算是够干净的了。例如第恩斯盖特街从老教堂一直向南伸展，在起头的地方是两排货棧和工厂，接着是第二流的商店和几个啤酒店，再往南去，就是商业区的尽头，这里是一些比较难看的商店，愈往南，就愈肮脏，同时酒店和小饭

館也愈來愈多，最後，在街道的南端，小店的外貌就使人絲毫不會懷疑這些小店的主顧是工人，而且也只是工人。從交易所向東南伸展的市場街，看上去也是一樣：最初是些第一流的華麗的商店，樓上是營業所和貨棧；接着（在皮卡第萊）就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大旅館和貨棧；再往前去（在倫敦路），在梅德洛克河旁，是工廠以及為資產階級下層和工人開設的小酒店和商店；再往前，在阿德威克-格林附近，是高等和中等資產階級的房屋，在它們後面，是那些最富有的廠主和商人的大花園和別墅。這樣，了解了曼徹斯特，就可以從幾條大街推出和它們毗連的地區的情況，但是很少能由此看出工人區的真正面貌。我知道得很清楚，這種偽善的建築體系是或多或少地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我也知道，零售商因其所經營的商業的性質就必須住在繁華的大街上；我知道，在這種街道上好房子總比壞房子多，這一帶的地價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畢竟還沒有看到過一個地方，像曼徹斯特這樣有系統地把工人階級排斥在大街以外，這樣費盡心機把一切可能刺激資產階級的眼睛和神經的東西掩蓋起來。然而，曼徹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個城市都建築得更不合警察的規定，更沒有一定的計劃，而是更偶然地堆積起來的。當我連帶考慮到資產階級那種熱心的保證，說什麼工人生活得很好的時候，我就覺得，那些自由派廠主，曼徹斯特的《big wigs》<sup>①</sup>對該市的這種可恥的建築體系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的。

還要補充一下的，就是幾乎所有的廠房都是沿着貫串全城的三條河流和各種運河建立起來的，現在我就來描述工人區本身的

<sup>①</sup> 這是一個無法翻譯的雙關語。英語中《big wigs》的意思是“要人”或“大亨”，而和它發音相同的《big whigs》的意思却是“輝格黨巨頭”。——譯者注

情形。首先要谈的是曼彻斯特旧城，它位于商业区北边和艾尔克河之间。这里的街道，即使像托德街、朗-密尔盖特、威色-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些比较好的街道，也都是又狭窄又弯曲的，房屋又肮脏又破旧，胡同里的建筑更是令人作呕。如果从老教堂顺着朗-密尔盖特街走去，就会看到右边有一排老式房屋，这些房屋的門面沒有一間不是东倒西歪的，——这是旧曼彻斯特，工业时代以前的曼彻斯特的殘迹，以前住在这里的居民和他們的子孙都搬到本城建筑得較好的区域去了，而把这些对他們太不合适的房屋留給包括很多爱尔兰人在內的工人居民。这里才真正是一个几乎毫不掩飾的工人区，甚至大街上的商店和酒館也沒有人想把它們的外表弄得稍微干净一些。但是这一切和后面那些只有經過狹窄得甚至不能同时走两个人的过道才能进去的胡同和大杂院比起来簡直就算不了什么。像这样違反合理的建筑术的一切規則而把房子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弄得一所貼着一所地挤作一堆，实在是不能想像的。而且这不能只怪建筑物是旧曼彻斯特时代保存下来的。这种杂乱無章的情形只是在最近才达到頂点，現在，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的建筑方式比較古老因而还保留下那么一点点空隙，人們就在这里补盖起房子，把这个空隙填起来，直到房子和房子之間連一小塊可以再建筑一些东西的空地也沒有为止。我現在从曼彻斯特的平面圖上描下一小塊来証实我的話。这远不是最坏的一塊地方，而且



芬諾尔街

占地还不到整个旧城的十分之一。

这张图可以充分地表明全区的、尤其是艾尔克河附近的建筑方式是如何不合理。在这里，河的南岸很陡，有 15 英尺到 30 英尺高；在这个陡坡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三排房屋，最下面一排紧靠水边，而最上面一排却已经是屋檐齐及山顶，面临着朗-密尔盖特街。此外，河岸上还有工厂，总之，这里的建筑也和朗-密尔盖特街下段一样密集而杂乱。大街左右有很多有顶的过道通到许多大杂院里面去；一到那里，就陷入一种不能比拟的肮脏而令人作呕的环境里；向艾尔克河倾斜下去的那些大杂院尤其如此；这里的住宅无疑地是我所看到过的最糟糕的房子。在这里的一个大杂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这是艾尔克河畔杜西桥以上的第一个大杂院——我指出这一点，是考虑到可能有人要想证实一下我的话；下面紧靠着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要到杜西桥以下的那些大杂院里去，大半要从一条狭窄而肮脏的台阶走下去，而要进入屋内就必须跨过一堆堆的垃圾和脏东西。桥以下的第一个大杂院叫做爱伦大院；在霍乱流行的时候，这里的情况曾使卫生警察不得不命令居民都搬出来，清扫一番，并用氯气把房子熏一遍；凯博士在一本小册子<sup>⊖</sup>里，对这个大杂院当时的情况曾做过

⊖ 医学博士詹·菲·凯“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1832年第2版（《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 By James Ph. Kay, Dr. Med. 2nd edit. 1832）。作者对一般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没有加以区别，但是在其他方面，这是一本出色的书。——恩格斯原注



一番令人惊心动魄的描述。从那时起，这个大杂院显然已经有一部分拆掉重新盖过了；至少从桥上看下去，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些断垣残壁和高耸着的垃圾堆旁边有几所较新的房屋。从桥上看到的这幅景象——一堵一人高的石墙小心翼翼地遮住了这幅景象，使个子不很高的过路人无法看到——就是全区的一般面貌。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齷齪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这就容易想像到这条河留下的沉积物是些什么东西。桥以下，可以看到陡峭的左岸上大杂院里的垃圾堆、脏东西、泥土和瓦砾；房屋一所耸立在一所后面，由于坡很陡，每一幢房子都看得见一小块；所有这些房屋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在后面，是旧的兵营式的工厂厂房。在比较平坦的右岸，是一长排房屋和工厂。靠边的第二所房子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废墟，里面堆满了垃圾，而第三所房子造得这样低，它的最下一层竟不能住人，所以就沒有窗子，也沒有門。在这后面，是穷人的墓地和利物浦一里子铁路的车站，再往后就是習艺所——曼彻斯特的“穷人的巴士底狱”，它像一座城堡，从小山上的锯齿形的高墙后面森严地俯视着对岸的工人区。

杜西桥以上，左岸較平，右岸較陡，但是两岸住房的情况絲毫也不見得好些，而且更坏了。在这里只要从朗-密尔盖特这条大街向左一拐弯，就会迷失方向；走出一个大杂院又走进另一个大杂院，走过一些拐角、一些狹窄而肮脏的胡同和过道，几分鐘以后，终于墮入五里霧中，根本不知道天南地北了。到处都是半倒塌或完全倒塌了的房屋，其中有一些事实上已經沒有人住了，这种情形是很耐人寻味的；房子里很少有鋪上木板或石板的，几乎到处都是破烂的装置得很坏的窗和門，而且是多么肮脏！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廢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無論如何不能在这里住。不久以前，由于里子铁路新修的延长出来的一段要在这里跨过艾尔克河，这些大杂院和胡同的一部分被拆掉了，可是余下的部分却暴露在人們的眼前。例如在鉄桥附近就有一个大杂院，它那肮脏的令人作嘔的面貌远远地超过其他一切大杂院，这是因为以前它四周都有房子包圍着，很难走到里面去；尽管我認为自己很熟悉这一带地方，假若不是建筑铁路桥梁时打开了缺口，我也永远不会發現这个大杂院。沿着坑坑洼洼的河岸，从上面拉着晒衣服的繩子的那些木桩旁边走过去，就走进了这一堆乱七八糟的矮小的平房中，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土地，地上沒有鋪任何东西，每一家都只有一个房間，厨房、起居室、臥室，什么都是那一間唯一的房子。在这样一个长不到6英尺寬不到5英尺的洞穴里，我看到了两張床——这算什么床鋪呵！——另外再加上一張梯子和一个爐灶，正好填滿了整个房間。在其他許多小屋里，我根本就什么也沒有看到，虽然門是敞开的，而住的人就站在門口。門前到处是脏东西和垃圾；垃圾下面似乎是鋪了石头的，但是看不見，只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用脚踏下

去才感觉得到。这一整堆住着人的牲畜栏，两面被房屋和工厂包围着，第三面是河。这里，除了一条沿河的狭窄的小路，只有一个狭窄的有顶的过道通到外边去——通到另一片几乎建筑得一样坏和一样不整洁的像迷阵一样的房屋里面去。

这已经够了！整个艾尔克河河岸的房屋都是这样建筑的。这是一些毫无计划地胡乱堆在一起的房屋，全部都已經或多或少地接近于倒塌了；房屋内部的肮脏零乱和周围的肮脏环境完全相配称。住在这里的人怎么能够讲究清洁呢？要知道，他们就连大小便的地方也没有。这里的厕所是这样少，每天都积得满满的；要不就离得太远，大部分居民都无法利用。附近只有艾尔克河的脏水，而自来水和抽水机又只是那些“体面的”市区里才有，人们怎么能够洗澡呢？现代社会中的这些奴隶的住屋并不比杂在他们小屋之间的那些猪圈更干净些，这实在是不能怪他们的！苏格兰桥以下沿岸有六七间地下室，室内的地面和离它不到6英尺远的地方流过的艾尔克河水浅时的水面比起来，至少要低两英尺，对岸桥以上离桥不远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房屋，最低一层没有门，也没有窗，根本不能住人（而这种情况在这一带并不少见）；还应当指出，由于没有更适当的地方，附近居民经常用这种敞开的最低一层房子做公共厕所，——像这幢房子的上面一层和那六七间地下室，房主们还恬不知耻地把它们出租！

我们撇开艾尔克河，再钻到朗-密尔盖特街另一边的工人住宅的中心去，我们就会走进一个稍微新一点的工人区，这个区域从圣迈克尔教堂起一直伸展到威色-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里至少比较整齐一些。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紊乱不堪的建筑，至少是可以发现一些长而直的街道和死胡同，以及按照一定计划建筑起来的通

常是四方形的大杂院。但是，如果说前面那些区域里的每一幢房子都是胡乱地建筑起来的，那末，在这里，这种胡乱建筑的做法却表现于整条整条的街道和整个整个的大杂院，在建筑这些街道和大杂院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到其他街道和大杂院的地位。街道时而朝这一面转，时而又朝那一面转，每走一步都会闖入死胡同或者碰上死角，使你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要不在这个迷阵里住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就怎样也摸不清这里的方向。这些街道和大杂院的通风（如果这个词还可以用到这里的话）状况和艾尔克河一带一样坏；虽然这个区域在某些方面比艾尔克河流过的那个区域优越一些（这里的房屋比较新，有些街道间或还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几乎每一所房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而这在艾尔克河畔，由于房屋比较陈旧，建筑得也比较马虎，就很少看到了。在其他方面，如脏东西、垃圾堆、灰堆和街道上的死水洼，却是两个地方都有的，而在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区域里，除了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碍居民的清洁的情形，这就是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这里，正像曼彻斯特大多数其他工人区一样，腊肠制造商把院子租下来，在那里盖起猪圈；几乎每一个大杂院里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隔开的角落，院里的居民把一切废弃物和脏东西都往里扔，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面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的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穿过这个区域，修筑了一条相当体面的宽阔的街道——密勒街，这样，这里的背景就相当成功地被隐蔽起来了，但是谁要是为了好奇，走进许多条通向大杂院的过道中的一条去看看，那末每隔 20 步他就会碰到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猪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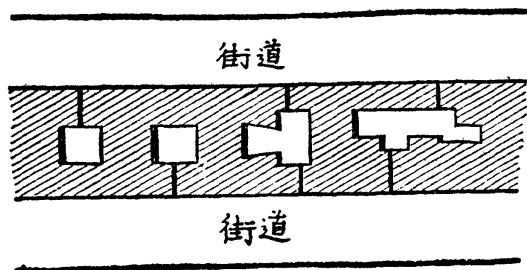
曼彻斯特旧城就是如此。重讀了一遍自己对它的描写，我应当說，我不仅絲毫沒有夸大，而且正好相反，对这个至少住着两三万居民的区域，我还远沒有把它的肮脏、破旧、昏暗和違反清潔、通風、衛生等一切要求的建筑特点十分鮮明地表現出来。而这样一个区域是在英国第二大城，世界第一个工厂城市的中心呀！如果想知道，一个人在不得已的时候有多么小的一点空間就够他活动，有多么少的一点空气(而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呵!)就够他呼吸，有什么起碼的設備就能生存下去，那只要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就足够了。不錯，这是旧城，——和当地居民談到这个人間地獄的可憎的状况时，他們就会強調这一点，——但是这能說明什么呢？要知道，一切最使我們厭恶和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業时代的产物。屬于旧曼彻斯特的那几百所房子老早就被原来的住戶遺弃了，只是工業才把大批的工人(就是現在住在那里的工人)赶到里面去；只是工業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間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業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只是工業才使这些牲畜栏的主人有可能仅仅为了自己發財致富，而把它們当做住宅以高价租給人們，剝削貧穷的工人，毀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只是工業才可能把剛摆脱掉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做無生命的物件，当做一件东西来使用，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錢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業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沒有工人的貧困和被奴役，工業是不可能存在的。固然，这些区域原来的规划就不好，很难从这种规划中弄出什么好东西来。但是在改建时，土地占有者做了些什么，地方当局又做了些什么来加以改善呢？什么都沒有做。相反地，只要哪里还空下一个角落，他們

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們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地价随着工業的發展而上漲，而地价愈是漲得高，就愈是瘋狂地在每一小塊土地上乱盖起房子来，一点也不考虑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賺錢，反正無論多坏的小屋，总会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穷人的。但是这到底是旧城，——資產階級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那末我們来看看新城(the New town)是怎樣的吧。

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 Irish town)，在旧城的那一边，在艾尔克河和聖乔治路之間的粘土小山上。在这里，城市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片迷陣似的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房屋，或者不如說是小宅子，情形都很糟，从来不修理，肮脏，有潮湿而齷齪的住人的地下室。街道既沒有鋪砌，也沒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無數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蹒跚。这里街上的污泥竟这样厚，只有在天气很干燥的时候，才能希望走过这里而不致讓烂泥掩沒了脚背。在聖乔治路附近，一堆一堆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集在一起，到处是一条条的街道、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愈接近市中心，就愈是挤在一起，愈是乱七八糟。固然，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鋪砌过的街道，或者至少也可以看到鋪砌过的人行道和污水沟，但是肮脏的情形，以及房屋，特别是地下室的恶劣状况还是一样。

在这里，不妨一般地談談曼徹斯特流行的工人区的建筑形式。我們已經知道，在旧城，房子的排列大半是純粹出于偶然的。每一所房子在建筑时都沒有考虑到其余的房子，而几所房子中間的一塊不規則的空地，由于沒有其他名字可用，就称它为大杂院(court)。

在这个区域中的一些稍微新一点的地段和工业繁荣初期形成的其他一些工人区里，房子的分布是比较有计划的。两条街道之间的地方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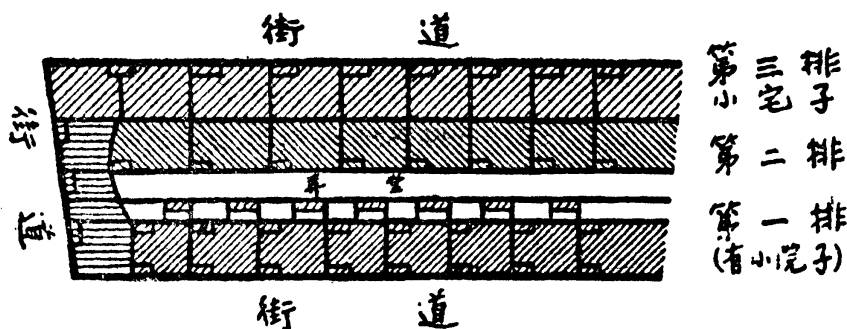


划分为较有规则的多半是四方形的大杂院，这些大杂院一开始就是以近似附图所表示的那种样子盖起来的，经过有顶的过道从街上通到里面去。房子的完全没有计划的分布固然很妨碍通风，因而对居住者的健康非常有害，但是这种把工人关在四面都被建筑物围起来的大杂院里的办法就更有害得多了。这里空气根本不能流动；只是在生火的时候，烟囱算是大杂院中闷人的空气的唯一出口<sup>⊖</sup>。此外，这些大杂院里的房屋大半都是两排盖在一起，两排房子共用一堵后墙，这就足以使那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通风了。又因为街道警察对这些大杂院的情况漠不关心，同时房屋里扔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扔在什么地方就留在什么地方，所以，在那里看到脏东西以及一堆堆的煤灰和垃圾，也就用不着惊奇了。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大杂院（在密勒街），这些大杂院至少要比大街低半英尺，没有排水沟，下雨时积起来的水一点也流不出去！

后来出现了另一种建筑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普遍地采用了。现在，工人小宅子几乎再也不一所所地盖了，总是一盖就是几十

⊖ 但是，有一位聪明的英国自由党人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硬说，这些大杂院是城市建筑艺术的杰作，因为它们像许多露天的小方场一样，可以改善通风状况，促使空气流通！假如每一个大杂院都有两个或四个宽阔的露天的面对面的出口，让空气可以自由流通，那也许真可以改善通风状况，促使空气流通；但是这些大杂院从来也没有两个这样的露天出口，甚至难得有这么一个，几乎一切大杂院都只有一条狭窄的有顶的过道。——恩格斯原注

所,甚至几百所;一个業主一下子就盖它一整条或两三条街。这些街道排列如下:第一排是比較高級的小宅子,很幸运,这些小宅子有一个后門和一个小院子,因而房租也最貴。这些小宅子的院子通向一条两端都盖有房子的弄堂(back-street),其中一端有一条窄縫或有頂的过道通到这条弄堂里去。大門开在弄堂里的那些小宅子,房租最便宜,一般也照管得最坏。它們和第三排小宅子共用一堵后牆,第三排小宅子的門开在另一条街上,房租比第一排便宜,但比第二排貴。这样,街道的布置情况就約略如下圖:



由于房屋和街道是这样排列的,所以第一排小宅子的通風还相当不錯,第三排的通風至少也不比前一种建筑形式中类似的小宅子差;但是中間一排的通風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大杂院中的小宅子一样坏,而弄堂也并不比大杂院更整潔些。業主們宁願要这种建筑方式,因为它既节省地面,又使他們能通过第一排和第三排小宅子的較高租金来更順利地掠夺工資比較多的工人。

这三种小宅子建筑形式不仅在全曼徹斯特,甚至在整個郎卡郡和約克郡都可以看到,它們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但大半都单独存在,所以仅仅从这一特征就可以看出城市各部分的相对年齡。第三种形式,即有弄堂的那一种形式,在聖乔治路以东、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两边的广大工人区里占有絕对的优势,在曼徹斯特



的其余工人区和郊区也很常见。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叫做安柯茨的广大区域里，沿着两条运河集中了曼彻斯特的大部分最大的工厂——六七层高的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及其细长的烟囱聳立在低矮的工人小宅子的上空。所以这个区域的居民主要是工厂工人，而住在最坏的街上的则是手工織工。靠近市中心的一些街道是最老的，因而也是最坏的，但是这些街道都鋪砌过而且还有污水沟；在这里我是把那几条同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靠近而又与之平行的街道算在里面的。再向东北可以看到几条新修建的街道；这里的小宅子看起来漂亮而又清潔，新的門窗刚刚刷上油漆，室内也粉刷得干干净净；街上空气比較流通，街道之間还没有盖房子的空地比較大，也比较多。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少数住宅的情况。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这就是几乎每一幢小宅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許多街道都没有鋪砌，也没有排水沟；而重要的是这个漂亮的外表仅仅是一种伪装，这种伪装过十年就什么也不会留下了。原因是这些小宅子并不比街道建筑得好一些。初看起来，所有这些小宅子都非常漂亮而坚固，外表結实的磚牆騙过了人們的眼睛，如果經過新建的工人区而不看一看那些弄堂，也不仔細看一下房屋是如何建筑的，那就会同意那些自由派厂主的說法：任何地方的工人也没有英国这样好的住宅。但是，只要走近細看一下，就会發現，这些小宅子的牆是薄到不能再薄了。支持地下室、房屋底層和屋頂的重量的外牆，最多也不过一塊磚那么厚，也就是每一行中，磚的长边是紧靠在一起的(□□□□)；但是，我也看見过不少同样高的小宅子(其中有些在我看到时还正在建造)，它們的外牆只有半塊磚那么厚，因为磚不是橫排而是直排的，就是說，不是长边靠在一起，而是短边靠在一起(□□□□)。

这样做，一半是为了节省材料，一半是由于盖房子的業主向来不是地基的所有者，按照英国的習慣他們把地基租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九十九年；期限一滿，地基和它上面的一切建築物都要毫無代價地歸還原主。所以租地的人总是精打細算使自己盖的房子在土地租賃期滿時尽可能地变得不值錢；而由于这种小宅子常常是在滿期前二三十年才盖起来的，这就容易了解，盖房子的業主是不願意在这上面多花錢的。此外，这些業主多半是建筑公司老板或厂主，他們很少或根本不願花錢修繕，这一半是由于他們不願意减少自己的收入，一半是由于租期短促的緣故；在商業危机来临，大批工人失去工作的时候，往往整条整条的街都空起来，因此，小宅子很快就倒塌毀坏，不能住人了。根据一般的估計，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当你看到那些新房子的似乎可以維持几个世紀的外表美丽而結实的外牆时，你会覺得这种說法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实际情形却是这样：建造房屋的时候光打小算盘，以后又絲毫不加修繕，房屋时常空起来，住戶經常更动，最后，在能够住人的最終十年里，房客——大部分是爱尔兰人——又大肆破坏，常常把房屋里的木質部分拆下来生火，由于这一切，这些小宅子过了四十年就变成一堆瓦砾了。这就說明了一个事实：在工業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本世紀才修建起来的安柯茨区，也还是有許多破旧的倒塌的房子，而大部分房子現在甚至已經到了能够住人的最后阶段了。至于这样白白地浪費了多少資本，以及只要在建筑上和以后的修理上怎样稍微多花一点錢，就可以使这个区域在許多年中保持清潔、像个样子和能够住人，这我就不談了。我在这里要談的只是房屋的状况和居住者的生活条件，在这一方面我应当說，再也沒有比这种安置工人的制度更有害更伤風敗俗的了。工人不得

不住在这种恶劣的小宅子里面，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去租较好的房子，或者是因为他们做工的工厂附近没有较好的房子，有时也因为这些小宅子是厂主的，厂主只是在工人租他的小宅子时才给工人工作。自然，这种四十年的期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如果房屋是在鬧市里，那末，即使地租昂贵，但是总有希望找到住戶，所以房主就会做一些修繕工作使房子在四十年以后还多少能住人；当然，他们所做的只是最必需的，而且这些修理过的房子正是最坏的。有时，在流行病威胁之下，卫生警察们平时酣睡着的良心惊醒了，于是他们就到工人区来进行突击检查，把整排整排的地下室和小宅子封闭起来，譬如在奥尔丹路附近的許多胡同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会持续多久，这些被禁止住人的房屋很快又住上了人；而且房主寻找新房客的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占便宜，因为人们知道，卫生警察一时半时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曼彻斯特的东郊和东北郊是资产阶级唯一没有替自己盖上房子的郊区。原因是这里一年中要刮上十个月到十一个多月的西风和西南风，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而这种煤烟确实是不不少的！）。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

在大安柯茨街以南是一个建筑了一半的巨大的工人区——一片光秃秃的丘陵地带，上面零零落落毫无规则地散布着一排排或排成四方形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一片空地，地下是粘土，高低不平，不长草，一下雨就几乎不能通行。这里所有的小宅子都肮脏而破烂，常常是建筑在低洼的大坑里，一般说来很像新城。北明翰铁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

味，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这里的河岸大部分是陡峭的，房屋一直建筑到河边，和我们在艾尔克河沿岸看到的完全一样；房屋和街道的规划无论是在曼彻斯特方面的，或是在阿德威克、却尔顿和休尔姆方面的，都同样糟糕。但是最可怕的地方——假若我对每个地方都仔细地一一加以描绘，那就没有一个完了——是在曼彻斯特这边，在牛津路西南，叫做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在梅德洛克河的一个河湾里，有一块相当深的凹地，四周都是很高的工厂、很高的河堤和盖了房子的河岸。在这块凹地里，密集着两片小宅子，共有两百所左右，大部分都是两所共用一堵后墙；一共约有4000人住在这里，几乎全是爱尔兰人。小宅子都很破旧，肮脏，小得不能再小；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大部分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妇女和孩子们到处走来走去，穿得破破烂烂，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烂泥坑里打滚的猪一样地肮脏。总之，这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讨厌，这样不顺眼，就是艾尔克河沿岸最坏的大杂院也不至于如此。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像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任何人只要看一看这个区域的外表，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又听说，这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楼有时

再加上一間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 20 个人；听说在这个区域里，大约每 120 人才有一个厕所（不用说，这厕所多半也是根本不能使用的）；听说不管医生们如何进行宣传，不管卫生警察在霍乱流行时就小爱尔兰的状况怎样发出警报，现在，在 1844 年，小爱尔兰的状况还是和 1831 年完全一样，听到这些话，他会说些什么呢？——凯博士说<sup>⊖</sup>，在这个区域里，不仅是地下室，甚至所有房屋的第一层也都是潮湿的；过去有许多地下室曾经用泥土填掉，但现在渐渐又被挖开，住上爱尔兰人；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它的地面比河面还低，水经常从一个用粘土封住的窟窿渗入屋内，住在里面的一个手工织工每天清早都必须把水舀出，倒到街上去！

稍稍往下，在梅德洛克河左岸，是休尔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工人区，情形和安柯茨几乎毫无区别。在建筑物比较密集的区域，房屋比较坏，而且都快要倒塌了，在居民比较少的地方，建筑物比较新，空气也比较流通，但大部分都淹没在肮脏里面。而且无论在哪里，房屋总是在潮湿的地方，无论在哪里，都有住人的地下室和弄堂。梅德洛克河对岸，曼彻斯特本城，是第二个大的工人区，它沿着第恩斯盖特街两旁一直伸展到商业区域，在许多地方都丝毫不亚于旧城。特别是在紧靠着商业区的地方，在桥街和码头街之间，公主街和彼得街之间，建筑物密集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要超过旧城中最狭小的大杂院。这里有許多狭长的胡同，这些胡同之间是狭小的、角落很多的大杂院和过道，它们的出入口是这样紊乱，如果不熟悉这个迷宫中的每一条过道和每一个大杂院，那就每

---

⊖ 見前面引用过的凱博士的著作。——恩格斯原注

一分鐘都有走入死胡同或走到完全沒有打算去的地方的危險。据凱博士說，住在这个拥挤、破落而肮脏的区域里的，是曼徹斯特居民中最墮落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的職業就是盜窃或卖淫；这种說法在今天显然还是正确的。在1831年，衛生警察曾来到这里，發現这里和艾尔克河沿岸或小爱尔兰一样脏（我可以証明，目前的情况并不見得好多少）；此外还發現，在議會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廁所，而在議會道，每三十幢住滿了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廁所。

过了艾尔威尔河，在这条河所形成的一个半島上，我們可以看到有8万居民的索尔福城，这里實質上是一个工人区，只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橫貫其中。曾經有一个时候，索尔福比曼徹斯特更为重要，是四周各个区域（Salford Hundred——索尔福群城）的中心，这些区域直到現在还叫这个名字。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相当古老的、因而直到現在还是肮脏而破落的、非常不衛生的地区；这个地区位于曼徹斯特老教堂对面，情况之糟和艾尔威尔河对岸的旧城完全一样。离河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比較新的地区，但是也已经超过了四十年，因而也是够破的。整个城市都是由大杂院和狭窄的小胡同所組成的，这些小胡同狭窄的程度，使我想起我过去看到过的最狭窄的街道——热那亚的狭窄的小街。在建筑方式上，索尔福比曼徹斯特还要坏得多，在清潔方面也是这样。在曼徹斯特，警察間或（每隔六年到十年）还到工人区去一次，封閉一些最坏的住宅，强迫人們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中最脏的地方打扫一下，而在索尔福，警察显然是从来不这样做的。礼拜堂街、格林盖特和砂砾胡同两边的小胡同和大杂院，大概从造好以后一次也沒有打扫过。現在，利物浦鐵路經由一座高聳着的高架桥通过这些街道的上空，一些最肮脏的角落是消灭掉了，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好

了一些呢？当你乘火车通过这座高架桥的时候，从桥上往下看，还是可以看到相当肮脏相当贫穷的景象；如果不怕麻烦，到这些胡同里逛一下，从洞开的门窗向房屋和地下室里望一下，那就不难相信，索尔福工人住的房屋根本谈不上清洁和舒适。在离索尔福中心较远的地区，在伊斯林顿，在瑞琴特路，在波尔顿铁路后面，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奥尔德菲尔德路和十字胡同之间的霍普街两旁，许多大杂院和小胡同是最糟糕的，这个地区的工人住宅就肮脏和拥挤而论都可以和曼彻斯特的旧城媲美。在这个地方，我遇到一个人，看样子已经六十来岁，住在一个牛棚里；在这个没有窗子、没有地板、甚至地上什么也没有铺砌的方匣子里，他装了一个像烟筒似的东西，放了一张床，就住在里面，一下雨，雨水就从破烂的屋顶往下漏个不停。这个人已经太老，太衰弱，不能做经常性的工作了；他用手推车搬运粪便等等来维持生活；粪坑就紧靠着他住的牛棚。

我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有机会亲身观察到的曼彻斯特各工人区就是如此。如果把我们在这些地方游历的结果概括一下，我们应当说，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 35 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恶劣、潮湿而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总之，在曼彻斯特的工人小宅子里，既不可能保持清洁，也不可能有什么设备，因而也就谈不上家庭乐趣；在这些住宅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才会感到舒适而有乐趣。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已经看到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描述。我再引证一个自由党人，厂主们所公认、所推崇的权威，

一切独立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西尼耳<sup>⊖</sup>先生的話来做补充。他說：

“当我参观爱尔兰城、安柯茨和小爱尔兰工厂工人的住宅时，使我感到惊奇的只是在这样的住宅里竟能保持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健康水平。这些城市——就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数目來說，这都是些道地的城市——在建造的时候，除了从事投机的業主的直接利益，就什么也沒有考虑到。木作老板和建筑公司老板合买（亦即租若干年）<sup>①</sup>若干地皮，在那上面盖上所謂的房子。在一个地方，我們看到一整条街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沟建造起来的，因为这样一来，不用另外花錢挖土就可以得到較深的地下室，而这种地下室并不是用来做儲藏室或倉庫，而是用来給人住的。这条街上沒有一所房子逃过霍乱的肆虐。这些郊区的街道通常都是沒有鋪砌过的，街心是一堆一堆的糞便，一滩一滩的死水；房屋是背靠背地建筑起来的，两所房屋共用一堵后牆，沒有通風和排水的設備，整家整家的人都挤在地下室或閣楼的一个角落里。”

我在前面已經談到曼徹斯特鬧霍乱时衛生警察所表現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積極性。当这种流行病到来的时候，城市中的資產階級全都惊慌起来。他們忽然想起了穷人的那些不衛生的住宅，而且一想到每一个貧民窟都会成为傳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傳播，会侵入有产階級的住宅，就吓得發起抖来。于是立刻委派了一个衛生委员会来調查这些区域，并且要它就这些区域的情况向市参議會做确切的报告。作为該委员会委員之一并特地調查了每一个警政区（第十一区除外）的凱博士从委员会的报告 中摘出了几段。总共檢查了 6 951 所房子——当然只是在曼徹斯特本城，索尔福及其他郊区都不在內；其中 2 565 所極需在內部加

⊖ 納騷·威·西尼耳“就工厂法問題給商業大臣（查理·波立特·湯姆生閣下）的信” 1837 年倫敦版第 24 頁（Nassau W. Senior.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to the Rt. Hon.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Chas. Poulett Thomson Esq.)». London, 1837, p. 24）。——恩格斯原注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以粉刷, 960 所没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 (were out of repair), 939 所没有足够的污水沟, 1 435 所是潮湿的, 452 所通风不良, 2 221 所没有厕所。在经过调查的 687 条街道中, 248 条没有铺砌, 53 条只是部分地铺砌过, 112 条通风不良, 352 条街道上都有死水洼、成堆的脏东西、废弃物等等。——不用说, 要在霍乱到来以前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干净,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 人们只打扫了几个最坏的角落就算了, 其余的仍然保持原状。自然, 那些清扫过的地方过一两个月就又变得和从前一样脏了, 小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至于这些房屋内部的情形, 该委员会所报道的, 和我们所听到的伦敦、爱丁堡及其他城市的情形是一样的。

“往往是整家的爱尔兰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秸和一条用旧麻袋做成的被单就当做全家共用的被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由于贫穷、迟钝和放荡而堕落下去。调查人员常常在一幢只有两间屋子的房子里发现两家人; 一间是大家睡觉的, 另一间用做公共的饭厅和厨房; 常常甚至是几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 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 12—16 个人。除了诸如此类的传染病来源, 还要加上在屋子里养猪以及其他脏得令人作呕的事情。”<sup>⊖</sup>

这里还必须补充的, 是很多只住着一间屋子的家庭为了收取一定的费用还接纳一些搭伙食的和寄宿的人, 这些寄宿者甚至往往不分男女和屋主全家同睡在一张铺上。例如“工人阶级卫生状况报告”就认定丈夫同妻子和成年的小姨子睡在一张床上的事, 在曼彻斯特就至少有六起。普通的夜店在这里也很多。据凯博士统计, 这种夜店 1831 年在曼彻斯特本城有 267 个, 从那时起, 一定又增加了很多。每一个夜店容纳二三十个人, 所以这些夜店每夜总

⊖ 见前面引用过的凯博士的著作第 32 页。——恩格斯原注

共要住5 000人到7 000人。这些房屋和它們的老主顧的特点也和其他城市中的一样。每一間屋子里都沒有床，只是在地上鋪上五張到七張鋪，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統統安插在这上面，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在这些罪惡的渊藪里籠罩着什么样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气氛，是用不着我来說的。每一幢这样的房屋都是犯罪的中心，也是干各种令人髮指的事情的場所。如果不是这样强制着把各种惡行集中在一起，这些事情也許永远不会發生。——据盖斯克尔<sup>⊖</sup>統計，仅仅曼徹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而“每周快訊”杂志“根据官方的报告”提出的数字，是全体工人的12%，这和盖斯克尔提出的数字大致相符，——工人的总数是175 000，12%就是21 000人。在曼徹斯特的郊区，住人的地下室至少也和曼徹斯特本城一样多，所以在整个曼徹斯特，連同郊区在內，住地下室的人共有四五万。大城市里的工人住宅就是如此。如何滿足住屋的需要，是可以当做一个尺度来衡量工人其余的一

⊖ 彼·盖斯克尔“英国的工業居民，他們的道德、社会 and 身体的状况，以及因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調查”1833年“正义得伸”出版社版(P. Gaskell.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Machiner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 «Fiat Justitia».—1833)。这一著作主要是描写郎卡郡的工人状况。作者是自由党人，但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般还并不認為自由党人必須歌頌工人的“幸福”。因此，他还能公正而清楚地看出現狀的、特别是工厂制度的坏的方面。但同时他这本书是在工厂調查委员会进行調查以前写的，而且从不可靠的材料中引用了一些論断，这些論断是后来被委员会的报告所推翻了的論断。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作者像凯博士一样把一般工人阶级和特殊的工厂工人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一著作整个說来虽然是好的，但在引用时，对于个别的細节还須謹慎。我們在“导言”中所叙述的無产阶级發展史，主要是以这一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恩格斯原注

切需要是如何满足的。不难想像，在这些肮脏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去。而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绝大多数工人都穿得很坏。用来做衣服的料子都是非常不合适的，无论是在女人的衣橱里或男人的衣橱里，都几乎根本没有亚麻布和毛织品，只有棉织品。衬衫是用漂白布或是杂色的印花布做的，女人的衣服大部分也是印花布做的，毛织品的裙子很少能在晒衣服的绳子上看到。男人们大都穿着粗布及其他粗棉织品做的裤子和同样的料子做的上衣或夹克。粗布(fustian)甚至成了工人服装这个名词的同义语，工人被叫做 fustian-jackets [粗布夹克]，而工人也这样称呼自己，借以和那些穿呢子(broad-cloth)的老爷们相区别，而呢子也就成了资产者的标志。宪章派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在1842年起义时来到曼彻斯特，他穿着一套粗布衣服在工人的热烈欢呼声中出现在他们面前。在英国，即使是工人也都戴礼帽，礼帽有各种样式，有圆形的，有圆锥形的或圆柱形的，有宽边的，有窄边的或根本没有边的，只有工厂城市里的年轻人才戴便帽。没有礼帽的人就用纸做一顶四方形的矮帽子戴在头上。工人的全部服装，即使都是完好的，也很少能适应气候。英国气候潮湿，天气变化无常，这比什么都容易引起感冒，因此，几乎整个有产阶级都穿法兰绒的内衣；法兰绒的护胸、紧身和兜肚很多人都用。工人不仅不可能采取这种预防办法，而且一般都几乎永远做不起一件毛织品的衣服。粗棉织品虽然比毛织品厚、硬而且重，但在御寒和防湿方面是远不及毛织品的，而且由于厚，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一湿就不容易干，而且无论如何没有像呢子之类的毛织品那样密实。如果工人居然有这么一天能够买一件毛织品的上衣预备星期天穿，那只有到“廉价商店”里去买，他在那里买到的是一种很坏

的所謂 «devil's dust»<sup>⊖</sup>, 这种料子制造出来“只是为了出售, 而不是为了給人穿的”, 只要穿上两个星期就裂了縫或是磨穿了; 要不然就是在旧貨商那里买一件穿旧了的上衣, 这种衣服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 再穿上几个星期就完了。但是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 而且还得常常把比較好的衣服送到当鋪里去。很多很多工人, 特别是爱尔兰人, 他們的衣服簡直就是一些破布, 上面往往連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沒有了, 不然就是补丁連补丁, 連原来的顏色都認不出来了。英格兰人或英爱混血人居然想出办法来縫补这样的衣服, 而且他們在这方面的技巧确实是惊人的: 他們毫不費力地把呢子补丁或麻布补丁补在粗布上, 或是把粗布补在呢子和麻布上, 但是不久以前才迁来的真正的爱尔兰人却几乎从来不縫补他們的衣服, 除非是万不得已, 即当它有破成几塊的危險的时候才縫补一下。衬衣的破布通常总是从上衣或褲子上的窟窿里拖到外面来。正如托馬斯·卡莱尔<sup>⊖</sup>所說的, 爱尔兰人穿的是

“一身破烂的衣服, 这种衣服脫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 只有在节日或特別隆重的場合才这样做”。

爱尔兰人还带来了英格兰从前所沒有的赤脚走路的習慣。現在, 在一切工厂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很多人, 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赤着脚走来走去, 这种習慣在最貧穷的英格兰人中間也逐漸流行起来了。

---

⊖ 直譯是“魔鬼的灰塵”, 这是一种用旧毛織品經過开毛机(这种机器在英語中叫做 devil)加工而制成的料子。——編者注

⊖ 托馬斯·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倫敦版第28頁(Thomas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28)。关于托馬斯·卡莱尔下面还要談到。——恩格斯原注

飲食状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产阶级认为太坏的东西。在英国的大城市里，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价钱很高；而工人必须用他那不多的几文钱来养家，他们是花不起这样多的钱的。加之工人一般都是在星期六晚间才领到工资，——不错，有些地方星期五就发了，但是这个很好的办法还远没有普遍实行起来。所以工人要到星期六下午四点、五点或七点钟才能上市场去，而资产阶级在上午老早就把最好的东西挑走了。早晨市场上有的是最好的食品，但是等到工人来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卖光了，即使还剩下一些较好的，工人大概也买不起。工人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贩。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最贫穷的工人为了用不多的钱买必需的食品，哪怕是买质量很差的食品，也还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办法：因为星期六晚上十二点钟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而星期日又完全停市，所以在十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商店就把那些不能保存到星期一的货物以想像不到的贱价出卖。但是，这些到晚上十点钟还没有卖出去的东西，十分之九到星期日早晨就不能吃了，而最贫穷的阶级星期日的餐桌正是用这些东西点缀起来的。工人们买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既然买来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1844年1月6日（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曼徹斯特有十一个肉商因出售不能吃的肉，被地方法庭（court leet）处以罚款。其中一个有一整头牛；一个有一整口猪；一个有几只羊；一个有五六十磅牛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本不能食用了，因而全被没收。在这些肉商里面，有一个被没收了

六十四只肚子里填滿了餡的聖誕节吃的鵝，这些鵝沒有及时在利物浦卖出去，因此就运到曼徹斯特来，在这里的市場上摆出来的时候已經腐爛了，發散着强烈的臭气。这件事情的全部經過当时曾登載于“曼徹斯特衛报”<sup>102</sup>，而且提到了当事人的姓名和罰款的数目。在7月1日至8月14日这六个星期中，該报还报道了三件类似的案子。据7月3日該报报道，在海华德沒收了一只200磅重的猪，肉商發現这只猪已經死掉而且甚至已經腐爛了，可是还把它切成塊拿出去卖。据7月31日該报报道，威根有两个肉商因出卖不能吃的肉被分別处以2英鎊和4英鎊的罰款，而其中的一个已經不是初犯了。最后，据8月10日該报报道，波尔頓的一个小商人有二十六只不能吃的火腿被沒收，并且被当众焚毀，这个商人被处以20先令的罰款。但是这里所举出来的还远不是所發生的事情的全部，并且不能把这些事情看做六个星期的平均数，也不能根据这个数字推算出一年的平均数来。有一个时期，这个每周出版两次的“曼徹斯特衛报”每一号都报道了曼徹斯特或邻近的工厂城市中所發生的这类案件。这里應該記住一点：由于市場的范围很大，所有的大街两旁都是市場，并且由于市場監察員監督不严，許多事情都逃过了他們的眼睛；——要不是这样，那又怎样解釋肉商肆無忌憚地把已經發臭的整头整头的牲畜拿来出售的事情呢？只要注意一下，在罰款像上面講的那样微不足道的場合下，这种勾当对小商人的誘惑力是多么大，只要想一想，什么样子的肉才被監察員認為完全不能吃而加以沒收，那就决不会相信工人平常所弄到的肉都是質量好的和有营养的。但是資產階級的貪婪还要使他們在其他方面吃苦头。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摻假，絲毫不顧及消費者的健康。上面我們引証了“曼徹斯特衛报”，現在

听一听另外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我是喜欢拉反对者来做证人的，——听一听“利物浦信使报”是怎样说的吧。

“把咸黄油冒充新鲜的出售，不是在一块块的咸黄油上涂上一层新鲜的黄油，就是把1磅新鲜的黄油放在上面让人先尝一尝，在尝过以后却把咸的卖出去，或者洗掉盐再把黄油当做新鲜的出售。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照净糖的价钱出卖。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咖啡粉里面掺上菊苣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甚至没有磨过的咖啡里也掺假，而且假货还真像咖啡豆。可可里面常掺有搞得很细的褐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茶叶里面往往掺上黄荆叶子及其他类似的杂物，或者把泡过的茶叶晒干，放在烧热的铜片上烘烤，使它恢复原来的颜色，然后当做好茶叶出卖。胡椒里掺上豆荚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葡萄牙红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颜料、酒精等制成），因为大家都知道，单是在英国喝掉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就比整个葡萄牙所生产的还要多。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几句，由于烟草普遍地掺假，去年夏天曼彻斯特某几个最著名的烟草商人曾公开地说，要是不掺假，他们的生意就无法做下去，价钱在3辨士以下的雪茄烟，没有一枝完全是用烟叶制成的。）像这种掺假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几打来，把石膏粉或白垩掺在面粉里，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卑鄙行为。当然，事情并不仅仅限于食品掺假。到处都有骗局：把法兰绒、袜子等等拉长，叫人看起来好像长一些，只要洗一洗马上就缩短；比规格窄1.5英寸或3英寸的呢子被当做宽的卖出去；磁器上的釉薄得一到手就裂开了，这类骗人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几千件来。——*Tout comme chez nous*〔和我们那里完全一样〕。但是吃这些骗局的苦头最深的，除了工人还有谁呢？有钱人不会受骗，因为他可以多花些钱到大商店里去买东西。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声誉的，

假如他們出售劣等的摻假的貨物，最吃虧的還是他們自己。此外，有錢人在吃的上面很講究，他們的味覺很靈敏，比較容易識破騙局。但是窮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錢都得盤算一下，必須以不多的錢買很多的东西，他們不能太注意質量，而且也不善于这样做，因為他們沒有機會鍛煉自己的味覺，結果，所有這些摻假的、甚至常常是有毒的食物都賣給了他們。他們不得不到小商人那里去買，甚至還常常要賒賬。而這些小商人由於本錢小，營業費用大，一樣的貨色却不能像大零售商賣得那樣便宜；而人們要求他們的却是價格低廉，再加上別人的競爭，於是他們就只好有意無意地備辦摻假的貨物了。此外，大零售商在自己的買賣里投下了大宗資本，騙局一旦被識破，就要喪失信用，遭受破產，可是小店主的營業面不出一條街，如果他的騙人的伎倆被揭穿了，那會失掉些什麼呢？要是他在安柯茨再也得不到信任，他可以搬到却爾頓或休爾姆去，那里誰也不知道他，他又可以重施他的欺騙伎倆了。摻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稅有關，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但是，英國工人不僅在物品的質的方面受騙，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騙。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規定的。在警察局的報告里，因犯了這類罪而被處以罰款的事情，每天都多得難以置信。從下面幾段摘自“曼徹斯特衛報”的話就可以看出，這類騙人的事情在工廠區是如何普遍；這裡所涉及的只是短短的一段時間，而且我手邊就連這一個時期的報紙也不全。

1844年6月16日“衛報”。羅契得爾法庭開庭。四個小商人因使用重量不足的砝碼被處罰5先令到10先令的罰款。——斯托克波爾特法庭開庭。兩個小商人各被處罰款1先令。其中一個有重量不足的砝碼7枚和不合規定的秤一具；兩個人以前都受



过警告。

6月19日“衛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一个小商人被判处罰款5先令；两个农民被判处罰款10先令。

6月22日“衛报”。曼徹斯特治安法官判处十九个小商人 $2\frac{1}{2}$ 先令到2英鎊的罰款。

6月26日“衛报”。埃士頓法庭开庭。十四个小商人和农民被判处 $2\frac{1}{2}$ 先令到1英鎊的罰款。——海德低級法庭判处九个农民和小商人5先令罰款，并繳納訟費。

7月9日“衛报”。曼徹斯特有十六个小商人被判決繳納訟費并且被处以10先令以下的罰款。

7月13日“衛报”。曼徹斯特有九个小商人被处以 $2\frac{1}{2}$ 先令到20先令的罰款。

7月24日“衛报”。罗契得尔有四个小商人被处以10先令到20先令的罰款。

7月27日“衛报”。波尔頓有十二个小商人和小飯館老板被判決繳納訟費。

8月3日“衛报”。波尔頓有三个小商人被处以 $2\frac{1}{2}$ 先令到5先令的罰款。

8月10日“衛报”。波尔頓有一个小商人被处以5先令的罰款。

在物品的質的方面受騙的主要是工人，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量的方面受騙的也是他們。

每个工人平常的飲食当然是随着工資变化的。工資較多的工人，特别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掙一点錢的那些工厂工人，在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就吃得好；飯桌上每天都有肉，晚上还有猪板油

和干酪。如果掙錢較少，那就只有每逢星期日吃一次肉，或者一星期吃两三次，而面包和土豆就要吃得些。如果掙錢更少，肉食就減少到只有切成小片夾在土豆里的一点点猪板油；掙錢再少的，那就連这一点点猪板油也沒有了，只有干酪、面包、燕麦粥（porridge）和土豆；最后，在工資最低的工人中，即在爱尔兰人中，土豆就成了唯一的食物。此外，一般都喝点淡茶，茶里面有时放一点糖、牛奶或燒酒。在英国，甚至在爱尔兰，茶被看做一种極其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飲料，就像咖啡在我們德国一样。喝不起茶的，总是極端貧苦的人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工人得有工作做。如果他沒有工作，那就只好碰运气了，別人給他什么，他討到什么，或者偷得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他什么也弄不到，那就只好餓死，就像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那樣。不用說，食物的量也和它的質一样，是由工資决定的，工資少的工人，特别是如果他們还有一家人，那末即使是在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常常挨餓。而这些工資少的工人，数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倫敦，工人的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剧烈，这一部分工人的数目是很多的，但是在其他一切城市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在这种情况下，人們想尽了一切办法，而由于沒有別的食物，就吃土豆皮、菜帮和烂水果<sup>⊖</sup>，貪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絲一毫养料的东西。如果一个星期的工資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末常常就是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餓死所必需的那一点点。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很多疾病。只要疾病一發生，特别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男人一病倒（由于他緊張地劳动，需要食物最

⊖ “每周快訊” 1844年4月号或5月号所登載的薩斯伍德·斯密斯博士关于倫敦貧民状况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多，所以第一个病倒的总是他），缺吃少穿的情况就特别严重起来，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

最后，我们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本章中所叙述的事实再概括地说一说。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槛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

---

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門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門，但是每一个部門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極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轉到極端的貧困，甚而至于餓死；几乎每一个英国無产者都能滔滔不絕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我們現在就来更詳細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 竞 争

我們在“导言”里已經看到，竞争怎样在工业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創造了無产阶级；由于布匹的需求增加，織工的工資提高了，兼做織工的农民抛弃了农业，以便在織机上賺到更多的錢。我們已經看到，竞争怎样以大規模經營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們降到無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們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們也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們也变为無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資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現代工业中获得充分發展并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無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徑和方法創造了無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現在我們就来看看竞争对已經形成的無产阶级所發生的影响。在这里我們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間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現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間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員之間进行；一个人擋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圖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們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資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織工和手工織工竞争；失業的或工資低的手工織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資高的織工

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阶级——他的“天然的长上”<sup>⊖</sup>——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

---

⊖ 这是英国厂主的惯用语。——恩格斯原注

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末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较有点文化的英格兰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爱尔兰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刚迁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人在随便哪一个猪圈里都可以住下来，他们每星期都会从稍稍像样一点的住宅里被赶出来，因为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像这样的人到工厂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脚的。因此，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为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在工作，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领一些工资，于是资产阶级就广泛地利用机器劳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用了机器劳动，雇用女工和童工进行生产就很合算）来降低工资。当然，有的家庭并不是每个成员都能工作；这样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挣到根据全家都能工作的情况而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一种平均工资，在这种工资

标准下,全家都能工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好,而能工作的成员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坏。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願放弃他已經習慣了的那一点点舒适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烂烂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餓。工人情願只拿一半工資,等待着好日子到来,但是不願像很多失業者那样餓死在街头。这一点点东西,这一点聊胜于無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資。如果工人比資产者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竞争斗争結束时还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們就只好餓死。要知道,資产者要是不能从出卖他們的劳动产品得到利益,当然就不会給他們工作。

从上面所說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資。而最高工資則决定于資产者之間的竞争,因为我們知道,他們也是在竞争着的。資产者只能靠商業或工業来扩大自己的資本,在这两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資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間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沒有商業和工業,誰也不会付給他利息,誰也不能使用他的資本。可見資产者总是需要無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們,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資本),而是为了發財,就像做买卖需要貨物,馱东西需要牲口一样。無产者給資产者制造商品,資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賺錢。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許甚至还不够的时候,工人間的竞争就会停止,資产者之間的竞争就开始了。寻找工人的資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漲的价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潤。因此,他宁願稍稍增加一些工資,也不願放过全部利潤。他为了贏得火腿,可以給工人香腸。这样,資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資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經增加的



需求所容許的程度。資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潤，但是当他必須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潤即平均利潤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資了。

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资。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人和資本家都沒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間展开特別激烈的竞争的时侯，在現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資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資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至于比最低工資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如果工人习惯于每星期吃几次肉，資本家就只好付給工人足够的工資，使他能吃到肉。这种工資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間沒有竞争，他們沒有理由滿足于較少的工資；这种工資也不会再多，因为在資本家之間沒有竞争的时候，他們也沒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来拉攏工人。

由于現代英国工業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們已經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業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規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能够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規性。正因为如此，产业工人的工資平均高于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資，特别是高于农业工人的工資，而后一种情况当然还說明了城市中食品价格的高昂。

換句話說，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們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漲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們的价格也就上漲；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

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貨”，那末他們就只好閑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們只好餓死。用政治經濟学上的話來說，用来維持他們的生活的費用不会“再生产出来”了，只会白白花掉，所以誰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資本。在这一点上馬尔薩斯先生及其人口論是完全对的。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間的全部差別仅仅在于現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質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給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沒有人保障他的生計。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讓他去餓死。可是，对资产阶级來說，現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無比地有利：他們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資本受到損失，工人劳动的代价無論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們而給他們算清了的<sup>⊖</sup>。

⊖ “人們說，奴隶体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而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則由自己花钱来补偿。实际上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短工和僕人等等的工資应当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讓他們能够按照社会方面日益增长、保持稳定、或不断降低的需求来延續短工和僕人的后代。但是，如果說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那末这种消耗比起奴隶体力的消耗来要主人花的錢通常到底是少得多的。用来恢复或补偿奴隶体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懶散的主人和漫不經心的监工来管理的”，如此等等(A. Smith.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原富”] 麦克庫洛赫4卷版第1卷第8节第134頁)。——恩格斯原注

因此也可以說，亚当·斯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做的論断是完全对的，他說：

“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調节工人的生产，調节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太慢，需求就会使它加快，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会使它緩慢下来。”

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們的价格（即他們的工資）就上漲，他們就生活得比較好些，結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漸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業、貧困、飢餓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現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口”。發展了亚当·斯密上述論点的馬尔薩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圓其說的；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現有生活資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錯了。“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說是由于工人彼此間的竞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假定某个厂主每天可以雇十个工人做九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那末他只要雇九个工人就够了，而第十个人就要沒飯吃。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时候，厂主就可以乘机用解雇的威胁来迫使九个工人拿同样的工資而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即工作十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第十个工人解雇，并把他的工資省下来。在这里小規模地發生的事情，在全国範圍內大規模地重演着。由于工人彼此竞争而使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許多工人就沒有工作做。市場失去了一批顧客，因为这些失業工人已經什么都买不起了。他們过去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商品已經不再需要，因而也用不着再制造了。

过去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業，市場又失去了一批顧客，事情就这样循环不断地繼續下去，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假若沒有其他情况插进来的話，事情就会这样繼續下去。工業中采用了上面說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产的手段，这就逐渐使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的消費量增加，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失業工人終于又在新的劳动部門找到了工作，自然这是經過了长期痛苦的。如果这里再加上英国近六十年来对国外市場的侵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業品的需求的不断的和迅速的增加，那末对工人的需求就增加起来，而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随之增加起来。这样，大不列顛的人口并没有减少，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并且还繼續在增加。虽然工業不断在發展，虽然对工人的需求大体上是在增加，但根据官方各政党（托利党、輝格党和激进党）的供認，英国經常有过剩的無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間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爭夺工人的竞争的。

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工業和竞争的性質本身以及这种性質所造成的商業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滿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賺錢为目的的生活資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風險去工作并使自己發財的时候，停滯現象是随时都可能發生的。例如英国供給許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貨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費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時間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貨，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經常波动的价格对現有的存貨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測，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場傳來，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

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国内市场和一切国外市场都充斥着英国货，这些东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费。工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门中都逐渐停止下来。小的厂主和商人无力克服资本收不回来的困难，破产了，较大的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或者只是“短时间地”开工，就是说，大约只做半天工作。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积蓄的话，这些积蓄也很快就花光了。慈善机关被围得水泄不通，济贫捐增加1倍、2倍，可是仍然不够，挨饿的人不断地增加，数目惊人的“过剩人口”突然出现了。这样继续了一个时候：“多余的人”勉强地挣扎着活下去，或者有些人挣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业和济贫法帮助许多人勉强地延长自己的生存；其余的人在那些竞争不大显著、离开大工业较远的劳动部门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一个人为了马马虎虎地维持一个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呵！——情况又渐渐地好转起来：积存的商品逐渐消费掉，商人和工业家的普遍的颓丧情绪使这些存货不会很快地得到补充，直到最后，高涨的价格和各方面传来的好消息又使他

們重新加紧活动起来。但是市場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漲。第一批运来的貨物人們都爭先恐后地購買,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場更加活躍起来,以后运来的貨物还要看漲。人們怀着这种还会漲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費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購買新到的商品,并把剛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漸漸地傳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場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漲,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緊張到極点,于是出現了“根基不穩的”投机家,他們运用虚拟資本,靠信貸来維持,而如果他們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轉卖出去,那就得宣告破产。他們大干这种普遍地漫無秩序地追逐利潤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貪得無厭,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貪得無厭使他們發瘋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瘋狂的竞赛开始了,連最穩重最有經驗的人都給迷住了。鉄、紗、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發現了有几十亿消費者的新市場。忽然有一天,国外的一些根基不穩的投机家由于要錢用就开始出售貨物——自然是低于市場价格,因為他們是迫不及待的。一个人一卖,其他人也跟着卖,物价开始波动起来,大吃一惊的投机家們把自己的貨物抛到市場上去。市場混乱起来了,信貸动搖了,商店一家跟着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着一家宣告破产。原来当地的和运输途中的商品已經比消費所需要的多了2倍。这个消息傳到了当时还在开足馬力进行生产的英国。这里的人們也惊慌起来,国外的破产引起

了英国国内的破产，商業停頓又使許多商店倒閉了。这里的人們在惊恐之余也把所有的存貨都拋到市場上去，这又引起了更大的惊慌。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繼續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業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經說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

由此可見，英国工業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業的工人后备軍，以便在最活躍的几个月內有可能生产市場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軍的扩大或縮小，要看市場能使他們中間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場最活躍的时候，农業区、爱尔兰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較少的工業部門暂时也能供給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們也同样屬於后备軍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們是屬於这个后备軍的。在这些工人轉到較活躍的工業部門里面去的时候，他們原来工作的地方沒有他們也行。为了稍微补一下空子，就延长工作時間，雇用妇女和少年，而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們發現自己的位置已經被人占据了，他們自己，至少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軍就构成英国的“过剩人口”，它在危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間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些人靠行乞和偷窃，靠打扫街道、拾馬粪、用手推車或毛驢运送东西、摆小摊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来維持自己可怜的生活。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許多这样的人，他們就靠偶然賺得的一点点錢，如英国人所說的，“不讓灵魂和軀体告別”。令人惊异的

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有哪一行不去干！倫敦的清道夫（crossing sweeps）是世界聞名的。以前，不仅一切大城市的广场，而且一切大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济贫所或市政管理机关雇用的失业者来打扫的。现在却用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了，机器每天隆隆地穿过大街，夺取了失业者的饭碗。在馬車往来頻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許多人推着小車，时刻冒着被往来奔馳的轎車和公共馬車車輪碾死的危險，拾取新鮮的馬糞去出賣。为此，他們常常还得每星期向街道清潔管理处繳納几个先令，而在許多地方这种营生是根本禁止的，因为要不禁止，收集起来的垃圾里面所含的馬糞就会太少，不能当做肥料卖出去。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誰能够弄到一輛手推車去搬运东西，那他要算是幸运的，如果除小車外还弄到錢买一头毛驢，那就更幸运了；毛驢要自己找东西吃，或者只得到一点人們扔掉的东西，但是仍然能够給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余的人”大多数都去做小販。特別是在星期六晚上，当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此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無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爭先恐后地叫卖鞋带、背带、带子、橘子、餅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其余的时候，也随时都可以碰到这种叫卖橘子、餅干、姜啤酒和蕁麻啤酒<sup>⊖</sup>的小販在街上站着或徘徊着。这些人卖的东西也有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謂 jobbers〔零工〕則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点零活，但是能碰上这种好运气的人并不多。

倫敦东头的牧师威·岑卜尼斯說：“冬天里，在倫敦一切船塢的大門口，

⊖ 工人，特別是不喝酒的人喜欢喝的两种起泡沫的清涼飲料。前一种由水、糖和姜制成，后一种由水、糖和蕁麻制成。——恩格斯原注



每天早晨还在破晓以前，就已经有成百的穷人等着开门，希望找到一点零活，而当最年轻力壮的、和船塢的行政人员最熟识的人们都已经被雇用的时候，其余的成百的人在失望之余便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到自己的破屋子去。”<sup>103</sup>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驱赶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但是这些人的乞讨方式是特别的。他们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来走去，时而停在这里，时而停在那里，唱一支诉苦的歌或者说一段可以唤起过路人同情的话。而奇怪的是，这种乞丐几乎只是在工人区里面才会遇到，并且他们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有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热闹的街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自己那种穷苦无告的样子来感动人。在这里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实际上，这种无言的但非常动人的呼吁几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并且是在工人经过的时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当工人区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资产阶级尽量避开这些被玷污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情形比什么时候都多。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

根据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这种“多余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有150万。在苏格兰，因为没有济贫法，这些人的数目无从确定。至于爱尔兰我们将单独地来谈。而这150万人只是那些真正向济贫所请求过救济的，大批勉勉强强可以活下去而不采取这种最后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办法的人并未包括在内。同时，这

个数字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农业区的，因而在这里不能加以考察。在危机时期这个数字自然大大地增加起来，而贫穷也达到最高限度。例如拿 1842 年的危机来说，这次危机是最近的一次，因而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要知道，危机每重复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强一次，也许不迟于 1847 年就会到来的下一次危机，根据所有的征象来判断，将更加猛烈，更加持久。在 1842 年的这次危机时期，济贫捐在一切城市中都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在斯托克波尔特，每收 1 英镑房租，就要付出 8 先令济贫捐，因而仅仅是这一项捐税就占了全城房租总额的 40%；此外，整条整条的街都空了起来，以致这个城市的居民比平常至少减少了 20 000 人，而在空房子的门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条：Stockport to let——斯托克波尔特出租。在波尔顿，抽济贫捐的房租平时每年平均是 86 000 英镑，这时降低到 36 000 英镑。可是需要救济的穷人的数量却增加到 14 000，即达全部人口的 20% 以上。在里子，济贫所拥有 10 000 英镑的准备金，可是这一笔钱和募集来的 7 000 英镑在危机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就用光了。到处都是这样。反谷物法同盟的一个委员会根据厂主提供的详细材料于 1843 年 1 月写了一份关于 1842 年工业区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里说：济贫捐比 1839 年平均高 1 倍，而需要救济的数量却增加了 2 倍，甚至 4 倍；许多申请人是过去从来没有请求过救济的，如此等等。这个报告又说：工人阶级得到的食品比 1834—1836 年少了  $\frac{2}{3}$ ；肉的消费量大为减少——有些地方减少了 20%，有些地方减少了 60%；甚至那些在最坏的时期还能找到足够的工作的手工业者，即铁匠、泥瓦匠等等，也因为没有工作和工资降低而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在现在，在 1843 年 1 月，工资还在不断降低。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厂主们的报告里面所说的呵！

所有的街上都有飢餓的工人站着（由于他們的老板关闭了自己的工厂，不能給他們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討，成群結队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請求帮助，但是他們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們的人数、以他們的态度和言語来威胁人。一切工業区，从萊斯特到里子，从曼徹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騷动时而在这里發生，时而在那里發生，例如7月間就在北斯泰福郡的陶器工厂里發生过；工人中弥漫着可怕的憤激心情，终于在8月間爆發了各工厂区的总起义。当我在1842年11月底到达曼徹斯特的时候，在十字街头还到处碰到一群一群的失業者，許多工厂还关着門。在以后几个月里，直到1843年年中，这些不得已而徘徊街头的人才逐渐减少，工厂也重新开工。

在这种危机时期失業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說了。济貧捐是不够用的，是远不够用的。闊佬們的慈善救济不过是杯水車薪，它的作用一瞬間就完了，因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舍物只能帮助很少的人。假若在这种时候小商店的老板們不尽可能地賒东西給工人，——自然，他們将来在結算的时候是会因此得到可观的报酬的，假若工人們不尽量互相帮助，那末每一次危机都会使大批“多余的人”餓死。但是，因为最严重的时期究竟不太长——一年，最多是两年或两年半，大部分人到底还能熬过艰难困苦保住生命。至于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間接地吞噬了許多人的生命这一点，我們下面还要談到。暫時我們先来看看使英国工人陷入困苦状况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現在还使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

## 爱尔兰移民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順便提到迁移到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在本章中就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这种移民的原因和后果。

假若英国沒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業服务的后备軍，英国的工業就不可能發展得这样快。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自从爱尔兰人知道，在聖乔治海峽彼岸只要手上有勁就可以找到工資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据估計，到現在为止，这样迁移来的爱尔兰人已經在 1 000 000 以上，而且每年还有近 50 000 人迁移过来，他們几乎全都奔向工業区，特别是大城市，并且在那里形成了居民中的最下層。例如倫敦有 120 000 爱尔兰貧民，曼徹斯特有 40 000，利物浦有 34 000，布利斯托尔有 24 000，格拉斯哥有 40 000，爱丁堡有 29 000。⊖ 这些人是在几乎一点文明也談不到的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慣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他們迁移到英

---

⊖ 拉納克郡郡长阿契波德·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两卷本 1840 年版 (Archibald Alison, High Sheriff of Lanarkshire.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Human Happiness». 2 vols. 1840)。作者是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哥哥威·巴·艾利生博士一样，是有宗教情緒的托利党人。——恩格斯原注

格兰来，把自己的各种粗野的习惯带给英格兰居民中对教育和道德本来就不大感到兴趣的那个阶层。让我们听听托马斯·卡莱尔是怎样说的吧。⊖

“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有弥勒斯人⊖的野蛮的面孔向你打招呼，这些面孔流露出假装的纯朴、浮躁、无理、穷困和嘲讽。英格兰马车夫在赶着马车过去的时候用鞭子抽弥勒斯人，而弥勒斯人却用自己的语言咒骂他两句，并脱下帽子向他行乞。这是我们的国家必须消灭的一种最糟糕的祸害。穿得破破烂烂、从来不知道发愁的野蛮的弥勒斯人，随时都在准备着去做那种只要手上有劲、脊梁结实就可以胜任的任何工作，而工资只要够他买土豆就行。调味品他只需要盐；过夜的地方只要随便在哪里碰到一个猪圈或狗窝他就觉得不错了，他住在草棚里面，穿一身破烂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节日或特别隆重的场合才这样做。英格兰人要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那他就找不到工作了。不大文明的爱尔兰人不是凭着自己的长处，而是凭着自己的短处把本地的英格兰人排挤出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他肮脏而无所用心，耍滑头，发酒疯，他是道德堕落和秩序混乱的祸根。一个还在竭力游泳、在水面上挣扎着的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不是一个不是浮着而是已经沉下去的人怎样才可能生存下去的例子……大家知道，下层英格兰工人的生活水平愈来愈接近于在一切市场上都和他們竞争的爱尔兰工人的生活水平。凡是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只要有力气就行的工作，工资都不合于英格兰人的标准，而是接近于爱尔兰人的标准，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比‘一年只有三十个星期吃最坏的土豆也只能吃个半饱’所必需的稍稍多一点，——稍稍多一点，但是每从爱尔兰新来一只輪船，就向这个水平靠近一步。”

如果撇开对爱尔兰民族性格的过分的和片面的责备不谈，那末卡莱尔在这里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花<sup>4</sup>辨士（合 $3\frac{1}{3}$ 銀格罗申）像牲口一样挤在輪船甲板上迁移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工人，总是随遇而安的。最恶劣的住宅在他們看来也是很好的；他們

⊖ “宪章运动”第28、31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 弥勒斯是爱尔兰古賽尔特国王的名字。——恩格斯原注

不大講究衣着，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穿在身上就行；他們不知道什么叫鞋子；他們的食品是土豆，而且仅仅是土豆；他們賺的錢要是超过以上这些需要，就立刻都拿去喝了酒。这样的人要掙很高的工資干什么呢？一切大城市中最坏的地区住的都是爱尔兰人。無論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某个地区特别显得肮脏和破烂，就可以預先猜到，在那里遇到的大部分将是一眼看去就和本地人的盎格魯撒克逊面貌不同的賽尔特面孔，听到的将是音調和諧的带气音的爱尔兰口音，这是道地的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口音。有时候我甚至在曼徹斯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听到爱尔兰人的話。几乎在任何地方，住地下室的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是来自爱尔兰的。一句話，如凱博士所說的，爱尔兰人發現了最低的生活需要是什么，現在又把這個教給英格蘭工人。他們也带来了肮脏和酗酒。这种不爱清潔的習慣是爱尔兰人的第二天性。它在人口不密的农村中还没有多大害处，可是在这里，在大城市中，因为人口非常密集，就足以使人顫栗并招致各种各样的危險。弥勒斯人按照在家乡时的老習慣，把一切廢弃物和脏东西都倒在自己門口，造成了污水坑和垃圾堆，結果把整个工人区都弄脏了，空气也弄得污浊不堪。如同在家乡一样，他紧靠着自己的房子就盖起猪圈来，如果不能这样做，他就干脆把小猪放到自己屋子里。在大城市中飼养牲畜的这种不像話的新方法，完全是爱尔兰人傳来的。爱尔兰人爱自己的小猪，就像阿拉伯人爱自己的馬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猪长得够肥的时候他就把它卖掉；而在这以前他和猪一起吃，一起睡，孩子們和猪一起玩，騎在猪背上，和猪一起在泥里打滾。这种情形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看到千百次。这些小破屋子里面如何肮脏，如何不舒适，是很难想像的。爱尔兰人不習慣使用家具。一捆麦秸、

几件完全没法子穿的破烂衣服，这就是他的床铺。一个木墩子、一把破椅子、一只当桌子用的旧木箱，再多就不需要了。一把茶壶、几个瓦罐和破土碗，就足够把他那也当做卧室和起居室的厨房陈设起来。如果他沒有生爐子的东西，他就把手边可以烧的一切——椅子、门框、飞檐、地板都送到火爐里面去，只要真有这些东西的话。此外，他要很大的地方做什么呢？在爱尔兰，他的土房子一共只有一间屋子，一切东西都摆在里面；来到了英格兰，一家人所需要的也不多于一间屋子。可见现在已成为普遍现象的这种许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的办法，主要也是爱尔兰人带来的。因为穷人到底也应当有一点享受，而其余的一切享受社会又不允许他有，所以他就只好到小酒店里面去。烧酒是点缀爱尔兰人生活的唯一的東西，再加上他那种满不在乎的快乐的性格，这就使得他老是喝得酩酊大醉。爱尔兰人具有南方人的轻浮性格，具有几乎可以和野人相提并论的暴躁的性情，他轻视所有那些正是因为他性情粗野而享受不到的人类享乐，他既肮脏，又贫穷，——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他的喝酒的嗜好。诱惑是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抵抗，只要得到一点钱，他就把它喝光了。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既然社会使他陷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酒徒的那种境地，既然社会丝毫不关心他，注定他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真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够责备他呢？

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这个竞争者是处于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因此，如卡莱尔所说的，在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爱尔兰工人竞争的一切劳动部门里，工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一天一天降低。而这样的劳动部门是很多的。所有那些不大需要或

者完全不需要技能的部門都向爱尔兰人开着大門。当然，对于那些必須有多年的訓練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規的活动的劳动部門，輕浮的、無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要当个机匠（mechanic——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門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要当个工厂工人，他就必須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習俗，即在本質上变成英格兰人。但是，凡工作比較簡單、比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因此，这些劳动部門都首先被爱尔兰人所包圍。手工織工、泥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許多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侵入在这里大大地促进了工資的降低和工人階級狀況的恶化。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門的爱尔兰人已經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們仍然保存了一些旧習慣，这些旧習慣足以使那些在他們影响之下的英国同伴趋于墮落。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 $\frac{1}{5}$ 或 $\frac{1}{4}$ 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大的爱尔兰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階級的生活、他們的習俗、他們的才智和道德的發展、他們的整个性格，都染上了爱尔兰人的許多特征，也就会了解，为什么現代工業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給英国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憤慨的狀況还会更加恶化。



## 結 果

我們已經相当詳細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現在我們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結論并且再用这些結論来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証。我們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們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們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末我們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謀杀。但是，如果社会<sup>⊖</sup>

⊖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說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負有責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統治权，因而应该对它不允許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状况負責。在英国，正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統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指资产阶级）至少有責任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員的生命，有責任注意，譬如說，不要餓死一个人，这一点是無須乎我来給我的德国讀者証明的。如果我是写給英国资产阶级看的話，那当然又当別論了。——恩格斯原注

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穌的第 1886 年，我們德国的資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經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恩格斯在 1887 年英譯本美国版上补加的注

这五十年来一切变得多厉害呵！目前，英国資产者中已經有人承認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員負有責任；而我們的德国資产者呢？！！？——恩格斯在 1892 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把成百的無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們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劍或槍彈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們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鉄腕强制他們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結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謀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謀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隱蔽的陰險的謀杀，沒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謀杀，因为誰也看不到謀杀者，因为謀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誰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說是犯罪，不如說是瀆职。但这仍然是謀杀。我現在就来証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謀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們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毀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們送进坟墓。我还要証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設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謀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書和議會报告書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証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連最必需的生活資料都如此缺乏的階級，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样，我們还是再一次地特別从工人的健康状况这一角度来把这些情况一个一个地考察一下。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經引起了極端不利的后果。倫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間那样清新而充滿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爐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

的地面上，消耗着極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末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乡间，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污水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地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这样，大城市工人区里的脏东西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总要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来的水蒸气也是一样。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髮指的，是现代社会的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

这样不得不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前面引证过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部的疾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而这类疾病也确实是在工人中间最常见。伦敦的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证明这一

点。在早晨，当大家忙着去上工的时候，如果到街上去踽踽一下，那就会大吃一惊，怎么竟遇到这许多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的人。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些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萎靡不振、没精打彩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许多，虽然肺结核在英国北部的工厂城市里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除其他肺部疾病和猩红热外，和肺结核同样厉害的，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灾害的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陈述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污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转为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修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发现，而传布得最广的还是 在贫民窟中，虽然它在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牺牲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经猖獗好久了。它在 1837 年闹得特别厉害，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官方报告。根据 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的关于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1843 年该院收容的病人有 1 462 人，比过去的任何一年都多 418 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污秽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病人多半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工人，他们在路上、甚至到达伦敦以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

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酒、氨制剂以及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 16.5 % 死亡。在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性的热病；在旧城、安柯茨、小爱尔兰等处的较坏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来没有绝迹过，但在这些地方，也如同在英格兰各城市里一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中的那样厉害。但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像之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 1817 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 1826 年和 1837 年，伤寒都特别猖獗，而每次都延续了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候。在爱丁堡，在 1817 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患热病的将近有 6 000 人，在 1837 年流行病期间则将近有 10 000 人，而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性和死亡率也增高了<sup>①</sup>。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期的肆虐情形，和 1842 年危机之后的猖獗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苏格兰的穷人有  $\frac{1}{6}$  患了热病，乞丐般的流浪者以惊人的速度把这种灾害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十二年还要多。1843 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 12%，共达 32 000 人，其中有 32% 死掉，可是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通常不超过 8%。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七天和第十五天；在第十五天上，病人的皮肤通常现出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sup>②</sup>。在爱尔兰，这种流行病也是相当常见的。在 1817—1818 年的二十一

①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② 艾利生博士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1844 年 10 月于约克举行的会议上所宣读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恩格斯原注

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 39 000 名，据艾利生郡长說（“人口原理”第 2 卷），在后来的某一年中，甚至达 60 000 名。1817—1818 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  $\frac{1}{7}$ ，在同一时期，在里美黎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  $\frac{1}{4}$ ，而在瓦特福德的貧民窟里竟占  $\frac{19}{20}$ ⊖。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們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满了人，有病的和沒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間屋子里，睡在一張床上，那末人們就只能惊奇，这样一种容易傳染的热病竟沒有蔓延得更广一些。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極端不够，許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連飲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項也不知道，那末这死亡率就显得太小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証过的那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認为穷人的貧困和悲慘的处境是生病的原因；他說，正是匱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滿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別危險，使它迅速蔓延。他証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業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間肆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說，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爱尔兰医生大部分也証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許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說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說是在于飲食方面。工人吃的食物一般都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子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沒有錢也沒有時間給自己

---

⊖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貧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的孩子弄到比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習慣，就是給孩子喝燒酒，甚至食鴉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發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們就患上了遺害終身的各种消化器官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們以后还是不得不吃那种使他們消化不良的食物。而且他們又哪里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們知道，在他們的生活条件和習慣沒有改变以前，他們又怎么能遵守比較适合的飲食規定呢？——但是，由于消化不良，他們还在童年时代就又染上了其他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癧，患瘰癧的父母常有患瘰癧的孩子，特別是在帶有父母遺傳下来的腺病質的孩子們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嬰兒發育期間的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僂病(英吉利病，关节結节性贅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極常見的。骨头的硬化延緩，骨格的成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佝僂病的普通現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这些疾病在商業停滯、失業以及危机發生时工資低落的时期怎样由于工人生活变化無常而变得更加厉害，那就用不着我来说明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至少都要过一段吃不飽飯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質量坏但数量畢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經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起来。正是在最迫切地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个半飽的孩子們(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間真不知有多少！甚至在工業繁荣时期也是很多的!)是不能不極度衰弱，不能不患瘰癧和佝僂病的。而他們也正是这样，这从他們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大批的工人的孩子所遭遇到的缺乏照顧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整个工人階級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的衣服不适用，因而也不能防止伤風，非到病得最后躺倒就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陷入



極度的困境，通常得不到任何医疗等等情况，那就可以約略地想像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了。而个别劳动部门中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还不打算在这里谈。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恶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誘，各种可能的誘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燒酒几乎是他們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經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須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憊、煩悶和憂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沒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無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無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經被混浊的空气和恶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館里得到滿足，因为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会見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極强烈的誘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誘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宁可說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許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輕人不可能不受到誘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們自己就給孩子們酒喝），人們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內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責备工人們爱喝酒。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一种染上了就要受到責备的恶習。它逐漸成为一种必然現象，成为一定条件作用于沒有意志（至少在这方面沒有意志）的对象时所必然产生的后

果。應該在這件事情上負責的是那些使工人淪為這種對象的人。但是，正像絕大多數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樣，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給它的犧牲者的肉體和精神以毀滅性的影響。它日益加強工人的生活條件所引起的容易感染疾病的傾向，它促進肺部疾病和胃病的发展，也極度地助長傷寒的發生和蔓延。

使工人階級遭受肉體上的痛苦的另一個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有高明的醫生來診治。的確，有許多慈善機關在設法彌補這種缺陷，例如曼徹斯特醫院每年醫治 22 000 個病人，其中有住院治療的，也有只接受醫生的診斷和藥品的。但是，對於一個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醫療（根據蓋斯克爾的計算<sup>⊖</sup>）的城市來說，這又算得了什麼呢？英國醫生索取的診費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們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於收費低廉的江湖醫生和歸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藥。在英國的一切城市里這種江湖醫生都有好多，他們靠各式各樣的廣告、招貼及其他詭計在最窮的階級中招攬顧客。此外，還有極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謂特許專賣藥（patent medicines）出賣，什麼莫里遜氏丸、帕爾氏生命丸、曼威靈博士丸以及成千種的其他丸藥、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這些藥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能醫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這些藥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東西，但是經常大量服用，對身體到底還是有害的；而因為所有的廣告都告訴外行的工人說，這些藥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無怪乎工人們不管有沒有必要，總是大量吞服這些藥品。帕爾氏生命丸的製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內就賣出 20 000—25 000 盒這種萬應靈藥，這些丸藥有的人用來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來治瀉肚子，

⊖ “英國的工業人口”第 8 章。——恩格斯原注

有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許专卖藥，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藥品的制造者的錢袋。这些特許专卖藥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鴉片制剂（主要是鴉片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藥，即市上出售的所謂“高弗萊强身剂”。在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顧自己的或別人的孩子的妇女們就給孩子們吃这种水藥，使他們安睡，或者如她們中的許多人所想的，使他們强壮起来。由于她們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們常常几乎是在孩子們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給他們吃这种藥，并且一直用这种藥灌他們，直到他們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鴉片的作用的感应愈来愈迟鈍，服用量就愈来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藥不再起什么作用，就給孩子吃純粹的鴉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15—20滴。諾定昂的驗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調查委员会做証說<sup>⊖</sup>：据一个制藥者自供，他在一年內为配制“高弗萊强身剂”就使用了1300磅糖浆。这种治疗对孩子們会引起怎样的后果，那是容易想像的。他們逐漸变得面色蒼白，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藥剂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業区里都有很广的銷路。

⊖ “矿山、煤坑以及雇有大批童工但不受工厂劳动限制法約束的生产部門和工厂中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調查委员会报告書”。第一个和第二个报告。第二个报告中的格梭吉报告（《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Mines and Collieries and in the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in which Numbers of them work together, not being includ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Factories' Regulation Act》.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Grainger's Rept., second Rept.）。报告書通常叫做“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这是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其中包含許多最有价值的但也很可怕的事实。第一个报告公布于1841年，第二个报告則晚两年。——恩格斯原注

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們中間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內工作的產業工人是如此，而我們在这里所談的也仅仅是他們。他們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蒼白，除了他們在工作时特別用勁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發達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憂郁病，总是愁眉苦臉，不高兴。他們的衰弱的身体無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們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統計表就無可反駁地証明了这一点。

根据出生、死亡、婚姻登記处主任詹·格莱安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 2.25%，即每 45 人中每年有 1 人死亡<sup>⊖</sup>。至少 1839—1840 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次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 46 人中才有 1 人死亡。但在大城市中，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統計表（公布在 1844 年 7 月 31 日的“曼徹斯特衛报”上），根据这些統計表，下面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在曼徹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頓在內，是 1 : 32.72，不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頓在內，是 1 : 30.75；在利物浦，如包括西得比这个郊区在內，是 1 : 31.90，不包括西得比在內，是 1 : 29.90；可是，根据柴郡、郎卡郡和約克郡（这一地区包括許多农業区或半农業区以及許多小城市，总人口为 2 172 506 人）的綜合材料，死亡率是 1 : 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郎卡郡的普萊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聚居的地方，而因为煤矿中的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很好，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業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乡下的，他們的死亡率是

⊖ “出生、死亡、婚姻登記处第五次年报”（《Fifth Annual Report of Reg. Gen. of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恩格斯原注

1 : 47.54, 就是说, 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字约低  $2\frac{1}{2}$ 。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 1843 年的死亡统计表。在苏格兰的各城市里, 死亡率还要高: 在爱丁堡, 1838—1839 年是 1 : 29, 而 1831 年在旧城甚至是 1 : 22; 在格拉斯哥, 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sup>104</sup>, 自 1830 年以来, 平均是 1 : 30, 而有些年份则是 1 : 22 或 1 : 24。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 而各阶级的平均寿命, 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 所以显得比较长, 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普·赫·霍兰德提供的, 他受官方委托, 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sup>⊖</sup>。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 得出如下的死亡率:

- 一等街, 一等房屋: 死亡率是 1 : 51
- 一等街, 二等房屋: 死亡率是 1 : 45
- 一等街, 三等房屋: 死亡率是 1 : 36
- 二等街, 一等房屋: 死亡率是 1 : 55
- 二等街, 二等房屋: 死亡率是 1 : 38
- 二等街, 三等房屋: 死亡率是 1 : 35
- 三等街, 一等房屋: 缺
- 三等街, 二等房屋: 死亡率是 1 : 35
- 三等街, 三等房屋: 死亡率是 1 : 25

从霍兰德所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里可以看出: 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 18%, 三等街比一等街高 68%; 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 31%, 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 78%; 而肮脏的街道

⊖ 参看“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区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1844年第一个报告中的附录(«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populous Districts», first Report, 1844. Appendix)。——恩格斯原注

經過清扫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他用下面的話結束自己的报告,这些話从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口里講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了:

“既然我們發現某些街上的死亡率比别的街上高3倍,而整个等級的街又比其他等級的街高1倍,既然我們又發現死亡率在糟糕的街上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情况較好的街上几乎总是低的,那末我們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結論:我們的大批的同胞,我們的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預防措施而被毀灭了(destroyed)。”

关于工人階級衛生状况的报告中有有些資料也証實了同样的事实。1840年,利物浦上等階級(貴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較好的手工業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議會报告書里还可以找到許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階級的幼兒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嬌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響。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沒有人照顧,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徹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們在前面剛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階級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業区各階級所有的孩子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sup>⊖</sup>,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証过几次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論文里面,我們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該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業区里各种小兒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較,証明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說来比

⊖ “工厂調查委员会报告書”第3卷霍金斯博士关于郎卡郡的报告。这里引証的是“曼徹斯特最高統計权威”罗伯頓博士的材料。——恩格斯原注

农业区高 2 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 4 倍，而患胃病的则比农村多 1 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的比较起来是 2.5 : 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 3 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 2 倍，因瘰疬而死的多 9 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 1832 年的议会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来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 年伦敦版第 3 版）里面的。

在每 10 000 个死亡人口中	5 岁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 岁以上
拉特兰德郡— 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2 865	891	1 275	1 299	1 189	1 428	938	112	3
艾塞克斯郡— 沼澤地农业区域……	3 159	1 110	1 526	1 413	963	1 019	630	177	3
工厂出现以前 1779—1787 年的卡赖尔市……	4 408	911	1 006	1 201	940	826	533	153	22
工厂出现以后的卡赖尔市	4 738	930	1 261	1 134	677	727	452	80	1
工厂城市普累斯顿……	4 947	1 136	1 379	1 114	553	532	298	38	3
工厂城市里子	5 286	927	1 228	1 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贫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碾死，被马踩死，

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燒死。孩子們因燒伤或被开水燙伤而致死的特別多。这种事情，在曼徹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發生一次，在倫敦也一样地多，只是报上很少登出来罢了；我手头只有 1844 年 12 月 15 日“每周快訊”上的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从 12 月 1 日到 7 日这一星期中就發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橫死的不幸的孩子們完全是我們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來說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們摆脱了充滿貧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英国已經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讀到这一切，可是他們却無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們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証据，控告他們犯了社会謀杀罪，他們是沒有权利申辯的。他們應該想办法結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則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給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們絲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們还是资产阶级，还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偏見，他們就無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現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經倒下去以后，他們終於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預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sup>105</sup>，虽然他們夸耀他們这种不仅沒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連衛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滿足的措施，但是他們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們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現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顧这种落到他們身上的無可反駁的謀杀的罪名，繼續把統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讓給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們还是宁願選擇第一条道路。



現在讓我們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轉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碼的生活，那我們也就不必奇怪它給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設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們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連自己也沒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識，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質，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錢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來說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們沒有相应的知識来做正确的选择。沒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所謂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 1843 年的議会會議上要想真正实施原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業资产阶级就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贊成。此外，有大批的兒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沒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們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課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証据都証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但是那里教师極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經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沒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次上課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課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証据，委员会

本身也坚决認為，無論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階級的愚昧無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無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資產階級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 5 500 万英鎊的龐大預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 4 万英鎊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沒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經費也許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 National Schools [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話，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搶夺过来。結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無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辯駁）成了最主要的課程，孩子們的脑子里塞滿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奧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發展却被可耻地忽視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議會建立純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給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還沒有一届內閣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內閣大臣是資產階級的馴順的奴才，資產階級又分成無數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們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讓工人受教育是危險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間直到現在还在为爭夺最高的統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階級就只好暫時不受教育了。不錯，厂主們吹嘘他們已經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書了，但这里所謂能念書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可

以看出来。只要誰認識了字母，就說他已經能念書，于是厂主們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書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經過长期的學習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階級的愚昧無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連許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国教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里，根本就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來說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業”。工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樣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沒有談到真正的工厂工業。

該委员会委員格棱吉說：“在北明翰，經我考試过的孩子，一般地連一点勉强可以說是有用的知識都沒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都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們一般也都是極端無知的。”該委员会委員霍恩說：“在烏尔未汉普頓，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听說过另一个世界，也沒有听說过天堂或陰間的生活’。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  $2 \times 2$  等于多少，說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 ( $\frac{1}{4}$  辨士)，甚至当人們把这些錢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說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没有听說过倫敦，甚至連威倫霍尔也沒有听說过，虽然这个地方离烏尔未汉普頓只有一点鐘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頻繁的。他們当中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納尔逊、威灵頓、拿破侖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連聖保罗、摩西或所罗門都从来没有听說过的人，对大盜狄克·杜平、特别是以越獄聞名的小偷杰克·謝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  $2 \times 2$  是多少，也不知道 4 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說，10 个法寻就是 10 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簡單的問題只簡短地回答說，‘什么也不知道’ (he was no judge o’nothin’)。” (霍恩。“报告”附录第 2 部分 Q 18, № 216、217、226、233 等)

这些孩子被人們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結果並沒有比原

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 q 39 页，I. 33）。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们的救主赎罪’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q 36 页，I. 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读一些小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也在内，以为圣约翰大概就是圣约翰·威斯利”（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q 34 页，I. 58）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救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昔蒙兹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书；他们说不出他们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刚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问题，在他依次问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疯病的人！”（昔蒙兹。“报告”附录第 1 部分 E 22 页及以下各页）

陶业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

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們看穿主張取消谷物稅的資產者，并且駁倒他們。虽然他們完全不了解教士們費尽心机給他們講的天国的問題，可是他們很了解人間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問題。这在以后我們还要談到，現在讓我們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連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結果显而易見地絲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們用来調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簡單原則，由于現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經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則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橫而毫無理由的訓令的宗教形式出現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沒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調查委员会所承認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沒有任何影响。英国資產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現代的道德，把資產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輸給工人！日益衰老、懶惰的資產阶级連为自己打算都認為是太費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們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經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話，資產阶级無論如何是不該抱怨的。

可見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統治阶级的擯弃和忽視。而資產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們；就像工人是無理性的动物一样，對他們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漸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資產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憤才能

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識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們还对統治階級感到憤怒，他們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們乖乖地讓人把挽軛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軛下的生活弄得比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軛，那他們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資產階級为工人階級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們考慮到工人階級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們就無論如何也不能責備他們对統治階級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資產階級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們周圍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們道德墮落。他們穷，生活对于他們沒有任何乐趣，他們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懲罰對他們也再沒有什麼可怕的。他們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讓富人去享受他們的財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無产者憑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們談論“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講得很冠冕堂皇，資產階級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沒有任何財產的人來說，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錢是人間的上帝。資產者从無产者那里把錢搶走，从而真的把他們变成了無神論者。如果無产者成了無神論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間上帝的神聖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無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时候，蔑視一切社会秩序的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这一点資產階級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昔蒙茲指出<sup>⊖</sup>，貧穷对精神所起的毀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詳尽地告訴有产階級，社会

⊖ “手工業和手工業者”。——恩格斯原注

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sup>⊖</sup>。穷困讓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餓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說，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願偷东西而不願餓死或自杀，那我們是不應該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間也有許多人很講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願去偷，而這些也就是餓死或自杀的人。不久以前自杀还是上等阶级的值得羨慕的特权，現在在英国的無产者中間也时髦起来了，許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貧困，因为他們找不到别的出路。

但是生活的毫無保障、掙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話，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無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們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貧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們的小农多半也穷，也常常缺这缺那，但是他們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較小，他們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無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沒有，昨天掙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沒有任何保証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業，——这个無产者已經被置于人們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証，农奴也还有一塊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餓死的保障；而無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們又不許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無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絲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錯綜复杂的情况下的沒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內勉强

---

⊖ “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頁。——恩格斯原注

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sup>⊖</sup>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闊綽”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蠢鱼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产业工人：

“他们的生意永远像赌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蕴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以它那殃及全世界的痉挛般的动荡，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sup>①</sup>——蒸气，把他们的一切生

⊖ 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结社的自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恩格斯原注

① 普罗特斯(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替普赛顿(Poseidon)服务的海神，有预言力并能变幻种种形态。——译者注



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們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冷靜、沉着、长期的安靜，人类这些最起碼的幸福他們是沒有的…… 对于他們，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滿了荒唐而無謂的痛苦、充滿了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陰森的監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統治的、青葱翠綠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統治的弥漫着硫酸銅蒸气、棉絮塵埃、醉后的吵嚷、憤怒和苦役的、陰暗而沸騰的陀斐特<sup>①</sup>呢？”<sup>⊖</sup>

往下，在第 40 頁中又写道：

“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罪恶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真理、背叛现实、背叛世界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識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待遇，因此，我們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問題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嗎？首先是：他們自己对于这种状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們的話就是很明显的回答，他們的行动是更明显的回答…… 憤激，下等阶级反对上等阶级的凶恶的复仇的意向愈来愈厉害了；他們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宰者的教訓的信仰愈来愈降低了。这种情緒可以加以譴責，可以給予懲罰，但是必須承認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應該知道这样的現象是可悲的，而如果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話，那将会是致命的。”

在事实方面，卡萊尔講的完全对，只是在責备工人对上等阶级的熾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錯了。这种憎恨、这种憤怒宁可說是一种証明，它証明工人感覺到他們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証明他們不願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証明他們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資产阶级的羈絆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們可以从那些沒有这种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馴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帮助資产阶级把束縛工人阶级的鎖鏈鍛得更結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業时代以前的

<sup>①</sup> 陀斐特 (Tophet) 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山谷，为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处，以后成为焚毀垃圾的地方。参看旧約全書耶利米書第 19 章。——譯者注

<sup>⊖</sup> “宪章运动”第 34 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東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連工作多少个鐘头，单调得令人厭煩；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話，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內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門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純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鐘又一分鐘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sup>⊖</sup>。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針头或銼齒輪，再加上像英国無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沒有改变。工人的劳

⊖ 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权威人士的証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亚当·斯密的“原富”（前引用版）第3卷第5編第1章第297頁上找到。——恩格斯原注

劲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sup>①</sup>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

<sup>①</sup> 耶利米是希伯来的先知。参看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译者注

是出于自願；同时現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結論說：創造大城市的只是工業和靠工業發財的資產階級；于是統治階級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創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發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認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業資產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資產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資產者完全看不見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們来听听他是怎么說的：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習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誘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懲罰而得到鼓励，懶散因有屡見不鮮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們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們所冒的危險也因容易發財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沒無聞，罪恶由于不容易識破而繁荣滋长；放蕩的生活因为可以給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誰要是在夜里走过聖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狹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貧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証据来証明这些話，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傳染性，在于年輕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習的引誘，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誘。有錢人 *eo ipso*〔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們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經不起这种引誘的；穷人們特別不幸的，是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習的引誘和犯禁的享乐的誘惑…… 在大城市里，要使沒有财产的階級中的年輕一代免受恶習的引誘，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

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論述之后，我們的作者繼續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別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的誘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責穷人行爲的富人自己也

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sup>⊖</sup>

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尤尔博士<sup>⊖</sup>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

⊖ “人口原理”第2卷第76页及以下各页、第135页。——恩格斯原注

⊖ “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1835）。

我们以后还要提到这本恶名昭彰的书。这里所引证的见该书第40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分散時虽然是軟弱的，但聯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力量。這促進了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分离，促進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們的生活条件下所應該有的那些見解和思想的形成，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受壓迫的地位，他們開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發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發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開始考慮到自己的狀況并为改变这种狀況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們發現了这种病的真實本質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沒有它們推动社会意識的發展，工人絕不会像現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殘迹，在这方面，大工業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資產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資產階級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資產階級是几乎保險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資產者随心所欲地剝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們，而且，如果他在工資以外，还对他們表現一点不花一文錢的和藹可亲的态度，或者給他們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純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錯，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創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資產者，他或許已經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責任；但是作为統治階級的一分子，——这个階級正由于它是統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狀況負責，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沒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剝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飾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

上已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使不

是爱尔兰血統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經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純理智的冷靜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資产階級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階級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階級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資产階級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資产階級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間之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間之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資产階級来，說的是另一种習慣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習俗和道德原則，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們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們是屬於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現時为止我們还只認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資产階級。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無产者所組成的那一种人。⊖

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現的社会性格，我們以后还要談到。在这里我們只想談談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談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資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經說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無論如何比資产階級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証实的事实，曼徹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証实了。他說：

“穷人給穷人的要比富人給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們的最老、最有經驗、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茲里博士的証言来証实我的話。他公开地說过，每年穷人們互相給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內富人給予穷人的

⊖ 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Sybil, or the Two 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說出了大工業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見解。——恩格斯在 1892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数目。”<sup>⊖</sup>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齷齪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些口头禅或对 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無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

⊖ 曼彻斯特的帕金逊掌教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人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版第3版（《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 etc.》. By the Rev. Rd. Parkinson, Canon of Manchester. 3rd. edit. London and Manchester, 1841. Pamphlet），——恩格斯原注

能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he is a parson!”（“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入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长说，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万个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一家酒店，而在1840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在苏格兰，1823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2 300 000加侖，而在1837年就有6 620 000加侖。在英格兰，1823年有1 976 000加侖，而在1837年就有7 875 000加侖。⊖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谓jerry-shops〔下等啤酒店〕的开设（在这些酒店里许可卖零杯的啤酒），这也助长了酗酒的

⊖ 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恩格斯原注

風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門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就必然有一家 jerry-shop [下等啤酒店]。此外，还有很多 hush-shops [私酒店]，即沒有获得許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釀造着大量的燒酒。据盖斯克爾在前引書中估計，这种釀酒作坊在曼徹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它們的年产量至少达 156 000 加侖。此外，曼徹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的酒店，因之它們在总戶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墮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騙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記起有些母亲給怀抱中的嬰兒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認这种場所对它們的顧客所起的伤風敗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資發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貧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們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徹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鬧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錢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鋪里去，——这种当鋪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許多，在曼徹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們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話）、飲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鋪里贖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鋪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結果这些东西無法贖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貸者的手

里，或者是高利貸者再也不願意為這些破舊不堪、毫無用處的東西付出一個小錢，那才算完。誰要是親眼看到過酗酒在英國工人中間流行的情形，誰就會欣然相信艾釋黎勛爵的話<sup>⊖</sup>，他說，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錢將近 2 500 萬英鎊。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惡化，如何破壞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糾紛，那是容易想像的。不錯，戒酒協會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但是幾千個「Teatotalers」〔“戒酒主義者”〕對幾百萬工人說來又算得了什麼呢？當愛爾蘭的戒酒使徒馬太神甫在英國的城市里巡行的時候，往往有 3 萬到 6 萬工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個月，大多數人就全都忘了。譬如說，要是計算一下過去三四年中在曼徹斯特起過戒酒誓的人究竟有多少，得出的數字一定會比全城居民的總人數還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現象有顯著的減少。

除酗酒外，許多英國工人的另一個大毛病就是縱欲。這個階級既然處於無人照管的情況下，又沒有正當地享受他們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這種毛病的產生，就是無可避免的，就是鐵的規律。資產階級只留給他們這兩種享樂，同時卻把大量的沉重的勞動和苦痛加到他們身上。結果是，工人為了還想從生活中得到點什麼，就把全部熱情集中在這兩種享樂上，過度地極端放縱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們被置於只適合於牲口的狀況里，那末他們除了起來反抗或者真的淪為牲口，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況資產階級自己，甚至他們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長了賣淫呢？每天晚上充塞於倫敦街頭的 4 萬個妓女<sup>⊗</sup>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資產階級為生呵！為了不得不向每一個過路人出賣自己的肉體

⊖ 1843 年 2 月 28 日在下院的演講。——恩格斯原注

⊗ 艾利生部長“人口原理”第 2 卷。——恩格斯原注

以免餓死，她們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謝她們的第一个引誘者——資產者呵！最沒有权利責备工人淫蕩的就是資產階級，这难道还不明显嗎？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縱地追求享乐、沒有远見以及不遵守現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極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階級，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嗎？既然誰也不关心这个階級的教育，既然他們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們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們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見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們这些总是处在动蕩不定的、毫無保障的状况中的人來說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現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坏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階級，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現存社会制度敌視的階級，难道还能要求他們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嗎？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階級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禍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間零乱肮脏、連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滿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什么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們还經常受到燒酒的誘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須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無休止的家庭糾紛和口角，不仅对夫

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躊躇满志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 80° 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

1805 年.....	4 605
1810 年.....	5 146
1815 年.....	7 898
1820 年.....	13 710
1825 年.....	14 437
1830 年.....	18 107
1835 年.....	20 731
1840 年.....	27 187
1841 年.....	27 760
1842 年.....	31 309

換句話說，在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6倍。在1842年發生的这些逮捕事件中，仅郎卡郡一地就有4 497起，即14%强，在密多塞克斯区(包括倫敦在內)有4 094起，即13%强。这样，我們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無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 $\frac{1}{4}$ 以上，虽然它們的人口远不及全国人口的 $\frac{1}{4}$ 。从这些犯罪統計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絕大部分的罪都是無产阶级犯的，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讀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讀会写，有6.77%讀和写都不錯，有0.22%受过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教育程度不詳。在苏格兰，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当事人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到1837年已經有3 176件，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 189件。在艾利生郡长本人做官方报告的拉納克郡，居民在三十年中增加1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1倍，即比居民的增长快5倍。至于所犯的罪，則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一样，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發生的犯罪，因为誰也不会去偷窃他自己已經有的东西。侵犯私有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 : 7 140，在法国是1 : 1 804，在英国，当盖斯克尔写書的时候是1 : 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 : 28 904，在法国是1 : 17 573，在英国是1 : 23 395。在农業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是1 : 1 043，而在工厂区則是1 : 840<sup>⊖</sup>；現在，在全英国这比例几乎是1 : 660<sup>⊖</sup>，而从盖斯克尔的書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十年呵！

⊖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10章。——恩格斯原注

⊖ 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22 733人)除以居民总数(約15 000 000人)所得的数字。——恩格斯原注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这些事实真是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二十年，——要是在这二十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这个比例就只会增大，——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拿起一张报纸而不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显著的例子。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1844年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个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了，它只选择最惹人注意的事实来叙述：在一个工厂里，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但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几个男孩子偷东西被捉住了，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骗他的债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比较详细些：埃士顿发生了两起偷窃案、一起破门入盗案和一起自杀案；柏立发生一起偷窃案；波尔顿发生两起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里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丹，发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几个爱尔兰女人打架，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母亲；罗契得尔发生许多起斗殴案、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尔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窃案、一起欺诈案、一次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瓦灵顿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欺诈、偷窃、抢劫以及家庭纠纷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我手边正好有一张1844年9月12日的“泰晤士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的消息。它报道了一起偷窃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出钱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遗弃孩子以及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



似的报道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熾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顧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純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說，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沒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話，每一个人都把別人看做必須設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別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統計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殘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漸漸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陣营：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無產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战争并不使我們感到驚訝，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原則的徹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烏云日益密集在資產階級头上，但他們却泰然处之，無动于中；虽然他們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們別說沒有对現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憤怒，甚至也沒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沒有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預示的总爆發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好說明了資產階級之所以为資產階級；由于資產階級的观点，他們甚至連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說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結果了。簡直無法相信，階級偏見和先入之見竟使得整个階級这样極端盲目，我还想說，簡直盲目到瘋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不管資產階級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發展总有那么一天會發生一种使有产階級大吃一惊的、連他們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 各別的劳动部門

### 狹义的工厂工人

現在我們來比較詳細地研究英国工業無产階級各个最重要的部分。根据上面(第299頁)規定的原則,应当从工厂工人即工厂法所涉及的工人开始。这个法律規定了利用水力或蒸气力来紡織羊毛、蚕絲、棉花或亞麻的一切工厂的工作時間;因而,它的效力及于英国工業各个最主要的部門。在这些生产部門工作的工人是英国工人中資格最老、人数最多、智慧最高、力量最大、因而也最不安分而且是資产階級最恨的。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的正是这些工人,首先是棉紡織業中的工人,正如領導着資产階級的政治运动的是他們的主人即厂主,首先是郎卡郡的厂主一样。

我們在“导言”里已經看到,在这些生产部門中工作的人如何因新机器的出現而首先被迫脫离了以前的生活条件。因此,后来陸續發明的新技术也極其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这一部分人,这就毫不足怪了。在尤尔<sup>⊖</sup>、培恩斯<sup>⊖</sup>等人写的棉紡織業史中,每一頁上都講到日新月异的改进,其中大部分也已經在紡織工業中的上

---

⊖ 安·尤尔博士“大不列顛的棉紡織業”1836年版(《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By Dr. A. Ure. 1836)。——恩格斯原注

⊖ 爱·培恩斯“大不列顛棉紡織業史”(《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By E. Baines, Esq.)。——恩格斯原注

述其余部門里被采用了。手工劳动几乎到处都被机器排挤掉，几乎一切操作都用水力或蒸气力，而且每年都有更新的改进。

在一个組織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資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搶走了工人的飯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業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業危机一样給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匱乏、貧穷和犯罪。讓我們举几个例子來說明一下。由于头一个發明——一个工人搖动的珍妮紡紗机（見前）的生产能力至少比一架普通紡車高 5 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紡紗机就要使 5 个紡工失業。生产力比珍妮紡紗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縱的水力紡紗机就剥夺了更多的人的生計。产量不变而需要工人更少的騾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它的每一次改进，即錠子数目每增加一次，都又一次地减少了所需工人的数目。騾机上的錠子已經大大增加，使許多工人都失業了：以前一个紡工和几个接断头的童工（piecers）管 600 个錠子，而現在他一个人就能够看两架騾机，总共是 1 400—2 000 个錠子，这样，两个成年紡工和他們的一部分助手就得失業。自从許多紡紗工厂使用自动紡机以后，紡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烏有而由机器代替了。我手头有一本書<sup>⊖</sup>，是曼徹斯特一位公認的宪章派領袖詹姆斯·李奇写的。作者曾在不同的工業部門里，在工厂里和煤矿里工作过許

⊖ “一位曼徹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無可否認的事实”，議會議員威·拉釋萊出版并獻給工人阶级。1844 年倫敦奧利維爾書店版第 28 頁及以下各頁（《Stubborn Facts from the Factories》. By a Manchester Operative. Published and dedicated to the Working Classes by Wm. Rashleigh, M. P. London, Ollivier, 1844, p. 28 ff.）。——恩格斯原注

多年,我个人也知道他是一位誠实、可靠而且能干的人。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他掌握了工人自己搜集起来的、关于各种工厂的許多極为詳細的資料。他做了若干統計表,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1829年,35个工厂总共比1841年多用了1060个紡工,虽然在这个时期內这些工厂里的錠子数目已經增加了99239个。他还举出了5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連一个紡工都沒有了,因为那里只使用自动紡机。錠子的数目增加了10%,可是紡工的数目却减少了60%多。而从1841年起,——李奇补充道,——通过把錠子改为双排(double decking)等等办法而实行了許多改进,結果上述工厂中的某几个厂从1841年起又解雇了一半紡工。在一个不久以前还有80个紡工的工厂里,現在只剩下了20个紡工,其余的不是被解雇,就是被迫做童工的工作,拿童工的工資。关于斯托克波特,李奇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1835年这里有800个紡工,1843年却只有140个了,虽然这个城市的工業在这八九年中有很大的發展。在梳棉机方面最近也做了类似的改进,这就剥夺了一半工人的生計。一个工厂里安装了改良并紗机,結果八个女孩子中有四个失業,而其余四个的工資也被厂主从8先令减到7先令。織布業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动力織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了手織机在織布業里的一切地盘。因为它生产的要比手織机多得多,而且一个工人能看两架动力織机,所以在这里也有許多工人失業。在所有的工厂生产部門中,在紡麻和紡羊毛方面,在蚕絲的加工方面,情形都是一样;动力織机甚至已开始夺取毛織品和麻織品生产的个别部門。仅仅在罗契得尔一地,在織法兰絨及其他毛織品的部門里用动力織机的就比用手織机的多。对于这一点資產階級通常总是这样回答:机器一改进,生产費用就减少,結果成品的价格就

降低,而价格一降低,消费量就会增加,因而失业的工人很快就能在新建的工厂里重新找到工作。当然,资产阶级有一点是完全对的,这就是在有利于一般工业发展的一定的条件下,以廉价原料制成的商品的价格每降低一次,都会大大地增加消费量,促成新工厂的创办。但是除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论断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价格降低的结果显示出来和新工厂建立起来以前,是要经过许多年的。他们绝口不谈,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真正的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因此,整个整个的劳动部门或者完全取消了,或者改变得很厉害,弄得工人必须从头学起;在禁止童工劳动的问题被提出来时,资产阶级总说,要想获得必要的工厂技能,必须从小即从十岁以前学起(例如见“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几个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们却竭力避免提到这一点。最后,他们绝口不谈,技术发展的过程在不断地继续着,即使工人真的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了工作,机器的改进还是要把他从那里排挤出去,使他最后失去对明天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机器改进的全部利益。在最初几年,当许多老机器还在工作,改进还没有普遍实行的时候,资产阶级抓到了发财致富的最好的机会,这时要资产阶级看到机器生产发展的坏的一面,那未免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机器一改进,工资就降低,这也是资产阶级激烈地加以反驳的,但工人却再三地坚持这一点。资产阶级要我们相信,虽然计件工资随着生产的改进而降低了,但每周的工资一般说来与其说是

降低，不如說是提高了，工人的狀況與其說是變壞，不如說是改善了。要徹底搞清楚這個問題是困難的，因為工人所引的多半是計件工資下降的例子。但是不管怎麼樣，在各種不同的勞動部門里每周的工資也毫無疑問地隨着機器的採用而降低了。在驃機上紡細紗的所謂精紡工確實拿到較高的工資，每周三四十先令，這是因為他們組成了一個堅強的工會來反對降低工資，同時他們的勞動也需要長期的訓練。但是普通的紡工所得的工資就很低了，因為他們不得不和不適于紡細紗的自動紡機（self-actors）競爭，而且這種機器的應用又大大打擊了他們的工會。一位這樣的紡工告訴我，他一個星期掙的錢不超過 14 先令，這和李奇的材料是符合的，他說，在各種不同的工廠里普通紡工一星期掙不到  $16\frac{1}{2}$  先令，三年前一星期掙 30 先令的紡工，現在勉勉強強才能掙  $12\frac{1}{2}$  先令，而去年一年的平均工資也沒有超過這個數目。的確，女工和童工的工資是下降得少一些，但這只是由於一開始就不高的緣故。我認識許多女工，都是有小孩的寡婦，她們拚了命每星期也只能掙八九個先令，而每一個知道英國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的人都承認，這一點錢是不夠養家的。所有的工人都異口同聲地斷定，工資隨着機器的改進而普遍降低了。工業資產階級說什麼工人階級的狀況隨着機器的使用而改善了，工人自己卻認為這是一個彌天大謊，而要証實這一點只要在工廠區里的每一個工人大會上听听就可以了。但**即使**真的只是相對工資即計件工資降低，而絕對工資即工人一星期掙的總數並沒有變動，那又該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來呢？這只是說，工人必須心平氣和地看着廠主老爺們裝滿自己的腰包，看着他們從每一種改進中得到好處，却連極小的一份也不分給他們工人。資產階級在和工人鬥爭時連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原

理都忘记了。这个在其他场合下把马尔萨斯当做神的资产阶级惶恐地向工人叫道：假使没有机器，英国人口中增加的那几百万人到哪里去找工作呢<sup>⊖</sup>？多么地荒谬！似乎资产阶级自己知道得不够清楚，假使没有机器和机器所促成的工业繁荣，这“几百万人”根本就不会出世，也不会长大！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这些聪明的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现在，这当然已经晚了，因为在这方面也发明了而且使用了机器），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只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要避免陷入绝望状态，在这里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在内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资产阶级，或者过酗酒和放荡的生活。英国工人有的选择了第一条路，有的选择了第二条路。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叙述了成百次的破坏机器和反抗资产阶级的骚动，而关于放荡生活，我们已经谈过，这当然只是绝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 例如昔蒙兹先生在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一书中就是这样发问的。——恩格斯原注

最倒霉的是那些不得不和新采用的机器竞争的工人。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是由机器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价格来决定的，而因为机器生产比手工生产便宜，所以和机器竞争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是最低的。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不得不和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竞争的话，他的遭遇也是一样。当然，另外还有谁会来担负这种损失呢？厂主既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又不愿意受到损失；对死的机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在活的工人身上，在整个社会的替罪羊身上打主意。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竞争的工人中间，生活得最坏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他们得到的工资最少，甚至在有足够的工作时，一星期所挣的钱也不超过 10 先令。动力织机一个跟一个地从他们那里夺取了织物業的各个部门；此外，手织业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门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所以，一个手工织工平时一星期能挣六七个先令就算是幸运的，甚至要挣这个数目，他每天就得在他的织机上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此外，大多数的织品都需要一个潮湿的工作地点，为使纬纱不致老是断掉，这样，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也由于工人穷，租不起好房子，手织作坊中地下几乎从来都是既不铺木板，也不铺石板的。我访问过不少手工织工；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在最破落最肮脏的大杂院和街道里，通常总是在地下室中。往往是五六个织工住在一座只有一两间工作室和一间大的公用卧室的小宅子里，而且他们中还有些是已经结了婚的。他们的食品几乎光是土豆，有时有点燕麦粥，牛奶很少见，肉类就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爱尔兰人或者祖先是爱尔兰人。这些不幸的手工织工，每次危机都是他们最先受到打击，最后摆脱危机的恶果，而且还要被资产阶级当做一种工具，用



来反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看吧，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这些穷工人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来评判工厂制度吧！<sup>①</sup> 似乎手工工人的状况这样坏并不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似乎资产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不像我们这样清楚！但是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说几句谎，装一装好人，在他们算是算不了什么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机器生产的发展日益挤掉成年男工的事实。在机器上工作，无论是纺或者是织，主要就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由于他们手部的肌肉和骨骼比较发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适合，因此，他们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气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了。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纺纱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骡机的纺纱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在使用自动纺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间或是失了业的老纺工。<sup>②</sup> 在动力织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岁到二

<sup>①</sup> 例如尤尔博士在他的“工厂哲学”中说的。——恩格斯原注

<sup>②</sup> “郎卡郡某些棉纺织业部门的工资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挣八九个先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岁的童工一星期却挣5个先令，而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竟挣10—12个先令。”1844年10月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十岁及二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们很少有二十一岁以后还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纺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最多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来装卸筒管（doffers），雇几个成年男人做监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匠、看门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这一情况厂主也是否认的，他们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详细的统计表，想证明机器决没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52%），男人大约占 48%，而所有这些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十八岁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爷们很小心地不告诉我们，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他们本来就是很明显地把机匠、木匠以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连办事员等等都列在表里面，可是他们没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说出来。这些表充满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颠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吓唬门外汉但不能向内行人证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表里面竟一字不提，这证明了作者即厂主们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不老实。我们可以从艾释黎勋爵于 1844 年 3 月 15 日在下院为辩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发表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别的资料，这些资料并没有受到厂主的反驳，而厂主所发表的材料也只涉及英国工厂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颠的 419 560 个工厂工人中（1839 年）有 192 887 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242 296 人是女性，其中有 112 192 人在十八岁以下。这样，男工中就有 80 695 人在十八岁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 96 569 人，占工人总数的 23%，就是说，还不到四分之一。在棉纺

織工厂里，女工占 56.25%；在毛紡織工厂里占 69.5%；在絲織工厂里占 70.5%；在紡麻工厂里占 70.5%。这些数字想来已經足以証明成年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但是要証实这一点，只要随便到一个工厂里去看看就可以了。結果現存的社会秩序必然会顛倒过来，而这种顛倒既强加于工人头上，就要使他們遭到最致命的后果。首先是女人出外工作完全破坏了家庭。如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或別的地方工作同样长的時間，那末他們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他們像野草一样完全沒有照管地生长起来；或者每星期花 1 个或 1<sup>1</sup>/<sub>2</sub> 先令把他們托付給旁人照管，而那些入会怎样对待他們，那是不难想像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顧而釀成的不幸事件就惊人地增加起来。根据曼徹斯特的驗尸官的記錄（根据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的材料，霍金斯博士报告第 3 頁），在九个月內有 69 个孩子燒死、燙死，56 个淹死，23 个摔死，77 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是說，一共發生了 225 起不幸事件<sup>⊖</sup>，而在非工厂城市的利物浦，十二个月內一共只發生了 146 起致命的不幸事件。煤矿中的不幸事件都沒有包括在这两个城市的这些数字里面，而且更應該注意到，曼徹斯特的驗尸官管不了索尔福，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可以認為是差不多相等的。几乎每一号“曼徹斯特衛报”都要报道一起或几起严重地燒伤、燙伤人的事件。母亲出外工作也是小孩子死亡率增高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由事实証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嬰孩当然只好丢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們急忙赶回去給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西。这奶是怎样

⊖ 1843 年由曼徹斯特医院記錄下来的不幸事件中有 189 件——一百八十九件；——是燒伤、燙伤的，其中有多少人死亡却沒有說明。——恩格斯原注

喂的，那也可想而知了。艾釋黎勛爵引述了几个女工的話：

“M. H. 二十岁，有两个小孩子，小的还是乳兒，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顧。她早晨五点钟一过就到工厂里去，晚上要到八点才回来；奶整天从乳房往外流，把衣服全弄湿了。——H. W. 有3个小孩子，星期一早晨五点离开家，星期六晚上七点才回来；一回来就要替小孩子做許多事情，忙到早晨三点鐘以后才睡觉。她常常被雨淋得渾身透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做工。她說：‘我的乳房痛得要命，我渾身都讓流出来的奶浸透了。’”

这个可耻的制度只是鼓励了人們采取用麻醉藥使孩子保持安靜的办法，而事实上这个办法在工厂区已經傳布得很广了。根据曼徹斯特区出生、死亡、婚姻登記处主任琼斯博士的意見，这种習慣是常見的瘡癩致死事件的主要原因。女人在工厂里做工不可避免地要把家庭整个地拆散，在目前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状况下，这种情形無論对夫妇或者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敗坏道德的后果。一个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沒有時間讓孩子在初生的几年中享受最普通的母爱的母亲，一个很少能見到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是不能成其为孩子的母亲的，她必然会对孩子很冷漠，沒有爱，沒有絲毫的关怀，完全像对待别人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以后对家庭是沒有絲毫眷恋的，他們在自己創立起来的家庭里也永远不会感到一点家庭味，因为他們太習慣于孤独的生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工人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兒童劳动也是促成家庭离散的一个原因。孩子們一到他們掙的錢多于父母花在他們身上的錢的时候，他們就开始交給父母一部分錢作为食宿的費用，其余的就自己花掉。这样的事情往往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經發生（鮑尔：关于里子城的报告，其中的几个地方；塔夫耐尔：关于曼徹斯特的报告第17頁及其他各頁；以上均引自“工厂劳动

調查委员会报告”)。一句话，孩子们都逐渐自立起来，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馆，如果他们不满意这个旅馆，他们就常常另外换一个。

在許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使它头脚颠倒了。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这种情形是很多很多的；仅仅在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专搞家务的男人。这种实际上的阉割在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愤怒，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原封不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发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像的。我手边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罗伯特·朋德的英国工人写给奥斯特勒的，这个工人住在里子城泽边木屋的男爵大厦里（为了资产阶级可以到那里去找他，所以我把详细地址写出来）。这封信的率直精神，我在翻译中未必能表达出一半来；綴字錯誤在德文中还可以适当地表达出来，但是約克郡方言的特点就完全失去了。他在这封信里说到他認識的一个工人出去找工作，在郎卡郡的聖海倫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就在这里，先生，他找到了他，他走近他的小屋的时候，您想，他看到了什么？一間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張三条腿的圓桌、一只箱子，沒有床，只是牆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着两条脏床单，火爐旁有两个木墩子。我这位可怜的朋友走进来的时候，可怜的杰克坐在火爐旁的一个木墩子上，您想想看，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用縫衣針替老婆补袜子，他一看見老朋友站在門口，就想把針綫活藏起来，可是朱（我那个熟人的名字）看到了一切，他說：‘見鬼，杰克，你在干什么呀？老婆呢？你这是干什么活呀？’可怜的杰克很不好意思，他說：‘我知道这不是我干的活，可是我那可怜的老婆在工厂里；她早晨五点半就到那里去，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点鐘，回家时已經累得啥也不能干了。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得替她做。我没有工作，已經三年多沒有工作了，我这一輩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說着就痛哭起来，他說：‘不錯，好心的朱，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沒有男人的工

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 100 金鎊还要难。但是我从来不愿意相信你或别人会看到我替老婆补袜子，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我老婆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我害怕她会病倒，那样一来我就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了，因为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朱，这工作可糟糕呀。’他接着又伤心地哭着说：‘以前可并不是这样。’朱问道：‘可是，杰克，告诉我，这些时候没有工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杰克回答道：‘我告诉你，朱，凑合着活下来了，可是也真难过呵。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有的是工作，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懒汉。’朱说：‘可不，你哪里是懒汉。’杰克说：‘我们的家曾经布置得很好，那时玛丽也用不着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们两人用。可是现在什么事情都颠倒过来了；玛丽得出去工作，我只好留在家里看孩子，扫地，洗衣服，做饭，补衣服。我那可怜的女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是累得动也动不了。你知道，朱，一个过惯了另一种生活的人，这日子真难过呵。’朱回答道：‘是啊，真不容易。’杰克又开始哭起来；他说，要是他没有结婚，或者根本就没有生下来，那该多好；但是他和玛丽结婚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弄到这个地步。杰克说：‘我为这些事情哭过不知多少次了。’先生，朱后来告诉我，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就用他所有从小在工厂里学会的骂人的话咒骂工厂、厂主和政府。”

还能够想像出一件比这封信里所描写的更荒谬更不近情理的事情吗？但是这种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又既不能使男人真正成为女人、也不能使女人真正成为男人的情况，这种最可耻地侮辱两性和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正是我们所赞美的文明的最終結果，正是几百代人为了改善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状况而做的一切努力的最終結果！眼看着人们的一切勤劳和努力到头来都成为笑柄，我们只能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到失望，或者承认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走错了道路。我们必须承认，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说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统治男人的现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来男人统

治女人的现象也应该认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现在的女人，像过去的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她谋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财产这样一事实上，那末财产的共有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合理的，因为家庭的一員以自己担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矜驕自夸。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愛，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 当孩子們不像上面所說到的那样只給父母飯費而要贍养他們的失業的父母的时候，也發生同样的相互关系。霍金斯博士在关于工厂劳动的报告里証实了这种关系是很常見的，在曼徹斯特这种事情更是屢見不鮮。正如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是一家之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是一家之主。艾釋黎勛爵在他的演說（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發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他的两个女兒上酒館而責罵了她們，她們却說她們已經被訓得煩死了：去你的吧，我們还得养活你！也应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她們丢开父母不管，从父母家里搬了出去。

在工厂里长大的未婚女人并不比已婚的好。一个九岁起就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孩子自然是不熟悉家务的，因此，所有的工厂女工在这方面都完全是外行，都不会管理家务。她們不会縫紉，也不会編織，不会做飯，也不会洗衣，她們連最普通的家务都不熟悉；至于怎样照顧孩子，她們更是一無所知。“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报告”举了几十个例子来証明这个事实，而关于郎卡郡的报告的作者霍

---

⊖ 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 412 个工厂里做工的有 10 721 个已婚妇女；她們的丈夫只有 5 314 人也在工厂里做工，3 927 人做別的工作，821 人沒有工作，其他 659 人不詳。可見每个工厂都有两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

金斯博士則發表了以下的意見(“報告”第4頁)：

“女孩子們沒有經過仔細考慮就很早地結了婚；她們沒有可能、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來熟悉家庭主婦的最普通的責任，而且即使她們有了這一切，她們在婚後也沒有時間來承擔這些責任。母親每天有十二小時看不見自己的孩子；照管孩子的是特地花錢雇來的女孩子或老太婆；此外，工廠工人的住宅又經常不是一個所謂的家(home)，而是一間地下室，里面既沒有做飯的器具，也沒有洗濯、縫紉和補綴衣服所必需的用具，缺少能使他們過愉快而有文化的生活並能使家庭具有吸引力的一切東西。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特別是為了保全孩子們的生命和健康，我只能竭誠希望，总有一天會禁止已婚的婦女在工廠里做工。”

個別的例子和証言見“工廠勞動調查委員會報告”，考威爾文件第37、38、39、72、77、50頁。塔夫耐爾文件第9、15、45、54頁及其他各頁。

但是這一切還不是最大的禍害。婦女在工廠里工作，在道德方面引起了更加嚴重得多的後果。人們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間工作室里，他們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沒有受過任何智育和德育的人們擠在一個狹小的地方，——這一切對婦女的性格的發展是不会有什麼好影響的。廠主即使注意到這一點，也只是在真正發生了什麼丑事的時候才會出來干涉；至於比較放蕩的人對比較規矩的人、特別是對年輕人的經常的但不大顯著的影響，他就無法知道，因而也無法預防。而正是這種影響害處最大。在“1833年工廠調查委員會報告”中，許多証人都說工廠中的談話是“猥褻的”、“下流的”、“骯髒的”等等(考威爾文件第35、37頁及其他許多頁)。我們在大城市里大規模地看到的事情在這裡小規模地發生着。人口的集中對人們有同樣的後果，不管這種集中是發生在大的城市里還是小的工廠里。工廠愈小，接近的機會就愈多，交往就愈不能



避免。后果是免不了的。莱斯特的一个证人說，他宁願讓他的女兒去討飯，也不願送她进工厂，工厂是地獄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鮑尔文件第 8 頁)。曼徹斯特的另一个证人“毫不犹豫地断定，工厂中的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經丧失了童貞”(考威尔文件第 57 頁)。委员会委員考威尔簡直就認為，工厂工人的道德比工人阶级的中等道德水平还要低一些(第 82 頁)，霍金斯博士則說(“报告”第 4 頁)：

“道德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出来的，但是，如果相信我亲身的观察，相信那些和我談过話的人在这个問題上的意見，并且也相信我得到的一切証言所产生的总印象，那末工厂生活在道德上对青年妇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丧气的。”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 *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給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們本来就不很珍視自己的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話(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許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們的情况本質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創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沒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習俗的暴發戶的时候，他們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們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要正确地估計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須先考察一下兒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性。現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們主要是从孤兒院里領来的，厂主把他們当

做“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们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1796年，派西沃博士和罗·皮尔爵士（棉纺织工厂厂主，现任首相的父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令人髮指的制度在社会舆论中所引起的愤怒，竟使得议会在1802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待<sup>106</sup>。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后，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儿童，使他们不会因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残害。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就足以证明他们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像对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质或者使发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贫穷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长起来的工厂工人的九岁的孩子，绝对不会像在比较健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他在九岁时就被送进工厂，每天工作六小时半（以前是八小时，再以前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甚至十六小时），一直工作到十三岁，而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八岁每天就要工作十二小时。对他的身体发生不良影响的原因仍然不停地起作用，而工作又愈来愈重了。就假定一个九岁的孩子，甚至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坚持每天六小时半的工作而

不致对他的身体有显而易见的损害，但是待在污浊、潮湿而且经常是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对健康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好处的。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拖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固然，资产阶级会说：如果我们不雇孩子们到工厂里来工作，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用来替自己辩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些专门为工人的福利而设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资产者会怎样保护工人的利益呵！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他们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说：孩子们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间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经常地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工作时间常常是长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饭时间除外）；厂主允许管理人殴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兰厂主骑着马去把一个十六岁的逃跑的工人追回来，叫他走在马前面，强迫他和马跑得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长鞭子抽他！（斯图亚特文件第35页）在工人的反抗比较强烈的大城市里，这种事情当然发生得少一些。然而就是这样长的工作日也还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贪欲。他们的目的是要

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投入建筑物和机器里的資本多生利，使它尽可能地加紧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有些厂主实行了两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证工厂工作的进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任何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的夜間的休息这样經常被剥夺，对于小孩子和年轻人，甚至对于成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像的。整个神经系统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劳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劳动的另一后果便是酗酒和纵欲。一个厂主证明（塔夫耐尔文件第 91 页），在他的工厂里实行做夜工的两年内，非婚生子的数目增加了 1 倍，道德水平竟降低到使他不得不停止夜工。别的厂主做得更野蛮，他们强迫许多工人一连工作三四十个小时，而且这样的事情每星期都有几次；这是因为厂主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换班：换班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工人能替换出来睡上一两个钟头。委员会关于这种野蛮行为和它的后果的报告超过了我在这方面所听到的一切。这里所叙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可是我们将会看到，资产阶级还经常地引用委员会的证据，把它解释得对自己有利。这种制度的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委员们报告他们遇到过大批的畸形者，而这些人之所以畸形完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最普通的畸形是脊柱和两腿弯曲。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里子城的弗兰西斯·沙普是这样描述这种畸形的：

“在我到里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股骨下端这样奇怪地弯曲的情形。起初我以为这是佝偻病，但是到医院里来看这种病的人很多，得这种病的年龄又都是小孩子通常已不会得佝偻病的时候（八岁到十四岁），而且只是在孩子们进工厂工作以后才开始得这种病，这一切迫使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到目前

为止我已看见过将近一百个类似的病例，我可以極肯定地说，这些病是劳动过度所引起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病人都是工厂里的孩子，并且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生病的原因是劳动过度。”——“显然是因为站得太久而引起的脊柱弯曲的病例，我遇到过不下三百件。”（劳顿博士文件第 12、13 页）

在医院里工作了十八年的医生，里子的海依博士，也同样证明：

“脊柱弯曲在工厂工人中是很常见的；在某些场合下这只是过度劳动的结果，在某些场合下则是长时间的劳动在生来就弱或由于营养不良而衰弱下去的身体上造成的后果…… 在这里，各种各样的畸形比这些病更常见：膝盖向里弯，关节上的韧带常常松弛而缺少弹力，腿的长骨弯曲了；这些长骨头的粗的一端特别弯曲而且发育过度；这些病人都来自工作時間过长的工厂。”（劳顿博士文件第 16 页）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門特和沙普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在德林瓦特、鮑尔和劳顿博士等三个委员的报告里描述了許多这类畸形的例子；不大注意这种现象的塔夫耐尔和爵士戴維·巴萊博士在他们的报告里也举了个别的例子。（德林瓦特文件第 69 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子，第 72、80、146、148、150 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子，第 155 页及其他許多页；鮑尔文件第 63、66、67 页上的两个例子，第 68 页上的三个例子，第 69 页上的两个例子；关于里子的报告第 29、31、40、43、53 页及以下各页；劳顿博士文件第 4、7 页上的四个例子，第 8 页上的几个例子等；戴·巴萊爵士文件第 6、8、13、21、22、44 页，第 55 页上的三个例子等；塔夫耐尔文件第 5、16 页及其他各页）調查过郎卡郡的委员考威尔、塔夫耐尔和霍金斯博士完全忽视了工厂制度所引起的这些医学上的后果，虽然郎卡郡的畸形者在人数上完全可以和約克郡相比。我每次走过曼徹斯特总要碰見三四个畸形者，他們的脊柱和腿弯曲的情形和上面所描述的完全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他們，并且也有可能仔細地观

察他們。我自己認識一個畸形者，他的情況和海依博士所描述的完全符合，他是在盆德爾頓城道格拉斯先生的工廠里弄成畸形的。這個工廠由於不久以前還整夜整夜地工作，所以在工人中間至今還是臭名遠揚的。一看這些畸形者，立刻就可以猜到使他們畸形的原因是什么，他們的畸形都是一樣的：膝蓋向里同時又稍微向後凹進去，雙腳成為里八字，關節畸形而粗大，脊柱往往向前或向旁邊彎曲。但是搞得最殘酷的看來還是麥克爾士菲爾德區的那些仁慈的絲織廠主們；其所以如此，是由於這些工廠里有年齡很小的（最小的只有五六歲）孩子在做工。在塔夫耐爾委員引用的補充材料里，我們看到一個叫做萊特的工廠監工的供述（第 26 頁），他的兩個姊妹的身體都被工作弄得畸形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他有一次計算過麥克爾士菲爾德好幾條街上（其中有幾條是那里最干淨最漂亮的街道）的畸形者的數目：他在唐利街看到十個畸形者，在喬治街看到五個，在沙洛特街看到四個，在瓦特考茨看到十五個，在班克托普看到三個，在勛爵街看到七個，在磨坊巷看到十二個，在大喬治街看到兩個，在習藝所里看到兩個，在派克格林看到一個，在皮克福特街看到兩個。這些畸形者的家屬都異口同聲地說，他們的畸形是繅絲工廠的過度勞動造成的。在第 27 頁上講到一個男孩子，他因身體畸形已不能上樓梯；那里還提到幾個女孩子，她們的脊柱和骨盤都是畸形的。

過度的勞動還造成了其他的畸形，特別是扁平足，這是戴·巴萊爵士（譬如在第 21 頁上他就提到兩起）和里子的內外科醫生們常常遇到的（勞頓文件第 13、16 頁等）。即使年輕人比較結實的身體，比較好的營養和其他條件，受得住這種野蠻剝削，但是他們也免不了要鬧背痛、腰痛、腿痛、關節腫脹、靜脈擴張，或大腿和小

腿上生大塊的頑固的瘡瘍。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普遍的現象。斯圖亚特、馬根多士和戴·巴萊爵士在他們的报告里举了几百个例子；他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患这些病中的任何一种病的工人；而在其余的报告里，也有許多医生証明这些后果确实是存在的。在关于苏格兰的报告里有無数的例子毫無疑义地表明，每日工作十三小时甚至对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工人，無論是男工或女工，都至少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对丹第和丹弗姆兰的紡麻工厂來說是如此，对格拉斯哥和拉納克的棉紡織工厂來說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疾病都是从工厂劳动的性質本身产生的，这种工作如厂主們所說的确实是很“輕易的”，但正是这种輕易比任何別的工作更能使身体衰弱。工人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但是他們必須老是站着，無权坐下。誰要是在窗台上或筐子上坐一会，他就要受罰。这样长久地站着，上身經常机械地压在脊柱上、骨盘上和腿上，这就不能不产生前面所說的那些后果。这样老是站着完全不是工作本身所必需的，諾定昂的例子就証明了这一点，在那里，至少在并紗間里已經安上了座位（結果，上面所說的那些疾病都絕了迹，因而女工們也同意延长工作日了）。但是，在工人只是替資產者工作而很少有兴趣把工作做好的工厂里，他利用座位确实很可能利用到超过厂主所同意和对厂主有利的程度，而为了使資產阶级少損失一点原料，就只好讓工人牺牲他們的健康了<sup>⊖</sup>。此外，長時間保持这种站立姿勢，加上工厂里的空气大半都很坏，这更使得整个身体显著地衰弱下去，从而又引起其他各种与其說是局部的、

⊖ 里子城一个工厂的紡紗車間里也已經安上座位了（德林瓦特文件第80頁）。

——恩格斯原注

不如說是全身的疾病。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風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沒有足够的氧气，充滿塵埃和机器油蒸發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滿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工人們由于热，都穿得很少，因此，室內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感冒；在这种热地方待久了，他們就害怕新鮮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的逐漸衰退，体内發出的热量也减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来維持，所以工人在窗子关得紧紧的悶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此外，从工厂的热空气里走到街上那种刺骨的或潮湿的寒風里的時候温度总是急剧地改变，工人沒有足够的防雨器具，淋湿了又不能换上干衣服，这一切加起来就經常引起感冒。如果我們記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恐怕除了腿上的肌肉，全身就沒有一塊肌肉真正緊張起来，真正活动起来，如果我們記住，工人們絲毫不能抵抗上述各种原因所起的使身体衰弱和鈍化的作用：他們沒有机会鍛炼身体，發展肌肉的力量，增進肌肉纖維的彈性和强度，而且从小就被剝夺了在新鮮空气里活动的机会，那末，当医生們在工厂报告中几乎一致肯定，他們發現工厂工人对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別弱，生活力普遍減低，整个智力和体力都不断在衰退，我們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讓我們先听听戴·巴萊爵士的話吧：

“工厂劳动对工人有下面几种不利的影響：（1）無条件地必須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動适应于由均匀的無休止的力量來發動的机器的运动；（2）必須在長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間隙都迅速地互相銜接起来的時間內保持站立的姿勢；（3）睡眠被剝夺（由于工作時間長、腿痛和全身不舒服）。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滿是塵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悶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因此，特別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兒童的新鮮的玫瑰色的臉色，比其余的男孩子蒼白而消瘦。連赤着脚站在織布房的泥地



上的手工織工的学徒都比他們好看些，因为这些学徒总还偶尔到新鮮空气里去走走。但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孩子，除了吃飯就没有一分鐘的空閑，他們也仅仅是在去吃午飯的时候才走到新鮮空气里去。一切成年的男紡工都蒼白而消瘦，都有消化不良和胃口时好时坏的毛病；他們从小就在工厂里工作，在他們中間很少有或者簡直就没有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人，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結論：他們的职业对男人身体的發育非常有害。女人担負这种劳动比男人容易得多。”（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們在下面将看到，她們也有她們自己的特殊的疾病。）（戴·巴萊爵士的总报告）

**鮑尔也說了同样的話：**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說，布萊得弗德的工厂制度造成了許多畸形者……時間延續得很久久的劳动，对身体的影响不仅表現在各种显著的畸形上，而且还更普遍地表現在發育受阻碍、肌肉松軟和体格孱弱上。”（鮑尔报告第74頁）

**前面已經引証过的里子的外科医生<sup>⊖</sup>弗·沙普写道：**

“当我从斯卡博罗搬到里子的时候，我立刻看到，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比斯卡博罗及其附近地区的孩子蒼白得多，肌肉也远不如他們發达。我还發現，許多孩子就他們的年齡說来是太矮小了……我診断过無数的瘰癧病、肺部疾病和胃腸疾病，作为一个医生，我絲毫也不怀疑这些病是由工厂里的工作引起的。我贊同这样的意見：時間延續得很久久的劳动削弱了身体的神經力量，造成許多疾病滋生的地盘；假使没有新的力量从农村里源源不絕地流进来，工厂工人这一种人是很快就会完全退化的。”

**布萊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門特也这样說：**

“在我看来，这里的工厂中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引起了整个身体的特別衰弱，因而使小孩子極其容易感染流行病和偶發的疾病……我坚决認為，工

---

⊖ 所謂外科医生 (surgeons)，和有学位的医生 (physicians) 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家，因此，他們不仅从事外科医生的業務，而且也从事一般的医务。由于許多原因，大家宁願找他們看病，而不找有学位的医生。——恩格斯原注

厂对通风和保持清洁没有任何必要的规定，是特别容易产生或感染我在行医时经常遇到的那些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证明：

“(1) 我有机会观察过工厂制度在最良好的环境中（在布莱得弗德的伍德工厂里，这是这个城市中设备最好的工厂，凯博士在这里当过厂医）<sup>①</sup>对儿童健康所起的影响；(2) 这影响是无可怀疑的，而且甚至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也为害很大；(3) 1842年一年中，在伍德工厂里做工的孩子有五分之三找我看病；(4) 这个制度最有害的后果，与其说是表现在畸形者人数众多上面，不如说是表现在大多数人都虚弱多病上面；(5) 自从伍德工厂中儿童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以来，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引用了所有这些证言的委员劳顿博士自己也说：

“我觉得这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孩子们的工作时间长得不近人情，长到残酷的程度；甚至成年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也未必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结果许多人夭亡了，许多人终身带上了残疾。担心那些活下来的人将产生衰弱的后代，从生理学的观点来说，是太有根据了。”

最后，霍金斯博士在谈到曼彻斯特时说道：

“我相信大多数的旅行者都会看到，曼彻斯特的居民，特别是工厂工人，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脸色苍白。在大不列颠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到过人们在体格和脸色方面这样显著地够不上民族标准。已婚的女人惊人地缺少英国妇女的一切特点……我必须承认，从曼彻斯特的工厂里领来给我看的一切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抑郁而苍白的；他们脸上没有一点青年人通常具有的生动、活泼和愉快的表情。他们中有许多人告诉我，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他们一点也不想在新鲜的空气里跳跳蹦蹦地玩一下，而宁愿静静地待在家里。”

我们再从霍金斯的报告里引证一段话，这段话固然只有一半

---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和这里所谈的有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有效地证明：

“無节制、放蕩、不关心将来，这就是工厂居民的主要恶习，这些毛病都很容易从今天的制度所产生的风气上得到解释，而且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这个制度里产生出来的。大家都公认，消化不良、憂郁病和全身衰弱在这类工人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十二小时的单调的工作之后，想找点什么东西来刺激一下，那真是太自然了，而当上述疾病终于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愈来愈频繁地到烧酒里面去寻求解脱。”

委员会的报告中举出了几百个例子来证实医生和委员们的这些话。关于青年工人的发育因工厂劳动而受到阻碍这一点，也有成百的证据来加以证实；例如考威尔举出了同在一个主日学里读书的46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的体重：其中26人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04.5磅，其余的20个虽然也属于工人阶级，但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17.7磅。曼彻斯特最大的厂主之一，一个鼓动厂主们反对工人的家伙——如果我沒有弄错，就是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自己有一次就说过：这样继续下去，郎卡郡的工厂工人很快就会变成侏儒族。<sup>⊖</sup>一个管理征兵的军官（塔夫耐尔文件第59页）说，工厂工人适于服兵役的很少，他们又瘦又弱，常常被医生们认为不合格而不得入伍。在曼彻斯特，他很难找到一个5英尺8英寸高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只有5英尺6—7英寸高，可是在农业区里大多数的新兵都有5英尺8英寸高（英尺略短于普鲁士尺，大约每5英尺短2英寸）。

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男工们都很快累垮了。大多数人一到四十岁就不能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支持到四十五岁，能支持到

⊖ 这一句话并不是从工厂报告中引来的。——恩格斯原注

五十岁的就非常少了。失去工作能力的原因，除整个身体衰弱外，还有视力的衰退。这是在驢机上工作的結果，在这种机器上工作时，工人必須經常注視着一长排平行的細綫，因而眼睛老是很緊張。在哈帕尔和拉納克的几个工厂里工作的 1 600 个工人中，只有 10 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在斯托克波尔特和曼徹斯特各工厂里工作的 22 094 个工人中，只有 143 人超过四十五岁。在这 143 人中，有 16 人是由于特別开恩才留在工厂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人做的是小孩子的工作。在一份包括 131 个男紡工的名单上，只有 7 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可是这 131 人向哪一个厂主要求工作都因“年齡太大”而遭拒絕。在波尔頓的 50 个被当做廢物的紡工中，只有两个超过了五十岁，其余的平均还不到四十岁，可是这些人都因为什么年齡太大而失業了！一个叫做艾釋华特的大厂主在写給艾釋黎勛爵的一封信里自己承認，紡工們一接近四十岁，就不能紡出規定数量的紗了，因此“有时候”就要被开除；四十岁的工人他已經称他們为“老头”了！<sup>⊖</sup>馬根多士委員在 1833 年的报告中也这样說：

“虽然我知道兒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从而在思想上对这一点已經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仍然很难相信那些比較蒼老的工人自己所說的岁数，这些人老得多么早呵。”

主要是替工厂工人看病的格拉斯哥的外科医生斯麦里也說，对工人來說，四十岁已經老年(old age)了(斯圖亚特文件第 101 頁)。关于这一点，塔夫耐尔文件第 3、9、15 頁和霍金斯报告第 4 頁、文件第 14 頁等都有証明。在曼徹斯特，工人的这种未老先衰的現象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四十岁的男人看起来都比他們的实

⊖ 所有这些事实都引自艾釋黎勳爵的演講(1844 年 3 月 15 日在下院發表)。——恩格斯原注

际年龄老十岁到十五岁，而在富裕的阶级中，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不狂饮，他们的容貌总是保持得很好的。

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是很特别的。因工作时间过长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严重；骨盘的变形（一半是骨盘骨本身位置不正常和发育不正常的结果，一半是脊柱下部弯曲的结果）就常常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劳顿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说：“我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骨盘畸形和其他几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毕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现象看做很长的工作日在儿童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极高声望的人物证实了。”

许多产婆和产科医生都证实了工厂女工分娩比别的妇女困难，同样还证实了她常常流产（例如见霍金斯博士文件第 11 页和第 13 页）。此外，女工们还患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们就得担忧她们的位置会被别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们在这一段时间内也拿不到工资了。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如果资产者老爷们还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末他们的太太大概也会同意我的意见：间接强迫一个怀孕的女人直到她分娩的那一天还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以前还要长），老是站着并且还要常常弯腰，这是残酷的事情，是卑鄙的野蛮行为。但是还不止此。如果女工们被允许在分娩后两星期可以不工作，那她们就会感到高兴，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很长的期限。许多人在产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到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厂主问监工：“某某人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她生了

多久了？”——“一星期。”——“那她早就該回来了。別人在家里只住了三天。”自然，不管女工們怎样衰弱，怎样痛苦，解雇的恐惧，失業的恐惧还是把她們赶回工厂来了；厂主的利益不允許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則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来，或者就要为了考虑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大伤其高貴的脑筋；为了避免發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

請听听下面的話(考威尔文件第 77 頁)吧：

“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簡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能請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們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險。’”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証明(戴·巴萊爵士文件第 44 頁)：工人托馬斯·麦克杜特有点發燒，

“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無論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輕的女孩子們在發育期間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現象。有些年輕的女工，特別是那些吃得比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發育得比平常快，因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經發育完全了。上面已經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徹斯特产科医生的罗伯頓在“北英格兰內外科医学杂志”中說，他遇到过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她不仅是一个發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徹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的高温和热带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和这种气候下的情形一样，發育得太早，結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們性

的發育受到阻碍的事也是常見的：乳房很晚才發育或者根本就不發育，考威尔文件第 35 頁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經常常到十七八岁、有时要到二十岁才开始来，甚至常常根本就不来。（霍金斯博士文件第 11 頁；劳頓博士文件第 14 頁等；戴·巴萊爵士文件第 5 頁等）月經不調而且在月經来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适的事很平常，妇女貧血症很常見，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証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徹斯特的报告，她們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萊一个人認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說，在他所視察的苏格兰，結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們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徹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臉色紅潤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臉色蒼白的、腺病質的。但是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紅潤的臉色，因为他們被送进了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此外，在工厂劳动中还有几个对健康特別有害的部門。例如在紡紗工厂和紡麻工厂里，屋子里都飞舞着濃密的纖維屑，这使得工人，特别是梳棉間和刮麻間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这种纖維屑有些人的身体受得了，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工人是沒有选择的余地的，他在哪一部分找到工作，他就得到哪里去，不管这对他的肺部有什么样的影响。把这种纖維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發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話，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結核。（参看斯圖亚特文件第 13、70、101 頁；馬根多士文件第 24 頁等；鮑尔关于諾定昂和里子的报告；考威尔文件第 33 頁等；巴萊文件第

12 頁〔一个工厂中發生五起〕、第 17、44、52、60 頁等，以及他的报告；劳頓文件第 13 頁等等）但是特別有害的是亚麻的湿紡工作，做这种工作的都是年輕的姑娘和小孩子。水从錠子上濺到他們身上来，所以他們的衣服的前襟总是透湿的，地上經常有积水。紡紗工厂的并紗間的情形也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稍微好一些，而后果也是經常的感冒和肺部疾病。說話时声音嘶哑、刺耳，这是一切工厂工人的特点，而湿紡工和并紗工尤其厉害。斯圖亚特、馬根多士和戴·巴萊爵士都極其尖銳地抨击过这种工作的害处，也同样抨击过大多数厂主对做这种工作的女孩子們的健康漠不关心。紡麻的另一个后果是肩部的特殊畸形，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質本身所引起的右肩胛骨向前突出。紡麻也像在水力紡紗机上紡棉一样，常常引起膝盖骨的疾病，因为在接断头的时候要用膝盖来抵住錠子，使它停止轉动。做这两种工作，工人必須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長發育不足的毛病。我曾經在曼徹斯特一家棉紡織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紡紗機車間里，就我的記憶所及，沒有一个长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們都矮小，發育不良，胸部狹窄，体形很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殘廢。机器上的工作常常釀成許多相当严重的不幸事件，結果还使得工人暫時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見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节，比較少見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等等被輪子卡住并且給軋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無关紧要的伤——以后，往往染上破伤風，因而死亡。在曼徹斯特，除了許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殘廢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簡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殘廢者里面一样。但是机器上最危險



的地方是从大轴上给各种机器传送动力的传动皮带，特别是在这种皮带装有扣子的时候，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谁要是被这种传动皮带带住，转眼间就会被卷起来摔到天花板或地板上去，摔得一根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立刻就死去。从1843年6月12日到8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下面这些严重的不幸事件(比较不严重的它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6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个男孩子因一只手被机器轧碎而得破伤风死去。6月16日，萨德尔渥斯城一个青年被轮子卷住，轧得粉碎。6月29日，在曼彻斯特附近绿野猎场机器制造厂做工的一个青年跌在一块磨石下面，被磨石弄断了两根肋骨，严重地伤残了身体。7月24日，奥尔丹一个女孩子被传动皮带卷住转了五十转，死后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7月27日，曼彻斯特一个女孩子掉到清棉机(最初在子棉上加工的机器)里，结果因伤死去。8月3日，达金菲尔德一个筒管旋工因被传动皮带卷住而死去，所有的肋骨都断了。在1843年一年中因在机器上受伤并弄成残废而到曼彻斯特医院来医治的人就有962个，而这个医院登记下来的其他不幸事件是2426件，这样，由于别的原因引起的不幸事件和机器引起的不幸事件的比例是五比二。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索尔福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私人医生所治疗的人。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时，即使受伤者因此失去劳动能力，厂主们最多也只付医药费，在治疗期间照付工资的就极其少见。至于不能再工作的工人以后如何生活，那是和他们不相干的。

关于这种事情，工厂报告写道：在任何情况下责任都应当由厂主来负，因为孩子们还不会遵守预防办法，而成年人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遵守这些办法的。但是写这个报告的是资产者，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并且胡诌一大堆关于工人的“犯罪性

的疏忽”(culpable temerity)的廢話。这当然改变不了事实。事情的實質是这样：既然孩子們不会謹慎小心，那就必須禁止使用童工；既然成年人常常不够謹慎，那末他們或者同样是小孩子，就是說，他們还处在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險的發展阶段上，而应当在这上面負咎的，不是使他們不能受教育的資產階級，还能是誰呢？——或者是机器裝置得不好，必須在周圍加上隔板或柵栏，这当然也是資產階級应当关心的；再不然就是有一种比对于危險的恐惧更强烈的动机支配着工人，——他們为了要多掙一些錢，必須赶快工作，沒有謹慎从事的时间，如此等等，——在这种場合下应当負咎的也还是資產階級。譬如說，許多不幸事件是由于工人在机器还在運轉时就开始擦洗机器而發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資產者强迫工人在机器停下来的休息時間內擦洗机器，而工人自然是不願意随便牺牲他的休息時間的。每一小时的休息時間对他來說都是这样地寶貴，使他宁愿一星期冒两次生命的危險，也不願把这一小时奉送給資產者。如果叫厂主把擦洗机器所必需的时间包括在工作時間內，那就沒有一个工人会想到要去擦洗轉动着的机器了。总之，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終生贍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贍养他的家庭。在工業發展的初期，不幸事件比現在还要多得多，因为那时的机器比較坏，比較小，裝置得比較挤，而且几乎完全沒有安全設備。但是像前面引証的材料所表明的，不幸事件的数字現在还很大，使人們不得不严肃地考虑下面这件事实，这就是，仅仅为了一个階級的利益，竟有这么多人成为畸形者和殘廢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資產階級服务的时候因資產階級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飢餓的厄运。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如果读到一件件的残酷得野蛮的事情，读到孩子们怎样光着身体被监工从床上拖起来，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拳打脚踢下被赶进工厂（例如斯图亚特文件第 39 页及其他各页），他们的梦魇怎样被拳头所驱散，他们又怎样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刚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怜的孩子怎样在监工的吆喝下惊跳起来，闭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读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样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们赶出工厂；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时怎样疲倦到由于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饭，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们跪在床前，原来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如果读到这一切和几百件其他肮脏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证据都有委员会本身认为可靠的许多证人起誓证实的报告中读到的；如果想一想，这是一个“自由党的”报告，是资产阶级的报告，是做起来反驳托利党以前的报告并证明厂主们的心地纯洁的；如果想一想，委员们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记载所有这些证据是违背他们的本意的，那末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怒，能不感到憎恨吗？但是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挑选出来的奴才尤尔博士的嘴说出来的话吧。

这位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 277 页及以下各页中写道，有人告诉工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和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们

应当努力表現自己的勤勞和忠誠，並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歡欣鼓舞，這樣他們就可以成為監工、經理，最後甚至可以成為股東，從而（多聰明呵，你說得真像鴿子咕咕叫一樣！）“市場上對工人的需求立刻就會增加”！！——“要不是工人這樣不安靜的話，工廠制度的發展會得到更加有益的結果。”接着就是一段抱怨工人倔強的冗長的耶利米哀歌，而在講到工資最高的工人（精紡工）的罷工時，竟說出了下面這些天真的話：

“是的，正是他們的高額工資使他們能夠維持一個有薪俸的委員會，並且給他們吃着就這種工作說來是營養過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經營養過度的毛病！”（第 298 頁）

讓我們聽一聽，這位資產者是怎樣描寫童工的勞動的：

“我參觀過曼徹斯特及其附近的許多工廠，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孩子受虐待或者受體罰；也沒有看到過孩子們情緒不好。他們看上去都很快活（cheerful），很機靈，對他們的肌肉的輕微活動感到愉快（taking pleasure），充分地享受着適合他們的年齡的活動。生產的景象決沒有在我的心裡引起一點傷感的情緒，相反地，它永遠使我感到興奮。看一看走車退回的時候他們怎樣靈巧地接上斷頭，看一看他們用自己的纖巧的手指活動了幾秒鐘之後，怎樣在空閒的幾分鐘內採取各種姿勢玩耍着，直到把綫抽出來又繞上為止，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delightful）。這些活潑的（lively）小鬼的工作就像是一種遊戲，因為已經習慣了，做起來非常輕快。他們自己也意識到自己的技巧，很願意把它顯示給每一個參觀者看。疲勞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的，因為他們一走出工廠，就在最近的一個遊戲場上跳跳蹦蹦地玩起來，和剛從學校里出來的孩子們一樣。”（第 310 頁）

（當然羅，好像活動一下肌肉並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勞僵硬的身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爾應當再看看這一瞬間的興奮是不是在幾分鐘以後就消逝了。而且這種情形尤爾也只能在中午，即在孩子們工作五六小時以後看到，而不能在晚上看到！）至於工人的

健康，这个资产者为了证明情况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们多次引证并摘录过的 1833 年的报告。他企图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句话来证明工人当中连一点腺病质的迹象都没有，证明工厂制度使工人摆脱了各种急性病的痛苦（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工厂制度同时却给工人们带来了各种慢性病，这一点尤尔当然绝口不谈了）。要了解我们这位可敬的尤尔怎样厚颜无耻地对英国公众撒下弥天大谎，就应当知道，这个报告共有厚厚的对开本三册，一个脑满肠肥的英国资产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让我们再听听他对 1833 年自由资产阶级所颁布的工厂法的意见吧。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给了厂主们一些最起码的限制。而在尤尔看来，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教育，是一种用来对付厂主的荒谬而专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抛到了街头，而结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轻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们现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们被人从温暖的纺绩间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们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有良心的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顿，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妨碍。（第 405、406 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1802 年的学徒法我们已经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约在 1817 年，新拉纳克（苏格兰）的厂主罗伯特·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赞成他的，有已经去世的罗·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 1819 年、1825 年和 1831 年的

工厂法，前两个法律根本沒有人遵守<sup>107</sup>，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約·凱·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議而通过的 1831 年的法律，禁止棉紡織工厂使用二十一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間（晚上七时半到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規定，在任何工厂里，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時間每天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險，就不能出面做証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项法律并没有給工人带来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项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乡下的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们已广泛地要求十小时法案，即規定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時間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傳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当时以迈克尔·薩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爱派抓住了这个計劃并把它提到議會里去討論。薩德勒达到了組織議會委员会去調查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委员会在 1832 年的議會常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工厂制度公开的敌人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公正的报告。高貴的热情使薩德勒做了許多毫無根据的不确实的論断，他提問題的方式使得他从証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虛假的，至少真理也是被歪曲和顛倒了。厂主們懾于这个把他們描写成惡魔的报告，就自动請求官方进行調查。他們懂得，一个真实的报告現在對他們只会有利；他們知道，当权的是和他們交情很好的輝格党人，真正的資產者，反对限制工業是这些人的原則。他們果然达到了成立一个完全由自由資產者組成的委员会的目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就是我在这里常常引用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比薩德勒委员会的报告稍微接近真实情况一些，但是它却向相反的方向背离了真

实情况。报告的每一頁上都流露出对厂主的同情、对薩德勒报告的不信任、对独立行动的工人和十小时法案拥护者的敌视；报告中没有一个地方承認工人有权过人的生活，有权独立活动和自己下判断。报告責备工人，說他們鼓吹十小时法案不只是替孩子們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傳家称为蠱惑者，称为存心不良的陰險的人等等，一句話，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資產阶级一面。但是报告仍然不能替厂主洗刷干淨，根据它的自供，应当由厂主負責的丑事还是很多，甚至就从这个报告来看，鼓吹十小时法案、工人对厂主的憤恨、薩德勒委员会用来罵厂主的最尖刻的詞句，也都应当認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区别只在于，薩德勒的报告責备厂主們那种公开而毫無掩飾的殘酷行为，而这个报告却表明这种殘酷行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进行的。譬如受委员会之托去郎卡郡进行过調查的医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坚决拥护十小时法案！馬根多士委員也声明，他的报告并没有包括全部真实情况，因为很难說服工人提出不利于他們的老板的証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来就被迫做了較大讓步的厂主們，往往又对委员会的訪問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減低了机器的轉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們就使用了这样的詭計：把监工当做“工人”介紹給委员会，这些监工滔滔不絕地述說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討厭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监工已經不是真正的工人，他們是本阶级的叛徒，他們为了較高的工資而替資產阶级效劳，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們的利益是和資產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們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業資產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憤

怒和冷酷無情，表明了整個卑鄙的工業剝削制度是怎樣毫無人性。在這個報告里可以看到兩種情況的對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過度而產生的許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廠主們冷酷的錙銖必較的政治經濟學，他們竟企圖用手中的數目字來證明，如果不再允許他們每年使這麼多的小孩子變成畸形者，全英國就必然會和他們一起毀滅。還有什麼比這種對比更令人憤怒呢？恐怕只有我剛才引用過的尤爾先生那些無恥的胡說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憤怒，假使這些胡說八道不是那樣可笑的話。

這個報告的結果就是 1833 年的工廠法。這個法律禁止雇用九歲以下的兒童做工（絲織工廠除外）；規定九歲到十三歲的兒童每周的工作時間是四十八小時，或每天不超過九小時，十四歲到十八歲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時間是六十九小時，或每天不超過十二小時；規定每天至少要有一個半小時的吃飯時間，並再一次禁止所有十八歲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時又規定所有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每天要受兩小時的義務教育，廠主如雇用沒有廠醫的年齡證明書和教師的入學證明書的兒童，就得受罰。為此，廠主有權從孩子們的工資中每周扣下 1 辨士作為教師的薪金。此外，還任命了廠醫和視察員，他們隨時可以到工廠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証，在廠主違法時，負責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訴。這就是尤爾博士那樣不可抑制地破口大罵的法律！

由于實施了這個法律，特別是由于任命了視察員，工作日平均縮短到十二個小時，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來代替了。因此，幾種最驚人的禍害幾乎完全絕迹了；只有身體極衰弱的人才會弄成畸形，工廠勞動的惡果一般說來表現得不太明顯了。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在工廠報告中找到足夠的証據，證明就是在那些按



照約·凱·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多不超过十三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經常出現各种不十分严重的疾病，如脚肿，腿、腰和脊柱軟弱而且疼痛，靜脉扩张，下肢瘡瘍，全身衰弱，特别是腸胃衰弱，作嘔，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飢餓感，消化不良，憂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塵和恶劣空气所引起的各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拉斯哥和曼徹斯特的工厂的报告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 1834 年的法律后也还没有絕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繼續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健康。人們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們有更多的騙人理由来吹嘘他們的虛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調查委员会出去，它就会發現情况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無准备就頒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因为政府并没有同时設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厂主們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們送到他們那里去待上两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孩子們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甚至工厂視察員（他們只限于直接履行自己的职责，即檢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許多材料，証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禍害不可避免地要繼續存在。視察員霍納和桑德斯在他們的 1843 年 10 月和 12 月的报告里說，在那些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業的成年工人来代替他們的部門里，許多厂主仍然要他們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甚至还要多些。在这些地方，剛超过受法律保护年龄的年輕人特別多。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們縮短休息時間，使孩子們工作的時間超过法律所許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險并不能制止他

們，因為他們可能受到的處罰和他們因破壞法律而獲得的利益比起來實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現在生意這樣好的時候，廠主們所受的誘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間十小時法案的宣傳並沒有停止。1839年這種宣傳又熱烈起來了，已故的薩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內由艾釋黎勳爵所代替，在院外則由理查·奧斯特勒所代替，——這兩個人都是托利黨人。奧斯特勒經常在工廠區進行宣傳工作，早在薩德勒在世時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現在特別為工人愛戴。他們簡直就稱他為“善良的老王”，“工廠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廠區里，沒有一個孩子不認識他，不尊敬他，當他到城里來的時候，沒有一個孩子不參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迎接他。奧斯特勒也竭力反對新濟貧法，因而被一個叫做桑希爾的輝格黨人送進了債務監獄，因為他在这位先生的莊園里當過管事，欠了這位先生一筆債。輝格黨人曾經屢次向奧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擊濟貧法，就替他償還債務，並且保護他。但是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監牢里，並且從那里散發他每周的“弗利特寄語”<sup>108</sup>反對工廠制度和濟貧法。

1841年上台執政的托利黨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廠法。內務大臣詹姆士·格萊安爵士在1843年向議會提出了一個把童工的工作時間限制為六小時半並加強義務教育的法案；這個法案的要点是要求創辦比較好的學校。然而這個法案由於非國教徒的宗教狂熱而未獲通過，因為義務教育雖然並不要求非國教徒的子女學習宗教課程，但學校要受國教的監督，而聖經又是大家必讀的書，宗教也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礎，所以非國教徒認為這對自己是一種危險。廠主們和自由黨人都支持非國教徒；工人們由於宗教的爭執而分裂了，所以沒有什麼活動；這個法案的反對派，雖然沒有在索

尔福和斯托克波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进行攻击，但是，他们仍然为自己的请愿书征集了将近 200 万人的签名，这就把格莱安吓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莱安删除了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没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议把八岁到十三岁的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使得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把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十二小时；此外，还实行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规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能。他刚提出这个法案，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传就重新高涨起来。奥斯特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和工人们的捐款，他还清了债，并全力投身于这个运动。下院中拥护十小时法案的人数增加了，从各方面来的大批请愿书又给这法案带来了新的拥护者。1844年3月19日，艾释黎勋爵以 179 票对 170 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工厂法案中“夜间”一词应理解为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六时这一段时间；因此，由于禁止做夜工，连休息时间在内，工作日也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如果不算休息时间，实际上已限制为十小时了。但是内阁不同意这样做。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而在第二次表决这个法案中的某一条的时候，下院以微弱的多数把十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一起否决掉了！在这以后，格莱安和皮尔宣布他们将提出一个新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过，他们就要辞职。这个新法案就是原来那个旧的十二小时法案，只不过变更了一下形式而已，3 月间否决了这个法案的主要点的下院，现在在 5 月间却把它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原因是拥护十小时法案的多半是托利党人，他们宁愿法案

垮台也不願內閣垮台；但是不管這兩次前後矛盾、互相排斥的表決的原因如何，下院只是使自己在全體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掃地，使憲章派認為必須改組下院的意見獲得了一個明証。以前投票反對內閣的三個議員，現在投票擁護內閣，從而拯救了這個內閣。每次表決時，反對派總是大批地投票擁護內閣，而執政黨却大批地投票反對內閣<sup>⊖</sup>。這樣，格萊安提出的兩類工人各工作六小時半和十二小時的提案便獲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於這一點，同時也由於對補足停工（如因機器損壞或因冰凍、旱災以致水力不足而產生的）時間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過十二小時幾乎是不可能了。毫無疑義，在很短的時期內，十小時法案也會通過的。不用說，廠主們幾乎全都反對十小時法案；他們中間未必能找出十個贊成這個法案的人來；他們用盡一切正當的和不正當的手段來反對這個為他們所痛恨的法案，但是這對他們沒有一點好處，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對他們的憎恨。不管怎麼樣，這個法案是會通過的。工人想要什麼，他們就能爭得什麼，而在去年春天他們就證明他們的确是要求十小時法案的。廠主們的政治經濟學的論據是：十小時法案會增加生產費用，從而使英國工業無力對抗外國的競爭，而因此工資也必然會降低，如此等等。當然，這論據有一半是對的，但這只是證明，英國工業的威力僅僅是靠野蠻地對待工人、靠破壞工人的健康、靠忽視整代整代的人在社會關係、肉體和精神方面的發展的办法來維持的。自然，如果問題是以十小時法案為極限，那英國就會毀滅；但是這個法案必然還會帶來其他的措施，這些措施一定會使英國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

⊖ 大家知道，在同一次會議中，在討論糖的問題時，下院又出了一次丑，起先反對內閣，以後由於使用了“政府之鞭”，就變為擁護內閣。——恩格斯原注

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来消灭的。我们已经一般地谈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质，并且谈得很详细，足以从已经举出的事实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轟隆轟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在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受和唯一的思想。如果某一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谓堕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员会委员霍金斯的意见，仅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堕落。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每一个工人堕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堕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纵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写的那种

程度，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其次，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無論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畢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見了。工人必須在清晨五点半鐘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鐘，那就得受罰；如果他迟到十分鐘，在吃完早飯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資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小时内只有两小时半沒有工作）。無論吃飯、喝水、睡覺，他都得听命令。連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里到工厂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专制的鐘声經常把他从睡梦中喚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喚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絕對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頒布工厂規則；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規；即使他在这个法規中加上最荒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說：

“你們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們不高兴，就不必訂这样的契約；但是

---

⊖ 我們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話：“如果我們把爱尔兰人的恶劣影响和全体棉紡織工人群众的無休止的劳动联系起来观察一下，对于他們的可怕的墮落就不会感到怎么惊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沒有間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有所發展的。在这种永無止境的苦役(drudgery)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單調得令人喪气，就像息息法斯<sup>①</sup>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憊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塊肌肉的無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識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鈍，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發展起来。判決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兽性。他逐漸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輕視人生中的舒適和高尚的娱乐，生活在肮脏、穷困和缺乏营养的状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錢花在各种放蕩生活上。”（詹·菲·凱博士，同前書）——恩格斯原注

① 息息法斯(Sisyphus)为希腊神話中哥林多之王，被謫在冥府中推运巨石至山頂，而这巨石每次推上都一定又滾下去。——譯者注

現在你們既然自願地訂了这个契約，那你們就得履行它。”

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是很常见的。1844年10月，曼彻斯特肯尼第工厂的工人罢工了。厂主就根据贴在厂里的一条规则——在一个车间里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工人同时丢开工作——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承认厂主有理，并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回答工人（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工厂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请看吧：（1）工厂的大门在上工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3辨士；（2）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动力织机上的织工）如在机器转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罚3辨士；在工作时间内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3辨士；（3）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1辨士；（4）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5）织工不在一周前预先通知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失当不经事先通知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辨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辨士<sup>⊖</sup>。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鐘的扣一刻鐘的工資，迟到二十分鐘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資；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罰1先令，其余的日子罰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

⊖ “無可否認的事實”第9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严格的紀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沒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統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証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軍事紀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無論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們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們处在更严格的監視之下。尽管这样，人們还要求他們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們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們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們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們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許多厂主用最殘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們头上的罰款，从一無所有的無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錢来增加自己的利潤。李奇也說，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發現工厂的鐘快了一刻鐘，因而大門已經关了，而拿着罰款簿的办事員却在車間里乱轉，把大批沒有到的工人記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 95 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門外面；这个工厂的鐘比城市里一般的鐘晚上慢一刻鐘，早上快一刻鐘。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鐘的針撥回去，因而工作時間就比規定的時間长，但工人並沒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資。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鐘。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鐘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軸轉动次数的机器鐘；如果机器轉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鐘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應該轉动的次数轉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規定的轉数不到時間就轉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滿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証人补充說，他認識几个女孩子，她們都掙錢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但她們还是宁願去做娼妓也不



願忍受这种暴虐的統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 80 頁）。現在我們再回过头来看看罰款的情形。李奇說，他曾經不止一次地看到，懷孕后期的女工們在工作時間坐下来休息一会，就被罰款 6 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罰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来的。商品到了倉庫才进行檢查，而倉庫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叫去就开了罰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給他工資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經受罰，而那时商品可能已經卖掉，至少已經拿走了。李奇有一張长达 10 英尺的罰款单，罰款总数达 35 英鎊 17 先令 10 辨士。他說，在开这張罰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倉庫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罰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 5 英鎊（34 塔勒）。（“無可否認的事实”第 13—17 頁）我再重复一遍，我認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說謊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錢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兒，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無法抗拒。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資產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請願書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請願書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議會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願意或不願意，他們都必須投資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講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監視。

还有两种办法特別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 *truck-system*（实物工資制）和 *cottage-system*（小宅子制）。工人們把用商品支付工資叫做 *truck*，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英国。“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見，使他們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剝削”，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价錢比

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 tommy-shop[工厂商店]中的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贵 25—30%), 支付工资时不用现款, 而用工厂商店的购买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愤, 因此 1831 年公布了 Truck Act [实物工资法], 根据这个法律, 对大多数工人采用的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被宣布为无效的、非法的, 谁要这样做就处以罚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国法律一样, 只是在个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 在城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认真的, 但是在乡间, 旧制度仍被直接间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里, 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违反这个法律的案件的判决书, 这些判决书都是 1843 年 11 月到 1844 年 6 月间做出的, 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 一部分发表在“北極星报”<sup>109</sup>上。自然, 这种制度现在是不那样明目张胆地实行了; 工人们多半都能领到现钱, 但是, 厂主们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买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主; 现在, 只要他们确把钱交到工人手里, 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干自己的罪恶勾当了。1844 年 4 月 27 日的“北極星报”刊登了约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谈到一个叫鮑威斯的厂主:

“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存在, 而且谁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 真是叫人奇怪。这里, 有许许多多老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派<sup>⊖</sup>分子的例子, 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 因为他对待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 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 34—36 先令的料子, 他只给 20 先令的现钱, 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 定价要

⊖ 自由贸易派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恩格斯原注

比其他商人貴 40—50%，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經霉烂的。但是自由貿易派的‘信使报’<sup>⊖</sup>却說：他們并不是非要貨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們便的。呵，不錯，可是他們要是不想餓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們要的現錢超过 20 先令，在領經紗时他們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們拿 20 先令再加貨物，那經紗总是够他們用的。这就是他們的自由貿易。布魯姆助爵說，我們在年輕的时候應該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請求救济。好呵，我們是不是就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話要不是一位助爵說的，那就只能認为这个人的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們的劳动的那些貨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沒有繳納登記費的報紙非法出現的时候，还有許多人向霍姆非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萊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現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現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們的厂主已經成了虔誠的自由貿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还誠心誠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們應該做的，我們都沒有做，我們不應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我們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饒恕我們吧。’（英国国教的禱詞）<sup>①</sup>是的，饒恕我們到明天吧，好讓我們再把霉烂的貨物付給我們的織工。”

小宅子制初看起来害处要小得多，它的产生更是無可非难的，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資制。在乡間，工厂附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給他投下的資本带来極大的利潤。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資本中获得年利 6% 的話，那就可以認为这种小宅子会給厂主带来双倍的利潤；因为只要他的工厂不关門，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他保險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两种主要的損失：他的小宅子永远不会空閑着，他也沒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險。但是房租通常是把这两种可能的損失都算进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

⊖ “里子信使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恩格斯原注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的房租和其他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笔获利12—14%的好买卖。厂主把房子租给工人，从而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們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对厂主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全部财富本来就都是靠牺牲工人而获得的。既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胁来强迫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们缴纳比平常高的房租，甚至缴纳他们根本不住的地方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这已经不是不公平，而是无耻了。自由党的“太阳报”<sup>①</sup>引了“哈里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留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经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让我们再把

<sup>①</sup> 1844年11月底的“太阳报”（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恩格斯原注

1845 年自由的英国人的状况和 1145 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农奴是 *glebae adscriptus* (束缚在土地上的), 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把 *jus primae noctis* (初夜权) 献给主人; 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 不但是初夜权, 而且是每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 他所有的一切, 地主都可以拿走; 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 而且由于竞争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甚至连诺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 厂主都做了: 厂主通过实物工资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 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 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整, 但是这种法律没有被遵守, 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 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 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 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 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 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 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 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他们都是物件的奴隶。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 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 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 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 否则就没有人理会; 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 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 他把农奴看做牲口; 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 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 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 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 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 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 是明显的, 公开的, 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

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sup>①</sup> 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 white slaves (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波·米德写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sup>110</sup>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  
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  
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  
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  
但他气力大，谁都比不上，  
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  
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  
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  
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  
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  
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  
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  
用人们的鲜血铸造金银。

<sup>①</sup>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译者注

Ein König lebt, ein vorziger König,  
Nicht des Dichters gewähltes Königsbild,  
Ein Tyrann, den der weiße Sklave kennt,  
Und der Dampf ist der König wild.

Er hat einen Arm, einen eisernen Arm,  
Und obgleich er nur Wägen trägt;  
In dem Reine schafft eine Zauberkraft,  
Die Millionen schlägt.

Wie der Meloch grimm, sein Ahn, der einst  
Im Thale Himmeln saß,  
In Feuerzahn sein Singewort,  
Und Kinder sind sein Fraß.

Seine Priesterhaare, der Menschheit haar,  
Voll Blutdurst, Stolz und Muth,  
Sie lenken — o Schand! — seine Miesenhaut  
Und zaubern Gold aus Blut.

Sie treiben in Staub das Menschenrecht  
Für das schneide Gold, ihren Gott,  
Des Weibes Schmerz ist ihnen Schertz,  
Des Mannes Tödt'n ihr Speck.

Mußt ist ihrem Ohr das Schrei'n  
Des Armen im Todeskampf;  
Skelette von Jungfrau'n und Knaben fällt'n  
Die Hellen des König Dampf.

Die Hüll'n auf Erd! Sie verbreiten Tod,  
Zeit der Dampf herrscht, rings im Reich,  
Denn des Menschen Leib und Seele wird  
Gemertel t'rin zugleich.

Drum nieder den Dampf, den Meloch wilt,  
Arbeitsende Tausende, all',  
Wind' ihm die Hand, oder unser Land  
Bringt er über Nacht zu Fall!

Und seine Vögte grimm, die Mill-Lords stolz  
Weltstregend und Nutzgreif,  
Stürzen muß sie des Volkes Zorn,  
Wie das Scheusal, ihren Gott\*!)

\*) Ich habe weiter Zeit noch Raum, mich weilkäufig auf die Entgegnungen der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書載有弗·恩格斯翻譯的  
爱·米德“蒸气王”一詩的一頁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鬼，  
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  
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  
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飢啼寒号欣慰他们心窍，  
悲嘆哭泣是悦耳的音乐，  
老人儿童的尸骨堆成山，  
堆满了他们宫殿的地窖。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  
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  
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  
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怒就快要觉醒，  
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sup>⊖</sup>

⊖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谈论厂主们对最近十二年来所受到的控诉的答辯。这些人是无可理喻的，因为他们已被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弄瞎了眼睛。他们的某些答辯我已经在前面顺便答复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消再说几句就够了。

你们来到了曼彻斯特，并且想考察一下英国的生活条件。自然，你们会很好地被介绍给一些“可敬的”人物。你们会提出一些有关工人状况的意见。你们会认识几个最大的自由党厂主，例如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艾德蒙·艾释华特、托马斯·埃士顿等等。你们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厂主是了解你们的，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领你们到他的乡下的工厂去；格莱格先生领你们到柴郡的石矿坡去，艾释华特先生领你们到波尔顿附近的塔尔顿去，埃士

頓先生領你們到海德去。他領你們到設備很好甚至還可能有通風設備的建築物中去，他使你們注意那高大的空氣流通的厂房，漂亮的機器和幾個看起來很健康的工人。他招待你們一頓豐富的早餐，然後向你們提議去參觀工人住宅。他領你們到一些看起來是新的、干淨而且舒適的小宅子裏面去，他自己也和你們一起走進這一家或那一家。他當然只領你們到監工、机匠等人那裏去，好讓你們“看看專靠工厂過活的家庭”。在別的小宅子裏，你們就會發現只有妻子和小孩在工厂裏工作，而丈夫却在補襪子。因為厂主在場，你們不便提出太輕率的問題；於是你們以為工人的工資都很高，生活都很舒適，而由於鄉間空氣新鮮，臉色也比較健康。於是你們就開始放棄英國到處都是貧窮和飢餓的想法，發現這是過分的誇張。但是小宅子制如何使工人變成奴隸，也許附近就有一個工厂商店，這你們卻一點也不會知道；工人不會向你們表示他們如何憎恨厂主，因為厂主就在你們身邊。厂主甚至還建立了學校、教堂和閱覽室等等。他利用學校來養成孩子們的服從的習慣，他放在閱覽室中的書籍都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他把那些閱讀憲章派或社會主義書報的工人解雇，這一切都是瞞着你們的。你們看到愉快的宗法關係，你們看到監工們的生活，你們看到工人同意在精神上也成為資產階級的奴隸時資產階級許給他們的東西。很久以來厂主們就特別喜歡“鄉村製造業”，因為在這裡，工厂制度的害處，特別是在衛生方面的害處，部分地由於空氣新鮮和四周的環境比較好而抵銷了，同時也因為在這裡對工人的宗法制的奴役保持得最長久。尤爾博士對此歌頌備至。但是倒黴的是那些想獨立思考並成為憲章主義者的工人：對於他們，厂主們的慈父般的愛護和關懷一下子就消失了。你們如果想到曼徹斯特的工人區去看看工厂制度在工厂城市中的影響，那末在有錢的資產者給你們協助以前，你們是得好好地等一個時候的！這些老爺們不知道工人想要什麼，他們所處的情況怎樣。他們不願意也不可能知道這些，因為他們害怕那些會使他們不安甚至會迫使他們違背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但是這絲毫沒有關係，工人要做的事情，他們是能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恩格斯原注

## 其他劳动部門

我們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談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業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产物。而其余工業部門的工人状况我們談的就少多了，因为一般的工業無产阶级的情况或特别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部分是和这些部門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問題就只是考察工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門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門中每一个部門有什么特点。

适用工厂法的四个劳动部門都是生产衣料的。我們現在最好是从那些向这类工厂領取原料的工人談起；先談諾定昂、得比、萊斯特的針織工人。“童工調查委員會报告”中談到这些工人时說，工作時間长（由于工資低，不得不这样），再加上整天坐着，眼睛因工作本身的性質經常保持緊張状态，这就使他們的整个身体都衰弱下去，特别是影响了視力。晚上沒有很强的灯光就不能工作，因此，工人通常都利用玻璃球来聚光，这对眼睛的害处很大。几乎所有的工人到了四十岁就得戴上眼鏡。在这种生产中从事纏綫和縫紉（縫合）的兒童，通常都不健康而且發育得不好。他們从六七岁或七八岁起就在狹小得令人窒息的屋子里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許多兒童被工作弄得疲憊不堪，逐漸虛弱下去，連最普通的家务事都干不了，眼睛很早就近視了，因此不得不在童年就戴上眼鏡。委員們發現許多兒童都患有瘰癧症；厂主們大都拒絕雇用做

过这种工作的女孩子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說她們的身体太弱了。童工調查委員會报告把这些童工的状况叫做“基督教国家的耻辱”，希望他們的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格棱吉。“报告”附录第1部分 F 15 頁第 132—142 节)。报告还說，萊斯特的針織工人的待遇在当地所有的工人中是最坏的；他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每星期掙 6 先令，要費很大力气才能掙 7 先令。过去他們掙过 20—21 先令，但是大型織机的使用降低了他們的工資；大多数工人还在旧的簡單的織机上工作，和改良了的机器进行着筋疲力尽的競争。可見技术的發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但是不管怎么样，鮑尔委員說，針織工人却以他們的自由、以他們吃飯、睡覺或工作都不受工厂鐘声的支配而感到驕傲。在工資方面，这些工人現在的情况并不比 1833 年工厂委員會写报告的时候好些；这是由于过着半飢半飽生活的薩克森針織工人的競争造成的。这种競争不仅在所有国外市場上击败了英国人，而且(在劣等貨物方面)在英国市場上也击败了他們。德国的爱国針織工人，由于自己的挨餓而剝夺了英国針織工人的面包，他們該多么心滿意足呵！如果德国的荣誉要求他們的肚子老是空着一半，难道他們就不再为德国工業的光荣而驕傲地愉快地繼續挨餓嗎？呵，競争和“国家競賽”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晨报”(也是自由党的报纸，par excellence [道地的] 资产階級报纸)在 1843 年 12 月發表了亨克莱的一个針織工人描写他的同伴的状况的几封信。他附带报道了 50 个家庭的情况，这些家庭共有 321 人，依靠 109 台織机为生；每台織机平均每星期收入  $5\frac{1}{6}$  先令，每个家庭平均每星期掙 11 先令 4 辨士。在这里面，房錢、針織机租費、煤炭、灯火、肥皂和織針总共要用掉 5 先令 10 辨士，每人每天只剩下  $1\frac{1}{2}$  辨士(15 个普魯士分

尼)做伙食費,至于做衣服就一个錢也沒有了。

这个針織工人写道:“从来沒有一个看到过,沒有一个听到过,也沒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們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

他們根本沒有床鋪,即使有,也只够一半人睡,孩子們穿得破破烂烂,赤着脚跑来跑去。男人們含着眼泪說:我們很久很久沒有吃肉了,我們几乎忘記了肉的味道。終于有些人星期日也工作,虽然社会輿論从来也不原諒他們这样做,而且織机的軋軋声四邻都可以听见。

其中有一个人說:“看看我的孩子你們就全明白了。貧穷逼着我这样干,我不能老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餓得直叫,却不去用最后的办法清清白白地賺些面包。上星期一我早上两点鐘就起来,差不多干到半夜,其余的几天从早上六点鐘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鐘;但是我吃不消,我不願意把自己送进棺材里去。現在我每天晚上干到十点鐘,損失的时间在星期天补上。”

無論在萊斯特,在得比,或在諾定昂,工資从 1833 年起就沒有增加过,而最坏的是萊斯特还普遍实行实物工資制,这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了。因此,这个地方的針織工人在每次工人騷动时都非常积极地参加,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針織工人多半是男人,所以他們参加运动,就显得更主动和更有力量。

針織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产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郡里面共有 2 760 台花边机,在英国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 786 台。由于严格的分工,生产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分成了許多部門。首先是把棉綫纏到筒管上,这工作由十四岁或更大一些的女孩子(winders〔絡綫工〕)来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装在机器上,把綫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約有 1 800 个),并把它引到規定的地方,这工作由八岁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thread-

ers〔穿綫工〕)来做;然后才是工人織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来时是寬寬的长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連接每塊花边的綫挑出来,把它們一塊一塊地分开;这个工序叫做 running〔挑〕或 drawing lace〔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 lace-runners〔挑花边工〕。在这以后,花边就完全制好,可以拿去出卖了。無論是絡綫工或穿綫工,都沒有一定的工作時間,机器筒管上的綫一用完,就需要他們;因为工作在夜間还繼續进行,所以任何時間都可能需要他們到工厂或花边工人的工作間去。工作沒有規律、常常做夜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許在許多方面損害了身体,敗坏了道德,特别是像大家一致指出的,引起了混乱而过早的性关系。工作本身对眼睛的害处是很大的;虽然沒有發現穿綫工有一般的慢性病,但在他們中間眼炎是很流行的,而穿綫的工作本身就会引起眼痛、流泪、視力一时模糊等等。至于絡綫工,那末已經查明,她們的工作严重地損害視力,除了引起經常性的角膜炎,还常常引起白內障和黑內障。花边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机器造得愈来愈寬,現在使用的几乎全是需要三个男工操縱的机器;这三个人依次每隔四小时換一次班,所以他們合起来每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每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就可以了解,絡綫工和穿綫工所以常常不得不在夜間工作,是为了不讓机器停得太久。为了把綫穿过1800个小孔,需要三个孩子工作两小时。有些机器已經用蒸气力来發动,因而男人的劳动就被挤掉了。在“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屡次提到有小孩子工作的“花边工厂”,由此显然可以推断;目前的情况不是花边工已移到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去工作,就是蒸气力已被普遍地用来制造花边。而两种情况都表示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广。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是挑花边的工作,做这

种工作的多半是七岁、甚至是五岁或四岁的孩子。格梭吉委员甚至碰到过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做这种工作。经常在复杂的花边纹路中注视着需要用针挑出来的那根线，是非常伤眼睛的，特别是这种工作通常都得继续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之久。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眼睛也会变得非常近视，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见的）就会因黑内障而永远失明。此外，孩子们因为经常弯着腰工作，所以长大后身体很弱，胸部狭窄，并因消化不良而患瘰疬；子宫机能破坏的现象在女孩子中几乎是很普遍的，脊柱弯曲也一样地普遍，所以“从这些孩子走路的姿势上就可以认出他们是挑花边工”。绣花边无论对眼睛，或对整个身体，也都有同样的后果。做证的医生一致说，所有从事花边生产的孩子的健康，都因他们的工作而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些孩子脸色苍白，虚弱无力，他们的身体与年龄比起来都显得太矮小；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比别的孩子差得多。他们通常的疾病是：全身虚弱、常常昏倒、头痛、两肋痛、背痛、腰痛、心跳、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脊柱弯曲、瘰疬和肺结核。这种工作时刻都在极其严重地破坏妇女的健康，患妇女贫血症、难产和流产的到处都是（格梭吉在“报告”中的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这个下级官员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孩子们经常穿得很坏，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吃也吃得很不好，多半只有面包和茶，常常好几个月看不到肉。至于他们的道德状况，他说：

“诺定昂的全体居民，警察、牧师、厂主、工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一致肯定，目前的劳动制度是产生道德堕落现象的最肥沃的土壤。穿线工（多半是男孩子）和络线工（多半是女孩子）常常在半夜里同时被叫到工厂里去，又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可能知道他们需要在那里待多久，所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在一块胡搞，工作完了就一块去游荡。这种情况大大助长了道德败坏现

象。大家都承認，在諾定昂道德敗坏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至于这种極端反常的情况对这些孩子和年輕人的家庭安宁和乐趣的严重破坏，那就不用說了。”

花边生产的另一部門即花边的編結，已扩展到农業地区——北安普頓郡、牛津郡、培德福德郡和巴金汉郡。从事这一工作的大都是兒童和少年，他們都抱怨吃得不好，很少吃到肉。他們的劳动对健康是極端有害的。孩子們在狹小的、不通風的和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工作，老是坐着，弯着腰撥动編針。为了使身体勉强保持这种吃力的姿勢，女孩子們都穿上带有木板条的紧身，由于这些女孩子大半都是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骨头还很軟，因此，这种紧身使胸腔和肋骨完全移动了位置，使胸部普遍狹窄。由于工作地点的空气不好，工作时又整天坐着不动，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患了消化不良症；她們在受到这种病的殘酷 (severest) 折磨之后，就得肺結核死去。她們几乎沒有受过任何教育，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得更少，又都喜欢打扮，因此她們的道德水平低得可怜，卖淫在她們当中几乎成了流行病。（“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白恩士的报告）

这就是社会为了使漂亮的資產階級太太們能享受戴花边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很便宜的代价嗎？总共只有几千个工人弄瞎了眼睛，只是一些無产階級的女兒得了肺結核，只是一代平民弄得孱弱不堪，而这种孱弱的体質还是遺傳給这些平民的同样是平民的子孙，——这算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們的英国資產階級若無其事地把政府調查委员会的报告放在一边，照旧用花边来裝飾自己的太太和女兒。英国資產者的泰然自若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郎卡郡、得比郡和苏格兰西部有大批的工人在印花工厂中工作。在英国工業中，沒有一个部門像这个部門一样在机械的發展



方面获得这样辉煌的成果，但是也没有一个部门的机械的发展使工人的状况恶劣到这种地步。应用蒸气力推动雕花滚筒，又发明了用这种滚筒同时印四种到六种颜色的方法，这就完全排挤掉了手工劳动，正像机器的使用把手工劳动从棉纺织业中排挤出去一样。但是这些新发明在印花工厂中挤掉的工人比在棉纺织工厂中还要多得多。在这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做助手的小孩用机器做的工作抵得上过去200个工人用手做的工作。一台机器每分钟出28碼（80普魯士尺）印花布。结果印花工的处境就很糟糕；在他们向下院提出的请愿书中说，郎卡郡、得比郡和柴郡在1842年共印出1100万匹印花布；其中有10万匹是完全用手工印的，90万匹是部分用机器、部分用手工印的，1000万匹是完全用机器印的，印上的颜色少则一种，多则六种。因为机器大部分是新近才使用的，而且不断地在改良，所以手工印花工的数目总是比生产所需要的多；其中有許多（请愿书中说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自然就完全没有工作了，而其余的平均每星期也只要一两天、最多是三天的工作，得到的是最低的工资。李奇在谈到一个印花工厂（郎卡郡柏立附近的第普里-戴尔）的时候说，那里的手工印花工平均最多只挣5个先令（“无可否认的事实”第47页），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机器印花工的报酬却相当高。这样，印花业完全实行了工厂制度，但不受法律对工厂制度的限制。这一行业所生产的是时髦的商品，所以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定货少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半时间工作；如果某一个图案受到欢迎，生意很好，工厂就工作到夜间十点、十二点，甚至通宵工作。在曼彻斯特，我的住宅附近就有一家印花工厂。我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回家时看到工厂中还是灯火通明，我常常听说，在那里，孩子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很长，他们总想

找个机会在石阶上或穿堂屋的牆角旁休息一会，打一会盹。至于这种情况是否真实，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否则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名字指出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只是大致地提了一下这一工业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报告只谈到，在英国，至少这些孩子大部分还穿得相当好，吃得相当好（这是相对的，当然要看他们的父母挣钱多少而定），他们没有受任何教育，在道德方面还有很多缺陷。由于上面已经谈过工厂制度的情形，这里我们只指出这些孩子是处在这个制度的统治之下就够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谈别的。

现在我们再稍微谈谈衣料生产部门中其余的工人。漂白工的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把氯气这种对肺部极有害的物质吸进去。染色工的工作害处比较少一些，在许多场合下甚至还对工人有益，因为这工作需要全身使劲。关于这两类工人所得的报酬很少有人谈到，这就证明它并不低于一般的水平，否则他们是会抱怨的。由于棉质天鹅绒的销路广，所以剪绒工的人数相当多，共达三四千人。他们间接地因工厂制度而大遭其殃。过去用手工织机生产的商品织得不十分均匀，所以需要一个个能手把线头一行一行地剪平。自从使用动力织机以来，每一行线都排得很均匀，每根线都和上一根平行，所以剪平绒毛的工作就不需要多大技巧。被机器剥夺了固定生计的工人迅速地投入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工作，由于他们的竞争，工资降低了。厂主发现这种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女人和小孩去做，于是工资就降低到女工和童工的水平，成百的男人就完全被挤掉。其次，厂主还发现，让工人在工厂中工作比在工人的作坊中工作要便宜得多，因为他们反正要间接地替工人付这个作坊的房租。从那时起，过去用做剪绒作坊

的許多小宅子的閣樓不是空起来，就是作为住房租出去，同时剪絨工失掉了自由支配時間的权利，要听从工厂里的鐘声的指揮了。一个看上去不到四十五岁的剪絨工告訴我，他还記得那样的时代，那时每剪一碼掙 8 辨士，現在每碼只掙 1 辨士；当然，現在因为織出来的东西比較均匀，他可以剪得快些，但是現在每小时所剪的远不能超过以前一倍；这样，他的工資就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李奇把 1827 年和 1843 年各种紡織品的工資列成了一个对照表（“無可否認的事实”第 35 頁）。从表中可以看到，1827 年剪絨工每碼所得工資是 4 辨士、 $2\frac{1}{4}$  辨士、 $2\frac{3}{4}$  辨士、1 辨士，而 1843 年每碼仅得  $1\frac{1}{2}$  辨士、 $\frac{3}{4}$  辨士、1 辨士和  $\frac{3}{8}$  辨士。据李奇說，每星期的平均工資，在 1827 年是 1 英鎊 6 先令 6 辨士、1 英鎊 2 先令 6 辨士、1 英鎊、1 英鎊 6 先令 6 辨士，而在 1843 年，同一种商品的工資是 10 先令 6 辨士、7 先令 6 辨士、6 先令 8 辨士、10 先令，同时还有成百的工人連这样的工資也得不到。关于棉紡織業中的手工織工，上面我們已經談过了。其余的紡織品几乎完全是手工織工生产的，这些工人也像剪絨工一样，由于从其他工業部門中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工人的竞争而遭了殃，此外，像工厂工人一样，工作不好就要無情地被处以罰款。拿絲織工來說吧。全英国最大的絲織工厂厂主之一布罗克赫斯特从自己的賬本中拿出一些統計表交給議會委员会，从这些統計表中可以看出，1821 年他对各种工作付出的工資是 30 先令、14 先令、 $3\frac{1}{2}$  先令、 $\frac{3}{4}$  先令、 $1\frac{1}{2}$  先令、10 先令，1831 年他只付出 9 先令、 $7\frac{1}{2}$  先令、 $2\frac{1}{4}$  先令、 $\frac{1}{3}$  先令、 $\frac{1}{2}$  先令、 $6\frac{1}{4}$  先令，虽然在这个部門中机器並沒有任何改良。但是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在他的工厂里所做的，完全可以当做全英国的标准。从这些統計表中可以看到，这个工厂中織工的平均工資，除去

一切克扣，在 1821 年是每周  $16\frac{1}{2}$  先令，而 1831 年每周仅仅是 6 先令。以后工資又降低了很多；在 1831 年每碼付工資  $\frac{1}{3}$  先令或 4 辨士的紡織品（所謂 single sarsnets——一种做衣里用的綢緞）；在 1843 年只付  $2\frac{1}{2}$  辨士。而許多住在农村的織工，只有接受每碼  $1\frac{1}{2}$ —2 个辨士的工資，才能找到工作。此外还有任意克扣工資的情形。每一个領到經紗的織工都同时領到一張卡片，上面通常写着：某日某时繳回成品，如因病不能工作，必須在三天內通知办事处，否則即使有病也不能得到原諒；等待緯紗也不能成为获得原諒的充分理由；工作中如發生某些过失（例如在一定长度的織物上使用的緯紗超出規定等）应扣去不少于一半的工資；如果不能按期交活，每碼扣 1 辨士。卡片上規定的所有这些克扣使工資大大地减少了，例如有一个收貨人到郎卡郡的里城去收回成品，每星期去两次，每次給厂主帶回的罰款都不下 15 英鎊（100 个普魯士塔勒）。这是他自己說的，而他还算是一个最厚道的收貨人。在过去，这类問題是由仲裁法庭来解决的，但因为坚持到这种法庭去解决的工人大部分要被解雇，以后这一慣例就逐漸消失了，如今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証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当工人告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們接受了卡片，就是簽訂了契約，你們現在就得履行它。这和工厂工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說明他“同意扣工資”。如果他想抗拒，那末全城的厂主立刻都会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用李奇的話說，他

“不願服从卡片上規定的秩序和法律，并且胆敢怀疑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这是他应当知道的）的人的智慧”（“無可否認的事实”第 37—40 頁）。

自然，織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們到他那里領取經紗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絕妙的說法，他只是對他們說：

“如果你們不願意在我的油鍋里受煎熬，那你們可以到火里去散步。”  
(«If you don't like to be frizzled in my frying-pan, you can take a walk into the fire.»)

倫敦的、特別是斯比脫菲尔茲的絲織工，很久以來就陷入周期性的極端貧困之中，而他們非常積極地參加英國的、特別是倫敦的一切工人運動這一事實，就證明他們現在也還沒有理由滿意自己的狀況。壓在他們头上的貧困引起了熱病，這種病蔓延到倫敦的東部，並且促成了工人階級衛生狀況調查委員會的成立。但是，從倫敦熱病醫院最近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這種熱病還是很猖獗的。

除紡織業外，英國工業第二個重要的部門是金屬制品的生產。這種生產的中心是製造各種精細金屬制品的北明翰、生產各種刀的設菲尔德以及生產鎖、釘子等等比較簡單的商品的斯泰福郡，特別是烏爾未漢普頓。現在我們來看這個工業部門中工人的狀況，先從北明翰說起。在北明翰，和生產金屬制品的大多數地方一樣，生產組織還保留着舊時手工業制度的某些特點。小師傅還存在，他們和自己的學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當他們需要蒸汽發動機時——在巨大的工廠廠房中工作，這些廠房被劃分成許多小作坊，租給個別的師傅；在每個作坊中都裝有由蒸汽發動機帶動的傳動帶，再由傳動帶轉動機器。萊昂·福適（“兩大陸評論”<sup>111</sup>上關於英國工人狀況的一系列論文的作者，這些論文表明作者至少研究過這一問題，而且無論如何要比英國人和德國人一向在這方面所寫的東西都更有價值）把這種和郎卡郡、約克郡

的大生产相对立的生产組織叫做 *démocratie industrielle* [民主工業]。他并且指出,这种生产組織对师傅和帮工的状况都不是很有利的。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其他場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潤,現在由竞争加以調整,被分配到許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資本集中的趋势經常影响着他們;只要一个人發財,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發戶的廉價竞争的壓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資本家竞争时,他們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下面我們將看到,学徒在小师傅那里过的生活至少也像在厂主那里一样坏,只有一个差別,就是将来他們自己也会变成师傅,因而他們就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換句話說,他們也受資產階級剝削,但是不像在工厂中那样直接。所以这些小师傅不是真正的無产者,因为他們部分地依靠学徒的劳动生活,而且出卖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成品,但他們也不是真正的資產者,因为他們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北明翰工人的这种独特的中間地位,說明他們为什么很少完全地和公开地参加英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北明翰是一个激进的城市,但不是純粹宪章主义的城市。北明翰也有許多資本家開設的較大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絕对的統治地位;这里所实行的極精密的分工(例如在制造針的部門里)和蒸气力的应用,使厂主們可能雇用很多妇女和兒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的材料)我們已經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無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討厭家庭生活,道德敗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門中被排挤出来,机器不断改良,兒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

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1个辨士（10个普鲁士分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所有的儿童，就他们的年龄来说，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很少有发育正常的。他们用来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贫乏，但是还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北明翰能服兵役的男人是这样少了。

一个检查新兵体格的医生说：“工人都很矮小、瘦弱而且体力很差；此外，许多人的胸部或脊柱都是畸形的。”

据一个征兵的下级军官证明，北明翰的男人比任何地方的都矮小：他们大部分身长都不超过5英尺4—5英寸，在征来的613个新兵中只有238个合格。至于说到教育，那末我在前面（第396—397页）讲到金属加工区的生活的时候已经举出了许多证言和例子，读者可以再看一下；同时，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在北明翰，五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进过学校；学生经常你来我去，所以要使他们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儿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从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在那里教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教员。一个女教员在回答她是否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时说：“没有，一星期3辨士的学费哪能这样要求。”有些女教员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则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们分内的事。一个女教员回答说，她不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她尽力向儿童灌输一些好的原则，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语法上的错误。据一个委员说，学

校里經常吵吵鬧鬧，亂成一團。因此，兒童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不能令人滿意的；所有的罪犯有一半是十五歲以下的；僅僅在一年內就有 90 個十歲的罪犯被判了刑，其中有 44 人是刑事犯。照委員們的意見，混亂的性關係看來几乎是普遍現象，而且這種關係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格梭吉。“報告”和文件）

斯泰福郡鐵業區的情況更糟糕。這裡主要是生產簡單的鐵器，在這個勞動部門中既不可能進行特別細致的分工（也有一些例外），又不可能使用蒸汽力和機器。所以這裡（在烏爾未漢普頓、威倫霍爾、比爾斯頓、塞治里、溫斯菲爾德、達拉斯頓、達德里、窩爾索爾、溫斯柏利及其他等地）的工廠較少，但是小鐵鋪卻很多，這裡的小師傅帶着一個或幾個學徒工作，這些學徒要一直替師傅工作到二十一歲。小師傅的狀況和北明翰的差不多完全一樣，但是學徒的生活多半還壞得多。給他們吃的幾乎全是病畜和死畜的肉、腐爛了的肉和魚、流產的牛犢或者在火車里悶死的豬的肉。不但小師傅這樣做，有三四十個學徒的比較大的廠主也這樣做。在烏爾未漢普頓，這種現象似乎是普遍的。這種飲食造成的自然結果就是經常鬧腸胃病及其他疾病。此外，這些孩子多半吃不飽；除了工作服就沒有別的衣服，僅僅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就不能上主日學。住宅又壞又臟，常常成為疾病的發源地，因此，雖然工作本身一般都無害於健康，可是孩子們仍然長得很矮小，發育得不好，孱弱不堪，而且常常被工作弄成嚴重的殘廢。例如，威倫霍爾城有許多人因經常在製造螺絲的車床上工作而成了駝背，并彎了一條腿——即所謂“後彎腿”（hind-leg），這樣，兩條腿就呈 K 字形；此外，這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患疝氣。這裡也和烏爾未漢普頓一樣，女孩子——女孩子也在鐵鋪里工作！——和男孩子的性成熟期往



往很晚，有时要到十九岁。在几乎是专门生产钉子的塞治里城及其近郊，人们就在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牲畜栏似的简陋的棚舍里居住和工作。女孩子和男孩子們从十岁到十二岁起就开始拿起铁锤来工作，只有到他们每天能生产 1 000 个钉子时才算是真正的工人。他们制造 1 200 个钉子，所得的工资是  $5\frac{3}{4}$  辨士，或者还不到 5 个银格罗申。每一个钉子要打十二锤，因为铁锤重  $1\frac{1}{4}$  磅，所以工人要举重 18 000 磅才能挣到这点可怜的工资。在这种劳动繁重而营养又不足的情况下，儿童身体必然发育得不好，矮小而且孱弱，委员会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地区的教育状况，我们在上面已经提供了一些资料。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经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岁和十岁之间，即恰恰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做工了，而主日学的教员——铁匠或矿工——常常自己也几乎认不得多少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状况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员引了许多例子证明说，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他们缺乏思考能力，连自己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笨头笨脑，愚昧得无可救药，以致他们常说，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的生活好极了，而事实上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穿得破破烂烂，吃也吃不饱，还常常挨打，往往挨打后好几天还感到疼痛。他们一天到晚工作，直到发出下工信号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懂得自己累不累，——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们。（霍恩。“报告”和文件）

在設菲尔德工資較高，所以工人的狀況从表面上看起來也好一些。但是这里也必須指出几个对工人健康極端有害的劳动部門。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工人必須經常用胸部頂住工具，这就常常引起肺結核。另一些操作过程，例如制銼子，則阻碍整个身体的發育并引起腸胃病。切削骨头(作刀柄用)的工作引起头痛、黄疸病，而做这种工作的許多女孩子会得妇女貧血症。但是对健康最有害并引起工人早死的，是磨刀叉的工作，特別是在干石头上磨的时候。这种工作之所以有害，一半是由于必須弯着腰工作，因而胸部和胃部經常受到压迫，但主要是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塵狀的、極細微的、有尖銳棱角的金屬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五岁。設菲尔德的奈特医生說：

“要比較明白地說明这种工作所帶來的害处，应当說，磨工中活得最长的是那些酗酒最厉害的人，因为他們工作的時間比其他人都少。設菲尔德总共将近有 2 500 个磨工。其中約有 150 个（80 个成年男人和 70 个男孩）是磨叉的；他們总是在二十八岁到三十二岁之間就死掉。磨刮臉刀的工人，無論是干磨的或是湿磨的，都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間就死掉，而使用湿磨石的磨餐刀的工人則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間死掉。”

这位医生把他們的病即所謂磨工哮喘病的經過描述如下：

“他們通常是十四岁开始工作，如果他們的身体很好，在二十岁以前还感覺不到特別不舒适；再下去，这种特有的疾病的征候就显现出来了。他們在爬山或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来；为了減輕經常不断的愈来愈厉害的呼吸困难，他們把两肩高高地聳起；他們的身体老是向前弯着，好像只有保持工作时那种弯腰的姿势才覺得最舒服；他們的臉色漸漸变成泥黃色，面部显露出憂郁的表情，常常訴說胸部有受到压迫的感覺。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他們高声地咳嗽，声音就像从空木桶里發出来似的。他們时常咳出大量

的灰塵，这些灰塵或者混在痰里，或者团成球形或圓柱形，表面复着一層薄薄的粘液。再过一些时候就出現吐血、不能躺臥、盜汗、水泻、極度消瘦以及肺結核的一切普通征候。他們这样被折磨几个月，甚至几年，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养活家庭，最后终于死去。我必須补充几句，到現在为止，一切預防和医疗磨工哮喘病的嘗試都完全失敗了。”

这是奈特在十年前写的。从那以后，磨工的人数增加了，疾病蔓延得更厉害了，人們也試驗过把磨石遮起来并利用气流把灰塵吹走以預防疾病的办法。这种試驗至少是部分地成功了，但是磨工自己却不願意使用这类設備，在某些地方甚至于把它打碎了，因为他們害怕这样一来将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干这种行業，并使他們的工資降低；他們宁願“活不长，但要活得痛快”。奈特医生常常对那些有了哮喘病的初期征候到他那里去看病的磨工說：要是你們回到磨石边去，那就是去找死。但是从来沒有人听他的話；誰要是当了磨工，誰就逐漸成为完全絕望的人，仿佛已經把灵魂卖给魔鬼了。設菲尔德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一个长期做教育統計工作的牧师認為，在工人阶级的 16 500 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識字的不超过 6 500 人。原因是孩子們到七岁，最迟到十二岁，就从学校中被弄走，教員又都是毫無用处的廢物（其中有一个是罪証确鑿的小偷，他从監獄里出来以后，除了教書就找不到别的糊口的办法！）。設菲尔德青年中間的不道德的情形似乎也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可是，很难說哪一个城市在这方面数第一；当你讀报告的时候，你会認為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数第一）。年輕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擲錢賭博或唆使狗打架；他們常跑小酒館，在那里和情人消磨時間，一直坐到深更半夜，然后双双对对地到僻靜的地方去踫躑。有一个委員在一家小酒館里看到四五十个青年男女；他們几

乎都在十七岁以下，每一个青年都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有些人在玩牌，有些人在唱歌和跳舞，所有的人都在喝酒。一些公开的职业妓女也坐在那里。所以，无怪乎所有的证人都说，早期的紊乱的性关系和卖淫（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的少年身上）在设菲尔德是极常见的现象。极端野蛮的不顾死活的犯罪行为是很平常的。在委员会委员到来的前一年，这里逮捕了一伙图谋纵火烧城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引火物和长矛。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设菲尔德的工人运动也带有同样放任的性质。（昔蒙兹。“报告”和文件）

除了这些金属工业的主要中心，在瓦灵顿（郎卡郡）还有一些别针工厂（这里的工人，特别是童工同样是极端贫困、道德败坏和愚昧无知），在威根（郎卡郡）近郊和苏格兰东部还有几个钉子工厂。关于这几个地方的报告几乎和关于斯泰福郡的报告完全相同。

在金属工业里只有一个部门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就是**机器制造业**。这个生产部门主要分布在工厂区，特别是在郎卡郡，它的特点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样，从其他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的工人就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所——制造那些使他们失业的机器的工作。在这里，刨和钻的机器，制螺旋、齿轮、螺丝帽等等的机器以及机械旋床都在排挤着大批的工人，以前他们都拿高工资而且经常有工作，现在却失业了；这样的失业者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斯泰福郡铁业区北面的一个工业区。这里**陶器生产**（potteries）很发达；它的中心是斯托克自治市（borough），包括亨莱、柏斯勒姆、莱因恩得、莱因德尔夫、厄特鲁里亚、柯尔利治、郎坡尔特、坦斯托尔和金山等地，一共有居民6万人。“童工调查

委员会报告”这样告诉我们：在陶器制造业的某些部门中，孩子们在温暖而宽敞的房子里做着轻便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些部门里他们都既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穿不上好的衣服，却要从事繁重而紧张的劳动。有许多儿童抱怨道：“我老是吃不饱，多半只能吃到带盐的土豆，从来没有肉和面包；我不能去上学，我没有换洗的衣服。”——“今天中午一点东西也没有吃，我们家里从来就不吃午饭，吃的多半只是带盐的土豆，偶尔才吃到点面包。”——“我身上穿的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没有节日穿的衣服。” mould-runners [送模型工]的工作也是特别损害健康的，孩子们把制成的坯子和模子一起送到干燥房里，等到坯子干燥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空模子送回去。他们这样整天沿着楼梯跑上跑下，搬运着不适合于他们年龄的过分沉重的东西，而且还得在高温下进行工作，这就使他们更加疲劳。这些孩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消瘦、苍白、孱弱、矮小而且发育不良；他们差不多都患胃病，经常呕吐，食欲不振，其中有許多人由于虚弱而死掉。那些因转动轆轤 (jigger) 而被称为 jiggers [轆轤工]的男孩，几乎也是同样地孱弱。但是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这些工人——成年男人和儿童——的手和衣服总是被这种液体浸得湿漉漉的，他们的皮肤渐渐变松，在经常和物体的粗糙面接触时就容易脱落，所以手指常常受伤出血，这样一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侵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有时还会引起肺结核，而在小孩子身上更常常引起羊癫疯。在成年男人中常见的现象是手上的肌肉部分麻痹——colica pictorum [染色工的职业病]和四肢全部麻痹。有一个证人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

两个男孩在工作时抽風死掉。另一个証人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曾經在上釉的大桶旁当过两年助手。他說，最初他患剧烈的腹痛，后来就抽風，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从那以后，抽風的次数就愈来愈多，現在每天都要發作，并且常常在一天內要發十次到二十次羊癇瘋。他身体的右半部已經麻痺，医生告訴他說，他再也不能支配右手和右腿了。某一个工厂的上釉房里有4个成年男工和11个男孩，4个成年男工都患羊癇瘋和剧烈的疝气痛，11个男孩当中也有几个已經成为羊癇瘋患者。总之，这一可怕的疾病是这种工作的極平常的后果，当然它也給資產階級带来了很大的利潤！在磨光陶器的工房里，空气中充滿了微細的矽土塵埃，把这种塵埃吸到肺里并不比設菲尔德的磨工把鋼屑吸进去的害处小些。工人們患着喘病，要靜靜地躺一回都不可能，喉嚨潰烂，咳嗽得很厉害，說話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見。他們也都是得肺結核死掉的。陶業区里的学校比較多，孩子們按理是能够上学的，但是因为他們年紀这样小就到工厂去做工而且工作日又这样长(多半是十二小时，有时还要多)，所以他們就不能上这些学校去念書了。在委員會的委員詢問过的兒童中，有四分之三既不能讀，也不能写。全区都处于極端愚昧的状况中。上过几年主日学的孩子連字母都分不清。全区中不仅知識教育的水平很低，而且道德和宗教的教育也都一样。(斯克里文。“报告”和文件)

在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工作对成年男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害处，但是小孩子却受不了。工作繁重，工作時間沒有一定，常常在夜里工作，特别是工房里的温度高(华氏100°—130°)，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們的全身衰弱和疾病、發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風湿病。許多小孩都是臉色蒼白、两眼發紅，往往几个星期看

不見东西,严重地恶心、嘔吐、咳嗽、經常感冒和患風湿病。当成品从爐子里取出来的时候,孩子們經常不得不在高到使他們脚下的木板都燃燒起来的高温下工作。吹玻璃的工人大多数都因虛弱和肺結核而死得很早。(萊夫查尔德。“报告”附录第 2 部分 L 2 頁第 11、12 节;弗兰克斯。“报告”附录第 2 部分 K 7 頁第 48 节;唐克萊德。文件附录第 2 部分 I 76 頁等;均見“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

报告大体上証明了工厂制度是在逐漸地不断地滲进一切工業部門里去,这特別表現在吸收妇女和兒童来工作这一点上。我認为沒有必要到处把技术进步和成年男人被排挤的情形都叙述出来。只要稍稍熟悉工業的人就能毫不費力地把我所沒有談到的补充起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現代的生产方式这方面做詳細的探討,关于这方面的結果,我在談工厂制度的时候已經談过了。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結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業在家,結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結果大資本家掌握了企業,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財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業的發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我在前面已經談过,在手工業方面,資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資产阶级,使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工人代之而起,而有时分工也造成了同样的結果。关于这些手工業者,可以談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和他們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談工業無产阶级的时候我已經談过了;此外,这个部門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真正的产业工人的接

触、大資本家的壓迫（這比小師傅的壓迫厲害得多，因為幫工和師傅還維持着私人的關係）、大城市的影響以及工資的降低，這一切使得幾乎所有的手工業者都積極地起來參加工人運動。這一點我們下面就要談到。現在我們還要來談談倫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於這些人受着貪得無厭的資產階級的極端殘酷的剝削，所以特別值得注意。我在這裡指的是女時裝工和女縫工。

值得驚奇的是，正是為資產階級太太們製造裝飾品的工作，給這些工人的健康帶來了極其悲慘的後果。在談花邊生產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過這種情形，現在我們再拿倫敦時裝商店的例子來做證明。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輕的女孩子，共達15000人；這些女孩子大部分來自農村，她們食宿都在老板那裡，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的奴隸。在一年內約有四個月之久的時裝季節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時間每天也達十五小時，在定貨急迫的時候每天達十八小時。但是大多數商店在這個期間的工作時間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們休息和睡眠的時間一晝夜從來不會超過六小時，常常只有三四個小時，有時甚至只有兩小時。這樣，她們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實上她們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晝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時到二十二小時！一直到疲憊得實在連針都拿不住的時候，她們的漫長的工作才算到了盡頭。還有這樣的事情：這些可憐的人一連九天都沒有脫過衣服，只是抽空在墊子上躺一下；給她們的食物都切成小塊，好讓她們儘快地吞下去。一句話，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脅——的驅策下無可奈何地去做那種持久而不間斷的工作，這種工作連身強力壯的男人也吃不消，何況是十四歲到二十歲的柔弱的女孩子呢。此外，由於工房和臥室里的空氣郁悶，經常保持彎腰曲背的姿勢，吃惡劣的難消



化的食物，但主要是由于劳动時間太长和缺乏新鮮空气，結果女孩子們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殘。她們很快就感到疲倦、困頓、衰弱、食欲不振、肩痛、背痛、腰酸，特別是头痛；以后就是脊柱弯曲、两肩畸形地高聳、消瘦、眼肿、流泪、眼痛、近視、咳嗽、鷄胸、气喘以及各种妇科病。在許多情况下，眼睛受到严重的損害，以致完全失明，視力完全被破坏，而如果目力还保持得不錯，可以繼續工作下去，那末肺結核便会結束这些女时装工的短促而悲慘的一生。甚至那些相当早就脫离这种工作的人，也常常不能完全恢复被損害了的健康。她們老是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們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童工調查委员会詢問过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断定，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生活方式能像女时装工的生活那样損害健康，那样使人早死。

倫敦的女縫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殘酷的剝削，只是稍微間接一些。做紧身的女孩子們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有害的。她們得到的工資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人要對發下的料子負責，并把工作分配給女縫工，而他每件得到 $1\frac{1}{2}$ 辨士（合15个普魯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少是 $\frac{1}{2}$ 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辨士。做領帶的女孩子們每天必須工作十六小时，一星期只得到 $4\frac{1}{2}$ 先令（即 $1\frac{1}{2}$ 普魯士塔勒），但是她們用这些錢能买到的东西并不比用二十个銀格罗申在德国物价最貴的城市里所买到的东西多一些。<sup>⊖</sup>可是生活最坏的还是那些做衬衫的。她們做一件普通衬衫得到 $1\frac{1}{2}$ 辨士。以前她們可以得到2—3辨士，但是自从資產阶级激进派的官吏們所办的聖潘克拉斯的習艺所以 $1\frac{1}{2}$ 辨

⊖ 参看1844年3月16日的“每周快訊”。——恩格斯原注

士一件承做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资了。每天要工作十八小时才能做成一件的绣花薄料衬衫的工资是6个辨士(即5个银格罗申)。这样,根据这里所谈的及女工和承包人的许多陈述看来,这些女缝工虽然每天很紧张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可是一星期的工资也不过 $2\frac{1}{2}$ —3先令!但是最可耻的野蛮行为则是强迫女缝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发给她的料子的押金。因此,她们当然只好把一部分料子拿去当掉(这一点物主也知道得很清楚),以后自己吃些亏把它贖回来,如果无力贖回,那她们就得去见治安法官了。1843年11月就有一个女缝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不幸的女孩子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后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1844年8月投河自杀了。女缝工们通常都像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sup>⊖</sup>;而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也许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就比她们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

---

⊖ 托马斯·胡德,所有现代英国幽默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像所有的幽默作家一样,他富于同情心,但没有一点精神力量。1844年初,当描写女缝工惨状的文章载满了各家报纸的时候,他发表了一首优秀的诗“衬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这首诗使资产阶级女郎们流了不少怜悯的但毫无用处的眼泪。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它重抄在这里。它最初登载在“笨拙”上,后来又转载在所有的报纸上。当时各报都在讨论女缝工的状况,所以也不必专门引证。——恩格斯原注

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状况就是如此。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难道这种状况能够长久地继续下去吗？

不，这种状况不能也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关于这种状况说了些什么吧。

## 工人运动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英国工人，这已经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人天

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理智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

人該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們已經看到，随着工業的發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經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發覺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槍匹馬地以盜窃来反对現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襲一个人并以占絕對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盜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覺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現工人的輿論，虽然工人內心里也贊許它。工人階級第一次反抗資產階級是在產業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時候。最初的一批發明家阿克萊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們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連發生了許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經過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騷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搗毀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針對着現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轉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襲击这些再度变得手無寸鉄的犯罪者，給他們各种各样的懲罰，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們必須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議会所頒布的法律帮了他們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資產階級成为統治階級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廢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貴族和資產階級才有的結社的权利。誠然，在工人中間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們从

来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 137 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 1812 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 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 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当 1824 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 (trades-unions〔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来做，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份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 the tramp〔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 tramper〔流浪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支薪的主席兼秘书，——可想而知，因为没有一个是厂主会雇用这

样的人，——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况下，曾有人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结合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 1830 年——试图建立一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 或 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 knobsticks〔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



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地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在罢工期间他投下的资本不能周转，机器也要生锈。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润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结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资更快地（比它们不加过问时）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业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样

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場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貨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連小鋪老板也拒絕高利的賒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鎖。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們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資，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資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場状况所引起的工資降低）看做他們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們想尽力抵抗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終。这就發生了一个問題，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沒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問題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須反对降低工資，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應該讓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認资产阶级在商業繁荣时期有权剝削工人，而在蕭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餓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們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議，而他們之所以这样抗議，而不用別的方式来抗議，就因为他們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抗議的講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論家們那样，只要把他們的抗議書登記下来，*ad acta* [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靜靜地睡大覺，讓抗議書也像抗議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靜靜地睡覺。相反地，英国人的積極抗議是不会不發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貪得無厭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証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組織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們是工人想

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人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坏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因此，在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产

生了——不論是否得到領導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達到絕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籬的狂野的激情來解釋的個別行動。屬於這一類行動的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用硫酸來灼傷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現在我就舉出幾件來。在1831年的激烈的工潮時期，曼徹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廠主，年輕的埃士頓，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槍殺了，兇手沒有找到。毫無疑問，這是工人的報復行為。縱火和企圖進行爆炸的事件也經常發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企圖炸毀設菲爾德霍華德街廠主派金的制鋸工場。用來進行爆炸的是一根裝滿了炸藥而且兩端堵死了的鐵管；損失是相當重大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設菲爾德附近設爾斯-摩爾的伊畢岑刀銼工廠又發生了同樣的事件。伊畢岑先生積極參加資產階級的組織，壓低工資，專門雇用工賊，還利用濟貧法來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機時期，他強迫工人接受低工資，把那些拒絕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濟貧所，說他們能夠得到工作，但不願工作，因而不應當得到救濟），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當大的損失，而所有來到出事地點的工人，都只恨“沒有把工廠全部炸毀”。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波爾頓有人企圖縱火焚燒愛恩司華斯-克倫普頓工廠，但沒有成功。在短短的時期內這已經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圖焚燒這家工廠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設菲爾德市參議會會議上警官給大家看一個專門用來爆破的生鐵炸彈，裝有4磅炸藥，有一根燒焦了但已熄滅的引綫，這個炸彈是在設菲爾德市伯爵街基欽先生的工廠里發現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懷特鋸木廠里發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廠里面來的一包火藥引起的，損失重大。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設菲爾德的索赫車輪工廠被人放一

把火燒得精光。四個月內就發生了六起這樣的事件，所有這些事件的爆發，都是由於工人對雇主的切齒痛恨所引起的。在什麼樣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發生這類事情，那是用不着說的。這些事實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國，甚至在 1843 年年底那樣的商業情況很好的時期，社會戰爭就已經爆發並公開地進行了。然而英國資產階級依然執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 1838 年 1 月 3 日至 11 日格拉斯哥陪審法庭審理的所謂格拉斯哥的薩格<sup>⊖</sup>案件。從審訊中人們可以看到，1816 年即已成立的棉紡工人工会的團結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會員必須宣誓服從多数的決定。罷工時有一個秘密的委員會在活動，這個委員會是大多數會員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項。委員會規定了刺殺工賊和可惡的廠主以及放火焚燒工厂的獎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於雇用沒有加入工会的女工來代替男紡工而被工人放火燒掉；其中有一個少女的母亲，叫做麥克弗爾遜太太的被殺死，兩個凶手由工会出錢送到美國去了。1820 年有一個叫麥克奎利的工賊被槍傷，工会付給開槍者 15 英鎊。以後又有一個叫做格萊安的也被槍傷了；開槍者得到 20 英鎊，但被捕获並被判处終身流放。最後，在 1837 年 5 月，在歐特班克和邁爾-恩得的一些工厂里，由於罷工而發生了騷動，大約有十個工賊遭到痛毆；同年 7 月，騷動還沒有平靜下來，有一個叫斯密斯的工賊被打死。這時委員會的成員才被逮捕和審訊。委員會的主席和主要委員被控參加非法社團、對工賊使用暴力和縱火焚燒詹姆斯—弗蘭西斯·伍德工厂，他們被認為犯了罪，並被判流放七年。對這件事情我們的善良的德國人會說些什

⊖ 這些工人們被稱為薩格 [thugs]；按薩格是東印度一個著名的種族；他們以殺害一切落到手中的外人生。——恩格斯原注

么呢?①

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战争中,一方遭受损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们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在所有的资产者中,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谈到最强大的工人队伍——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谈到这些自称能够叫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无策“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

① “怎样一种‘原始的司法’(wild-justice)感在支配这些人呵!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理性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为自己阶级的逃兵和自己事业的叛徒,判他死刑,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因为国家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有这些都像古代的‘菲默法庭’②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好像这些法庭突然复活并呈现在人们的惊愕的目光之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拉斯哥建筑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感情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在群众中传播很广,并且是非常强有力的!”——卡莱尔“宪章运动”第40页。——恩格斯原注

② 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秘密法庭。——译者注

的法庭时，就气得语不成声。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sup>112</sup>！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撫，真遺憾呀！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操縱驛机的粗紡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濫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資并没有引起他們感激厂主的心情和發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無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們变得傲慢，使他們有錢来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神，而厂主們却接二连三地平白無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發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带的厂主們担心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竞争，就向沙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請求沙普先生發揮他的發明才能，設計一台自动驛机，以便“把生产从苦痛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練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觉和手指。这个鉄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納發<sup>①</sup>的命令从現代的普罗米修斯<sup>②</sup>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創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間的秩序并保証英国人在工业中的統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績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創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搖籃就把無法無天的海德拉<sup>③</sup>扼杀了。”

① 密納發 (Minerva) 是古希臘神話中司智慧、学术、工艺和战争的女神，也是雅典的守护神。——譯者注

② 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个神。他从天上盜走了火，并把使用火的方法告诉了人們。他因此被宙斯用鉄鏈縛在高加索山之巔，每天有一只鷹去啄食他的肝脏。后来海格立斯釋放了他。古希臘人把普罗米修斯看做人类文化的奠基者。——譯者注

③ 海德拉 (Hydra) 是希臘神話中的一条非常凶猛的九头巨蛇。它的八个头可以杀伤，第九个头是不能杀伤的，斬去一个头立刻就生出两个头。后为海格立斯所杀。——譯者注

接着尤尔又証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顏色的机器的發明，是印花布工人騷动的結果；織布厂中漿經紗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漿紗机的誕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sup>⊖</sup>。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許多篇幅来証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釋华特和其他許多人也沒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憤怒向工会發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資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陰謀家、蠱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們硬說，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領薪俸，所以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發給这些代理人工資的并不是剝夺了他們工作的資产階級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地証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經蔓延到什么程度。沒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沒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發生罢工，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資，有时是厂主拒絕提高工資，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賊，有时是厂主拒絕廢除打罵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無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間或才轉变为較严重的战斗；它們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們确鑿地証明無产階級和資产階級間的决战已經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軍事学校，他們就在这里受到訓練，准备投入已經不可避免的偉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階級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偉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閱一下报道無产階級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極星报”全年的合訂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業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經結成了工会，并且常常用总罢

⊖ 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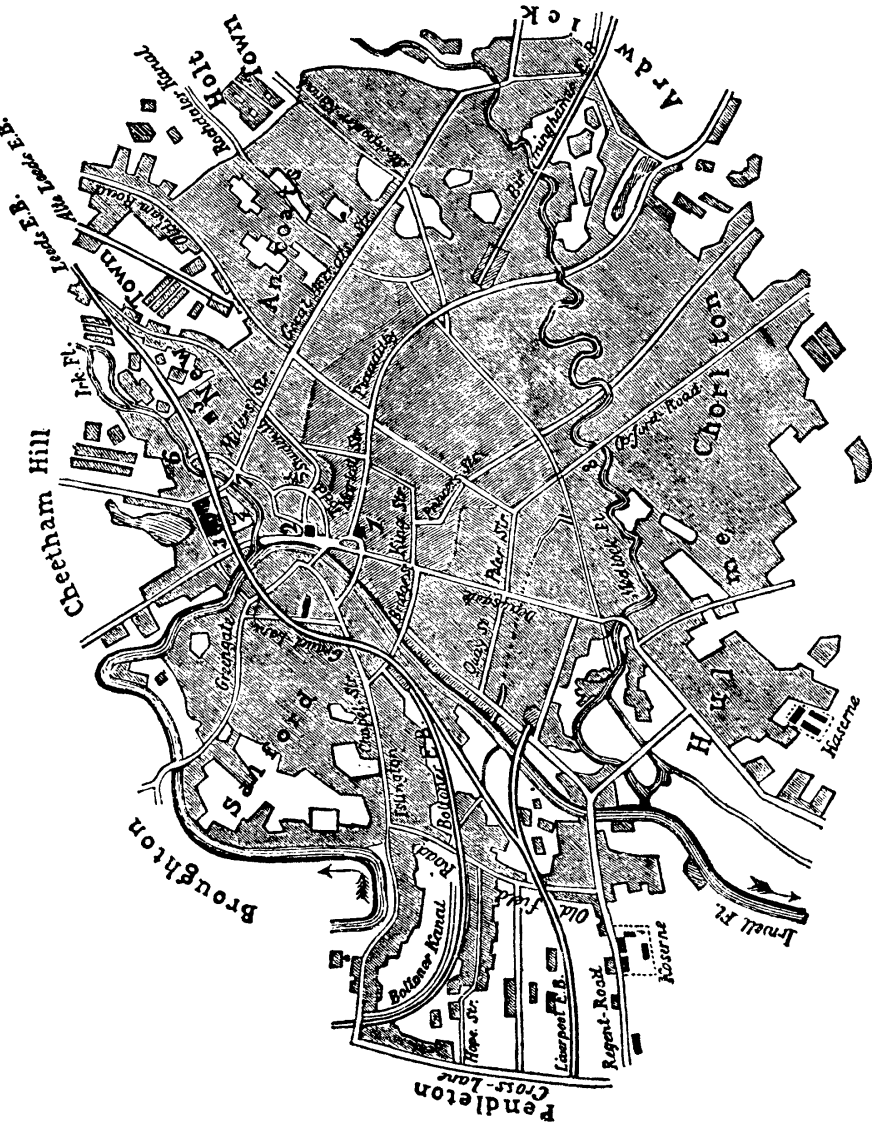


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穷困，1834年在里昂发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会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国工人为了挣脱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们在慢慢地饿死，他们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饿，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吗？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

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英国工人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時候（1843年5月間），那里就發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磚厂（保林—亨弗萊）加大了磚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資，虽然尺寸較大的磚必然会卖得貴些。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被拒絕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費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賊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圖恫吓他們。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給他們配备了槍枝。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鐘的时候，一支以步槍为前鋒的制磚工人的战斗队伍襲击了工厂，工厂离駐扎步兵部队的軍营<sup>⊖</sup>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發現警衛后就向他們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磚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磚，毀坏了他們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毆了住在那里的一個监工的妻子。那时，警衛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們可以毫無阻碍地射击。襲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磚窑前，火光照亮了他們，使他們成为敌人最好的槍靶子，而他們自己只好毫無目的地射击一陣。可是射击仍然繼續了半小时多，直到他們所有的槍彈都已經用光并达到了襲

⊖ 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見曼徹斯特平面圖。——恩格斯原注

# Plan von Manchester und seinen Vorstädten



1. die Börse.
2. die alte Kirche.
3. das Arbeitshaus.
4. der Armenkirchhof
5. St. Michael's Kirche.
6. Scotland Bridge über d. Irk.
7. Duse Bridge über d. Irk.
8. Little Ireland.



Das commerciale Färbel ist zur Unterscheidung von der linken zur rechten Hand abwärts schattirt

## Plan von Manchester und seinen Vorstädten 曼徹斯特及其郊区平面圖

Cheetham Hill	奇坦希尔	Oxford-Road	牛津路
Irk Fl.	艾尔克河	Chorlton	却尔顿
Leeds E. B.	里子铁路	Broughton	布劳顿
New Town	新城	Salford	索尔福
Alte Leeds E. B.	老里子铁路	Chapel Str.	礼拜堂街
Oldham. Road	奥尔丹路	Quay Str.	码头街
Rochdaler Kanal	罗契得尔运河	Deansgate	第恩斯盖特街
Holt Town	霍尔特镇	Peter Str.	彼得街
Millers Str.	密勒街	Medlock El.	梅德洛克河
Ancoats	安柯茨	Islington	伊斯林顿
Great Ancoats Str.	大安柯茨街	Boltoner E. B.	波尔顿铁路
Stockporter Kanal	斯托克波特运河	Boltoner Kanal	波尔顿运河
Todd Str.	托德街	Hope Str.	霍普街
Shudehill	修德希尔	Liverpool E. B.	利物浦铁路
Piccadilly	皮卡第莱	Regent-Road	瑞琴特路
Birmingham E. B.	北明翰铁路	Kaserne	兵营
Ardwick	阿德威克	Irwell Fl.	艾尔威尔河
Market Str.	市场街	Hulme	休尔姆
Greengate	格林盖特	Kaserne	兵营
Gravel Lane	砂砾胡同	Pendleton	盆德尔顿
Bridge Str.	桥街	Cross-Lane	十字胡同
King Str.	英王街	Oldfield-Road	奥尔德菲尔德路
Princess Str.	公主街		

engl. Meilen

$69\frac{1}{2} = 1^\circ$  des Aequators  $69\frac{1}{2}$  英里 = 1 緯度

Das kommerzielle Viertel ist zur Unterscheidung von der linken zur rechten Hand abwärts schattirt  
商業区用自左至右自上而下的投影表出

1. die Börse. 交易所
2. die alte Kirche. 老教堂
3. das Arbeitshaus. 習艺所
4. der Armenkirchhof Zwischen Beiden der Liverpooler & Leedser E. B. Hof. 利物浦铁路車站和里子铁路車站之間的貧民公墓
5. St. Michael's Kirche. 聖邁克爾教堂
6. Scotland Bridge über d. Irk. Die Strasse von 2 nach 6 heisst Long Millgate. 艾尔克河上的苏格兰桥。从 2 到 6 的这条街叫朗-密尔盖特
7. Ducie Bridge über d. Irk. 艾尔克河上的杜西桥
8. Little Ireland. 小爱尔兰

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彻斯特 3 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 4 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1842 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場广场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级）的奴僕們不在場，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撫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

級給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訴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說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徹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發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圖冲击一个有鉄門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風，如前面已經說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产階級的法律来代替資产階級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無产階級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 (People'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純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則改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資产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資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覺；当工人自覺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覺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資产階級的是整个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产階級的政权进攻，向資产階級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圍牆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紀80年代和無产階級同时并在無产階級內部發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締結和約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經和自由資产階級联合起来迫使旧議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資产階級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洛維特为首的倫敦工人协会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 精神正

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議員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赂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設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証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純屬形式的300英鎊地产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組織，初看起来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徹底毀掉。宪法中的所謂君主和貴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無非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它們摆摆样子；这两种成分在今天本来也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輿論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現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現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貴族失掉他們头上最后的一絲聖光。英国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勳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也很少考虑勳爵和女王的意見，但对他們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們从来不用或極少用这个字眼；他們同情各国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們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們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誠然，宪章主义从1835年一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傳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們的共同的口号，他們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組成了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正对改革法案的結果和1837—1839年的商業停滯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杀的情緒高漲，所以宪章主义者的激烈鼓动很合他們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無論如何想像不出来的。宪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

召他們起义。人們制造了长矛，就像从前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傳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徹斯特的居民講了这样的話：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們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們手里的工具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是十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要拿几根火柴和一把澆上松香的干草就够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們勇敢地用起这种武器来，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它究竟有什么办法！”<sup>⊖</sup>

但同时，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質在那时就已經显露出来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們已經提到过的曼徹斯特的“聖山”克薩尔-摩尔举行的 20 万人的大会上又講了下面的話：

“朋友們，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們爭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問題，宪章主义是**飯碗問題**；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資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对新的济貧法和爭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經和宪章运动有了極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利党人奧斯特勒發表演說，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請願書，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請願書。1839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躍地繼續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賽、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約克郡和威尔士組織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計劃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發动起义，結果就遭到了失敗。北方的起义組織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圖已經失敗，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在 1840 年 1 月，約克郡發生了几次所謂警察叛乱

⊖ 我們已經看到，这些話对工人起了什么影响。——恩格斯原注



(spy-outbreaks)<sup>113</sup>——例如在設菲尔德和布莱得弗德，——后来，激昂的情绪就渐渐平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协会的产生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斗争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言语说话，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1839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聖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

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它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蹒跚一个时期。这种讽刺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000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碍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8月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的宠儿——翟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

沒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願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廢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槍彈这一点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認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 1840 年的工資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原因而失敗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覺的有組織的工人起义，那末它無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願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沒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同时，在履行 2 月 15 日的盟約方面連手指都沒有动一下的資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願意充当他們手中的工具，他們离开“合法”途徑后的矛盾行为對他們本身是一种危險；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資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場，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們煽动起来又被他們逼着起义的工人。資产阶级和自己的奴僕一起当了特別警察——在曼徹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們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揚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頓，資产阶级曾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發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裝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沒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渐散去，起义結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資产阶级还干了許多别的卑鄙勾当；他們表示厭惡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圖这样来为自己辯护。这和他們在春天所說的話是很不協調的。他們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給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們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們極端厚顏無耻地重新站到承認法律神聖的先前的立場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沒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們只是做了資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勢罢了，可是他們却

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失，在停工时期他们倒卖掉了存貨，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間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爭論点，但是后来这个爭論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話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訴諸物质力量了。第二个爭論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宪章主义恰好成为真正的宪章主义的爭論点，就是谷物法問題。关心廢除谷物法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就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原則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北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治提議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理由是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經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没有認为必須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意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問題时斯特治失敗了。这时，这位忽然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組織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組成的“爭取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资产者，不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討厭，甚至连普选权 (universal suffrage) 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發笑的名稱——完全选举权 (complete suffrage) 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繼續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曾经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但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经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阶级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这个要求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主义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无产阶级。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

宪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傅教士斯提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主义者才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主义者都是真理了。宪章主义者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因工业发展而已经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即 allotment-system，关于此种办法请参看“导言”）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来一般地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措施本身不是受不住竞争的打击（这样，以前的情况就会恢复起来），就是要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主义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特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中的繁荣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sup>⊖</sup>，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工人要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到那时他们将要弄清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们通过宪章就能做到而他们现在还不很清楚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

---

⊖ 预言准确地实现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何而言。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接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合理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合理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他们的理论原则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 selbst auflöst]的目的<sup>⊖</sup>。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

⊖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改为:“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合乎规律的进一步的政治发展,直到这一过渡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编者注

个单独的人在內，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們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們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們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階級的，但是工人階級中傾向于他們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現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階級的公共財產，因此，它必須降低自己的水平，暫時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經過宪章运动的考驗并清除了資产階級成分的、真正的無产階級社会主义現在已經在許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領袖（他們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sup>⊖</sup>）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發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寬广得多、但是在發展<sup>⊖</sup>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暫時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更加向前發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不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覺地純粹为了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銳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也是穷困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們会愈来愈相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們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順从地听任有产階級榨取他們的脂膏。

这样，我們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別，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較落后，比較不开展，但他們是真正的道地的無产者，是無产階級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

---

⊖ 自然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狹义的欧文主义者。——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譯本中，“發展”一詞前有“理論上的”字样。——編者注



远得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这些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主义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设施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Mechanics' Institutions»）<sup>114</sup> 里面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去阅读，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

有直接关系的問題。于是自滿自足的資產階級就說他們的 *Dixi et salvavi*<sup>⊖</sup>，并且輕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宁願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願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階級。但是工人也是重視“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杂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智謀。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証明：在無產階級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閱覽室里經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經濟学問題的講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襤褸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們显示出自己对地質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識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資產者还要多。閱讀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詩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別表明了英国無產階級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經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資產者是現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見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計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無產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視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們。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無產階級曾經做过不少事情，他們翻譯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維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譯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傳播。施特劳斯的“耶穌傳”和蒲魯东的“什么是財產”也仅仅是在無產者中間流行<sup>115</sup>。雪萊，天才的預言家雪萊和滿腔热情的、辛辣地諷刺現社会的拜倫，他們的讀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資產者所讀的只是經過閹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謂“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無產階級

⊖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編者注

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 «working men» [“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 矿业无产阶级

对于像英国的那样规模巨大的工业说来，开采原料和燃料同样需要数目很大的一批工人。但是在工业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中，除农业区供给的羊毛外，英国本地只出产矿物，即金属和煤。康瓦尔有丰富的铜矿、锡矿、锌矿和铅矿，斯泰福郡、北威尔士及其他地区出产大量的铁，几乎整个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苏格兰中部及爱尔兰某些地区都出产丰富的煤<sup>⊖</sup>。

康瓦尔的矿山雇用了将近 19 000 个男人、11 000 个妇女和儿童，这些人一部分在地下做工，一部分在地面上做工。在矿井内做工的几乎全是男人和十二岁以上的男孩子。据“童工调查委员会

⊖ 据 1841 年调查，大不列颠（爱尔兰除外）在矿上工作的工人数目如下：

	男 人		女 人		总 数
	20岁以上	20岁以下	20岁以上	20岁以下	
煤矿·····	83 408	32 475	1 185	1 165	118 233
铜矿·····	9 866	3 428	913	1 200	15 407
铅矿·····	9 427	1 932	40	20	11 419
铁矿·····	7 773	2 679	424	73	10 949
锡矿·····	4 602	1 349	68	82	6 101
其他（包括那些未指出名称的矿）	24 162	6 591	472	491	31 716
总 计	139 238	48 454	3 102	3 031	193 825

因为在煤矿中工作的多半就是在铁矿中工作的工人，所以算在煤矿工人中的一部分工人以及列在最后一项内的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应该列入铁矿工人中去。——恩格斯原注

报告”看来，这些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似乎是相当不错的，英国人也常常夸耀他们这些强壮而勇敢的、甚至到海底下去开发矿脉的康瓦尔矿工。但是，委员会的报告对这些人的力量的估计却有些不同。巴朗博士那个考虑得很周到的报告表明：矿井深处的空气含氧很少，并且混杂着尘土和炸药爆炸时的烟，这种空气对肺部很有害，妨碍心脏的活动，削弱消化器官的机能；紧张的工作，特别是每天上工前和下工后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某些矿井中，甚至年轻力壮的男子也要在这上面花费一小时以上），也大大助长了上述疾病的发展，所以从小就下矿的男子的体力竟远不如在地面上做工的妇女；许多人年纪轻轻就死于急性肺结核，而大多数人都在壮年时得慢性肺结核死去；工人们都未老先衰，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很多人由于爬梯子吃力，弄得满身大汗，从温暖的矿井里出来后突然遇到地面上的冷空气，本来就有病的呼吸器官感染上急性炎症，他们常常因此送命。地面上碎矿和选矿的工作，是由少女和儿童来做的，这种工作被认为对健康很有益处，因为它是在新鲜的空气中进行的。

在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交界的地方，是蕴藏丰富的奥尔斯顿-摩尔铅矿所在地。关于这个地区的材料——“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密契尔委员的报告——和关于康瓦尔的材料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材料也指出，矿井坑道内氧气不足，空气中充满尘土、炸药烟、碳酸气和含硫的瓦斯。因此，这里的矿工和康瓦尔的矿工一样，也是身材矮小，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患者继续工作下去的话（他们几乎总是继续工作下去的），这种病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结核，大大缩短这些人的平均寿命。如果说这个地区的矿工比康瓦尔的矿工活得稍微久些，这是由于他们

从十九岁起才开始下矿井，至于康瓦尔的矿工，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做这种工作了。但是在这里，据医生証明，大多数人也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間就死去了。在这一地区的官方登記册上記載的 79 个死亡的矿工中，37 人死于肺結核，6 人死于哮喘病，他們的平均寿命是四十五岁。在附近的几个居民点——爱倫达尔、斯坦霍普和密得尔頓，矿工的平均寿命各为四十九岁、四十八岁和四十七岁，因肺部疾病而死的各占死亡总数的 48%、54% 和 56%。在这里必須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仅仅是指滿了十九岁才下矿的矿工說的。讓我們把这些数字和所謂瑞典統計表——关于所有瑞典居民死亡情形的詳細統計表——比較一下，这些統計表在英国直到現在还被人看做衡量不列顛工人階級平均寿命的最正确的标准。根据这些統計表，十九岁以上的男人的平均寿命是五十七岁半，这样看来，英格兰北部矿工的寿命由于他們的劳动平均縮短了十年。但是不要忘記，瑞典統計表是工人的平均寿命的标准，所以它們所表示的，是無产階級在不利的生存条件下可能活到的岁数，就是說，它們是低于普通人的寿命标准的。在这一地区里，我們也發現了我們在研究大城市时已經熟悉了的夜店和栖身之所，那里肮脏、發臭和拥挤的情形也并不亚于大城市。密契尔曾参观过一間 18 英尺长 15 英尺寬的屋子，里面有七張像船上那样的双層床，住了 42 个成年男人和 14 个男孩，一共 56 个人。屋子沒有任何通气孔；虽然最近三夜都沒有一个人在这間屋子里睡过，但是里面仍然又臭又悶，竟使密契尔一分鐘也待不住。如果在炎熱的夏夜往里边塞进 56 个人，那又将成什么样子呢！这并不是美国运奴隶的船只的統艙，而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顛人”的住所呵！

現在我們來談談英國礦業最重要的部門——鐵礦和煤礦。“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是把它們放在一起考察的，而且正如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樣，考察得非常詳細。報告的第一部分所談的差不多都是這兩個部門中的工人的狀況。我在前面已經詳細地描述了產業工人的狀況，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按照本書的篇幅所要求的那樣，盡量寫得簡短些。

在開采方法大致相同的煤礦和鐵礦里做工的，有四歲、五歲、七歲的兒童，但大多數都在八歲以上。他們的工作是把開采出來的礦石或煤從開采地運到馬車道上或主要的礦井里去，以及把從礦井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門打開讓工人和礦石通過，然後再關上它。看這些門的多半是最小的孩子，他們就這樣被迫每天在黑暗、狹窄、多半是潮濕的巷道里孤獨地坐上十二小時，由於沒有足夠的工作，他們不能不閑得發呆。可是搬運煤和鐵礦石却是很繁重的勞動：必須在高低不平的坑道里把裝滿了煤或鐵礦石的相當大的沒有輪子的運礦桶拖着走，常常要涉過稀泥或水，爬上陡坡和通過低得有時必須爬着走的巷道。因此，這個吃力的工作就由年齡較大的男孩子和快成年的女孩子來做。隨着情況的不同，每一個運礦桶或由一個成年工人拖着走，或由兩個孩子，一個在前面拉，另一個在后面推着走。成年男子和十六歲以上的比較結實的青年所做的挖礦工作也是非常累人的。工作日通常長到十一小時至十二小時，往往還要長些，在蘇格蘭竟長到十四小時。把工作的時間延長一倍的事情是極常見的，因此，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地下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也往往達三十六小時。在大多數礦里都沒有固定的吃飯時間，所以工人們都是在肚子餓了而且又能夠抽出一点点時間來的時候吃些東西。

矿工的表面状况一般被描写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工资甚至比周围的农业工人高（农业工人简直是吃不饱的），只有苏格兰的某些地区和爱尔兰煤矿区例外，那里是极其贫穷的。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头来谈谈对于矿工状况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在和全英国最贫穷的阶级的状况相比较时才得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目前这种采矿方式所造成的恶果，并让读者来判断：究竟有什么样的金钱报酬能够补偿工人所受的这种痛苦。

运铁矿石和煤的儿童和少年都因工作太累而叫苦不已。就是在那些剥削工人最残酷的工厂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普遍和这样极度的筋疲力尽的情形。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有这方面的许多例子。下面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孩子们一回到家，就倒在灶旁的石板地上睡着了，甚至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父母得把睡着的孩子洗干净，抱上床去。孩子们常常疲倦得倒在路上睡着了，于是父母必须在深更半夜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在睡梦中带回家去。通常，每逢星期日，这些孩子为了稍微恢复一下一星期的疲劳，竟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觉上；上教堂和学校去的只是少数孩子，而且教员还常常埋怨说，虽然他们的求知欲很强，但他们总是打瞌睡而且很愚笨。女孩子和妇女的情形也是一样。人们极残酷地迫使她们去做力不胜任的工作。自然，这种几乎总是把人弄得极端虚弱的疲劳现象，是不会不影响工人的身体的。这样的过度劳动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肌肉的发展不平衡，也就是说，在拉东西和推东西时特别用力的胳膊、腿、背、肩和胸部的肌肉过分发达，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因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这首先是阻碍了身体的成长和发育。几乎所有矿工的个子都很矮小，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矿工是例外，因为他们是在特殊的、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工作



的。其次是延緩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性的成熟期，男孩子的性的成熟期常常要晚到十八岁。昔蒙茲委員遇到过一个十九岁的少年，除牙齿外，他身体各部分的發育竟和一个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差不多。这种兒童期的延长實質上也不过是發育受到阻碍的結果，其影响是必然要在以后表現出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和体質这样孱弱的情況下，两腿弯曲、两膝向里弯、两足形成外八字、脊柱弯曲等等畸形状态，是工作时姿势一直不自然所造成的最普遍的后果；这些畸形是这样常見，以致無論在約克郡和郎卡郡，或者在諾森伯兰和德勒穆，許多人(包括医生在內)都一致認為，单从体格上就可以在 100 个普通工人中認出哪一个是矿工来。妇女显然受这种工作的危害更深；她們的体格很少有完全正常的，更正确地說，几乎从来沒有完全正常的。在报告中也举出了許多事实，証明矿井里的工作使得妇女的骨盘結構不正常，因而引起难产，甚至常常造成死亡。除这类畸形外，煤矿工人还患一大串特殊的病，这些病也是其他矿工所患的，其原因很容易从他們的劳动的特点中得到解釋。首先，他們都患胃病；食欲消失，多数都腹痛、恶心和嘔吐，同时口渴得厉害，但只能用矿井里肮脏的、常常是微温的水来解渴。消化器官的活动受到了破坏，这又促成了其他疾病的产生。根据許多人的証明，煤矿工人們也常常患心脏病，如心脏肥大，心脏炎和心包炎，心脏的血管硬化和主动脉口狹窄等。这些疾病的原因就是劳动过度。疝气也几乎是普遍的現象，这也是肌肉过度緊張的直接后果。在許多矿井里，由于肌肉过度緊張，又由于空气里充滿了塵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这本来是容易避免的)，产生了許多痛苦而危險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这种疾病在某些地区的大多数煤矿工人中是在四十岁上出現，而在另一些地区甚至在三

十岁上就出現，并且很快就使患者失去工作能力。那些在潮湿的矿井中工作的人当中，喘息的现象自然要开始得早得多；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工人们在三四十岁之間，即在有病的肺部特别容易感染各种炎症和热病的年龄，就有了喘息毛病。这种工人所特有的一种病是所謂黑痰病(black spittle)，它是由細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濃痰。在某些地方这种病比較輕微，而在另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苏格兰，却是不治之症；在这里，这种病除上述各种征候表现得特別明显外，还有呼吸短促而带有哨音、脉搏很快（每分鐘一百多次）、时断时續的咳嗽等现象；病人愈来愈瘦，愈来愈弱，很快就失去工作能力。在苏格兰，这种病总是致命的。据东洛蒂昂的倍开特兰这个地方的麦克凱拉博士說，在一切通風設備好的矿井里，这种病根本看不到，可是从通風設備好的矿井轉到通風設備坏的矿井去工作的工人却經常害这种病。这样看来，这种病之所以普遍存在，应当归罪于不安装良好通風設備的唯利是圖的矿主。風湿病也是一切煤矿工人共同的疾病（只有瓦瑞克郡和萊斯特郡的煤矿工人是例外），这种疾病大部分是由于經常待在潮湿的矿井中引起的。所有这些疾病的結果就是各个地区(毫無例外)的煤矿工人都衰老得早，四十岁以后——在一些地区稍稍早一些，在另一些地区稍稍迟一些——就已經不能工作了。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还能繼續工作的煤矿工人是極其少見的。根据所有的材料証明，这一劳动部門中的工人到四十岁就衰老了。上面所說的是挖煤的工人；至于經常把沉重的煤塊举起来放到运矿桶里去的装煤工人，那他們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間就已經衰老了，所以在煤矿区里甚至有这样一句諺語：“装煤工人，未少先老。”煤矿工人老得这样早，

自然也就死得早，所以在他們中間很少能遇見六十岁的老人；甚至在矿井的設備好得多的南斯泰福郡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岁以上。由于工人这样过早地衰老，所以这里很自然地也像工厂里一样，失業的父母經常靠他們的孩子来养活，有时还靠非常年幼的孩子来养活。如果把煤矿中的工作所引起的后果再简单地总结一下，我們就会發現，正如委员会的委員之一薩斯伍德·斯密斯博士所說的，由于童年时期的延长和未老先衰，一个人精力最充沛的生活时期就大大縮短了，而且寿命也因为早死而普遍地縮短了。所有这些都必須記在资产阶级的賬上！

上面談到的一切只是英国矿井的一般情形。但是有不少矿井的工作条件还要坏得多，这就是那些开采薄煤層的矿井。假如掘煤时把和煤層連在一起的砂和粘土带出一部分来，煤价就会太貴；所以矿主只讓掘煤，不許动砂和粘土。这样一来，通常有四五英尺或者还要高一些的巷道在这里就低得連站都站不起来。工人只好側臥着，把肘支在地上，用鉄鎬把煤掘下来。这种姿势就引起肘关节炎，而在工人必須跪着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膝关节炎。拖煤的妇女和兒童用挽具和鏈子拖着运矿桶在低矮的水平坑道里爬着走，鏈子往往从胯下穿过去，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用头頂和用手推。用头頂运矿桶引起局部刺激、腫脹和疮癩。此外，許多水平坑道都是潮湿的，因此，工人必須在几英寸深的脏水或咸水中爬行，这样也使皮膚受到刺激。不难想像，这种可怕的奴隶劳动是怎样助长了煤矿工人本来就有的各种疾病的發展。

但落在煤矿工人头上的灾难还不止这些。在整个不列顛王国里，再沒有一个劳动部門中的工人的生命像在这里这样經常發生危險。煤矿是許許多多駭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場所，而所有

这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貪得無厭。矿井中常常产生的矿坑瓦斯和空气混合起来,就成为一种爆炸性瓦斯,这种瓦斯一碰到火就爆炸,就会把附近的人都炸死。这样的爆炸时而在这里發生,时而在那里發生,几乎每天都有。1844年9月28日,在德勒穆的哈斯威尔矿井中發生了一次这样的爆炸,結果死了96个人。同样在矿井中大量形成的碳酸气沉积在比較低的地方,常常积到一人多深,人一陷到里面就会悶死。按理說,把矿井隔成各个部分的門是会防止爆炸的蔓延和瓦斯的流动的,但是因为看門的都是小孩子,他們常常睡着了,或者是疏忽了,所以这不过是有名無实的預防而已。要是利用通風井来使矿井中的空气暢通,就完全可以消除这两种瓦斯的危害性,但资产者不肯出錢来办这件事。他要工人只使用戴維灯;但这种灯的光綫很微弱,对工人毫無用处,所以工人宁願改用普通的蜡烛。可是一旦發生爆炸,那当然就要归咎于工人的疏忽;但是只要资产者把通風設備搞好,爆炸是几乎不可能發生的。其次,随时都有水平坑道整个地或部分地崩塌下来的事故發生,把工人活埋或者把他們弄成殘廢;资产者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地把煤从水平煤層中掘干淨,这就是造成这类不幸事件的原因。再其次,工人下矿井时攀緣的繩索的質量往往很坏,繩索一断,不幸的工人就墜到井底,跌得粉身碎骨。所有这些不幸事件(因为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根据“矿业杂志”<sup>116</sup>的統計,每年大約要夺去1400个人的生命。仅仅就郎卡那一地而言,“曼徹斯特衛报”每周至少要报道两起不幸事件。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驗尸陪審員都是受矿主左右的,而在情况不是这样的地方,判断照例是这样的:“因不幸事故致死。”此外,陪審員很少考虑到矿井的状况,因为他們在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但是“童工調查委員

会报告”却毫不犹豫地要把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责任归之于矿主。

至于矿业工人的教育和道德，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康瓦尔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错，奥尔斯顿—摩尔甚至很不错；但是在煤矿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工人住在乡村里，住在偏僻的地方。只要他们在做那种繁重的工作，除警察外，谁也不关心他们。同时，由于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工作，所以他们的智力发展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通的学校他们进不去，在夜校和主日学里又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教师都是些废物。因此，只有少数人识字，能写的就更少了。据委员们证明，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靠自己的繁重而又危险的劳动所换得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他们从来不或者几乎从来不上教堂；所有的牧师都抱怨他们异常缺乏宗教感。的确，这些人在宗教的和世俗的问题上显得这样愚昧无知，连我们在前面许多例子中所谈的产业工人都为之逊色。他们只是从骂人的话里才有了宗教的概念。他们的道德被他们的劳动条件破坏了。一切煤矿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们酗酒。至于说到性道德，那只要谈一点就够了，这就是由于矿井里温度很高，男人、女人和孩子往往都是赤身裸体地工作，而在大多数场合差不多是一丝不挂的。这在黑暗而僻静的矿井过道中会引起什么结果，那是每一个人都想像得到的。私生子非常之多，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在这些半野蛮的人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也证明，非婚的性关系在这里还没有达到城市里那种卖淫的地步。妇女的劳动在这里也产生了和工厂里一样的后果，它破坏了家庭，使妇女完全失去了履行母亲的义务和料理家务的可能。

当“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在议会中提出时，艾释黎勋爵急忙提出了一个法律草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

用兒童。这个法案通过了<sup>117</sup>，但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紙空文，因为連視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視察員都沒有任命。何况在矿場所在地的乡間，規避这个法律本来就是很容易的。因此，当去年煤矿工会正式通知內务大臣，苏格兰汉密尔顿公爵的矿里面有六十多个妇女工作的时候，当“曼徹斯特衛报”报道在威根附近（我記得是这样）的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沒有人注意到这已經暴露了違法的事实，那是毫不足怪的。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这个法律也許有人遵守，但总的說来还是一切照旧。

可是煤矿工人的苦难还不止这些。资产階級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們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險，并剝夺了他們受教育的任何机会，但它还不滿足，它还用最無耻的方式来剝削他們。实物工資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規，并且是明目張胆地实行的。这里普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剝削。此外，资产階級还用其他的方法欺騙工人：煤是按重量出卖的，但工人的工資多半都是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沒有完全装满，他就一点工資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又一文錢也不能多得。如果运矿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工人就不仅完全得不到工資，而且还要罰款，但砂子的多少与其說是决定于工人，不如說是决定于煤層的性質。罰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極其厉害的，有时候一个穷人做完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去領工資的时候，才从监工——他高兴罰就罰，甚至不預先告知工人——那里知道不仅一个錢也領不到，甚至还必須繳多少多少罰款！监工处理工資通常都是独断独行的；他把工人做的工作登記下来，可以随意付給工人一些工資，而工人还必须相信他的話。在某些按重量計算工資的矿里，使用砝碼与物重为一比十的不准确的台秤，秤上的砝碼是沒有經過当

局檢驗过的；有一个矿里甚至有这样一条規則：工人要控告台秤不正确，必須在三个星期前預先告訴監工！在許多地区，特別是在英格兰北部，还有以一年为期的雇工，工人在这一年內除了自己的雇主外不能給任何人做工，但主人却根本不負責給他們工作。这样一来，他們就常常整月地沒有工做，而如果他們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工作，那就会得到一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被送到監牢里去待六个星期。另外一些合同保証他們每两个星期有 26 先令的工資，但是諾言并不兌現。在某些地区，矿主借給工人一笔不大的款子，讓他們以后用劳力来偿还，这样就把他們紧紧地束縛在自己身边了。在北方还有一种慣例，就是經常扣压一个星期的工資不發，以便把矿工束縛在矿上。下面这一情况把这些被束縛的工人完全降到奴隶的地位：几乎煤矿区里所有的治安法官本身不是矿主，就是矿主的亲戚朋友。他們在这些貧穷的落后地区，在这些報紙很少，——而報紙也是为統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宣傳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有几乎無限的权力。甚至很难想像，这些为自己的利益执掌着司法大权的治安法官会怎样剝削和折磨不幸的煤矿工人。

这种情形維持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矿工們連做梦也沒有想到过他們活在世界上决不是仅仅为了供人榨取血汗。但是在他們中間，首先是在和覺悟較高的工厂工人相接触而不能不受他們影响的工厂区里面，也漸漸出現了对“煤炭大王”的無耻压迫的反抗精神。煤矿工人开始組織工会，时常举行罢工。在文化比較發达的地区里，他們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护宪章派。但是完全和工業生活隔絕的英格兰北部大煤矿区，并没有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只是由于宪章派和覺悟較高的煤矿工人本身的多次努力，到 1843 年，反抗精神才在这里普遍地覺醒起来。諾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工人完全投

入了运动，他們成了全大不列顛煤矿总工会的首領，并聘請了布利斯托尔的律师，宪章主义者威·普·罗伯茨做他們的“总代理人”，他是在宪章派过去的多次訴訟中就已經出了名的。这个工会很快就扩展到大部分地区里；到处都任命了召开大会和征求會員的代理人。到1844年1月在曼徹斯特开第一次代表會議的时候，工会已拥有會員6万人以上，半年后，到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第二次代表會議的时候，會員已經超过10万人。在这两次代表會議上討論了煤矿工人的一切問題，并就比較大規模的罢工的問題做出了决定。为了維護煤矿工人的权利，創辦了好几种新的期刊，特别是泰納河上的新堡創辦的“矿工的律师”月刊。

1844年3月31日，諾森伯兰和德勒穆所有煤矿工人的受雇合同已經到期。他們委托罗伯茨草拟了一个新合同，提出了以下的要求：(1)不按容积而按重量計算工資；(2)过秤时要用普通的經政府檢查官檢驗过的秤和砝碼；(3)受雇期限为半年；(4)廢除罰款制度，按实际做的工作付給工資；(5)矿主有义务保証专门替他工作的工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工作，或保証他們每星期領到四天的工資。他們把这个合同送給了煤炭大王們，并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談判。但是矿主們的回答是：矿工工会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他們只和个别的工人打交道，而工会他們是永远不会承認的。矿主們也提出了一个合同草案，这个草案中連上述几点的影子都沒有，工人当然拒絕了。这样双方就宣了战。1844年3月31日，4万煤矿工人放下了自己的鉄鎬，于是这两个郡里所有的矿井都空無一人了。工会的財力是这样雄厚，好几个月里每个家庭每星期都可以領到两个半先令的補助金。当工人用这种方法来考驗他們雇主的耐性的时候，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組織罢工，进行鼓



动；他召开各种会议，东奔西走地跑遍了全英国，为罢工者募集捐款，劝告他们要沉着和守法，同时又向横行霸道的治安法官和实行实物工资制的业主展开了英国空前未有的斗争。早在年初他就展开了这一斗争。只要某一个治安法官判决煤矿工人有罪，罗伯茨立刻就到皇家法庭<sup>118</sup>去弄一个Habeas Corpus<sup>119</sup>来，把他的被保护人带到伦敦去，结果总能替他辩明无罪。例如威廉斯法官于1月13日在皇家法庭中宣布3个已被比尔斯顿（南斯泰福郡）的治安法官判了罪的煤矿工人无罪；这几个煤矿工人原来的罪名是：他们拒绝在一个有崩塌危险而且当他们刚离开那里就真的崩塌了的地方工作！更早一些时候，帕特逊法官曾宣布6个工人无罪，所以罗伯茨这个名字渐渐地使那些拥有矿井的治安法官们闻风丧胆。普里斯顿也有受罗伯茨保护的4个人被关在监牢里；2月初，罗伯茨到那里去就地调查这件事，但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些被判刑的人在刑期未滿以前已经释放了。曼彻斯特监禁了7个人；罗伯茨弄到了一个人身保护状，使得法官怀特曼把被告全释放了。普莱斯科特有9个煤矿工人被控破坏了圣海伦斯（南郎卡郡）的安宁而被关在监牢里，听候宣判；罗伯茨一到那里，他们就马上被释放了。这一切都是2月上半月的事情。在4月间，罗伯茨用这种方法从得比监狱中释放出1个煤矿工人，从威克菲尔德（约克郡）监狱中释放出4个，从莱斯特监狱中释放出4个。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些时候，直到这些《Dogberries》〔“道勃雷”〕——人们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烦恼”中的有名人物的名字来这样称呼治安法官——变得老实一些为止。罗伯茨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实物工资制。他把这些恬不知耻的矿主一个又一个地拖到法庭上，迫使治安法官违背自己的心愿来判决他们有罪。矿主们在这个行动迅速、事事出

头的总代理人面前感到十分恐怖，例如在得比附近的拜尔帕地方，一家实行实物工资制的公司在罗伯茨刚到那里的时候就贴出下面这个布告：

“通告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哈斯拉家认为有必要做如下声明：他们矿上所有矿工的工资，将全数以现金支付，矿工们愿意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悉听自便。如矿工在哈斯拉家的铺子里买东西，他们将和过去一样照批发价格买得。但是并不要求他们一定在那里买，不管他们是在这个铺子里或其他任何的铺子里买，他们的工作和工资仍照旧。

本特里克煤矿”

这些胜利在整个英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并为工会吸引来了大批新会员。那时北方仍在继续罢工。没有一个人工作，在输出煤炭的主要港口新堡，煤荒竟严重到必须从苏格兰运进煤来，虽然英国人的谚语“to carry coal to Newcastle”〔“把煤运到新堡去”〕和希腊人所说的“把猫头鹰带到雅典去”一样，意思就是“完全多此一举”。起初，当工会的经费还没有用光时，一切都很好，但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工人就很难进行斗争了。他们穷困不堪；他们没有钱，因为英国所有工业部门工人的捐款和罢工的人数比起来是太微不足道了；他们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小铺老板赊欠；整个报界，除不多的几家无产阶级报刊外，都反对他们；资产阶级，就是其中少数很有正义感并想支援罢工者的人物，也只是从卖淫式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报纸上读到些关于罢工情况的骗人的报道；被派到伦敦去的由12个煤矿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向伦敦的无产阶级募集了一些款子，但是因为需要救济的人很多，所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尽管如此，矿工们仍然坚定不移；而更重要的是，虽然矿主及其奴才们采取狂暴的敌对态度并进行各种挑衅，但是他们仍

然保持安静和沉着。没有采取过一次报复的行动，没有殴打过一个叛徒，也没有发生过一次盗窃。罢工就这样继续了四个月之久，矿主们仍然没有一点占上风希望。但他们面前还有一条道路。他们想起了小宅子制；他们想起了倔强的工人的住宅是老板所有的。7月，他们叫工人腾出房子，一个星期以后，4万人全都被赶到街上去了。他们的残酷的手段是令人髮指的。有病的和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和婴儿，甚至产妇都被他们毫不留情地从床上拖下来，推到公路旁边的沟里去。有一个走狗亲手抓住一个快分娩的女人的头髮，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扔到街上，这样来寻开心。大批军队和警察站在那里，只要有人抵抗或只要指挥这种暴行的治安法官一示意，就立刻动武。但工人们连这也忍住了，没有作任何反抗。矿主们希望工人使用暴力，并竭力用一切手段来引起他们反抗，以便找到借口用军队来结束罢工；但是被赶到街上来的矿工们记住了他们的总代理人的劝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声不响地把他们的家具搬到多沼泽的草地上或收完庄稼的田里，继续耐心地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因为找不着更好的地方，就露宿在公路两旁的沟里；另一些露宿在别人的地段上的，因为“他们造成了半辨士的损失”而受到法庭的追究，被处以1英镑的罚款，他们当然交不出这笔罚款，就只好坐监牢。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这样在去年（1844年）多雨的深夏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除了床上的印花布帐子，他们和婴儿就再没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除了工会的微薄的补助和小铺老板的愈来愈少的赊欠，他们就再得不到其他的帮助。那时，德勒穆的一个拥有很多煤矿的伦敦德雷勋爵曾以他的高贵的愤怒来威吓“他的城市”西恩的小铺老板们，不准他们再赊东西给“他的”倔强的工人。这位“高贵的”勋爵在整个罢工期间成了一

个道地的小丑，因为他老是对工人發布一些傲慢得可笑而文理不通的“命令”，这些“命令”除了成为全国的笑料，就再也达不到别的目的<sup>⊖</sup>。矿主們看到無論什么办法都無济于事，就花了很多錢从工人运动还没有發芽的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偏僻地方，雇人到他們的矿上来工作；这样一来，工人彼此之間的竞争又恢复了，罢工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了。矿主們强迫工人脱离工会，和罗伯茨断絕关系，并接受矿主所提出的条件。煤矿工人对雇主的历时五个月的偉大斗争，被剝削者以值得我們極力称頌的毅力、勇敢、覺悟和理智进行的斗争，就这样在9月初結束了。这样一个4万人的群众斗争，需要多么高度的真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我們知道，1840年“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还把这些人描写成極其粗野的和毫無道德的人。而这种压迫是多么殘酷呵！它把这4万人逼得像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好像一支军队，不仅有紀律而且为一个願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靜和鎮定把斗争一直进行到再反抗下去已經沒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斗争呵，这不是在和看得見的可以击败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在和飢餓与匱乏、貧穷与露宿作斗争，和自己的、由于富人的殘酷而达到瘋狂地步的激情作斗争。假如工人使用了暴力，那末他們，这些手無寸鉄的人，就会遭到槍杀，几天之后矿主就会得到胜利。他們守法并不是由于害怕警察的棍子，而是事先深思熟慮的結果，这是工人的覺悟和自制力的最好証明。

就这样，工人虽然無比地坚强，这一次还是被資本家打败了。

⊖ 天下本無新奇之事，至少在德国是如此。我們的“施杜姆大王”也不过是英国模型的翻版而已，这一模型在它的本国早已被人遺忘，而且不可能存在了。

——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但是斗争并不是没有结果的。首先，持续了十九个星期之久的这次罢工使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工人永远脱离了以前所处的精神睡眠的状态。他们苏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文明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把矿主对工人的一切暴行揭露无遗的这一次罢工，最终唤起了这些工人中间的反抗精神，至少把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而3万个这样坚忍不拔和经得起考验的人，对宪章派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产。其次，在合法的范围内延续了这样久的罢工和伴随着罢工的积极的宣传，毕竟引起了社会舆论对煤矿工人状况的注意。利用对煤炭出口税问题辩论的机会，下院中唯一坚决拥护宪章主义的议员托马斯·邓科布在议会中提出了煤矿工人状况的问题，争得了在下院讲坛上宣读他们的请愿书的机会，并且发表了演说，迫使资产阶级的报刊至少在报道议会的辩论时把全部事情做了正确的描述。这次罢工以后不久，哈斯威尔发生了一次爆炸。罗伯茨来到了伦敦，要求谒见皮尔，并以煤矿工人代表的身分坚决要求彻底调查这次爆炸事件。他终于达到了委派英国地质学界和化学界的第一流权威赖尔教授和法拉第教授去肇事地点进行调查的目的。由于这次爆炸以后不久又发生了好几次爆炸，而且罗伯茨又把关于这些爆炸的记录送给了首相，所以首相答应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也就是今年——1845年——这一次）中，如果可能的话，提出一个为保护工人所必需的各种措施的法案。如果煤矿工人不在这次罢工中表明自己是爱好自由的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不委托罗伯茨来管理他们的事务，那末这一切成就都是不会有的。

北方的煤矿工人被迫解散自己的工会和被迫解聘罗伯茨的消息刚一传出，郎卡郡的煤矿工人就组织了一个约有1万工人的工

会，并保证给他们的总代理人 1 200 英镑的年薪。去年秋天，工会每月收入的款项都在 700 英镑以上，其中约有 200 英镑用做薪俸、讼费等等，其余的大部分是用来补助失业工人或者由于和雇主冲突而罢工的工人。工人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这种觉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它由于工会的建立和 1844 年的罢工，才出现在英国煤矿工人中。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觉悟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就能够和产业工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将会同他们齐头并进。资产阶级脚下的地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覆。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听警告的。煤矿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们更加残酷；他们并不认为这应该使他们更加理智，不认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前进的一步，而认为这只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对这些愚蠢到不同意继续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发泄怒气。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企图——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企图——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来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许多代理人说成是从他们这些穷工人口袋里骗去最后一文钱的狡猾的骗子。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 农业无产阶级

我們在“导言”里已經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已經解体，空出来的小塊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競争所排挤，他們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他們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們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發展是步調一致的，但后来工业發展有些緩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經不容許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貧困現象，也在农业区出現了。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結束了。在战争期間，战区生产縮减、輸入停止以及必須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顛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現在，輸入的阻碍、輸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結果就是英国人所說的 agricultural distress，即农业灾难。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們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資。为了提高粮价，議会在 1815 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 80 先令时，禁止粮食輸入。后来，这个自然是無济于事的法律經過了多次的改变，但是这并没有減輕农业区的貧困。唯一的結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

自由竞争存在时已经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们。但是现在完全变了。雇农几乎全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下，雇农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农场主的庄园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农场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园里给这一代找点活干，当时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那时每一个农场里的工人，严格地说，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在19世纪20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结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从前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而工厂区则成了周期贫穷的发源地，修改济贫法是政府对乡村日益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间工作中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官方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门里也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没



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了。但是农业中的停滞现象维持得愈长久，工人现在身受的打击就愈沉重，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现得愈明显。“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现的，而且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吸收他们。只要产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创造不出来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险的投资，所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资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这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工资没有提高，“多余的”人口没有消失，新法律的残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极端愤怒。甚至最初已经缩减了的济贫捐几年后又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结果就是：以前总共有 300—400 万半赤贫者，现在却有 100 万完全的赤贫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贫者，但已经得不到任何救济了。农业区的贫困每年都在加剧。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整家整户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连这一点钱也没有。有一个自由党的议会议员在 1830 年已经描述了这部分居民的状况，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sup>①</sup>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

<sup>①</sup>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强够做一頓简单的飯，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結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他的妻子和兒女都受冻挨餓，經常害病，無依無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憂慮、沮喪，自然也就貪婪、自私，并且令人討厭。因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看到他們就一肚子气(hates the sight of them)，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篱笆来总还是一个比較好的躲避風雨的地方。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飯，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进行欺詐。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階級中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真正的盜猎者或走私者，但他沒有勇气；可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謊和偷东西。他对較富有的邻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說明这些邻居对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惧怕他們，憎恨他們，但从不敢用暴力去对付他們。他徹头徹尾地墮落了，屈辱得連失望的勁头也沒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風湿病和哮喘病把他帶到習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沒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讓給另一个也将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

我們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农業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較强悍的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較發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同样穷困的生活，但他們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們比較关心家庭，但他們是走私者和盜猎者，常常同森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队發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們更加殘酷無情地反对社会，他們对有产者的仇恨也不亚于第一类人。我們的作者最后說：

“由于礼貌的关系 (by courtesy)，人們就用莎士比亚的話称这类人为‘勇敢的英国农民’(«bold peasantry of England»)。”<sup>⊖</sup>

⊖ 議會議員愛·吉·威克菲尔德“被揭露了的斯温，或农村中縱火的原因”，1831年在倫敦出版的小册子(E. G. Wakefield, M. P. «Swing unmasked, or the Cause of Rural Incendiarism». London, 1831. Pamphlet.)。上面引証的几段話見該書第9—13頁；在翻譯的时候，我們略去了原文中有关当时还存在的旧济貧法的地方。——恩格斯原注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1844年6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记者到这些地方去调查这类人的状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6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1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像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窄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

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lord of the soil»〔“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博爱主义的论调。

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罪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七月革命后，即1830—1831年的冬季，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还在10月初，在萨塞克斯及其邻近的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来，走私就困难了，从而，用一个农场主的话说，使整个海岸区都破产了），由于新的济贫法的通过，由于工资低和使用机器，就已经发生了骚动并且扩展到全区。冬天，农场主场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们

住宅近旁的谷倉和畜圈都被燒毀了。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惶惶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汁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偉大的动力——**贫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生纵火事件。1843—1844年的冬天，纵火事件异常频繁。我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極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纵火事件，并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下面没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極星报”都是我手头没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纵火事件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纸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来。1843年11月25日，“北極星报”报道了两起纵火事件，并引证了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12月16日“北極星报”报道：在培德福德郡，两星期来每夜都发生几次纵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几天有**两处**大农场被燒毀。在劍桥郡有**四处**大农场被燒毀，在哈特福郡有**一处**农场被燒毀；此外，在几个地方还发生了**十五起**纵火事件。12月30日，諾福克发生一起纵火事件，薩福克发生**二起**，艾塞克斯发生**二起**，哈特福郡发生**三起**，柴郡发生**一起**，郎卡郡发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发生**十二起**。1844年1月6日一共发生纵火事件**十起**，1月13日发生**七起**，1月20日发生**四起**。从这以后，该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纵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只繼續到春天，而是一直繼續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刊的报道中看到，1844—1845年的冬天来临时，这种犯罪行为更加普遍起来了。

关于英国的純朴宁靜的农業区中的这种情况，讀者們会說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嗎？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嗎？但是这里的农場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們看不到不能給自己带来現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說，如果廢除谷物法，他将給他們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場主則向工人們說，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們得到人間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無法爭取工人来支持他們一心想实现的幻想。無論工厂工人或农業工人对谷物法的廢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們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廢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經濟制度就会發展到極端；谷物法廢除后，在現存关系的范圍內，进一步發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業工人來說，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輸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談到——农場主不再依賴于土地占有者，換句話說，就是托利党的农場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場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經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績。但是，如果农場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覺的资产者，那末他們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覺的無产者。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業無产者中已开始出現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賴德諾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決議于 1844 年 10 月在他的領地所在地海瓦斯附近举行的會議就証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淡，但是他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說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塊土地，而且他們当面向賴德諾伯爵說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階級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

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sup>①</sup>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Yes, blast him），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总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習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薩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谁也不听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

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話作

---

<sup>①</sup> 亚历山大·索麦维尔的笔名。——编者注

为結束：

“現在我敢斷言，這些人的狀況、他們的窮困、他們對教堂的仇恨、他們對教會的顯貴們的外表上的順從和內心里的怨恨，在英國所有的農村教區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英格蘭的農民向我們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條件下的人數眾多的農業無產階級在農業區里引起的後果，而在威爾士我們卻看到了小佃農的破產。在英格蘭的農村教區里重演着無產者和大資本家之間的對抗，而威爾士農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不斷破產相類似。威爾士的農民多半只是小佃農，他們不能像條件比較好的英格蘭大農場主那樣合算而便宜地出賣自己的農產品，但是他們卻不得不在同一市場上和這些大農場主競爭。同時也應該注意到，許多地方的土壤只適宜於收入很少的畜牧業，而威爾士的農民由於眷戀自己民族的孤獨性，就比英格蘭的農場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們相互間的競爭、他們和英格蘭鄰居的競爭以及這個競爭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們破產到幾乎不能維持生活的程度，而由於他們看不出自己的狀況惡劣的真正原因，他們就把這種原因歸之於各種各樣的小事情，例如高額的通行稅等等。當然，高額的通行稅也妨礙農業和貿易的發展，但是由於每一個承租土地的人都把這些稅算到固定的開支裏面去，所以歸根到底這些稅還是由土地占有者負擔的。此外，佃農們也都極端憎恨新的濟貧法，因為他們本身經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險。1843年2月，威爾士農民日積月累的不滿情緒在有名的“利碧嘉騷動”中爆發出來了。許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塗黑了臉，結成幾個武裝大隊，襲擊了那些在英國用來代替關卡攔路杆的大門，在響亮的歡呼聲和射擊聲中搗毀了這些大門，還打壞了通行稅徵收人的小房子，以神秘的



“利碧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馬登的習艺所。后来，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崗上傳来的号角声引誘着向相反的方向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经过和原因，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極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間孤零零的簡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塊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間存在着劇烈的竞争，地租达到了聞所未聞的高度，竟比英格兰的高1—2倍甚至3倍。每一个打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經分散得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塊土地。虽然大不列顛的耕地有3 200万英亩，而爱尔兰只有1 400万英亩，虽然大不列顛每年出产15 000万英鎊的农产品，而爱尔兰只出产3 600万英鎊的农产品，但是，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却比大不列顛多75 000人<sup>⊖</sup>。这一極不相称的情况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

⊖ 济貧法委员会在1837年的議会會議上所提出的关于爱尔兰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地而进行的竞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经极端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存的土豆已经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 8 500 000 居民中，有 585 000 个当家人过着极端贫困 (destitution) 的生活，根据艾利生郡长所引用的其他资料<sup>⊖</sup>，爱尔兰有 2 300 000 人没有社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无法生活，换句话说，有 27% 的居民是贫民！

这种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找出别的原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原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塊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塊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

---

⊖ “人口原理”第 2 卷。——恩格斯原注

土地出租給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間，有时候甚至有十層中間人夹在里面。有人認為貧穷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繳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經把地租繳給了那个和他訂合同的中間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貧穷表現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結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繳地租，他們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塊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迅速的增加也会在几年內就使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去。那些情况好轉的人养活的孩子，現在由于貧穷和苦难，在幼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說，这种貧穷应归咎于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民的無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貧穷的到来，但它并不是貧穷到来的原因。还有人指出，貧穷的原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屬於新教的国教教会，但是，如果把国教教会取之于爱尔兰人的一切分摊一下，每人还摊不到两个塔勒；此外，什一稅稅款虽然由佃农繳納，但这种稅并不是向佃农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現在，在 1838 年的折現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稅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繳納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农的状况也就沒有得到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說明問題的解釋，还可以举出几百种来。貧穷是現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結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貧穷的某种表現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貧穷本身的原因。在爱尔兰，貧穷以現在这种形式而不以某种其他的形式表現出来，其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民族性格及其历史的發展。爱尔兰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來說是和拉丁民族，和法国人，特別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缺点，我們已經用卡莱尔的話描述过了。現在讓

我們來听听爱尔兰人講的話，他說的畢竟比那位特別偏愛日耳曼性格特点的卡萊爾所說的更接近于真理：

“他們不安靜，但同時也懶惰（indolent），他們机警而又輕率、急躁，沒有耐性而又缺乏遠見；他們生來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馬上報復或立即寬恕，交朋友快，絕交也快；他們天才四溢，但是判斷力却差得可憐。”<sup>⊖</sup>

在爱尔兰人身上，感情和熱情無疑地是占優勢的，理性必須服從它們。爱尔兰人這種重感情的容易激動的性格使他們不能深思熟慮，妨害他們從事冷靜的堅忍的活動。這種人是根本不適宜於從事目前那樣的工業勞動的。所以他們還繼續從事農業，而且還是在最低的水平上從事農業。因為這裡的小塊土地並不像在法國和萊茵河地區那樣人為地由大領地分割而成<sup>⊗</sup>，而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着，所以用投資的辦法來改良土壤是不可想像的。據艾利生計算，要投資 12 000 萬英鎊，才能使愛爾蘭的土壤達到英格蘭那樣本來就不算高的生產率水平。英格蘭移民本來有充分的可能來提高愛爾蘭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們只是極端殘酷地剝削愛爾蘭人民，而愛爾蘭移民卻給英國民族帶來了一種酵素，這酵素將來是會產生結果的；愛爾蘭對英格蘭移民是沒有什麼可以感謝的。

愛爾蘭人民試圖擺脫無法生活的現狀的嘗試，一方面表現為恐怖行動，這種行動在愛爾蘭的農業區里，特別是在南部和西部，現在已成為日常現象：大多數場合是殺害直接的敵人——土地占

⊖ “愛爾蘭的狀況”1807年倫敦版，1821年第2版，小冊子（《The State of Ireland》. London, 1807, 2nd edition, 1821. Pamphlet.）。——恩格斯原注

⊗ 這是一個錯誤。小經濟從中世紀起一直是農業中占優勢的經濟形式。因此，小農經濟在革命前就已經存在了。革命只是改變了土地的所有權：它從封建主手里奪取了土地所有權，直接或間接地把這所有權交給農民。——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有者的代理人 and 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們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塊土豆地拼湊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sup>120</sup>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沒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們說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爭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貧困，而只能表明，爱尔兰貧困的原因应当在國內寻找，而不应当像現在那样認為要到国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实现爱尔兰分离才能使爱尔兰人明白这一事实，这个問題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無論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沒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結束有关爱尔兰的論述，因为 1843 年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經使德国的人們日益了解到爱尔兰的貧困状况了。

这样，我們已經通过不列颠島屿上無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門，观察了他們的状况，并到处發現貧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們看到，不滿情緒如何随着無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滿情緒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組織形式；我們也看到無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們研究了决定無产者的命运、希望和憂虑的根源，并且發現他們的状况沒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們有机会在許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無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們应当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他們的行动。

## 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態度

我在這一章里所談的資產階級，也包括所謂的貴族階級在內，因為說它是貴族階級，說它享有特權，這只是對資產階級而言，並不是對無產階級而言。無產者把它們二者都僅僅看做有產階級，即資產者。在財產特權面前，其他一切特權都算不了什麼。區別只在於狹義的資產者是和工廠無產者、部分地和礦業無產者打交道，作為農場主的資產者是和農業工人打交道，而所謂貴族只是和一部分礦業無產階級以及農業無產階級相接觸。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階級像英國資產階級那樣墮落，那樣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那樣腐朽，那樣無力再進一步。在這裡我指的首先是狹義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反對谷物法的自由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着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sup>①</sup>。

在這種貪得無厭和利欲熏心的情況下，人的心靈的任何活動都不可能是清白的。當然，這些英國資產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

<sup>①</sup> 卡萊爾在他的 1843 年出版於倫敦的“過去和現在”（《Past and Present》，London, 1843）一書中絕妙地描述了英國資產階級及其令人作嘔的貪欲；該書的一部分我已經譯出，登在“德法年鑒”上，希讀者參閱<sup>121</sup>。——恩格斯原注

亲，他們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謂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業关系上，他們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們不像我們的小商人那样討价还价，斤斤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發財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徹斯特街上走，和他談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衛生的建筑体系，談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說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徹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靜靜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別的时候，他說：“and ye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賺很多錢）。再見，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餓，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賺錢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賺錢来衡量，凡是不賺錢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經濟学这門专講賺錢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們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經濟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純粹的經濟关系。厂主是“資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願意讓別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認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場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間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別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經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萊尔所說的，除現錢交易外，他不承認人和人之間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間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現在同样的“現錢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統治，金錢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語言上

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錢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鎊 (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說，他拥有这样一笔錢。誰有錢，誰就“值得尊敬”，就屬於“上等人” (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势力” (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領头的。小商人的氣質渗透了全部語言，一切关系都用商業術語、經濟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 (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邏輯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sup>122</sup> 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許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統治已日漸趋于崩潰。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贅，对它來說，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剝削他人，譬如說，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納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資產階級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無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們利用国家来对付無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認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財主就不关心穷人？他們不是已經創辦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沒有的慈善机关嗎？呵，不錯，慈善机关！你們吸干了無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滿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 (其实你們还給被剝削者的只是他們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無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賤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



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給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讓我們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說的話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徹斯特衛报”上讀到一封給編輯部的信，編輯部把这封信当做極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語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編輯先生！

近来在我們城里的大街上出現了大批乞丐，他們时常企圖用他們那襤褸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嘔的化膿的伤口和殘廢的肢体，以極端無耻的和令人討厭的方式来喚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認为，一个不仅已經付过济貧捐而且还給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錢的人，應該說已經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無耻的糾纏了。如果城市的警察連保証我們安安靜靜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們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稅来供养他們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們这个拥有广大讀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設法消除这种恶劣現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不会白白地施舍，他們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們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說：我为慈善事業花了这么多錢，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們攪扰的权利，而你們就得待在自己的陰暗的狗窩里，不要用你們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經！你們不妨繼續悲觀失望，但是要做得讓人覺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給医院 20 英鎊所換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沒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們”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們”又該怎样呢？人們会說，这封信所說的只是个別情形。不，它正好表現了絕大多数英国资产

階級的想法，否則編輯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則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議，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沒有找到这种异議。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說过，穷人从他們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資產階級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無产者深知飢餓的苦楚，所以他們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們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極欲的資產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資產階級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們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們在政治和政治經濟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資產階級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們只是为了無产階級的利益才希望廢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資，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較低因而工資也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廢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資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調整工資的原則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資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業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維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滿足英国工業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規模扩大一倍也沒有問題；而且从廢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們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業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無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資產者直截了当地說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們只看到廢除谷物法給他們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淺，甚至不懂

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老爷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好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辨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辨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

何各自冒着風險來剝削工人的情形。現在我們來看看資產階級如何以政黨、甚至以國家政權出面來反對無產階級。整個立法首先就是為了保護有產者反對無產者，這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因為有了無產者，所以才必須有法律。這一點雖然只是在少數法律條文里直接表現出來，——例如取締流浪漢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無產階級不受法律的保護，——但是敵視無產階級却是法律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因此法官，特別是本身就是資產者並且和無產階級接觸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會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這種意圖。如果關係被傳到，或者更正確些說，被請到法庭上來，法官便會因為打攪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並且盡力使訴訟變得對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給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對此表示極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結果是罰他一筆微不足道的罰款，資產者輕蔑地把錢往桌上一扔，就揚長而去。但是，如果是一個窮鬼被傳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幾乎總是先被扣押起來，和其他許多像他一樣的人一起過一夜；他一開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罵，他的一切辯護只得到一個輕蔑的回答：“呵，我們懂得這些借口！”最後是被處以罰款，可是他付不出這一筆錢，於是只好在監獄里做一個月或幾個月的苦工來抵罪。即使不能給他加上任何罪名，他還是會被當做流氓和游民（a rogue and a vagabond——這兩個詞幾乎總是連在一起用的）送進監牢。治安法官的偏袒行為，特別在鄉間，實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這種行為已司空見慣，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報紙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評論地登了出來。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別的做法。一方面，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來解釋法律，而另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資產者，他們首先認為本階級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礎。治安法官是這樣，警察

也是这样。無論資產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無产者却粗暴而又殘酷；貧穷本身就已經使得無产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無产者來說，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闖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毆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請了辯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請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無产者說来是多么微小，無产者經常被迫肩負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無产阶级，有产阶级現在还在議會里不断地向那些还没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議員的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塊接一塊地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無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損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驢、放猪或放鵝，孩子們和年輕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兒游玩和欢跳。現在这种事情愈来愈少了，穷人的收入日益减少，年輕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館去。議會每次开会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条例。1844年的議會會議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壟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鐵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車費（降到1辨士1英里，約合5銀格罗申1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車旅行，并为此建議各鐵路綫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車，这时，“可敬的教父”倫敦主教却建議把星期日，把在業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許闊人旅行，不許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議太露骨太公开，实在無法通过，因此才被否决。可是采取隱蔽方式侵犯無产阶级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議會會議期間所發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會議上所發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沒有名声的議員迈尔斯先生提

出了一个調整主僕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無可非議的。政府贊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給一个專門的委员会去审理。那时英格兰北部發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無罪的工人胜利地遍走全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項专橫到極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上或書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絕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 (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 (any) 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証詞——即根据原告的証詞——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無比的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議會正在討論十小时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轟轟烈烈的宣傳鼓动工作。工人們开了几百次会，給無产階級在倫敦議會里的辯护人托馬斯·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請願書。除“青年英国”的代表弗兰德外，邓科布是唯一極力反对这个法案的議會議員。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們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科布靠攏，自由資產階級看到工人的激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憤面前，根本也沒有一个人特別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地破产了。

但資產階級对無产階級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馬尔薩斯的人口論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貧法。关于馬尔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过好几次了。現在我們再来簡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滿着穷困、匱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們就分为不同的階級，有些比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則

比較窮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結論（而且这个結論是馬尔薩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業和济貧金实在是毫無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維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們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資也因他們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貧所給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無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銷路，一个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換句話說，济貧所这种事業是在損害私人工業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因此，問題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縮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馬尔薩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認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資料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了一个詩人的話：穷人來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馬尔薩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滾蛋 (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沒有事先問一下社会是否願意接受他”。这一理論現在已成為英国一切真正的資產者心爱的理論，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論對他們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現存关系下它在許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問題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簡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餓死，并同时阻止他們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簡單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須使“过剩人口”承認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願餓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資產階級已經費尽心机，使工人們相信自己沒有用处，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無产者却坚决相信，他們有勤劳的双手，他們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無所事事的有錢的資本家先生們，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無产者不得不听憑法律宣布他們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們自己并不願意承認这一点。新济貧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1601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貧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則出發：照顧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責任。誰沒有工作，誰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認為教区有責任不讓他們餓死。他們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資產階級对此終于感到厭煩了。1833年，当資產階級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業区的貧困又达到頂点的时候，他們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貧法。他們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調查济貧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發現农業区的整个工人階級都变成了貧民，他們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貧金过活，或在工資低的时候領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結論：这个制度养活了失業工人，帮助了工資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撫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認穷人有被保护的權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業發展，鼓勵人輕率結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銷人口增长对工資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誠实的人不願意工作，使懶惰、放蕩和輕佻的人得到鼓勵；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經常阻碍資本的积累，耗費現存的資本，并使納稅人破产；此外，它还給私生子發撫育費，这簡直是在發私生子的獎金”（摘自济貧法委员会的报告）<sup>⊖</sup>。

这一段对旧济貧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勵懶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

⊖ “济貧法委员会所获得的情报資料的摘要” 1833年倫敦官方版（《Extracts from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Poor-Law-Commissioners》. Published by Authority. London, 1833）。——恩格斯原注



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那套理论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sup>①</sup>，并极其残酷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彻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则，所以他们很想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诚然，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不妨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用

<sup>①</sup> 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是古希腊的强盗，他把俘虏绑在铁床上，身体比床长的，把足切断，比床短的，就用力拉得和床一样长。——译者注

来警戒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新的济贫法，1834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巴士底狱”(poor-law-bastilles)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要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赠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

了使这些巴士底獄中的貧穷傳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絕，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許可才能在特別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監視或許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規定，食物应当是衛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显了，以致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貧法委员会的委員們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認為可以只实行原則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錯了。法律条文对住在習艺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規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實質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習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監獄，把住習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無济于事。实际上官吏們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1843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習艺所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由于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海恩的習艺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在这里显然是經常采用的。这个習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記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话結束的：

“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們惩罚人的貧穷一样，那末，亚当的子孙們該是多么可怜呵！”

1843年11月，萊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的習艺所里放出来两天就死掉了。这个習艺所对待穷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愤的。上面談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沒有得

到治疗。習艺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来压。他吃的是習艺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訴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習艺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讓給丈夫，竟挨了一頓罵，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沒有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請求，他們夫妇俩一起被放出来了，他离开習艺所时还挨了一頓臭罵。过了两天，罗伯逊就在萊斯特死掉了。据驗尸的医生証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無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習艺所的时候，才交給他几封附有匯款的信，这些信已在習艺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習艺所的規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習艺所中發生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1843年12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員去調查。他查明，有4个流浪汉（trampers——我們在上面已經解釋过这个名詞）<sup>⊖</sup>被剝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閉室（blackhole）里；他們在这里已經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們常常挨餓，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習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閉：先是被关在一間又潮湿又狹小的拱形的儲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閉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閉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時間，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業者特別禁閉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員去調查的时候，还發現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縮成一团的男孩子，他們在那里已經有四天

⊖ 見本卷第503頁。——編者注

了。坐禁閉室的人数常常多到 7 个，而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閉室里的則往往有 20 人之多。女人也經常因拒絕上教堂而被罰坐禁閉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閉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曉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藥的时候發生的！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瘋人院的懲罰。1844 年 1 月在薩福克的拜克頓的習艺所里也进行了一次調查，發現一个白痴似的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極其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們在夜里值班，就用繩子把那些不安靜的或夜里常常起来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倫敦的聖潘克拉斯的縫制廉价衬衣的習艺所里，一个患羊癩瘋的男人在發病的时候悶死在床上，誰也沒有去搭救他。在这个習艺所里，一張床上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小孩子。在倫敦的邵尔底治的習艺所里，曾有一个男人和一个發高燒的病人挤在一張爬滿了虫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倫敦的拜特納-格林的習艺所里，所方不讓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到習艺所的房子去住，从 1844 年 2 月 28 日到 3 月 20 日一直把她和她的不滿两岁的孩子鎖在会客室里，里面既沒有床，也沒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带进了習艺所，当他請求把他妻子釋放出来时，所方便認为他行为卤莽而把他关了二十四小时禁閉，吃的只有水和面包。1844 年 9 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的習艺所里有一个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馬上到斯劳去探望，她在夜里十二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習艺所，但是所方竟不讓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許和自己的丈夫見面，時間只有半小时，而且还有女管理人在場；以后几次会面时这个女管理人也都在場，一到時間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尔頓的習艺所里，一間

屋子睡 12 个人，有时甚至睡 18 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的约束，而受较早的专门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约束。管理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1844 年 7 月 31 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也弯不过来，实在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一种比较适合于他的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他被判处在监狱里做两个星期的苦工。1844 年 2 月，在巴斯弗德的习艺所里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床单已有十三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则有两个月到十个月没有换了，因而 45 个男孩子中只有 3 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铺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脏水桶中洗涤。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 4 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的从一个分所里带出一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潭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 14 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末，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

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 1838 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替 8 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获得像在英格兰同样的意义，它也

会引起穷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 250 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 8 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个别地方，都没有济贫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谁也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 in corpore [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1844 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 1844 年通过的 Poor-Law-Amendment-Bill [济贫法修正案] 中对它做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sup>⊖</sup>。

---

⊖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提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的激进党人，他们差不多就是宪章主义者，例如，下院议员埃士顿的亨得利厂主和托德摩尔登（郎卡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社的团体，这些人中有议会议员迪斯累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sup>123</sup>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

“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说道：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

---

里、波尔斯威克、弗兰德、约翰·曼诺斯勋爵等等。艾释黎勋爵和他們也有密切的关系。“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旧时的«merry England»（“美好的英国”）以及它的光辉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起来反对现存的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他们有勇气承认现存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的托马斯·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就比上面谈到的所有那些人都进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摸索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我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对他寄以最美好的愿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庸人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况下，即使廢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廢除的)，外国的工業，首先是美国的工業，也能够經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業正在加紧發展，美国的工業已經大規模地發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資源，有巨量的煤鉄蘊藏，有無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別是有坚毅而活躍的居民，和他們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質的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建立了工業，目前在粗棉紡織品(英国工業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經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經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場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貨也和英国貨一样地銷行了。其他工業部門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業壟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業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內發生)，那末無产階級大多数都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們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餓死，或者革命。英国資產階級看到了这种前途嗎？剛剛相反，他們最寵爱的經濟學家麥克庫洛赫从書房里教导他們說，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年輕的甚至連人口也沒有达到应有数字的国家也能够順利地从事工業活动，尤其是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業国竞争。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嘗試的話，那他們簡直就是發瘋，因为这样做只会賠錢。最好还是讓他們去从事農業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种起来的时候，他們順利地从事工業的日子或許就会到来。聰明的經濟學家这样說，整个資產階級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把市場一个一个地搶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美国投机分子甚至大胆地把一批美国貨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又順順当当地作为出口貨抛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業的壟断权，假定他們的工厂的数目会繼續增加，結果又将怎样呢？商業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着

工業的發展和無产階級人數的增加而日益尖銳、可怕。隨着小資產階級的不斷破產，隨着資本迅速地向少數人的手里集中，無产階級的人數將按照幾何級數增加起來，使整個民族，除少數百萬富翁外，很快都成為無产階級。但是，在這種發展的進程中必將有這樣一個時機到來，那時無产階級將看到，他們要推翻現存的社会秩序是多麼容易，於是革命就跟着到來了。

然而事變很可能不沿着這兩條道路發展。商業危機（它是促進無产階級獨立發展的最強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國的競爭和中等階級的日益破產將加速整個進程。我不相信人民會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機。1846年或1847年行將到來的危機，想必會促成谷物法的廢除和憲章的通過。憲章將引起什麼樣的革命運動，現在還很難說。但是在這次危機之後和下一次危機之前（按過去的危機類推，下一次危機應當在1852年或1853年到來，雖然它的到來可能因谷物法的廢除而推遲，或因外國的競爭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國人民大概會對順從地忍受資本家的剝削或在資本家不需要他們的時候就去餓死這樣的事情感到厭惡。如果到那時英國資產階級不變得聰明些（按所有的跡象來判斷，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會到來，這次革命將是過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絕望地步的無产者將要像斯提芬斯向他們宣傳過的那樣去放火；人民復仇的怒火將迸發出來，來勢之猛就連1793年也不能與之相比。窮人反對富人的戰爭將是人們之間進行過的一切戰爭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戰爭。即使資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轉到無产階級方面來，即使資產階級的習氣普遍地改好了，也都無濟於事。要知道，整個資產階級的观点的改變至多也只能達到不徹底的*juste-milieu*〔中庸〕的程度；那些較堅決地歸附於工人的資產者會形成

新的吉倫特派，这一派別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階級的偏見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狹隘而自私的英国資產階級尤其不会这样做。我們可以滿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結論，因为这些結論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發展的無可爭辯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預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發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經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說将取决于資產階級的發展，倒不如說将取决于無产階級的發展。無产階級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殘酷性将愈少。在原則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之間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認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認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認為，無产階級对他們的奴役者的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業，而是全人类的事業。沒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認為某个資產者在現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現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別人的原則出發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們現在的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憤怒今后仍然表現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無論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結果)，在他們反对資產階級的發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無产階級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現在这已經不可能了，太

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国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

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

Enrolled under Acts of Parliament, 18 Geo. IV. c. 36, and 4, 5, Wm. IV. c. 44.

“ANY GENERAL CHARACTER, FROM THE BEST TO THE WORST, FROM THE MOST IGNORANT TO THE MOST ENLIGHTENED, MAY BE GIVEN TO ANY COMMUNITY, EVEN TO THE WORLD AT LARGE, BY THE APPLICATION OF PROPER MEANS, WHICH MEANS ARE TO A GREAT EXTENT AT THE COMMAND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OSE WHO HAVE INFLUENCE IN THE AFFAIRS OF MEN.”—Lubbock's Essay.

W. JOHNSON, PRINTER, LITTLE RED BIRD COURT, CHANCERY-LANE, LONDON.

No. 25. Vol. VI. Third Series.

SATURDAY, DECEMBER 13, 1864.

PRICE 2s.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現在給貴報<sup>124</sup>寄上短文一篇，想来貴国同胞听到我們的共同事業在海峡这边进展的消息一定会感到高兴。同时我也高兴我能够指出，虽然德国人通常在討論社会改革問題方面总是相当落后，但是他們現在正在努力弥补自己虚度了的时间。的确，社会主义在我国傳播之快簡直是一个奇迹。四年前这里总共只有两个人对社会問題感兴趣，一年前才出版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sup>125</sup>。在国外，德国共产主义者确实有几百人，但是他們都是工人，他們的影响不大，不可能在“上層階級”中推广他們的刊物。此外，社会主义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还遇到重重的障碍：政府实行書报檢查，集会和結社沒有自由，政府頒布专制法令，設置秘密法庭，雇佣法官惩办一切胆敢用任何方式促使群众思考問題的人。尽管障碍这样多，但是德国現在的情况怎样呢？过去只有两个人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或者对这个問題毫無兴趣的群众写文章介紹社会主

义，現在我們已經有几十个有才干的作家向成万个渴望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一切的人宣傳新的学說。我們有几家激进（在書报檢查制度所容許的範圍內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其中首推“特利尔日报”<sup>126</sup>和威塞尔的“發言人报”<sup>127</sup>；在巴黎，我們在出版自由的情况下發行了一張报纸<sup>128</sup>。除了直接受政府影响的期刊外，沒有一个刊物不是每天都在頌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我們的死敌沒有勇气公开反对我們，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对待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傾向的运动，只要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就行。到处都出現了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以及帮助他們进行自我教育的协会，并且还有些普魯士政府的高級官員也積極地参加了这些协会的活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德国已經是一个提到日程上来的問題了。一年来已經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成长起来；各个政党都对他們表示尊敬，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他們面前討好卖乖。到目前为止我們的力量仍然靠中等階級，——这一事实或許会使英国讀者大为吃惊，假使他們不明了德国的中等階級远沒有英国中等階級那么自私、偏頗和愚笨（这只是因为他們不那么富有）的話。但是我們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階級中找到支柱；显然不論何时何地工人階級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而且工人階級已經被穷困、压迫、失業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工業区的起义所惊醒，他們不再那样昏睡不醒了。因此請允許我提一下优秀的德国画家許布納尔的一幅画；从宣傳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織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絕望的穷困作了鮮明的对比。厂主胖得像一只猪，紅銅色的臉上露出一付冷酷相，他輕蔑地把一个妇人的一塊麻布抛在一

边,那妇人眼看出售無望,便昏倒了;她旁边圍着两个小孩,一个老头吃力地扶着她;管事的在檢驗另外一塊麻布,这块布的主人正在焦灼地等候檢驗的結果;一个青年正在把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可怜的收入給失望的母亲看;在石头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头、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他們在等着輪到自己;两个男人,一个人背着一塊沒有驗上的麻布,正从房子里出来,其中一个怒气冲冲地搖晃着拳头,另一个把手擱在他的同伴的肩上,指着天,好像在說:別生气,自有老天爷来懲罰他。所有这些情景都出現在一間冷冷清清的、像是沒有人住的外厅中,外厅的地面是石头鋪的,只有厂主一个人是站在一塊小毡墊上。在画面的远处,在柜台后面展現出来的是一个陈設極其講究的賬房,华丽的窗帘,明亮的鏡子;几个办事員正在那里写什么,絲毫沒有注意他們背后所發生的事情;老板的兒子,一个年輕的花花公子斜倚着柜台,手里拿着馬鞭,嘴里刁着雪茄,冷眉冷眼地瞧着这些不幸的織工。这幅画在德国好几个城市里展覽过,当然給不少人灌輸了社会的思想。同时我們也非常滿意地看到,我国优秀的历史画画家卡尔·莱辛已經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經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就是今天早晨,我在一張自由派的报纸(“科倫日报”<sup>129</sup>)上讀到一篇文章,該文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攻击,作者就在这篇文章中为自己辯护。但是他怎样辯护呢?他說他是社会主义者,就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希望从政治改革着手,而我們却希望立刻取得一切。但是要知道,“科倫日报”就其影响和發行面来說是德国第二大报。奇怪的是(至少在德国北部是如此)無論在輪船上、火車車廂里或是邮車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他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的思想,同意必須



采取某种措施来改造社会。我刚从附近的几个城市旅行归来，没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碰到五个以至十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在我自己的家——这是一个真正虔诚而善良的家庭——中，我就可以数出六个甚至更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每一个都不是因为受其余的人的影响而转变的。我们在各种人当中，在商人、厂主、律师、官吏、军官、医生、编辑、土地承租人等等当中都有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大量刊物正在印刷中，虽然暂时还只出了三四种。如果我们能在最近四五年内取得像这一年当中所取得的那样的成就，那末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你知道，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都正在成为实践的事业家。事实上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人受托参照欧文、傅立叶等人的计划并利用美洲各移民区及你们的“和谐”移民区<sup>130</sup>（我希望它繁荣壮大）的经验来拟定一个组织及管理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将发到各地去讨论，并将和各地提出的修正意见一起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现在在科伦的莫·赫斯博士，巴黎的卡·格律恩博士，巴门（在莱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里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奥·吕宁博士，科伦的海·皮特曼博士等等。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下面就是这首歌<sup>131</sup>；

在他們悲憤的眼里不見一滴泪珠，  
 他們坐在織机旁，絕望的情怒呈現在臉上。  
 “我們已飽經折磨和冻餓；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們正為你織着寿衣，  
 把三个詛咒織在寿衣上。

我們織呵，織呵！

“一是詛咒上帝，那耳聾眼瞎的上帝。  
 我們信賴他，像孩子信賴他們的父亲，  
 我們對他滿怀着希望和信任，  
 可是他却嘲笑我們，欺騙我們。

我們織呵，織呵！

“二是詛咒那富人的国王，  
 我們的苦楚絲毫不能打動他那鉄石心腸。  
 他搶走了我們的最后一文錢，  
 還要派兵來把我們当狗一样槍杀。

我們織呵，織呵！

“還要詛咒那虛偽的祖国，  
 它給我們的只是痛苦和耻辱，  
 我們在它那里飽經飢餓和困苦，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們正為你織着寿衣。

我們織呵，織呵！”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詩歌之一；这次我也就此和你告別；希望不久我就能告訴你有关我們的进展和社会著作的消息。

您的誠摯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11月9日左右

按报纸原文刊印

載于1844年12月13日

原文是英文

“新道德世界”第25号

several others. Besides those, Henry Heine, the most eminent of all living German poets, has joined our ranks, and published a volume of political poetry, which contains also some pieces preaching Socialism.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celebrated *Song of the Silesian Weavers*, of which I give you a prosaic translation, but which, I am afraid, will be considered blasphemy in England. At any rate, I will give it you, and only remark, that it refers to the battle-cry of the Prussians in 1813:—"With God for King and fatherland!" which has been ever since a favourite saying of the loyal party. But for the song, here it is:—

Without a tear in their grim eyes,

They sit at the loom, the rage of despair in their faces ;

"We have suffered and hunger'd long enough ;

Old Germany, we are weaving a shroud for thee :

And weaving it with a triple curse.

"We are weaving, weaving !

"The first curse to the God, the blind and deaf god,

Upon whom we relied, as children on their father ;

In whom we hoped and trusted withal,

He has mocked us, he has cheated us nevertheless.

"We are weaving, weaving !

"The second curse for the King of the rich,

Whom our distress could not soften nor touch ;

The King, who extorts the last penny from us,

And sends his soldiers, to shoot us like dogs.

"We are weaving, weaving !

"A curse to the false fatherland,

That has nothing for us but distress and shame,

Where we suffered hunger and misery—

We are weaving thy shroud, Old Germany :

We are weaving, weaving !

With this song, which in its German original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oems I know of, I take leave from you for this time, hoping soon to be able to report on our further progress and social literature.—Yours sincerely,

AN OLD FRIEND OF YOURS IN GERMANY.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的一頁，上面載有  
弗·恩格斯翻譯的亨·海涅的“西里西亞織工之歌”



## 二

1845年2月2日于巴門

自从上次給你去信后，共产主义的事業仍然在迅速进展，就像在184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一样。不久以前我訪問了萊茵河上的几个城市，到处我都看到，从我上次訪問以来，我們的思想又占据了一些障地，并且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障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們都在無比热情地討論和傳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普魯士的一切城市都举行了許多公开的集会，目的是要成立协会来制止貧困、愚昧和犯罪的現象在广大居民中滋长。政府起初是支持这些集会的，可是当这些集会显得过于独立不羈时，它就立刻开始和它們为难。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集会已經使大家注意社会問題，并且已經为傳播我們的原则做了很多工作。在科倫举行的大会上，几位知名的共产主义者的演說激起了極为热烈的情緒，當場就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协会的章程，而且在选出的委员会中徹底的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章程的基础当然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組織劳动，保护劳动，使它不为資本的势力所侵害，如此等等，而且这个章程几乎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政府自然沒有批准这件事（在我国成立任何协会都得經政府批准），但是此后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問題在科倫就到处都在討論了。在爱北斐特宣布的协会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都應該分享科学的成果。但是协会的章程还没有得到政府的

批准，很可能也会遭到科倫章程的命运，因为牧师們想使协会从屬于市内布道区的計劃被大会否决后，他們就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政府是会查禁自由派的协会，支持牧师們的組織的。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已經提出来的問題現在正在全市範圍內展开討論。在閱斯德、克列維、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中也建立了协会；未来的結果如何，讓我們等着瞧吧。至于共产主义的書刊，科倫的海·皮特曼出版了一个集子<sup>132</sup>，其中除了其他一些論文之外，都是描写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們在汉普郡的移民区的文章，这对于消除那种認為我們的思想無法實現的偏見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皮特曼先生还刊登了一个季刊<sup>133</sup>的出版計劃的广告，創刊号預計在今年五月里出版；它将全部用来宣傳我們的思想。科倫的赫斯先生和巴門的恩格斯先生准备另外再出版一个月刊<sup>134</sup>，創刊号将在四月一日出版；这个刊物将全部用来刊載那些表明現代文明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的事实，利用雄辯的事实来宣傳徹底改造的必要性。馬克思博士在短期內将出版一部新著，內容是对政治經濟学原理和整个政治的批判<sup>135</sup>。法国的保守政府已迫使馬克思博士离开巴黎。他打算迁往比利时，如果普魯士政府（就是它促使法国政府驅逐馬克思的）还要跟踪追到那里报复他，那他就只好到英国去了。但是从我上次給你去信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学家費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不久以前我們的一个朋友到他隱居的乡村——巴伐利亚一个偏僻的角落去拜訪他，費尔巴哈告訴他說：他深信共产主义不过是他所宣布的原則的必然結果，而且實質上不过是他很久以前在理論上所宣布的东西的實踐。費尔巴哈說，沒有一本書像魏特林的“保證”<sup>136</sup>第一卷那样使他感到欣慰。他說他从来不把自

己的书献给任何人，但是他很想把他的下一部著作献给魏特林。这样，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和德国工人（以魏特林为代表）的联盟，即马克思博士一年前所预言的联盟<sup>137</sup>，就快要实现了。如果我们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2月2日

按报纸原文刊印

载于1845年3月8日

原文是英文

“新道德世界”第37号

## 三

亲爱的先生！

前一个时候，由于某种原因，我無法写信告訴你关于德国的情况；现在我来繼續我的报道，希望这些报道能引起貴报讀者的兴趣，并且希望連續写下去，避免过去那样長時間的中断。我能够告訴你們，我們取得了像我上次給你們去信时那样的十分迅速而踏实的进展，非常高兴。自从我上次給你們去信以后，普魯士政府就認為繼續支持“劳动階級状况改进协会”是一种危險的事情。它發現各地的这些协会都被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东西感染了，因此它用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办法来鎮压它們，或者至少是阻止它們發展。另一方面，这些协会的大部分成員都是資產者；一談到他們在改善劳动者的状况方面所能采取的步驟，他們就茫然了。他們提出来的办法，例如成立儲蓄銀行、給优秀工人頒發奖金和奖品等，很快就被共产主义者証明是毫無用处的，并且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公开的嘲笑。这样，資產階級想用伪善和假慈悲来欺騙工人的企圖就絲毫沒有得逞，反而給我們造成了一些在家长式的警察統治的国家里很难得到的机会，結果是政府和資本家奔忙而我們却得到了好处。

但是还不仅是这些集会被用来宣傳共产主义而已，在萊茵普魯士的工業区中心爱北斐特，还定期举行共产主义的集会。这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被一些最有身分的人物請去和他們討論共产主



义的原则。首次会议是在二月里举行的，私人的性质比较多一些。到会的人有四五十个，其中包括总检察长、法院的其他人员以及几乎所有的大工厂和大商号的代表。赫斯博士（他的名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贵报上提到过）宣布开会，建议选举共产主义者克特根先生做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接着就是赫斯博士发表演说，他讲的是社会的现状和抛弃旧的竞争制度的必要性，他认为竞争制度就是公开抢劫的制度。他的演说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座的人中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接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不久以前他在贵报发表过几篇有关共产主义在大陆上的情况的文章<sup>138</sup>）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性和优越性<sup>⊖</sup>。他举了有关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们的“和谐”移民区的一系列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断。接着就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辩论，在辩论中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上述的两个发言人和其他几个人，站在反对方面的有总检察长和文学家贝奈狄克斯博士等人。会议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一点钟才散。

第二次会议是一星期以后在该市最好的一个旅馆的大厅中举行的。大厅里挤满了当地的“有身分的”人物。上次会议的主席克特根先生讲了一下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未来的社会制度及其远景；接着是恩格斯先生发表演说<sup>⊖</sup>，他在演说中证明了（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现状不能不在短时间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种无法避免的革命用任何发展工商业的办法都防止不了，防止这种革命（它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振荡都更加猛烈）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并为这种制度的实现

⊖ 見本卷第 602 頁。——編者注

⊖ 見本卷第 617 頁。——編者注

做准备。在这次辯論会上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几个律师，他們是从科倫和杜塞尔多夫赶来参加的。这次辯論会仍然开得很热烈，一直开到半夜。会上还朗誦了杜塞尔多夫的弥勒博士写的几首歌頌共产主义的詩，弥勒博士当时也出席了大会。

一星期后举行了第三次會議，会上赫斯博士又發表了演說，另外还宣讀了几篇从一个集子里选出来的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閉会前仍然展开了討論。

几天后城里謠傳警察将要解散下次會議，逮捕会上的發言人。爱北斐特市市长真的跑到旅館老板那里去，威胁他說，如果他再允許在他的旅館里举行这类集会，就要撤銷他的營業執照。共产主义者立刻就此事詢問市长，可是就在應該举行下次會議的前一天得到了通知，通知是給赫斯先生、恩格斯先生和克特根先生的；地方当局在通知書里引証了一大堆習慣法和成文法，宣布这类集会是違法的，并且威胁說，如果不停止，他們就要用武力来解散它。會議在下一个星期六举行了；市长和总檢察长（从第一次會議后他就不在这些会上露面了）都出席了會議，陪同他們来的是一队从杜塞尔多夫用火車运来的武裝警察。在这种場合下当然沒有人發表演說，到会者都只管喝酒、吃牛排，沒有給警察任何干涉的借口。

这样的措施只会有助于我們的事業，因为政府那样的重視，使那些从来沒有听說过这个問題的人都对这个問題發生了兴趣。那些参加了辯論会但是根本不了解我們的观点或者甚至对它抱嘲諷态度的人，大多数都对共产主义怀着尊敬的心情回家。这种尊敬部分地也是由于我們这一群人在会上显得很有身分而引起的，因为該市所有的名門富家几乎都有自己家里的人或亲戚出席，和共产主义者同坐在一个大餐桌上。总而言之，这几次集会对整个工

業区的輿論所起的影响确实是惊人的；几天以后就有人向那些發言贊成我們的事業的人索取書報，以便从中了解整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据我們了解，會議的全部文件不久就会出版。

至于共产主义的書刊，在这方面已經展开了广泛的宣傳活动。群众确实渴望得到消息；他們正在吞食有关这一問題的一切新書。皮特曼博士出版了一本論文集，其中收有：赫斯博士論現代社会的貧困現象及消除此种現象的办法的精彩著作、一篇詳細描写西里西亚工人的貧困状况的文章（文中还概述了去年春天該地發生的起义）、其他几篇描写德国社会状况的論文以及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和諧”移民区的通訊（这篇通訊是弗·恩格斯根据芬奇先生的書信和一篇署名为“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sup>①</sup>的文章編写的）。这本集子虽然遭到普魯士政府的追究，但是各地却很快就銷售一空。另外还創辦了一些月刊，这就是“威斯特伐里亚汽船”<sup>139</sup>（在比雷菲尔德出版，呂宁發行，載有論社会主义的通俗論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人民报”<sup>140</sup>（在科倫出版，具有較明确的社会主义傾向）和“社会明鏡”（在爱北斐特出版，赫斯博士發行，專門揭發有关現代社会状况的事实和保衛劳动階級的权利）。此外，皮特曼博士还創辦了一个季刊，叫做“萊茵年鑒”，該刊的創刊号正在印刷中，很快就要出版。

另一方面，德国有一些哲学家不願从他們的純粹理論中做出实际的結論，硬說人只應該玄想形而上学的問題，現在我們向这些人宣战了。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出版了一本著作，詳細地駁斥了布魯諾·鮑威尔所坚持的原則<sup>⊖</sup>，赫斯先生和畢尔格尔斯先生

① 見本卷第 557 頁的編者注。——譯者注

⊖ 見本卷第 7—268 頁。——編者注

現在正在着手駁斥施蒂納的理論。鮑威尔和施蒂納是德国抽象哲学的最終結論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宁可說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人物；因为社会主义一詞在德国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所具有的各种不明确而且也無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这些人認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是否就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

馬克思博士的“政治和政治經濟学批判”、恩格斯先生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sup>⊖</sup>、一本論共产主义的論文集——“軼文集”<sup>141</sup>也已經在印刷中；另外，最近我們將着手翻譯英法两国的論社会改造問題的優秀著作。

由于德国的政治情况很恶劣，由于它的家长式的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中間，除文字上的联系外，要建立任何联系都几乎不可能。一些期刊，主要是“萊茵年鑒”，就成了那些在报刊上坚持共产主义的人的中心。通过来往的旅客还維持着某种联系，但是也就止于此了。結社是違法的，甚至通信也不安全，因为近来“秘密机关”的活动特別頻繁。因此，我們只是从报上知道在波茲南和西里西亚的山中有两个共产主义的組織存在。据說，在普屬波兰的首府波茲南，有一群青年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則組織了一个秘密团体，准备占据該城；后来密謀被發覺，因此計劃沒有实现。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情况。但是不管怎样，下面的事实却是可靠的，这就是：有一大批出身于波兰的貴族和富豪家庭的青年被捕了，此后（两个多月）所有的崗哨都加强了一倍并荷槍实彈地守护，两个青年（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九岁）即

---

⊖ 見本卷第 269—587 頁。——編者注

雷馬尔凱維奇弟兄已經潛逃并且直到現在還沒有被当局拿获。被捕的人中大部分是十二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另外一个所謂的密謀是在西里西亞山中，据說規模很大，也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密謀者似乎打算夺取施魏德尼茨的堡垒，占据整条山脉，从那里来号召整个德国的受苦受难的劳动者。至于这些消息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沒有人能下判断，不过就在这个倒霉的地区也有根据警探告密逮捕人的事情發生；富有的厂主施略費尔先生已經被押解到柏林，現在正在那里受审，因为他被認為是上述密謀的主使人。

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德国工人中的共产主义者的协会仍然很活躍，虽然他們在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地方受到了警察的迫害。据报載，日内瓦共产主义协会的會員約有 60 个被驅逐出該市和該州。一位最有天賦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奧·貝克尔出版了他在洛桑發表的演說；演說的标题是“共产主义者要求什么？”<sup>142</sup>；这篇演說可以列為我們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最优秀、最有力的著作。我敢說这篇演說是值得譯成英文的；如果貴报讀者中有通曉德語的人來从事这一工作，那我就太高兴了。当然这只是一本小册子。

我希望能經常不断地給你們报道消息。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 1845 年 4 月 5 日左右

按报纸原文刊印

載于 1845 年 5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新道德世界”第 46 号

## 弗·恩格斯 在爱北斐特的演說

1845年2月8日的演說

諸位先生！

正如你們剛才听到的，我想，本來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競爭的世界里。現在讓我們稍微詳細地研究一下這種自由競爭和它所造成的社會秩序。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每一個人都在單槍匹馬地冒着風險工作，每一個人都在竭力使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不理会別人在干些什麼。这样就談不上合理的組織，談不上分工。相反，每一個人都想超過別人，都想尋找一個好的機會來謀取私利，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各個資本家同其他一切資本家進行鬥爭，各個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進行鬥爭；所有的資本家反對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羣眾也必然要反對資本家集團。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種到處都很混亂、到處都在剝削的現象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但是這種混亂的經營方式最後必定使社會得到最悲慘的結局；作為社會基礎的無組織狀態和卑視真正的公共福利的態度，遲早總會最明顯地暴露出來。這一鬥爭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小資產階級即在前一世紀構成國家的

主要基础的等級破产了。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資本的勢力如何在摧毀社会的这一个階級。就拿独立的裁縫和制造家具的木匠來說，由于服裝店和家具店拉走了他們的最好的顧客，于是他們就逐漸从小資本家，从有产階級的一員变成依靠別人、为別人工作的無产者，变成無产階級的一員。小資本階級的破产就是人們贊揚备至的工業自由所引起的悲慘的后果；这是大資本家对實力較差的竞争者保持的优势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資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的最明显的表现。資本的这种趋势已經为許多人所承認；到处都在抱怨財產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的人民却愈来愈貧困。这样，在一小撮富翁和無数的穷人之間，就产生了尖銳的敌对現象。这种敌对現象，在英法两国已經尖銳到惊人的地步，在我們这里也愈来愈尖銳了。只要目前的社会基础保存一天，这种少数人發財，广大群众貧困的进程就無法制止；只要社会还没有最后被迫根据較为合理的原則进行改組，这种敌对現象就会愈来愈尖銳。

但是，諸位先生，自由竞争的全部后果还远不止这些。既然每一个人都单槍匹马地冒着風險在那里生产和消費，根本不理會別人在生产什么，消費什么，那末生产和消費必然很快就会完全脫节。既然現代社会把分配产品的工作委托給商人、投机者和店主去做，而这些人又都只顧自己的私利，那末在分配产品时，也就会产生同样的脫节現象，更不用說沒有財產的人無法取得他們所必需的那一份了。厂主怎么能够确定他的产品在某一个市場上需要多少呢？姑且假定他能够确定这个数字，但是他又怎么能知道他的竞争者送了多少产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場上去呢？一个很可能連自己剛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去路都全然不知的厂主，又怎么能够

知道他的外国竞争者有多少商品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关于这一切，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像自己的竞争者一样，凭猜测进行生产，用别人也必定这样行事的话来安慰自己。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他发货的时候，商品价格已经完全不同人家先前用信告诉他的远方市场上的价格了。而当商品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時候，商品的价格又和启运的时候不同了。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的工商业愈发达，这种不景气的现象自然也就愈严重。因此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由于商业发达，由于在进行生产的厂主和真正的消费者中间插入了许多投机者和经纪人，所以英国的厂主要比德国的厂主更难于知道现有存貨和生产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况英国的厂主几乎向全世界的一切市场供应商品，他几乎从来不知道他的商品的去路如何，而且英国工业的生产力又非常巨大，所以经常发生各市场转瞬之间即为商品所充斥的现象。商业停顿，工厂开工半天，甚至完全停工，许多人破产了，存貨不得不以低得荒唐的价格出售，过去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資本大部分因为这种商业危机而又重新化为烏有。从本世纪初起，在英国就可以看到一系列这样的商业危机，而最近二十年来，危机每隔五年或六年就重复一次。諸位先生，你們大部分人大概还清楚地記得 1837 年和 1842 年这两次最近發生的危机吧。要是我国的工业也像英国的工业那样发达，我国的市場也像英国的市場那样遍布各地，那末我們也会遭受同样的后果。現在我們这里的竞争对工商业的影响，表现为工业各部門的普遍的长期蕭条，表现为介于一定的繁荣和完全低落之間的悲慘处境，表现为某种停滞即不活躍



的現象。

这种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貧富之間的鮮明的對照、商業的不景氣和由此而產生的資本浪費的現象是由什麼引起的呢？就是人們的利益彼此背離。我們大家辛勤勞動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關心別人的福利。可是，每一個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這一事實却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不言而喻的真理。雖然我們大家都應該承認，沒有自己的伙伴我們就寸步難行，應該承認僅僅是利益把我們大家聯繫起來，但是我們卻以我們的行動來踐踏這一真理，我們把我們的社會安排得好像我們的利益不但不能一致，而且還是直接對立的。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嚴重的錯誤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要消除這種悲慘的後果，就必須消滅這種錯誤。而共產主義就抱着這樣的目的。

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人和人的利益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競爭就消失了。當然也就談不到個別階級的破產，更談不到像現在那樣的富人和窮人的階級了。在生產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資料的時候，就不要再發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個人都不必再單槍匹馬地冒着風險企求發財致富，同樣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會再有商業危機了。在共產主義社會里無論生產和消費都很容易估計。既然知道每一個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數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時生產已經不掌握在個別私人企業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機構的手里，那也就不難按照需求來調節生產了。

這樣，我們看到，在共產主義的組織里，現代社會制度的主要缺陷就會消除。但是，如果我們再稍稍地多從細節方面來考察間

題，我們就會看到，這種組織的優點還不止此。這些優點還表現在消滅其他許多缺點上，今天我只舉幾個經濟方面的例子。在經濟方面，當前的社會結構無疑是難以想像地不合理和不切實際的。由於人們的利益彼此對立，大量勞動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會沒有從裡面得到任何好處，相當多的資本完全浪費掉了，並且沒有再生產出來。在發生商業危機的時候，我們就看到這種情形。我們看到，人們怎樣不願血本地拋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產出來的大批產品；我們看到，處心積慮地積累起來的大批資本怎樣由於所有主的破產而從他們手中飛掉了。現在讓我們來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現代的商業。請你們想一想，每一個產品必須經過多少人的手，才能到達真正的消費者的手里！諸位先生，請你們想一想，現在有多少投機倒把的多余的中間人插足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舉一包北美產的棉花為例。棉花從種植場主之手轉到密士失必河某個碼頭上的一個經紀人手里，然後順流而下運到新奧爾良。在這裡棉花又賣出去（這是第二次出售，因為經紀人已經從種植場主那裡買過一次了），假定是賣給一個投機商，而投機商又轉賣給出口商。後來這包棉花，比如說，運到了利物浦，在那裡，另一個投機商又伸出了貪婪的手，抓住了這包棉花。這個投機商再把它賣給一個經紀人，而這個經紀人，比如說，又是受德國某公司的委託而買的。這樣，這包棉花就運往鹿特丹，再溯萊茵河而上，經過十來個轉運商之手，而且還要經過十來次裝卸，這時它才到達廠主之手，但是還沒有到達消費者的手里。廠主首先將棉花加工，使它適於使用，然後把紡成的棉紗交給織布的人，織布的人將布交給印花的人，然後布匹才到達批發商之手，批發商再把布轉給零售商，最後，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費者的手里。所有這些成千上萬的中間人，即投

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經紀人、轉运商、批發商和零售商都沒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們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潤，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潤，否則他們就無法生存下去。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須經過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倉庫运到另一个倉庫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沒有更簡單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紡織品送到真正的消費者的手里嗎？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証明了人們的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費嗎？在合理地組織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現在我們繼續談这个例子。正如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費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紡織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費量。只要这种統計工作組織就緒，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內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費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預先确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可以按批購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訂購，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經過中間人，不需要任何停頓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給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潤。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間人非但不再为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們現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們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資料，而在很多場合下，他們甚至还大發其財；因此，他們現在是在直接損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們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們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們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員而出現，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員、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

加者而出現。

現代社會促使個人敵視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已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費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机关也将無限地加以簡化，而这正是因为（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在这种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須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方面。我們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間的敌对現象，我們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們徹底鏟除犯罪的根源，因而就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現在因情欲而犯罪的現象已經愈來愈多地讓位于因利害得失而犯罪的現象，就是說，侵犯人身的犯罪次数愈來愈少，而侵犯財產的犯罪次数却不断增加。在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現代社会里，文明的增进已經可以减少情欲上的强暴表现，要是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呵！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滿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閡和社会差別的地方，侵犯財產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發生了。刑法会自行消失，民法（它几乎只是专门处理财产关系或者至多是专门处理那些以社会的战争状态为前提的关系）也会不再存在。現在的各种爭端是人們互相敌对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到那时就只是罕有的例外，并且很容易通过仲裁法庭来調解。現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也是針對經常的战争状态的，就是說，警察机构和整个行政机关都专心致力于使战争保持隱蔽的和間接的形式，使战争

不致变为公开的暴力行为,变为犯罪。如果說,維持和平要比在一定地区内进行战争容易得多,那末,管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知要比管理籠罩着竞争的社会容易多少倍。如果說,文明甚至在現在就已經教人們懂得,只有維持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西,那末,在利益的共同已經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經没有什么差別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呵!現在是違反社会制度而实现的东西,在社会制度不再阻碍、反而予以促进的时候,将不知要傳播得多广呵!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我們也有理由預期,由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从社会那里夺走人手的事情不再發生,劳动力将会增加很多。

常备軍是現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費最大的設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們。从我們的国家預算中可以看出,我們为常备軍花費了多少:每年花錢2400万,从生产中夺走20万双最結实的手。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誰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軍。要常备軍来做什么呢?为了維持国内的安宁嗎?我們已經知道,誰也不会想到去破坏国内的安宁。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們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结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嗎?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損失人員和資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載道、因而也只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自衛嗎?自衛也不需要常备軍,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員,为了保衛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檢閱,在自己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請你們注意一下,一旦發

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你们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像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这样，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现在由于维持军队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岗位，他们不仅会生产出自己所消费的产品，而且还能生产出比供养他们自己、比补充社会储备所必需的还多得多的产品。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现在有钱人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所有这些女僕、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钟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钟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马车的侍从座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牵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们不再成为老爷们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的社会里，目

前浪費在服侍人們過奢侈生活的勞動力自然就轉而為大家造福，為勞動者自己造福。

此外，在今天的社會里，直接由於競爭的影響，產生了浪費勞動力的現象，因為競爭使大批的人失了業；他們很想工作，但是卻得不到工作。既然社會根本不是從考慮勞動力的真正使用上建立起來的，既然每一個人都得自己去尋找生活，那末，在分配真正有益的工作或者似乎有益的工作時，很大一部分工人很自然地就沒有工作做了。這由於下面這種情況而表現得更加嚴重，這種情況就是：競爭迫使每一個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價的勞動力來代替高價的勞動力，而文明的日益增進也為此創造了更多的條件，換句話說，每一個人都不得不去搶奪別人的飯碗，用一切辦法擠掉別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會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卻找不到工作的失業者，而且這個失業人數比人們通常想像的要大。我們看到，人們用一定的方式出賣自己：他們求乞；打掃街道；站在街道拐角處等候某種工作；替別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樣的零星雜貨叫賣；或者像我們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窮人家的姑娘一樣，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彈着吉他賣唱，僅僅為了賺幾個小錢而不得不聽各種無禮的和侮辱人的話。而終於真正不得不去賣淫的人們又不知有多少呵！這些不得不採取某種方式出賣自己的失業者數量是很大的，我們的慈善機關可以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同時也不應該忘記，雖然這些人對社會毫無益處，社會還是要通過某種方式來养活他們。既然社會要負擔养活這些人的費用，那末社會也就應該關心這些失業者，使他們能正大光明地謀生。但是在競爭統治着一切的現代社會里，這是無法辦到的。

諸位先生，你們想一想上面所談的一切（我還可以舉出許多別的例子來說明現代社會如何浪費勞動力），你們就會發現人類社會擁有極其豐富的生产力，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組織起來，妥善地加以調配，就可以給一切人帶來最大的利益。根據這一切，你們就可以斷定，擔心公正地分擔社會活動以後每個人的勞動負擔就會大得使他不可能去做別的事情，那是多么沒有根據。其實我們可以設想，在這樣的組織下，由於利用了現在完全沒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當的勞動力，每個人的一般工作時間就會比現在縮短一半。

但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因利用目前被浪費的勞動力而表現出的優越性還不是最重要的。把個別的力量聯合成社會的集體力量，以從前彼此對立的力量的一種集中為基礎來安排一切，才是勞動力的最大的節省。在這裡，我贊成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的一些主張，因為這些主張最實際、最完善。歐文提議建造一些大公寓來代替現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礙的城市和村莊。每一公寓占地長寬各約 1 650 英尺，附有大花園，可以舒適地居住兩三千人。顯而易見，建造這種能使住戶享受現代最好的住宅設備的房屋，比起為同樣多的人建造單獨的、多半沒有那麼舒適的現有式樣的住宅來，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現在幾乎每幢大廈都存在的許多房間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兩次的現象就可以消滅，而且不會有任何不方便；儲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樣可以大大節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務瑣事，那末公共經濟的優越性就表現得特別明顯。現在的分散經濟，就拿取暖來說，不知浪費了多少勞動和物資！每一個房間必須有一個火爐，每一個火爐必須分別生火、添煤和照顧；必須把燃料送到每一個房間，而爐灰還



得加以清除。可是像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装置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设备，比如說，用一个發热中心和一些蒸气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爐，是多么簡單和便宜。其次，瓦斯灯目前費用还很貴，因为連最細的管子也得敷設在地下，而管子又因为我們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积很大，必須敷設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像上面所說的那样来安排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1650英尺見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灯的数目并不会减少，結果，这种照明的費用無論怎样也不会比一个中等城市所花的費用更多。再其次，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这种分散經濟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場上、在菜場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購買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設，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現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看看收拾房屋的工作吧！要是这些工作也組織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嗎？而像現在这样安排，两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这不过是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組織在經濟方面的無数优点中举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我們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內用不多的几句话向你們闡明我們的原则，适当地、全面地論証我們的原则。我們根本沒有給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們只能够，而且也只希望闡明几点，促使那些还不熟悉这个問題的人去研究这个問題。但是我們希望今天晚上至少已經向你們闡明了一点，那就是

共产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论。

也许有人要问：如何实现这种理论，我们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论？达到这个目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英国人大概会从建立一些单独的移民区开始，然后让每一个人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移民区；法国人却刚刚相反，他们也许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和实行共产主义。至于德国人从什么地方着手还很难说，因为社会运动在德国还是一种新的现象。我现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许多办法中间提一下近来谈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弟兄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显而易见，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受了教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但是现在连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也不愿意继续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国我们也能够找到证明，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就是例子。至于别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

為全移民區造福。到目前為止，濟貧所還把它掌管的資本用來放債生息，這就為有錢人剝削窮人創造了更多的機會。現在畢竟應該是把這些資本真正用來為窮人造福的時候了，應該是把這些資本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三給窮人的時候了，應該是作出資本和勞動的聯合的卓越榜樣來的時候了！一切失業者的勞動力都應當像這樣用來為社會謀福利，而這些被迫墮落的受盡壓迫的赤貧漢將會轉變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他們所處的環境，很快就會使沒有聯合起來的工人感到羨慕，並且為徹底改組社會開辟道路。

要貫徹這兩個措施就需要錢。為了取得這些錢，同時為了改變到現在為止一切分擔得不公平的賦稅，在現在提出的改革計劃中就應該建議採取普遍的資本累進稅，其稅率隨資本額的增大而遞增。這樣，每一個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來負擔社會的管理費用，這些費用的重擔就不会像一切國家中以往的情形那樣，主要落在那些最沒有力量負擔的人們的肩上。納稅原則本質上是純共產主義的原則，因為一切國家的徵稅的權利都是從所謂國家所有制來的。的確，或者是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這樣就沒有什麼國家所有制，而國家也就無權徵稅；或者是國家有這種權利，這樣私有制就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所有制就高於私有制，而國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後面這個原則是大家公認的。好吧，諸位先生，我們現在就只要求大家遵守這個原則，要求國家宣布自己是全國的主人，從而用社會財產來為全社會謀福利；我們要求國家實行一種只考慮每一個人的納稅能力和全社會的真正福利的徵稅辦法，作為達到這個目的的第一步。

這樣，諸位先生，你們就看到，我們談的不是不顧民族的意志

立即实行财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标和保证我们能够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径。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证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证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证明。

这篇演说是弗·恩格斯 1845 年 2 月  
8 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 1845 年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 1 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 1845年2月15日的演說

諸位先生！

在上次会上有人責备我，說我所举的例子和証据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特别是英国的。有人說，法国和英国跟我們無关，我們生活在德国，我們的任务是証明共产主义在德国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有人还責备我們，說我們根本沒有充分証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完全正确，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証明历史必然性不可能像証明两个三角形全等那样快；历史必然性只有經過研究和全面的論証才能得到証明。尽管这样，今天我还是要竭力消除引起这些責备的原因，竭力証明共产主义对德国說来即使沒有历史的必然性，至少也有經濟上的必然性。

我們先来考察一下德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我国有大量的貧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事件本身就說明了这些地方的状况。摩塞尔和埃斐尔两地区的貧困状况，“萊茵报”已經詳細地报道过了<sup>143</sup>。厄尔士山区自古以来就被可怕的貧困籠罩着。在捷涅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紡業区情况也不見得好些。德国各地都怨声載道，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的無产階級人数众多，这也不能不是这样，即使我們極其膚淺地考察一下我們的社会状况，我們也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工業区一定有人数众多的無产階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工業要是沒有大批全力为它效劳、为它工作而且不再从事其他任何行業的工人，就不可能存在。只

要竞争存在一天，工业劳动就使工人不可能从事其他任何行业。所以在所有的工业区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他们这样多，这样引人注目，要否认他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许多人断言：农业区刚刚相反，那里一定不会有无产阶级。但是，这是否可能呢？在大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农业无产阶级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农场需要男女雇农，没有无产者，大农场就不可能存在。在土地分散的地方，同样也无法避免产生一无所有的阶级，因为土地分散有一定的限度，它不可能超过这个限度再分下去，而且因为那时土地只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所有，所以其余的成员就不得不变为无产者，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同时，土地的分散通常总是要分到土地小得不能养活一家人为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像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形成了由有产阶级过渡到一无所有的阶级的阶梯。土地不让人去另谋生计，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级也是极端贫困的。

这个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会不断增加，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这一点我在上星期已经详细谈过了）和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得出来。今天我也许没有必要再来谈这些问题，我只想指出，这些不断产生无产阶级并日益扩大其队伍的原因，仍然起着作用，而且只要竞争不停止，它们就会引起同样的后果。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仍然单枪匹马地进行生产，并把自己和其余的一切人对立起来，那末无产阶级就不但会存在下去，而且它还会不断扩大，会成为现代社会中愈来愈吓人的力量。但是总有一天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强大起来，觉悟会提高起来，他们再也不愿载负着一直压在他們肩上的整个社会大厦的重担，他们会要求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利。那时，如果人的本性还不

改變的話，社會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這個問題我們的經濟學家直到現在還絲毫沒有加以研究。他們感興趣的並不是國民財富的分配，而僅僅是國民財富的創造。但是，我們暫且不談我們剛才指出的那個論點，即競爭本身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會革命；我們來研究一下競爭所表現的幾個形式，研究一下德國在經濟上可能走的幾條道路，並且看看它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德國，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德意志關稅同盟目前實行着 *juste-milieu* [中庸之道的] 關稅制度。對真正的保護關稅來說，我們的關稅太低，對自由貿易來說，我們的關稅又太高。因此有三種可能：或者是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或者是以高額的關稅來保護自己的工業，或者是維持目前的制度不變。現在我們來分別研究一下每種情況。

如果我們宣布貿易自由並取消我們的關稅，那末我們的全部工業，除去少數幾個部門，都會垮台。那時，棉紡業、機織業、棉紡織業和毛紡織業中的大多數部門、絲紡織業中的主要部門以及幾乎整個采鐵業和制鐵業都談不上了。所有這些工業部門的工人都會突然失業，他們將像潮水般地涌入農村和余下的幸免于難的工業部門。貧窮的現象開始到處迅速地擴大，財產向少數人手裏的集中將因這種危機而加速，根據西里西亞事件就可以判斷，社會革命就是這種危機的必然結果。

現在假定我們實行保護關稅。這種關稅制度近來已成了我國大多數工業家的寵兒，因此應當更仔細地加以研究。李斯特先生已經使我們的資本家的願望成了一個體系<sup>144</sup>，我也想來談談他們幾乎一致地認作自己的信條的這個體系。李斯特先生主張實行逐

漸提高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最后要提高到足以保证厂主們把持国内市場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关税应该保持在这个高的水平上，然后才开始逐漸降低，经过若干年后就最后取消保护关税制度。我們假定这个计划实行起来了，逐漸提高的保护关税制度也明令公布了。工业发达起来，游資投入了工业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增长起来，工資也跟着提高，济貧所空閑起来，从表面现象看，全盛时期来到了。这种情况将会繼續下去，一直到我們的工业发达得足以滿足国内市場为止。工业要进一步扩展是不可能了，因为它既然沒有关税的保护就不能保住国内的市場，那末在中立的市場上它就更經不起外国的竞争了。李斯特先生認為到那时我国的工业已經非常巩固，因而就不大需要关税的保护，并且可以开始降低关税。我們暫且假定事情果然是这样。关税不断在降低。它不在第一次降低稅率时，就得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降低时，不可避免地要降到使外国工业，直截了当地說，就是使英国工业能够在德国市場上和我們自己的工业竞争。这正是李斯特先生所希望的。但是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从这时起，德国的工业就得和英国的工业一起經受一切波动和一切危机的考驗。一当英国商品塞滿海外市場，英国人就会像他們現在那样干起来，正如李斯特先生动人地描繪的那样，他們会把自己的全部儲存都抛到他們所能达到的最近一个市場——德国市場上来，这样他們就重新把关税同盟变成自己的“旧貨店”。接着英国工业很快又恢复元气，因为全世界都是它的市場，因为全世界沒有它就不成，然而沒有德国的工业就連德国自己的国内市場也可以过得去，而且德国工业就是在自己国内也得担心英国的竞争，深受在危机时期供应它的顧客的英国商品过多之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工业就必然会尝尽英国工业在



困難時期所嘗的痛苦，而得到的却僅僅是繁榮時期所帶來的那些利益中極微小的一部分。一句話，那時我們的處境就和現在一樣。如果我們推論到底，那時就會呈現出半受關稅保護的工業部門目前所處的那種被壓抑的狀況；那時企業就會一個跟一個地倒閉，而新的企業又建立不起來；那時我們的機器會變成陳舊過時的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能力用新的完善的機器來代替它們；那時停滯就會變為倒退，而且照李斯特先生的判斷，工業就會一個部門跟一個部門地萎縮下去，並最終關門大吉。但是，那時我們就會有一個由工業產生出來的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他們既沒有生活資料，又沒有工作。諸位先生，那時這個無產階級就會向有產階級索取工作和麵包。

這樣的事情是在降低關稅的情況下發生的。現在我們假定不降低關稅，而使它保持在高的水平上，直到我國廠主之間的競爭使它成為沒有任何意義的東西因而可以降低的時候再降低。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德國的工業剛剛發展到能夠充分供應國內市場的時候，就停滯不前了。新的企業是不需要的，因為現有的企業就已經足夠滿足市場的需要了，而新的市場，正如上面已經談到的，在工業還不能不需要關稅保護的時候，就更不要妄想了。但是，工業如果得不到擴展，那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無論工業的外部或內部都是一片停滯的景象。對工業來說，改善機器是不可能的，因為舊的機器不能拋棄，而新的機器又沒有新的企業來使用。可是別的国家却在前進，只是我們的工業從停滯變為倒退。經過一段不長的時間，英國人由於有了新的成就，就可能生產出很便宜的商品來和我們的落后的工業競爭，而且儘管我們有保護關稅，還是可以在我們的國內市場上競爭。因為在競爭的搏鬥中，也像在任何其他

的斗争中一样，总是力量最强的取得胜利，所以我们最终失败是没有疑问的。那时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种情况就会重演；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阶级索取他们要保持特殊的有产者的地位就不能给予的东西，那时社会革命就会爆发。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种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情况：我们德国人依靠保护关税大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工业，从而没有保护关税它也能和英国的工业竞争。假定情况果然是这样，那末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在国外的中立市场上一开始和英国人竞争，在我们的工业和英国的工业之间就会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英国人会尽一切力量不让我们进入一直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市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存的泉源，他们的要害受到了威胁。他们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手段，利用百年来的工业的一切优越性就能把我们打垮。他们会把我们的工业限制在我们自己的市场范围内，这样也就阻止了我国工业的发展；那时就会造成像我们在前面谈过的那种情况——我们停滞不前，英国人却在前进；我们的工业既然不可避免地要衰败下去，也就无力养活那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就要爆发。

即使假定我们能够在中立的市场打败英国人，把他们的销售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但是我们在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会赢得些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只会重复英国人在我们之前就走过的那条工业发展的老路，而且我们迟早会面临英国人目前所处的那种境地，就是说，我们将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但是从各种可能性看来，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到来的。德国工业的不断胜利必然要破坏英国的工业，并且只会加速英国人本来就已经面临着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群众性起义。迅

速增长的失業現象会促使英国工人起来革命，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社会革命将会給大陆上的国家，特别是給法国和德国以巨大的影响。由于工業加速發展而人为地造成的德国無产階級的人数愈多，这个影响也就愈大。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气地粉碎我們的厂主对德国的工業壟断所抱的幻想。英国工業和德国工業和平共处是不能設想的，竞争已經使这样的事情成为不可能了。我再說一遍，工業必須不断地發展才不致于落后和灭亡；它必須扩展，必須获得新的市場，不断增加新企業，否則它就不可能前进。但是，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sup>145</sup>，夺取新市場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現有的市場，加之将来工業的扩展要比現在緩慢得多，所以英国現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为了保护本国的工業，使它不致灭亡，英国必須使其他国家的工業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來說，保持工業的壟断已經不純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問題，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問題了。不用說，各国之間的竞争比个人之間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尖銳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大規模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敗而告終。因此，我們和英国人之間的这种斗争，不管結果如何，既不会給我們的工業家，也不会給英国的工業家带来好处，它只能引起社会革命，正如我剛才所証明的那样。

諸位先生，我們已經考察了德国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能够从自由貿易和保护关税制度中得到的东西。我們还得考察一种經濟上的可能性，这就是保持目前所实行的 *juste-milieu* [中庸之道的] 关税制度。但是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們的工業一定会一个部門跟一个部門地倒閉，產業工

人会沒有飯吃，而失業的現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反對有產階級的革命就會爆發。

可見，詳細考察的結果完全証實了我在最初根據競爭所做的概括性的說明，即**社會革命**將是我們現在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況下必然引起的後果。正如我們可以有把握地從已知的數學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樣，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地從現存的經濟关系和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中得出社會革命即將到來的結論。但是，讓我們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這個革命。它將以什麼形式出現呢？它的結果會怎樣呢？它和以往一切暴力革命有什麼區別呢？社會革命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頭不是對着壟斷權的所有，而是對着所有權的壟斷；社會革命是窮人反對富人的公開的戰爭。所有那些過去在歷史上的衝突事件中表現得不顯著的隱蔽的動力和原因，都會在這個鬥爭中明顯而公開地顯示出來，所以這個鬥爭無論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鬥爭更尖銳、更殘酷。鬥爭的結果可能有三個。或者是起義者只打擊了表面現象而沒有打擊本質的東西，只打擊了形式而沒有打擊事物的實質；或者是他們找到了事物的本質，抓住了禍根。在前一種情況下私有財產將被保存下來，而只是重新加以分配，結果，造成目前這種情況的原因仍將繼續起作用，經過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這些原因又會造成同樣的情況，引起新的革命。但是這是否可能呢？我們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樣一種確實沒有實現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的革命呢？英國的革命既實現了宗教原則，又實現了政治原則，這次革命是由於查理一世反對這些原則而引起的；法國資產階級在反對貴族和舊的君主制的鬥爭中贏得了他們所追求的一切，消滅了激起他們起義的一切流弊。難道窮人的起義會在貧困和貧困的根源消滅以前停止嗎？

这是不可能的。承認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認全部历史經驗。就从工人的發展水平，特别是从英法两国工人的發展水平来看，我們也已經有理由認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后一种假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匱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惡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實現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則才能实现。請你們想想那些激动着連工人也在思考的国家里的工人的思想；請你們看看法国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別，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嗎？請你們到英国去听听，那里向工人提出了什么样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計劃，难道所有这些計劃都不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原則上嗎？請你們研究一下各种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难道你們能够从里面找出許多非共产主义的东西来嗎？到現在还有意义的一切方案中，唯一非共产主义的是傅立叶的方案，因为他更多地注意人类活动的社会組織，而較少地注意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分配。所有这些事实都証实了这个結論：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則的實現而告終；別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

如果这些結論是正确的，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實現是我們的現存关系的必然結果，那末我們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們能够在實現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們不願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問題，如果我們不願意使我們的無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間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銳到像我們对人性的理解所啓示的那樣，必須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絕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諸位先生，我們就应当認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問題，就应当尽一

切努力使現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或許你們当中有人覺得，要提高以前被輕視的階級的地位，就不能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就应当記住，我們談的是为所有的人創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發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別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而且也应当記住，个人不得不犧牲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生乐趣，而仅仅是我們的丑惡的制度所引起的表面上的享乐，它是和目前享受这些虛偽的特权的人們的理智和良心相矛盾的。我們決不想破坏那种能滿足一切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真正的人的生活；相反地，我們尽一切力量創造这种生活。即使把这点撇开不談，如果你們認真地考慮一下，我們現代的制度一定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种制度会把我們引入什么样的矛盾的迷宮，什么样的混乱状态，那末，諸位先生，你們也肯定地会得出結論說，社会問題是值得認真而徹底地加以研究的。如果我能促使你們这样做，那末我的演說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

这篇演說是弗·恩格斯 1845 年 2 月  
15 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發表的  
演說全文第一次刊載于 1845 年  
“萊茵社会改革年鑒”第 1 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 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

VOL. VIII, NO. 409

LONDON, SATURDAY, SEPTEMBER 13, 1846.

PRICE FIVEPENCE a  
Week, including Postage and Carriage per Quarter

## 弗·恩格斯 最近發生的萊比錫大屠杀。 ——德国工人运动

萊比錫大屠杀<sup>146</sup>您在貴報最近一號上曾經評論過，而且在几星期前曾做過比較詳細的報道。這場大屠杀現在還繼續為德國各報所注意。它的卑鄙程度只有彼得盧事件<sup>147</sup>才能超過。它是德國軍事專制制度所策劃的暴行中最卑鄙的一個。當人民高呼“隆格萬歲！”、“打倒羅馬教！”的時候，薩克森親王約翰（順便談一下，他是我們的許多寫詩著書的王公大人中的一個，曾發表過意大利詩人但丁的作品“地獄”的拙劣譯文），這位“地獄”的譯者就想在他的文學聲譽上添上軍事榮譽，因而向手無寸鐵的群眾發起了狡詐卑鄙的進攻。他命令當局調來的步兵營分為几隊，封鎖通往愛好文學的“王儲殿下”的官邸的各條道路。兵士接受了命令，把群眾包圍起來，迫使他們聚集在一起，然後把他們趕向官邸的大門；正是群眾被按照約翰親王的命令行動的兵士們逼近了官邸的神聖大門成了向群眾開火的口實，而政府的報紙也正是企圖拿這一點來為槍殺事件辯護！但是，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几隊兵士把群眾包圍起來以後，就按照王儲殿下的詭計向這些赤手空拳的群眾

交叉扫射。群众不管往哪里走，都遭到像雨点一般的槍彈的射击。要不是比約翰亲王人道一些的兵士多半都对空射击，那末，這場屠杀就会成为一場極其駭人听聞的屠杀。这种卑鄙的暴行引起了普遍的憤怒；就是現存制度的最忠良的臣民、最热烈的拥护者也都感到憤怒，并对这种行为表示極端厭惡。不过这一事件倒会給薩克森带来不少好处，因为这里是德国最愛空談最缺乏行动的地方。薩克森人有一个小小的立宪政府，有自己的議會清談館、自己的自由主义的議員和自由主义的开明的牧师等等，在德国北部算是温和的自由主义即德国的輝格主义的代表；虽然这样，但是和普魯士人比較起来，他們更是普魯士国王的奴隶。不管普魯士政府通过什么決議，薩克森內閣都得执行；而且近来普魯士政府甚至懶得和薩克森內閣打交道，而直接向薩克森的下級官吏發号施令，就好像他們不是为薩克森服务而是为普魯士服务似的！薩克森听命于柏林，而不是听命于德累斯頓；可是，尽管薩克森人喜欢空談和吹嘘，他們还是清楚地知道普魯士的鉄掌紧压在他們的身上。萊比錫的這場大屠杀会結束薩克森人的这种空談和吹嘘，自傲和自滿，——正是这些东西使薩克森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和普魯士人及其他德国人迥然不同的特殊的民族。薩克森人現在一定会知道，他們也像其他一切德国人一样处在軍閥統治之下；他們一定会知道，尽管他們有宪法、自由主义的法律、自由主义的書报檢查制度和国王的自由主义言論，但是在他們这个小国家中实际存在的不过是軍法而已。另外也还有一个因素有助于萊比錫事件在薩克森傳播这种反抗情緒。不管薩克森的自由派怎样吹嘘，但是大多数的薩克森人只是在現在才开始說話。薩克森是一个工業国，那里的麻紡織工人、針織工人、棉紡工人、花边工人、煤矿工人和采



礦工人自古以來一直就是極端窮困的。從西里西亞起義（即通常所謂的 1844 年 6 月的織工鬥爭）開始的無產階級運動已經蔓延到整個德國，當然也觸及了薩克森。不久以前，在許多地方的鐵路建築工人中和印花工人中都發生了騷動；這裡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共產主義很可能正在工人中傳播開來，雖然現在還沒有確切的材料可以拿來做證明。如果薩克森工人登上鬥爭的舞台，他們肯定地不會像他們的僱主自由資產者那樣空談一下就完事。

另外我還請您注意一下德國工人階級的運動。您上星期在貴報上預言我國將發生光榮革命——不是 1688 年那樣的革命<sup>148</sup>。在這一點上您完全對。不過我只希望修正一點，或者更確切地說，只希望把您所說的說得更明確些，那就是：實現這一變革的將是德國的青年。但是這種青年不應該在資產階級中去尋找。德國的革命行動將從我們的工人當中開始。的確，在我們的資產階級當中也有不少的和共和主義者以至共產主義者，而且也有不少這樣的青年，如果現在爆發革命，他們在運動中就會非常有用；但是這些人是資產者，是追求利潤和經營企業的人。誰能向我們擔保，這些人不會因他們的職業，不會因他們的社会地位而墮落腐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会地位，他們才靠他人的繁重的勞動來生活，靠吮吸工人階級的血、榨取工人階級的脂膏來養肥自己。即使他們僅僅在職業上是資產者而在思想感情上是無產者，但是和那些因本身利益而死抓住現存秩序不放并一心只想塞滿自己錢袋的資產者相比，他們在人數上實在太少了。所幸的是我們根本沒有指靠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運動以驚人的速度展開了，一兩年後，我們就可以檢閱光榮的工人隊伍，即民主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隊伍，因為在我國對工人階級來說，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個東西。1844 年

西里西亚的織工發出了信号，波希米亚和薩克森的印花工人和鐵路建筑工人、柏林的印花工人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的产业工人都紛紛举行罢工和局部的起义来响应；这些起义几乎都是由于法律禁止結社而引起的。現在运动差不多扩展到了全国，并且还在繼續平穩地發展，可是資產階級却只是在鼓吹“宪法”、“出版自由”、“保护关稅”、“德国天主教”和“新教改革”。虽然所有这些資產階級运动都有它們的作用，但是根本不能影响工人階級，因为工人階級有自己的运动，即飯碗問題的运动。

在下一封信中我将詳細地談这个問題。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9月8日至11日

按报纸原文刊印

載于1845年9月13日“北極星报”第409号

原文是英文

并在标题下附有編者注：本报通訊員来稿

## 弗·恩格斯 德国状况

### 給“北極星报”編輯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遵照您的願望，我从这封信起，开始有系統地撰写几篇文章，闡述我的祖国的現狀。为了使大家能完全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并且証明这些意見都有充分根据，我必須簡短地叙述一下那件震撼現代社会基础的事件（我指的是法国革命）以后的德国历史。

古老的德国当时叫做神聖羅馬帝国，它由無數的小邦，即無數的王国、选帝侯国、公国、大公国和最大公国、侯国、伯爵領地、男爵領地和帝国自由市所組成，它們彼此独立，只服从皇帝和联邦議会的权力（假使有这样的权力的話，但是事实上几百年来根本就沒有这样的权力）。这些小邦独立自主已經达到这样的程度：每当和“最大的敌人”（当然是法国）交战时，总有某些小邦和法国国王結成同盟，公开地对自己的皇帝作战。联邦議會由所有这些小邦的代表团組成并由帝国的代表主持，它的使命是限制皇帝的权力。它經常召集會議，但是从来沒有任何結果，哪怕是最微小的結果也沒有。代表們把時間都浪費在討論最無謂的礼节問題上，例如說，某某男爵使团（可能是由他的兒子的家庭教师和一个着制服的老

僕人或年迈的森林看守者組成)的地位是否應該比某某男爵使团的地位高些,或者一个帝国自由市的代表是否不必等待另一城市的代表表示欢迎便先行向他致敬等等。此外,他們还为了許多微不足道的特权爭吵不休,其实这些特权大部分都是特权享有者本身的累贅,但是他們認為事关荣誉,因此在这些問題上爭吵得特別厉害。諸如此类的重大事情占去了英明的联邦議會这样多的時間,当然这个可敬的會議就沒有任何時間来討論帝国的問題了。因此,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無論在战时或平时都被內部紛爭弄得四分五裂的帝国,从宗教改革到1789年經歷了一系列的內战,并且在每次战争中法国总是和强的方面結成同盟来反对帝国中力量薄弱的易于征服的方面,当然它攫得的东西也最多。最初是勃艮第,接着是三个主教管区——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其次是洛林的殘留部分,再其次是弗兰德斯的一部和亚尔薩斯全部就这样脫离了神聖羅馬帝国而归并于法国。于是瑞士也脫离帝国而独立,比利时則依照查理五世的遺囑讓給了西班牙。所有这些国家在脫离德国之后情况都好轉了。除了帝国外部逐漸崩潰而外,帝国内部也極度混乱。每个小王公对其臣民說来都是专橫殘忍的暴君。帝国除了設立一个法院(維茨拉尔帝国法院)来审理臣民控告官吏的案件,就从不过問各邦的內政。而且这个寶貝的法庭实在太会审理案件了,从来也沒有人听說过有什么案件得到了解决。狂妄自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橫殘忍簡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作乐、驕奢淫佚的王公們,授与其大臣和官吏無限的权力,使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們能装满主子的金庫,供給主子足够的嬌妻美妾就行。那些沒有独立、仍受某一个国王、主教或者王公管轄的貴族,通常也把人民看得連狗都不如,他們尽

量从自己的农奴的劳动中榨取金錢，因为农奴的从屬关系当时在德国是十分普遍的。即使在那些郑重其事地被命名为帝国“自由”市的地方也絲毫沒有自由，因为这里的市长和自选的参議員——这些职位几世紀以来已經像王位那样成为世襲的了——在处理政事中表現得更为专橫。再沒有什么东西能和这种城市小資产階級貴族的卑鄙行为相比的了。要是这些情况沒有留在許多还能回忆起这个时代的人的記憶之中，要是这些情况沒有得到为数甚多的权威人士的証实，那末，的确誰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五十年前的德国的情况。可是人民呵！他們对这种情况說了些什么呢？他們做了些什么呢？至于中等階級，即貪財的資产者，則在这种长期的混乱状态中找到了致富的泉源，資产者懂得混水摸魚是最不費力的事情。他們忍受着压迫和侮辱，因为他們知道他們能够用自己的办法来复仇：欺騙压迫者，从而为自己所受的委屈雪耻。如果他們和人民團結起来，他們就能够推翻旧的政权，重建帝国，正如英国資产階級从1640年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了的那样，也如同一时期法国資产階級准备去完成的那样。但是德国的資产階級沒有这样做，他們从来沒有这样的毅力，也从来不認為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德国的資产者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們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們本身就是粪，周圍的粪使他們感到很温暖。劳动者的生活也不比現在坏，但农民是例外，他們大部分是农奴，沒有城市人民的支援就任何事情都做不了，因为雇佣軍隊經常駐扎在他們那里，只要他們企圖起事，他們就有淹沒在血泊中的危險。

这就是前一世紀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討厭的东西。沒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業、商業、工業

和農業極端雕敝。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到雙重的苦難——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貴族和王公都感到，儘管他們榨盡了臣民的膏血，他們的收入還是彌補不了他們的日益龐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影響群眾意識的工具，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會輿論，甚至連比較大宗的對外貿易也沒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麼也沒有；一種卑鄙的、奴顏婢膝的、可憐的商人習氣滲透了全體人民。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爛尸骸的力量都沒有。

只有在我們的文學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來。這個時代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是可恥的，但是在德國文學方面卻是偉大的。1750年左右，德國所有的偉大思想家——詩人歌德和席勒、哲學家康德和費希特都誕生了；過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個偉大的德國形而上學家<sup>⊖</sup>黑格爾誕生了。這個時代的每一部傑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寫了“葛茲·馮·柏里欣根”，他在这本書里通過戲劇的形式向一個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寫了“強盜”一書，他在这本書中歌頌一個向全社會公開宣戰的豪俠的青年。但是，這些都是他們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們年紀一大，便喪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寫些極其辛辣的諷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沒有在科學中，特別是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偉大歷史中找到慰藉，那他一定會陷入悲觀失望的深淵。用這兩個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斷其他一切人。甚至連德國最優秀最堅強的思想家都對自己祖國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 形而上學一詞在這裡是指研究經驗以外的問題的哲學。——編者注

突然，法国革命像霹靂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極其無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無动于中。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貴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議會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詩人没有一个不歌頌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純粹形而上学的性質，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論表示的。但是，一俟無可辯駁的事实把理論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一俟法国宮廷和法国人民在實踐上不可能再协调下去（虽然他們在理論上的联合已为1791年理論上的宪法所确定），一俟人民通过“八月十日”事件实际上确立了自己的主权<sup>149</sup>，尤其是当1793年5月31日吉倫特派的复亡弄得理論完全哑口無言的时候，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一变而为对革命的瘋狂的憎恨了。当然，这种热情只是对1789年8月4日晚上貴族阶级放弃其特权这样的事件表示的，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从来也沒有料到，这种行动实际上产生的后果絕不同于好心的理論家可能做出的結論。德国人从来也沒有想到要称贊这些后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后果对于許多有关的人來說，是相当严重、相当不愉快的。所以，所有这些当初为革命欢欣鼓舞的朋友現在都变成了革命的最瘋狂的敌人。他們从奴顏婢膝的德国人报刊上得到有关巴黎的、显然全被歪曲了的消息后，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聖羅馬糞堆，而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鎖鏈并向一切暴君、貴族和僧侶挑战的令人顫栗的行动了。

但是神聖羅馬帝国的末日到来了。法国的革命軍隊进入了德国的心脏地带，把法国的国境綫移到了萊茵河上，并且到处宣傳自由平等。他們赶走了成群的貴族、主教和修道院长，也赶走了在这样漫长的时期中在历史上只起了傀儡作用的全部小王公。他們像

进入美国西部边疆原始森林的移民一样廓清了大地；这个“基督教德意志”社会的原始森林，在法国军队的胜利进军中像旭日东升时的云雾一样消失了。当果断的拿破仑把革命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他认为自己就是革命（即1794年热月9日后被贪婪的资产阶级所扼杀的那次革命），当他这个“寡头的”民主（一个法国作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接二连三地派遣军队袭击德国的时候，“基督教德意志”社会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



划的人。他們詛咒他，因为他把他們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們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頌揚，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大发横财，他們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騙德国人，把德国人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罵拿破侖，因为他們想繼續过苟且偷安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因为他們根本不想过問任何偉大的理想和公共的利益。而最后，当拿破侖的军队被俄国击潰的时候，他們便乘机摆脱掉这位偉大征服者的铁鏈。

被称为“德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期”等等的 1813—1814 年和 1815 年的“光荣的解放战争”，是一种瘋狂的表现，每一个正直的和有理智的德国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內都会为它感到慚愧<sup>150</sup>。的确，当时表现了激昂的情緒，但是，是誰表现的呢？首先是农民，世界上最愚昧無知的一部分人，他們死抱住封建成見，蜂涌而起，宁死也不背叛他們和他們的先輩称之为老爷的人，不背叛管轄他們、蹂躪他們和鞭打他們的人。其次是大学生和一般的年輕人，他們認為这次战争是捍衛原則的战争，甚至是宗教战争，因为他們認為他們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捍衛他們称之为民族特征的正統主义原則，而且也是为了捍衛神聖的三位一体和上帝的存在。当时的一切詩歌、論著和講演都把法国人描写成無神論的代表，沒有信仰、沒有道德的典型，而把德国人則說成維護宗教、虔敬神明、主持正义的代表人物。再其次是一些比較有知識的人，他們把关于“自由”、“宪法”和“出版自由”的某些概念和这些思想混在一起，但是这种人为数極少。最后是企業主、商人、投机家等等的子弟，他們要爭取在最便宜的市場上購買貨物的权利，要爭取喝不掺菊苣的

咖啡。当然他们都是拿“自由”、“伟大的德国人民”、“民族独立”这类当时流行的热烈的字眼来掩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那些在俄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帮助下打败了拿破侖的人。

在下一封信中我准备谈拿破侖垮台后的德国历史。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1845年10月15日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45年10月25日

“北極星报”第41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 給“北極星报”編輯的第二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在第一封信里描写了法国革命前、革命时以及拿破侖統治期間的德国状况，指出了这个偉大的征服者是怎样被打倒和被哪些反对者打倒的。现在我繼續来談經過这次民族独立的“光荣复兴”之后，德国的情况起了怎样的变化。

我对所有这些事件的看法和一般的見解完全相反。但是我的看法絲毫不差地为德国历史上的下一时期發生的事件所証实。要是反对拿破侖的战争确实是爭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战争，那末結果就应该是所有被拿破侖征服了的国家，在拿破侖垮台之后，都宣布平等的原則，享受到平等原則带来的幸福。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就英国方面來說，战争是由惊惶失措的貴族發动的，并且得到了財閥的支持。这些財閥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利潤泉源：接二連三的借款；国債的增长；以及他們有可能滲入南美市場，在那里傾銷自己的工業品，夺取他們認為能使自己的腰包塞得更滿的、原屬於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他們力圖使不列顛威鎮四海<sup>⊖</sup>，以便能够打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貿易，如果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够成为他們發財致富的障碍的話。最后，他們竭力維護自己从供应欧洲市場取得巨額利潤的权利，和拿破侖的大陆体系分庭抗礼。这

⊖ 原文为《Britannia rule the waves》，即“不列顛威鎮四海”（摘自英国国歌）。——編者注

就是当时英国統治阶级进行这次长期战争的真正原因。至于說法国革命威胁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口实，也只不过表明这种“人类理性的完美創造”無比优越而已。从西班牙方面來說，發動战争是为了保衛正統的王位世襲和僧侶专制裁判的原则。1812年的宪法的原则是为了鼓舞人民繼續作战在較晚的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原则本身也是来自法国。意大利从来不敌視拿破侖，因为拿破侖只給它带来了好处；单就意大利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这件事來說，就得感謝拿破侖。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德国應該感謝拿破侖的地方，我已經在第一封信里談过了。

所有一切战胜国都把拿破侖的垮台看做法国革命的复灭和正統主义原则的胜利。結果它們当然都在自己的国家里恢复了这种原则，它們恢复这种原则，起初还用“神聖同盟”、“永久和平”、“公共福利”、“君民互相信任”等等动人心弦的詞句加以掩飾，后来就抛弃了任何遮盖，而借助于刺刀和牢獄了。征服者的無能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已經充分地表现出来：最后战败的法国人民，即使人家强加給他們一个他們恨之入骨的、靠15万支外国毛瑟槍支持的王朝，然而仍然使战胜了的敌人胆顫心惊，以致于不得不給他們一个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濃厚的宪法；而別的国家，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吹嘘自由，然而除了漂亮的言辞和随之而来的鉛彈之外，什么也沒有得到。在法国南部屠杀共和主义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把人活活燒死，本国的专制制度又恢复起来，在英国頒布了禁口法令，發生了“彼得卢事件”，这就是对法国革命被鎮压下去的庆祝。現在我們就会看到，德国也走着同样的道路。

在德意志各邦中間，普魯士王国首先向拿破侖宣战。当时統治普魯士的是外号“公正大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是迄

今作过王位裝飾品的最大的傻瓜之一。他生来只配做一个伍长，只配檢查兵士的鈕扣是否整齐。他是一个冷酷無情的淫蕩之徒，但同时却在那里宣傳道德。他除了会用不定式外，就不会用别的什么式說話，在草拟命令方面只有他的兒子比得过他。他只有两种感觉：恐惧和伍长式的狂妄自大。在他統治的前半期，他的主要情緒是恐惧拿破侖。拿破侖对他表示了一种輕蔑的慷慨，把半个王国还給了他，因为拿破侖認為这个国家不值得加以控制。由于这种恐惧，他就准許一些不徹底的改革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夏恩霍斯特等等来代替自己管理国事。这些改革家开始采用較为自由的市政組織，廢除农奴制，把封建劳役改为地租或必須在二十五年內付清的一笔固定的款項。但是最主要的是他們奠定了給人民以巨大力量和迟早会用来反对政府的軍事組織的基础。他們也“制訂”了一个宪法，但是迄今尚未問世。下面我們将会看到，在法国革命失敗后，普魯士的情况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科西嘉怪物”最后被牢牢地禁閉起来之后，大大小小的帝王們立刻在維也納开了一次大会，以便分配贓物和奖金，并商討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統治者的利益和願望就行。在出席會議的国家里面，只有三个国家知道它們要些什么。英国想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商業霸权，想保留掠夺殖民地所得的最大部分，并削弱其他各国。法国想尽量減輕自己的不幸，并削弱其他各国。俄国想增强自己的实力，擴張自己的領土，并削弱其他各国。其余的一切国家都多情善感，想得些小利，而有几个国家甚至还想表現一种可笑的大公無私。

結果法国打乱了德意志各大邦的計劃；俄国获得了波兰的最

好的一部分。英国用签订和约的方式比用战争的方式更加扩大了它的海上霸权，并在所有的大陆市场上占了优势，——这对英国人民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但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却是大发横财的泉源。除了自己心爱的正统主义原则就不关心任何东西的德意志各邦又一次受骗了，在签订和约时，丧失了它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一切。德国还是分裂为三十八个邦；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阻碍着内部的一切进步，使德国大大弱于法国，使它仍然保持英国工业品最好的市场的地位，只是有利于英国资产阶级大发其财。英国人中的这一阶层以慷慨自夸，说什么由于慷慨，他们拿出了大宗款项来援助别国同拿破仑继续作战。但是，即使假定，这些援助款项确实是资产阶级拿出来的，而不是劳动人民拿出来的，那末资产阶级之所以慷慨，也只是为了重新给自己打开大陆市场。而在这方面他们也进行得很顺利；他们从签订和约之日起，仅仅从一个德国所得到的利润，就不少于援助支出的6倍。资产阶级的慷慨就是如此，它起初以援助的形式给你一个礼物，而后来却以利润的形式从你那里拿走比礼物大6倍的东西。要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情况刚刚相反，是德国的商品充斥于英国市场，而不是德国在工业上依附少数英国资本家，那末英国资产阶级会这样热心地解囊相助吗？

无论如何，德国完全被欺骗了，首先是被它那些所谓的朋友和盟邦欺骗了。这倒并不使我特别感到难受，我很明白，我们即将改组欧洲社会，因而类似的下流勾当，类似的愚蠢失策，将来就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我要指出，第一，无论是英国人民或者是其他各国的人民，都没有从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受骗中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或者是别的君主，或者是本身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某个阶级；第二，重掌政权的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第一步措施就

已經證明他們是完全無能的。

現在我來談德國國內的情況。

我們已經知道，在英國的金錢和俄國的野蠻支持下把法國革命鎮壓下去的力量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這種力量分成兩類：第一類是舊“基督教德意志”社會的熱烈維護者，即受農奴制、民族主義、正統主義和宗教的狂熱所驅使的農民和熱心的青年；第二類是一些較為溫和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希望“安靜地生活”，希望能夠發財和揮霍，而沒有什麼重大的歷史事件找上門來打擾他們。後一種人只要得到和平，只要有权在價格最低的市場上購買東西、喝沒有摻雜菊苣的咖啡和不問政治，就感到心滿意足了。但是“基督教德意志”的信徒都成了復辟政府的積極支持者，他們盡一切可能把歷史拉回到 1789 年去。至於那些希望人民享受他們努力的某些成果的人，他們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口號成為 1813 年的戰鬥呼聲，但是不成為 1815 年的實踐。他們得到了一些極其動聽的諾言，如頒布憲法、允許出版自由等等，然而僅僅是諾言而已。實際上一切都照舊。德國境內幾個法國化了的地方已經盡量掃除了一切“外國專制制度”的遺迹，只有萊茵河左岸的几省還保留了法國的制度。黑森選帝侯做得更干脆，他甚至把自己士兵頭上的從前被不信神的法國人剪掉的辮子恢復起來了。總之，和其他一切國家一樣，德國出現了一幅無耻的反動的圖畫，這種反動特別的地方，只在於它有些猶疑和軟弱，它甚至還沒有表現出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和英國反對革命原則的那種毅力。

在維也納會議上使德國深受其害的欺騙方法，現在在德意志各邦之間也用起來了。普魯士和奧地利為了削弱德意志其他各邦，就迫使它們制訂某種不倫不類的憲法，這種憲法削弱了政府，但是

沒有賦予人民，甚至也沒有賦予資產階級以任何權力。既然憲法規定德國是一個聯邦，各邦政府各自指派代表組成聯邦議會，那末就可以不必擔心人民會獲得過大的力量，因為每一個邦都得受聯邦議會決議的約束；這些決議對整個德國來說就是法律，而不管各邦議會是否贊同。當然，這個聯邦議會完全由普魯士和奧地利控制着；只要它們威脅一下小邦諸侯，說不支持他們同本邦議會的鬥爭，就足以把後者吓得百依百順了。這樣一來，由於它們的勢力壓倒一切，由於它們是德意志各邦諸侯權力所依據的原則的真正代表者，它們就成了德國的絕對統治者。不管各個小邦做了些什麼事情，實際上都不起任何作用。在德國的自由資產階級的鬥爭還只限於南部幾個小邦的時候，這種鬥爭是不會有什麼成果的。只有普魯士資產階級從昏睡中蘇醒過來，這種鬥爭才能起作用。因為奧地利人未必能夠列入文明世界，他們馴順地服從統治者的家長式的專制統治，所以普魯士就成了德國現代歷史的中心，社會輿論變化的晴雨表。

拿破侖垮台之後，普魯士國王過了幾年最幸福的生活。的確，他受了各方面的欺騙。英國欺騙他，法國欺騙他，他自己的親密的朋友奧國皇帝和俄國皇帝也一次又一次地欺騙他。但是由於他滿腔熱情，他甚至沒有發現這一點；他沒有想像到，世界上會有一些壞蛋胆敢欺騙“公正大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很高興，因為拿破侖被打倒了，他沒有什麼可以懼怕的了。他堅持德意志聯邦條例的第十三條，即允許德意志各邦制訂憲法<sup>151</sup>。他還堅持另外一條，即有關出版自由的一條。此外，他還在1815年5月22日下了一道詔書，詔書是用“人民代議制一定實現”這幾個字開始的，這幾個字表現了他那沾沾自喜的快意和家長式的傲慢的絕妙的結合。



不久他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他的人民制定宪法。甚至在 1819 年，当普鲁士显示了革命的征兆，当反动气氛笼罩了整个欧洲，维也纳会议的美好的成果正是光辉灿烂的时候，他还宣称，今后如果没有征得即将成立的王国议会的同意，不借任何国债。

可惜好景不长。国王对革命的恐惧很快就代替了对拿破仑的恐惧。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封信里再谈。

我还得补充几句话。每当英国的民主集会通过“向各国爱国志士”致敬时，在这些爱国者中间肯定地有安得列阿斯·霍弗的名字。但是从我所谈到的拿破仑在德国的敌人的情况看来，霍弗的名字是否值得民主主义者尊敬呢？霍弗是一个守旧的、愚昧无知的、具有宗教狂热的农民，他的狂热是万德人的狂热，是“教会和皇帝”的狂热。他勇敢地撕杀着，但是万德人是为了反对共和主义者才这样撕杀的。他是为了维护维也纳和罗马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而撕杀。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请你们不要再提这个狂热者吧！德国有比他更优秀的爱国志士。为什么不提就当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1525 年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名字呢？为什么不歌颂那不同于自己所有的同胞而在巴黎支持法国革命到底、最后牺牲在断头台上的德国的托马斯·倍恩——格奥尔格·福斯特呢？为什么不歌颂其他许多为了现实而不是为了幻想而撕杀的人们呢？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弗·恩格斯写于 1845 年 10 月底

按报纸原文刊印

载于 1845 年 11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北极星报”第 417 号

### 給“北極星報”編輯的第三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得請求您和貴報的讀者原諒，因為從表面看來我有些漫不經心，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給貴報繼續撰寫關於德國狀況的文章了。但是，您可以相信，只是由於我必須花費整整幾星期的時間去致力於德國的運動，我才放下了我所承擔的給英國民眾介紹我國狀況的愉快工作。

貴報讀者大概還記得我在第一封和第二封信里所談的事情。我在那兩封信里談到了1792年至1813年德國的陳腐的制度怎樣被法國軍隊所摧毀，拿破侖怎樣被歐洲的封建主（即貴族）和資產者（即工商業中等階級）的同盟所打倒，德意志各邦諸侯怎樣在後來的和平談判中被自己的盟邦所欺騙，甚至被戰敗的法國所欺騙，德國怎樣擬定了聯邦條例，它現在的政治制度是怎樣確立的，以及普魯士和奧地利怎樣用促使各小邦立憲的辦法使自己成了德國的至高無上的主宰。如果我們把奧地利這個半野蠻的國家撇開不談，那末我們就可以做出結論說，普魯士是決定德國未來命運的戰場。

我們在前一封信里已經指出，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擺脫了對拿破侖的恐懼之後，過了幾年幸福安寧的生活，後來又遇到了新的魔鬼——“革命”。我們現在來研究一下“革命”是怎樣進入德國的。

1815年拿破侖垮台——我再重复一下，当时各国的君主和貴族都把这件事完全当做法国革命的失敗，或者甚至像他們所說的革命的失敗——之后，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从倫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聖彼得堡，各国的內閣都由封建貴族統治着。但是，曾經为这件事花过錢、出过力的資產階級也想取得自己的一分权力。复辟政府絕沒有把資產階級的利益放到首要的地位。相反，它們不但处处忽視資產階級的利益，甚至公然不理會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欧洲各地都可以看到的現象中，1815年英国通过谷物法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当时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了。商業和工業已經扩展到每一个角落，并使大腹便便的資產者財富巨增；資產階級財富的增长表現在投机倒把的活躍上，表現在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上。他們不能再忍气吞声地服从这样一个階級的統治，这个階級几世紀来就日趋沒落，这个階級的利益是和他們的利益相对立的，这个階級暫時重掌政权是他們一手造成的。資產階級和貴族之間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这个斗争几乎在和約締結后就开始了。

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錢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們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壟断权合成一个金錢的大特权和大壟断权。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資產階級消灭了国内各个現存等級之間一切旧的差別，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橫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們不得不把选举原則当做統治的基础，也就是說在原則上承認平等；他們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書報檢查对报刊的束縛；他們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階層的束縛，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

切而言，資產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是資產階級實行這一切改良，只是為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已往的一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這樣，他們通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的限制，使選舉原則成為本階級獨有的財產。平等原則又由於被限制為僅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銷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範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說，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這樣，出版自由就僅僅是資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出版需要錢，需要購買出版物的人，而購買出版物的人也得有錢。陪審制也是資產階級的特權，因為他們採取了適當的措施，只選“有身分的人”做陪審員。

我認為，為了說明以下兩個事實，這樣稍微談一下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必要的。第一，從1815年到1830年，各國工人階級的、實質上是民主主義性質的運動都或多或少地從屬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運動。雖然工人比資產階級先進，但是他們還看不出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即資產階級的解放和工人階級的解放之間的根本區別；當金錢還沒有在政治上獲得解放，當資產階級還沒有成為唯一的統治階級的時候，工人們是不能識別金錢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之間的區別的。因此，在彼得盧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民主主義者打算呈遞請願書，並不僅僅是為了要求普選權，而且同時是為了要求廢除谷物法；因此，1830年巴黎無產者為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進行了戰鬥，1831年英國無產者準備為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而投入戰鬥。從1815年到1830年，在一切國家里，資產階級都是革命派中間的最有力的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領袖。只要資產階級本身還在革命，還在進步，工人階級就不可避免地要充當資產階級手里的工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工人

階級單獨的運動始終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從資產階級取得了全部政權、金錢的勢力消滅了一切封建的和貴族的特權、資產階級不再進步和不再革命並且本身已經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階級的運動就開始領先，並且成了全民的運動。如果今天廢除谷物法，明天憲章就會成為英國的中心問題，憲章運動就會表現出保證自己取得勝利的力量、毅力、熱忱和堅韌不拔的精神。

第二個事實（為了說明這個事實，我稍微談了一下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專門和德國有關的。德國人是一個從事理論的民族，但是缺少實踐，因此他們把英法兩國資產階級的謬論當做神聖的真理。德國的資產階級都滿足於能夠安安靜靜地經營自己的規模不大的私人事業。在他們爭得了憲法的地方，他們就吹噓自己的自由，但是卻很少過問國家大事；在沒有憲法的地方，他們則覺得輕鬆愉快，因為他們可以擺脫選舉代表和閱讀代表們的長篇大論的麻煩。工人階級缺少使英法兩國工人從酣睡中蘇醒過來的那種強大的杠桿，就是說，缺少發達的工業和以發達的工業為前提的資產階級的統治。所以工人還沒有什麼動靜。在德國，在那些從前的封建制度又重新代替了現代的法國制度的地方，農民感到了壓迫，但是這種不滿情緒還需要新的刺激才會爆發為公開的反抗。所以，從1815年到1830年，德國的革命派只是由一些理論家組成。它的成員都是從大學里招收來的，他們都是一些大學生。

要在德國恢復1789年以前的舊制度顯然是不可能的。情況的變化迫使政府想出了一種新的、德國特有的制度。貴族想執掌政權，但是太軟弱無力；資產階級既沒有這個願望，又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執掌政權。但是兩者湊在一起，就有足夠的力量迫使政府做某些讓步。於是，一種不倫不類的君主政體就成了統治的形式。在

某些邦里，宪法在表面上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得到了保障；在其余各邦却存在着官僚政府，也就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君主政体，这种君主政体好像是通过优良的行政机关来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似的，但是这种行政机关是由贵族领导的，而贵族则尽量使这个机关的活动避开社会的耳目。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他们掌握着大权，他们和其他一切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这就是野蛮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

但是这种统治形式既不能使“贵族”、“基督教德意志人”、“浪漫主义者”、“反动派”满意，也不能使“自由主义者”满意。因此，他们就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组织秘密的学生团体。从这两个派别（因为它们不能够称为党派）的联合中产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自由主义者的派别；这些人在自己的秘密团体里梦想德国有这样一个皇帝，他头戴皇冠，身着紫袍，手执权杖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颌下是花白的或棕黄色的长髯，周围是各等级——僧侣、贵族、市民和农民分别议事的等级会议。这是封建的暴虐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骗局所合成的最荒谬的混合物，我们想像它多荒谬，它就有多荒谬。但是对那些不管目的、不惜代价而只求热烈的大学生来说，这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可是这种荒唐可笑的特殊混合物加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革命<sup>152</sup>、法国的烧炭党运动<sup>153</sup>和英国的改革运动<sup>154</sup>，已经吓得君主们几乎失去了理智。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说来，“革命”（指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和有局部冲突的运动）已经成了妖魔。

大量的逮捕和大规模的迫害把德国的这个“革命”镇压下去了；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正统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甚至土耳其皇帝对他统治下的希

希臘臣民施行絞杀和分尸的神权也暂时得到了神聖同盟的支持，但是他做得太露骨了，于是希腊人得到允許，脫离了土耳其的羈絆。

最后，巴黎的三日革命<sup>155</sup>發出了全欧資產階級、貴族和人民的憤怒总爆發的信号。波兰的貴族革命被鎮压下去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資產階級順利地取得了政权。英国的資產階級利用改革法案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在意大利，兼有人民的、資產階級的和民族的性質的起义被鎮压下去了。而在德国，不可胜数的起义和騷动，証明人民和資產階級的運動的新紀元已經来到。

1830年到1834年的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新的、汹涌澎湃的性質，这表明資產階級本身已經在着手解决問題。但是由于德国分为許多小邦，而且几乎每个邦都有自己的关卡和稅率，所以沒有共同的利益把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德国資產階級之所以要爭取政治自由，并不是为了要使公共事業适应于他們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們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面前为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羞耻。他們的运动缺少自由主义据以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的現實基础；他們对理論問題的兴趣要比对实际問題的兴趣大得多。德国的資產階級一般說来是所謂不大关心自己私利的人。但是1830年的法国資產者却不是这样。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拉菲特就說：“現在該我們这些銀行家来執政了。”而且到今天他們还在統治着。英国的資產階級也很了解他們把財產資格規定为10英鎊<sup>156</sup>的目的；但是德国的資產者，如我們已經說过的，是一些目光短淺的人，他們只是“出版自由”、“陪審制”、“宪法对人民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代議制”等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他們不是把这一切当做手段，而是当做目的。他們把影子当本質，因而一無所得。但是，資產階級的这个运动已足以掀起几十次革命（其中有两三次已获得了某些成

就)，引起無數次的群众集会，造成众口紛紜和报纸大吹大擂的情况，使民主运动在大学生、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了一点萌芽。

这里用不着来说明这个声势汹涌但最终失利的运动的冗长细节。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争得了某种重大的成果，例如巴登争得了出版自由，德意志联邦议会就会进行干涉并加以制止。这出滑稽剧以1819年和1823年大规模逮捕的重演，以德意志各邦诸侯为了阻止自由主义进一步扩展而在1834年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缔结秘密同盟而告终。这次会议的决议在前几年已经公布了<sup>157</sup>。

从1834年到1840年，德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沉寂下去了。1830年和1834年的活动家不是在狱中，就是亡命国外。在运动高涨时期保持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谨慎态度的人，继续和愈来愈严的书报检查制度、和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冷漠进行斗争。虽然议会反对派的首领还继续在议会里发表演说，但是政府却有办法保证自己获得多数票。看来，要在德国掀起一个社会运动的新高潮是绝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做它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所有这些运动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几乎都没有参加。全国的工人都表示不满，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骚动，但是这些骚动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毫无结果。普鲁士人的冷淡就是德意志联邦的主要力量。它表明德国资产阶级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只要我能够收集到必要的材料，用德意志各邦政府自己的一些行为（同这些行为相比，贵国内务大臣的所作所为看来就完全无可厚非了）<sup>158</sup>来说明这些政府的实质，我就将在下一封信里<sup>⊖</sup>谈谈

⊖ 恩格斯应允写的信未见于该报以下各号。——编者注



近六年来运动的情况。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您的德国通讯员

1846年2月20日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46年4月4日

“北極星报”第438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 弗·恩格斯 “傅立叶論商業的片断”的 前言和結束語<sup>159</sup>

德国人逐漸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輩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認为自己能够用輕視前輩和空談哲理的办法来掩飾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剛在德国出現，它就被一批投机分子用来作为資本。这些人把在法英两国已經陈腐了的論点翻譯成黑格尔邏輯的語言，就以为自己創造了奇迹；而現在他們就把这种新的智慧当做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論”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誣蔑目光短淺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實踐”和“可笑的”社会体系。这种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論極其幸运地稍許嗅到了一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气息，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癩的教授列入了永恒的范疇，后来也許还参考过費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sup>160</sup>。这种劣等的德国理論，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無困难地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适当的解釋，使它处于从屬的地位，“制服了”它，把它“提高”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論”的“更高的發展阶段”。当然，这种理論不会想到去稍許熟悉一下要提高到更高阶段的对象，去看一下傅立叶、聖西

門、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对这种理論來說，要宣告德国的理論光輝地战胜了外国人的可憐的掙扎，有了施泰因先生的貧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为了反对不朽的德国理論所表現的那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們在研究社会問題这方面應該感謝外国人的地方。現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張的詞句被吹嘘为真正的、純粹的、德国的、理論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則，而在所有这些夸張的詞句中，到現在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說过的話——他們說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才偶尔知道一些，并把这些話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做了再一次的發明，并把它当做嶄新的發明，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要是說，德国人也有些自己的东西，那末这只能是他們用来表达这种思想的那种討厭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的形式。他們儼然是真正的理論家，認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們还几乎一無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最一般的原則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規划，即**社会制度**。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現存社会的批評**——对社会問題作任何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主要任务，他們却泰然自若地抛弃了。不用說，关于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明的理論家通常也用輕蔑的口吻評論一番，或者干脆連提都不提一下。

我想建議这些聪明的先生讀一讀傅立叶的著作中不很长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可以給他們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沒有从黑格尔的理論出發，因此——可惜！——他不能認識**絕對真理**，甚至也不

能得出絕對的社会主义。的确,可惜正由于这个缺点,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分类的方法来代替絕對的方法,产生了海水变檸檬汁、couronnes boréale 和 australe [北極和南極發出灵光]、獅子改变兽性<sup>161</sup>、行星交配这些想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願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奇迹,而不相信那根本沒有任何檸檬汁的絕對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無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疇的交配。法国人的無稽之談至少是令人高兴的,而德国人的無稽之談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現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銳、非常生动和非常明睿的批評,人們会乐意原諒他那也是建立在天才的宇宙觀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的。

这里發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遺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載于傅立叶派在 1845 年初开始發行的“法郎吉”<sup>⊖</sup> 杂志第 1 期上。我刪去了其中屬於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的那一部分和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的那一部分。总之,我不受原文的拘束,而要使外国社会主义者为了一定目的而写的著作能被不知道这种目的的讀者所理解,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片断絕對不是傅立叶的著作中最有天才的作品,甚至也不是他論商業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比的文章。

为了使德国讀者不浪費精力去閱讀“法郎吉”杂志的原文起

⊖ “法郎吉”。社会科学評論, 1845 年巴黎“法郎吉”出版社出版, 創刊第 14 年第 1 輯, 八开本。傅立叶的手稿論三个外在統一的大綱發表在該杂志第 1—2 月号第 1—42 頁上 (《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 XIV. année, 1-re série in 8°, Paris, aux Bureaux de la Phalange. 1845.—Publication des Manuscrits de Fourier, section ébauchée des trois unités externes, p. 1—42 des Januar-und Februarheftes)。

見，我必須指出，該杂志純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里所登載的傅立叶的手稿，价值大小極不一致。發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的先生們已經成了像德国人那样的妄自尊大的理論家，他們用神聖不可侵犯的、庄重的、不实际的、晦涩的說教来代替他們的老师在揭露資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这使他們在法国受到应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們在“法郎吉”的第1期中所描繪的傅立叶主义的想像中的胜利会使运用絕对方法的教授們欣喜若狂。

我現在从已經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論”一書中發表过的一个題目开始本文。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該書中發表过。这里我只引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sup>162</sup>。

傅立叶就是这样写的。“法郎吉”第2期中刊載的这篇文章的續文包括証券交易、囤积居奇(accaparement)和寄生現象三章，这几章大部分都已經發表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論”一書中。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上面所录的片断已經完全足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做一个結束。

讓那些热中于在無底的 $\ominus$ 理論的“茫茫大海”中乘風破浪并竭力釣取“社会主义”的“原則”的德国学者先生們学学 *commis marchand*〔店伙計〕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絕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說出了許多理由，这些理由是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們”注意的。不錯，他們会反駁我，說傅立叶也一样地“抽象”，他靠自

$\ominus$  双关語：德文 *grundlos*，既有“無底的”意思，又有“沒有根基的”、“空無一物的”意思。——編者注

己的分类法想出了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不管傅立叶有怎样独特的怪癖，这也不能为干巴巴的德国理论的乏味的所谓发展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像未来的，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清算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给未来加上一个方向。譬如请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较一下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并终于不顾实际上有四大世界帝国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结构，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结构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歪曲了的内容，而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结构却已经没有任何内容了。

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初次碰到的第三手材料给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是这样。难道德国还有写社会问题文章的人没有说过傅立叶一句确实有辱于德国人做事切实认真的话吗？这些人中间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sup>163</sup>，他立刻利用“罗·施泰因的杰作”创立一个世界史的结构，这个结构只有一点令人感到遗憾，那就是它所根据的事实全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德国的理论至少已经有二十次给他确定了他在“绝对理念发展中的地位”，可是每次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每一次德国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以施泰因先生或其他同样不甚可靠的文件为根据。因

此，德国的“絕對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談談現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談談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說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魯东那样（而这还是經過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談一下财产，稍微为無产階級悲嘆几声，稍微談一下劳动組織，多少組織几个改善下層階級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經濟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無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論領域中沒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絕對平靜”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們却想用这些空話使德国革命，去推动無产階級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們德国的那些半边的和十足的共产主义教授們花些力量去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他們來說并不比任何一本德国書难懂），他們将会在这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进行推断和达到其他的目的！他們将会在这里找到多少新的（对德国來說目前还是新的）思想！但是到現在为止，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無产階級的处境外，还未能对現代社会提出任何責难，而且即使在無产階級的处境这方面，他們能够說的也不太多。当然，無产階級的处境是一个主要問題，但是对現代社会的批評难道就仅限于此嗎？傅立叶（除了他后期的著作外，他几乎沒有接触到这一問題）就証明了，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問題，也可以承認当前的社会完全不中用，而且仅仅根据对資產階級的批評，也就是对資產階級內部的相互关系的批評而不涉及它和無产階級之間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必須改造社会的結論。到目前為止，能够进行这种批評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毫不留情地揭穿有身分的人士的虛伪，揭穿他們的理論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們整个生活方式的空虛；他嘲笑他

們的哲学，嘲笑他們想使 perfection de la perfectibilité perfectibilisante〔日趨完善的完善能力臻于完善〕，嘲笑他們想追求 auguste vérité〔最高真理〕。傅立叶嘲笑這些人的“純潔的道德”，嘲笑他們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們的实践，把受到他的精辟批評的 doux commerce〔和气的商業〕，把不能提供享乐的放縱的享乐，把婚姻制度所容許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沒有談論过的現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曾經有人談論过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結果呢？說几句杂乱無章的話，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現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乱倫抱怨几句——全是虎头蛇尾！

德国人首先必須熟悉一下（哪怕是稍微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一下国外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業和法国的革命就是实际运动的例子，——然后他們必須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像他們的邻居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像各民族的功績大小这类無关痛痒的問題。但是到那时，这种詭辯式的爭論已經沒有听众了。

而現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書，毫無例外地都很拙劣。这样簡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評論一些著作，根本無法介紹这些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获得，有一部分篇幅过于龐大，有一部分杂有許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义并且在 1845 年已經引不起德国讀者的兴趣的材料。为了使这些对德国尚屬新鮮的具有宝貴內容的著作容易理解起見，我們必須进行編选，正像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材料一样。法国人在



这方面要比我們实际得多。經過这样編选的外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的重要著作,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輕而易举地写出具有独到見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可以希望,这一工作会給高明的德国理論家指出,他們的一切高見都已經陈旧了,在萊茵河和英吉利海峽的彼岸,这些問題早已爭出一个 pro et contra [孰是孰非]来了。只有他們知道了在他們之前已經做了些什么以后,他們才能表明他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布魯塞尔

写于 1845 年底

按年鑒原文刊印

第一次刊載于 1846 年的

原文是德文

“德国公民手册”年鑒上

署名:弗·恩格斯

## 弗·恩格斯 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

(慶祝 1792 年 9 月 22 日法蘭西共和國的成立)<sup>164</sup>

“我們和各個民族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和法蘭西共和國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不是老早就很了解各個民族了嗎？我們不是已經給每一個民族指出了適當的地位了嗎？我們不是已經把理論領域劃給德國人，把政治領域劃給法國人，把市民社會的領域劃給英國人了嗎？干嗎突然又把法蘭西共和國搬出來！為什麼要慶祝這樣一個發展階段的事情呢？這個階段老早就被超過了，被它自身的後果取消了。如果你想告訴我們一些英國的事情，那你最好是談談社會主義原則最近所達到的階段，請你告訴我們，片面的英國社會主義是不是還不知道它遠遠低於我們的原則高度，是不是還不知道它只能算是一個階段，而且只是發展中的一個被超過了的階段！”

親愛的德意志，請你冷靜些！無論是哪個民族或是法蘭西共和國都和我們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用以對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偽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義；這種兄弟友愛比德國的一切“真正社會主義”的理

論都要寶貴得多。

現代民主（它從法國革命中產生，後來發展成法國的共產主義和英國的憲章主義）旗幟下的各民族的兄弟友愛向我們表明，群眾和他們的代表比德國的理論家更懂得時代的要求。

“但是談論的問題不是這個呵！誰在談論這種兄弟友愛，誰在談論這種民主呢？我們談論的是各民族的兄弟友愛，而且就只是各民族兄弟友愛，我們談論的是民主，而且就只是民主，只是民主本身。難道你們把自己的黑格爾全都忘掉了？”

“我們不是羅馬人，我們都抽煙。”<sup>165</sup> 我們談論的不是現在在世界上發生的反民族主義的運動，而是靠純粹思考即靠毫無根據的幻想在我們的頭腦中消除民族的特點。我們談論的不是全歐洲所嚮往的現實的民主，即不同於從前的一切民主的完全特殊的民主；我們談論的完全是另外一種民主，即希臘、羅馬、美國和法國的民主的一種平均物，簡而言之，即民主這個概念。我們談論的不是屬於 19 世紀的、丑惡的、暫時的東西；我們談論的是永恆的、“早於山岳形成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範疇。總而言之，我們談論的不是大家所談論的東西，而是完全另外一種東西。

簡單地說，當英國人、法國人以及那些參加實際運動而不空談理論的德國人現在談論民主和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的時候，絕不應該只就其政治意義來理解。目前，只有德國的理論家和我們現在沒有加以考慮的少數外國人還有這類荒誕的想法。實際上，這些言論現在已經具有社會意義，而且它們的政治意義已經溶於社會意義之中。這個革命已經不是一個僅僅爭取某種國家形式的鬥爭，如像目前在德國還經常描繪的那樣。即使對問題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從當時大多數的起義和飢荒的聯繫、從首都糧食供應和

儲备物資的分配(1789年开始的)的意义、从最高限价令和对付粮食囤积商的法律、从革命军队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給茅屋和平”、从共和主义者唱的要 du fer [武器]、要 du coeur [勇气]、还要 du pain [面包]的“卡馬尼奧拉”歌<sup>166</sup>以及成百件的其他极为明显的事实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主和純政治的組織完全是两回事。此外,大家知道,1793年宪法<sup>167</sup>是由依靠起义的無产阶级的政党制定的,恐怖統治是由这个政党实行的,罗伯斯比尔的复亡表明资产阶级战胜了無产阶级,巴貝夫和他的同謀者从1793年的民主思想中給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結論。法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之后,純粹政治上的民主已經变为毫無意义的东西了。

**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無联系、認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發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發展起来的、好空談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經成了無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們全都認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們在估計共产主义的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計在內。而且,当各民族的無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們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詞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为除了我們現在沒有加以考虑的那些民主主义者之外,1846年欧洲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已經“被超过”,但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参加它的庆祝会。第一,所有因愚蠢而被人利用来镇压革命的人民,在他們終于明白了自己由于忠君爱国的情緒

干了什么样的蠢事之后，就應該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第二，現在歐洲的整個社會運動只不過是革命的第二幕，只不過是為結束1789年在巴黎揭幕而現在已經以整個歐洲作為舞台的那出戲作準備而已；第三，在我們這個充滿胆怯、自私和吝嗇的資產階級時代，回憶一下那個偉大的年代是完全適時的；那時全體人民曾經一度拋棄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嗇，那時他們是敢於反抗法律的、在任何東西面前都不退縮的人，是具有堅強毅力的人，曾經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機者，總之，使得一切資產者都不敢抬頭。在一個叫做路特希爾德的人掌握着歐洲和平的命運，克希林叫嚷着要實行保護關稅，科布頓叫嚷着要實行貿易自由，迪加爾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勞動階級狀況的協會來拯救罪孽深重的人類的時候，我們確實必須提起馬拉和丹東、聖茹斯特和巴貝夫，以及在熱馬普和弗略留斯兩地所取得的光榮勝利<sup>168</sup>。如果這個堅強有力的時代和這些剛毅果敢的人物對我們這個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響，那末，人類的确就會墮入失望的深淵，會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克希林、科布頓和迪加爾特這些人去隨意支配。

最後，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具有純粹的社會意義。幻想成立歐洲共和國和利用適當的政治組織來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談靠普遍的貿易自由來保護各族人民的團結一樣荒唐可笑；當所有這類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時候，各國的無產者就開始不聲不響地在共產主義民主的旗幟下真正地結成兄弟。也只有無產者才能够真正做到這點，因為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於他們認為這些利益高於一切，他們無法越出民族的範圍。他們的少數幾個理論家即使

把他們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則”都搬出來也頂不了什麼事，因為他們根本不觸犯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個現存制度，他們只會說空話。可是全世界的無產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敵人，面臨着同樣的鬥爭；所有的無產者生來就沒有民族的偏見，所有他們的修養和舉動實質上都是人道主義的和反民族主義的。只有無產者才能夠消滅各民族的隔離狀態，只有覺醒的無產階級才能夠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愛。

下面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剛才所說的一切。

還在 1845 年 8 月 10 日，在倫敦就差不多同樣隆重地慶祝過三個事件：1792 年的革命、1793 年憲法的頒布和“民主協會”的成立。“民主協會”是由參加 1838—1839 年運動的英國黨中最激進的一派建立起來的。

這個最激進的派別自然是由憲章主義者和無產者組成，不過這些無產者對憲章運動的目的都有明確的認識並且竭力促其實現。當時大多數的憲章主義者都還只想到把政權轉入工人階級手中，只有少數人才想到如何使用這個政權的問題，可是在當時的運動高潮中起重要作用的這個協會的成員卻一致認為，他們首先都是共和主義者，而且正是宣布 1793 年的憲法為自己的信仰的標志、斷然拒絕和資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聯合、始終認為被壓迫者在反對壓迫者的鬥爭中有权使用壓迫者用來反對他們的一切手段的共和主義者。他們還不止於此；他們不但是共和主義者，而且是共產主義者，並且還是不信宗教的共產主義者。到 1838—1839 年的革命高潮衰退時，協會瓦解了，但是它的活動並沒有落空，而是大大地加強了憲章運動的積極性，促進了憲章運動中的共產主義因素的增长。在上述的 8 月 10 日的慶祝會上已經

提出了共產主義和世界主義的<sup>⊖</sup>原則，除了政治平等的要求，還提出了社會平等的要求，並且會上大家都熱情地向各國民主主義者祝賀。

以前在倫敦也做過團結各國激進派的嘗試，但是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於英國民主主義者內部的分歧和外國人對此不了解，部分地是由於各國黨的領袖之間有原則上的分歧。民族差別嚴重地妨礙團結，甚至很早就住在倫敦的外國人都幾乎一點也不了解在他們眼前所發生的運動和事物的真相（雖然他們對英國的民主寄以莫大的同情），分不清激進的資產者和激進的無產者，並且企圖把臭名昭彰的敵人當做朋友聚集在同一个會上。由於這些原因，同時還由於不信任其他的民族，英國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又因為這種談判成功與否必然取決於各委員會的幾個領導人（他們大多是彼此不認識的）意見是否一致，所以更是容易犯這種錯誤。在過去那些嘗試中，由於這些人選擇得極不恰當，所以事情每次都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但是這種兄弟友愛是迫切需要的。每一次嘗試的失敗都只是激發大家再去努力。當倫敦的一些民主主義的領導人對這種事情感到厭倦的時候，就有其他的人來代替他們；1845年8月又做了一次彼此接近的嘗試，這次嘗試就不再是毫無結果了。<sup>169</sup>住在倫敦的各國民主主義者利用別人早已宣布要召開的9月22日的慶祝會公開地宣告他們聯合起來了。

出席這個會的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

---

⊖ “世界主義”一詞在這裡和在第668頁里都不應當理解為恩格斯在本篇里所批判的資產階級世界主義，而應當理解為它的第二個意義，即“沒有民族局限性和民族偏見”。——編者注

波兰人和瑞士人。匈牙利和土耳其也各有一个代表参加。文明的欧洲的三个大民族——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会上起了主导的作用，并且看来很值得人尊敬。大会的主席当然是英国人，是一位叫做托馬斯·庫伯的“宪章主义者”；他参加过 1842 年的起义，因而差不多坐了整整两年的监牢。在獄中他模仿“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記”写了一首叙事詩，博得了英国文学批評家的極大的好評。<sup>170</sup> 作为英国人的主要發言人在晚上發言的是乔治·朱利安·哈尼。他担任“北極星报”的編輯已經两年。“北極星报”是奥康璠尔在 1837 年創办的，它是宪章派的机关报；自从乔·霍布逊和哈尼共同編輯这个报纸以来，該报在各方面都成了欧洲最优秀的报纸之一。我只能提出几家小型的巴黎工人报刊如“同盟月刊”<sup>171</sup>和它相比。哈尼本人是一个真正的無产者，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运动。他是上述 1838—1839 年的“民主协会”的主要成員之一（8 月 10 日举行的庆祝会就是他担任主席），而且除了霍布逊，他就是最优秀的英国作家，——这一点有机会我就会設法向德国人証明。虽然哈尼对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論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对欧洲运动的目的却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完全站 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 [在原則的高度上]。在筹备这个世界主义的<sup>①</sup>庆祝会方面，主要的功績是他的。他不遺余力地促使各民族彼此接近，消除彼此的誤会，克服彼此間的个人的分歧。

哈尼在献詞时說道：

“1792 年的正直而勇敢的法国共和主义者永垂不朽！願他們曾經取得的終生为之奋斗的平等很快重現于法国，并且傳遍全欧洲。”

① 見本卷第 667 頁的編者注。——譯者注



到會的人向哈尼反復地歡呼了兩三次，他接着說道：

“在過去，我們如果舉行像今天這樣隆重的集會，不僅會遭到特權階級的蔑視、譏笑、嘲弄和迫害，而且還會遭到受人欺騙的、愚昧無知的群眾的毆打；這些群眾被神甫和當權者所愚弄，認為法國革命是可怕的妖魔鬼怪，是想起來就令人毛骨悚然、談起來就令人討厭的東西。你們也許記得，至少是你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會記得，就是不久以前，在我們的祖國這裡，每當人們要求廢除壞的法律、頒布好的法律的時候，立刻就會有人狂叫‘雅各賓派’。要是有人要求實行議會改革，降低稅收，實行國民教育，或採取任何稍帶進步性的措施，那末，我們可以預料得到，立刻就會有人拿‘法國革命’、‘恐怖統治’以及其他嗜血成性的魔鬼來吓唬那些已經胡子滿腮但是還沒有學會獨立思考的大孩子。（笑聲，鼓掌）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要說我們已經學會正確地理解這次偉大革命的历史，那我還是不相信。我要是打算借這個機會說一些聳人聽聞的話，吹噓一下自由、平等、人權、歐洲君主的同盟以及皮特和布朗施威克公爵的所作所為，那是很容易的。我可以在這個問題上發表長篇大論，也許還會受到人們的贊揚，認為我的演說帶有濃厚的自由思想的色彩，然而這樣却絲毫沒有接觸到真正的問題。法國革命所面臨的真正的大問題是消滅不平等，建立能夠保障法國人民過幸福生活的制度，人民大眾是從來沒有過這種幸福生活的。如果我們用這塊試金石來考驗革命活動家，我們就會很容易給他們作出正確的評價。例如拉斐德，作為憲政主義的代表也許是他那個集團內最正直最優秀的人；以聲望而論很少有人趕得過他。他在青年時代曾經去過美國，並且參加了美國反對英國暴政的鬥爭。美國人獲得獨立後，他回到了法國，以後不久我們就看到他出現在自己祖國當前革命的最前列。在他年邁的時候我們又遇到了他，這時他在法國已經是聲望最高的人物；‘三日’革命後，他成了法國真正的獨裁者，他一句話就可以廢立國王。拉斐德在歐洲和美洲也許比他的任何一個同時代人都享有更高的聲譽。假如他在後來的行動中仍然忠實於他最初的革命言論，那末這種聲譽他是應該享有的。但是拉斐德從來不贊成平等。（喊聲：“注意，注意！”）的確，最初他拋棄了自己的頭銜，放棄了封建特權，這是好的。當他是國民自衛軍的首腦，是資產階級崇拜的偶像，而且甚至還得到工人階級的同情的时候，他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先進的革命戰士。可是，他正需要前進的時候，却裹

足不前了。人民很快就看出，摧毀巴士底獄、廢除封建特權、鎮壓國王和貴族的結果只不過加強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可是人民對這一點是不滿的。（鼓掌）他們要求自由和權利，他們要求我們現在要求的東西——真正的、完全的平等。（熱烈鼓掌）當拉斐德看出了這一點以後，他變成了保守主義者，他不再做革命家了。正是他，為了在萬一發生騷亂的時候可以合法地槍殺和拷打人民而建議實施戒嚴令，而且他提出這個建議正是在人民遭到極端嚴重的飢饉的時候。在國王逃往發棧後，人民於1791年7月17日聚集在馬爾斯校場，要向國民議會呈遞請願書，反對這個賣國的國王重登王位，就在這個時候，拉斐德便根據這個法令親自下令屠殺人民。後來他甚至敢於用屠刀來威脅巴黎，用武力查封來威脅民眾俱樂部。8月10日革命後，他企圖率領他的士兵襲擊巴黎，但是這些士兵比他愛國，都不服從他的命令，於是他逃跑了，背棄了革命。不過拉斐德也許還是所有憲政主義者中的最好的一個，但是，我們的慶祝無論是對於他，或是對於他那個集團都沒有任何關係，因為他們甚至在名義上也不是共和主義者。他們虛偽地承認人民有主權，但是又把人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只允許他們稱為積極公民的納稅人享有選舉權。總而言之，拉斐德和憲政主義者都只不過是些輝格黨人，和那些用改革法案來欺騙我們的人相差無幾。（鼓掌）跟在他們後面的是吉倫特派；正是這些人通常被當做‘真誠而忠實的共和主義者’。但是我不能同意這種看法。對他們的才幹和口才我們當然不能不欽佩，在才幹和口才方面這一派的領導人都很出眾，在一些領導人身上，除了這些而外，還有其他優點，例如羅蘭堅貞正直，羅蘭夫人舍己忘我，巴巴魯熱情奔放。當我們讀羅蘭夫人或哲學家孔多塞過早地慘死這段歷史時，我們都不能不（至少我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激動。但是，無論如何吉倫特派不是人民能指靠的人，人民不能指望他們把自己從社會奴役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我們从不懷疑他們當中有許多有勇氣的人；我們承認他們忠實於自己的信仰。我們也許還可以相信，他們當中許多多半是無知，並沒有什麼罪過——當然，這只是就那些已經犧牲了的人而言，因為要是我們根據他們中間曾經在所謂恐怖統治下活過來的人來看這一派人，那末我們就必然會得出結論說，他們是有史以來最卑鄙的一群暴徒。這些活下來的吉倫特派分子幫忙撕毀1793年的憲法，實行了1795年的貴族憲法。他們伙同其他貴族奸黨策劃殺絕真正的共和主義者的陰謀，並且最後在法國造成了篡奪者拿破侖的軍事專制。（喊聲：“注意，注

意！”）吉倫特派的口才是備受贊揚的，但是，我們這些堅定不移的民主主義者絕不能僅僅因為他們能說會道就拜倒在他們面前；否則我們就应当向賣身求榮的貴族米拉波表示最高的敬意了。當起來爭取自由的人民粉碎了14世紀的奴隸制鎖鏈，離鄉背井前去抗擊國內的叛逆和國境綫上的外國軍隊的時候，他們為了抵抗敵人，需要的就不是吉倫特派的娓娓動聽的長篇大論和冠冕堂皇的理論，而是更重要的東西。‘麵包、武器和平等’——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東西。（鼓掌）麵包給挨餓的家庭；武器拿來反對專制制度的軍隊；平等是奮鬥的目標和犧牲的代價。（掌聲大作）用托馬斯·卡萊爾的話來說，吉倫特派只不過把人民當做‘一包可以用來炸毀巴士底獄的炸藥’，可以當做工具使用，可以當做奴隸看待。吉倫特派動搖在王權和民主政治之間；他們徒勞無功地想用妥協的辦法來逃避永恆的正義。他們失敗了，他們的失敗是理所當然的。堅毅剛強的人們把他們擊潰了，人民把他們從自己的道路上清掃出去。在山岳黨的各派中，我覺得值得提起的只有羅伯斯比爾和他的朋友。（熱烈鼓掌）山岳黨中大部分人是強盜，他們想的只是把革命果實攬為己有，根本不關心歷盡千辛萬苦勇敢地實現了這個革命的人民。這些壞蛋曾經一度擁護平等的人使用過同一種語言，和他們一起跟憲政主義者和吉倫特派進行過鬥爭，但是，一當他們掌握了政權，他們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們是死心塌地地反對平等的人。他們推翻了羅伯斯比爾，殺害了他，並且還處死了聖茹斯特、庫通和這位廉潔的立法者的其他朋友。這些叛徒和謀殺者殺害了平等的支持者還不滿足，他們還大肆誣蔑受害者，恬不知恥地把自己所犯的罪行栽誣在這些受害者的身上。我知道，流行的看法是把羅伯斯比爾僅僅看做怪物，但是我想，人們對這個非凡人物的品質完全改變看法的日子已為時不遠了。我絕沒有想把羅伯斯比爾當做神來崇拜，把他描繪成完人；但是我認為，他畢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革命領袖，懂得並且使用了正確的方法去根除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不合理的現象。（熱烈鼓掌）我沒有時間來談論不屈不撓的馬拉的品德，來談論聖茹斯特這位卓越地體現了共和主義豪俠精神的人物；我也沒有時間來列舉那些法律上的英明措施，這些措施都是羅伯斯比爾在治國方面堅決果斷的標志。我再說一遍，現在離開人們公正地評價羅伯斯比爾的一天已經不遠了。（鼓掌）在我看來，最能證明羅伯斯比爾的真正品質的是他的死亡引起了死在他後面的那些真誠的民主主義者的普遍惋惜，在這些民主主義者裡面還包括那些不了解他的心意因而誤入迷途並促成

了他的失敗的人；後來這些人痛悔自己一時糊塗，可是已經晚了。巴貝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那個著名的密謀的組織者。這個密謀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里不容許有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行為（鼓掌），不存在私有財產、貨幣和一切窮困的根源（鼓掌），大家的幸福應當建立在大家共同勞動和平等享受福利的基礎上。（熱烈鼓掌）這些無上光榮的偉大人物至死都在追求無上光榮的目的。巴貝夫和達爾特用自己的鮮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邦納羅蒂坐穿了牢獄，飽嘗了窮困，度過了暮年，仍然忠實於我們今天晚上大膽宣布的偉大原則。我還應當提一下英勇的代表羅姆、蘇布拉尼、杜魯阿、杜肯努阿和他們的同志；他們被國民公會中的貴族叛徒判處死刑後，還當面同兇手挑戰，把一把匕首依次傳遞下去，用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要講的第一部分就到此為止。第二部分我只說幾句話就可以了，因為在座的法國民主主義者在這方面會談得更好些。平等的原則將會恢復和勝利，這是毫無疑問的；其實這些原則已經恢復了，它們不僅是以共和主義綱領的形式出現，而且是以共產主義的形式出現，因為據我所知，目前在法國到處都有共產主義的組織。但是，這一點我留給我的朋友封丹博士和他的同胞來作更詳細的敘述。我非常高興，這些可敬的民主主義者現在都在場。今晚他們就可以親自看到法國主戰派所散播的反對英國人民的言論是荒謬的。（鼓掌）我們要堅決消除這種民族糾紛；我們鄙視和憎惡像‘天生的敵人’、‘生來的仇人’和‘民族的光榮’這類野蠻人的誘餌和圈套。（掌聲大作）我們憎恨一切戰爭，只有人民被迫起來反對國內壓迫和外國侵略的戰爭才是例外。（鼓掌）此外，我們反對‘外國人’這個字眼，今後應當把它從我們的民主字典中清除出去。（熱烈鼓掌）儘管我們可以屬於歐洲大家庭的任何一個支脈，英國也好，法國也好，意大利也好，德國也好，但是我們總的名稱是‘青年歐洲’，我們都在這面旗幟下一起反對暴政和不平等。”（熱烈鼓掌多時）

在一個德國共產主義者<sup>⊖</sup>唱完“馬賽曲”以後，威廉·魏特林接着宣讀第二篇祝詞，他說：

⊖ 約瑟夫·莫爾。——編者注

“讓我們為青年歐洲干杯！願各國民主義者拋棄以往的猜忌和民族糾紛，團結為兄弟般的集體，一起來消滅暴政，爭取平等的完全勝利。”

**魏特林**受到了極其熱烈的歡迎。由於他的英語說得不流利，他朗讀了下面的一篇講稿：

“朋友們！今天這個聚會證明我們每個人的心里都燃燒着一種感情，普遍的兄弟友愛的感情。儘管由於我們各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我們無法使用同一種語言來表達我們的這種共同的感情，儘管語言的不同妨礙着我們體會這種感情，儘管我們共同的敵人抓住並且利用一千種偏見來阻撓我們加強相互了解和發展普遍的兄弟友愛，儘管存在着所有這些障礙，但是這種強烈的友愛感仍然是根除不了的。（鼓掌）這種感情會使受苦的人成為患難與共的同志，會使爭取美好生活的鬥士成為戰友。（鼓掌）參加今晚我們所慶祝的革命的人也是我們的戰友；他們也是受了現在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奮鬥目標的鼓舞；這些目標可能也會使我們去迎接同樣的、希望是更加順利的戰鬥。（掌聲大作）在發生人民運動的時期，在我們國內的敵人的特權遭到嚴重的威脅的時候，這些敵人竭力把我們的偏見引到我們祖國的邊疆以外去，並且要我們相信，國境那邊的人威脅着我們共同的利益。真是騙人的把戲！如果我們冷靜地考慮一下，我們很快就會看出，離我們最近的敵人就在我們中間，就在我們自己的同胞中間。（喊聲：“注意，注意！”接着鼓掌。）我們應當害怕的不是國外的敵人，因為這些可憐的敵人的境遇和我們是一樣的。和我們一樣，他們也是被迫為成千的毫無用處的游手好閑之徒做工；和我們一樣，他們拿起武器反對別人也是迫於飢餓和法律，也是為盲目的熱情所驅使。掌權的人們對我們說，我們的弟兄殘忍而且擄掠成性。但是，難道還有誰比那些統治我們、教我們使用武器、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而唆使我們互相廝殺並把我們拖入戰爭漩渦的人們更加擄掠成性嗎？（鼓掌）真的是我們共同的利益非要戰爭不可嗎？一群羊由狼率領着去攻擊另一群也是由這些狼領來的羊，難道是為了羊的利益嗎？（掌聲大作）我們的最凶惡的敵人正是這些人；他們搶走了我們的一切，把我們的這些東西揮霍在吃喝玩樂之中。（鼓掌）他們從我們這裡搶走的都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因為他們所揮霍的一切都是我們生產出來的，這些東西應該歸我們這些生產者，歸我們的妻子和兒女，歸我們的老人和病人。

(掌声大作)但是,請看,他們怎样用陰謀詭計搶走了我們的一切,把我們的財產交給了一帮好吃懶做的寄生蟲。(鼓掌)說国外的敵人搶劫我們比我們本国的敵人搶得多,这是可能的嗎?說外国人杀害我們的人民比我們的那些冷酷的富豪杀害得多,这也是可能的嗎?这些富豪利用証券交易、重利盘剝和投机倒把,利用貨幣制度和宣告破产,利用壟断、教会捐稅和地租,利用所有这些手段从我們手里夺去了生活必需品,把我們的千百万劳动弟兄置于死亡的边缘,甚至不給他們留下足够的土豆来活命。(热烈鼓掌)所以,各国工人的真正敌人正是那些有錢就無所不能而無錢就什么也不成的人,而且除了工人的敌人之外,在人們当中就沒有其他的人类敌人,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嗎?(鼓掌)說我們在各国間發生战争的时候会遭到比現在这个所謂承平时期更厉害的掠夺和殘杀,这难道可能嗎?难道我們仅仅为了軍事上的光荣就要提倡民族偏見、流血和掠夺嗎?我們会从这种愚蠢的光荣中贏得什么呢?(鼓掌)既然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高尚的感情都和这种光荣不相容,那末我們要它干什么呢?(鼓掌)难道我們非为它付出代价不可嗎?(鼓掌)难道我們非为它辛苦劳动、流血牺牲不可嗎?(再次鼓掌)除了利用时机掉轉槍口来反对掠夺者和劊子手——各国的貴族——之外,所有这些攻城略地、流血牺牲难道还会給我們带来什么益处嗎?(热烈鼓掌)这些貴族,也只有这些貴族才是一貫地靠掠夺和杀人为生。穷人只是由于被迫和無知才成为貴族的工具;这些人是从各民族中网罗来的,本身都具有最濃厚的民族偏見并且希望看到所有其他民族都被本民族踩在脚下。但是,如果把这些人引到这里来,引到我們这个会上来,那末,他們也会互相了解,互相伸出手来。假如在一場战斗之前自由的捍衛者們能够向自己的弟兄發表演說,那末這場战斗就不会發生,也許反而会开一个像我們这样的联欢会。要是我們能够在戰場上召开哪怕是一个这样的会,那末我們就会多么迅速地战胜所有現在压迫我們、搶劫我們的貪婪的吸血鬼呵!(掌声大作)朋友們,这就是整个人类感情的流露,它發的热都集中在普遍的兄弟友爱,并且燃起了热情的烈焰;它很快就会把所有聳立在道路上的长期使我們弟兄分隔开的冰山融化掉。”(魏特林在經久不息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在魏特林之后致詞的是一位老共和主义者貝利耶-封丹博士。他早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初期就在巴黎的人权协会中起过显著的作

用。1834年，他牽連在四月審判案<sup>172</sup>中，可是翌年就和其他的被告一起從聖珀拉惹監獄里逃跑了（見路易·勃朗的“十年歷史”<sup>173</sup>一書）；後來他和法國的革命政黨一起前進並且和 Père [慈父] 卡貝保持着友誼的聯繫。與會者向貝利耶-封丹博士熱烈地歡呼；他接着說道：

“公民們！我的發言不得不簡短些，因為我的英語說得不太好。我看到英國的民主主義者慶祝法蘭西共和國，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我從心底裡體會到朱利安·哈尼先生所表示的崇高的感情。我向你們保證，法國人民從來沒有想到要把英國人民當做自己的敵人。有些法國記者寫文章反對英國政府，但是這並不等於他們寫文章反對英國人民。英國政府之所以為全歐洲所深惡痛絕，因為它不是英國人民的政府，而是英國貴族的政府。（鼓掌）法國民主主義者絕沒有對英國人民抱敵視態度，相反地，他們希望和英國人民結為兄弟。（掌聲大作）法國的共和主義者並不是僅僅為了法國而戰鬥，而是為了全人類而戰鬥；他們力圖建立平等，並把它的幸福的果實傳遍世界。（熱烈鼓掌）他們宣布全人類都是自己的兄弟，他們所反對的只是其他國家的貴族。（鼓掌）公民們，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平等的原則已經復活了。共產主義正以巨人的步伐在全法國邁進。共產主義的協會已經遍布全國。我希望，我們很快就看到各國民主主義者結成偉大的聯盟，這個聯盟將是共和主義的共產主義在全歐洲取得勝利的保證。”（封丹博士在再次的掌聲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隨後全體為“青年歐洲”舉杯，接着是三次高聲的“歡呼”和“再次的歡呼”，以後就為托馬斯·倍恩和各國犧牲了的民主主義者默哀，接着為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犧牲了的民主主義者默哀，向被放逐的憲章主義者弗羅斯特、威廉斯、瓊斯和愛里斯致敬，向奧康瑙爾、鄧科布和其他宣傳憲章的人致敬，最後是三次為“北極星報”歡呼。然後用各種語言（我發現只是沒有提到用德語）唱民主歌曲。於是慶祝會在極其親切友愛的气氛中結束。

这样就举行了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一千多个民主主

义者的大会。他们齐聚一堂来庆祝一个似乎和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关的事件，即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大会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吸引某个集团；会上除了谈论伦敦的宪章主义者所了解的民主主义之外，也看不出还谈论过什么别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到会的大多数人总的说来都正确地代表了伦敦的宪章派无产者群众。而且这个会一致热烈欢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一词本身。宪章主义者的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庆祝会，并且如英国人自己所承认的，“像那天晚上的那种热情在伦敦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了”。

所以我断言，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年底

按杂志原文刊印

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

原文是德文

署名：弗·恩格斯



## 声 明

据 1 月 18 日(第 18 号)“萊茵观察家”<sup>174</sup>报道,“特利尔日报”編輯部曾發表声明說,在为該报撰稿的各式各样的作家中也有“馬克思”。为了避免任何誤会起見,特声明如下:我从来没有为該报写过片紙只字,因为該报那种資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傾向是同我毫不相容的。

卡尔·馬克思

1846 年 1 月 18 日于布魯塞尔

載于 1846 年 1 月 26 日

“特利尔日报”第 26 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業年表

索 引



## 注 釋

- 1 “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一書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寫的第一部著作。該書寫於1844年9月至11月間，並於1845年2月在美茵河畔法蘭克福問世。

“神聖家族”是對鮑威爾兄弟及其鳩集在“文學總匯報”周圍的追隨者們的一種諛諧的稱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書中駁斥了鮑威爾及其他青年黑格爾派（或黑格爾左派），同時也批判了黑格爾本人的唯心主義哲學。

早在1842年夏季柏林成立所謂“自由人”小組時，馬克思就已同青年黑格爾派發生了嚴重的分歧。1842年10月馬克思擔任“萊茵報”編輯，當時參加報紙工作的還有一些柏林的青年黑格爾派。馬克思反對在報上發表脫離實際生活和沉醉於抽象的哲學爭論的“自由人”小組所撰寫的又空泛又浮夸的文章。馬克思和“自由人”決裂後的兩年當中，馬克思、恩格斯同青年黑格爾派之間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分歧達到了極其深刻而又不可調和的程度。這不僅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從唯心主義轉變到了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變到了共產主義，而且還說明鮑威爾兄弟及其同道們當時已經蛻化。鮑威爾及其小集團在“文學總匯報”上背棄了“1842年的激進主義”以及明顯表現出這種激進主義的“萊茵報”；他們墮落到陳腐的、庸俗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地步，鼓吹一種“理論”：認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純粹的批判”的體現者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群眾、人民似乎只是毫無生氣的東西，是歷史發展的障礙。

為了揭露這種有害的反動的思想，捍衛自己的新的唯物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首次合寫這一部著作。

在恩格斯逗留巴黎的十天中，他們就已擬定了全書的大綱，分好了章節，並合寫了“序言”。該書書名最初是叫“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

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前就写完了他所分担的几个章节。馬克思負擔了全書的絕大部分，直到1844年11月底他才写完，同时，为了写作分担的几个章节他利用了自己在1844年春夏所写的一部分經濟哲学手稿，以及对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历史研究的心得和其他許多筆記、摘要，于是大大超过了本書預定的篇幅。在本書排印过程中，馬克思在标题上又加了“神聖家族”这几个字。本書的目录标明了哪些章节是馬克思写的，哪些章节是恩格斯写的（見本卷目录I—IV頁）。本書开本小，篇幅已超过20印張，因此，根据德意志某些邦当时的規章，它沒有遭到書报檢查机关的預查。——第3—4頁。

- 2 “文学总匯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鮑威爾主編的德文月刊，于1843年12月—1844年10月在沙洛頓堡發行。——第7頁。
- 3 指卡·賴哈特在“文学总匯报”第1、2两期（1843年12月和1844年1月）上發表的文章“关于赤貧化的論文”。——第9頁。
- 4 *Mühleigner*（直譯是“磨坊主”），德語里沒有这个字，它是由英語的 mill-owner（工厂所有者、厂主）譯过来的。恩格斯在这里嘲笑“文学总匯报”的撰稿人茹·法赫爾在自己的文章里使用了他按英国字的形式生造的字。——第13頁。
- 5 恩格斯指的是茹·法赫爾在“文学总匯报”第7、8两期（1844年6月和7月）上發表的“英国的迫切問題”一文。——第13頁。
- 6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徹斯特的厂主科布頓和布莱特于1838年創立的。旨在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輸入谷物的所謂谷物法，是为英国大地主的利益实行的。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廢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見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在谷物法問題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关于廢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結束。——第15頁。

- 7 在英国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限制的斗争早在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 30 年代初就已經开始，这一斗争席卷了广大的無产階級群众。由于土地貴族的代表力求在反对工業資產階級的斗争中利用这一深得人心的口号，他們在議會里維護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从 1833 年起，在議會里拥护这一法案的首要人物是“托利党人慈善家”艾釋黎勋爵。——第 15 頁。
- 8 这是布·鮑威爾的話，引自他的“自由的正义事業和我自己的事業”一書，1842 年苏黎世和温特圖尔版 (《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2)。——第 18 頁。
- 9 这里指的是“璫威尔克先生和哲学系”一文，这篇文章載于“文学总匯报”第 6 期(1844 年 5 月)，署名《J.》，是荣格尼茨(Jungnitz)这个姓的第一个字母。——第 19 頁。
- 10 指免除布·鮑威爾的职务。因为他發表了批判聖經的著作，普魯士政府于 1841 年 10 月暫時剝夺、而在 1842 年 3 月永久剝夺了他在波恩大学講学的权利。——第 19 頁。
- 11 恩格斯在这一节里分析并引用了埃·鮑威爾在“文学总匯报”第 5 期(1844 年 4 月)上發表的对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Flora Tristan. «L'Union ouvrière»)一書(1843 年巴黎版)的評論。——第 21 頁。
- 12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現象学”(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該書第一版于 1807 年間世。馬克思在写“神聖家族”时所使用的版本是“黑格尔全集”第二版第 2 卷(Hegel. Werke. 2-te Aufl., Bd. II, Berlin, 1841)。——第 24 頁。
- 13 摘自席勒的詩篇“来自异乡的少女”。——第 26 頁。
- 14 这里指的是比·約·蒲魯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P. J. Proudhon.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該書第一版于 1840 年在巴黎問世。馬克思所引用的是 1841 年的巴黎版本。

“什么是財產？”一書是用矛盾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寫成的，由於它對私有制進行了尖銳的攻擊，出版後曾經轟動一時。馬克思在他的“論蒲魯東”一文中曾對該書做了全面的批判的評價，這篇文章是用給“社會民主黨人報”（《Social-Demokrat》）主編施韋澤的書信的形式於 1865 年發表的。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的這一節中所批判的埃·鮑威爾的文章“蒲魯東”，刊載於“文學總匯報”第 5 期（1844 年 4 月）上。——第 27 頁。

- 15 馬克思所指的是因結在巴黎“改良報”（《La Réforme》）周圍的一個政治集團，參加這個集團的是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第 29 頁。
- 16 “德法年鑒”（《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盧格。僅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卡·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19—451、452—467、596—625、626—655 頁）。這些著作標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地轉到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誌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第 39 頁。
- 17 “黑格爾全集”1833 年柏林版第 8 卷第 256 頁，“法哲學原理”第 190 節（G. W. F. Hegel. Werke. Bd. VIII, S.256, Berlin, 1833.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90）。這部著作的第一版於 1821 年在柏林問世。——第 49 頁。
- 18 J. B.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該書於 1803 年在巴黎出第一版，馬克思所引用的是該書的第三版（1817 年）。——第 53 頁。



- 19 这段話出自沙·孔德的著作“論财产”1834年巴黎版第1卷第52頁上(«Traité de la propriété». T. I, p. 52, Paris, 1834); 蒲魯东在“什么是财产?”一書(1841年版)第93頁上引用了这段話。——第55頁。
- 20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本書第一版于1776年在倫敦問世。——第61頁。
- 21 这里指的是“文学总匯报”第7期(1844年6月)上所刊載的施里加对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評論。这部小说用感伤庸俗的笔調写成,書中充滿了社会幻想,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后,不仅在法国国内大負盛名,而且在国外也享有声誉。——第67頁。
- 22 莫里哀“醉心貴族的小市民”第二幕第四場(見1956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版第31頁。——譯者注)。——第68頁。
- 23 指1830年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后所通过的立宪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nelle),它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真理”是諷刺的話,隱指路易·菲力浦在1830年7月31日發表的宣言結束語:“今后宪章就是真理。”——第70頁。
- 24 馬克思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場(“魔女之厨”)中的对句改写的。——第78頁。
- 25 引自沙·傅立叶的“关于普遍統一的理論”(«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一書第3卷第2篇第3章。該書初版于1822年問世,名为“論家庭农业协会”(«Traité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agricole»)。——第83頁。
- 26 阿·阿·蒙泰“法兰西各等級近五百年的历史”1828—1844年巴黎版第1—10卷(A. A. Monteil. «Histoire des français des divers états aux cinq derniers siècles». T. I—X, Paris, 1828—1844)。——第89頁。

- 27 莎士比亚“終成眷屬”第一幕第三場。——第 89 頁。
- 28 Polydori Vergilii liber de rerum inventoribus. Lugduni, 1706. ——第 90 頁。
- 29 弗罗芒“自复辟时代以来，特別在弗朗舍和德拉沃年代的警察内幕”1829 年巴黎版第 1—3 卷 (Froment. «La Police dévoilé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notamment sous M. M. Franchet et Delavau». T. I—III, Paris, 1829)。——第 94 頁。
- 30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書綱要” (G. W. F. Hegel.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全書第一版于 1817 年問世。馬克思参考了 1830 年的第三版。——第 100 頁。
- 31 此处和以后的引証都出自在“文学总匯报”第 1 期 (1843 年 12 月) 上發表的布·鮑威尔的文章“犹太人問題的最新論文”；这篇文章是鮑威尔針对在报刊上对他的“犹太人問題”一書的批評所做的回答。——第 100 頁。
- 32 布·鮑威尔的“犹太人問題” (B. Bauer. «Die Judenfrage») 是一本增訂本，其中补充了布·鮑威尔曾用同一題目發表在 1842 年 11 月的“德国年鑒”上几篇論文。該書于 1842 年在布朗施威克出版。——第 100 頁。
- 33 这里指的是“巴黎革命” («Révolutions de Paris») 周报，該报于 1789 年 7 月—1794 年 2 月在巴黎發行。在 1790 年 9 月以前，革命政論家、民主主义者埃利塞·路斯达洛任該报編輯。——第 104 頁。
- 34 即路·費尔巴哈的“哲学改革的預拟提綱”，写于 1842 年 1 月，被書报檢查机关禁止在德国出版，于 1843 年，發表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現代哲学和政論界軼文集”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第 2 卷。在这两卷集里也編入了卡·馬克思、布·鮑威尔、弗·科本、阿·卢格等人的論文。——第 105 頁。

- 35 空論派 是复辟时期(1815—1830)法国资产阶级政客集团;空論派是立宪君主主义者、民主和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所以他們極欲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和貴族的同盟;空論派最有名的人物是历史学家弗·基佐和哲学家保·魯瓦埃-科拉尔。后者的观点在哲学方面是对18世紀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思想的反动。——第108頁。
- 36 馬克思指的是布·鮑威尔在“文学总匯报”(1843年12月)第1期發表的文章“犹太人問題的最新論文”。——第110頁。
- 37 “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2頁,“法哲学原理”序言(G. W. F. Hegel. Werke. Bd. VIII, S. 12, Berlin, 1833.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Vorrede)。——第111頁。
- 38 这里指的是卡·馬克思的“論犹太人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頁。——第111頁。
- 39 这里指的是布·鮑威尔对黑格尔右派分子辛利克斯的講义第1卷的評論。这份講义用“政治講义两卷集”(«Politische Vorlesungen». Bd. I—II)的名称于1843年在哈雷出版。鮑威尔的这篇評論載于“文学总匯报”第1期(1843年12月)。下面的一篇即“辛利克斯,第二号”,指的是布·鮑威尔在“文学总匯报”第5期(1844年4月)上对该講义第2卷的評論。——第115頁。
- 40 布·鮑威尔的“国家、宗教和政党”(«Staat, Religion und Parthei». Leipzig, 1843)一書是匿名出版的。——第115頁。
- 41 路·費尔巴哈“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圖尔版(L. Feuerbach.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第117頁。
- 42 这一段及以下的引文都出自布·鮑威尔为反駁他的“犹太人問題”一書的批評者而写的第二篇文章。鮑威尔的这第二篇文章和第一篇的标题一样,即“犹太人問題的最新論文”,發表在“文学总匯报”第4期(1844年3月)。——第120頁。

- 43 这是布·鮑威尔在“文学总匯报”第8期(1844年7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馬克思在“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討”这一节中所引用的“文学总匯报”上的全部引文几乎都是摘自这篇文章。——第127頁。
- 44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简称。該杂志自1841年7月由阿·卢格主编,在萊比錫出版。1838—1841年該杂志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由于“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在普魯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編輯部从普魯士的哈雷城迁移到薩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沒有出版多久。1843年1月薩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同时联邦議会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内出版。——第128頁。
- 45 “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倫出版。該报系萊茵资产阶级代表創立,对普魯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緒。該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派撰稿。1842年4月馬克思开始为“萊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該报編輯之一。“萊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担任編輯期間,該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質。政府当局对“萊茵报”进行了特別严格的檢查,后来把它封閉了。——第128頁。
- 46 B. Bauer. «*Das entdeckte Christenthum*».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 ——第129頁。
- 47 布·鮑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萊比錫版第1—2卷;1842年布朗施威克版第3卷(B. Bauer.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1—2, Leipzig, 1841; Bd. 3, Braunschweig, 1842)。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把前三篇福音(即馬太、馬可、路加三福音,因它們的內容类似,故統称复类福音。——譯者注)的編者称为复类福音作者。——第134頁。

- 48 指卡·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頁。——第136頁。
- 49 指收集在“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張”(«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 這本文集里的布·鮑威爾的“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一文。這本文集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詩人格·海爾維格于1843年在蘇黎世和溫特圖爾出版的。——第137頁。
- 50 “普魯士福音教和科學”1840年萊比錫版(«Die evangelische Landeskirche Preussens und die Wissenschaft». Leipzig, 1840)。布·鮑威爾的這本書是匿名出版的。——第144頁。
- 51 *Cercle social*(社會小組)是民主知識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組織,于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初年代在巴黎進行活動。*Cercle social*在共產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看出:社會小組的思想家克·福適主張平均分配土地,限制過多的財產,並主張對凡有勞動能力的公民都給予工作。克·福適對法國革命文獻中所宣布的形式上的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瘋人派”的領導者雅克·盧對這一問題發表了大膽得多的言論。——第152頁。
- 52 比·讓·若·卡巴尼斯“人的肉體和精神的關係”(P. J. G. Cabanis. «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第一版于1802年在巴黎出版。這部著作的很大一部分曾于1798—1799年間在法國科學院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第160頁。
- 53 揚遜派(由荷蘭神學家揚遜的名字而來)是17世紀和18世紀初法國天主教徒中的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反映了一部分法國資產階級對正統天主教的封建思想的不滿情緒。——第161頁。
- 54 約·洛克“關於人類理性的經驗”(J.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一版于1690年在倫敦出版。——第162頁。
- 55 “關於人類知識的起源的經驗”(«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孔狄亞克這本書的第一版是1746年在阿姆斯特

- 特丹匿名出版的。——第 165 頁。
- 56 爱尔維修“論人及其智力和教育”(Helvétius. «De l'homme,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éducation»)。作者逝世以后，这部著作在俄国駐荷兰大使德·阿·哥利岑的协助下第一次于 1773 年在海牙出版。——第 165 頁。
- 57 “人是机器” 1748 年来頓版(«L'homme machine». Leyden, 1748)。拉美特利匿名在来頓出版的这本书曾被焚毀，而作者本人則被驅逐出荷兰。他是在 1745 年从法国亡命到荷兰的。——第 166 頁。
- 58 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或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規律”(«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s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一書的第一版于 1770 年出版；为了免于暴露，作者的名字用了 1760 年逝世的法国科学院秘書日·勃·米拉波的名字。——第 166 頁。
- 59 讓·巴·罗比耐“自然論”(J. B. Robinet. «De la Nature»)。第一版(四卷集)于 1763—1766 年間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 166 頁。
- 60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講义”(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这部著作第一次發表于“黑格尔全集”第一版中(Hegel. Werke. Bd. XIII—XV, Berlin, 1833—1836)。——第 168 頁。
- 61 关于“哈雷年鑒”杂志，見本卷注 44。——第 168 頁。
- 62 爱尔維修“精神論” 1822 年巴黎版第 1—2 卷(Helvétius. «De l'Esprit». T. I—II, Paris, 1822)。爱尔維修这本书的第一版是在 1758 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的，后来在 1759 年被劊子手所焚毀。——第 169 頁。
- 63 指霍尔巴赫的著作“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則” 1822 年巴黎版第 1—2 卷(«Système social, ou Principes naturels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 T. I—II, Paris, 1822)。霍尔巴赫这部三卷集著作的第一版是在 1773 年匿名出版的。——第 169 頁。

- 64 “懲罰和獎賞的理論”。耶利米·邊沁先生的手稿摘要。1825—1826年巴黎第三版第1—2卷（《Théorie des peines et des récompenses》。Ouvrage extrait des manuscrits de M. Jérémie Bentham. T. I—II, 3-me éd., Paris, 1825—1826）。第一版于1811年出版。——第170頁。
- 65 “總匯報”（《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國的一家反動的日報，1798年創刊，1810—1882年在奧格斯堡出版。——第170頁。
- 66 羅·施泰因“現代法蘭西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842年萊比錫版（L. Stein.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Leipzig, 1842）。後來查明，本書的作者是普魯士政府的暗探。——第171頁。
- 67 指“邏輯學”（《Wissenschaft der Logik》）。馬克思所引用的是“黑格爾全集”第二版（G. W. F. Hegel. Werke. 2-te Aufl., Bd. V, Berlin, 1841）。黑格爾的這部著作最初是以三卷集的形式於1812—1816年出版的。——第176頁。
- 68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浮士德的書齋”）。——第180頁。
- 69 “思辨神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spekulative Theologie》），1836—1838年間在柏林出版，編輯是當時屬於黑格爾右派集團的布·鮑威爾。——第182頁。
- 70 引自法國作家讓·弗·馬蒙台爾的獨幕喜劇“呂錫爾”第四場。——第183頁。
- 71 埃·鮑威爾的小說“堅定不移的原則萬歲！”收在1843年在柏林出版的阿·魏爾和埃·鮑威爾的“柏林小說集”（A. Weill und E. Bauer. «Berliner Novellen》. Berlin, 1843）中。——第187頁。
- 72 “柏林學社”（《Berliner Couleurs》）是“文學總匯報”的記者對一些不屬於布·鮑威爾集團並在若干枝節問題上批評“文學總匯報”的柏林青年黑格爾派的稱呼；其中有麥克斯·施蒂納。——第189頁。

- 73 馬克思指的是布·鮑威爾著的文章“神學意識的痛苦和快樂”，此文發表在“德國現代哲學和政論界軼文集”第2卷。——第193頁。
- 74 “和平民主日報”(《*La Démocratie pacifique*》)是傅立葉派主辦的日報；1843—1851年間于巴黎出版，該報主編是維·孔西得朗。——第194頁。
- 75 引自海涅的“北海集”(詩集第二集，“問海”)。——第200頁。
- 76 引自德國民歌“修女”。——第205頁。
- 77 引自德國民間滑稽故事“七個施瓦比亞人”。——第208頁。
- 78 引自歌德所著的“溫和的諷刺詩”。——第224頁。
- 79 “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國資產階級報紙“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稱，1789年于巴黎創刊。在七月王朝時期是政府的報紙，奧爾良派資產階級的機關報。——第242頁。
- 80 “世紀報”(《*Le Siècle*》)是1836至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種日報。在19世紀40年代中，該報反映了那一部分只要求溫和的憲法改良的小資產階級的观点。——第242頁。
- 81 指的是報紙“小廣告”(《*Petites affiches*》)，這是法國最老的一種期刊，1612年創辦于巴黎；它是一種刊載各種廣告和通知的新聞小報。——第242頁。
- 82 “撒旦”(《*Satan*》)是資產階級的小型諷刺報，1840—1844年在巴黎發行。——第243頁。
- 83 這裡馬克思引用的是沙·傅立葉的下述幾部著作：“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第一版于1808年間世)，“經濟的和公有的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第一版于1829年間世)，以及“關於普遍統一的理論”(見本卷注25)。——第250頁。



- 84 Chaptal. «De l'Industrie française». T. I—II, Paris, 1819. — 第 255 頁。
- 85 福尔土納特 是德国民間傳說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用之不竭的錢袋和一頂魔帽。——第 255 頁。
- 86 引自沙·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運的理論”第二部的跋。——第 255 頁。
- 87 这里指的是那些喪失了自己权力的德国小公爵，在拿破侖战争和維也納會議期間(1814—1815 年)由于重新划分德国的政治地圖，他們的領地被并入較大的德意志各邦的領土之內。——第 258 頁。
- 88 “青年英国”是屬於托利党的一些英国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集团，組成于 19 世紀 40 年代初。“青年英国”社的活动家們流露了土地貴族对資產階級經濟和政治实力的增强的不滿情緒，并采取了蠱惑性的手法，企圖把工人階級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們来反对資產階級。在“共产党宣言”中，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把他們的观点确定为“封建的社会主义”。——第 260 頁。
- 89 馬克思加了諷刺性的插話的这段引文，是引自希采尔的苏黎世的通訊，此通訊登載在“文学总匯报”第 5 期上(1844 年 4 月)。——第 267 頁。
- 90 引自法国的席間小調。——第 268 頁。
- 91 “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書是弗·恩格斯 1844 年 9 月—1845 年 3 月在巴門写成的。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間(1842 年 11 月—1844 年 8 月)研究了英国無產階級的生活条件，他本来打算在他計劃写的英国社会史中分出一章來說明这个問題，但是恩格斯为了要說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便决定專門写一本書来研究英国工人階級状况。

本書的德文第一版在 1845 年在萊比錫出版，德文第二版在 1892 年出版。那时經作者同意的本書英譯本已出过两版(1887 年紐約版和 1892 年倫敦版)。恩格斯在准备出本書的新版时，並沒有做任何重大的修改。但是在 1887 年“美国版附录”(这篇附录的内容后来几乎完全包

括在 1892 年的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序言中) 中, 恩格斯認為必須告訴讀者: 不应当把“英国工人階級狀況”這本書当做一本成熟的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这样写道:“……在本書中到处都可以發現現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書(特別是在末尾) 大力強調: 共产主义不純粹是工人階級的党的学說, 而且是一种理論, 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个社会从現存关系的狹窄的范圍中解放出来。这个論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 然而在實踐中却是無益的, 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 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 那末工人階級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进行社会革命。”接着, 恩格斯就解釋, 为什么他在 1845 年所做的“英国将在最近發生社会革命”的預言沒有証实。他認為, 1848 年以后宪章运动的低潮和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暫時胜利是与英国工業壟断世界市場有直接联系的, 并且他确信, 一旦英国丧失了壟断地位, “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現”。——第 269 頁。

- 92 “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这一篇文章是恩格斯用英文写的, 他本打算以单行本出版并分發給英国各政党的某些領袖、著作家和議會議員們。1845 年和 1892 年德文版“英国工人階級狀況”中轉載了这篇文章, 1887 年的美国版和 1892 年的英国版并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在里面。——第 273 頁。
- 93 指 1844 年 6 月 4—6 日西里西亚織工的起义 (这是德国無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第一次大規模的階級搏斗) 及 1844 年夏天發生的包括布拉格近郊織工在內的捷克工人的騷动。——第 280 頁。
- 94 “德勒穆紀事報” (《*Durham Chronicles*》)——周刊, 从 1820 年起在英格兰的德勒穆出版。該報在 19 世紀 40 年代的时候傾向于資產階級自由派。——第 293 頁。
- 95 这里指 1832 年 6 月英国議会所进行的选举法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断, 并为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議会的方便之門。在爭取改革的斗争中成为主要力量的無产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被自由資產階級所欺騙, 沒有获得选举权。——第 297 頁。

- 96 指 1844 年的議會會議。并見本卷第 460—462、571 和 581 頁。——第 297 頁。
- 9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596—625 頁。——第 300 頁。
- 98 恩格斯引自奧爾斯頓牧師的一篇報道。這篇報道起初載于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機關報“每周快訊”，后来又轉載于 1844 年 5 月 4 日的憲章派報紙“北極星報”第 338 號。——第 309 頁。
- 99 “泰晤士報”(《*The Times*》)是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的報紙，1785 年創辦于倫敦。——第 312 頁。
- 100 哈得茲菲爾德居民于 1844 年 7 月 19 日選出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本城的衛生狀況。恩格斯在這裡引証了該委員會的報告。這篇報告載于 1844 年 8 月 10 日“北極星報”第 352 號。——第 322 頁。
- 101 克薩爾-摩爾 是曼徹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們常在那里舉行集會。恩格斯把它比為古羅馬的聖山，也就稱它為“聖山”。根據傳說，公元前 494 年，古羅馬的平民會起義反抗貴族，後來退往聖山。——第 326 頁。
- 102 “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國資產階級報紙，自由貿易派的機關報，後來成為自由黨的機關報。該報從 1821 年起在曼徹斯特出版。——第 352 頁。
- 103 恩格斯引自威·岑卜尼斯牧師關於倫敦碼頭工人狀況的報道。這篇報道起初載于“每周快訊”，后来又轉載于 1844 年 5 月 4 日“北極星報”第 338 號。——第 371 頁。
- 104 考溫所寫的“從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統計看居民的衛生狀況”，這篇文章載于 1840 年 10 月號“倫敦統計學會會刊”。——第 391 頁。
- 105 首都建築法案 (*Metropolitan Buildings Act*) 于 1844 年在英國議會通過。——第 394 頁。

- 106 1802 年的学徒法把兒童学徒的工作時間限制在十二小時以內，并禁止讓他們做夜工。此項法律只是在棉紡織業和毛紡織業中實行，并且沒有規定工厂視察制來加以監督，而事實上厂主們也不遵守它。——第 436 頁。
- 107 1819 年的法律禁止棉紡織工厂雇用九歲以下的兒童，禁止兒童和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做夜工，并規定他們的工作時間每天不超過十二小時，其中不包括吃飯時間，由于這段時間厂主可以任意加以安排，因此實際上工人每日工作時間達十四小時或十四小時以上。  
1825 年的法律規定每天吃飯時間總共不得超過一小時半，以便每個工作日的總時間不致超過十三小時半。正像 1819 年的法律一樣，1825 年的法律沒有規定工厂視察制來加以監督，而厂主們也不遵守它。——第 456 頁。
- 108 “弗利特寄語”（《*The Fleet papers*》）是 1841—1844 年間奧斯特勒在弗利特債務監獄中用書信集的形式出版的周刊。——第 460 頁。
- 109 “北極星報”（《*The Northern Star*》）是英國的一種周刊，憲章派的中央機關報；1837 年創刊，1852 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從 1844 年 11 月起在倫敦出版。該報的創辦人和主編為菲·奧康瑞爾，40 年代喬·哈尼也曾任該報主編。1845 年 9 月至 1848 年 3 月間弗·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第 468 頁。
- 110 愛·米德的“蒸汽王”（《*The Steam-King*》）一詩是由弗·恩格斯譯成德文的。該詩原文登載于 1843 年 2 月 11 日“北極星報”第 274 號上，比德譯文多兩節。該詩的俄譯者為薩·馬爾夏克。——第 472 頁。
- 111 “兩大陸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是資產階級的文艺政論性的雙周刊，1829 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485 頁。
- 112 據傳說，羅馬貴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向公元前 494 年起義的平民講了一則人體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因而把他們說得服服貼貼。——第 511 頁。
- 113 指設菲爾德、布萊得弗德及其他城市中由奸細所挑起的憲章派和警察

- 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这一运动的許多領袖和参加者被捕。——第 519 頁。
- 114 *Mechanics' Institutions* 是一种夜校，工人們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科目和技术科目的知識；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倫敦(1824年)出現。19世紀40年代初，这种学校有二百多个，大都在郎卡郡和約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資產階級利用这些学校来訓練工業所必需的熟練工人，并使这些工人受他們支配。——第 527 頁。
- 115 戴·弗·施特勞斯“耶穌傳”1835—1836年杜賓根版第1—2卷(D. F. Strauß. «Das Leben Jesu». Bd. 1—2, Tübingen, 1835—1836)。关于蒲魯東的著作見本卷注14。——第 528 頁。
- 116 “矿业杂志”(«*The Mining Journal*»)是1835年起在倫敦出版的經濟技术周刊。——第 538 頁。
- 117 禁止在地下劳动中雇用妇女和十岁以下兒童的法案，1842年8月10日在議會通过。——第 540 頁。
- 118 皇家法庭是英国最古老的法庭之一，在19世紀(1873年以前)是一个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独立的高等法庭，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級法院的判決。——第 543 頁。
- 119 *Writ of Habeas Corpus* (人身保护状)是英国的审判實踐中通用的一种文件的名称，它責成相当的审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将被捕者提交法庭，以便审查逮捕是否合法。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审查，法庭或釋放被捕者，或将其押回監獄，或取保釋放。1679年法案所規定的这个程序不适用于叛国罪而經議會議决后也可以停止其效力。——第 543 頁。
- 120 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鎮压1798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把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給剝夺了，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議會。从19世紀20年代起，取消合并(Repeal of Union)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在1840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 563 頁。

- 12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6—655頁。  
——第564頁。
- 122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經濟學家的信條，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範圍內的任何事務。——第566頁。
- 123 “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或宴会)”这一成語引自神話“一千零一夜”，在这个宴会上給飢餓者端來的是一个个的空菜盤。——第583頁。
- 124 指“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週報，1834年由羅·歐文創辦，一直出版到1846年；最初在里昂出版，從1841年10月起改在倫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弗·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第588頁。
- 125 指卡·馬克思和阿·盧格所辦的“德法年鑒”——見本卷注16。——第588頁。
- 126 “特利爾日報”(«*Trier'sche Zeitung*»), 1757年在特利爾創刊，1815年起以這個名稱出版；從19世紀40年代初起成為激進的資產階級報紙；到40年代中葉開始刊載論社會主義的文章，其中包括它的固定撰稿人卡·格律恩的文章。格律恩很快就成了“真正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第589頁。
- 127 “發言人報，或萊茵—威斯特伐里亞通報”(«*Sprecher oder Rheinisch-Westphälischer Anzeiger*»), 1798年在多特蒙德創刊，19世紀40年代在威塞爾出版；從1842—1844年11月卡·格律恩參加了該報的編輯工作。——第589頁。
- 128 指德國的報紙“前進報”(«*Vorwärts*»)；該報於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兩次。馬克思從1844年夏天起密切地參與該報的編輯工作，該報在他的影響下開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該報對普魯士反動制度展開了尖銳的批評。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都曾在該報發表過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68—489、656—705頁)。根據普魯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內閣於1845年1月

- 下令把馬克思及該報其他一些工作人員驅逐出法國；“前進報”因而停刊。——第 589 頁。
- 129 指 1844 年 11 月 9 日“科倫日報”第 314 號副頁上所刊載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社會主義的’魔影”。——第 590 頁。
- 130 “和諧”(《*Harmony*》)是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的信徒們——於 1841 年在英國漢普郡所創辦的共產主義移民區的名稱。該移民區一直存在到 1846 年初。——第 591 頁。
- 131 譯文是恩格斯根據海涅原詩的較早的稿子翻譯的，它和首次發表在 1844 年 7 月 10 日“前進報”第 55 號上的原文不同，這篇譯文的第一小節中多一個第三行。——第 591 頁。
- 132 指 1845 年的“德國公民手冊”(《*Deutsches Bürgerbuch*》)年鑒，該年鑒是海·皮特曼於 1844 年 12 月在達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鑒除載有大量的“真正社會主義者”的文章外，還有威·沃尔弗、詩人格·維爾特這類革命民主運動活動家的著作，同時還有關於美洲共產主義移民區和歐文主義者在英國的“和諧”移民區的報道。這些報道是弗·恩格斯編輯的，取材於“新道德世界”、“北極星報”和“晨報”，並譯成了德文。1846 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 1846 年“德國公民手冊”年鑒中載有弗·恩格斯的一篇譯文“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斷”，並附有他所寫的前言和結束語(見本卷第 654—661 頁)。——第 594 頁。
- 133 指“萊茵社會改革年鑒”(《*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雜誌，這個雜誌是激進政論家海·皮特曼辦的；共出版過兩卷，第 1 卷於 1845 年 8 月在達姆斯塔德出版，第 2 卷於 1846 年年底在德國和瑞士邊境的一個小地方別列塢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要取得在德國宣傳共產主義觀點的陣地，就必須利用雜誌。在該雜誌第 1 卷中載有弗·恩格斯於 1845 年 2 月 8 日和 15 日在愛北斐特的集會上所發表的演說全文(“在愛北斐特的演說”)，在第 2 卷中載有他的“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一文(見本卷第 602—626 頁和 662—676 頁)。但是年鑒的總的方向已為“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德意志思想體系”

(1845—1846)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第 594 頁。

- 134** 指“社会明鏡”(«*Gesellschaftsspiegel*»)月刊。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杂志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杂志由莫·赫斯任编辑，在爱北斐特出版，刊载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在 1845—1846 年間总共出版了 12 期。——第 594 頁。
- 135**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馬克思曾經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 年 2 月 1 日，馬克思和出版商列斯凱签订了該書两卷本的出版合同。馬克思从 1843 年年底起开始鑽研政治经济学，在 1844 年春天已經給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場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所謂“1844 年的經濟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聖家族”，馬克思暂时推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 1844 年 12 月才又回来从事这一工作。馬克思在 1845—1846 年研究英法经济学家时所做的大量的大綱、摘要和札記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計劃。关于促使馬克思再度延期实现他的計劃的原因，他自己在 1846 年 8 月 1 日給列斯凱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認为，最重要的是在我正面地闡述問題之前写一本論战性的著作来反对德国的哲学和从那时起就存在着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要使群众接受那种和德国过去的科学刚好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样做是必要的。”馬克思在这里所說的“論战性的著作”就是指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1847 年 2 月出版商取消了“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書的出版合同。——第 594 頁。
- 136** 威·魏特林“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842 年斐維版 (W.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vis, 1842)。——第 594 頁。
- 137** 指刊载在“德法年鑒”上的卡·馬克思写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52—467 頁。——第 595 頁。



- 13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75—593、594—595頁。——第597頁。
- 139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是“真正社会主义者”奥·吕宁創办的月刊。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599頁。
- 140 指“人民总匯报。当代重大問題每月通俗評論”(«*Allgemeines Volksblatt. Populärer Monatsbericht über die wichtigsten Zeitfragen*»),1845年1月—1846年初在民主主义活动家德斯特尔的参与下在科倫出版。德斯特尔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联系。——第599頁。
- 141 指的是“新軼文集”(«*Neue Anekdoten*»);这个集子是1845年5月底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集子中載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等人給报纸撰写但是被書报檢查机关所禁止的文章,大半均写于1844年上半年。从格律恩致赫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集子出版后不久,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針对它的内容發表了許多尖銳的批評性的意見。——第600頁。
- 142 A. Becker. «*Was wollen die Kommunisten?*». 1844年在洛桑出版的一个小册子。——第601頁。
- 143 指卡·馬克思發表在1843年1月的“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摩塞尔記者的辯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10—243頁)。——第617頁。
- 144 德国經濟学家弗·李斯特在其1841年于斯圖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政治經濟学的国民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und Thübingen, 1841)一書中闡述了他的保护关稅的观点。——第619頁。
- 145 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發动的所謂第一次鴉片战争結束,中国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約,該条約中有一条規定中国开放广州、上海、厦門、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同英国通商。——第623頁。

- 146 萊比錫大屠殺 是指薩克森軍隊槍殺 1845 年 8 月 12 日在萊比錫舉行遊行示威的群眾這件事。遊行示威是為了反對薩克森政府鎮壓“德國天主教徒”的運動和迫害其領袖之一的約·隆格牧師；它的導火綫是為迎接親王約翰而舉行的閱兵典禮。1844 年德國許多邦里都發生了“德國天主教徒”的運動，這一運動席卷了大部分中小資產者。“德國天主教徒”推翻了羅馬教皇的權力和天主教的許多教條與儀式後，便竭力使天主教適應於上升的德國資產階級的需要。——第 627 頁。
- 147 1819 年 8 月 16 日，為爭取選舉改革在曼徹斯特近郊聖彼得廣場舉行群眾大會的手無寸鐵的群眾遭到英國軍隊的血腥屠殺。由於這一事件和滑鐵盧戰役相類似，所以現在的人都把它叫做彼得盧事件。——第 627 頁。
- 148 1688 年的政變在英國資產階級的历史書上稱為“光榮革命”。這次政變後，英國確立了以土地貴族和金融資產階級的妥協為基礎的君主立憲政體。——第 629 頁。
- 149 1791 年資產階級的制憲會議通過了憲法，確立了法國的君主立憲政體，這個憲法被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人民起義所廢除，結果君權被推翻了。——第 635 頁。
- 150 弗·恩格斯寫“德國狀況”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反對用反動的民族主義觀點來敘述德國的历史，特別是敘述 1813—1815 年對拿破侖法國的戰爭的历史。恩格斯批判了民族主義的觀點，同時也對這個戰爭作了片面的估價。在這次戰爭中，人民群眾反對拿破侖第一的掠奪政策的民族解放鬥爭，被統治階級和當權的王朝利用來恢復歐洲的封建秩序。後來，弗·恩格斯在他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8 年)中重新評價這個历史時期時寫道：“各民族反對拿破侖的全民戰爭，是遭拿破侖蹂躪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識的反映。”——第 637 頁。
- 151 使德國繼續保持分裂的聯邦條例於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維也納會議上通過。這個文件的第十三條對加入德意志聯邦的各邦許下了制訂憲法的諾言，但諾言未曾實現。——第 644 頁。

- 152 指 1820 年 1 月在西班牙爆發的資產階級革命，1820 年 7 月在那不勒斯和巴勒摩、1820 年 8 月在葡萄牙以及 1821 年 3 月在皮蒙特等地的革命發動。由於神聖同盟派遣法國軍隊入西班牙，奧地利軍隊入意大利進行干涉，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了。——第 650 頁。
- 153 法國燒炭黨人的密謀組織成立於 1820 年底—1821 年初，它是仿意大利的同一名稱的組織建立的。法國燒炭黨人把各種政治派別的代表人物團結在自己的隊伍里，目的是要推翻波旁王朝。1822 年他們密謀在許多城市（伯爾福、羅舍爾等城市）的衛戍部隊中同時舉行起義。在密謀失敗和某些領袖慘遭殺戮後，燒炭黨人的組織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第 650 頁。
- 154 指 1816—1819 年英國群眾性的民主運動的高漲；運動是在為改革選舉法而鬥爭的口號下進行的。——第 650 頁。
- 155 指 1830 年法國資產階級的七月革命。——第 651 頁。
- 156 按照英國 1832 年的選舉法，在城市里，每年租金不少於 10 英鎊的房東和承租人獲得了選舉權。——第 651 頁。
- 157 載於德意志各邦維也納代表會議的最後（1834 年 6 月 12 日）記錄上的決議規定，各邦君主必須在反對自由主義和民主運動的鬥爭中互相支持。該文件由自由派政論家韋爾凱爾發表在 1844 年在曼海姆出版的“關於德意志國民的法律狀況的重要文件”（«Wichtige Urkunden für den Rechtszustand der deutschen Nation»）一書上。——第 652 頁。
- 158 英國內務大臣詹·羅·喬·格萊安為了討好奧地利政府，於 1844 年命令郵政管理局允許警察秘密檢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這一行動引起了民主團體的憤怒。——第 652 頁。
- 159 “傅立叶論商業的片斷”（«Ein Fragment Fourier's über den Handel»）一文的翻譯工作，是包括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在德國傳播英法兩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優秀著作而草擬的一個比較大的出版計劃之內的。弗·恩格斯在“傅立叶論商業的片斷”的前言和結束語中第一次

- 公开地批評了“真正社会主义者”。“真正社会主义者”对待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者的那种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态度，以及他們想頌揚“真正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的企圖，特別明显地表现在 1845 年 8 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卡·格律恩所著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一書中。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一書中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卡·格律恩进行了全面的批評。——第 654 頁。
- 160 恩格斯指的是罗·施泰因所著的“現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書。——第 654 頁。
- 161 这里指的是傅立叶在他的著作中对自然界将来要發生的变化所作的近于幻想的描写：海水的怪味将会改变，南北極上空将会出現放热的灵光，野兽将会变成有利于人类的牲畜，等等。——第 656 頁。
- 162 接下去就是弗·恩格斯所譯的傅立叶的作品。譯文在本版中沒有列入。恩格斯所选的片断包括沙·傅立叶未完成的著作“論三种外在統一”的前七章。傅立叶的这个著作在他死后發表在 1845 年出版的傅立叶派的杂志“法郎吉”（《La Phalange》）中（見“傅立叶选集”俄譯本，1951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 卷第 228—318 頁）。这几章給商業下了一般的定义，并叙述了各种类型的破产。其中某些地方同沙·傅立叶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論”一書中“論商業的無限自由”一篇完全相同。在“法郎吉”上發表手稿的时候，这几个地方都代以删节号。恩格斯在自己的譯文中按照傅立叶原著的相应頁次恢复了这些地方，略去了傅立叶对未来所作的近于幻想的离題較远的描写、某些沒有现实意义的暗示以及由于傅立叶运用了特別的術語而难于理解的地方。恩格斯翻譯的部分見上面提到的俄譯本第 228—232、237、240—244、249—252、253—260、261、262—263、265、266—269、271、272—313、314、315、316—318 頁。——第 657 頁。
- 163 恩格斯指的是 1843 年不来梅出版的赫·沃·凱澤尔所著的“財產的个性”（H. W. Kaiser. «Die Persönlichkeit des Eigenthums»。

Bremen, 1843)一書。——第 658 頁。

- 164 “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一文是弗·恩格斯在 1845 年年底寫的，發表在 1846 年年底出版的“萊茵年鑒”(«Rheinische Jahrbücher»)第 2 卷上。在本文中，恩格斯根據 1845 年 9 月 27 日“北極星報”第 411 號的報道，描寫了 1845 年 9 月 22 日在倫敦舉行大會的經過情況並轉述了會上的發言。這個大會實際上奠定了國際民主主義協會——“民主派兄弟協會”的基礎。參加該協會的有憲章派左翼、德國的工人——正義者同盟盟員和僑居在倫敦的其他各國的革命流亡者。恩格斯非常重視這個大會(他和馬克思都參加了它的籌備工作)，並特地為它寫了這篇文章。文章的第一段恩格斯以諷刺的口吻重述了一些“真正社會主義者”(格律恩、呂寧等)的典型的論調。這些人一方面對其他的民族抱虛無主義的態度，一方面卻以民族主義的態度吹噓德國民族的優越性。恩格斯批判了這些觀點，他提出各國無產者利害一致的思想來和它們相對抗。——第 662 頁。
- 165 引自海涅的詩“安心”。海涅在這首詩里抨擊德國小市民的市儈作風和因循習慣，並拿古羅馬的共和主義者來和他們相比照。——第 663 頁。
- 166 “卡馬尼奧拉”是 18 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形成的一首革命歌曲。它的歌詞聯系着當前的政治事件而有所修改和補充。——第 664 頁。
- 167 1793 年憲法 是法國雅各賓派專政的头幾個月中所擬定的憲法，它屬於資產階級憲法中最民主的憲法。這個憲法開頭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布主權屬於人民，人民有權起來革命，反對篡奪他們政權的政府；這個宣言還承認社會有義務保證無產者有工作做和關心沒有勞動能力的人。憲法取消了財產資格的限制，實行了普選權，同時卻宣布私有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1793 年的憲法由於內戰和反革命干涉未能付諸實行，1794 年熱月 9 日後該憲法被取得了政權的反革命大資產階級所撕毀。——第 664 頁。
- 168 指法國革命軍隊於 1792 年 11 月 6 日在熱馬普和 1794 年 6 月 26 日在弗略留斯同歐洲各反革命君主第一次聯盟的軍隊作戰時所取得的勝

- 利。——第 665 頁。
- 169 1845 年 8 月下半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直接促進了英國工人運動的活動家和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人物的接近。他們出席了憲章主義者和正義者同盟倫敦組織的領導者同各國民主革命運動的活動家所舉行的協商會議。據 1845 年 8 月 23 日“北極星報”報道，會議在恩格斯的支撐下通過了如下的決議：“召開居住在倫敦的各國民主主義者的公開會議，討論建立一個協會，以期彼此了解（通過定期的聯席會議）各國爭取共同事業的運動進行的情況。”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參加 9 月 22 日的會議，因為他們當時已經離開倫敦。——第 667 頁。
- 170 托·庫伯的詩“自殺者的滌罪所。獄中詩稿十篇”是模仿拜倫的“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寫成的；於 1845 年在倫敦出版。——第 668 頁。
- 171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編輯和發行的通報”（《L'Union. Bulletin des ouvriers rédigé et publié par eux-mêmes》），是 1843 年 12 月至 1846 年 9 月在巴黎出版的月刊；由一批受聖西門思想影響的工人出版。——第 668 頁。
- 172 四月審判案是審訊法國工人共和主義運動的 167 名活動家的事件。他們因 1834 年 4 月的里昂起義以及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革命發動被控叛國。被告中也有秘密的、共和主義的人權和公民權協會的領袖。在 1835 年的審判中，大多數被告被殘酷地判決流放到殖民地或長期監禁。一部分被告，其中包括在審判期間逃走掉的 28 個人，受到了缺席判決。——第 675 頁。
- 173 路·勃朗“1830—1840 年的十年歷史”第 1—5 卷（L. Blanc. «Histoire de dix ans. 1830—1840». T. I—V.）。第一版於 1841—1844 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引證的是本書的德譯本，這個譯本於 1844—1845 年在柏林出版。——第 675 頁。
- 174 “萊茵觀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是一種保守的日報；於 1844—1848 年初在科倫出版。——第 677 頁。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業年表

(1844年8月—1846年4月)

### 1844

8月底—9月初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巴黎會見；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給他們創造性的合作、他們共同的學術工作以及他們為無產階級事業進行的革命鬥爭奠定了基礎。

當兩位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了解了他們“在一切理論方面”（恩格斯）都是完全一致的以後，他們便着手合寫他們的第一部作品；這部作品他們打算題名為“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恩格斯在巴黎逗留的十天中間，為本書個別章節寫了七篇文章。

馬克思邀請恩格斯為“前進報”撰稿，他自己則親身參加該報的編輯工作。

恩格斯直接去了解法國的工人運動，參加法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集會，也會見了俄國的政治活動家米·巴枯寧和格·托爾斯泰。

8月31日—10月19日

“前進報”刊載了弗·恩格斯的兩篇論文“英國狀況。十八世紀”和“英國狀況。英國憲法”；這兩篇文章是他在1844年2月—3月在英國寫的，當時準備在“德法年鑒”上發表。

9月6日左右

恩格斯離巴黎回德國，回巴門市。

- 9月—11月** 馬克思在巴黎繼續写“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他大大地扩充了他和恩格斯最初拟定的計劃，在这部著作中利用了他的一部分經濟哲学手稿，也利用了有关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史的筆記和摘录。
- 1844年9月—1845年1月** 馬克思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保持着联系，和德国人的秘密組織巴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保持着联系，也和大多数法国工人秘密組織的領袖保持着联系；他經常出席德法两国工人和手工業者的集会。
- 1844年9月下半月—1845年3月** 恩格斯在巴門写作“英国工人階級状况”。  
恩格斯在萊茵省積極参加社会主义宣傳工作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組織工作。他和巴門、爱北斐特、科倫、杜塞尔多夫、波恩等城市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在集会上宣傳共产主义的思想，参加出版社会主义刊物的工作。
- 10月初** 恩格斯写信給馬克思，报道社会主义宣傳工作在德国进行的情况，并且談到迫切需要写两三本書来闡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以便为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理論的基础。
- 10月18日以后** 馬克思收到威·魏特林从倫敦的来信；該信是对馬克思的“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評論。
- 10月** 恩格斯編輯“現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一文，这是一篇把英国报刊上的材料譯成德文的文章；这篇报道于1844年12月發表在1845年的“德国公民手册”上。
- 1844年10月—1845年4月初** 恩格斯繼續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撰稿，在該报上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德国傳播的情况。



- 11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給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麦·施蒂納的著作“唯一者及其财产”。
- 11月下半月 馬克思結束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書的工作，将手稿送交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在排印过程中馬克思在本書的标题上又加了“神聖家族”这几个字。
- 12月 馬克思讀了麦·施蒂納的著作“唯一者及其财产”后，打算在“前进报”上写文章批判該書。
- 1844年底—  
1845年1月 馬克思在巴黎繼續研究 18 世紀和 19 世紀头几十年的英法两国經濟学家的著作。

## 1845

- 1月16日 法国政府在普魯士的压力下下令驅逐卡·馬克思和“前进报”的几个撰稿人出法国。
- 2月1日 馬克思和在巴黎的出版商列斯凱(来自达姆斯塔德)簽訂合同，出版两卷集的經濟著作“政治和政治經濟学批判”。
- 2月2日左右 馬克思在巴黎会见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埃·卡貝。
- 2月3日 馬克思因在巴黎被逐迁往比利时的京城布魯塞尔。
- 2月—7月 馬克思在布魯塞尔繼續写他的經濟著作。
- 2月—12月 馬克思和在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動家以及正义者同盟巴黎組織的領導人通信来往。
- 2月8、15、22日 恩格斯参加在爱北斐特組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討論会的工作。恩格斯在2月8日和15日的大会上的演說，發表在1845年8月的“萊茵年鑒”第1卷上。
- 2月24日左右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神聖家族，或对批判

- 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一書問世。
- 2月25日** 恩格斯接到地方当局的正式通知，禁止在爱北斐特举行任何討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集会。
- 3月15日** 弗·恩格斯結束了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書的工作，將手稿送交萊比錫的出版商。
- 春天** 卡·馬克思寫“費爾巴哈論提綱”，這是“包含着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
- 3月—5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交涉在德国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
- 4月5日左右** 恩格斯給“新道德世界”寫了一篇报道爱北斐特集会的文章；該文于1845年5月10日發表。恩格斯也就此停止为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撰稿。
- 4月5日以后** 恩格斯迁往布魯塞爾馬克思处。
- 4月—12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与比利时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动家以及波兰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联系。
- 5月底** 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書在萊比錫出版。
- 7月12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到倫敦和曼徹斯特旅行，目的是研究英国的經濟文献，同时也是为了更进一步熟悉英国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英国的工人运动。
- 7月下半月—8月上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徹斯特逗留期間一直在公共圖書館里研究英国經濟学家的著作。
- 8月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會見了宪章派報紙“北極星報”的一位編輯喬·哈尼；也會見了正义者同盟倫敦組織的領導人卡·沙佩爾、約·莫爾等。

- 8月20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參加了憲章派、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和各國的一些革命民主主義運動活動家的集會。會議在恩格斯的贊助下通過了如下的決議：必須在倫敦建立各國民主主義者的協會，以便相互交換各國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情報。
- 8月24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英國回布魯塞爾。
- 9月8日到11日之間** 弗·恩格斯寫“最近發生的萊比錫大屠殺。——德國工人運動”一文。這篇文章於9月13日發表；從此，他開始為“北極星報”撰稿。
- 9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開始寫“德意志思想體系”一書；該書在制定共產黨的理論的哲學的原理方面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因此馬克思就停止了整理“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卷手稿的工作。
- 10月15日** 弗·恩格斯寫“德國狀況”的第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刊登在10月25日的“北極星報”上。
- 11月8日** “北極星報”發表弗·恩格斯的“德國狀況”的第二篇文章。
- 12月1日** 馬克思得知普魯士政府通過比利時政府將其逐出比利時的訊息後，放棄了普魯士的國籍。
- 1845年底** 恩格斯鑒於出版“外國傑出的社會主義者文叢”的計劃因找不到出版商無法實現，他就把他翻譯的傅立葉著作的片斷（“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斷”）發表在1846年的“德國公民手冊”上，並且給它寫了前言和結束語。恩格斯這次發表文章的目的是在於第一次公開地反對“真正社會主義”。
- 恩格斯寫“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一文，該文到1846年底才刊登在“萊茵年鑒”第2卷上。

## 1846

- 1846年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建立共产主义聯絡委員會，目的在於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團結各國社會主義者和先進的工人。他們設法在倫敦、巴黎和德國建立聯絡委員會，為創立國際無產階級的政黨準備基礎。
- 1月18日** 馬克思因1846年1月18日“萊茵觀察家”第18號說他是“特利爾日報”的撰稿人，特為此辟謠。
- 2月20日** 恩格斯為“北極星報”寫“德國狀況”的第三篇文章。
- 3月3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共产主义聯絡委員會的會議（魏特林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上，尖銳地批評了威·魏特林的“真正社會主義”和粗糙的平均共產主義。
- 4月4日** “北極星報”刊載了弗·恩格斯的“德國狀況”的第三篇文章。
- 4月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結識了從德國流亡來的威·沃尔弗；他被吸收入布魯塞爾共产主义聯絡委員會，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實學生與戰友。
-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寫作“德意志思想體系”。

## 人名索引

### 三 画

小卡托(馬可·波尔齐烏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 95—46)——羅馬国家活动家, 貴族共和政党的領袖; 不願意看到共和国的垮台, 因此便自杀了。——第 156 頁。

### 四 画

巴萊, 戴維 (Barry, David 1780—1835) ——英国医生和生理学家。——第 439—442、448、449 頁。

巴賽, 彼得 (Bussey, Peter) ——1839 年宪章主义公会會員; 1839 年約克郡起义失败后脱离运动。——第 518 頁。

巴朗, 查理 (Barham, Charles 1804—1884) ——英国医生, 1841 年是童工調查委员会委員。——第 531 頁。

巴貝夫, 格拉古 (Babeuf, Gracchus 1760—1797) ——真名为弗朗斯瓦·諾艾尔, 法国革命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 “平等派”密謀的組織者。——第 58、152、664、665 頁。

邓斯·司各脫, 約翰 (Duns Scotus, John 約 1265—1308) ——中世紀經院哲学家, 唯名論(唯物主义在中世紀的最初表現)的代表人物, 著有“牛津文集”这一杰作。——第 163 頁。

邓科布, 托馬斯·斯令斯比 (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 ——

英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分子, 40 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第 297、547、572、675 頁。

孔德, 沙尔 (Comte, Charles 1782—1837) ——法国自由主义政論家, 庸俗經濟学家。——第 28、54、55 頁。

孔狄亚克, 埃蒂耶納·博諾 (Condillac, Etienne Bonnot 1715—1780) ——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感觉論者, 洛克的信徒。——第 162、165 頁。

日拉, 菲力浦 (Girard, Philippe 1775—1845) ——著名的法国工程师和發明家。——第 290 頁。

尤尔, 安得魯 (Ure, Andrew 1778—1857) ——英国化学家, 庸俗經濟学家, 自由貿易論者。——第 407、420、427、453—455、458、474、510—512 頁。

牛頓, 伊薩克 (Newton, Isaac 1642—1727) ——偉大的英国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力学科学的創始人。——第 160 頁。

扎克, 卡尔·亨利希 (Sack, Karl Heinrich 1789—1875) ——德国新教神学家, 波恩的教授。——第 258 頁。

丹东,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s Jacques 1759—1794) ——18 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人的右派領袖。——第 155、665 頁。

## 五 画

卡貝,埃蒂耶納(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論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記”一書的作者。——第 167、675 頁。

卡萊尔,托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揚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發表近于 40 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場上批判英国的資產階級,傾向托利党,1848 年后成为徹头徹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 15、350、375、377、402、403、510、561、564、565、583 頁。

卡西烏斯(凱尤斯·卡西烏斯·朗金)(Caius Cassius Longinus 死于公元前 42 年)——羅馬政治活动家,人民护民官,反对尤利烏斯·凱撒的貴族共和国密謀的發起人之一。——第 156 頁。

卡特賴特,艾德蒙(Cartwright, Edmund 1743—1823)——著名的英国發明家。——第 286 頁。

卡巴尼斯,比埃尔·讓·若尔日(Cabanis, Pierre Jean Georges 1757—1808)——法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160 頁。

卡提利納,魯齊烏斯·賽尔吉烏斯(Catiline, Lucius Sergius 公元前約 108—62)——羅馬政治活动家,貴族,反对貴族共和国密謀的組織者。——第 155 頁。

布魯諾(Bruno)——見鮑威尔,布魯諾。

布林德利,詹姆士(Brindley, James 1716—1772)——英国工程师,运河建筑工程师。——第 294 頁。

布萊克斯頓,威廉(Blackstone, William

1723—1780)——英国法律家,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辯护人。——第 249 頁。

布黎紀瓦特,弗兰西斯(Bridgewater, Francis 1736—1803)——公爵,英国的大土地占有者。——第 294 頁。

布魯士斯,馬可·尤尼烏斯(Brutus, Marcus Junius 公元前約 85—42)——羅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烏斯·凱撒的貴族共和国密謀的發起人之一。——第 155 頁。

卢——見卢-拉維涅,比埃尔·賽勒斯丹。

卢,雅克(Roux, Jacques 1752—1794)——18 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活动家,代表城乡最貧苦的劳动者階層利益的“瘋人派”領袖之一。——第 152 頁。

卢-拉維涅,比埃尔·賽勒斯丹(Roux-Lavergne, Pierre Célestin 1802—1874)——法国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268 頁。

卢格,阿尔諾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資產階級激进分子,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197 頁。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托利党人,首相(1841—1846),在自由党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 436、461、547、582 頁。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50—1830)——英国棉紡織工厂大厂主,議會議員,托利党人。——第 436、455 頁。

皮索,魯齊烏斯·卡普尔尼烏斯(Piso, Lucius Calpurnius 生于公元前 101 年)——公元前 58 年的羅馬执政官,尤利烏斯·凱撒的拥护者。——第 155 頁。

皮特曼,海尔曼(Püttmann, Hermann

- 1811—1894)——德国激进的诗人和记者, 40年代中“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591、594、599頁。
- 弗安, 罗伯特(Vaughan, Robert 1795—1868)——英国牧师,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論家。——第405頁。
- 弗兰德, 威廉(Ferrand, William)——倾向托利党的英国土地占有者。——第572、583頁。
- 弗罗斯特, 约翰(Frost, John 1784—1877)——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1838年参加宪章运动, 由于組織1839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 因此被判终身流放至澳大利亚洲; 后来被赦免而在1856年回到英国。——第518、675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1797—1840)。——第640、644、646、650頁。
- 甘斯, 爱德华(Gans, Eduard 約 1798—1839)——德国法学教授, 黑格尔主义者。——第228頁。
- 瓦特, 詹姆斯(Watt, James 1736—1819)——杰出的英国發明家, 設計了蒸汽机。——第286頁。
- 边沁, 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功利主义理論家。——第167—170、227、240、247、528、529頁。
- 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Hamilton, Alexander 1767—1852)——公爵, 英国大土地占有者。——第540頁。
- 第15、414、428、430、433、446、460、461、539、583頁。
- 艾利生, 阿契波德(Alison, Archibald 1792—1867)——英国历史学家和經濟学家, 托利党人。——第15、314、374、384、400、405—407、412、414、417、560、562頁。
- 艾利生, 威廉·巴尔特尼(Alison, William Pulteney 1790—1859)——爱丁堡大学医学教授, 托利党人。——第314、315、374、385頁。
- 西尼耳, 納騷·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庸俗經濟学家, 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第346頁。
- 西哀士, 艾曼紐尔·約瑟夫(Sieyè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法国神甫, 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39頁。
- 西斯蒙第, 讓·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学家, 批評資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評家。——第40頁。
- 伊丽莎白(Elizabeth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第574頁。
- 伊壁鳩魯(Epikouros 公元前約341—約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無神論者。——第161頁。
- 亚立司泰提(Aristides [Ἀριστοειδης] 公元前約540—467)——古希腊政治活动家和战略家, 雅典温和和民主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第155頁。
- 亚历山大里亚的奧力金(Origene of Alexandria 約 185—254)——基督教

## 六 画

艾釋黎, 安东尼(Ashley, Anthony 1801—1885)——从1851年起为舍夫茨利伯的伯爵, 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神学家,所謂“教会的祖先”之一。——第 202、227 頁。

米德, 爱德华 (Mead, Edward) ——英国工人詩人, 他的詩在宪章派的报纸“北極星报”上发表过。——第 472 頁。

米太雅第 (Miltiades (*Μιλτιάδης*) 死于公元前 489 年) ——古希腊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 在他指揮之下雅典人在馬拉松战役中战胜了波斯人。——第 155 頁。

安东尼, 馬可 (Antonius, Marcus 公元前 83—30) ——羅馬政治活动家和战略家, 尤利烏斯·凱撒的拥护者。——第 156 頁。

考尔德, 威廉 (Coward, William 約 1656—1725) ——英国医生, 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165 頁。

吉伯特, 托馬斯 (Gilbert, Thomas 1720—1798) ——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580 頁。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1694—1778) ——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諷刺作家, 历史学家, 18 世紀資產階級啓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 曾經为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而斗争。——第 161 頁。

多德威尔, 亨利 (Dodwell, Henry 死于 1711 年)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165 頁。

托克維尔, 阿列克西斯 (Tocqueville, Alexis 1805—1859) ——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238 頁。

齐赫林斯基, 弗兰茨 (Zychlinski, Franz 1816—1900) ——普魯士軍官, 青年黑格尔分子, 以施里加的名字为布·鮑威尔的定期刊物撰稿。——第 7、68—70、

75—84、86—98、110、207、208、211—215、225—228、230、237、242、244、247、249、256、265、266 頁。

## 七 画

克希林 (Köchlin) —— 1845 年任艾斯林根(維尔騰堡)的紡紗厂厂长, 保护关税論者。——第 665 頁。

克魯克, 威廉·特劳戈特 (Krug, 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190 頁。

克特根, 古斯塔夫·阿道夫 (Köttgen, Gustav Adolf 1805—1882) ——德国画家和詩人, 在 40 年代时曾参加工人运动, 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社会主义”。——第 597、598 頁。

克倫普頓, 賽米尔 (Crompton, Samuel 1753—1827) ——著名的英国發明家。——第 14、286 頁。

克萊米約, 阿道夫 (Crémieux, Adolphe 1796—1880)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在 40 年代时是資產階級自由党人。——第 147 頁。

克罗狄烏斯(普卜利烏斯·克罗狄烏斯·普尔克尔 Publius Claudius Pulcher 死于公元前 52 年) ——羅馬政治活动家, 尤利烏斯·凱撒的拥护者, 公元前 58 年为人民护民官。——第 155 頁。

李, 約翰 (Lee, John 1779—1859) ——苏格兰牧师, 从 1840 年起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第 315 頁。

李奇, 詹姆士 (Leach, James)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織工, 在 19 世紀 40 年代时是郎卡郡宪章派組織的領導者之一。——第 421、422、424、466、467、481、483、484 頁。

李嘉圖, 大衛 (Ricardo, David 1772—



- 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闻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38、40頁。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傳極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619、620頁。
- 狄更斯，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笔名波茲，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9頁。
- 狄德罗，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人物，無神論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一，啓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的領袖。——第166、528頁。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Δημοσθένης] 公元前384—322)——杰出的古希腊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为反对馬其頓征服希腊而斗争。——第155頁。
- 貝克尔，奧古斯特 (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論家，在40年代时是瑞士魏特林派領袖之一。——第601頁。
- 貝利耶-封丹，卡米尔 (Berrier-Fontaine, Camille 約生于1806年)——法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674頁。
- 貝奈狄克斯，罗德里希 (Benedix, Roderich 1811—1873)——德国作家和剧作家，1845年是爱北斐特的剧院院长。——第597頁。
- 亨得利，查理 (Hindley, Charles)——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慈善家，工厂法的拥护者。——第582頁。
- 亨茨曼，本杰明 (Huntsman, Benjamin 1704—1776)——著名的英国發明家。——第292頁。
- 麦克亚当，約翰·勞頓 (MacAdam, John Loudon 1756—1836)——英国公路視察員，公路建筑专家。——第294頁。
- 麦克庫洛赫，約翰·雷姆賽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287、364、584頁。
- 沃尔弗，克利斯提安 (Wolff, Christian 1679—17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者。——第84頁。
- 沃尔涅，康斯坦丁·弗朗斯瓦 (Volney, Constantin François 1757—1820)——法国资产阶级啓蒙运动者，自然神論哲学家。——第166頁。
- 苏，欧仁 (Sue, Eugène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說。——第68—70、76—78、83—87、89、93、94、97、210、212、215、218、230—233、236—240、243、251、256—258頁。
- 呂宁，奧托 (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論家，在40年代中期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66年后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591、599頁。
- 勞頓，查理 (Loudon, Charles 1801—1844)——英国医生，1833年是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委員。——第439、440、444、447、449、450頁。
- 伯麦，雅科布 (Böhme, Jakob 1575—1624)——德国手工業者，神秘主义哲学家。——第163頁。
- 但丁，阿利格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627頁。
- 怀特曼，威廉 (Wightman, William 1784

—1863)——英国的法律家,从1841年起是皇家法庭的委員。——第543頁。

杜畢伊,沙尔·弗朗斯瓦(Dupuis, Charles François 1742—1809)——法国資產階級啓蒙運動者。——第166頁。

伽桑狄,比埃尔(Gassendi, Pierre 1592—1655)——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學說的拥护者和宣傳者;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第161頁。

里謝尔,加布里埃尔(Riesser, Gabriel 1806—1863)——犹太人,德国政論家,奋起保护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第121—125、145頁。

希斯科特,約翰(Heathcoat, John 1783—1861)——英国發明家。——第288頁。

邦納羅蒂,菲力浦(Buonarroti, Filippo 1761—1837)——意大利革命家,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法国革命运动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貝夫的战友;他的“为平等而密謀”一書(1828)使工人革命运动中重新恢复了巴貝夫的传统。——第152頁。

岑卜尼斯,威廉·威爾頓(Champneys, William Weldon 1807—1875)——英国牧师,資產階級慈善家。——第370頁。

辛利克斯,海爾曼·弗里德里希·威廉(Hinrichs, Hermann Friedrich Wilhelm 1794—1861)——德国哲学教授,黑格尔右派分子。——第115、117—119、124、133、139、175、176、178、179、180頁。

## 八 画

罗,約翰(Law, John 1671—1729)——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財政专家,曾任法国財政大臣(1719—1720),以發行紙幣的投机活动最后徹底破产而聞名。——第161頁。

罗素,約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領袖,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第16頁。

罗泰克,卡尔(Rotteck, Karl 1775—1840)——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第157頁。

罗伯頓,約翰(Roberton, John 1797—1876)——英国医生。——第392、448頁。

罗伯茨,威廉·普洛廷(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律家,与宪章运动以及工联运动有联系。——第542、543、546—548、571、572頁。

罗默尔,泰奧多尔(Rohmer, Theodor 1820—1856)——德国政論家。——第268頁。

罗默尔,弗里德里希(Rohmer, Friedrich 1814—185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268頁。

罗比耐,讓·巴蒂斯特·勒奈(Robinet, Jean Baptiste René 1735—1820)——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166頁。

罗伯斯比尔,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領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153—156、664頁。

波茲(Boz)——見狄更斯,查理。

波特,乔治(Porter, George 1792—1852)——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統計学

- 家。——第 287 頁。
- 波門特, 托馬斯 (Beaumont, Thomas 死于 1859 年) ——英國外科醫生。——第 439、443 頁。
- 波旁王朝 (Bourbons) ——法國王朝名 (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103、158 頁。
- 波爾斯威克, 彼得 (Borthwick, Peter 1804—1852) ——英國政治活動家, 托利黨人, 從封建貴族的反動立場批評工廠制度。——第 583 頁。
- 波蒙·德·拉·蓬尼埃爾, 古斯塔夫 (Beaumont de la Bonnière, Gustave 1802—1866) ——法國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著有論述奴隸制和美國的感化機構等書籍。——第 238 頁。
- 帕金森, 理查 (Parkinson, Richard 1797—1858) ——英國牧師, 資產階級慈善家。——第 410、568 頁。
- 帕特遜, 約翰 (Patteson, John 1790—1861) ——英國法律家, 皇家法庭委員 (1830—1852)。——第 543 頁。
- 帕爾尼, 埃瓦里斯特·德吉烈 (Parny, Evariste Désiré 1753—1814) ——子爵, 法國詩人。——第 87 頁。
- 帕爾佐夫, 罕麗達 (Paalzw, Henriette 1788—1847) ——德國女作家。——第 23 頁。
- 阿克萊, 理查 (Arkwright, Richard 1732—1792) ——產業革命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企業家, 占有他人在英國的許多發明專利權。——第 13、286、502 頁。
- 阿爾諾, 安都昂 (Arnauld, Antoine 1612—1694) ——法國哲學家, 笛卡兒的唯心主義認識論的擁護者, 形而上學者。——第 162 頁。
- 阿貝爾, 雅克·勒奈 (Hébert, Jacques René 1757—1794) ——18 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 雅各賓黨人的左派領袖。——第 146 頁。
- 阿那克薩哥拉 (小亞細亞克拉左門地方的人) (Anaxagoras aus Klazomenae 公元前約 500—428) ——古希臘哲學家, 唯物主義者。——第 163 頁。
- 法赫爾, 茹爾 (尤利烏斯) (Faucher, Julius 1820—1878) ——德國政論家, 青年黑格爾分子; 德國自由貿易的擁護者之一。——第 7、13、46、49、99、103、110 頁。
- 法拉第, 邁克爾 (Faraday, Michael 1791—1867) ——著名的英國學者, 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第 547 頁。
- 拉菲特, 雅克 (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 ——法國大銀行家, 政治活動家, 奧爾良分子, 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第 651 頁。
- 拉美特利, 朱利安 (Lametrie, Julien 1709—1751) ——法國醫生, 哲學家, 機械唯物主義的卓越代表人物。——第 160、166 頁。
- 芬奇, 約翰 (Finch, John) ——英國記者, 歐文的信徒。——第 599 頁。
- 彌勒, 威廉 (Müller, Wilhelm 1816—1873) ——筆名為沃尔弗干格·彌勒·馮·科尼斯文特爾。德國詩人, 1845 年是杜塞爾多夫的醫生。——第 598 頁。
- 歐文, 羅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偉大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107、167、239、455、525、591、612、655 頁。
- 門采爾, 沃尔弗干格 (Menzel, Wolfgang 1798—1873) ——德國反動作家和文學批評家, 民族主義者。——第 195 頁。

昔蒙茲,詹林格·庫克遜 (Symons, Jelinger Cookson 1809—1860) ——英國自由主義政論家, 1841 年是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第 318、398、400、425、492、503、535 頁。

提吉里奧,波利多羅 (Vergilio, Polidoro 約 1470—1555) ——意大利人, 僑居英國, 寫了許多歷史書。——第 90 頁。

孟德維爾,貝爾納德 (Mandeville, Bernard 1670—1733) ——英國民主主義的倫理學作家和經濟學家。——第 167 頁。

## 九 畫

威德,約翰 (Wade, John 1788—1875) ——英國政論家, 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第 393 頁。

威廉斯,約翰 (Williams, John 1777—1846) ——英國法律家, 從 1834 年起是皇家法庭委員, 自由黨人。——第 543 頁。

威廉斯,澤芬奈阿 (Williams, Zephaniah 約 1794—1874) ——憲章主義者, 1839 年威爾士礦工起義的組織者之一; 被判終身流放澳大利亞洲。——第 675 頁。

威季伍德,約瑟亞 (Wedgwood, Josiah 1730—1795) ——英國工業家, 改進了英國的陶器業生產。——第 293 頁。

威克菲爾德,愛德華·吉本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 ——英國資產階級政論家。——第 552 頁。

施里加 (Szeliga) ——見齊赫林斯基, 弗蘭茨。

施泰因,卡爾 (Stein, Karl 1757—1831) ——男爵, 普魯士國家活動家, 在 1804—1808 年他歷任許多高級職務,

參加了進行旨在鞏固普魯士國家的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改革。——第 641 頁。

施杜姆,卡爾 (Stumm, Karl 1836—1901) ——德國大工業家, 保守黨人, 工人運動的凶惡敵人。——第 546 頁。

施蒂納,麥克斯 (Stirner, Max 1806—1856) ——卡斯巴爾·施米特的筆名。德國哲學家, 青年黑格爾分子,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家之一。——第 304、566、599 頁。

施特勞斯,大衛·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德國哲學家 and 政論家, 青年黑格爾派的著名人物之一; 1866 年後成為民族自由主義者。——第 110、132、174、177、181、528 頁。

施略費爾,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 ——西里西亞的廠主。——第 601 頁。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 ——英國國王 (1625—1649), 在 17 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被處死。——第 624 頁。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英國國王 (1660—1685)。——第 580 頁。

查理五世 (Charles V 1500—1558) ——西班牙國王 (1516—1555) 和德國皇帝 (1519—1556)。——第 632 頁。

查得威克,愛得文 (Chadwick, Edwin 1800—1890) ——英國官吏, 議會關於工廠法問題的一系列委員會的參加者。——第 315 頁。

哈尼,喬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 ——英國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 憲章運動左派領袖之一; “北極星報”的編輯; 同馬克思和恩

- 格斯有联系。——第 668、669 頁。
- 哈特莱, 大衛 (Hartley, David 1705—1757)——英国医生, 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165 頁。
- 哈登堡, 卡尔·奥古斯特 (Hardenberg, Karl August 1750—1822)——公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1810—1813 年他为了巩固普魯士国家, 实施了一系列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革; 在維也納會議之后成为神聖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者。——第 641 頁。
- 哈格里沃斯, 詹姆士 (Hargreaves, James 死于 1778 年)——著名的英国發明家。——第 13、284 頁。
- 洛克, 約翰 (Locke, John 1632—1704)——著名的英国二元論哲学家, 感覺論者; 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第 160、162、164、167、168 頁。
- 洛維特, 威廉 (Lovett, William 1800—1877)——英国小資產階級激进分子, 宪章运动参加者, “道德力量”的拥护者, 主張和資產階級合作。——第 516 頁。
- 科布頓,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反谷物法同盟的發起人之一。——第 665 頁。
- 科林斯, 安东尼 (Collins, Anthony 1676—172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165 頁。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Disraeli, Benjamin 1804—1881)——貝肯斯菲尔德公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在 40 年代时参加“青年英国”社, 后来成为保守党的領袖, 1868 年和 1874—1880 年曾任首相。——第 410、582 頁。
- 迪加尔特, 弗里德里希 (Diergardt, Friedrich 1795—1869)——德国的紡織工
- 厂大厂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第 665 頁。
- 約翰 (Johann 1801—1873)——薩克森亲王, 从 1854 年起为薩克森国王。——第 627 頁。
- 拜倫, 乔治 (Byron, George 1788—1824)——杰出的英国詩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528 頁。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活动家, 站在同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上。——第 675 頁。
- 胡德, 托馬斯 (Hood, Thomas 1799—1845)——英国现实主义詩人,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第 498 頁。
- 柏拉圖 (Plato 公元前約 427—約 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 229 頁。
- 柯德尔——傳說中的雅典皇帝, 相傳他活在公元前 11 世紀。——第 156 頁。
- 派西沃, 托馬斯 (Percival, Thomas 1740—1804)——英国医生, 資產階級的慈善家。——第 436 頁。
- 韋尔凱尔, 卡尔·泰奧多尔 (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律家, 自由主义政論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會議的議員, 屬於右派。——第 157 頁。

## 十 画

-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小資產階級政論家, 在 40 年代中期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591 頁。
- 格萊格, 罗伯特·海德 (Greg, Robert Hyde 1795—1875)——英国大厂主,

- 自由党人。——第 445、473 頁。
- 格梭吉, 理查·杜加尔德(Grainger, Richard Dugard 1801—1865)——英国医生和生理学家, 1841 年是童工調查委员会委員。——第 389、397、476、479、488 頁。
- 格魯培, 奧托·弗里德里希 (Gruppe, Otto Friedrich 1804—1876) ——德国政論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1842 年写了一本反对布·鮑威尔的小册子。——第 200 頁。
- 格萊安,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 1841—1846 年为皮尔的托利党内閣的内务大臣。——第 16、18、460—462 頁。
- 格勞修斯, 胡果 (Grotius, Hugo 1583—1645) ——荷兰学者, 法律家, 資產階級天赋人权論的奠基人之一。——第 60 頁。
- 馬拉, 讓·保尔 (Marat, Jean Paul 1743—1793) ——法国政論家, 18 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出色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領袖之一。——第 103、665 頁。
- 馬太, 特奧巴德 (Mathew, Theobald 1790—1856) ——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士。——第 414 頁。
- 馬丁·杜·諾尔, 尼古拉·斐迪南 (Martin du Nard, Nicolas Ferdinand 1790—1847)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从 1840 年起是司法和文化大臣, 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第 147、149 頁。
-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 8、111、136、591、594、595、599、600、617、661、667、677 頁。
- 馬尔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国牧师, 反动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 宣揚仇視人类的人口論。——第 364、365、425、572、575、576 頁。
- 馬勒伯朗士, 尼古拉 (Malebranche, Nicolas 1638—1715)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形而上学者。——第 159、162、165、166 頁。
- 海依, 威廉 (Hey, William 1772—1844) ——英国医生。——第 439、440 頁。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偉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591 頁。
- 爱里斯, 威廉 (Ellis, William) ——斯泰福郡宪章派組織的领导者之一; 因参加 1842 年 8 月的起义被判流放澳大利亚 20 年。——第 675 頁。
- 爱尔維修, 克勞德·阿德里安 (Helvétius, Claude Adrien 1715—1771)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無神論者, 法国的革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第 162、165—169 頁。
- 夏普塔尔, 讓·安都昂 (Chaptal, Jean Antoine 1756—1832) ——法国化学家, 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第 255 頁。
- 夏恩霍斯特, 盖尔哈特 (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 ——普魯士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为实行旨在巩固普魯士国家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革。——第 641 頁。
- 泰勒, 約翰 (Taylor, John 1804—1841) ——英国医生, 曾加入宪章运动的左翼。——第 518 頁。

倍恩, 托馬斯 (Paine, Thomas 1737—1809)——英国激进的政論家, 共和主义者, 美国独立战争和 18 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 292、645、675 頁。

庫伯, 托馬斯 (Cooper, Thomas 1805—1892)——英国詩人和記者, 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40 年代初参加宪章运动, 后来成为基督教的傳教士。——第 668 頁。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偉大的德国作家。——第 257、637 頁。

桑德斯, 罗伯特·約翰 (Saunders, Robert John)——19 世紀 40 年代的英国工厂檢查員。——第 459 頁。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8、39、273—280、300、343、372、450、513、564、583、590、591、593—600、616、631、646、654、661、667 頁。

埃德加尔——見鮑威尔, 埃德加尔。

倫敦德雷, 查理·威廉 (Londonderry, Charles William 1778—1854)——侯爵, 英国大土地占有者。——第 545 頁。

特莉斯坦, 弗洛拉 (Tristan, Flora 1803—1844)——法国女作家, 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21、22、240 頁。

荣格尼茨, 恩斯特 (Jungnitz, Ernst 死于 1848 年)——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第 19 頁。

索麦维尔, 亚力山大 (Somerville, Alexander 1811—1885)——英国記者,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 557、599 頁。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103、114、157、158、637—642、644、646 頁。

## 十一画

培尔, 比埃尔 (Bayle, Pierre 1647—1706)——法国怀疑論哲学家, 宗教独断論的批評者。——第 162 頁。

培根, 弗兰西斯 (Bacon, Francis 1561—1626)——維魯拉姆男爵,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英国唯物主义的創始人, 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163—165 頁。

培恩斯, 爱德华 (Baines, Edward 1800—1890)——英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 自由党人。——第 420 頁。

畢舍, 菲利浦 (Buche, Philippe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 153、268 頁。

畢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9)——德国激进政論家, 1847—1852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后来成为自由党人。——第 599 頁。

勒卢阿, 昂利 (Le Roy, Henri 1598—1679)——荷兰医生, 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第 160 頁。

勒克莱尔克, 泰奥菲尔 (Leclerc, Teophile 生于 1771 年)——18 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代表城乡最貧苦的劳动者阶層利益的“瘋人派”領袖之一。——第 152 頁。

莫尔, 約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科倫的鐘表匠, 正义者同盟的領導者之一,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巴登起义中牺牲。——第 672 頁。

- 莫里哀,讓·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 Baptiste 1622—1673)——偉大的法國劇作家。——第 68 頁。
- 蓋伊,茹爾 (Gay, Jules 1807—1876 后)——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第 167 頁。
- 蓋斯克爾,彼得 (Gaskell, Peter)——英國醫生,自由黨人,資產階級政論家。——第 15、348、388、413、417、583 頁。
- 雪萊,派爾西·畢希 (Shelley, Percy Byssche 1792—1822)——杰出的英國詩人,革命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無神論者。——第 528 頁。
- 雪恩,亨利希·泰奧多爾 (Schön, Heinrich Theodor 1773—1856)——普魯士國家活動家;曾參加為實行旨在鞏固普魯士國家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革。——第 641 頁。
- 荷馬 (Homerus)——傳說中的古希臘敘事詩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第 58、242 頁。
- 康德,伊曼努爾 (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國哲學家,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德國唯心主義的創始人。——第 228、634 頁。
- 笛卡兒,勒奈 (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杰出的法國二元論哲學家,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第 159—161、165、166、168 頁。
- 密契爾,詹姆斯 (Mitchell, James 1786—1844)——英國資產階級社會活動家,寫了一系列的通俗科學作品,1841 年是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第 531、532 頁。
- 莎士比亞,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國作家。——第 89、543、552 頁。

- 許布納爾,卡爾 (Hübner, Karl 1814—1879)——德國民主主義派現實主義畫家。——第 589 頁。

## 十二畫

- 斯密,亞當 (Smith, Adam 1723—1790)——英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38、40、61、364、404 頁。
- 斯特治,約瑟夫 (Sturge, Joseph 1793—1859)——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貿易論者;抱著使工人階級受資產階級影響的意圖參加了憲章運動。——第 522 頁。
- 斯密斯,托馬斯·薩斯伍德 (Smith, Thomas Southwood 1788—1861)——英國醫生,1841 年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第 356、383、537 頁。
- 斯賓諾莎,巴魯赫(別涅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杰出的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第 159、162、163、165、166、168、174、177 頁。
- 斯提芬斯,約瑟夫·雷納 (Stephens, Joseph Rayner 1805—1879)——英國牧師,在 1837—1839 年曾積極地參加過郎卡郡的憲章運動。——第 518、524、585 頁。
- 萊辛,卡爾·弗里德里希 (Lessing, Karl Friedrich 1808—1880)——德國民主主義派畫家。——第 590 頁。
- 萊喀古士——傳說中的古斯巴達立法者,相傳他活在公元前 9—8 世紀。——第 155 頁。
- 萊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偉大的德國數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



- 第136、159、161、165、166頁。
- 費希特, 約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 ——德國哲學家, 主觀唯心主義者,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德國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第153、177、634頁。
- 費爾巴哈, 路德維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 ——馬克思以前德國最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第48、69、105、117—120、159、162、177、179、186、279、594、595、654頁。
- 普蘭克, 卡爾·克里斯提安 (Planck, Karl Christian 1819—1880) ——德國新教神學家, 唯心主義哲學家。——第132頁。
- 普里斯特利, 約瑟夫 (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 ——著名的英國學者, 化學家, 唯物主義哲學家。——第165頁。
- 凱-夏特沃斯, 詹姆士·菲利浦斯 (Kay-Shuttleworth James Phillips 1804—1877) ——英國醫生, 資產階級的社会活動家。——第330、343、345、347、348、376、464頁。
- 凱撒(凱尤斯·尤利烏斯)(Caesar, Caius-Julius 公元前約100—44) ——著名的羅馬戰略家和国家活動家。——第155頁。
- 瓊斯, 威廉 (Jones, William 約1808—1873) ——英國鐘表匠, 憲章主義者, 1839年威爾士矿工起義的組織者之一; 被判終身流放澳大利亞洲。——第675頁。
- 隆格, 約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 ——德國牧師, 利用天主教來為德國的資產階級服務的“德國天主教徒”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第627頁。
- 富瓦, 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提安 (Foy, Maximilien Sébastien 1775—1825) ——法國將軍。——第94頁。
- 傅立叶, 沙爾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 ——偉大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38、103、106、111、167、247、249、255、291、591、625、654—660頁。
- 菲爾登, 約翰 (Fielden, John 1784—1849) ——英國廠主, 資產階級慈善家, 工廠法的擁護者。——第582頁。
- 曼諾斯, 約翰 (Manners, John 1818—1906) ——拉特蘭德公爵, 英國貴族, 托利黨人, 著有關於工廠工人狀況的偽善的博愛主義書籍。——第583頁。
- 閔采爾, 托馬斯 (Münzer, Thomas 約1490—1525) ——偉大的德國革命家, 宗教改革及1525年農民戰爭時期農民和平民的領袖及思想家, 他宣傳了空想平均共產主義的思想。——第645頁。
- 湯姆生, 查理·波立特 (Thomson, Charles Poulett 1799—1841) ——悉登楠男爵, 英國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人。——第346頁。
- 黑格爾, 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國最大的哲學家, 客觀唯心主義者, 極全面地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第13、20、21、24、26、44、49、75、100、105、108、109、110、114、118、132、133、138、146、159、166、168、174、176、177、179、213、214、228、244—246、256、279、634、654、655、658、663頁。

### 十三画

奧斯特勒, 理查 (Oastler, Richard 1789—1861) ——英國政治活動家, 傾向托利黨, 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貿易論的斗

- 爭中主張通過立法限制勞動日。——第 431、460、461、518 頁。
- 奧康奈爾，丹尼爾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愛爾蘭律師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家，民族解放運動右翼自由派的領袖。——第 563 頁。
- 奧康瑙爾，菲格斯 (O'Connor, Feargus 1794—1855)——憲章運動左翼領袖之一，“北極星報”的創辦人和編輯，1848 年後成為改良主義者。——第 349、668、975 頁。
- 聖西門，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偉大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38、654 頁。
- 聖茹斯特，路易·安都昂 (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18 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動家，雅各賓黨人領袖之一。——第 155、156、665 頁。
- 雷馬爾凱維奇，萊昂 (Rymarkiewicz Leon 約生于 1825 年)——1844—1845 年波茲南波蘭愛國者革命密謀的參加者。——第 601 頁。
- 雷馬爾凱維奇，馬克西米利安 (Rymarkiewicz, Maximilien 約生于 1832 年)——1844—1845 年波茲南波蘭愛國者革命密謀的參加者。——第 601 頁。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國國王 (1643—1715)。——第 70 頁。
- 路斯達洛，埃利塞 (Loustallot, Elisée 1762—1790)——法國政論家，民主主義革命家，18 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第 102 頁。
- 葛德文，威廉 (Godwin, William 1756—1836)——英國小資產階級作家和政論家，唯理論者，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之一。——第 528 頁。

瑙威爾克，卡爾 (Nauwerck, Karl 1810—1891)——德國政論家，曾參加柏林的青年黑格爾分子集團“自由人”。——第 18—20 頁。

#### 十四画

- 福適，萊昂 (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國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自由黨人，工人運動的凶惡敵人。——第 485 頁。
- 福斯，約翰·亨利希 (Voß, Johann Heinrich 1751—1826)——德國詩人，荷馬、味吉爾及其他古代詩人作品的翻譯家。——第 242 頁。
- 福斯特，格奧爾格 (Forster, Georg 1754—1794)——德國作家，民主主義者，18 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參加者。——第 645 頁。
- 維多克，弗朗斯瓦·歐仁 (Vidocq, François Eugène 1775—1857)——法國的刑事犯，警察局密探；一般認為“維多克回憶錄”一書出于他的手筆；他的名字已成為狡猾的密探和騙子手的代名詞。——第 93、208 頁。
- 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英國女王 (1837—1901)。——第 312、517 頁。
- 蒙泰，阿芒·阿列克西斯 (Monteil, Amans Alexis 1769—1850)——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第 89 頁。
- 蒙蒂溫，安都昂 (Montyon, Antoine 1733—1820)——法國慈善家，把自己大財產的一部分捐給“慈善獎金”機關。——第 242 頁。
- 赫斯，莫澤斯 (Heß, Moses 1812—1875)——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在 40 年代中期為“真正社會主義”的重要代表

人物之一。——第591、594、597—599頁。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24、634頁。

蒲魯东, 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 無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第26—43、46—65、67、199、528、659頁。

### 十五画

賴尔, 查理 (Lyell, Charles 1797—1875)——著名的英国学者, 地質学家。——第547頁。

賴哈特, 卡尔 (Reichardt, Karl)——柏林的一个訂書匠, “文学总匯报”的工作人員。——第9、11、46、99頁。

賴德諾, 威廉·普萊得尔 (Radnor, William Pleydell 1779—1869)——伯爵, 英国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第556頁。

德薩米, 德奧多 (Dézamy, Theodore 1803—1850)——法国政論家, 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卓越代表人物。——第167頁。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都昂·路易·克劳德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Louis Claude 1754—1836)——伯爵, 法国庸俗經濟学家, 感覺論哲学家; 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40頁。

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公元前約460—約370)——偉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是原子論的創始人之一。——第161、163頁。

### 十六画

霍恩, 理查·亨利 (Horne, Richard Henry 1803—1884)——英国作家, 1841年是童工調查委员会委員。——第397、489頁。

霍納, 萊昂納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質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833年任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委員, 1841年任童工調查委员会委員。——第427、459頁。

霍弗, 安得列阿斯 (Hofer, Andreas 1767—1810)——1809年在梯罗尔同法国軍隊进行游击战的領導者。——第645頁。

霍布斯, 托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鮮明的反民主的傾向。——第161、163、165頁。

霍布逊, 乔舒阿 (Hobson, Joshua)——英国記者, 宪章主义者。——第668頁。

霍金斯, 弗兰西斯·俾賽特 (Hawkins, Francis Bisset 1796—1894)——英国医生和政論家; 1833年任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委員。——第392、429、433、435、439、444、446、447、449、457、463頁。

霍尔巴赫, 保尔·昂利 (Holbach, Paul Henry 1723—1789)——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無神論者, 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之一。——第166、169、528頁。

霍布豪斯, 約翰·凱姆 (Hobhouse, John Cam 1786—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第456、459頁。

鮑威尔, 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

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7、48、50、99—153、157—159、168—183、186—197、199—206、213、244—246、268、599 頁。

鮑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鮑威尔的弟弟。——第21—28、40、41、45—53、60、62、65—67、99、110、186、199、200、240、268 頁。

### 十七画

戴維，亨弗利(Davy, Humphry 1778—1829)——杰出的英国学者，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第293、538 頁。

謝林，弗里德里希·威廉(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1775—1854)——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成为科学

的凶恶敌人，宗教的竭力拥护者。——第121、196 頁。

### 十八画

薩伊，讓·巴蒂斯特(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39、53、54 頁。

薩德勒，迈克尔·托马斯(Sadler, Michael Thomas 1780—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慈善家，倾向托利党。——第456、460 頁。

魏尔，卡尔(Weil, Karl 1806—1878)——德国自由主义政論家，从1851年起是奥地利的官吏。——第207 頁。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論家之一，他的职业是裁縫。——第594、595、655、656、672、674 頁。

## 期刊索引

### 二 画

“人民总汇报。当代重大问题每月通俗评论”(Allgemeines Volksblatt. Populärer Monatsbericht über die wichtigsten Zeitfragen)——科伦出版。——第599頁。

### 三 画

“小广告”(Petites affiches)——巴黎出版。——第248頁。

### 四 画

“太阳报”(Sun)——伦敦出版。——第470頁。

“文学报”(Literatur-Zeitung)——見“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沙洛顿堡出版。——第7、13、64、98、115、116、127、137、174、176、182、187、192、195、199、201、267、268頁。

### 五 画

“北極星报”(The Northern Star)——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30日起在伦敦出版。——第468、512、555、627、630、631、638、639、645、646、653、668、675頁。

“北英格兰内外科医学杂志”(North of England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第448頁。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242頁。

### 六 画

“机工”(The Artizan)——伦敦出版。——第316、317、320、382、392頁。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編輯和發行的通报”(L'Union. Bulletin des ouvriers, rédigé et publié par eux-mêmes)——巴黎出版。——第668頁。

### 七 画

“每周快訊”(The Weekly Dispatch)——伦敦出版。——第348、356、394、497、523頁。

“每周紀事报”(The Weekly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523頁。

“里子信使报”(The Leeds Mercury)——第469頁。

“两大陆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巴黎出版。——第485頁。

“利物浦信使报”(Liverpool Mercury)——第353頁。

### 八 画

“矿业杂志”(The Mining Journal)——倫

敦出版。——第 538 頁。

“矿工的律师” (*The Miner's Advocate*)

——新堡出版。——第 542 頁。

“法郎吉。社会科学評論” (*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巴黎出版。

——第 656、657 頁。

“和平民主日报” (*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巴黎出版。——第 194 頁。

“社会明鏡。维护無产階級利益和闡明当前社会关系的刊物” (*Gesellschaftsspiegel. Organ zur Vertretung der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und zur Beleucht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 der Gegenwart*)——爱北斐特出版。——第 594、599 頁。

## 九 画

“前进报” (*Vorwärts!*)——巴黎出版。

——第 589 頁。

“总匯报” (*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出版。——第 170 頁。

“观察家” (*The Examiner*)——倫敦出版。

——第 523 頁。

“宪法年鉴” (*Konstitutionelle Jahrbücher*)

——斯圖加特出版。——第 207 頁。

“科倫日报” (*Kölnische Zeitung*)——第 590 頁。

“思辨神学杂志” (*Zeitschrift für spekulative Theologie*)——柏林出版。——第 181 頁。

“哈里法克斯衛报” (*Hallifax Guardian*)

——第 470 頁。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 (*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比雷菲尔出版。——第 599 頁。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巴黎出版。——第 242 頁。

## 十 画

“泰晤士报” (*The Times*)——倫敦出版。

——第 312、418、553、583 頁。

“彩色杂志” (*The Illuminated Magazine*)

——倫敦出版。——第 307、577 頁。

“特利尔日报” (*Trier'sche Zeitung*)——

第 589、677 頁。

“倫敦統計学会会刊”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第 308、321 頁。

“爱丁堡內外科医学杂志” (*Edinburgh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第 315 頁。

## 十一 画

“晨报” (*The Morning Chronicle*)——倫敦出版。——第 476、557 頁。

“曼徹斯特衛报” (*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352、354、355、390、418、429、451、465、468、538、540、567 頁。

“笨拙，或倫敦喧声” (*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498 頁。

## 十二 画

“莱茵观察家” (*Rheinischer Beobachter*)

——科倫出版。——第 677 頁。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 (*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1845 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1846 年在別列塢出版。——第 594、599、600、616、626、676 頁。

“莱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报”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倫出版。——第 128、137、617 頁。

“發言人報，或萊茵—威斯特伐里亞通報”  
(*Der Sprecher oder: Rheinisch-Westphälischer Anzeiger*)——威塞爾出版。  
——第 589 頁。

### 十 三 画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會報”(*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倫敦出版。——  
第 588、592、595、597、601 頁。

### 十 五 画

“德法年鑒”(*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 39、111、  
136—146、142、145、300、564、588 頁。

“德勒穆紀事報”(*Durham Chronicle*)——  
第 293 頁。

“德國公民手冊”(*Deutsches Bürgerbuch*)  
——1845 年在達姆斯塔德出版；1846  
年在曼海姆出版。——第 594、599、  
661 頁。

“德國科學和艺术年鑒”(*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萊比錫出版。——第 128、136 頁。

“德國科學和艺术哈雷年鑒”(*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第 168 頁。

“撒但”(Satan)——巴黎出版。——第 243  
頁。

## 譯 后 記

本卷所載“神聖家族”一書第五和第八兩章，郭沫若同志曾經譯出，先後以“藝術作品的真實性”（1936年11月）和“藝術的真實”（1949年7月）為名，作為單行本出版。我們在翻譯這一部分時參考了他的譯文。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我局曾譯出，於1956年5月出版。過去在翻譯此書時，曾參考了季羨林同志的譯稿；並承李必新、張仲實兩同志根據俄文本、胡雄定同志根據英文本提出過不少意見。這次收入全集時，我們又對譯文作了若干修改。

我們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並參照有關的原文翻譯的。其中“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還參考了英譯本。前後參加翻譯的有王治平、胡堯之、張奇方、周裕昶、易克信、錢文干、孫開煥、伍瑞麟、孫傳己、孫魁、沈淵等同志。全卷譯文最後經謝寧同志校訂。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